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命运三部曲之一

于风政 著

改造

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

河南人民出版社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命运三部曲之一

改造

于风政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改造/于风政著.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1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命运三部曲之一)
ISBN 7-215-04715-6

Ⅰ.改… Ⅱ.于… Ⅲ.知识分子-社会主义改造-中国-1949~1957 Ⅳ.D66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7472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0.375 字数 507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3.00 元

前　言

1949年，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中华民族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对社会进行了全面的革命性改造。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剥削阶级被消灭：一个是地主阶级，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同时消失的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集团，这就是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群体。

众所周知，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关注的社会群体，首先是农民，其次就是知识分子。但是，他历来不承认知识分子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集团。新中国成立以前，他认为知识分子群体的下层属于小资产阶级，中上层多依附于民族资产阶级；对前者的政策是"团结、教育、改造"，使其融化于革命队伍之中，后者则是统战的对象。新中国建立后，社会环境和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毛泽东不但没有相应地调整自己的理论与政策，反而把整个知识分子集团都不加区别地视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对他们实行给工作、给饭吃的"赎买"政策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企图通过这两方面的努力，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充分利用工农革命胜利造成的有利形势，以坚定的意志和高超的政治智慧，以政治运动为基本形式与手段，全面动员政治的、思想的、社会的乃至国家机器的资源，对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群体进

行了日趋激烈的批判斗争。意识形态领域里一个接一个的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打击对象的政治运动，恰如一个不停地释放着无穷能量的强大震源，使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动荡之中。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批判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发生的长期的“左”的错误，正式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实现了知识分子政策的历史性转折。这个转折是伟大的，但也是迟到的，因为经过30年的努力，“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目标，已基本达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学习运动、批判《武训传》和陶行知先生的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派唯心论的运动、清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肃反运动和反右派运动，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一部分人接受“改造”，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一部分人被戴上各种帽子打入“另册”，脱离了正常的社会生活，更多的人则被迫保持长期的沉默。“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个群体中那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人，亦陷入灭顶之灾。经过政治运动的打击和岁月流逝的摧残，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神州大地的时候，虽有少数老一辈知识分子重新出现在学术与社会舞台上，但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集团早已七零八落，不再成其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中华民族在1919年至1949年间万分艰苦的条件下聚积起来的这支队伍中不乏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和学术大师。新中国建立后，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推进了祖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其中的一小批人由于特殊的历史机遇曾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如“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但是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得到充分施展才华的机会。研究中国当代史，不能无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现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翻开了新的一页，知识分子有了光明的前途。但是，历史的创伤是如此之重，以致事情过去十几、二十年后，许多人仍然难以摆脱昨天的梦魇。1987年4月17日，巴金老人在致冰心先生的信中说：我“有时忽发奇想，以为从此自己可以

摘掉知识分子的帽子,空欢喜一阵子。可是想来想去,还不是一场大梦?! 不管有没有'知识',我脸上给打上了知识分子的金印,一辈子也洗刷不掉了。可悲的是一提到知识分子,我就仿佛看见我家里的小包弟。它不断地作揖摇尾,结果还是给送进了解剖室。"① 1995年,季羡林先生在论及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特征时说:"干知识分子这个行当是并不轻松的,在过去的七八十年中,我尝够了酸甜苦辣,经历够了喜怒哀乐。走过了阳关大道,也走过了独木小桥。有时候,光风霁月;有时候,阴霾满天。有时候,峰回路转;有时候,柳暗花明。金榜上也曾题过名,春风也曾得过意,说不高兴是假话。但是,一转瞬间,就交了华盖运,四处碰壁,五内俱焚。""我从来不相信什么生死轮回。现在,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再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播弄成知识分子。"②

这两位历经北洋军阀、国民政府、人民中国三个时代的学界泰斗、文化大师,当代中国公认的最杰出、最典型的知识分子,今天既为知识界顶礼膜拜,也受到政治家的无比尊崇。在躬逢改革开放盛世、知识分子时来运转之时,他们竟然还要发出如此悲愤的感叹,实在令人惊心动魄。一方面,酷爱自己的国家、民族与人民,以近于宗教徒式的献身精神,不计名利,辛勤工作;一方面,内心又充满着对自身悲剧性命运无可奈何和悲愤不已的情绪,这就是当代中国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态。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的坎坷遭遇,正是导致这种不正常心态的直接原因。要理解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不能不研究他们昨天的历史。

迅猛推进的现代化进程赋予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空前伟大的使

---

① 《巴金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27页。"小包弟"是巴金先生家的一条狗。

② 季羡林:《朗润琐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6、121页。

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即是对知识分子群体作用的肯定。知识分子要自检、自省,完成群体精神、群体人格、群体文化、群体道德的重建,亦即完成自身的现代化,才能担负起这伟大的责任。历史永远是人类最宝贵的智慧资源和百科全书。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我们需要经常回顾历史,从历史中吸取智慧和力量。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消失,固然是执政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等许多不可抗拒的外部因素的结果,从主体来说,却又是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消解、自我的失落,亦即知识分子群体精神的消失。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群体,自我的失落、精神的变异,除了环境的压迫以外,是不是还缘于本性的自我迷失和潜在的卑贱与怯懦?在五四运动过后80年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回顾与反思先人们的历史,看看他们曾经怎样在社会环境的压力下努力坚守自我,最终却失去了同五四的精神联系,也失去了知识分子的特质。

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消失,既是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生剧变的结果,又是构成这种历史变迁的一部分。正如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管理体制、执政党的治国模式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即1949年至1957年间基本确定的一样,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集团,也是在同一时期的社会剧变和一连串以知识分子为斗争对象的政治运动中基本完成其精神蜕变并归于消失的。这个过程,是知识分子群体与外部环境双向互动的过程,而这个互动过程,在反右派运动以后即归于停止。因此,研究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必须研究1949年至1957年间知识分子的历史。

本书不是执政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史,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知识分子史。笔者将着力再现知识分子在那个激动人心的社会变革时代的欢欣与失落、自省与内疚、进步与蜕变,着力反映知识分子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政治运动中的茫然与被动、逆反与顺从。换言之,本书所研究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的思想与精神

怎样一步步得到“改造”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旧中国过来的、以欧美留学生为核心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一步步走向消失的历史。

目　录

第一章 旧邦新命之际

民国的遗产:以欧美留学生为核心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集团——跟共产党走:十字路口的选择:——跨入新社会:新天新地新感觉——改造的基础:自卑感、愧疚感的产生——政治学习运动:第一个知识分子检讨浪潮——参加土地改革:阶级斗争实践中的思想感情变化——抗美援朝运动:对崇美思想的初步清理

1.1 民国的遗产:以欧美留学生为核心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集团

中国的近代知识分子集团,是20世纪初期形成的。1905年,清廷废科举,兴学校,全面推行新式教育。1911年,全国已有新式中等学校985所,学生113669人;大学4所,专科学校115所,学生40114人;留学生达到2万人。这些新式学堂的学生和留学生,构成了最初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民国元年至1949年,全国的大学和专科学校共培养毕业生约25万人,另有100万左右的肄业生和4万人左右的留学生。粗略估计,民国时期培养的有高等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总数应在150万人左右。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新的社会群体。自清末以至于整个民国时期,向先进的西方学习,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改造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建设现代化的科学、教育

和文化，以实现中国的独立、统一、民主、富强，是历经挫折而长期激荡不止的社会潮流。近代知识分子群体，正是这一潮流的产物。特定的时代背景，先后以日本和美国学制为蓝图的新式教育，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留学生教育，使中国的近代知识分子既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时也深受西方政治与文化的影响。他们普遍地接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属于五四一代或是五四精神的传人。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后，这个集团的左翼转向马克思主义，追随共产党；其右翼由信仰三民主义转为信奉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投向国民党。但是，知识分子群体的左右两翼只是少数人。它的主体是游离于左右两端的自由主义分子，这部分人在政治上崇尚西方式的民主、法治与自由，追求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与经济富强，反对专制、独裁、卖国；在思想上，崇尚科学，追求个性解放，反对半封建半法西斯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在社会改造的方式与道路方面，主张科学救国、教育救国、逐步改良，反对暴力革命。他们希望把中国改造和建设成为英美那样的实行议会制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始终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主体和领导阶层，因此，应当肯定，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基本上是一个以西方社会价值观念为主导意识、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素养、以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为己任的精英集团。

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的主导意识、政治倾向、精神风貌，显著地受到留学生群体的影响。清朝末年，大批有志青年为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东渡日本求学。他们在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的斗争中发挥了先驱与先锋的作用。民国初年，日本仍是留学生的主要去向，但欧美留学生人数剧增。1911 年至 1949 年，仅留美生就达到 18000 人，其中，1945 年至 1949 年有 5000 人赴美留学。民国时期的留日生继承了清末留日学生关心政治与社会变革的传统，在政治界、文化界长期占据突出地位。这个群体中出现的

陈独秀、李大钊、李达、鲁迅、郭沫若等许多著名人物，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社会的政治与文化变革。但是，日本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文明程度远逊于欧美。欧美各国博大深厚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的科学精神，崇尚民主、自由、法治的社会价值观念与政治制度，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教育，中国留学生在欧美大学所受的正规的、严格的科学训练，使欧美留学生大多具有自由主义的政治信仰与社会价值取向，也有更好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修养，许多人在留学期间已经取得了世界一流的研究成果。因此，民国时期的教育界、科技界、学术界，长期以欧美留学生特别是留美生为核心。例如，1912年至1929年，清华学校派出庚款生1279人。到1949年，这批人中有大学校长、院长39人，系主任63人，教务长11人。1948年11月当选的81名中央研究院院士，77名是留学生，其中留美生至少有46人，这种情况一直沿续到新中国[①]。所以说，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知识分子集团，其核心与上层始终以留学生为主。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群体。毛泽东在1939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指出："数十年来，中国已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在这一群人中间，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

---

① 中国科学院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部，1955年首批学部委员为172人，留学生占90%；1957年增补后的191名学部委员，留学生占91.1%，其中留美生占有留学经历的委员的58%。1981年增补后的400名学部委员，留学生占86%，其中留美生占有留学经历的委员的59.7%。1998年，中科院629位院士中，留学生为507人，占80.6%。留学日本与留学欧美的两个留学生群体的政治与社会价值取向的差别，可以从他们在国共两党中的分布得到进一步的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成员中最多的是留日生、留苏生、赴法勤工俭学生，几乎没有正规的欧美留学生。勤工俭学生大多没有接受西方的正规高等教育，故不宜看做普通的欧美留学生。

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运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运动,就是显明的例证。尤其是广大的比较贫苦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工农一道,参加和拥护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① 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的革命性与进步性,正是这一群体所具有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政治体现。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既源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也是近代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残酷现实所致。民国时期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深重,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也就特别的强烈。

毛泽东对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的评价,自然也适用于以留学生为主体的上层知识分子。民国时期的留学生,出国留学的具体动机不同,政治倾向、专业领域、学术思想不同,但忠于祖国、热爱民族,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学,为国家富强而学,学成后为国效力,始终是这个群体的主导精神。这个群体中的许多人在欧美著名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留学期间已经取得了很高的学术地位。当时的中国长期处在战乱之中,留学生回国后甚至谈不到基本的科研条件与生活条件,他们也许比今天的留学生更有理由滞留不归,然而,他们还是毅然回到苦难深重的祖国。以往曾被人们看做是最"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清华留美生,其爱国精神丝毫不逊于他人。1909 年至 1924 年,清华学校共派出庚款留美生 963 人,在 1924 年以前回国的就有 620 余人。1957 年的中科院学部委员中,这一时期的清华留学生就有 29 人。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第 641 页。

陶行知、陈鹤琴、廖世承、侯德榜、蒋梦麟、赵元任、王力、闻一多、梁实秋、李健吾、林庚、钱钟书、吴组缃、曹禺、孙瑜、金岳霖、马寅初、茅以升、罗隆基、周培源、梁思成、汤用彤、杨石先、竺可桢、萨本栋、秉志等人，都是这一时期的清华庚款生。1937年的《清华同学录》载有该校留学生1152人，其中学成回国者1132人，归国率达98%，远远高于今天的留学生回国率[①]。在国家贫穷落后、战乱不止的条件下，留学生爱国与否的首要标准，就是看他学成后是不是回国将其才学贡献于祖国。在国内政治斗争中采取何种立场，政治倾向与政治态度如何，主要是对救国建国道路的不同选择，不能成为爱国与否的标志。否认民国时期以留学生为主体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情感，就无法理解他们在社会大转折关头作出的历史性选择。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直接或间接地接受资本主义的现代教育，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他们以西方国家为理想的社会蓝图，企图以科学的、教育的、改良的手段，把中国改造和建设成为欧美式的国家。但是，这不能证明他们是完全西化的一群。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大多在发蒙时期即熟读四书五经，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又非常注意对学生灌输传统的伦理道德，因而，知识分子仍然深受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在接受西方的新思想、新科学、新文化的同时，仍然保持着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情感模式、心理特征、行为方式、处世品格，其深层次的心理结构仍然是中国化的，不少人身上有非常浓厚的士大夫习气。他们仍然偏重于关心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并不特别

① 据《人民日报》1999年2月4日报道，最近20年来，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近32万人，回国总数超过10万人。回国率不足1/3，而且回国人员多为进修生和访问学者，攻读学位的留学生是少数。又据《中国高等教育》1998年第12期一篇文章中的数字，1978年至1997年间我国自费留学生为15.4万人，回国6000余人，回国率仅为4%。

注重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仍然恪守着诸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进则仕,退则隐"、"士为知己者死"等传统的文人准则。正如当时的中国正处在空前的变动中的无序状态一样,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的心理结构也是诸种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因素的复合。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大转折的时期,几种不同的社会发展方向的斗争非常激烈。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分裂从来没有如此深刻与不可调和。在知识分子的心理结构中,传统与现代、现实与理想、改良与革命、个人与社会、学术与政治等等的冲突如此尖锐,以至于这个集团不断地发生分化和重组。它的广大下层日益倾向共产党,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直接投入革命的队伍。它的大部分中上层分子,抗战中期以后曾幻想依托民族资产阶级,聚合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周旋于国共两党之间,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十足道地的英美式的民主国家",然而,在以战争为最终解决手段的社会冲突中,知识分子集团是软弱无力的。它完全没有独立行动的能力。当国共两党争夺全国政权的斗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它的中上层分子便不得不作出或去或留的命运攸关的抉择。

1.2 跟共产党走:十字路口的选择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蒋介石运走了所有的黄金、白银、外币和中央博物院、故宫博物院的文物精品,也曾制定了"抢运学人"的计划,最终却劳而无功。2月3日,北京各大学的教授们,冒着刺骨的寒风,举着小旗,同欣喜若狂的工人、市民一起,到前门欢迎列队入城的解放军。在沸腾的人群里,有许多来自北大、清华、燕京、辅仁等著名大学的教授,有费孝通、钱伟长、张奚若、雷洁琼、周建人、胡愈之、吴晗等人的身影。1948年当选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共81人,留在大陆或新中国建立初期回到大陆的

60人，占院士总数74%[①]；去美国的12人，占院士总数的15%；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的仅有9人，占院士总数11%。在新旧社会更替的历史转折点上，知识分子集团的上层终于和它的中下层汇集到一起，选择了共产党。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上层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名流，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②]。他们知道，工农革命成功、共产党掌握政权后，将没收官僚企业，实行土地改革和私营企业国有化，他们的父兄将成为革命的对象，他们本人在旧社会享有的特殊地位与待遇亦不复存在。他们长期追求建立欧美式民主国家的社会理想，幻想走所谓“第三条道路”，长期不愿认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其社会价值观和政治价值观与共产党相去甚远。然而，1949年，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却毫不犹豫地抛弃国民党，投向了共产党，这只能归因于他们具有的强烈的爱国情感。

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社会不变的主题，也是知识分子集团甘愿为之献身的最崇高的事业。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到大革命时期，知识分子集团的主体作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同路人，共同反对北洋军阀，就是因为北洋军阀反动、专制、卖国。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后的一个时期，多数知识分子靠近国民党，疏离共产党，是因为他们对于国民党领导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

---

① 他们是：姜立夫、许宝騄、华罗庚、苏步青、吴有训、李书华、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饶毓泰、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侯德榜、李四光、翁文灏、黄汲清、杨钟健、谢家荣、竺可桢、周仁、茅以升、萨本栋、王家楫、伍献文、贝时璋、陈桢、童第周、胡先骕、殷鸿章、张景钺、钱崇澍、戴芳澜、李宗恩、张孝骞、汤佩松、冯德培、蔡翘、俞大绂、邓叔群、罗宗洛、秉志、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征、陈垣、陈寅恪、顾颉刚、梁思永、郭沫若、梁思成、周鲠生、钱端升、马寅初、陶孟和、陈达。

② 据张静如、刘志强主编的《北洋军阀时期的中国社会状况》记载，1936年，大学教授的起点工资是技工起点工资的28.6倍，最高工资是技工最高工资的47.6倍。

抱有希望。但是,国民党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党一人的独裁专制,投靠英美,对日妥协,背弃三民主义,排斥民族资本,拒不解决土地与农村问题,使知识分子的幻想破灭。上层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既反对共产党,也不满于国民党,抗战前胡适对国民党政府的不合作态度,即是明证之一。许多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放弃了依靠国民党政权改造中国社会的努力,改走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抗战军兴,国民党政府曾有改革政治的举动,很快又归于反动。抗战期间,官僚资本急剧膨胀,垄断经济;前方将士流血牺牲,后方官员大发国难之财,人民沦于水火之中,知识分子亦衣食无着,连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也要靠刻图章、卖字画,靠夫人替人洗衣、摆小摊,维持生计。以民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力量的崛起,即是知识分子集团的主体在政治上与国民党决裂的标志。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使知识分子渴望在和平建设中将自己的才学贡献于祖国的愿望破灭,政治腐败与社会黑暗达于极端。严酷的现实使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完全失去了对国民党的信心。他们终于认识到:国民党专制、独裁、卖国、腐败;"第三条道路"也走不通;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复兴,必须依靠新的政治力量,尽管这种新的政治力量可能不会给他们个人和家庭带来什么特别的好处。1948年5月,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理事郭沫若、曾昭抡、马叙伦、翦伯赞、宋云彬、狄超白、林焕平、千家驹、刘思慕、侯外庐等人发表的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联合声明就坦露了这一点。他们在声明中说:

十二万分的不幸,今天独裁卖国贪污残民的暴政,造成了普遍的饥饿、破产、恐怖、混乱的局面,使全中国人民陷于旷古未有的灾难,直接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存,剥夺每一个人的任何的公民自由。

用几千万同胞的生命与无法估量的苦难和损失换来的抗

战胜利，驱除了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却立刻被迎进来一个更凶狠的美帝国主义。为了一心一意要维护独裁，实现武力统一，于是“宁赠友邦，勿与家奴”，大批大批地拍卖主权：从东北卖到西北，从天空卖到地底，从海岸卖到内河，诸如军权，基地权，航空权，开采权，筑路权，内河航运权以及一切经济财政的支配权和国家行政的控制权等等之类，都一古脑儿奉送给美帝国主义了。尤其令人咋舌的是反动派不但高唱对日宽大，而且厚颜附和美帝扶日政策，最近更在大谈其美日中“协同体”的汉奸论调，把民族的血仇完全置于脑后，把几千万生命换来的胜利，轻轻付诸东流。所有这一切，为的是想争取美援，来延续独裁统治的残命。但同时所有这一切，即又带来了空前严重的新的民族危机，剥夺着民族国家的一切主权自由。

我们是中国的一群智力劳动者……我们对于现实政治，并没有直接的过问，我们的要求很单纯，我们只想从真理探求中所得的一点一滴收获，贡献给我们的民族，使我们民族的精灵，从三千年来封建专制窒息中的枯萎状态，渐渐地（纵使很缓慢地）振奋起来，壮健起来，以适应“人民世纪”历史新时代的需要。然而，我们尽管对政治无直接责任，政治却愈迫愈紧地不允许我们对它不负责，因为前述的政治现状，不但不容许学术工作者有从事学术（讲学，著作）的自由，而且连他们的生存权利都已受到直接的威胁了。抗战期间，全国大学教授和研究著作家的生活，本已苦得够瞧的了，可是跟最近这两年的情况比较起来，大家却不免对它又有留恋之感了！这样，我们的自由既无保障，我们的生存又受威胁，我们若再不问政治，是不是准备束手待毙呢[1]？

[1] 《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188页。

当时公开声明拥护中共主张的多是左派和中派知识分子。几个月后，抛弃国民党，转向共产党，即成为整个知识分子集团的共同立场。中央研究院的绝大多数院士留在大陆，并不是出于对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了解，而主要缘于对国民党的失望与憎恶。然而，当旧社会轰然崩溃，新社会还在朦胧之中的时候，站在历史"十字街头"（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著名哲学教授汤用彤先生语）的大知识分子们的心态还是很有一些不同的。

第一种人，以郭沫若、茅盾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即知识分子激进的左派，自然是以欣喜若狂的心情，迎接他们为之长期奋斗的革命的胜利。1949 年 6 月 15 日，郭沫若先生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用诗一般的语言抒发了他的感情：

> 我感觉着，今天的新政协筹备会的开幕，正好象在黑暗中苦斗着的太阳，经过了漫漫长夜的绞心沥血的努力，终于吐着万丈光芒，以雷霆的步伐，冒出地平线上来了。
>
> 我不能不以满怀的热诚，庆贺这新生的太阳出土。我更不能不以满怀的热诚，庆贺这新生的太阳永远上升，永远不会下降。
>
> 这是规模宏大的新民族形式的史诗的序幕，是畸形儿的旧民主主义转换到新民主主义的光荣的开始[①]。

第二种人，是尚在国外的学者和学生，他们几乎以和郭沫若、茅盾们同样的心情拥抱新的中国。据中央教育部统计，截至 1950 年 8 月 30 日，尚在国外的留学生有 5541 人，其中美国有 3500 人，日本有 1200 人，英国有 443 人。原中研院院士李四光、华罗庚、赵忠尧和著名作家老舍、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是这个群体的杰出代表。

① 《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 256 页。

1950年2月，华罗庚在回国途中发出《致中国全体留学生的公开信》，信中说："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钱学森冲破阻挠，历经艰辛，终于回国的艰难过程，更是留学生群体热爱新中国的生动例证。1950年至1953年，约有2000名留学生回国，成为发展新中国科技事业的骨干力量。

第三种人，是崇尚科学、"不问政治"的自然科学家，他们以平静的心情迎接政权的更替。这个群体均有欧美或日本留学背景，深知科学技术对于国家富强的意义，渴望国家统一、社会安定，以施展自己的才能，而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使科学技术的发展毫无希望。他们寄希望于共产党。原中研院院士、中国"气象学之父"竺可桢先生是国民党"抢运学人"计划的重点对象之一。他拒绝蒋氏父子的劝说，留在上海，迎接解放。他在上海解放的第二天即1949年5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民国二十六年国民党北伐，人民欢腾一如今日。但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卒致今日之颠覆。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败。"① 不久，竺先生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原中研院院士、著名数学家姜立夫先生本已率中央研究院数学所迁至台湾，1949年7月，他以"家有急事"为由离台赴港，继而应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先生之邀，到该校任教。地质学家黄汲清先生1949年6月赴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后经香港回国时，接傅斯年电邀赴台主持台湾大学地质系，黄先生置之不理，毅然返回重庆北碚地质调查所。在旧中国一贯以"超阶级"、"超政治"自居的自然科学家们在历史转折关头表现出的爱国热情，丝毫也不亚于人文

① 《竺可桢日记》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版，第1256页。

社会科学界的知识分子。

第四种人，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出于对欧美政治制度的崇拜和对苏联政治制度的了解，他们对行将诞生的新的社会多有疑虑，但仍然相信新社会会为他们提供发挥作用的舞台。这一类知识分子以清华大学教授费孝通先生最为典型。费先生是社会学家，早年留学英国，30年代反对马克思主义。抗战时期，他对国民党政府不满，但尚满足于做一个温和派、自由派的人物。他希望在中国建立英国式的代议政治，主张解决农村问题，认为共产党代表了农民的利益，却反对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他同当时的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一样，赞同苏联的"经济民主"，却反对苏联的政治制度，认为那不是民主，而是变相的封建专制。他担心共产党掌权后把解放区那种在没有劳动分工、没有现代工业的落后经济环境中形成的简单生活推向全国，把"所有的人民塑成一种模式"；担心在苏联式的政治制度下失去思想自由和学术研究的自由。抗战胜利前他加入民盟，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仍然了解甚少，同共产党人没有直接的接触。内战时期，他怀疑共产党是否也对战乱负有责任，"在主要的政治问题上保持沉默"，因而引起进步学生的不满。他的名著《乡村建设》出版后即遭到左翼知识分子的批判。然而，他还是在1947年回到祖国，决心"同人民一起渡过黑暗时期"。他说，"我在国内有许多事可做，培养学生，研究中国"。"一个人属于他原来的集体，并对该集体负有责任，这对人类生活至关重要，它可以丰富生活。""我希望我不会失去研究社会科学的机会，但我认为前途是光明的。"他相信他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够在新政权领导下为国家作出贡献，因为社会主义需要社会计划，而社会学对制定社会计划是有帮助的。他认为自己还可以作为"忠诚的反对派"对政府提出批评和

建议[①]。1948年12月6日,他十分平静地看着解放军进入清华园,丝毫没有离国而去的念头。费孝通先生的思想发展过程说明,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在决定留下来为新中国服务的时候,对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并没有多少了解。他们对国民党的腐败厌恶之至,因此不去台湾;美国、英国虽然有理想的学术与生活条件,但那不是自己的祖国。他们仅仅由于深厚的爱国情感而留在大陆,尽管他们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存有种种的疑虑。

第五种人,是在国共斗争中曾站在国民党一边的少数上层知识分子,即毛泽东所说的确实"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在历史的十字街头,也正是知识分子传统的爱国精神使他们抛弃党派之见,接受了新中国。原中研院院士、著名哲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冯友兰和著名美学家、北大教授朱光潜可为代表。冯先生出身于地主家庭,大革命和抗战时期两度加入国民党,曾担任国民党河南省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45年参加国民党"五大",任主席团成员,蒋介石曾有意推荐他为中央委员,是蒋介石器重的大学者。照他自己的说法,"按个人的家庭出身和个人所受的教育",他的"思想感情都打上了绅权的烙印"。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是共产党的敌人。然而,留美期间目睹中国人备受歧视、冷落,伤害了他的民族自尊心。他在《三松堂自序》中说:"当时我想,还是得把自己的国家搞好。我常想王粲《登楼赋》里的两句话:'虽信美而非吾土兮,夫胡可以久留?'"抗战胜利后,他赴美讲学。全国行将解放之时,他却毅然返回祖国。有人劝他在美常住。他说:"俄国革命以后,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留,称为'白俄'。我决不当'白华'。"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国民党动员学人南迁,他坚决不走,表示"无论什么党派掌权,只要它能把

① 戴维·阿古什著,董天民译:《费孝通传》,时事出版社1985年11月版,第162、164页。

中国治理好,我都拥护"。"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①] 朱光潜先生做过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国民党"抢运学人"计划中名列第三,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留在北平迎接了解放。旧中国的许多大学教授集体加入过国民党,不少人为国民党做过事,写过反共文章。他们有条件去台湾、香港或国外。他们对共产党心有疑惧,却留了下来,因为他们相信共产党建设国家需要知识分子。他们并不担心因为同国民党的政治关系而遭受清算或因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留学外国的背景而受到歧视和打击。

第六种人,是历史上既反对过国民党,也反对过共产党,愿意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为新中国服务,却又害怕新政权会对他们实行"专政"的知识分子。沈从文先生即是一例。沈先生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然而,这是今人的评价。沈先生了解旧社会,痛恨旧社会,用自己天才的艺术作品无情地揭露旧社会,客观上促进了旧社会的死亡。但是,他同大多数受到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一样,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他在"湘西王"军中看多了杀人放火的恶行,本能地厌恶一切战争,因此,内战时期,他既反对国民党,也反对共产党;既不赞成国民党的独裁专制,也不赞成苏联式的共产主义。1948年下半年,他受到在香港的郭沫若先生的激烈批判。他反对国民党,自然不能去台湾,去香港还可以吧? 然而,他终究没有走。留下了,心却不安,怀疑新中国有没有他的出路,共产党会不会和他"算账",竟至于精神崩溃割断血管以求解脱。

第七种人,长期坚持独立的政治立场,社会变革后也不准备皈依马克思主义,主要由于故土难离的爱国情感而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这样的"不识时务者"不多,但的确有。原中研院院士、清华

---

①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12月版,第65、124、126页。

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理解新中国成立以后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心态,特别是许多人在受到不公正对待时所产生的委屈与愤懑情绪,是十分重要的。

1.3 跨入新社会:新天新地新感觉

知识分子主要出于爱国情感而接受新中国,当他们作出这一历史性选择的时候,多数人"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①]。他们热切地向往一个新社会,但是,民国以来,他们看多了政局变幻、官场腐败、经济破产和种种欺骗,"共产党怎样呢?除了极少数的先知先觉者以外,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还是一个谜"[②]。许多人怀疑山沟里走出来的共产党有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更担心共产党进城后会不会同国民党一样地堕落腐败。共产党行不行,还要等一等,看一看。

这种"等一等,看一看"的心态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解放军严明的纪律、"正义之师"的形象,共产党干部的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和自我批评作风,新政权铲除社会黑暗、抑制通货膨胀、稳定社会秩序的能力,中国社会迅速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变化",立刻赢得了知识分子的普遍好感和盛赞。

1949年3月,叶圣陶先生与27位民主人士由香港北上,沿途所见所闻,感触良深。他在《北上日记》中记载:在中共华东局党政机关所在地潍县,他"听吴仲超君谈收藏保管文物之情形,头头是道,至为心折",知"诬共产党往往谓不要旧文化,安知其胜于笃旧文人多多耶"。"即以招待客人而言,秩序以有计划而井然。侍应员之服务关切而周到,亦非以往所能想像。若在腐败环境之中,招

① 季羡林:《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东方》,1994年第5期。

② 季羡林:《朗润琐言》,第25页。

待客人即为作弊自肥之好机会，决不能使客人心感至此也。”“来解放区后，始见具有伟大力量之人民，始见尽职奉公之军人与官吏。”在济南，他参观华东大学之后，称校长韦悫丹为“笃实之士”。3月19日，出席北平市长叶剑英举行的宴会，听叶演说，谓“其说甚精当”。他听罗迈（即李维汉）谈话后说，“其言至亲切，余极为满意”。他的老友曹葆华久在延安，北平重逢，称曹“谦和朴实，大有延安风度”。23日访友人，共谈解放后之观感，“甚感满意”。6月，见到从上海到北平参加全国文代会的巴金等人，“诸友对于上海解放，颇多好感”[①]。叶先生对于中共人士和中共领导下的新社会之好感，溢于言表。

1949年5月初，著名的剧作家、后任上海戏剧学校校长的顾仲彝先生由上海赴北平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他在解放区呆了一个半月，对共产党的干部赞叹不已。他说：

> 中共各级干部们，给我不可磨灭的印象是热情诚恳，吃苦耐劳，谦虚坦白，坚定乐观。他们穿不大合身的军装，长头发，满腮胡子，大的用草绳缚住的破布鞋，起先给我一种很奇怪而不舒服的感觉，但看惯了，反倒使我油然起敬，肃然羡慕。他们朴素简单的外容正象征着新中国必须从艰苦中建立起来，自力更生，而笔挺的西服和时髦的女装正代表着帝国主义的物质引诱和买办阶级的遗留毒素，而起厌恶之心了。我们老在蒋管区和上等绅士们接触惯了的，初看他们衣不整貌不扬的就发生一种错觉，以为他们真是田沟里来的老粗，但听他们一开口，事理清楚，层次分明，思虑周到，眼光远大，不禁吓了我一跳；尤其一班年青男女，看样子好象刚认得几斗大字，但听他们说话，其老练与熟谙人情世事，真叫我们咋舌不止。但

① 《叶圣陶集》第2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38、39、46、47、54页。

是他们并不骄傲，他们仍然虚心求教，勤劳学习。有时问起他们的待遇，更使我惊奇不已，他们每月所领的钱，只够我们在香港吃一顿点心。他们出门坐不起三轮，有朋友来请不起客，一切的享受跟他们无缘，但他们是很少抱怨的，即有，也给工作的热情和人民大众的利益的想法一下子冲得无影无踪了[①]。

朱光潜先生承认，解放前他对共产党的主张与作风的认识"极端模糊隐约"，一向受到国民党恶意宣传的蒙蔽。然而，解放后他的思想迅速地起了变化。他说：

自从北京解放以后，我才开始了解了共产党。首先使我感动的是共产党干部的刻苦耐劳，认真做事的作风，谦虚谨慎的态度，真正为人民服务的热忱，以及迎头克服困难的那种大无畏的精神。我才恍然大悟，从前所听到的共产党满不是那么一回事。从国民党的作风到共产党的作风，简直是由黑暗到光明，真正是换了一个世界。这里不再有因循敷衍，贪污腐败，骄奢淫逸，以及种种假公济私卖国便己的罪行。任何人都会感觉到这是一种新兴的气象。从辛亥革命以来，我们绕了许多弯子，总是希望以后失望，现在我们才算是走上大路，得到生机[②]。

冯友兰先生是哲学家，观察人与事的角度也和一般人不同。他对解放军和共产党的干部同样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

---

① 《到解放区后我学习到了些什么?》,《光明日报》,1949年7月2日。

② 《自我检讨》,《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7日。

> 北京刚解放底时候，与一般人最初接触的是解放军。一般人所最感觉惊奇的是解放军里，每一个人都能滔滔不绝地讲一番大道理。有一天我听见我底窗户外面，有一个解放军与别人辩论。这个解放军说："你知道什么是人生底意义？"我听见心里一惊。"人生底意义"是我们哲学教授常在教室里讲的一个题目，可是在解放军口里出来，可就有不同的意义。……
>
> 我佩服共产党底各级领导人员。他们谈起来，不拘关于什么问题，都是"头头是道"，你听他们讲，起初也不觉得怎样"轰轰烈烈"，只觉得真不空洞。你听起来觉得事事都有个办法，而每一个办法，也都有个道理。他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可是到处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你才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轰轰烈烈"[①]。

共产党人廉洁朴素的作风，同国民党的腐败堕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给了知识分子最深刻的印象。最初，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同中国共产党只是朋友关系，并不是"一家人"，双方之间有一道"鸿沟"。这道"鸿沟"是"怎样填实的呢？主要是共产党的作风感化了人"[②]。

解放后社会面貌的变化，给了知识分子极大的震动。中央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中央政府林业部部长的梁希先生最早撰长文畅谈新社会的新气象。他在1949年7月27日即南京解放后仅两个月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发表《南京今昔观》一文，从经济、生活方式、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变化等四个方面，用对比的方法，生动地描绘了南京的变化。他说，黄金和美钞，在南

---

① 《我对于共产党员的认识》，《人民教育》，第3卷第4期。

② 费孝通：《解放以来》，《人民日报》，1950年2月2日。

京、上海被称为“老大”和“老二”，国民党政府允许美钞在中国流通，大小贪官污吏利用权势和银行钱庄“吸进”、“抛出”，“条子和美金越赚越多，家私愈累愈富”，而“经营正当企业的民族资产阶级，被迫得走投无路；而大部分劳工群众，则更是衣不暖，食不饱，被抛弃在街头了”。南京、上海解放以后，美钞和黄金“骤然销声而匿迹”。解放前法币剧烈贬值，金元券大量滥发，国民党反动派把黄金美钞、银元向华南、台湾以及美国偷运，“谁也不相信纸币，谁也不贮蓄纸币，以致大街小巷丁丁当当地早已成了袁大头的世界”，解放后，银元贩子在南京完全绝迹。解放前，美国奢侈品充斥市场，解放后舶来品再也找不到销路，这对国货厂商是一个好消息。“国民党时代，物价月月涨，日日涨，到后来甚至时时涨，刻刻涨，生活痛苦极了。解放军一到南京而物价稳定，完全变了一个世界。”“人民解放军男女同志们那些朴素的英武的布衣、布裤、布鞋和八角帽，感动了南京的青年儿女们”，“浓妆艳服的服饰骤然减少，口红也大大地减少了”，“一般的装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而换了一个生活方式”。阔绰的餐馆关了门，因为共产党员代替了官僚们的职务，大请客的现象没有了。知识分子开始发生变化。“有几位学者，一向是自满自足地闭塞在科学神圣和科学独立的甲壳里，近来忽然时时离开研究室，和群众打成一片，从事社会性的事业和政治性的工作了，并且十分积极。”“有几位博士，从前连最普通的字而都喜欢用英语，现在忽然连翻译出来的美国人名和地名，也宁可说出声音不正确的中国译名，而不用原名了。”过去学生怕兵、躲兵，解放军的士兵却成了学生的老师和朋友。从前学生游行，轻则被打、受伤，重则送命，随时有被送进集中营的危险，现在游行，大家唱歌、打鼓、扭秧歌、踩高跷，高兴得发狂。“两个月以前，学生还成群结队地向伪总统府请愿，求生存，求全面公费。而人民政府把救济金送上门来，许多学生偏偏又不要了。”这位不久后即出任中央政府林业部部长的老先生感叹地说：“事事在变，物物在变，人人在

变,南京在变,上海在变,整个中国也在变。"[1]

深受欧美思想影响的大知识分子们,对共产党的作风一下子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他们怀疑共产党是不是只讲专政,不讲民主。这一疑虑,也很快为事实所打消。1949年9月初,北平举行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费孝通先生在9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撰文盛赞这次会议。他说:"北平各界代表会议一共开了六天,对我说是上了六天课,这六天课里学到的抵过了过去六年,甚至三十多年。三十多年来我所追求的梦想,在这六天里得到了。这是什么呢? 是民主。"

费先生说,他自五四运动起,就听到"民主"二字。然而,从小学到大学,不明白什么是民主。后来到了美国、英国,写了《初访美国》、《重访英国》两本书,什么是民主,还是"似是而非"。解放以来,他钦佩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但是共产党要实现民主,我很老实说,在参加代表会议以前,我是不太相信的"。当他"生平第一次"看到"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长袍的,还有一位戴瓜皮帽的——这许多一望而知不同的人物",在一个会场里平等地讨论问题的时候,他相信中国从此已经有了民主,而且"开步走的起点已经超过了美国现有的民主程度"[2]。参加同一个会议的著名新闻记者陈铭德先生说,国民党时代的民主都是假民主,在自己50多年的生活经验中,"说到了出席真正人民民主的会议,这还是第一次"[3]。

共产党进城后表现的廉洁作风与治国才能,出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意料。起初,人们还只是从和共产党干部、新政府工作人员、解放军官兵的接触中,感觉到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不同。新中国

① 《光明日报》,1949年7月26日。
② 《我参加了北平各界代表会议》,《人民日报》,1949年9月2日。
③ 《对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的感想》,《光明日报》,1949年9月8日。

成立后，党和政府打退投机商人的经济进攻，平抑物价，迅速消除了通货膨胀；镇压反革命，铲除了社会黑暗势力；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方针，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迅速进行土地改革，铲除了封建土地制度。久为战乱所苦的古老中国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各个阶层的人们对国家和个人前途充满了希望。在事实面前，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进一步发生了变化。当新中国迎来第一个国庆日的时候，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纷纷撰文，称赞"一年之中，真所谓百废俱兴，一切应该做的工作，政府都在尽量去做，一切不合理的现象都在努力革除"，"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府"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新生命确在开始"②。这表明，原本对共产党存有疑虑的知识分子，已经完全接受了新中国。

1.4 改造的基础：自卑感、愧疚感的产生

工农革命的胜利，对于大多数中上层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震动是无比强烈的。过去，这些人不满于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却又不敢拿起武器，投入血与火的斗争；向往光明的中国，却又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和山沟里的"土八路"能够成功。许多耍笔杆子的文人，固然写过文章抨击国民党，但对共产党不是不置一词，就是冷嘲热讽。然而，他们不相信、做不成的事情，共产党做成了、做好了。现实无情地宣告了他们在政治上的愚昧无知与人格上的怯懦。在胜利者面前，那些有良心的、敏感的知识分子当然要扪心自问：当共产党和工农群众为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浴血奋战的时候，你做了些什么？愧疚感、自卑感油然而生。

① 徐悲鸿：《一年来的感想》，《光明日报》，1950年10月1日。

② 梁漱溟：《国庆日的一篇老实话》，《新建设》，第1卷第7期。

知识分子的愧疚感、自卑感，在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中间，是迎接解放之时即刻产生的。1949年6月25日的《文汇报》刊发了一组题为《上海解放有感》的文章，其中有文艺工作者梅林和曾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著名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许杰先生的两篇短文。这两篇写于上海解放后10天左右的短文，生动、真实地记录了知识分子的这种心理。梅林的文章写于6月8日，其中表露的自责之心极端强烈。他说：

> 当解放的信号，那密集的轰然震动于宇宙的枪炮声，一天一天地接近上海市郊的时候，我完全沉浸在大的兴奋和狂喜中，我无论怎样也不能够安静，整天在各处走来走去，或者在深夜站在狭小的晒台上，猜测大上海周围的枪炮声的远近，以及凝视那漫天的红光。然而同时也感到焦急，疑惧，不安，而且更感觉到惭愧——它象冷光四射的锐剑一样斩断了所有的兴奋和狂喜，焦急和疑惧，紊乱与不安，而使我几乎抬不起头来。这种复杂的心情，这种紊乱的情绪，我想，象我这样只能躲在房子里拿笔或用嘴说空话的所谓从事文艺工作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想欺世盗名，欺骗自己和别人，是可以理解的，并且应该成为检讨自己的教训或基础的。

梅林说，5月25日，他同人们一起冲上大街，欢呼大上海的解放。“看到庄严的人民解放军的布告，看到庄严的红旗，看到那些脸孔眼睛都是善良的解放军，那些工农的儿子”，他感动万分，想大喊“自由万岁”。然而，他“只有沉默地注视；因为冷光四射的锐剑一样的惭愧感觉如此强烈”。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惭愧之感呢？他说，当黑暗和苦难被驱除、辉煌的太阳照耀人间的时候，战士们狂欢，工农充满着喜悦，都是当然的、可以理解的。

然而，我不能够理解，那些在最丑恶的反动派匪帮统治时期，勾勾搭搭，故意不明是非，不分左右，沽名钓誉，唯我中心，只图自己名利兼收活得舒服的人们竟会如此招摇撞骗，瞎吹瞎擂，大言不惭，沾沾自喜，自命"不凡"！难道他们就是这样天生的一种冒险家么？真的就是这样的没有"人性"吗？真的就是这样的昧于"知己知彼"么？

然而这也不外是一种激愤，在历史的严正的铁则下，一切自然都是十分清楚，十分明朗的，无可躲避，也无可"取巧"。我想，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无论你是自封或同帮互封（用广告或发消息或其他方式）的什么"家"吧，如果真的还象一个人，还想不乌七八糟的真正做点事情，首先就要透彻无情地照明自己，检讨自己，确立坚强把握赤诚沉默忘我的工作态度。否则，仍然是冒险家而已，投机家而已，无论装做怎样慷慨激昂，或貌似无我的唯唯诺诺[①]。

许杰先生首先用真挚、优美的语言夸赞解放军，说他们"创造了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说他是英雄，还不如说他是圣人"，真乃古代诗人们描写的"王师"。然后，他述说了在看到解放军时立刻产生的要进行自我改造的念头。

如今我们是被解放了，但我们能安于"被"解放，而不再进一步改造，把自己加入人民当中，在人民中学得一些什么，又发生一些什么作用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这一批土里土气的中国农民青年，现代的英雄，现代的圣人身上，得到一些启示，学习一些什么呢？……当我看到一队解放军从我前面走过时，我在感动得几乎流出眼泪来以后，立刻在自己的心

① 《照明自己》，《文汇报》，1949年6月25日。

里，就闪过了这样一阵思想的。我不隐瞒你，我的心里还有一些疙瘩，但在那个时候，我的心灵，却是如同看神圣的闪光一样，顿时心地清明，似乎达到了"悟道"或"净化"的境界了的。我晓得，你会发笑，你说这是文绉绉的一套，而且有些酸溜溜的。是的，我晓得。但是，我得老实地说，我不隐瞒。这得一个长时期的克服，而且要有理性和生活的支持，但是我得试试。在人民当中，在群众的进步当中，人是可以改造的。我为什么不能改造呢[①]?

许杰教授是著名的进步文化人，为什么在迎接解放的时候会产生这样的意识呢？他在同年6月21日《文汇报》发表的北上参加全国文代会的感想中曾有说明。他说："二十多年以来，对于反帝反封建的认识，自认为还没有放松过一步，但想想自己究竟有些什么成绩呢，实在就有些汗颜。在国民党统治的时代，因为我的存在，可能也会使他们不快，这倒使我自己感到一些得意。……可是在人民政府时代，刚在这解放了不久的日子，我就受到了国家的优待，我能够代表上海一向受到国民党压迫的文艺工作者，去出席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我觉得光荣，觉得欣幸，但同时也觉得自己惭愧了。我没有什么成绩贡献给人民政府与人民文化，我这多少年来只是为着生活，躲在蒋管区下面，畏首畏尾地活着，真是太对不起那些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吃苦、流血、流汗的同志们。"[②] 我们应当特别注意许杰先生这段话，因为其中隐含着对中国革命两条战线的历史作用的判断。在解放大军进城之时，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进步文化活动的人们，已经怀疑自己对革命的胜利作出过多大的贡献。这可以被看做在后来的思想改造过程中逐步走向彻

① 《从今日开始》，《文汇报》，1949年6月25日。

② 《光荣、欣幸和惭愧》，《文汇报》，1949年6月21日。

底自我否定的起点。

季羡林先生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的回忆文章中，述说了解放初期同样的心理活动。他说，解放军进城，知识分子是欢迎的，内心是兴奋的。解放初期，政治清明，社会充满了朝气，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荡涤一清，我们都觉得，“从此河清有日，幸福来到了人间”。“我一下子像是变了一个人。觉得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我觉得天特别蓝，草特别绿，花特别红，山特别青。全中国仿佛开遍了美丽的玫瑰花，中华民族前途光芒万丈，我自己仿佛又年轻了10岁，简直变成了一个大孩子。开会时，游行时，喊口号，呼‘万岁’，我的声音不低于任何人，我的激情不下于任何人，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时期。”

> 但是，反观自己，觉得百无是处。我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摘桃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自己也跟着挺直了腰板。任何类似贾桂的思想，都一扫而空。我享受着“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干了什么事呢？我作出了什么贡献呢？我确实没有当汉奸，也没有加入国民党，没有屈服于德国法西斯。但是，当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我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声事业。天下可耻事宁有过于此者乎？我觉得无比地羞耻。连我那一点所谓学问——如果真正有的话——也是极端可耻的。
>
> 我左思右想，沉痛内疚，觉得自己有罪，觉得知识分子真是不干净。我仿佛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徒，深信“原罪”的说法。在好多好多年，这种“原罪”感深深地印在我的灵魂中。
>
> 我当时时发奇想，我希望时间之轮倒拨回去，拨回到战争年代，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立功赎罪。我一定会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为了革命，为了民族。我甚至有近乎疯狂的幻想：如

> 果我们的领袖遇到生死危机，我一定会挺身而出，用自己的鲜血与性命来保卫领袖。
>
> 我处处自惭形秽。我当时最羡慕、最崇拜的是三种人：老干部、解放军和工人阶级。对我来说，他们的形象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在我眼中，他们都是"最可爱的人"，是我终生学习也无法赶上的人①。

武汉大学法律系教授燕树棠先生的思想与上述几位先生略有不同。他在解放前反对过共产党。武汉解放之日，他的感觉似乎是"旧我"的完全遗失，而在迷茫中产生一种造就"新我"以求生存的欲望。他在1950年6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

> 去年五一六那天，我开始直接接触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潮。几天之内，我感觉到我五十年的苦工所积累的古今中外的学问，好象顷刻之间都归于无用，化为乌有。知识上感觉到惶恐的空虚，空虚的恐慌。另一方面，自己几十年的修养和锻炼所搏得的社会地位——个人虚荣，也随着变为污泥，化为粪土。精神上很觉着穷乏。好象是一身褴褛，两手空空的赤贫了。一个人在这样境界，自然而然地，找寻出路奔向光明②。

像以上几位先生那样，在解放之初即产生强烈的自卑感、惭愧心乃至原罪感的知识分子到底有多大比例，我们无从估计。但是，可以肯定，除少数在组织上加入了革命队伍，坐过牢、流过血的人，或者对新中国仍然持敌视态度的人以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在社会发生进步性变革的时候"反躬自问"，是一种普遍的

---

① 《东方》，1994年第5期。

② 《学习一周年小结》，《光明日报》，1950年6月13日。

现象。历史证明了共产党的伟大、工农的高尚、革命的神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固然不能不承认政治上、思想上的彻底失败，进步的知识分子也不免在以流血牺牲换取革命胜利的工农群众面前生出“自卑”与“惭愧”之心、“原罪”与“穷乏”之感。这就成为他们接受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虚心进行自我改造的思想基础。

1.5 政治学习运动：第一个知识分子检讨浪潮

从1949年2月北平解放到1950年下半年，全国开展了以大学教师为主要对象、兼及中小学教师的政治学习运动。这场运动的指导思想、学习内容、组织形式，特别是普遍进行以自我检讨和群众批评为特点的思想总结的学习方法表明，它是中国共产党把延安整风时期形成的改造党内知识分子的理论、政策与方法运用于党外知识分子的开端，是革命胜利后的第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新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政治运动的源头。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这场运动中经受了进入新社会后的第一次严峻考验。

中国共产党关于革命胜利后的教育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是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阶段以后提出的。中原地区是最早开辟的新解放区。1948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对中原新解放区知识分子方针的指示》，指示中原局对当地学校，要“采取严格的保护政策”。在巩固地区，要帮助原有一切学校开学，“在原有学校的基础上，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良”[①]。“改良”仅限于取消反动的“公民”课程，清除极个别的反动分子和破坏分子，其余全部教职员要留下来“继续教书”，因误会而逃走的要争取他们回来。这个文件确定了维持现有教育机关和争取留用全部教师的基本政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219、220页。

策，尚未涉及知识分子改造问题。7月3日，中共中央同时发出两个文件，明确提出了解放后对待知识分子的基本政策和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与思想改造的具体办法。

第一个文件是中共中央向各地党的领导机关转发的新华社负责人陈克寒从中原发回的关于新区宣传工作与争取青年知识分子的电报。中共中央在批注中重申了“对于原有学校，要维持其存在，逐步加以必要和可能的改良”的政策，同时指出：“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是我党重大的任务，为此，要办抗大式的训练班，逐批地对已有知识的青年施以短期的政治教育，要大规模地办，目的在争取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受一次这样的训练”[①]。这个文件不但强调“争取与改造知识分子”是一项重大任务，而且确定了对知识分子进行政治训练的方针。

第二个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临汾地区工作方针给晋绥分局等的指示》。这个文件规定，对于学生、教员和知识分子，除号召其中的特务分子坦白登记、禁止反革命组织活动与阴谋破坏活动、禁止讲授“党义”之类的有法西斯内容的课程以外，“即可令他们继续教学”。“对他们的一些反动思想言论，则不必操之过急，也不要用法律去禁止他们这些思想言论，要认识他们有些是为环境所迫而失足的，或是被蒋介石匪帮的法西斯教育所欺骗蒙蔽的，对我们则完全不了解。对于这些，仅仅是思想上反动的人，我们应依靠其中较进步的分子，从思想上去说服教育改造他们。办法可利用讲演会、座谈会、辩论会等方式，进行时事教育及理论上的辩论与说服，可以具体生动的事实，启发他们认清解放区与蒋占区之光明与黑暗及真理之所在，说明蒋必败我必胜的形势，和中国的前途出路，争取他们开始转变。进而给以新民主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逐步改造他们。”“为了指导旧有教员在今后如何去进行教育，可用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225、226页。

暑期讲习所或教育会议等形式去集训教员。"[1] 这个文件确定的对待知识分子的基本政策、对知识分子进行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的方式与步骤,为后来的政治学习运动所遵循。

这几个重要文件表明,在革命迅速走向全国胜利的时刻,党的基本指导思想首先是确保原有的教育机关和知识分子全部平稳地过渡到新社会,然后用办"抗大式的训练班"即革命大学的办法集训知识分子,在不引起震动和混乱的前提下对教师进行初步的思想政治教育,逐步推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使他们从政治上思想上学术上完全融入新的体制,但当时并无发起群众性的学习运动或思想改造运动的想法。此后不久,中共中央、中央宣传部发出的其他几个同一主题的文件,都贯彻着同样的精神。

1949 年上半年,京津沪等大城市相继解放,新区学校完成了向新社会的过渡。形势尚未完全稳定,各地党的宣传部门、军管会的文教机关立即引导以北平、上海各大学的教师为主体的高级知识分子开展政治学习活动。这一活动兴起的初始阶段是分散的,并不是全国性的统一运动。同年 12 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新区学校安顿以后的主要工作,是进行政治与思想教育。"中央教育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钱俊瑞在会议总结报告中详细规定了政治与思想教育的方针、内容与方法。这表明党的文教与知识分子政策的重点,已经从保持原有学校与人员的稳定转向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此时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全国的教育行政业已统一,因此,会议以后,政治学习立刻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并迅速掀起高潮。1950 年 6 月 6 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作的《不要四面出击》的报告中指示:"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

---

[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7 册,第 220 页。

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①] 由于毛泽东的倡导与推动，政治学习运动在 1950 年暑期继续进行，直至下半年陆续结束。

上述历史过程说明，政治学习运动的发起，是依据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逐步地把教育工作的重点从维持和改良原有学校转变为对知识分子实行思想改造的结果。这个运动萌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发展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保持原有学校和知识分子队伍稳定的客观需要，使这次运动不致太“过火”；用党内整风的方式对党外知识分子实行思想改造的坚定决心，又潜藏着发生“左”的偏差的危险。

知识分子学习政治的组织形式有三，一是参加革命大学或短期培训班；二是参加教育行政机关举办的假期研究会、报告会、讲习班、讲习会；三是参加本单位的学习小组。1948 年 8 月到 1950 年，全国的 57 所革命大学和同类性质的训练班共集训旧军政公教人员 47 万人，其中有一大批知识分子，但是，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通过第二种和第三种方式进行政治学习的。

知识分子的政治学习活动，最初由北平各大学的党员教授、进步教授根据党的意图发起，教师自愿参加，没有任何强迫。学习组织多是自发产生、自由组合的学习小组。2 月 3 日，解放军开进北平，到 3 月间，北京大学沙滩教学区的 190 余名教师中就有 150 多人参加了 14 个学习小组。北平艺专的教员 2、3 月间就经常参加东南区举办的教职员座谈会和学校每周举行的政治演讲。北京师范大学也建立了许多学习小组。上海 5 月底解放，6 月，复旦大学的教授会、讲助会、职员会即分别成立学习小组。初期的学习小组，有的是教授副教授结合、讲师助教结合，有的是不分职称混合组成，有的是师生混编，有的是学生会发起后邀请教师参加，没有

①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 月版，第 22－23 页。

统一的形式。由于缺乏统一领导和合理编组，在初期的激情消退之后，许多学习小组趋于涣散。这个问题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北京各大学在5月份以后，上海各大学在7月份以后，陆续成立教职工学习委员会，由学委会制定统一的学习计划，督促和指导学习小组的活动，政治学习遂进入初步的有组织阶段。

1949年暑假期间，以北平、上海高校为主的政治学习活动全面展开。各地都举办了大规模的暑期讲习班。上海高教联主席团主办的大专学校教职员暑期讲习会听讲人数达到1000人，学习组织亦极为严密。学委会规定：大专学校教职员所有已参加或拟参加学习小组者，均得报名为暑期讲习会会员；会员10人为一组，推选组长1人，每周举行讨论会两次；学习小组长组成组长会议，每5组产生学习委员1人，组成学校的学习委员会，负责筹划学习事宜；各校学习委员会每周召开小组长会议，市学习工作委员会每周召开各校学委会联席会，对本周学习情况作出总结与检讨。教师参加学习非常踊跃。上海交大参加学习的教授、副教授为81%，讲师、助教为61%，职员为80%。全校参加学习的总比例为75%。

1949年12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把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确定为新区学校的主要工作，使政治学习活动掀起了全国性的高潮。这时的学习活动仍由学委会组织，实际上完全由党的组织领导，并通过行政系统要求全体教职员参加。此前的暑期学习有些地方虽规定教职员均须参加，仍有人置之不理，如前引上海交大的数字，教授、讲助、职员分别有19%、39%、20%的人没有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后，学习组织更加严密，全体教职员依其行政归属编成小组。这样，政治学习也就从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自觉自愿的活动变成了执政党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一项有计划、有组织的工作。

政治学习的具体内容，始终没有统一的规定。北平解放初期

各校自发性学习小组的活动，讨论时事政策占了相当比重，只有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学习组织比较重视理论，如北大法学院6月中旬组成的教授为主的“新思想新政策研究会”，其学习计划包括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新经济学、新民主主义理论与政策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上海的暑期讲习班请华东局和上海市党政首长系统地讲演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国内形势、国际形势、文教政策、知识分子问题、新人生观等6个题目，这些内容都属于一般性的政治教育，目的是使刚刚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了解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和新的社会制度，了解形势与政策。

1949年8月5日，毛泽东批发了华北人民大学第一期的教育经验总结。华北大学是当时规模最大、最有影响的革命大学，其教育方针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心，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把学校当做“思想战场”或“政治工场”。历史唯物主义着重讲三个问题：劳动创造世界、阶级斗争、国家学说；处于次要地位的学习内容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政治形势、国际主义、党史党纲党章。它的一切教育，都是“环绕改造思想的中心任务”[①]。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把华北大学的经验运用于普通教育系统。钱俊瑞在他的报告中说，新区学校进行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使教师和学生“逐步地建立革命的人生观”；“这种教育首先要反对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建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但是为了建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应当提倡和鼓励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理论学习必须密切结合思想实际，“即把理论学习作为改造思想的武器，改造思想作为理论学习的直接目的”[②]。此后，“在比较正规的或高级的学习组织中，一般都学了或大概地学了共同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408、409页。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91、92页。

纲领、《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1]。把革命大学的经验运用于普通教育系统，使得政治学习的内容从增进对共产党、中国革命和新社会的了解，转为为改造思想服务，这是一个质的变化。

与运动的组织程度、内容、目的的转换相适应，在政治学习运动的不同阶段，学习方法有很大差别。1949 年的政治学习，起初是自由讨论，暑期后转为大课听报告、小组讨论与个人自学相结合。华北大学的经验推广后，有些单位开始把“革大”的做法运用于政治学习，强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思想总结”，即“在学完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后，需要来一次思想的清算运动，对于反动的落后的思想，作一番更深刻更切实的批评、揭发与清除”[2]。思想总结的方法是先由本人写一书面检查，交由小组评定，接受同事、群众包括学生们的激烈批评，经过反复检讨、反复修改后通过。知识分子大都信奉“过则无惮改”的人生原则，但那是一种自省的功夫，对激烈地批评别人或面对别人的激烈批评很不习惯，又由于思想总结中穿插着交代历史的坦白运动，空气自然非常紧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后，思想总结的做法得到普遍推广，自我检讨、群众批评、人人过关的做法，使政治学习具备了群众运动的特征。这次会议把政治学习划分为两个阶段，此前为真正意义上的学习“活动”，此后则是以自我检讨、群众批评、人人过关为特征的“运动”。

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国共两党斗争时期的“民主教授”，是政治学习运动的倡导者。他们的努力，使这个实际上由党设计和发起的运动表现为知识分子群体的自发行动。当时，郭沫若、李达、张友渔、史良、陶大镛、林砺儒、孙起孟、黄炎培、马叙伦等纷纷

---

① 《思想战线上的伟大胜利》，《光明日报》，1950 年 10 月 1 日。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8 册，第 411 页。

发表谈话、文章，或者号召知识分子进行学习与改造，或者对政治学习运动表示热烈的响应。例如，1949 年 7 月，列名于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的北京大学教授张志让和南京中央大学教授、老教育家张士一发表谈话，号召教代会筹备会与有关方面配合，发起以教育工作者为主体的政治学习运动。他们认为教育工作者负有教育青年一代的责任，必须先学习；这个运动的目标，首先是了解新思想，"研究马列主义，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新民主主义政策，就是今天中国与世界的新思想之内容"；这个运动应是一个"长久性的计划，不是在解放之初的一种兴奋，态度要谨严"[①]。张志让先生还在 1949 年 9 月创刊的《新建设》第 1 卷第 1 期撰文说："我一向认为研究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目前教育界第一重要课题。而要实现这个要求，最好的方法是发动一个全国性的运动。这一运动必须立刻发动，必须普遍推行。它必须包括全中国大中小学的全体教职员，及研究教育和从事其他教育工作的一切人们。"[②]

对于组织教师学习政治，并不是没有人怀疑或反对。叶圣陶先生在《北上日记》中记载：1949 年 3 月 14 日，他在济南与著名文物学家、新中国成立后出任国务院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听说北平解放后"教员个人俱拟令受政治训练，心为殊可不必。并此数日，叔老（陈叔通——于风政注）曾谈及，凡国民党之所为，令人头痛者，皆亦反道而行之，否则即引人反感。而令人受训，正是国民党令人头痛者也"[③]。尽管如此，知识分子的左翼多数是拥护这个学习运动的。许多原先的自由主义派知识分子，出于顺从大势和"自救"的心理，也欢迎这次学习运动。复旦大学教授蔡尚思在

① 《光明日报》，1949 年 7 月 27 日。

② 《探求新知批判利用旧学与大学教育前途》，《新建设》，第 1 卷第 1 期。

③ 《叶圣陶集》第 22 卷，第 42 页。

1949年7月21日《文汇报》上发表的响应暑期学习运动的文章，就典型地反映了这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态。他在这篇题为《肯学习才得救》的文章中说：

> 一般富有传统观念的高级知识分子，年纪愈大愈糊涂，愈不肯再学习，好象再学习是最丢脸的一件事，这真是莫大的错误……新旧时代和新旧理论是大不同或不两立的，有些高等教育工作者在旧社会上占着很高的地位，自以为最了不起，然而对于新理论却连一点常识也没有，在这新时代里，如果不肯再学习，就必然成为古人死人而不能算是今人活人，这是你自绝于新时代，而不是新时代弃你。反过来说：你只要有意在这新时代生存下去，就得重新学习；只要重新学习，就什么难题都容易解决。所以高等知识分子应该从速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先求理论的正确，建立新人生观，变成一个新时代的人民，然后才谈得到其他的一切。例如胡适博士对于新哲学新社会科学，一向瞧不起而不屑研究一下，所以变成一个最反动的高等知识分子；陈垣先生到了七十岁还肯虚心学习新理论，所以不失为很光荣的文化人和教育家。高教联办这个暑期学习会的目的正是要来救一救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的。

尽管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不接受改造，就没有他们在新社会的地位，然而，在学习的起始阶段，积极参加学习的并不是多数。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信服共产党是一回事，学不学马列主义又是一回事。在旧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崇尚"超阶级"、"超政治"的"独立立场"，与国民党政权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进行过一定的斗争，"很多人觉得自己的思想，本来是不反动，不错误，不落后的，还要改造它干什么？还有人以为研究学术是应该自由的，必有研究

的自由，才能从多方面求得真理，不应该以一家之言，限制住了每一个人的思想领域，所以认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了解认识则可，用它来改造自己的思想，大可不必。也有些人认为'改造思想'是专对政治人员说的，有学问的人，不会造反，思想改造与否，有什么关系！"[①] 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崔之兰说："我最痛恨共产党提知识分子改造，认为即使要改造，至多是那些同国民党鬼混过的知识分子，我的身家清白，教学胜任，怎么同那些人一概而论？"[②] 中国知识分子还有一种传统，若社会发生改朝换代式的剧变，往往以忠于旧君主、固守旧思想和旧文化为"有节之士"。极少数教师"看不起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认为这只是公式教条，不算学问，因而拒绝学习，而且以为抗拒学习，正是表现一个有学问的人的骨气"[③]。有些人不但听不得"改造"二字，"甚至还把政治理论学习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代的所谓党义课等量齐观"[④]。在旧社会一贯以社会名流自居的大学教授，在众人乃至学生面前否定自己的历史，检讨思想，在许多人看来，更是丢人之至。所以，不少的知识分子起初参加政治学习，不过是觉得"时局如此"，不得不"奉命学习"、虚应故事，谈不到有什么自觉与热情。《光明日报》记者方明在1950年8月17日的报道中说，上海、南京地区参加学习的教师中，开始时"几乎有一半人存在着怀疑和对抗思想"。

然而，知识分子中像陈寅恪那样固执地拒绝马克思主义的人毕竟不多，许多开始抱着"随大流"态度参加政治学习的人，在社会的压力、环境的影响、组织的作用之下，终究不得不正视现实，逐步接受这种形式的改造，并在思想总结阶段进行程度不同的自我检

---

① 更生：《"思想改造"与批判利用旧学》，《新建设》，第1卷第4期。

② 《试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经过》，《光明日报》，1951年11月5日。

③ 翦伯赞：《教师学习的问题很多，主要的还是思想问题》，《光明日报》，1950年8月11日。

④ 《光明日报》社论：《开展全国教师的学习运动》，1950年8月11日。

讨。正是在思想总结这一阶段上,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第一次检讨高潮。

最早公开发表检讨的有影响的人物,是朱光潜和冯友兰先生。《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7日发表朱先生的《自我检讨》,28日发表冯先生的《检查我的学习》。为什么要首先发表这两位先生的检讨呢?大概因为这两位先生既是国民党时代最有影响的学者,又曾与国民党有过政治方面的关系。他们的检讨,既是一种政治姿态,同时又能以政治上思想上保守、落后、反动的学者而欣然接受思想改造的榜样,推动政治学习运动,他们的自我检讨同时也是思想总结的范文。1950年1月,《人民日报》又发表费孝通先生的《我这一年》、冯先生的《一年学习的总结》。2月,《光明日报》发表清华大学吴晗教授的《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随后,许多著名知识分子陆续公开发表自己的检讨。

政治学习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检讨,内容涉及个人的家庭背景、教育背景、政治历史、政治思想、人生观等许多方面,重点在政治层面,集中检查原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间广泛存在的"超阶级"、"超政治"思想,检讨作为这些思想之基础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有些人的检讨相当深刻与尖锐。我们以著名作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吕组缃先生为例。吕先生在旧中国算是一个进步的文化工作者,但他在检讨中却承认,长期在国统区生活的结果,使他在思想上有了许多陈旧腐朽的东西。他检讨说:

> 当时不是自以为是个进步分子吗?是的,可是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个落后的进步分子;当时不是自以为是个新文化工作者吗?是的,可是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个腐旧的新文化工作者;当时不是自以为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吗?就算是吧,可是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个"辩证唯物主义"的名士派;当时不是自以为信服了马列主义吗?就算是吧,可是在今天看来,显然是

> 个"马列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这样的一个人,是怎样形成的呢?第一,他是个没落地主的儿子,非无产阶级的各种渣滓留在他身上;第二,在实际生活上他长期的离开了广大人民,把自己放在一个狭小的社会圈子里,还悠然自得地陶醉着;第三,他对他所遇所养的旧社会颇有些认识,他厌恶它,抗拒它,凭着所谓正义感,用"有所不为"的一套传统信念来保卫自己,久而久之,就老是下意识地自赏着所谓清高与洁白[①]。

像吕先生这样的检讨,是比较温和的。在政治学习运动中发表公开检讨的,更多的是像冯友兰、朱光潜这样曾经同国民党有过政治关系的人。他们的检讨更接近于认罪。但是,除了屠光启这样的"黄色影片"导演、沈从文这样的"反动作家"以外,多数的检讨集中在政治方面,很少涉及学术或专业领域。这种情况不难理解。政治学习运动作为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后在知识界发动的第一个群众性运动,固然有使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建立统一的意识形态的目的,更为直接的,却还是增进知识分子的政治知识,使他们了解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从而在比较高的层次上认同新的社会制度。中国革命的胜利,不啻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失败。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大业,封建制度的铲除,是共产党完成的。无论出于真诚还是出于无奈,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对他们的政治历史、政治思想作一番清理,既有必要,也属自然。

对那些真心向新社会新政权新理论靠拢的知识分子来说,政治学习与转变思想的过程不乏迷茫与痛苦。1950年年初,费孝通先生发表的《我这一年》、《解放以来》这两篇广泛传播、影响极大的短文,就非常实在地表露了这种心理状况。他说,过去他对人民的

---

① 《谈文艺工作者的团结》,《光明日报》,1950年5月29日。

翻身、工业化的实现没有信心,对历史的发展没有把握,是因为看不到工农力量的深厚。革命胜利了,“一个富于生命的大千世界庄严地在我眼前展现,一切使我低头”。“但是究竟还是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旦打击了自大的心理,立刻就惶惑起来,感觉到自己‘百无是处’了,梦想着一种可称为‘魔术性’的改造,点石成金似的,一下子变为一个新人。”然而,这是不现实、不可能的,于是就陷人了苦恼的境地,进入了“闹情绪”的阶段。朋友们点出他的“闹情绪”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肯低头的表现。他认识到了自己所谓“百无是处”其实不过是“体面全失”的意思,不是“虚心”而是“心虚”;认识到改造只能承认现实,逐步改造。然而,“传统知识分子是唯心而且是不辩证的。他们在这个转变关头,总是不大肯从历史发展观点来看问题,对于自己的改造也是如此。百无是处的悔恨心理,恨不得把过去历史用粉刷在黑板上擦得干干净净,然后重新一笔笔地写过一道”。然而要知识分子像农夫一样按着自然规律去耕耘真不容易。看不到结果就不耐烦,沉不住气。又过了一个时期,情绪安定了一些,然而,周围都是和自己一样的旧知识分子,大家进行“改造竞赛”。进步的想和进步的靠近,想和落后的绝缘。改造竞赛造成了“一圈圈、一层层的分裂”,又生出了厌恶之感,“把‘前进’名称看成肉麻”,觉得在清华这一类知识分子集团里无法完成改造,要改造就得到工厂去,到部队去,到华北革大去。这样“闹改造”闹了半年,“讨论会、学习会都参加了。结果呢?也许除了要求进步之外,还是没有摸着边”。是什么东西把他从烦闷中解脱出来的呢?费先生说,是压在肩上的工作。“从这段经验里我明白了一点,也许只有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才真的说得上改造。”[1] 他说解放后参加了许多会,一类是学习政策的会,一类是群众的集会,后一类会议收益为大。

---

① 《我这一年》,《人民日报》,1950年1月3日。

费先生的文章不仅反映了知识分子在政治学习运动和转变思想过程中的种种苦闷，同时保留了一个对评价这次运动极为重要的信息：这次运动中的政治学习对知识分子思想的转变，似乎并未发生显著的作用。1949至1950年间知识分子政治上的进步，与其说是政治学习运动的结果，毋宁说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进步与知识分子的观察、理解与体验。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党的领导机关不可能有太多的精力关注教育；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和学校的许多党员干部对党的文教政策缺乏全面理解，存在着不信任、排斥、打击旧知识分子的倾向，又由于土地改革、镇反运动等的影响，因而在政治教育和政治学习运动中，不少中等学校用“思想斗争”、“打落后堡垒”、“围攻落后思想”甚至“三查”的方法解决学生和教师中的问题，有些事情做得非常荒谬。高等学校主要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后，在1950年上半年，在思想总结这个环节上，发生了“左”的偏差。《人民日报》在1950年11月12日发表的一篇总结性报道中说：在1949年开始的高等学校政治教育中，“大多数学校都表现了过左偏向，笼统地提出‘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口号，而在实际执行时，锋芒往往指向‘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单纯技术观点’等属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范畴的思想，反而忽略了政治教育首先应肃清的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三大敌人的思想”。有些学校采取了“不讲步骤、不讲方式、不顾教师及学生觉悟程度的急躁措施”，“若干地区干部不加区别地在高等学校内机械地搬用干部教育、党内教育的方法，甚至错误地用‘追’、‘逼’、‘斗争会’、‘思想总结’等方式解决思想问题。某大学还提出‘把思想解放战争进行到底’的不恰当口号”。

在发生“左”的偏差的情况下，对一些思想问题的批评必然是不尽妥当的。譬如，当时受到猛烈批评的“超阶级”、“超政治”思想，一方面固然阻碍了知识分子积极参加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一方面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不满。复旦大学教

师胡文淑在自我检讨中说,新中国成立前她"所以对政治不感兴趣,实于看到国民党政府简直是一个肮脏的集团,为了洁身自好,不愿卷入政治旋涡,因此对于政治抱了不闻不问的态度"[①]。可以说这种态度实际上是宽容反动派,延长了反动统治;也可以说它孤立了反动统治阶级,客观上有利于革命。为了引导知识分子作自我否定性的反省,当时的批评只强调前一个方面,这就必然要打击许多在历史上不愿与国民党同流合污的正直的知识分子。

由于"左"的影响和认识水平的低下,思想检讨中出现了胡乱上纲上线的情况。同济大学女教授房仲明说,她当初出家教书,是为了扭转社会上轻视女子的偏见,因为她"感觉到一个女子也应该出来多少做点事情,不要让人家讥讽我,说我这样一个受过教育的女子,也不过是守着丈夫孩子蹲在家里,这样与不曾受过教育的女子有什么差别呢?"后来,为生活所迫,不但不完全靠自己的能力来维持她和两个孩子的生活,这样工作又变成了谋生存的手段。女子走出家庭投身教育本是进步行为,靠工作养活自己亦无可指责,然而,她却检讨说,当初投身教育是"完全爱虚名所支配着","以往这种工作的动机是自私自利的,虽然我对工作,一向是负责任的,但却是带有很浓厚的个人英雄色彩"[②]。吴晗先生是著名的进步知识分子、民盟的重要领导人,曾经同国民党作过不屈的斗争。他在检讨中却说,自己是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1946年他曾和闻一多约定,等到民主政治实现,便退回书斋,专心著作,"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想法,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想法,是自以为是的英雄主义的想法,是消极的有毒的黄老学派的想法,是不对人民服务的想法,是自居于人民之外,'超阶级'的想法"[③]。

---

① 《我的思想怎样转变的》,《文汇报》,1950年8月30日。
② 《我铲除了独善其身的错误思想》,《文汇报》,1950年8月13日。
③ 《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光明日报》,1950年2月23日。

要求刚解放不久的知识分子"'脱裤子'要彻底,把最后的遮羞布也要去掉"[①],未免也过分了一些。

政治学习运动在思想总结这个环节上发生的"左"的偏差,对知识分子的群体精神是有损害的。运动的目标本是清除"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对于什么是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却没有明确的界定;人们批判和检讨的,充其量是无所不包、似是而非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这就不能不造成简单地否定他人、否定自我、否定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倾向。革命胜利后,许多知识分子已经产生了程度不同的自卑感、愧疚感,自认为觉悟、地位乃至人格、道德都比工农低了一截。政治学习运动又从外部对知识分子的历史与思想进行简单的否定。这种主客观两方面的压力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进一步发展,终于导致了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失落、人格分解与精神变异。

1.6 参加土地改革:阶级斗争实践中的思想感情变化

1949年年底至1951年年底,在毛泽东的直接倡导下,数十万知识分子作为土改工作队员,亲身参加了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当时的人们曾充分肯定这一特殊的实践活动对他们的思想的深刻触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吴景超先生说:"在解放以后,我们也学过阶级观点和群众观点,但两年的学习,其所得似不如一个月的实践为深刻。"[②] 北大中文系教授杨人楩先生说:"参观一次土地改革,胜过两年的学习。"[③] 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汪宣说,土改"对于知识分子,实在是理想无比的思想改造的好机会,就我个人

① 艾思奇:《学习观念的革新》,《文汇报》,1949年8月25日。
② 吴景超:《参加土改工作的心得》,《光明日报》,1951年3月28日。
③ 《跟农民学习以后》,《光明日报》,1951年4月16日。

来说,它将是我思想改造过程中的里程碑"[①]。许许多多类似的发自内心的话语表明,知识分子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对于促进思想改造,认同共产党的领导,接受马克思主义,其作用远较政治学习运动为大。

组织知识分子参加土改,始于北京。1949年12月中旬,由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先生发起,北京高校700名师生分赴京郊参加土改,其中有清华大学教授冯友兰、雷海宗、吴泽霖、全慰天以及学生260人,北大法律系教授汪宣及该系学生110余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李桦、董希文、李可染、叶浅予、滑田友、周令钊、艾中信及中央美院、中央戏剧学院学生200余人,燕京大学学生70余人。他们分布在京郊8区65个工作队,利用寒假工作约2个月,协助完成了100多个行政村的土地改革。这一做法得到了充分肯定,被认为是"向广大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改造自己的道路"[②]。1950年和1951年秋冬,北京、上海等地大批大学教师和高校学生(主要是文法专业的学生)踊跃报名,与机关干部、科研人员一起,由中央统一编组为庞大的工作团开赴新解放区,在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同本地干部混编为大小不等的工作队,到农村指导土改。这一时期到底有多少知识分子参加过土改工作队,无从统计。据报道,1951年8月23日由北京出发的中南土改工作团中就有北大、清华、辅仁、燕大师生800多人;同年12月15日由广州出发赴农村参加土改的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南方大学的师生有5600多人。此类报道甚多。粗略估计,说数十万或多数大学教师、相当一部分大学以及其他各界的知识分子参加过土改,当为不虚。

知识分子参加土改,固然有解决干部不足的用意,主要目的却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并争取他们对于土改的理解与支持。1949年

---

① 《我在土改工作中的体验》,《光明日报》,1950年4月2日。

② 《光明日报》,1950年3月18日。

12月30日，钱俊瑞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与土地有联系，他们在土地革命的斗争中是动摇的，但是他们的立场是可以经过教育而改变的，我们必须事先向他们进行土地改革的教育，争取他们积极参加或支持土地改革的工作。"[①] 1951年2、3月间，毛泽东几次对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南局、川西区党委的报告作出批示，要求各地"对民主人士应采取积极态度，引导他们参加土改等项工作"。"民主人士及大学教授愿意去看土改的，应放手让他们去看，不要事先布置，让他们随意去看，不要只让他们看好的，也要让他们看些坏的，这样来教育他们。""在今年夏、秋、冬三季的土改和镇反工作，从各大城市中等城市分几十批组织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教授，教员，资本家下乡去参观，或参加工作。只要他们愿意去，就要欢迎他们去。不要怕他们去，不要向他们戒备，因为他们不是反动派。好的坏的，都让他们去看，让他们议论纷纷，自由发表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②] 毛泽东非常关注知识分子参加或参观土改的效果。当他看到1951年3月28日《光明日报》刊载的吴景超《参加土改工作的心得》一文后，认为"写得很好"，翌日即指示胡乔木"令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令新华社广播各地"[③]。他还专门致信刘少奇等人，要求北京、天津组织四五批或七八批高级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参观团，到南方参观土改和镇反。实践证明，组织知识分子参加土改运动，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决策。它的效果，也许超出了发动者的期望。

土地改革时期的中国农村，对知识分子来说，确是一个"革命

---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卷，第90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119、173、203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198页。

的大熔炉”。与出身于工农家庭或久已投身革命的土改工作队员不同,那些从高等学府与机关大院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于地主家庭,正是靠着家庭对农民的剥削,他们才得以接受高等教育,获得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今天,他们以毛主席、共产党派来的工作队员的身份,出现在他们那已成为革命对象的父兄面前,同那些大字不识几箩筐却让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基层干部一起,睡土炕,吃粗米,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召开控诉大会,斗地主,定成分,分田地。他们亲眼目睹了中国乡村的落后、封建土地制度的危害,了解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中农在革命中的动摇、贫苦农民觉醒后的伟大。激动、痛苦、惶惑、愧疚、愤怒、怜悯……种种情感体验交相更替,构成了这些特殊的土改工作队员的典型心态。正是在激烈的现实阶级斗争和复杂无比的内心冲突中,他们获得了执政党所期望的政治上思想上的进步。从农村回到城市之后,他们都曾进行过认真的工作与思想总结。阶级观点、阶级意识、阶级立场、劳动观点、群众观点的确立,阶级感情的转变,对自身弱点的进一步认识,对中国农村状况和共产党基层干部的进一步了解,是他们当时公认的主要收获。

阶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旧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缺乏的观点。政治学习运动曾把阶级观点作为重点问题之一,但是,“在学校的环境中,没有尖锐的阶级斗争,没有热烈的群众运动,想在这样的环境中获得阶级观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①]。农村就不同了。土地改革是农村阶级斗争最尖锐、最激烈的时期。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之间的经济与政治关系、他们在土改运动中的态度与立场,都简单化、表面化了。阶级利益、阶级立场、阶级阵线,不再是抽象的名词,而是活生生的现实,这就使得长期持“超阶级”观点的知识分子们不能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

① 吴景超:《参加土改工作的心得》,《光明日报》,1951年3月28日。

在，并在地主与农民的斗争中确定自己的立场。正如曾在陕西长安县参加过土改的吴景超所说：

> 土改的第一步，就是要组织广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与地主阶级作斗争。在此时乡村中的每一个农民的立场不许模糊。在两个阵营里，你是站在哪一边？你是拥护谁、反对谁？这些问题，每一个人都需要作一决定性的答案，连地主的儿子，在中学读书的，也在追求这个答案而致几晚的失眠。在这种斗争的气氛之下，我们每一个人都更明确地学会了阶级观点，与农民打成一片，把农民的问题看成自己的问题，贡献出自己的力量，随同农民同地主进行斗争，并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得到与农民在感情上与道义上的一致的感觉[①]。

在地主与农民的阵线分明的斗争中，教授们作为土改工作队员必须站在农民一边，而且知识分子的理性也迫使他们背叛自己的阶级，投向贫苦农民一边。

与阶级观点、阶级立场相联系的，是阶级感情。旧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来自农村，对农民的苦难有一定的了解，对他们持同情态度，而且知识分子在理智上是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但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夏衍曾分析过知识分子在土改问题上的感情冲突。他说：

> 一般地说，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新政治新经济是怀抱着热心和希望，对于旧政治旧经济是怀抱着反感和敌意的，但，在仰望和反感，在这热心和敌意之间，不也依旧只限制于一种观念上的认识么？观念上性理上的认识，并不就等于生活上情

---

① 吴景超：《参加土改工作的心得》，《光明日报》，1951 年 3 月 28 日。

> 感上的全心全力的拥护，在此就很自然地发生了思想与感情相矛盾的问题。非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就不可能根本铲除中国的封建制度，这已经是每个知识分子都可以理解的常识。可是，有朝一日当这个人人可以理解的理论问题进一步而付诸实践的时候，知识分子就不能象他们过去支持这个理论一样的热心而积极了，为什么？理由是十分明白的，今日中国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和地主阶级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饮水思源，他们今日所有的这一点点即使是十分可怜的社会地位和知识特权，不都是经过“祖先余荫”，“戚友协助”这些间接方式，而得自土地封建剥削的余润么？一句话可以说完，中国知识分子和广大农民大众不同，他们不曾直接身受过封建剥削的苦痛，所以他们对于土地封建剥削制度和代表这种制度的地主，不仅是没有深仇大恨，而且是或多或少地带有若干怀恋的，惟其没有恨，所以对于彻底铲除封建剥削制度就鼓不起高度的热情，惟其或多或少的都还带着一些对地主阶级的好感，所以一朝当这个阶级到了非死亡不可的时候，他们就会油然而生怜悯之情①。

夏衍的分析不免有片面之处，因为已在“观念上性理上”认识到土改之必要的知识分子的“怜悯之情”似乎仅限于对个别地主而不是对于整个地主阶级，这种“怜悯之情”也不仅源于同地主阶级的血缘关系，还由于知识分子长期脱离社会，脱离工农群众，深受“中庸之道”、“不打落水狗”以及“和平土改”的改良主义思想影响，等等。但是，知识分子在思想感情上很难割断与地主家庭的联系，却是事实。当时有一篇报道说到，知识分子出身的工作队员看到

---

① 《从〈樱桃园〉谈起》，《夏衍选集》第4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239页。

老干部对地主的严厉态度、农民的愤怒情绪,往往对沦为丧家之犬的地主产生怜悯的感情,"而且他们还很快地联想到自己的阶级出身,想到家里人也有这么一天,不由得不心痛起来,怀疑起来。一位新干部同志在生活检讨上说:'在斗争地主时,大伙儿都说地主坏;可是自己总觉得地主有什么坏?有一点不大相信,如果拿我家里来说,就不一定做过坏事。'"①

土地改革特殊的斗争环境和斗争任务,不能不使身临其境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发生剧烈的激荡。朱光潜先生说,知识分子下乡搞土改,自然要站在农民一边,然而这还是由客观环境决定的,后来在斗争中就变成了主观心理的倾向。"我们当和农民在一起,看见他们朴素正直,确是可爱;搜集了许多地主欺压老百姓的材料,觉得他们横蛮凶恶,确是可恨。这样我们在情绪上就起了一个变化。"他还说:

> 斗争大会的场面是一种情感教育。在这种场面,任何人都要感觉到心象浪一样,要经过几起几伏的情感的激动。我分析我每次当场的情感,可以毫不惭愧地说:我是站在贫苦农民方面,把地主阶级当作对面的敌人来仇恨。我听到农民对地主诉苦说理,说到声泪俱下时,自己好象就变成那个诉苦的农民,真恨不得上前打那地主一下。有时诉苦人诉到情绪激昂时,情不自禁地伸手打地主一耳光。我虽记得这算违背政策,心里却十分痛快,觉得他打得好。如果没有这一耳光,就好象一口气没有出完就被捏住喉管似的。象这样情感的变化不是读书听讲所可得来的,它必须由实际斗争经验才能体验到②。

① 袁方:《我们的土改工作组》,《新建设》,第2卷第4期。

② 《从土改中我明白了阶级立场》,《光明日报》,1951年4月13日。

艾中信教授有同样的感觉。他说："在掀天动地的土改浪潮中，谁也不能视若无睹，充耳不闻，我们或者是被诉苦所感动，引起了阶级仇恨；或者从清算封建剥削启发了斗争情绪；或者看到了农民的高度觉悟而兴奋；或者从老干部的工作态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忘我精神，加深了对共产党的热爱。这一切新的事物跑进我们的头脑里，挤走了旧的观念。"[①] 这就是思想感情的变化。在京郊西红门的一个斗争大会上，几十个农民涕泪交流地控诉恶霸的罪行，徐悲鸿教授和学生们放声大哭。这种现象说明，土改斗争对知识分子心理和情感的冲击是巨大的。吴景超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

> 在此以前，我们在学校中也常谈土改，甚至在大课中也讲过土改。经过一个月的实践，认识有何不同呢？我想最不同的一点，就是以前谈土改，只有理智的内容，而现在谈土改，则添了一些感情的内容。以前只是冷静的分析，条文的推敲，现在则充满了对于农民的爱，对于地主的恨，把土改看作与自己血肉相关的一件事。这点感情的内容，是由于与农民共同参加反地主的斗争而获得的[②]。

在农村，知识分子工作队员非常注意向工农干部学习，在一言一行中发现自己在阶级感情、阶级立场方面与他们的差距，工农出身的工作队员也这样要求与影响他们。譬如，他们若接受了地主在生活方面的些小照顾，乃至抱了一下地主的孩子，和地主或他的家属和颜悦色地说了几句话，对斗争地主时的过激行为略有微词，

① 《土地改革与思想改造》，《光明日报》，1950年3月21日。
② 吴景超：《参加土改工作的心得》，《光明日报》，1951年3月28日。

或者对被没收了土地、财物并被管制劳动的地主略表同情，都会受到工农干部的批评，他们自己也会从阶级感情、阶级立场上认识自己的错误。陈体强教授在土改总结中谈到，他们到农村后，工作队住在地主的房子里，把地主赶到后院的破屋里；天下大雪，老地主一早就起来扫雪；一个地主的骡子被没收了，只留给他一头驴，地主家的老人、小孩子到工作组跪求，工作组就连驴子也没收了。“一部分同志觉得有点过火，心里很不舒服，后来在检讨会中曾因此提出激烈的辩论。”他们最后是这样认识的：“我们只看到今天这个服服帖帖的老头子，但是农民所看到的却是当年作威作福的土皇帝……我们潜意识中仿佛认为地主扫雪是可怜的，假如扫雪的是一个长工，我们就会视为当然，再也不去理会它了。我们只知道地主没有骡子就活不下去，但是忘了多少农民从来没有过一亩地。”[①] 他们从这里发现了自己在阶级感情和阶级立场上存在的问题。汪宣教授说：

> 当我初下乡时因为对地主阶级只有空洞的仇恨，所以遇到个别地主态度上客气温和的，看见老干部对地主的态度觉得不免过于粗暴和冷淡，例如在刚下乡的那天住在地主孟大成家，孟大成的老婆假意殷勤地抱了一捆干柴来为我们烧炕，张组长见了连说不要，一直将她推到门外，不仅没有客气话，连好脸色也没有。以张组长为人的和蔼可亲，使人甚为纳闷。到后来我也觉得地主面目可憎，不愿加以理睬，当地主与农民狡辩时，我和其他同学在态度上也不禁显得粗暴，有时反觉得张组长对地主太有涵养了。起先纳闷的现在得到了解答：张组长是农民出身的干部，他有着农民的感情，他对地主自然不会有、当然也不必要有温文尔雅的态度，从这一点我悟到工农

① 陈体强：《从土改中学习马列主义》，《文汇报》，1950 年 8 月 14 日。

> 出身的干部所以立场坚定，就是由于他们先天生成的工农感情。从此我也认识到知识分子必须从实际与工农结合当中培养工农感情，才能将"灵魂深处的小资产阶级王国"粉碎，建立起无产阶级的王国[①]。

思想感情的变化，即是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重大变化。艾中信教授说，他参加土改，最大的收获就是思想感情的群众化即工农化；思想感情的群众化，又导致了学术观点和美学观点的群众化。他说，他下乡的那天，"带着罗曼蒂克的心情走上西郊的黄土大道，远处的西山积雪，夹道的枯柳，小河里的冰流，既没有西北风，太阳照得象春天，同学们都兴高采烈地唱起了歌，那情景实在是挺美。一路走到村子，如作春节旅行一般，映入眼帘的尽是这些美景，就是没有注意到群众"。土改结束离村的那天，"群众送出几里地，有的一直送到区里，好些人都哭了。循着原路回来，同样的西山，同样的冰流，但对我的感觉已完全不同，它们不再能吸引我，不再能感动我，在我脑子里的，不再是这些美景，取而代之的是那一屋子的农民"[②]。大自然的美景没有变，是自己的思想感情变了。著名历史学家宋云彬教授参加土改后写了篇《西湖的春天》。他说：

> 看到了土地改革后的种种新气象，我对西湖的观感也改变了。西湖是可爱的，尤其是春天的西湖。"苏堤春晓"不是西湖十景之一吗？可是过去的西湖是被那些大官僚、大地主管领着的。他们在西湖上买地皮，盖庄子，春秋佳日，就来游玩一番。那些大丛林像灵隐、天竺之类，也是靠地租收入来维持和尚们的生活的，所以和尚事实上也是地主。我们从前自

① 《我在土改工作中的体验》，《光明日报》，1950年4月2日。
② 《土地改革与思想改造》，《光明日报》，1950年3月21日。

命为“文人雅士”，一到春天，探梅孤山，泛舟六桥，或者到灵隐、天竺找和尚们谈禅说理，以为“高雅”得很，现在想起来，实在是愧不堪言。你想，西湖装点得这样美丽，这不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成绩？所谓“苏堤”“白堤”之类，还不是靠劳动人民动手筑起来的？过去我们坐享劳动人民的成果，自己不惭愧，还以为“高雅”，把劳动人民看作“俗人”，这不是愧不堪言吗？……同样是西湖的春天，同样是春天的西湖，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后，我的心情和对她的观感全不相同，因为今天的情况已经改变了。我再不想做文人雅士去孤山探梅；我只希望再过几年，湖上有了大规模的疗养院、文化宫之类，让西湖成为劳动人民的大公园，我以一个脑力劳动者的资格，在湖上作短期的休养，用一种跟过去完全不同的心情来领略湖光山色[1]。

劳动观点与群众观点的确立，也是知识分子下乡的重要收获。旧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自视甚高，看不起工农群众，特别看不起农民，认为农民保守、落后、散漫。他们在土地改革中看到了农民的智慧和力量。曾在湖南岳阳参加土改的著名作家、诗人、翻译家、新闻记者萧乾先生说：

善良、纯朴、炽热的农民在土地改革中的表现真了不起！他们的爱与恨，就象晴和雨那样截然分明。在琐碎事情上，他们显得似乎比知识分子迟钝——他们更不会虚伪的客套；但是在关键性事情上，他们一丝也不苟。他们斗争时，坚决到底；修起堤来，太阳落山也不肯歇手。他们也有公私利益的矛盾，也即是眼前的与远大的利益的矛盾，然而他们处理起那些矛盾来，真是又明朗又干脆。

---

① 《新观察》，第2卷第7期。

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明农民的政策水平之高。有一次,斗争一个地主婆,这个地主婆的丈夫是个白痴。地主婆把白痴放在楼下,自己和一个姘夫住在一起,并虐待这个白痴。斗争会召开前,农民决定只斗争掌握财权的地主婆,不斗那个白痴。斗争时,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想挖她"偷汉"的根,就问她"你们谁先找的谁?"一类的话。农民提意见,认为"斗争应该集中到政治反动与经济剥削,不应集中到私人感情上去"。萧乾感叹地说:"这是多么明快,细腻,冷静的政策思想!"[①] 吴景超教授说:"自整顿农会,以至开诉苦会,反恶霸斗争,清查田亩,评定成分等一系列的工作,都要集合群众的力量,同群众反复商量讨论,才可以圆满完成。群众的智慧高于个人的智慧,也在各种斗争的场合中,表现得非常透彻而明显,因此小资产阶级那种自高自大的心理,在群众的伟大力量之前,也就由减低以至消失了。一方面认识个人能力之有限,一方面在群众的身上,发现了取之不尽的智慧泉源,便会诚心诚意地学习走群众路线了。"[②]

经过政治学习运动,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改造意识有了增强。在土改工作中,他们与贫苦农民、工农干部朝夕相处,在对比中发现了自己与贫苦农民、工农干部的差距,这就使参加土改的过程变成了自觉的思想改造过程。阶级观点、阶级立场、群众观点、劳动观点的确立,阶级感情的转变,本身即是思想的变化。燕京大学教授郑林庄说,他过去坚持"为社会服务"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观点,解放后也不认为"为社会服务"有什么错。到农村参观土改,树立了阶级观点,"有了这点阶级观点,我就有了清算过去错误思想的根据。每当一天的工作完了,躺在稻草铺上没有人睡之前,我总

---

① 《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人民日报》,1951年3月1日。

② 吴景超:《参加土改工作的心得》,《光明日报》,1951年3月28日。

在追索这种错误思想"[1],由此可见知识分子自我改造意识的强烈。有人说,"土改的土字,要是下面的一横写短了就是士字,那么土改就成为士改了"[2]。

土改中的亲身体验,显著地推动人们认同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朱光潜先生说,他们在农村认识了中农的特性以后大吃一惊,"就象突然站在一面镜子前,看见了自己的形象,吃了一惊说:'我们就活象这批中农!'"[3] 曾在四川眉山县参加土改的著名历史学家、北大教授周一良先生写了一篇题为《我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照了镜子》的体会文章,从政治上的动摇性和对革命由恐惧到安心的心理变化等方面,详细论述了为什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像中农。在政治学习时期,许多人对毛泽东称脱离实际的文化人为"半知识分子"不服气、不理解。到了农村,接触了农民和参加土改的工农干部,才认识到知识分子实际知识的缺乏和实际能力的低下,承认自己确为"半知识分子"。雷海宗教授说,参加土改以前,他"有时也曾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自己的知识确有很大的根本上的缺陷。在此次土改工作中,一方面接触到真正工农出身的老干部,一方面亲自听到刚刚解放一年的农民谈到实际问题时思维的活跃与发言的热烈,才使我了解读书太多,尤其是久与实际生活脱节的读书太多,是使一个人的知识愈来愈无实用价值也就无理论价值的一种求知方式。这种求知方式是要不得的"[4]。北大哲学系教授胡世华说,参观了土地改革运动,思考土改运动及其前因后果,才"深深地体会到毛主席说的'知识分子不与工农民众相结合,就将一事无成'这句话是有多么深刻的意义!"[5]

---

① 《参观土地改革的两点体会》,《人民日报》,1951 年 4 月 7 日。

② 袁方:《我们的土改工作组》,《新建设》,第 2 卷第 4 期。

③ 《从土改中我明白了阶级立场》,《光明日报》,1951 年 4 月 13 日。

④ 《参加土改工作总结与一年学习总结》,《光明日报》,1950 年 3 月 30 日。

⑤ 《人民民主专政在农村扎了根》,《人民日报》,1951 年 5 月 3 日。

在实践的教育面前,知识分子表现了爱面子更爱真理的自我批判精神。有一些人的自我批判十分尖锐。北大经济系教授樊弘先生参观土地改革归来,撰文说他的最大收获是认识到一切工作,“特别是文化教育的工作,无论在何时何地,均必须配合被压迫的劳动阶级对反动阶级所发动的激烈斗争。我们看每一个问题均必须站在这个最尖锐的斗争的立场上去立论”。他全面地检讨和尖锐地批判了五四以来的大学教授缺乏明确的阶级意识和阶级立场,耻言阶级和阶级斗争,表面崇尚“超阶级”,实际“偏袒”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站在反动的阵营里去”的错误。他说,缺乏明确的阶级立场,就是“我们这一批自五四运动以来,曾经喧嚣一时的大学教授们,在今天或多或少地失掉了社会地位的原因”。

> 我们反人民,人民胜利了。我们还不没落么?除开少数的马列主义的文化战士而外,我们确是没落了。现在无人不感到五四以来的老教授们的地位在没落。在社会科学上几乎没有什么老教授们的笔墨,在政治舞台上亦几乎没有什么老教授们的精彩表演,在社会讲坛上亦几乎没有什么老教授们的声音。老教授们不但在学校以外逐渐丧失了威信,在教室里或在学生群众中,也逐渐地丧失了威信。因为过去我们所谈那一套,都不是代表人民的呼声,而是代表少数剥削者的播音。这即是说,我们的立场基本上是反人民的。

他说,社会科学知识只能在阶级斗争中才能得到,“大学教授们或多或少的不喜欢参加革命的斗争,这是否会使我们的知识陈腐不堪和没有进步呢?一个大学教授所教的东西既然陈腐不堪和没有进步,而社会则在飞跃往前进步,纵令社会还要继续供给我们

的小米,但我们是否也要想想我们能够长此不进步么?"[1] 雷海宗教授说,因为接受欧美资本主义教育而在精神上与祖国失去了联系的大知识分子,"须要努力发现祖国,认识祖国,最好的办法恐怕是深入民间,尤其是深入农村,到农村中去生活,去学习,使自己的人格在农村中扎根,在思想、意态、感情、情绪的所有方面能够与农民神通气合,使自己成为一个老农"[2]。这种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完全发自内心的自我批判与强烈的自我改造意识,只能产生在亲身参与土地改革这样一种特殊的阶级斗争实践中。著名哲学家、北大教授贺麟先生参加土改归来,撰文系统地批判了自己的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检讨了以前对于辩证唯物论的片面理解,这表明参加土改影响到了一些人的学术思想。

参加土地改革对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意义,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实际上,1949年至1957年间一连串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这是最成功的一次。革命胜利之初,知识分子不能不承认共产党的正确和自己政治上的短视,但这种认识不能不是笼统的,即"胜利者皆对,失败者皆错"。在政治学习运动中,他们学习理论,反省历史,开始从政治上思想上否定自我,达到的实际效果主要是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土地改革运动真正触及了他们的灵魂。承认自己确属毛泽东所说的"半知识分子"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确需进行艰苦的自我改造;承认马克思主义确是科学的理论,产生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强烈愿望,这是参加土改促成的知识分子的两大变化。知识分子真正接受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接受被教育、被改造的地位,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可以说,是从参加土改开始的。许多年后,一些人仍然念念不忘当年参加土改对他们的思想的震撼,说明这一次阶级斗

---

① 《使知识服务于革命斗争》,《光明日报》,1951年10月21日。

② 《社会科学工作者与新的社会科学》,《光明日报》,1951年4月5日。

争实践对于知识分子精神与心理的发展，影响至深至远。

1.7 抗美援朝运动：对崇美思想的初步清理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参战。为了动员群众支持战争，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广泛地进行仇视、蔑视、鄙视美帝国主义的教育。这个运动波及了有美国教育背景的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

如前所述，民国时期的高级知识分子大多有留学背景，其中又以留美生为多。美国以教会为工具，长期在中国举办文化教育事业，培养了很大一批知识青年和知识分子。新中国建立时，美国的教会及救济机关在中国仍有相当的势力。如美国教会资助了全国20所教会大学中的17所，300余所教会中学中的近200所，6000所教会小学中的1500所，400余所教会医院中的200余所，孤儿院200余所，麻疯病医院20余所，聋哑学校10所，盲校30所。美国在科技、经济、文化、军事诸领域的领先地位，以及"卓有成效"的对华文化渗透，使得崇拜美国的教育制度、政治制度、科学技术乃至生活方式，成为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流行心理。朝鲜战争爆发后，需要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但是，一部分知识分子不但害怕没有原子弹的中国打不赢这场战争，而且对美帝国主义也恨不起来，这就暴露了他们在思想感情上同美国的复杂联系。安徽大学史地系教授李则纲在1950年12月发表的一篇短文中说，他在北京，在南京，在路上，都听到人们说："现在抗美援朝思想成问题的还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或多或少是'亲美''崇美'的多。"[①] 这种群众性的看法不会离实际太远。因此，知识界便成了"三视教育"，清理亲美、崇美、恐美思想的重点。

---

① 《为抗美援朝向某些知识分子进一言》，《光明日报》，1950年12月9日。

知识界的"三视教育"以声讨美国的文化侵略为重点。1950年11月28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在安理会上把美国对中国的文化侵略说成是"中美人民的友谊"，引起了中国知识界全国规模的抗议示威。12月29日，政务院通过《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1951年2月17日，中国政府接办天主教辅仁大学，随后，各教会学校陆续脱离同美国教会的关系。教育界特别是教会大学随之掀起声讨美国文化侵略的高潮。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协和医大、岭南大学以及清华大学等纷纷举办展览会、讲演会、控诉会，揭露美国利用文化教育机关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培养为其殖民目的服务的奴才的罪行。燕大校长陆志韦发表《燕京大学受到的美帝主义文化侵略》的文章，揭露司徒雷登同反动势力相勾结，把持校政的历史。该校文学院院长齐思和教授曾在1948年平津18教授呼吁美援的呼吁书上签过名。他在全校控诉大会上承认，这样做"实在是背叛祖国、认敌为友的卖国思想。……我对不起祖国，对不起同胞"。该校社会系严景耀教授检讨了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工部局做事的历史，流着眼泪说："我过去一直自以为是进步的教授，最近才发觉自己多少年做了美国文化侵略的俘虏。""我不仅自己深受美帝的毒害，而且还把这些毒素传播给青年，这是多么沉重的罪恶。"[①] 自认为"一生四分之三的时间都在美帝国主义的思想麻醉下过生活"的岭南大学教授林孔湘作了《我的思想转变》的检讨，揭发美国人"假服务之名在中国享受特殊权利"的事实。反对美国文化侵略，是一次声讨帝国主义、动员人们积极参加抗美援朝的政治运动，而对于有美国留学背景或与美国的文化侵略有工作关系的知识分子来说，又是一次思想检讨运动。

如果把知识界控诉美国文化侵略的运动放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① 《光明日报》，1951年5月10日。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与变化的全过程中去看,就会发现,这次声势很大、时间很短的运动,直接控诉目标主要是司徒雷登、福开森等这样一些在中国文化教育界活动的美国人,它所真正触动的还是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与美国(也可扩展到整个西方)的表层关系。它所起的实际作用,主要是在中美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形成了使知识分子不能继续公开说美国的好话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尽管一些人非常诚恳地检查了自己因长期接受教会学校的教育而产生了崇美思想,甚至上升到洋奴、买办的高度,但是,要说在思想深处对他们有什么真正的触及,恐怕是谈不到的。

当时最有影响的文章当数吴贻芳先生的《我的控诉和检讨》,这位时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的著名女性不但控诉了美国利用两个国际性宗教组织"侵略世界"的阴谋,检讨了自己受人蒙蔽参与这两个宗教组织的活动的错误,还"在现有的政治认识上,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控诉我自己"。她控诉自己让帝国主义通过金陵女大校长的地位麻痹了她,使她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控诉自己单纯地重视校内的宗教活动,盲目信任一切基督徒,对外国教员毫不提防,使他们能够在宗教的掩护下进行反中国人民的活动;控诉自己受到个人自由主义思想的毒害,以致一直抱着"超政治"的态度。这样的批判与自我批判,对于一个长期受美国教育、与美国文化保持密切联系、在世界教育界和宗教组织中享有很高地位的虔诚的基督徒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不难想像出吴贻芳先生在做这个控诉与检讨时的痛苦。但是,把她的检讨放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全局看,也没有提供超出此前政治学习运动所涉及的范围。

在研究控诉美国文化侵略运动的有关材料时,我们还注意到一种现象,即在客观形势对曾接受美国教育、同美国文化教育界宗教界有联系、或长期在教会学校中服务的知识分子造成巨大压力的情况下,一些人并未因此而违心地全盘否定自己或别人。在世

人眼里，陆志韦先生身为燕京大学校长，当然是美国文化侵略的头号工具，然而他却公开声明：

> 我从不在美国人的面前低过头，也从不丝毫怀疑我们的民族是优秀的民族。我只是有点顽固，不能把自己的痛苦跟人民的痛苦打成一片，也就不能完全看透美帝的文化侵略对于中国人民是何等危险。我轻视美帝，可不痛恨美帝，因为我从来不恨任何人、任何阶级。

他坚持说："要说我不爱国，我不承认，我就是不明白世界大势。""平心而论，三十年前的司徒雷登也不全然是跟美国国务院表里为奸的特务头子。"他说他出任燕大校长，实出于无奈。他处理校务，并不买司徒雷登的账，不让管的事偏要管，特别要管美国人。他甚至说燕大的主要问题，不是美国利用文化教育进行政治与经济侵略，而是传播美国的生活方式；燕大的美国教授也有进步分子，要分清美帝与美国人[①]。

燕大新闻系教授蒋荫恩在控诉大会上检讨自己因美国教育和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而崇拜美国、看不起祖国的思想，检讨自己迷信美国的政治理论与新闻理论，却有全部否定自己的味道。他说："燕京的毕业生当中曾有不少人变成革命干部，可是这和过去的燕京教育本身是没有丝毫关系的。同时，燕京毕业生中也有不少出色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可是这也不完全是燕京教育的直接产品"。这些话未必妥当。但是，他又特别说明自己在抗战时期曾力主在燕京办一个由中国人主持的新闻系，当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蔑视他的意见，主张办一个完全由美国人来教的新闻

① 《燕京大学受到的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新观察》，第2卷第3期。

学院时，他“非常生气，几乎在口头上和他冲突起来”[1]。这实际上又否定了他前所承认的崇美思想，表明他虽然长期受美式教育并在燕京工作，不但没有洋奴思想，且有爱国精神。这些情况表明，当时尚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外部条件，知识分子还能够心口如一地自由发言，尚未出现后来那种在政治压力下不得不发违心之论的情况。

① 《一个燕京人的自白》，《光明日报》，1951年3月1日。

第二章　早期的冲突

新生的中国:“旧知识分子”不熟悉的环境——首次文代会:建立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开端——本能的反抗:“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争论——捍卫文艺独立:阿垅的《论倾向性》与对阿垅的批判——抵制“左”的文艺批评:关于《红旗歌》的讨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社会转换期的学术与自然科学——两种学术观的交锋:关于朱光潜美学思想的争论——自信心的动摇:冯友兰和柳湜关于学风问题的辨论——全国高教会议:高级知识分子对转换教育模式的抵制

2.1　新生的中国:“旧知识分子”不熟悉的环境

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认同新社会,认同共产党,愿意融入新社会,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人民”,但是,他们长期工作和生活在旧社会,不但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学术观与新社会格格不入,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乃至言语、装束也与新的时尚大不相同。新社会全然是根据地、解放区的放大。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旧知识分子”一举手、一投足,都不免发生令人尴尬的事情。

知识分子和新政权打交道,第一个动作就是开口说话。共产党的话语范式,解放后成为新社会的标准话语。知识分子不熟悉这种话语,因而带来不少的烦恼。冯友兰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

特别记载若干事例，以说明这个问题。清华大学解放时，冯先生担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当时校务委员会出了一个通告，让愿意留下来为新教育服务的教授登记。吴晗教授当时在解放区，没有登记，会计课便不发给他工资。吴晗就在外面说：清华规定，凡从解放区回来的人要"登记"。在新的话语范式中，"登记"这个词的含义是政治上或其他方面有"问题"的人以文字形式认可自己的"问题"，有打入"另册"的意思。消息传开，人们便说，清华认为去解放区的人有"问题"，最后竟然招来了文管会的查问。有一个时期，学校发不出工资，教授会有人要冯先生去催，冯先生听了很生气，说我在这里是办学，不是讨饭。一位教授说他是"思想"问题。冯先生说："我当时想，我搞了几十年哲学，还不知道什么是思想？后来才知道，解放以后的所谓思想，和以前所谓的思想并不完全一样。"1949年4月29日，清华大学校庆，周总理派人来问他有什么"意见"。他以为"意见"就是对国家大事"拾遗补阙"的意思，他便说没有什么"意见"。后来才知道"意见"一词含义甚广，大到国家大事，小至个人生活、工作，有什么希望和要求，都可以作为"意见"提出来。冯先生说："在当时我同共产党接触的时候，虽然说的都是一样的字眼，可是各有各的了解，往往答非所问。在解放之初，许多知识分子都有这种情况。"①

除了说话以外，许多行为举止乃至穿衣戴帽，知识分子都有一个由不习惯到习惯的过程。当时大型集会极多，开会便山呼"万岁"；每逢重大节日或领袖诞辰（虽未公布，但人所共知），要向领袖致电致信，敬祝领袖"永远健康"，报纸上照登不误。服装逐渐统一，解放区来的干部穿灰布军装，地方干部穿中山装，青年学生穿列宁装。西服、长衫、花裙、旗袍、皮鞋，成了不时兴、很刺眼的东西，慢慢地消失。这些极普通的生活细节，知识分子都有一个适应

①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134页。

的过程。开会要做笔记，写文章、讲话要引用革命导师的词语，也使一些知识分子颇感困难。季羡林先生说：

> 我当时才40岁，算是刚刚进入中年，但是我心中需要克服的障碍就不老少。参加大会，喊“万岁”之类的口号，最初我张不开嘴。连脱掉大褂换上中山装这样的小事，都觉得异常别扭，他可知矣[1]。

季先生新中国成立前算是一个中派知识分子。左派知识分子又怎么样呢？吴晗先生自40年代中期投身于民主运动，是共产党的老朋友，学术上也比较早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使人难以想像的是，他对新社会的不适应竟然同他那些从美国归来的清华同事毫无二致。他在写于1956年前后的一篇“自传”中说：

> 在蒋介石统治区生活的日子里，对蒋介石的以党治国，独裁专政，万岁百岁，极端厌恶，听了恶心。初到解放区，听到专政，拥护共产党，毛主席万岁，很不习惯，心里以为好是好，何必搞这套形式……其实是我当时还没有和解放了的人民感情完全在一起，还没有体会到解放了的人民的真实感情。一句话，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感情，而不是解放了的劳动人民的感情。但是，这种错觉很快就纠正了。经过学习，我用自己眼见的亲身的感受，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不多日子以后，我从心坎里喊出毛主席万岁了，衷心拥护人民民主专政……[2]

那些对政治问题没有深刻理解，但对人与人之间的种种事物

---

① 季羡林：《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东方》，1994年第5期。

② 《吴晗自传书信文集》，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

有着特殊敏感的作家们，进入新社会也不免时有尴尬。著名作家王蒙在《文艺争鸣》1994 年第 2 期发表的《杂感》说：

> 在 1949 年时，有一大批作家是以“革命的先锋”、“革命的号手”、“革命的大炮”的身份来迎接共和国的。但是与此同时，作家们却也发现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现象，就是当这些作家真正投身到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当中，愈发现自己的言行举止相当不符合革命对他们的要求。在农民的革命当中，要求作家无条件地参加革命，要求作家认同工农战士，放弃自己许多在贫苦农民眼中的奢侈习惯，有的作家甚至连刷牙都做过检讨，因为农民们认为没有必要每天刷牙。我在农村劳动时，也有过这种经验，农民曾问我：“你嘴里有大粪吗？为什么每天用个粪勺子在里面掏来掏去的！”

长期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分子，没有整过风，最害怕自己思想上余毒未清，被他人视为“小资产阶级”或旧派人物。一方面由于“摘桃派”和“小资产阶级”自卑心理的影响，一方面又想处处给人以争取进步的印象，所以他们对日常生活和言行举止非常注意。郑振铎先生曾对后来担任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楼适夷先生讲过一个笑话：1949 年 7 月在北平召开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时候，解放区、国统区的两支文艺大军浩荡会师，真是一片洋洋喜气。有一次，会后夜游北海，泛舟中流，月光照在水面上，银鳞闪闪，景色甚美。振铎先生举首望明月，情不自禁地对一位延安来的作家赞叹说：“今夜的月色真美呀！”对方竟毫无反应，既不点头，也无回话。他就有点担心了：是不是谈了“风花雪月”，暴露了自己的

小资产阶级的尾巴呢[①]? 著名的民主人士、长期同共产党保持密切关系的大知识分子尚且如此,何谈他人! 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待人处世,讲和气,讲中庸,而新社会讲原则,讲批评,讲斗争;批评别人,检讨自己,动辄上纲上线,不讲情面。旧中国的知识分子生活"西化",不拘小节,而新社会讲"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特别注意个人"生活作风"的严谨。知识分子在日常工作和生活小节方面的自我约束,也就逐渐达到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程度。

在工作方面,许多知识分子也很不习惯。如新社会崇尚组织的力量,整个社会为组织之网所笼罩。工人有工会,农民有农会,妇女有妇联,青年有青年团,少年有少先队,教师有教育工作者联合会,文学艺术工作者有文联、作协、剧协、影协、美协、音协……社会上的一切人、一切职业,莫不有其组织。更重要的是,这些组织具有同旧社会类似组织不同的性质和职能,即它们或多或少都与一定的行政、政治权力相联系,对它的成员有着实际的约束作用。这就很使散漫惯了的知识分子们烦恼。"就拿教授来说罢。在解放前,他们想开什么课,就开什么课;愿意怎么讲,就怎么讲。在大学里,他们是教授;在社会上,他们是名流。许多人是高视阔步,唯我独尊,自由散漫,逍遥自在。但是今天不同了:知识分子同其他劳动者一样,都为着人民的利益而工作。工作要有计划,要有组织;教授讲课,要有教学计划,要有教学大纲;工作中的缺点,又是批评,又是自我批评。辛辛苦苦地用了半天力,结果招来一大堆意见。"[②] 你不服从组织吗? 立刻就会招来批评和批判,课不能再讲,戏不能再演,作品不能发表,前途乃至生活都成了问题。

新社会看人论事,处处政治化,也使得知识分子无所适从。黄

---

① 楼适夷:《零零碎碎的回忆》,《文化界名人自述》,群众出版社 1993 年 7 月版,第 284 页。

② 季羡林:《我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些看法》,《人民日报》,1956 年 1 月 13 日。

宗英在旧上海是以演"娇生惯养的,脾气特别的,服装漂亮的","穿着马裤马靴,发起脾气来,真象美国电影明星的""甜姐儿"出名的。1950年年初,她在反映新中国成立后工人生活的话剧《红旗歌》中扮演一个女共产党员。她演得很卖力气,却招来许多批评:"这怎么象个共产党员呢?假如共产党员是这样的,共产党早就垮了。""工会里面的分子若要象她这样软弱的话,工会什么事也不要干了。"还有的人一本正经地对她说:"宗英,你要晓得共产党是懂得社会发展规律的,是有着什么什么……样的精神和思想的,你一定要从你的思想里,你过去的生活里,好好地检讨你自己,什么什么……的。"黄宗英在上海第一次文代会上发言说:"天啊,我就想,我过去是做过什么罪大恶极的事,使我今天演出了共产党员,是这样地侮辱了党了呢?""这个罪过可真不是容易受的。""有一个时期我就那么想,在我自己是共产党员之前,我再也不要演共产党员了。"后来,又要她在另外一个电影中演共产党员工会干部,她"简直就要给大家磕头了,说了很多苦衷,求饶,因为这精神负担太重了"①。

新中国成立之初,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理论与政策并不十分清楚,因而不免时常在无意中踩了"地雷"。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1949年10月底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后到天津演出,其间他同记者谈到京剧改革,提出了"移步而不换形"的主张。他认为,不要把京剧艺术的思想改革与技术性改革混为一谈,京剧技术原则上应当保留,思想性方面的改革要经过充分准备和慎重考虑再行修改,才不会发生错误,因为京剧是一种古典艺术,有很久的传统,改要改得天衣无缝才行。记者将他这一番并无不妥的谈话公诸报端,结果在北京文艺界引起轩然大波。一些人认为梅先生主张"移步而不换形"是宣扬改良主义,与京剧革命的精神不相容,写了批判文

① 黄宗英:《我争取做一个共产党员》,《文汇报》,1950年7月28日。

章要发表。梅先生得知后极为紧张，两三个晚上没有睡好，因此而被困在天津半个月。最后陆定一过问此事，说中央考虑到梅先生的地位，已写好的批判文章不要见报，请天津市委书记黄敬和市委文教部部长黄松龄解决。经天津市文化局局长钱杏邨等人策划，开了一个旧京剧改革座谈会，由梅先生在会上发言公开修正自己的观点，转而提出“移步必然换形”，并说“这是我最近学习的一个进步”，此事方才了结。

上面所说的知识分子与新的社会环境的冲突大多是表面性的问题，更深刻的冲突当然发生在思想与专业领域。尽管知识分子承认共产党伟大、正确，马克思主义应当成为判断是非的惟一标准，然而，知识分子毕竟是知识分子，他们有独立思考的习惯。因此，当着社会变革触及他们的专业领域、专业思想时，他们与新社会的冲突便立刻尖锐起来，而这正是旧人物与新环境最深刻的冲突。

2.2　首次文代会：建立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开端

共产党进入北平之后，除了立即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组建中央政府外，还于1949年6月19日至7月16日召开了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7月2日至19日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7月13日召开了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7月15日至17日召开了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7月23日至29日召开了中华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这些会议多由知名人士提起，实际上都由中共中央批准和指导。通过这些会议，党使知识分子了解和接受它的理论与政策，以建立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建立无所不在的行业性群众团体，把知识分子组织起来，使他们成为党指挥下的一支军队。

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是这些会议中惟一正式的代表会议，也是规模最大的会议。这次会议有正式代表700多人，囊括了全国各地区、各方面的知名文化人士，另有1300名戏剧工作者专程赴北平为会议演出。郭沫若先生作了总报告，毛泽东会见了全体代表，周恩来、陆定一、陈伯达、钱俊瑞作了报告。会议决定成立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选举郭沫若等87人为全国委员会委员。共产党进城后首先召开文学艺术界的全国代表大会，并一直给予文艺界以特别的"政治待遇"，表明了它对文艺工作的特殊重视。这是共产党的传统。在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延安时期，共产党已经不仅把文学艺术视为为军事和农村工作服务的宣传动员手段，而且把它作为改造人们思想的工具。当着行将建立全国政权，需要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时候，它很自然地选择文学艺术作为第一个需要完全占领的领域。文学艺术工作者在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跳舞的历史命运，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就已经确定了。

这次全国文代会规模很大，时间很长，主题却很简单：把毛泽东1942年所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一个革命党的文艺工作理论，转变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方针。胜利者的意识形态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文艺工作在和平建设时期应发挥同战争时期一样的作用，在执政党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这时的领导者犯了一个错误：共产党不再是一个革命党，而成了执政党；执政党的主要任务不再是革命，而是建设；文学艺术不再单纯是革命的动员工具，而是提高民族的文化文明素质的有独立价值的事业。在革命胜利、社会环境发生根本变化的历史条件下，文艺事业发展的方向、任务必须有所调整，革命时期形成的文艺理论、文艺工作方针、文艺工作方式应重新审查，应当用国家的力量保障文学艺术创作的自由，为文学艺术工作者创造自由、宽松、广阔的活动天地，以便迅速繁荣新中国的文化。不幸的是，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奠基

者在历史转折关头失去了历史的感觉，通过第一次文代会，机械地搬用了革命时期的文艺理论与政策，这就种下了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发生“左”的错误的根苗。

参加全国文代会的多数代表，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不陌生。早在战争年代，国统区文艺界的许多人已经通过中共地下组织，了解了它的基本内容。有人赞成，有人怀疑，也有人提出过异议。在共产党尚未取得全国政权的时候，中间派的文化人士暂且不说，即使进步文艺工作者，也不觉得自己有完全服从毛泽东文艺理论的义务。革命胜利后，许多人由政治上对共产党的佩服进而相信毛泽东文艺理论的正确，然而，思想上的真正接受必有一个过程。全国文代会期间，人们对确定毛泽东的文艺理论为新中国文学艺术的方针，原则上没有什么意见，但对一些具体问题还有疑虑、疑问和争论。这些疑虑、疑问和争论，多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尽管郭沫若在大会总报告中宣布允许文艺统一战线中不同文艺观点的存在，然而，茅盾作的《十年来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区革命文艺运动总报告》表明，郭沫若代表党所作的承诺，纯粹是一种姿态。

茅盾报告的主旨或主题，是依据毛泽东的文艺理论，清算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文艺界存在的“错误倾向”和“错误理论”。他首先强调国统区与解放区环境的区别，从这一前提引出“在反动统治下，群众运动不可能广泛地发展起来，文艺工作者没有充分的机会去和人民群众接近。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文艺工作者主观上的缺点也就容易于滋长”的结论。在回顾了进步文艺发展的概况之后，他批判了创作中存在的错误倾向。他认为，自抗战初期以后，由于环境的困难，作家不能接近群众或与群众结合，不能改造自己，相互间不能互通声气，思想方法和创作方法存在问题，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创作“不免表现着相当混乱与空疏的现象”，“一般来说，没有能够反映出当时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与主要斗争，这正是国统区

文艺创作中产生各种缺点的基本根源"。有些作家的文字"黯淡无力",有些作家按照主观描写作品中人物的精神状态,有的作家在作品中填塞人道主义的思想情绪,还有的作家描写低级趣味,编造"抗战加恋爱"的庸俗故事,公然宣扬颓废主义。作品的题材写工农的极少,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对于知识分子的短处则常常表示维护,即使批判了,也还是表示爱护与原谅"。茅盾指出,文艺创作中这些错误倾向的产生,有作家方面的主观原因。"国统区的进步作家们大多数都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和人民大众之间是有着距离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使作家们在艺术上倾心于欧美资产阶级文艺的传统。小资产阶级的观点也妨碍了作家们全面而深入地认识历史的现实。"

茅盾的报告最有针对性的内容是对国统区文艺思想理论的批评。他说,在抗战以来的10年中,国统区的文艺理论上,"确也曾表现出不少模糊与混乱的现象。曾经由于反对过去文艺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倾向,以致抹煞了科学的文艺思想的指导作用而放纵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也曾出现过由于强调抗日战争中的民族观点而比较忽视了阶级观点的思想倾向"。国统区文艺工作者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入研究不够,尤其没有根据《讲话》进行"具体的反省与检讨"。他对1940年发生的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作了各打五十大板式的评论。他认为这场争论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在文艺家中如何建立真正的群众观点的问题没有受到重视。争论取得了一些好的效果,但不能克服"那对于文艺大众化成为最严重障碍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及其文艺形式"。他回顾了1945年重庆进步文艺界因对几个作品的评价问题而发生的争论,批评了当时的几种意见,突出地强调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作品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的关系。最后,他集中批判了1944年在重庆出现的强调文艺创作中的"主观"和"生命力"的理论,说"这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禁受不住长期的黑暗与苦难生活的

表现”。文艺理论上的“主观”问题，是近几年文艺界“思想中积蓄酝酿着的基本问题，不能不要求解决”。这个问题的讨论继续下去，“不得不归结到毛泽东的文艺讲话中所提出的关于文艺上立场观点态度等问题”。“如果作家不能在思想上生活上真正摆脱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而走向工农兵的立场、人民大众的立场，那么文艺大众化的问题不能彻底解决，文艺上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的问题也不能彻底解决，作家主观的强与弱、健康与不健康的问题也一定解决不了。——从国统区文艺运动这若干年来的思想理论斗争中，也和在创作实践中一样，是只能得到这一个结论而不可能得到其他的结论的。”[①]

茅盾的报告，抽象地承认国统区进步文艺的成绩，通篇读来，使人感受到的却是完全否定国统区进步文艺、至少是否定这种文艺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强烈倾向。按照茅盾的报告，似乎在抗战以后的10年间，国统区的进步文艺没有取得什么了不起的成绩，国统区进步文艺界的主导思想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特别是胡风的文艺理论。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这次大会应是“胜利的大团结、大会师”[②]，是文艺界的狂欢节，人们应当大谈民主革命28年间革命文艺、进步文艺的成就，包括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文艺的成就与贡献。茅盾这个大煞风景的报告，却使那些长期活动于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化人堕入五里雾中。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只谈抗战以来的“十年”，而不谈五四以来的30年和无产阶级文艺创建与蓬勃发展的内战10年；为什么只谈文艺界内部的分歧，而不谈共同的对敌斗争。国统区以鲁迅为代表的文艺工作者在中国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建了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他们以自己的

---

① 《光明日报》，1949年7月5日。

② 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358页。

作品唤醒了人民，唤醒了青年，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军。有些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在革命胜利之日，他们的成就与贡献竟然得不到肯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竟然成了立场、观点、态度都有问题的、满身缺点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标志着文艺界大团结、大会师的全国文代会竟然成了批判“错误倾向”和“错误理论”的大会，成了声讨胡风的战场，这不但使胡风愤愤不平，也使那些长期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艺工作者感到委屈和压抑。

其实，文代会的领导者为大会确定这样一种似乎不合常理的方向的意图非常明显：淡化30年代国民党统治区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文艺界的贡献，贬低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文艺在整个革命文艺事业中的地位与作用；肯定甚至夸大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根据地革命文艺的成就和作用，抬高它在五四以来整个进步文艺事业中的地位；通过这相互联系着的两个方面的努力，把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规定为民主革命时期惟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因而也就使它自然地成为新中国的文艺指导思想。因为无论怎样考证，也得不出毛泽东在20年代、30年代已经有系统的文艺思想的结论，得不出鲁迅、郭沫若等人是在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培育下成长和战斗的一代的结论，所以，周扬等人想方设法，提出真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即无产阶级文艺是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始的这样一个不符合事实的观点，以此一笔抹煞此前20年间不但已经产生而且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这就是说，茅盾的报告直接地是贬低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剥夺他们“翘尾巴”的资本；批判以胡风为代表的进步文艺界内部有独立思想的人们，清理“门户”；潜藏于最深处的政治意图，却是用不尊重事实、不尊重历史的手法，为确定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的绝对地位服务。因此，茅盾的报告，不是对“十年来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区革命文艺”的总结，而是建立大一统意识形态的重大步骤。

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表面上开得很轻松，上午开会，下午讨论，

晚上看戏，报纸上发表了不少表决心、谈感想、论收获的短文，然而，怀着激动万分的心情来参加会议的人们对这次会议的反应似乎并不热烈。叶圣陶先生在日记中记下了当时的感受。7月2日，会议开幕，叶先生记："郭沫若之主席致辞朗诵诗，义实平常。"7月4日，茅盾作报告，叶先生记："雁冰作报告。谈国统区之革命文艺活动，依据发布之印刷品而讲说，如教师讲课然。"7月19日，大会闭幕，叶先生记：郭沫若作总结，"余未听明白"，"沫若作闭幕词，有一语最可记，此次大会费用值小米三百万斤"[①]。叶先生没有明白地记下对这次大会的具体看法，但不以为然的态度和压抑之感隐约可见。在后来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文艺整风乃至反右派运动中，领导层的一些人屡屡提起这次会议上暴露出来的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出席会议的一些代表后来不得不对他们当时的言论作出检讨，说明这次会议远未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但是，人们已经意识到："在一种强固的政治制度之下，决不容许有纷乱的个性表现。"[②] 用一种思想规范一切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时代已经开始。

2.3 本能的反抗："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争论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原则之一。按照一般的推论和权威的解释，为工农兵服务，自然要写工农兵，要使工农兵成为文艺作品的主角。国统区的作家、艺术家，长期生活在城市，不熟悉工农兵，只熟悉市民或"小资产阶级"。如果文艺作品只能写工农兵，他们只好搁笔不写。因此，他们自然要提出"我们写什么"的问题。

---

① 《叶圣陶集》第22卷，第55页。

② 桥烟：《关于美术的一二问题》，《文汇报》，1949年8月14日。

实际上，在全国文代会上，就有人（如《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导演史东山）提出这个问题，并引起了争论，以致周恩来不得不在他的报告中作出解释。周恩来说："我们主张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然不是说文艺作品只能写工农兵。比方写工人在解放以前的状况，就要写到官僚资本家的剥削；写现在的生产，就要写到劳资两利；写封建农村的农民，就要写到地主的残暴；写人民解放战争，就要写到国民党军队里的那些无谓牺牲的士兵和那些反动军官。所以，我不是说我们不要熟悉社会上的别的阶级，不要写别的阶级的人物，但是主要的力量应该放在哪里必须弄清楚，不然就不可能反映出这个伟大的时代，不可能反映出创造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劳动人民。"①

这段话的第一句，似乎是说小资产阶级也可以写，而其后举的例子表达的意思却是：工农兵以外的人物只能在写工农兵的作品中作为陪衬，也就是说，非工农阶级的人物不能成为文艺作品的主角。可惜的是，当时即使在怀仁堂召开的大型会议也还有战时遗风，不像今天这样，开会前先发"会议文件"，代表们可以从容不迫地"领会""精神实质"。周恩来没有讲明白，许多人也没有听明白，所以会议结束不久，上海便发生了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争论。

这次论争是由全国文代会代表、电影剧本作家冼群先生挑起的。1949年8月22日的《文汇报》在《剧影协昨开会欢迎返沪文代》的新闻中报道了文代会代表、剧作家陈白尘先生在欢迎会上说的一段话："文艺为工农兵，而且应以工农兵为主角，所谓可以写小资产阶级，是指在以工农兵为主角的作品中，可以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人物出现。"冼群因雨没有出席这次欢迎会，他看了报道之后写了《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问题》的短文，发表在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53页。

8月27日《文汇报》的《磁力》专栏中。冼群不同意陈先生的意见，他说："在北平的文代会上，至少我个人是没有听到和看到过与他的意见相同的报告或决议的；也没有读到过刊载类似这种意见的任何文件。"9月3日，陈先生在该专栏发表《误解以外》的短文作答，说明新闻报道与他那天的讲话存在出入。他说，那天他先说了在文艺作品中，工农兵应该取得主角的地位，"在整个文艺创作里讲"，专门描写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作品，不应该占有太多的分量，以人口比例计，不应该超过百分之十；其次才说，"在一般作品里，也不一定是专写工农兵的；城市小市民、知识分子等等也出现的。但问题在于着重在哪儿——也就是说，应该谁做主角呢？应该是工农兵，而不是小资产阶级"。他声明："这意见其实并不是我自己的，而是周副主席（恩来）在文代大会上发言的传达。"

误解似乎已经澄清，然而，"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问题触到了上海文艺工作者最敏感的神经，《文汇报》干脆把这场争论继续下去。从8月27日至9月17日，先后发表了十几篇文章，此后据说"由于别的任务占去了篇幅"，未作任何结论便戛然而止。然而，这场讨论不但"引起全国文艺界的注意"，也惊动了上层。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何其芳写了《一个文艺创作问题的争论》的长文，发表在《文艺报》上，为这次争论作了"结论"。11月26日、29日，《文汇报》加按语转发何文。事情并未了结。在1952年的文艺整风运动中，冼群、史东山、当时负责编辑《磁力》专栏的唐弢等人又做了检讨。丁玲、黄钢等人再次提出批评。"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争论，成了上海文艺界对抗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罪证。

可不可以写以小资产阶级为主角的文艺作品，有两种意见。多数人认为可以写，只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就行。如上所述，陈白尘先生就认为可以写，但数量不能太多。冼群认为，毛泽东说过，"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着工农兵，第二才是为着小资产阶级"；

对知识分子的研究与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面,那是应该的”。据此,他说,“文艺工作者今后服务的对象,主要的应该是工农兵,但是这并不就是说完全不应该或不能够也为了小资产阶级(虽然是次要的)”,“不是可不可以或应不应该写小资产阶级的问题,是要求我们(写的人)不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而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去研究,去描写的问题”。如果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任何题材都可以写,“可以写反动派,也可以写四大家族,也可以写帝国主义”。他又声明说,“可以写小资产阶级,这并不等于说,鼓励大家只写小资产阶级,或是拿写他们作为我们的主要任务”①。

黎嘉赞同冼群的观点。他说,陈白尘先生抗战时写的《魔窟》以汉奸为主角,《升官图》以国民党高级官僚为主角,难道可以否认它们是进步的作品吗?解放后的城市仍有大批小资产阶级,他们急需要教育,需要健康的精神食粮,“难道我们的文艺可以完全不顾他们吗?”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为小资产阶级看的文艺,或描写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把握无产阶级的观点而创作的,这样的文艺就必然是教育小资产阶级进步的,改造他们的思想感情和生活的”②。仿佛附和他的观点,认为小资产阶级的进步有一个过程。“在这个时候,‘为小资产阶级’的文学,也还有它一定的社会意义,若果横扫一切非工农兵为主角的文艺,痛快固然痛快,恐怕对于革命也不见得是有益的吧!”③

张毕来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证了文艺作品的主角与配角问题。他说,历史上的压迫阶级总把自己作为文学的主角,而把被

① 《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问题》,《文汇报》,1949年8月27日。
② 《我对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一点意见》,《文汇报》,1954年9月3日。
③ 《补充的意见》,《文汇报》,1949年9月10日。

压迫阶级只是附带到他们的作品里,使被压迫的工农成为文学作品中的丑角。"现在轮到我们了,我们写工农阶级,而把其他阶级当配角。"但是,张毕来赞同写小资产阶级。他引用了艾青《诗论》中的一段话:"问题不在你写什么,而在你怎样写。"写什么是题材问题,怎样写才是作者的立场、态度问题。他主张无产阶级要多写,肯定地写;小资产阶级,要少写,批判地写;大资产阶级,更少写,否定地写,"在这样的原则之下,主人翁与配角一定属谁的问题是不存在的"。他以人们对于各阶级了解的多少来论证多写与少写的必要性,"因为新的,是正在形成中的东西,很多人还不很了解,为了加强他们的了解,坚定他们的信心,使他们加倍努力,必须多写。旧的,是长年久月的存在,大家早已了解,更加上国民党露骨而精彩的表演,比起新的来,较多为人民所熟悉",所以要少写[①]。

何若非赞同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观点,但他认为张毕来的观点太机械了。"问题不在于一个作家有意地去多写什么阶级与少写什么阶级,也不在应把什么阶级作主角,什么阶级当配角,更不在于什么阶级可以写,什么阶级不可以写,因为这一切,一个立场站稳、观点正确的作家,他自己会决定取舍的,问题就在如何使作家立场站稳、观点正确,从而进一步要求作家通过何种适当的能为人民大众所接受所爱好的形式来表现人民的革命现实的内容。"[②]

显然,多数人赞同可以写小资产阶级,并且一致认为前提是有正确的立场与观点。但他们的意见仍有重大差别,即有人认为可以写小资产阶级,但以小资产阶级为主角的文艺作品应当是少数,文艺作品的主体或多数应以工农兵为主角;有的人则认为,只要立场、观点正确,写什么题材都可以,不需要作特别的规定。

① 《应不应该写小资产阶级呢?》,《文汇报》,1949年9月5日。
② 《也谈"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问题》,《文汇报》,1949年9月13日。

少数人如乔桑、左明坚决反对文艺作品以小资产阶级为主角，即反对作家创作任何以小资产阶级或非工农兵为主角的文艺作品。乔桑从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特点与地位出发，坚持"作家们如果愿意忠实于现实，或者说愿意更集中地表现现实，无论怎样，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人物，只能出现于以工农兵为主角的作品里"。他甚至不赞成冼群把以描写1947年北平学生运动为主题的《民主青年进行曲》说成是以小资产阶级为主角的作品，否则就等于说领导学运的共产党员也是小资产阶级[①]。左明的观点是："在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作品中是可以有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出现的，而且他们都应该占有其应有的位置。可是，要把小资产阶级作为作品中的主角是绝对不可以的，纵然是在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变为主题的故事里也无例外。道理很简单，不仅我们的文艺写作要为工农兵服务，所有一切的一切也都是要为工农兵服务。""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变，便不应该以写小资产阶级，写他们的生活、意识、思想、情感为主，必须着重写出工农兵的生活、意识、思想、情感。着重写出如何在这些具体的教育之下改造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主角，自然不是单纯的小资产阶级，他必然是一个由小资产阶级转变过来的工农兵，或已经丢掉小资产阶级立场向工农兵靠拢中的革命的知识分子了。这与以小资产阶级为主角是迥然不同的两件事。"[②]

上海文艺界为什么在全国文代会确定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以后"公然"提出"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问题呢？冼群等认为，这是因为很多文艺工作者为这个问题所困惑，"急切寻求一个解答"。陈白尘先生承认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但他认为不应当以这

---

① 《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问题的几点意见》，《文汇报》，1949年9月3日。

② 《对"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看法》，《文汇报》，1949年9月8日

样的方式提出问题。他说，在那天的欢迎会上，在他发言之前，曾有人作过如此的传达："为工农兵，并不是只写工农兵；工农兵以外的小资产阶级还是可以写的。"陈先生说："把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问题，这样孤立地提出来，将引导到如何危险的境地？在新解放区的上海，这样断章取义地'可以描写小资产阶级'的意见，将被若干人所大大地欢迎的。冼群兄文章一开头就说：'好些朋友'就担心着'是不是还可以写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呢？'就是个最好的证明。""我不知道这些'朋友'，为什么独独担心于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是不是还可以写'？为什么就不担心于如何与工农相结合等等问题？从问题的提出，就显然潜伏着避重就轻，投机取巧的隐衷。""'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提出，我担心着会被若干人利用做写作的避难所。"①

激烈反对写小资产阶级的左明，把问题上升到思想意识、阶级意识的高度。他说："这一问题之所以被很多作者们关心而终于正式的提出，我认为是有其阶级的思想意识的根源的。这些好多作者们所以关心这一问题，正说明了他们还没有能摆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的支配，不自觉的做了旧思想意识的俘虏。""自然，在今天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们，几乎绝大多数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他还不可能在其具体的实践中克服其旧的思想意识的时候，是难免要受这种思想意识支配的。而且不问其在主观上已经有了如何要求，但在初面临一个新的时代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将有所惶惑。尤其作为一个与现实密切联系着的文艺工作者。新的社会对于他是如此陌生，便会愈感惶惑，写什么的问题，也就特别为他们所关切。他们所熟悉的是旧的社会，旧的人物，而这些，在'为工农兵服务，写工农兵'的新的文艺工作方向的要求下，是被批判了的。对于新的一切，又不熟

① 《误解以外》，《文汇报》，1949年9月3日。

悉，不能够写。既发觉自己没有什么可写，但又不甘于沉默，便只好企图从旧的里面'化腐朽为神奇'地找出些什么来写了，这样便关心起小资产阶级是不是可以写的问题。"[①] 何若非说："'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问题的本身，就浓烈地显示着这是属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所苦恼着的问题。"[②]

何其芳是当时有权对文坛一切问题作出判决的权威人物。他在上海的论争停止两个月以后作的总结，显得非常"全面"和"深刻"。他说："说这个问题就不应该提出，是不对的，因为这不能解决问题。说小资产阶级的人物虽然还可以写，但绝对不可以作为作品中的主角，是不能说服人的，因此也并不能解决问题。说小资产阶级的人物可以写，并且也可以作为作品中的主角，不过应该少写，批判地写，也还是比较表面的回答，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今天新解放区的作者所共有的这个疑问和困惑。"[③] 他认为，参加讨论的人都存在着只强调一个方面的现象，"对于这个具体问题回答得比较适当的，对于新时代的文艺新方向的根本精神却有些把握得不够；对于新时代的文艺新方向的根本精神把握得比较紧的，却又对这个具体问题回答得不大适当"[④]。第一种情况以张毕来为代表，第二种情况以乔桑、左明为代表。

何其芳首先表示，在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之下，文艺必然地要改变为以写工农兵及其干部为主，"但是，这也并不等于在全部的文艺创作中就不可以有若干篇以小资产阶级的人物或其他非工农阶级的人物为主角的作品"。他认为张毕来提出的"一个立场，三种态度"大有问题。张主张多写什么少写

---

① 《对"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看法》，《文汇报》，1949年9月8日。

② 《也谈"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问题》，《文汇报》，1949年9月13日。

③ 《一个文艺创作问题的论争》，《文汇报》，1949年11月29日。

④ 《一个文艺创作问题的论争》，《文汇报》，1949年11月29日。

什么,是根据人民了解的程度,这是对毛泽东文艺方向认识不够。何集中批判了张引用的艾青的话,说"问题不在写什么,而在你怎样写"的观点"并不完全","尤其不适合今天的状况"。

何其芳认为:"劳动人民从来就是创造世界创造历史的主人公,但过去他们处于被统治阶级的地位,过去的文艺家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不可能认识这一真理,因而主要只能描写他们自己的阶级的人物和他们比较接近的阶级的人物。现在我们是处在一个和过去根本不同的时代,中国的劳动人民团结其他民主阶层胜利地进行了翻天覆地的人民民主大革命,并已经做了新国家新社会的统治者。如果我们自己就是中国的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对于中国的劳动人民抱着火焰般的热情,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写他们呢?这不是说明了写不写他们不仅是一个题材问题,而且正是一个立场问题吗?自然,对于有些文艺家来说,也有这样的情形,主观上是热爱他们的,但不熟悉他们,因而不能写他们。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面,到底是我们投身到他们里面去熟悉他们,还是以'问题不在你写什么,而在你怎样写'为理由而只写我们所熟悉的人物呢?所以,在今天还来强调这个片面的文艺见解,正等于否定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出来的到工农兵中去的号召。"[①]

何其芳表示他也不能完全赞同乔桑和左明的观点。他肯定左明的意见"包含着真理",但"在许多地方已经有些过火了,因之就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有些说不通了"[②]。文艺创作只能择取生活中的一个侧面、一个片断。新时代的文艺,除主要反映工农兵以及干部外,"总也还是会有一些反映次要斗争、次要人物或以这为主的作品。这种作品就自然会以小资产阶级的人物或甚至其他非工

① 《一个文艺创作问题的论争》,《文汇报》,1949年11月29日。

② 《一个文艺创作问题的论争》,《文汇报》,1949年11月29日。

农阶级的人物为主角。这种作品是否写得忠实于现实,关键并不在于什么人是主角,而在于是否能够写得正确"①。

上海文艺界提出这个问题反映的思想倾向,何其芳认为左明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他说,这个问题之所以为许多作者所关心,"以至于达到困惑的程度,是反映了一定的阶级立场、阶级利益的。直到今天,中国的作者们,特别是新解放区的作者们,绝大多数都曾经是或现在还是从地主资产阶级的家庭出身的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所熟悉的一般是他们自己的阶级,他们所从出身的阶级以及和这些阶级比较接近的阶级,总之,并不是工农兵"。"许多作者的最拿手的本事并不一定就是今天的中国人民特别是工农兵及其干部所最需要的,这样就自然会发生'是不是还可以写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这样一个疑问和困惑。"这个问题是"思想性质或理论性质的问题"。"为人民服务并首先为工农兵服务这样一个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要原来在旧社会活动的广大的新旧文艺工作者都在思想上彻底地接受并在行动上认真地实践,那是一定要有一个过程的。因为这种思想上彻底地接受和行动上认真地实践本身就包含着一个阶级变化的问题,就是从非无产阶级的文艺工作者变化为无产阶级的文艺工作者的问题。"②

何其芳始终没有正面回答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问题,只是说这样的作品"会有",即客观上会存在。他把写不写工农兵归结为作家的"立场"问题,说"问题不在你写什么,而在你怎样写"的观点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相对立,这就从赞同还是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高度批判了所有对这个问题持赞同态度的人,并使他们不可能再作辩解。这就暴露出何其芳所代表的党的文艺领导企图严格限制创作题材,反对写任何以小资产阶级和非工农兵为主角的

---

① 《一个文艺创作问题的论争》,《文汇报》,1949年11月29日。

② 《一个文艺创作问题的论争》,《文汇报》,1949年11月29日。

文艺作品的真实立场。

我们无意从文艺思想的角度对这场论争做具体的评价。我们关注的仅仅是这次论争的意识形态或政治涵义。如前所述，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问题，是在全国文代会期间就提出来并为执政党的最高领导层所关注的问题。然而，会议刚刚结束，参加过文代会的代表就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并发生激烈争论，这一事实至少说明：第一，文代会并未达到认识的统一，这次争论是文代会争论的继续；第二，广大文艺工作者为这个问题所"困惑"，表明他们把是否允许他们写自己熟悉的东西视为前途、命运攸关的大事情（事实确也如此，许多30年代的著名作家新中国成立后毫无成就，即是片面强调写工农兵而提前结束了一些人的艺术生命的明证），执政党并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第三，全国文代会企图将毛泽东文艺思想意识形态化，没有经过延安整风的新区非党文艺工作者并不认为有绝对服从的义务，他们仍然保持着独立思考的习惯和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勇气。

何其芳和其他一些人认为存在并提出"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问题，是文艺工作者受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阶级立场、阶级利益支配的表现，确属"无限上纲"。其实，正如冼群后来在检讨中所说，这充其量不过是他们听到有人甚至连文艺"第二是为小资产阶级的"也要取消时产生的一种"近乎本能的反抗"[①]，谈不到阶级意识、阶级立场、阶级利益，更谈不上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直接对抗。如果说思想意识确有问题的话，就是像上海这样的新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领会的确不深，在社会发生大变化的时候，他们还按照自己的习惯思维。他们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某些片言只语所迷惑，因为他们不熟悉辩证法。他们不理解执政党的困难：不允许写知识分子和小资

① 《文艺整风粉碎了我的盲目自满》，《文汇报》，1952年2月1日。

产阶级，在理论上说不通，也显得太霸道了一些；允许写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就会迁就、放纵这批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工作者，妨碍建立毛泽东文艺思想一统文坛的地位。

何其芳的总结是把提出"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视为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挑战。他不但把问题上升到阶级意识、阶级立场、阶级利益、赞成还是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政治高度，使人们不可能再进行任何的讨论，还通过武断地肯定"绝大多数"文艺工作者仍然是需要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否定五四以来新文艺的传统，这就剥夺了以上海文艺界为代表的广大文艺工作者独立地探讨文学艺术问题并公开发表意见的资格。在人们已经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情况下，如此对待知识分子，其结果是进一步强化了知识分子自我怀疑与自我否定的心理倾向，使他们自觉地或被迫地匍匐于一种理论的权威之下，这固然有利于推进他们的思想改造，却动摇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存在与活动的心理基础。这种同样广泛发生于教育界、科技界和其他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领域的情况，无疑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2.4 捍卫文艺独立：阿垅的《论倾向性》与对阿垅的批判

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革命党在革命时期为完成一定的革命任务而提出的文艺理论或政策原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因此，它从政治角度对文艺基本问题的论述是十分精辟的。遗憾的是，甚至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文艺界领导人就对毛泽东关于"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等观点作了近于庸俗化的解释，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开始发生偏差。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把文艺为政治服务具体化为"写政策"、"赶任务"，即要求文艺创作配合具体的、临时的工作，用文艺作品宣传和解释党的政策。有些党的机关、领导干部甚至在一个运动、一项工作还没有展开之前，就

要求写出宣传它们的文艺作品。

“赶任务”、“写政策”的做法，受到了一部分文艺工作者的怀疑和反对。他们认为，“赶”出来的作品，多是概念化、公式化、形式主义、标语口号式、千篇一律、粗制滥造、没有丝毫艺术性可言的东西，它们既没有很大的教育作用，更没有艺术的生命力。他们希望党注意文艺的特点，给文艺工作者以创作自由的空间。文艺界的重要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担任全国文联党组书记的邵荃麟承认：“文艺服从政治，这个基本原则今天一般没有人怀疑了，但是在这个原则的实践中间，我们碰到一个具体的问题，即是文艺创作如何与政策相结合……目前有些作家常常为这个问题所苦恼着，有些作家因为在作品中所反映的政策观点犯了错误而被批判了，有些作家则甚至对这个问题还有根本的怀疑。”①

文艺工作者的怀疑和反对，长期的反复的争论，丝毫没有动摇领导层的思想。他们甚至公开表示，为了配合具体的政治任务，宁可牺牲作品的艺术性。林默涵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期间发表文章说：“文学是一种战斗的武器，因此不管什么形式，只要能够用来作战，有益于当前斗争的胜利，就都可以采用，应该采用，倒不必管它是否能‘传之千古’。”“我们不赞成那种‘作品传之千古’的想法，以为不写则已，写出来就必须是杰作，念念不忘于所谓艺术的永久性，却不肯为当前的迫切的斗争，尽我们一份所能尽的力。这实际上也是从自己个人出发的思想。”“现实斗争的发展是太快了，各种条件都不容许我们去细磨细琢地创造‘传之千古’的伟大杰作。现在更需要的，是能够迅速反映这个现实斗争，推动这个现实斗争的作品，是能够解决目前的问题的作品。正象解放区的某一村子，有了问题，不能解决，就演它一个剧。这是真正的群众的功利主

① 《论文艺创作与政策和任务相结合》，《文艺报》，第3卷第1期。

义。"[1] 茅盾在1950年1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如何能使一篇作品完成政治任务而又有高度的艺术性,这是所有的写作者注意追求的问题。如果追求到了,就能产生伟大的作品。如果两者不能得兼,那么,与其牺牲了政治任务,毋宁在艺术性上差一些。"他也承认:"严格而言,这句话是不太科学的。今天暂不讨论这句话所能引起的若干问题,今天单说:'赶任务'是否必要呢?为了'赶任务',作者不得不写他自己认为自己不成熟的东西,是否值得呢?我以为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我们不但应当不以'赶任务'为苦,而且要引以为光荣。因为既然有任务要交给我们去赶,就表示了我们文艺工作者对于革命事业有用,对服务人民有所长,难道这还不光荣么?我相信我们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不会发生错误观念,以为'赶任务'是损害了文艺的什么尊严的。"[2]

不能写自己熟悉的题材,只能写工农兵;不能写典型化的人和事,只能写真人真事;不能追求艺术性,要"写政策"、"赶任务",这样一些要求使得广大文艺工作者极端苦恼和惶惑。当时的天津亦是文化重镇,聚集了一大批曾长期在国统区工作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市文化局局长阿英又是一个相当"开明"的人物,对这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百般迁就,因此天津文艺界的"思想混乱"似乎也就更加严重。1950年年初,天津文艺界在阿垅(原名陈守梅,笔名陈亦门、张怀瑞等)、鲁藜等人主持下,曾多次召开创作漫谈会,许多文艺工作者倾诉了他们的苦恼和惶惑。很明显,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是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了片面的理解,使得文艺工作者无所措手足。在这样的背景下,阿垅在1950年2月1日出刊的天津《文艺学习》第1卷第1期发表了《论倾向性》的文章,由此引发了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的一桩公案。

---

① 《为今天而写》,《文汇报》,1949年7月8日。

② 《目前创作上的一些问题》,《文艺报》,第1卷第9期。

阿垅的文章约1万字。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他至少引用了40段以上的革命导师与名人语录（这是50年代流行的最恶劣的文风之一）。表面看来，文章的前半部分重点批判“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后半部分主要批判形式主义、公式主义、教条主义，但是，综观全篇，文章的锋芒所向，却是对着片面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否定文艺作品的艺术性，因而实质上是根本取消文学艺术的观点。

阿垅认为，艺术与政治是一元的。他以苏联著名作家西蒙诺夫1949年10月17日在上海的一次讲话中提出的观点立论，说“艺术和政治，不是‘两种不同的原素’，而是一个同一的东西；不是‘结合的’，而是统一的；不是艺术加政治，而是艺术即政治”，因为作家生活在现实社会中，是“社会人”，他对政治、经济、道德、艺术等自然有一定的看法，并反映在他的作品中。所以，“在文学上，无论那是意识的，或者不意识的，进步的和反动的，以至为艺术而艺术的，无可逃避也无可争辩的事情是，那里面，总是有着一定的政治倾向或者思想倾向的”。既然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没有倾向性即政治性思想性的艺术，所以，也就可以说“艺术即政治”。他以此来批判和否定“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照他的观点推论下去，既然“艺术即政治”，那么就不用担心艺术会脱离政治，也就无需刻意强调艺术与政治相结合或艺术为政治服务了。

在论述了“艺术即政治”的观点之后，他针对当时十分猖獗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和创作中的概念化，提出了“没有艺术也就没有政治”的观点。他引用了列宁、毛泽东、倍林斯基的一些话论证他的观点，譬如“我们远不想宣传一种什么单调的制度或者用几个决议案来解决任务。不，在这个领域内公式主义是最说不上的”（列宁）。“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们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列主义”，“因此我们既反对内容有害的艺术作品，也反对只讲内容不讲形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缺乏艺

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毛泽东）“艺术首先应当是艺术，然后它才可能是某一时代和社会底精神和方向底反映。”“美是艺术底必要的条件，没有美，就不会有、也不能够有任何艺术。这是一条公理。”（倍林斯基）

阿垅认为，艺术是政治的一种形式，“否定了作为政治底形式之一的艺术，也就否定了政治本身——已经失去了影子的人，他底存在是很困难的”。“在艺术问题上，如果没有艺术，也就谈不到政治。”公式主义、教条主义从概念出发，自以为政治很多，其实根本没有政治，因为根本没有艺术作为政治的表现形式。“公式主义、教条主义，总是一套公式的艺术形式，总是一堆教条的艺术内容，那是没有什么思想性的。政治概念既不等于政治内容，也不等于思想性。”他尖刻地说：“如果我们要读哲学和政论，那我们是会直截了当地去找哲学或政论来读的，用不到兜一个圈子从文学作品去读它们。”他反对从概念出发进行文艺创作，因为作品的思想性必须通过艺术形象表现出来。“一种概念，包括政治概念，和活生生的现实，以及活生生的人，又是有着一种一定的距离的。概念，如果那不是和现实互相排斥的，不是对于人完全虚伪的，到底，从艺术到政治，那也是毫无力量的，没有效果的。艺术，首先的条件是真；这个概念，却不是真，既不是思想的真，就没有艺术的真，也不是政治的真。”“‘赤裸裸的倾向性’，原来，在一般的场合，总是那种‘歪曲’、虚伪或者空洞而已。”

多少年来，研究文学史、政治思想史、共和国史的学者们，虽然都同情他后来的不幸遭遇，但大多不赞成阿垅这篇文章的基本倾向，特别是“艺术即政治”的观点。一位著名作家前几年说，阿垅的文学理论，“既有认识上的局限，也有材料上的局限”。的确，如果不考虑阿垅撰写和发表《论倾向性》的特定历史背景，可以说他的“艺术即政治”、“没有艺术就没有政治”的观点，不大符合马克思主义。然而，阿垅的文章是有感而发，是一篇有鲜明的针对性的论战

文章。林默涵、茅盾们说：文艺不能脱离政治，文艺工作者不能为艺术而艺术，要为现实政治服务；阿垅说：艺术即政治，有艺术就有政治。林默涵、茅盾们说：为了服务于政治，文艺作品可以牺牲一些艺术性；阿垅说：不，没有艺术就没有政治！林默涵、茅盾们说，文艺必须写“政策”，文艺创作可以从概念出发；阿垅说，概念不是“真”，既不是政治的真，也不是艺术的真，从那里产生不出艺术品。双方尖锐对立，不可调和。所以，阿垅的文章，没有所谓的“局限性”。它是在片面强调文艺为现实政治服务、把文艺创作混同于政策宣传因面最终必然导致毁灭文艺的社会氛围中，捍卫文学艺术的独立价值和文艺创作自由的战斗，是对“左”的文艺指导思想和“左”的文艺工作方针的公开挑战。

文艺界领导层的感觉十分敏锐。他们迅速地察觉了阿垅文章的真实含义，并感觉到了它的威胁。1950 年 3 月 12 日，当时任教于马列学院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陈涌（即杨思仲）在《人民日报》发表《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评阿垅的〈论倾向性〉》一文，对阿垅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当然不是陈涌的个人行为，而是“党报”或党的动作。陈涌运用论战技巧中的“归谬法”，极力歪曲阿垅的观点。他说，“艺术即政治”是“纯粹唯心论的观点”，它“无异于告诉我们一切作者说：不论什么人，不论什么作品，只要把艺术搞好便够了，好的艺术便自然是好的政治了，面一切要想更好的学习政治，更好的服务于政治的企图，都是多余的了，都是只能产生‘公式主义’的了。因为‘艺术即政治’啊”！陈涌断章取义，歪曲阿垅关于文艺作品不能从概念出发的观点，说阿垅认为“一切概念”都是“和现实互相排斥的”、“完全虚伪的”，说他对那些还不能很好地做到政治与艺术统一、艺术性还比较粗糙的作品，“一切都在一个所谓‘形式主义’的名目下加以压杀”。陈涌的结论是：

总的一句话说来，阿垅这篇名为《论倾向性》的论文，形式

> 上是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和形式主义，但事实上，却同时也是反对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它以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始，以反对艺术积极地为政治服务终。事实上，在阶级斗争一向都异常尖锐的中国，并不是培植为艺术而艺术理论的最好的环境，完整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体系（假如有的话），是拖守不住的了，而且一个多少有点革命要求的作家，他也要求某种程度即使是颇为朦胧灰色的战斗，但又不愿意（至少今天还未认识到）把自己的艺术更多地靠近群众的政治，他还希望保留自己一撮残缺不全的“艺术王国”的国土。于是他便起来抵抗马列主义关于文艺的党性的思想。不管阿垅曾经怎样大量地引用过马列主义的词句，又不管阿垅自己明确地意识到与否，我以为他的理论的实质便是如此。

这样，如同何其芳对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争论的总结一样，陈涌也把这种文艺思想上的纷争上升到了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这在50年代的环境中，无异于死刑的宣判。

在这同时，阿垅还以“张怀瑞”的笔名在上海《起点》杂志第2期发表了《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文章，因为引文不准确受到严厉批评。1950年3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史笃的文章《反对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说阿垅的文章是“假马列主义”在市场上“鱼目混珠”；“不管作者的主观意图如何，这篇文章堆满了马列主义词句，而实际是完全违反马列主义的文艺思想的”；阿垅的引文以及所作的解释，“是对马列主义最大的歪曲和玷污”。

阿垅作了公开的自我批评，但他只承认《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在引文方面的过失，并把问题上升到“这已经不是一个思想问

题或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不可饶恕和不可解释的政治问题了!"①周扬曾亲自出面,"启发"阿垅承认错误,但阿垅始终坚持《论倾向性》中的文艺观点,拒绝作任何的检讨。他写了一个很长的答辩文章。当然,《人民日报》不会发表他的文章。

阿垅是胡风的朋友,有人便认为阿垅之所以受到批判,主要是他与胡风的关系;周扬等人企图以批判阿垅为突破口,对胡风一派及其文艺思想进行清算。这样的因素当然是有的。但是,主要的出发点和意义,还是对"非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进行斗争,捍卫党的文艺工作指导思想与方针,因为阿垅文章中的某些观点,甚至其基本精神,来自于胡风,或者同胡风的文艺思想相吻合,而与占统治地位的文艺思想相冲突。以行为主体而言,对阿垅的批判是由中央党报直接进行的,"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讨论则由《文艺报》、《文汇报》发表何其芳的文章了事。处理方式之所以如此不同,就在于,前者确是对党的文艺思想与指导方针的自觉的公开挑战,后者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本能的反抗"。

阿垅敢于写出《论倾向性》这样的文章,并在受"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牵连被关押的12年间至死坚持他的信念,显示了知识分子捍卫文学艺术的独立价值与创作自由(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独立存在的价值与自由)的勇气。对阿垅的只许承认错误、不许申辩的批判,则第一次显示了上纲上线、蛮不讲理的大批判的粗暴。这一类现象使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在以行政权力为后盾与依托的意识形态管理体制下,一切偏离占统治地位的理论与思想的言行,都会招致巨大的舆论与政治压力;新中国建立了,"开口是银,沉默是金"的古训也还没有过时。

① 《我的自我批评》,《人民日报》,1950年3月21日。

2.5 抵制"左"的文艺批评:关于《红旗歌》的讨论

批判阿垅,被看做新中国成立后文艺批评的一个"好的开端"。此后,以《文艺报》为主要代表的"左"的文艺批评在全国泛滥开来。仅发生在1950年、1951年的就有:《人民日报》对方纪的《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罢》的批评,对王震之《内蒙古春光》的批评;《文艺报》对小说《金锁》的批评,对歌剧《石榴裙》的批评,对朱定的诗《我的儿子》的批评,对碧野的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的批评,对王亚平的诗《愤怒的火箭》的批评,对卞之琳的长诗《天安门四重奏》的批评,对歌颂毛泽东的几首歌曲的批评,对沙鸥的讽刺小说《驴大夫》的批评,对胡考的漫画《美国纸老虎与战争贩子杜鲁门、麦克阿瑟、艾奇逊》的批评;《大众日报》对隋问樵的《赵同志》的批评;重庆《新华日报》对卢耀武的《界限》的批评;西安《群众日报》对胡杨的《三七二一号羊毛车》的批评;等等。这样的批评还可以举出许多许多。这些作品并不是没有缺点甚至是严重的缺点,对它们的批评也不是全无道理,然而,这些批评大多是粗暴的、教条主义的、过火的。其中,发生比较早、影响比较大的,是对话剧《红旗歌》的批评。这次批评,受到了许多文艺工作者的抵制。

《红旗歌》是军队青年作家鲁勒在1948年冬天创作的一部反映工厂工人生活的四幕话剧。它以解放后的石家庄为背景,反映了某纺织厂在实行管理民主化和开展劳动竞赛中一个落后女工马芬姐的转变过程。这是第一部以反映工厂和工人生活为题材的戏剧作品,新中国成立后在京、津、沪、宁、渝、兰等大城市上演,在上海曾演出148场,在南京创造了话剧卖座的历史最高纪录。但是,对这部受到群众普遍欢迎的作品,文艺界的评论,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比较早的批评文章是来自延安的著名女作家陈学昭发表在

1949年8月14日《光明日报》上的《马芬姐的现实性》。她承认这部剧作反映了新的主题，“特别值得重视”，但认为它没有“恰当圆满”地回答马芬姐的落后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她的思想转变过程是怎样实现的。剧作者说马芬姐的性格，是“一个被旧世界的剥削、压榨、凌辱所歪曲了的性格，一个痛苦、孤癖、倔强，甚至有些无赖的性格”。陈学昭表示，她非常怀疑马芬姐这个人物的“现实性”。她说：“在我看来，剧中所表现的马芬姐的思想、情感不是一个典型的工人阶级的思想、情感，即便是一个落后的女工思想、情感也不是那样的。”8月26日，史行发表《看了〈红旗歌〉以后》，却给以高度评价，说这部戏有“丰富的思想性和积极性”，“的确是一个有了相当水平的作品，我们应该向《红旗歌》学习”[1]。后来，这部戏在全国各地继续演出，影响越来越大，评论文章逐渐增多，分歧仍然严重存在，但多数评论持肯定的态度。

1950年2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第1卷第11期发表3篇评论文章，使对《红旗歌》的批评陡然升温。这3篇文章，一篇持充分肯定的态度，两篇持基本否定的态度。

署名“黎阳”的文章《评〈红旗歌〉》持肯定态度。黎阳认为，《红旗歌》“是一部有相当成就的描写工人底戏剧，它体现了工人阶级可爱的性格，而且在艺术上，是提升了作品中明朗、流畅、热烈的，新社会的乐观主义的情愫和品质；作者在现实的基础上把这种可爱的性格发挥了”。作品有一些缺点，“但这些缺点不能不说是由于我国工人文艺刚在发展中的缘故”。

署名“蔡天心”的文章《〈红旗歌〉的主题思想》倾向于否定。蔡认为，“这个剧作在写作的技巧上是相当成功的，特别是语言的刻画人物方面，活泼，新鲜，给人以十分生动的印象”，但是，主角“不止于作者所介绍的那样有些无赖的性格，而是一个具有流氓无产

---

① 《光明日报》，1949年8月26日。

阶级意识的女工,不讲原则,不讲道理,邪气十足,狂妄而且骄傲","表现出沾染着很浓厚的剥削的思想意识","不仅对于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毫无认识",对政府和党委派的人员也毫不尊重与服从。因此,她不具备工人阶级的应有品质。作品在工厂管理民主化的问题上,"表现出一种小资产阶级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违反了无产阶级民主集中的原则"。在工人的团结问题上,"是非常无原则的"。

最有影响的是《文艺报》主编之一萧殷的文章《评〈红旗歌〉及其创作方法》。萧肯定这部剧给观众带来新的题材、新的结构形式,"很富有独创性,有很多新鲜的气息","有文学的魅力"。但他认为,解放以后,马芬姐这样"顽固"、"落后"的人物是不可能存在的。"解放后工人与工厂的关系已根本改变了,工人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也更正常了;再加上解放初期工人群众的诉苦运动,工人对共产党、解放军以及工厂当局会毫无认识吗?会一点阶级觉悟都没有吗?这是不合乎一般情况,也不合乎一般规律的。""在旧社会里被压迫得深重的工人,只可能产生两种看法,一是以为这是命里注定,抱着沉默忍受下去的态度,一种是受不住这种压迫,勇敢的起来反抗。像马芬姐这样的人,应该属于后者",而在作品中,马是一点工人气质也没有的。她的"倔强"和"有骨气"的性格,应该用来对待工作中的困难和敌人,"但是《红旗歌》中所表现的,都是以'顽强'来对待自己阶级的党,对待自己的工厂,对待自己的同志。这样的性格值得歌颂么?作者对于这种性格,不但很少批判,反而无原则地表示同情"。"试想一下吧,在一个工人阶级政党领导下的工厂,而这工厂又正开展红旗竞赛运动,工厂里的工人大多数已经有了阶级自觉,这样新的环境难道是培育敌对的'顽强'的'有骨气'的性格的土壤吗?在这样工厂与工人利益完全一致的环境中,难道有培育敌对性格的条件与可能吗?""作者采取这样态度来处理马芬姐这个人物,并不是偶然的,这恰好反映了作者对这'倔强"

的“有骨气”的性格的无原则的偏爱，也充分反映了作者的小资产阶级的看问题的方法。”这是“形式主义追求性格的创作方法”，“这种创作方法是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在创作上的表现”。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创刊的《文艺报》，名义上是隶属于全国文协、以“指导文艺思想”为专任的最高文艺批评刊物。在文艺工作者眼中，它是代表党来领导文艺的。萧殷和蔡天心否认新中国有马芬姐一类人物存在的社会条件，否定马芬姐这个人物的真实性，就使《红旗歌》的主题不能成立。他们的批评不但表现了严重的庸俗唯物论的倾向，而且超出了文艺批评的正常范围，把作品的“缺点”上升到“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与思想作风的高度，因而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与不满。

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对《红旗歌》展开了讨论。3、4月间，上海文艺界召开专题讨论会，著名文艺界人士靳以、顾仲彝、牧野、李洛等人一致表示不赞同萧殷等人的观点，而给予《红旗歌》以极高的评价。他们认为，由于反动统治的长期影响，由于新社会还刚刚诞生，马芬姐这样的落后工人的存在，不是没有它的社会条件的，“在全国，尤其是在上海，这种芬姐型的落后工人，仍然可以看到”。《文艺报》的作者说马芬姐的性格没有社会基础，《红旗歌》的主题缺少思想基础，是“只从问题的一面出发，形式主义的要求人物必须具备某种社会条件”。《红旗歌》在典型创造上比较成功，“是较一般公式化的戏剧为出色、为突出的、较有成绩的”①。这样的观点是一般文艺工作者共同的观点。

1950年5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第2卷第4期发表了周扬的文章《论〈红旗歌〉》。这是他4月22日在全国文联文艺批评组座谈会上的发言。周扬充分肯定了《红旗歌》的主题和创作上的成就，批评了萧殷等人的观点。他指出，马芬姐这个人物的落后思想

① 《〈红旗歌〉座谈会》，《文汇报》，1950年4月5日。

心理是有它的社会根源的，有“一定的代表性”。萧殷认为“在旧社会被压迫得深重的工人”，“应该很容易接受新社会的思想，很容易理解新社会与旧社会在本质上的不同”，怀疑解放半年后还有马芬姐这样的人物存在。周扬说：“‘应该’是一回事，‘可能’又是一回事。在解放不过半年，工人的政治觉悟还没有可能普遍提高，物质福利还没有可能根本改善的情况下，工人中有象马芬姐这样‘顽固’‘落后’的思想是完全可能的，现实的，不奇怪的。即在今天也是如此。”“认识与适应新社会，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对于旧社会所遗留给人民的坏习惯、坏思想，我们必须有足够的估计，用长期教育的工作去改变它们。”蔡天心认为作者对于马芬姐的团结是无原则的。周扬批评他说，这是“以我们所要求于一个共产党员的组织性纪律性来要求一个落后工人，因而对她作出无情的判决”。周扬的文章，为这场争论作了总结，并为人们所接受。

围绕《红旗歌》发生的争论说明：第一，在“左”的文艺思想影响下，以庸俗唯物论为武器，从固定的概念、公式、教条出发评判文艺作品的粗暴批评之风正在形成。在文艺创作中，工人形象怎样写，农民形象怎样写，知识分子形象怎样写，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凡是违反这些模式的，就有可能受到严厉的批判。批评家们认定任何作品都是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阶级意识、阶级立场、思想作风的反映，因此习惯于把对作品的文艺批评和对作者的政治与思想批判混杂在一起，形成了非常不利于文艺发展的环境。第二，广大文艺工作者对“左”的批评是不满意的，他们并没有惧于《文艺报》的权威地位而沉默，这时的文艺界知识分子还是敢说话的。第三，周扬批评萧殷等人，支持了《红旗歌》，也支持了多数文艺工作者的观点，首先是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因为《红旗歌》毕竟是第一部写工人的戏剧，并受到广泛欢迎。联系到此后不久胡乔木对一些人在“文艺事业上表现出不能容忍的潦草态度”、“满足于创作粗制滥造的生产品”和文艺落后于社会变革步伐

的批评，陈伯达对戏曲界反历史主义的、公式主义的创作倾向的批评，以及这一时期《人民日报》发表的若干贯穿着相同精神的文章，说明这时的文艺领导层对“左”的偏向有所警惕，对明显偏激的、引起广大文艺工作者反感和反对的一些做法，还是有所控制的。

2.6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社会转换期的学术与自然科学

在向新社会过渡和转折的时期，以大学为主要集中地的中国学术界，相对于一开始就充满了表面化的斗争与风浪的文艺界相比，要平静得多。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明确和正确地确定了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传统学术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比起他的文艺思想来说，这个原则更容易为学术界所接受。但是，其间也不是没有偏差和波折。

批判旧学术，建设新学术，是共产党进城后就提出来的问题。在纪念五四运动 30 周年之际，新中国意识形态的最高领导者之一、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毛泽东秘书的陈伯达就忠告知识分子说：“知识分子们必须根据百年来——特别是三十年来中国人民革命的实际经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观点、新方法，用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新观点、新方法，在一切学术部门（不论是哲学的、经济的、政治的、历史的、文艺的以及各种自然的）去对自己来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进行批判与自我批判。”[①] 9 月 23 日，他以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首席代表的身份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提出了“思想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他说：

> 中国人民大革命的胜利，引起了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大革

① 转引自雷洁琼：《论教育工作者思想改造》，《新建设》，第 1 卷第 3 期。

命。在文化思想领域内，同样地需要一个大革命……人们知道旧的反人民的观点在人民大革命的冲击之下已经站不住脚，需要有新的人民的观点，重新审查自己的思想，重新考察中国，考察世界，考察现在和将来，以便决定自己应处的地位，决定自己需要怎样来重新工作。……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认为我们同样地必须在这一个人民大革命中重新学习，进行自己的思想大革命，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抛弃各种错误的东西，接受正确的东西，同时联合自然科学界和文艺界，贡献我们的全部能力，来帮助全国人民和全国学术界进行这个思想大革命，贯彻这个思想大革命。……

毛泽东同志和在他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已给我们中国社会科学的工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我们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指导的方向，来从事开垦中国许许多多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所还未开垦的处女地。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人民革命过程中，对于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摧毁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他反动派的思想阵地，是做过不少工作的；但是，应当指出：如果比起其他革命战线来，我们显然是太惭愧了。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仍然大大落后于革命的实际与人民的需要。我们觉得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来填补这个重大的缺点①。

陈伯达的讲话，是党对学术界的要求。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陈伯达虽然提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口号，对于旧中国的学术和学术工作者却并未作过分的否定与指责，甚至肯定社会科学工作者做过“不少工作”。此前不久，郭沫若在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发起人会议上致开幕词，却是否定中国曾有过真正的社会科学的。他说，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没有可能建立真正

① 《红旗从这里升起》，第387、388页。

的社会科学。对于过去的学术，只是"某些朋友也曾收获到了某些部分的首先是某些材料的接触上的可贵的成就"。三大敌人的遗毒很深，"我们还不能不进行尖锐的思想斗争，来肃清旧时代的遗毒，抵抗一切可能有的阴谋诡计，彻底消灭一切可能有的无形的敌人"①。这样的观点，不免有大抓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味道。比起陈伯达来，身为旧中国学术界主要领袖之一的郭沫若先生似乎更加激进一些。

学术是知识分子的立身之本。新中国建立后应如何对待已有的学术，自然要引起知识分子的特别重视。上海解放不到一个月，1949 年 6 月 21 日的《文汇报》便开辟了《学术界》专栏，热烈讨论了如何批判旧学术、建设新学术的问题。首篇发表的文章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平心先生的《为人民和反人民的学术思想》。李平心指出："一切学术思想脱离不了社会斗争与政治斗争，是不容怀疑的事实。"在新旧社会更替的时候，学者们有必要对自己的学术是为人民的还是反人民的进行认真的清理和检讨。他还提出 20 条标准，供作参考。全国教育工作代表会议筹备会议期间，北大教授张志让、中央大学教授张士一提出要"整理旧学问"。他们认为，"我国古时传下来的，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搬来的，统统是旧的，都要用新观点加以批判"。张士一说，整理旧学问，"就是要用新的观点、新的立场，新的方法去整理，批判地取舍，以求切实有用"②。张志让强调："我们对于旧知识的态度是应该仍旧加以珍视，必须予以利用，而旧日学者更不宜妄自菲薄，而必须将它贡献出来。而另一方面，它们却亦必须加以整理批判、改造"③。有人认为，旧中国的学者很少能够接触马列主义，因此"自己对中国学术的看法或

① 《光明日报》，1949 年 7 月 15 日。

② 《光明日报》，1949 年 7 月 27 日。

③ 《探求新知批判利用旧学与大学教育前途》，《新建设》，第 1 卷第 1 期。

研究出的成果，就不免或多或少的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甚至买办阶级的观点。现在要用马列主义来接受中国学术遗产，那就必须把这些观点毫无保留的、毫不爱惜的、彻头彻尾的扫除干净，必须这样，才能够从头学起，重新建立自己的看法"[①]。在激烈主张批判旧学术的同时，也有学者提醒人们不要一概否定旧学术，要注意文化与学术的传承。如张志让就提出要重视大学里面的学术。他说，旧大学是旧学问"集中表现的场所"，对"大学学者的知识应该加以重视，当作是一种值得批判利用的可贵遗产。这一点不仅应为政府和社会所注意，而尤其应为大学学者自己所知道"[②]。他认为，能否批判地继承和利用旧学术，关系着大学的存亡。

在这个旧邦新命、天地翻覆的时刻，一些著名学者的学术思想变化之快，十分惊人。1950 年 1 月 3 日的《文汇报》报道说，刚刚辞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和哲学系主任职务的冯友兰先生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愿生活在新社会里，而不愿寄居在新社会里。愿作一个人民，而不愿作一个遗民。"他承认自己"过去治学是一种形而上的方法，是与实践脱节的。有些著作(不止是抗战时期的贞元诸书)又跌入旧民族主义的泥坑，还有些恶劣的复古倾向"，这是"代表着死去了的时代"。他说他已经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并根据马克思主义重写《中国哲学史》。他在同年 1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年学习的总结》中承认："我以前讲的新理学，可以说是中国旧哲学的回光返照。""其社会影响是与革命有阻碍的。"自己"著书立说"，"不仅只妨碍了自己的进步，也妨碍了有些别人的进步"。冯先生的表态，无异于向学术界扔了一颗重磅炸弹。此后不久，哲学界即发起对他的《新理学》的批判。冯先生写了《〈新理学〉底自我检讨》等 3 篇文章，检讨自己的哲学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① 孙怡：《接受中国学术遗产漫谈》，《光明日报》，1950 年 3 月 5 日。
② 《探求新知批判利用旧学与大学教育前途》，《新建设》，第 1 卷第 1 期。

30年间,冯友兰先生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在不断的自我检讨和政治批判中与时变化,最后竟成为学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典范"。此系后话。

在思想改造成为知识分子关心和关注的问题的情况下,人们很自然地把对旧学术的批判与思想改造联系起来。有人认为以批判的精神对待旧学术,也是能否真正进行思想改造的重要标志。有人认为,应当把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批判旧学术的前提,因为惟有如此,才能获得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开展思想斗争,因为"彻底否定自己过去的看法或成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不简单。想想看,自己辛辛苦苦地研究了十几年或几十年,掌握了不少的材料,撰写了不少的著作,在旧社会里有了一定的学术成绩和学术地位。现在要一下子全部推翻,重新来过,这就需要来一个自我斗争,这斗争也许是很痛苦的,也许还不是一个短时期的"①。不少人承认,学术批判同时又是思想改造,人的改造与学术改造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在政治学习运动中,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联系学术思想进行自我批判和新的研究。著名史学家赵俪生教授谈到政治学习对他的史学研究的影响。他说,白天参加政治讨论,"当夜里我回到家中一灯孤坐又搞起我自己的历史学来的时候……我的政治敏锐性在这时候一变而为学术敏锐性,它使我对自己旧日的史学著作(那都是自己当初认为非常得意的作品)看出了百孔千疮,无一当意,而觉得必须从头改写"②。赵先生还以他所擅长的北朝研究和对太平天国一些问题的认识为例,说明学习历史唯物论以后在把握社会性质方面的进步。用马克思主义清理、批判、改造旧学术的思想,似乎毫无抵抗地为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所接受。这样一种思想现象,可以看做是从政治高度认同共产

① 孙怡:《接受中国学术遗产漫谈》,《光明日报》,1950年3月5日。

② 《政治学习与学术研究》,《光明日报》,1950年3月5日。

党进而扩展到不加思索地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结果。

旧中国的学者崇尚的"为学术而学术"的观点,在政治学习运动中受到了激烈的批评。人们认为,在旧中国,无论学者们如何标榜超政治、超阶级,他们的学术客观上都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至少是为他们装饰门面的。学术不可能脱离阶级,脱离政治;学术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山东大学教授、著名文学史家陆侃如先生说:"过去我研究文学史,仅为了个人的兴趣,认为这是纯粹学术的工作……事实上任何研究工作都离不开现实的政治,'为学术而学术'的口号只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手段'而已。我们所以要确切通晓已往的文化,无非为了改造它,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所以我们应该在文学遗产中分辨出哪是'封建性的糟粕',哪是'民主性的精华'。……我决心纠正过去的错误——忽视研究工作的政治意义和忽视现代文学的错误。我决心从头学起,从头做起。"[①] 文学史的研究如此,其他学术研究领域也如此。

这样,当着新中国刚刚建立甚至在建立之中的时候,学术是有阶级性的、学术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学术必须为政治服务这样一些观点,已经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认同。用马克思主义一统学术,以马克思主义为评判一切学术是非的标准,学术为政治服务,这些观点对新中国学术发展的影响,既深且巨。这些观点,既有正确的一面,又有在社会发生根本性变革时必然如此的一面,也有机械的、片面的、把阶级斗争和政治泛化的一面。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一两年间,比较明显的偏差,集中表现在自然科学有没有阶级性、如何看待旧有的社会科学这两个问题上。

据新中国成立初期曾在中宣部自然科学处工作的著名物理学家、现任中科院院士何祚庥教授回忆说,自然科学有阶级性,是从

① 《一个文学史工作者的感想》,《文艺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一周年特刊。

苏联传来的观点。1921年布哈林写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坚持这个观点的代表作。布哈林不仅认为自然科学理论本身属于上层建筑,而且连"科学上的实验仪器,国家机器,国家机器里的房屋,大炮,算盘,图表等等,艺术中的画笔,乐器等等都属于上层建筑"。30年代,苏联科学界发生大论战,米丁教授在这场论战后写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里,也将科学列入上层建筑。斯大林在《关于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说语言不是上层建筑,没有阶级性,但他没有说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新中国成立前及新中国成立初,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某些负责人的讲话,也跟着说自然科学有阶级性,是上层建筑。如果自然科学有阶级性,那么,逻辑推理的结论,就要对自然科学采取批判和改造的方针。苏联在自然科学问题上推行过"左"的政策,在"一切学习苏联"的口号下,他们的错误自然要影响到中国。据说胡乔木在组织学习《关于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时,说过"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一类的话,"但那一时期,自然科学有阶级性的观点却几乎占主导地位"。"大约在1950至1952年,中央卫生部门有的领导同志就强烈地持有这种错误观点,当时有位同志写文章说'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产阶级医'"[①],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王斌等人宣传的这个观点,直接影响到中共中央制定的"团结中西医"的方针的贯彻,因此受到过批判。

自然科学有阶级性这一错误观点的形成,原因是混淆了自然科学本身的性质与自然科学在阶级社会中主要为哪个阶级带来利益这两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政治领导层与学术界的一部分人接受这个错误观点,也是因为没有分清这两个问题。1949年9月27日,《文汇报》发表周鸿赓的文章《论新民主主义阶段的

① 何祚庥:《胡乔木同志与自然科学研究》,《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118、120页。

自然科学》。他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的五四以后，“一般的暂时还让自然科学为资产阶级的宇宙观所统治”为依据，说“自然科学理论也包含了许多反动因素”，“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自然科学是被资产阶级所控制，因而基本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自然科学家“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帮办”。他批评自然科学家们“自命清高”，“从来也没有考虑到自然科学的革命问题”，“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一般自然科学家何曾直接与劳动者（无产阶级）有过血肉上的关系？无论自然科学家的心地是如何朴素，以为自己的贡献是为着全人类，但实际上他们所创造的，只能促进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自然科学家“大部分都是仅知自然科学某一部门的专家，由于他们视野的狭小，由于部分科学的局限性，因此当研究的范围逐渐扩大的时候，就碰见了不能以部分理论来解决的问题，因为他们跳不出他们的小圈子”，所以必然地陷入唯心论。李平心在前引《为人民的和反人民的学术思想》一文中说：“世上断没有超社会超政治的科学技术。”“为人民的和反人民的两极化现象也深刻反映在各式各样的科学学说和各个科学家的政治倾向中。”在政治学习运动中，自然科学有阶级性的观点为许多人所接受。有人开始用李森科和米丘林的理论批判摩尔根、孟德尔、魏斯曼等人的“唯心学说”[①]。有人还以旧地理学曾宣传过“地理决定论”的错误观点为由，断言“地理学也有阶级性”[②]。自然科学有阶级性的观点，为对自然科学的政治干预和对科学工作者滥施政治批判提供了理论根据；说旧中国的自然科学家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则否定了他们对在中国传播现代科学技术、因而推动了社会进步的贡献。

对五四以后从西方传入我国的社会科学，则持完全否定的态

① 《旧业务的思想根源在哪里?》，《光明日报》，1950 年 2 月 10 日。

② 见《文汇报》，1950 年 3 月 11 日。

度。它的理论根据是：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不可能出现真正的社会科学；西方的社会科学或者是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创立的，或者是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因此，新中国的社会科学，不论是政治学、经济学还是法学，都不能从过去继承什么，必须完全重新建立；旧中国过来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完全否定和放弃他们的所学，进行脱胎换骨式的学术改造。

行动最早的似乎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是旧中国最有地位的社会学系，它有潘光旦、费孝通等一批学有所成、倾向进步的著名教授，民主革命时期曾被称为"左派"中心，培养了许多具有革命思想的民主人士和干部。然而，也正因为他们比较地"进步"，一解放他们就认识到，由孔德创立的社会学早在马克思时期已受到批判，"社会学的前面加上了资产阶级的称号"，"由于社会学者在理论上所存在的这许多破绽，就规定了社会学系的落后性质，因此也必须加以改造"[①]。这时说的"改造"，即是还有可取之处，并未全面否定。费孝通也说过，旧中国的社会科学"必然带有封建和买办的性质。同时也因为中国人民对这些反动势力的斗争，革命的理论和观念必然存在于原有社会科学的范围里"[②]。然而，政治学习、土地改革，很快就推动人们把认识"提高"到了对旧的社会科学不是改造而是抛弃的激进程度。

清华大学教授雷海宗先生参加土改归来写了一篇题为《社会科学工作者与新的社会科学》的文章，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这一思想变化。他声称，无论中国的旧学还是西方来的"新学"，或染上资本主义色彩的中国哲学，都已陈旧，都需要彻底改造，并且需要改造的彻底性"远较过去任何一次为深"。他甚至说，"我们的全部所学，就是我们最大的包袱"。他认为：

① 胡庆钧：《清华社会学系的改造》，《光明日报》，1949年9月21日。

② 《当前大学种种问题》，《光明日报》，1949年7月5日。

(老干部们在土地改革中的经验总结)是每日每时每刻在创造中的新学术。至于旧的、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所传给我们的社会科学,不必说与我们国家的需要全不相干,即或就事论事,我们也必须承认那些东西本身也很大一部分是表面现象的罗列与辩解,毫不深入,不只对我们无用,连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知识分子也无甚大用处,往往甚至发生迷惑欺骗的反作用。我们中国也搞这些东西,正足证明我们过去是没有独立自主资格的半殖民地,好比奴隶俯首下心的揣摩研究主人的衣着、饮食、说话音调、走路姿态,以及主人表面一切的一举一动一样。今日我们全国已经翻身,就学术界而论,翻身后的第一个大任务就是检讨清算旧的学术,其中可能尚有一部分精华可取,但更重要的是在祖国的园地,根据祖国的经验与需要,创造新的与有丰富内容的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经过前所未有的大革命,今后中国的社会科学必将以革命中的发展及革命中的创造为基本源泉与基本内容。……今日各校社会科学的教师如仍抱残守缺,不求彻底钻进新社会,从新学习,彻底改造全部学术,亦即彻底改造自己的人格,过一个时期,新的学术必将在校园之外萌芽成长,而今日一批学人均将成为古董,与辛亥革命后,尤其五四运动后,一般清代遗老之成为古董无异[①]。

较之雷海宗教授,原中研院院士、旧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科院副院长的陶孟和先生似乎更加激进。他在一篇题为《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的文章中,论证了为什么必须彻底否定和抛弃旧的社会科学。他说:

① 《光明日报》,1951 年 4 月 4 日。

> 中国人民的伟大解放运动，剧烈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首先应该指出的，便是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过去所生活的、所习惯的那个环境正是这次解放所打倒的、所推翻的。他是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之下长大的。他或者是地主、官僚、或买办家庭出身，或者与他们的利益相结合。无论如何，他的生活的各方面，都是长久的浸润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里头的，他所攻求的学问当然也与这些主义相结合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是在旧社会里长大的，他必然带着旧社会里所加给他的包袱。……这次人民革命所打倒的、所推翻的正是传统的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东西，正是过去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所经常处理研究的对象。……自从我们经过人民解放，踏进了新民主主义以来，所有社会科学所处理研究的题目与内容……差不多全变成无意义了，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所熟悉的东西，不能继续存在而不得不抛入废纸篓了。这不能不说是今日大部分社会科学工作者所遇到的凄惨的、可怜的处境①。

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社会大变革，都会引起学术思想的巨变，这是毋庸置疑的。新中国成立后，原封不动地继承旧有的学术是不可思议的。对旧有学术，包括西方来的人文社会科学，必须批判地继承；对自然科学，则只能继承而无需批判。新中国成立前后，人们认为批判地继承的原则，适用于自然科学，适用于“国学”，而不适用人文社会科学。这里面的谬误明显可见。这些观点，不仅是领导层的观点，也是很多知识分子的观点。这反映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争得民族独立之初，知识分子急于在文化与学术方

① 《光明日报》，1951年3月29日。

面也争取“独立”的迫切愿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与社会氛围之下，这样一种为历史发展证明并非科学的态度的形成，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肯定，这种倾向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即使不占主要地位，也有相当的影响。但是，科学与学术研究的实践会很快纠正他们的错误。然而，执政党处在科学与学术研究实践之外，其政策以一定的理论为指导，这样，错误的理论与政策一旦形成，就十分牢固，不易纠正。院系调整中取消了所有大学的社会学系和社会学课程，撤销了一些政治学系和法学院，大批社会科学教研人员被迫转业，遭到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的反对；把自然科学（特别是遗传学）政治化的所作所为，也受到人们的抵制。这说明知识分子群体经历过短暂的迷误之后，迅速地恢复了对待科学与学术的科学态度。

2.7 两种学术观的交锋：关于朱光潜美学思想的争论

社会变革时期，即是社会价值观的调整时期，也是学术价值规范的调整时期，对于同一问题，总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一部分知识分子激烈地否定从西方传来的人文社会科学，也有人试图坚持批判地继承的方针。1949 年年底发生的关于朱光潜美学思想的论战，就是新中国建立后两种学术观的第一次交锋。

这场论战是《文艺报》发起的。1949 年 10 月 25 日出版的《文艺报》第 1 卷第 3 期发表署名“丁进”的读者来信，表示了对朱光潜所著《文艺心理学》介绍的“移情说”和“距离说”的赞赏。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美学家蔡仪先生在答丁进的通信中，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委婉地批评了朱光潜的美学思想。他说：“美感原是社会生活决定的，也就是它有社会性，而且是有阶级性的。反动分子不会看到《百万雄师下江南》而发生美感；你或我也不会看到反动的特务小说之类而发生美感。因此所谓美感的‘忘我境界’，也不能证明美感要驱逐对象的实际效用，社会的政治的意义。相反的，对

象的社会的政治的意义,实是基本上决定它成为我们美感对象的条件。所以毛主席在文艺问题里所指出的艺术标准服从政治标准,正是很中肯地阐明了文艺理论上的一个基本问题。"①

朱先生在1950年1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第1卷第8期撰文作答,表示不能接受蔡氏的批评,不赞成一概否定过去的学术。他首先说,他的被批判的主要美学著作《文艺心理学》与《谈美》是20年前当学生时写的介绍性著作,"我的见解大半是融会着当时流行的多数美学家公认的见解而成的。现在从马列主义的观点看,有许多地方是错误的或过偏的"。他对美学所做的工作,"大半是介绍的性质",那两本书中所说的,大体是欧洲从古希腊以来的传统的普遍的看法,诸如移情说、距离说之类,并不是他的创见。"二十年前的书有几部能免这些毛病呢?""我原来没有料到我的两本幼稚的书居然得到广大的读者群,而且使他们'染了毒'。我固然要负传毒的责任,染毒的人们也应当负缺乏批判的责任。"朱先生由此谈到应该如何对待前人的学术。他说:"一切学说思想都有它的历史环境的背景,我们读任何书,都要还它一个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环境变了,硬要墨守成规,说它完全是对的;或是执今责古,说它完全要不得,这两种态度都未免缺乏历史发展的认识和批判的精神。""治任何一种学问都应知道它的历史的发展,知道问题是怎样起来的,从前人对这问题如何思想过,如何辩论过,才可以免走一些冤枉路。批评我的人们对于这一方面未免太忽略了,这使我很怅惘。"朱先生承认他的书里可能存在一些错误,但是,他反问道:

> 承认了可能有错误,是否就等于承认全都错误了呢?这是一个较广大的问题中的一个小个例,就是:在无产阶级革命

① 《谈"距离说"与"移情说"》,《文艺报》,第1卷第3期。

的今日，过去传统的学术思想是否都要全盘打到九层地狱中去呢？还是历史的发展寓有历史的连续性，辩证过程的较高阶段尽管是否定了后面（原文如此——于风政注）的较低阶段，而却同时融会了保留了一些那较低阶段的东西呢？蒸汽水电是资本社会的产物，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并不因此消失它们的生产的效用；太阳光是红的，冰雪是冷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和资本社会的人们都认为这些是真理，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也不因此失去它们的真实性。我想过去的许多美学原理也许有一部分是如此。比如"移情说"和"距离说"是否可以经过批判而融会于新美学呢？我愿意在对于马列主义多加学习之后，再对美学作一点批判融贯的工作，现在还不敢冒昧有所陈述。建立新美学是一件重大的工作，我们需要更谦虚的学习和更严谨的批判。我们需要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新时代的现实情况，也需要学习美学古典和美学史的发展，认清我们所应该否定的和所应该接受的。

朱先生直接地反驳了蔡仪对他的批评。蔡先生说"按朱光潜的说法，美感对象是孤立绝缘的，和外物关系，也就是对人生的意义是一刀截断的"。朱先生说："如果我确实如此说，我就堕入'为文艺而文艺'那一个魔障，自然罪该万死。但是我的说法并不如此。"他举了他书中的一些话，证明他并未否定美感与人生的联系。

朱先生认为，传统美学的一些观点，不能简单地说都要不得。"从康德以来多数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们所得的答案是：美感经验中的心理活动是直觉（直觉是先于思考的活动），直觉的对象是一个完整的孤立绝缘的意象。这里所谓'孤立绝缘'是着重艺术品的完整性以及美感经验的完整性。说得简单一点，美感是聚精会神去观照一个对象时的感觉。这种聚精会神的状态通常是不长久存在的，可我们不能否认它的存在。什样对象才能引起一个人聚精会

神呢？要解答这个问题，要看那‘对象’如何，也要看那‘人’如何。说阶级性有决定性，道理就在某一阶级‘人’对于某种‘对象’有接受的条件，有聚精会神的可能。这里所谓‘条件’包含政治道德等观点和教育，天资以及艺术修养等即整个人生在内。依这个看法，美感经验为形相观照说并不一定不能与马列主义的观点相融洽。不过这只是一个不成熟的摸索，在这里约略提及，请马列主义学者们想一想。”

《文艺报》在发表朱先生的答辩文章的同时，发表了蔡仪和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黄药眠两先生的文章。蔡仪的文章《略论朱光潜的美学思想》，引用了《文艺心理学》、《谈美》中的许多段落，证明朱先生的“超脱现实人生”的美学理论，确实是堕入了“为文艺而文艺”的“魔障”。他还引用朱先生著作中一些攻击革命文艺和革命文学家的言论，从政治的角度加以批判。蔡先生说：“也惟其因为他堕入了那个魔障，否认艺术和实际人生的关系，于是他反对文艺与实际人生中最主要一面的政治相结合，所以他从来对于革命文学就是深恶痛绝地责骂。”“朱先生之所以如此对于革命文学和革命文艺家的痛骂，自有其他的社会的原因，然而文艺思想之堕入‘为文艺而文艺’的魔障，不能不说也是原因之一，我这样说，想必不是误解吧？”

黄药眠先生的文章首先引用斯大林论辩证法特征的一段话和毛泽东关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服从于政治的观点，然后对照朱先生的两段话，以证明朱的美学思想与马列主义格格不入。他认为，朱先生主张有美感经验的人，必须要能够对实际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必须要能够对千千万万人的苦难，保持着冷静的观照的态度，这种学说和今天的“为人民服务”的学说毫无相同之处。“不管朱先生主观的立意如何，很显然的，他这种学说，在客观上，是在青年群众中起着毒害的作用的。因为它把青年们引到背向现实的道路上去，使他们厌恶实际斗争，站得远远的，整天在那里孤高自

赏，发着无稽的画梦，并以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体验到美的'崇高'的境界。是的，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才必须对于这一派的美学思想加以批评。"

然后，黄先生引证《文艺心理学》中一些前后矛盾的话，说明朱先生"虽然是从事于学术工作二十余年，却至今还没有养成学术工作者的态度"。朱先生"要学习马列主义，就必须首先把他过去学来的唯心论的哲学，先验论的哲学，直觉主义的哲学，二元论的哲学，先行抛开，虚心学习，并从客观的事实和生活中去印证马列主义的正确。但很可惜，朱先生并不是如此"。朱先生的袋子里先装了许多唯心主义的"宝贝"，然后"迈步走进马列主义底学说的殿堂，以焦急的神气，在寻求，是不是在这殿堂里也可以看到和他袋子里所装的相同的宝贝，并以此来证明他所有的宝贝还是稀世之珍"。

黄药眠说，朱先生关于"九层地狱"的提法"根本就不大妥当"，"朱先生所介绍的各种学说，乃正是我们所要扬弃的一部分"。"康德的形式主义美学，是企图把思想从美学领域驱逐出去的学说；心理距离说，是企图把人们引向脱离现实；孤立绝缘说，是劝人们要离群索居；内模仿说，是要把美和艺术还原到诉诸于感觉的游戏；移情说，是以个人主义主观主义的立场来分析美感经验的东西。所以就其整个的体系说，都是要否定的，虽然也许某些断片还可以有用，但这也必须用新的理论体系去整理溶化。"至于这些学说的历史背景，那都是"代表着西欧没落的资产阶级的颓废思想"。然后，他进一步批判朱光潜说：

> 至于朱先生为什么会介绍这样的学说进来，而这些学说，又何以能受到反动统治者的欢迎，它的历史的背景又是什么呢？很显然的，朱先生的思想是代表着过去中国的买办势力的。因为正是中国的买办阶级，喜爱一切都模仿欧洲的资产

阶级，喜欢追求物质的享受和形式美，同时他也正要求在思想上能够有如朱先生这样的学说，来麻痹群众的斗志，吸引青年避免政治斗争，走向朱先生早已替他们预备下的艺术的“息风避凉”的处所。是的，正是因为这，所以朱先生的学说曾受到反动统治者的赏识，对一部分思想简单的知识群众发生了麻醉影响。但是也正因为朱先生的思想是代表没落的买办阶级，所以它也就没有办法进一步完成一个理论体系。

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之开展距今已有二十余年了，而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艺术理论介绍到中国也已经有二十余年的历史了，可是朱先生对于这些学说是始终鄙视的，而他自己那一套则始终又是若隐若现地和我们的左翼文艺运动对立着。说起来已成往事，但朱先生，你还能责备我们，不去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和“执古责今”吗？

蔡仪、黄药眠批判朱光潜的美学观点，意义当然不止于美学问题，而首先是建立马列主义文艺思想在美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对此，黄先生说得非常明确。他说“我们之所以要批评朱先生的美学思想，并不是故意要与朱先生为难。我们之所以要批评，是因为朱先生的学说，是和我们今天马列主义的艺术思想直接处于冲突的地位，是和我们今天的文艺运动背道而驰”。蔡、黄两先生长期站在革命阵营一边而与朱光潜对垒，因此，这一论战又带有胜利者清算失败者的意义。从政治角度来看，蔡、黄两先生对朱先生的批判，是有很大的必要与合理成分的。

在朱先生来说，他似乎没有受到当时知识分子由政治上认同共产党，进而认同马克思主义，进而彻底否定自己的历史、思想与学术的群体心理与风气的影响。他固守着他从西方引进的所谓“学术”，不但没有彻底自我否定的意思，甚至还想到他的“学术”能与马列主义“融合”，极力从纯学术的角度讨论问题，不愿把美学理

论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他似乎没有因为自己曾有反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和左翼文艺运动、在政治上倾向国民党而影响学术的自信与独立。这在当时非常少见。

蔡、黄、朱三先生之间的这次论战,既有一定的政治含义,也是新旧两种学术观的对峙。旧的学术观是:学术就是学术,学术不是政治,不同社会里的学术是可以相通的。新的学术观是:学术是有阶级性的,学术不能离开政治,学术必须为政治服务,对旧的学术必须全部否定,至少是要进行彻底的改造。朱先生和蔡、黄三先生基本上是这两种学术观的代表。

关于朱先生美学思想的论战,发表以上几篇文章后即归于沉寂。当时学术界尚未形成大批判的风气,新中国刚刚建立,领导层似乎也不愿意使学术界的空气过于紧张。对于朱先生美学思想的新一轮批判,是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再起的,并一直持续到反右派运动。朱先生后来承认,黄、蔡对他的批评,曾推动他转向马克思主义,系统地清理自己的"反动"美学思想。

这次论战是新中国成立后新旧学术观的第一次交锋,同时也可以看做新中国学术讨论政治化的开端,因为它以政治动机始,以政治结论终,使用政治化的语言和标准,已显露出后来的学术批判运动的若干基本特征。

2.8 自信心的动摇:冯友兰和柳湜关于学风问题的辩论

革命胜利之时,中上层知识分子因为自己没有投身革命感到自卑与愧疚。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在社会改造、经济治理方面的伟大成就,使人更加相信马克思主义之正确。同时,执政党越来越刻意地否定旧中国的知识界和旧有学术,不断地剥夺知识分子群体赖以保持精神自立的资本,使得知识分子日益感到自己的无知、渺小与百无一是,由政治而人品,而思想,而学术,一步步地丧失了

自信。不论他们主观上怎样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一开口就会露出"资产阶级"的"尾巴"。失去自信的人当然没有力量坚持和捍卫自己的思想与观点。因此,如果自己的意见遇到党的或"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批评,便会立刻改变和放弃。这样一种心理的恶性发展,最终导致了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群体独立精神与"自我"的完全丧失。

1950年8月1日出版的《人民教育》第1卷第4期发表冯友兰先生的文章《对于中国近五十年教育思想进展的体会》,同时发表中央教育部司长柳湜的批评文章《关于"为学术而学术"的风气》。9月1日出版的《人民教育》第1卷第5期发表冯先生的答辩文章《再论"为学术而学术"的风气》。冯、柳争论的基本问题是五四以来中国的学术与学风问题。这个不大的争论,既显露出知识分子和执政党评价历史以及其他问题的不同观点与思路,也清楚地反映出在社会变革时期进退失据的中上层知识分子自信心的逐步丧失。

冯先生在第一篇文章开首说:"解放以来,新教育思想,不仅只替代了以前的教育思想,而且是包括了以前的教育思想。"冯先生大概没有注意到柳湜为1950年5月1日出版的《人民教育》创刊号写的发刊词《为建设新中国人民教育而奋斗》的文章。柳的那篇文章已经明确指出:旧教育是一个"反动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必须"粉碎",因为"这一思想体系的特点是反对进步思想,排斥马列主义,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处于敌对的地位"。冯先生说新的教育思想包括了以前的教育思想,开口就犯了一个大"错误"。

冯先生随后转入学风的讨论。他说:"一个时期的教育思想的具体表现,就是一个时期的学风。"他声明他所讨论的范围限于自清末以来的高等教育。他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到清末为止,一直是读书以求在政治上社会上获得特权的学风占主导地位。"五四运动,建立了新学风。这新学风有两个方面的表现。其表现在政

治社会方面的，是在思想上对于传统的思想制度，作激烈的批评与反抗，在行动上参加当时的革命运动。其表现在学术教育方面的，是建立了一个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五四运动起源于北大，蔡元培先生倡导后者，不倡导前者。“五四运动前一方面的表现，在中国历史上起了壮阔的波澜，有了深远的影响。这是众所周知的。后一方面的表现，在中国的教育及学术研究方面，也很有影响。在这种影响下，有一种思想，是教育为学术服务。”“学术是为什么呢？照主张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学术的价值，就在于发现真理，而真理的价值就在于其本身。”“这种为学术而学术的风气，相对于五四以前的学风说，是一个进步。这个进步在中国的学术教育界，起了一定的作用。现在国内，年龄五六十岁，在研究上有成绩的人，大概都受过这种学风的影响。”他还谈到“纯技术观点”，说这种风气是“要人确实得一种本领，教人靠本领吃饭或者发财致富”，“对于五四以前的学风说，也是一个进步”。

显然，冯先生是用赞赏的口吻论评说“为学术而学术”的风气的，认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是高等教育的进步。这是有道理的。然而，冯先生的这篇文章写在政治学习运动的高潮中，当时正在大批“为艺术而艺术”、“为学术而学术”和“纯技术观点”，因此他同时又指出，“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其阶级根源是“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主义的思想”。新社会研究学术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在主张“为学术而学术”的人看来，这是“有所为而为”的功利主义。冯先生当然也不赞成“有所为而为”即现时有用则研究现时无用则不研究的观点，因此，他为新的学术方针辩护说：“为人民服务”的学术研究目的，从“私”的观点来说，也是“无所为而为”的，因为学术研究不是为个人，而是为人民、为社会。

柳湜说，冯先生“认为五四的革命精神，只及于政治社会的思想上而不及于学术、教育上，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把政治社会思想与学术教育分割开来是不对的。五四运动不仅在政治社会思

想上引起了'壮阔的波澜',同时在学术思想方面,也引起了'壮阔的波澜'。冯先生所指的那个'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只是五四运动中以及以后一部分学者所走的道路,不是由五四精神而诞生的新学风,更不能概括五四以后的中国整个学术教育界。从五四以后,中国思想学术界的确是开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学风,但那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五四以后的学术界是有了明显的分裂,文化阵线逐渐也更分明了。中国出现了新的文化生力军"。这支生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行动上参加了当时的革命运动,在学术上尤其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也掀起了革命。"这支文化新军所代表的学风,才是五四所诞生和发展的新的学风,它不是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服务,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而是为民族,为人民大众,为中国人民革命服务。"他说,为人民服务的学风是和中国革命相联系的一种学风,这种学风在 1942 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而完善。

然后,柳湜回到本题,批驳冯先生关于五四以后中国高等学校中形成了"为学术而学术"的风气和这种学风有一定的进步作用的观点。他说:"在中国旧有高等教育方面,正如冯先生所叙述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是曾严重地存在着的,尤其是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那一段政治反动的时期,大学教授中间,特别是北京几个主要大学教授中间,这种思想和风气确是曾经占相当优势的,但也不是说,这种学风,就是一种统治一切的学风。我们知道,尤其是近二十余年中,高等学校内,还有一种法西斯学风,也有一种革命的学风。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高等学校内部,常处在一种分裂状态的。不仅在青年学生中,通过一次次的学生运动而在思想上表现着激烈的斗争,而且有少数革命的教授,在学术上,行动上已转向为人民的道路了。虽然,各人程度是不一致的。他们早已在思想上走出'为学术面学术'的象牙之塔,那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有一部分教授就是在学术研究上也明显地走向了新的道路。

在文学艺术方面,这有作品可以证明。在史学方面,也有开始用新的观点从事著作。在教育方面,我们至少不能忘记陶行知先生。"

柳湜承认:"在五四运动时期,的确也在一部分人中出现了'为学术面学术'的风气,这种学风在其开始时也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反传统的性质,但是这种反传统的性质是极其脆弱的,特别在已经出现了人民大众的革命的学术思潮并且在这革命的学术思潮与反动文化思想之间进行激烈斗争的时候,'为学术而学术'的倾向便成为逃避斗争的懦弱的表现,甚至更会堕落为反动的文化思想的帮手。"

柳湜由此得出结论说:"因此,我认为'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不能当五四以后代表性的新学风。它不仅没有统治着整个的学术教育界,也没有完全统治着旧有的各高等学校。它只是一部分学者所采取的态度。他们回避了那日益壮大起来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五四以后发生了这一种思想,那是作为代表社会中回避革命的一翼而存在的。"

冯先生的文章固然并不完美,可质疑的地方不少,但柳湜的文章更是漏洞百出。如冯先生的文章开首即声明,他所讨论的范围仅限于清末以来的高等教育。柳湜则说,如果冯先生说的是他所接触的一个小范围,他的观察是有意义的,"如果作为对全部的学术教育思想的发展历史的说明,那就显得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了"。柳湜大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生力军"所代表的学风,意指冯先生抹煞了这种革命学风的存在,然面这种由共产党代表的、在延安整风后形成的学风与冯先生所说的显指北洋军阀或国民党统治区"高等教育"的学风又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柳湜用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运动、少数教授倾向革命、少数教授走向新的学术道路、陶行知先生提出并实践新的教育思想等例子,说明1927年以后"为学术面学术"的风气并不是"统治一切"的学风,当然不无道理,但并不妨碍冯先生所说的"为学术而学术"的风气成

为一种为多数教授、学者所接受的因而在大学里有代表性的学风。而且，柳说“为学术而学术”是“逃避斗争的懦弱的表现”尚可，说它“堕落为反动的文化思想的帮手”，那是太过分了一些，因为多数主张“为学术而学术”的知识分子，正是因为厌恶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才打出“为学术而学术”的旗号的。

柳湜的批评，既不符合冯先生确定的讨论范围，也未完全针对冯先生原本的观点，颇有些强词夺理的味道。以冯先生的阅历与功力，自当正面反驳他的批评，坚持自己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对于五四以后高等教育界学风的评价，关系到如何估计五四精神对教育文化界的影响，关系到对曾服务于国统区高等学校的众多知识分子的评价。如果冯先生坚持“为学术而学术”是高等教育领域源于五四的、占主导地位的、有一定进步性的学风，不但基本符合事实，而且也会使大批曾服务于旧中国高等教育界的知识分子感到极大的欣慰。遗憾的是，冯先生没有这样做。

冯先生在《人民教育》第2卷第1期发表的题为《再论“为学术而学术”的风气》的答辩文章，开始即承认：“对于五四以后的学术教育进展的情形，柳先生的叙述是完全正确的。”“柳先生说：五四以后的学术界有了明显的分裂，文化阵线也更分明了。中国出现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的文化生力军。这是完全正确的。”“柳先生说：‘我认为“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不能当作五四以后代表性的学风。’这一点，我完全同意。”

事已至此，认输也就罢了，冯先生却又不甘心如此轻易地放弃自己的观点。他说，他的看法之所以与柳湜不同，是因为两个人着重的时期不同。柳着重说五四学术界分裂以后，而他着重说的是“这个分裂以前的几年的学术界的情况”。“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是不是在上面所说的分裂以前的某一个时候，即令是很短的时候，曾经有代表性，或有若干的代表性。这一点恐怕是我与柳先生的意见不同之处”。冯先生的辩解无力至极，因为他的第一篇文

章的题目就是《对于中国近五十年教育思想进展的体会》，讨论的范围是清末特别是五四以来的高等教育，而且还举了民国十七八年的例子，而那正是大革命失败后"政治反动"、文化学术界已经发生分裂的时期。冯先生的论战手法，使自己先输了一着。

冯先生不愧是哲学家，能言善辩。柳湜的文章大段引用毛泽东的话来增加自己的权威。冯先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你搬毛泽东，我搬陈独秀、严复，一个是共产党的老祖宗，一个是毛泽东肯定过的人。冯先生将讨论的时限范围偷换之后，即大段引用陈独秀写于 1918 年 7 月 15 日的题为《学术独立》的随感录，然后说："这种'学术独立'的看法，以为学术不是任何东西的附属品，它的价值在其本身，不在于能为某一方面服务。这是当时的人，对于学术文艺的一种看法。当时的'为学术而学术'，'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的各种主张，各种风气都与这种看法有关。"他又引用严复论西洋文化的话，然后说："学术的最高目的，在于求真。这个目的，是'独立'于任何方面的看法。"这是有关对于学术的看法。在研究学术的方法方面，他又引用严复的话，说明主张"为学术而学术"的人同严复的主张是一致的，即认为"学术是有用的，但是研究学术的时候，不可以有致用之心。为致用而学术，容易犯一种短视急躁病。结果学术研究不好，因而也无从致用。'为学术而学术'，不以致用为意，反而可以得到学术的大用。这一点意思倒是可以批判地接受"。五四前后关于研究学问的目的和"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在当时都有反传统的革命性。在五四前后，都发生了很大的作用"。它是自由主义的表现。"因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新发生的资本主义，不久就夭折，因而'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也不久就成了不合时代的了。此后的人民大众革命的学术思潮，正是新民主主义时代的反映。"

表面看来，冯先生似乎是在用"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手法对待柳湜的批评，顽强地坚持自己的观点。然而，他把"为学术而学

术"作为一种有代表性学风的适用范围,从五四以来的30年改为从五四到1927年的不到10年,就避开了他们原本的分歧所在,完全附和了柳湜的观点。

冯先生所发显系违心之论。柳湜在教育界、学术界的地位不能与冯先生相比,但是,他是教育部的官员,是党的代表。他以毛泽东的论述为依据,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看问题,为争取和维护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教育史、学术史上的地位而战,因而具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冯先生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过去坚持"为学术而学术"因而对人民革命毫无贡献,甚至"堕落为反动的文化思想的帮手",自然也就失去了自我辩护的自信。然而,他们又自认为曾有贡献于中国的科学教育文化事业,不甘心完全否定自己的历史,所以一有机会,就要"表现"一下;一旦受到批评,又立刻缩回去,不敢坚持自己的观点。新中成国立初期冯、柳争论这小小的历史插曲,既验证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顽固性,也暴露了他们的软弱性与自信心的丧失。冯先生一生的坎坷曲折与思想变化,似乎也可以作为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一个缩影。

2.9 全国高教会议:高级知识分子对转换教育模式的抵制

旧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事业很不发达,知识分子多集中在教育系统。新中国建立之初,全国大中小学教师约为80万人。高等学校有227所,大学教师约19500人。大学教师在知识分子总数中占的比例不大,却是这个群体的群英与代表。旧中国的大学,教育思想、学制、院系组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都模仿欧美。许多学校,教材用外国原版,讲课用英语。教育行政与人事,更是欧美留学生的一统天下。他们中的许多人崇尚"教育救国",视教育高于一切,打着"为教育而教育"的旗号,尽量保持同现实政治的距离。他们长期对教育事业发展的缓慢与教育本身存在的弊端不

满。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同所有的人一样，都认为中国教育将迎来一个千载难逢的蓬勃发展的时代。许多人纷纷建言，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

但是，处在历史转折关头的高等教育界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如何对待旧教育、如何建立新教育的原则与方针缺乏认识，对高等教育模式即将从模仿欧美转为照抄苏联缺乏思想准备。他们对旧教育的批判、对新教育的规划，都潜在地受到欧美教育思想和教育模式的支配。就客观原因来说，毛泽东并没有一篇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样的著作全面论述党的教育思想，使教育界人士有所遵循。解放之初，为了稳定教育，不致使学校陷于混乱，党采取了维持现状、待条件成熟后逐步加以改革的政策，也使一部分知识分子产生了共产党承认或宽容现有教育体制的错觉。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发展时期，在教育问题上，教育界内部、执政党与教育界之间发生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

最初一个时期，在如何评价旧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上，教育界除了一致认同"旧中国的高等教育脱离中国实际"之外，对于从政治角度对其进行全面的批判与清算，态度并不积极。费孝通先生是北平解放后最早关注大学改革、发表言论最多的人。《光明日报》在 1949 年 7 月创办《大学周刊》专栏，费任主编。7 月 5 日，他在这个专栏的第 1 期发表了一整版的文章，全面论述了大学改革问题。他肯定大学必须改革，改革的过程必然同教师的思想改造相联系，指出了大学院系结构的弊端，对学生修业年限、学校行政系统的调整与建设、提高办学效益等问题，提出了许多非常内行的意见。他对旧大学的弊端没有提出直接的批判，只是说在新民主主义时代，大学担负起了新的任务，"原有大学制度和教学内容暴露了它的弱点，必须加以改造"[1]。老教育家林砺儒先生同年 7 月

① 《当前大学种种问题》，《光明日报》，1949 年 7 月 5 日。

发表谈话，激烈地批评旧教育，说它不过是"次殖民地谄媚帝国主义的一套洋装"[①]，但这种主要从政治角度完全否定旧教育的意见，并未得到知识分子的认同。在执政党方面，由于坚持"维持原有学校，逐步改善"的方针，也没有公开表示支持这种意见。1949年年底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新中国的教育要"根据共同纲领，以原有的新教育(即解放区的教育——于风政注)的良好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的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②]。这就是说，对旧教育不能全盘否定。

形势发展很快。1950年上半年，高等教育的改造与建设引起了领导层的高度重视。这一方面是高等教育自身存在的问题开始显露出来，更重要的是，领导层认为应当向高等教育提出为即将到来的建设高潮培养人才的任务。建设新教育，要扫除思想障碍，就要否定和批判旧教育。本书已提到过的柳湜为《人民教育》写的发刊词《为建设新中国人民教育而奋斗》，就反映了领导层的这种意向。他不但对旧教育的思想体系作了完全否定的结论，并且提出要肃清旧教育思想的影响。他说："我们从各级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许多原有的课程上，许多旧教育的论著上，以及今天新区有一些教育工作者在思想上对新教育的怀疑态度，和不易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等方面，都看到它的反映。这一思想体系，甚至也曾影响到老解放区某一些教育工作者，以至使他们在某些具体教育实施上保有旧教育的观点。""全国教育工作者必须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必须用建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新教育思想体系去代替旧教育思想体系，这就必须从各方面去拆毁这一个顽固堡垒。""过去一年来，也有人在自我批评与批评

① 《林砺儒谈新教育》，《光明日报》，1949年7月23日。

② 钱俊瑞：《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要点》，《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87页。

中,做了对旧教育思想与实践的揭发,但一般说还是笼统的、片段的,不够具体和缺乏系统性的。现在我们需要有计划、有系统地来对于支配旧中国教育的各派思想、各种教育制度,和旧课程、旧教法,作科学的批评。"

然而,高等教育界有欧美留学背景的大知识分子们,较之文艺界知识分子要顽强得多。他们之中很少有人系统地检讨和否定自己的教育思想与教育经验。在1950年6月召开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前后,他们更是一致抵抗领导层提出的改造和调整旧大学的方针,竟使第一次院系调整计划流产。

这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自5月30日开始,6月9日结束,主要讨论高等教育的方向与任务、大学如何培养国家建设急需的人才、院系调整、课程改革等四个问题。当时,国家形势趋于稳定,经济建设即将展开,产业部门急需人才,对人才培养提出了专、快、多的要求,即学习的技术要专,培养的速度要快,培养的人数要多。领导层出于满足当前急需和加快向苏式教育模式转换的双重考虑,在大学任务的确定、课程改革、院系调整等一系列问题上,表现出了明显的使大学专科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又和对"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片面理解相联系。根本地转换高等教育模式的动向,受到高等教育界大多数高级知识分子的反对。会前各地在讨论课改方案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争论。会议期间,会内会外的争论更加激烈。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理解大学的任务以及大学与专科学校的区别、如何理解和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这两个问题。

绝大多数教授认为,必须把大学与专科学校从任务上区别开来;一个国家不可以没有大学,大学不可以改为或实际地降为专科学校;大学的任务是发展学术,培养具有系统、全面的理论基础,能够发展学术、创造知识的"通才",这种通才对于国家科学技术的长远发展是绝对必需的。专科学校以培养"专才"为责任,即在必要的理论基础之上,重点进行实用的技术性教育。混淆大学与专科

的区别，将大学实际地降为专科，必定会损害国家长远的科学发展与人才培养。

清华大学副教务长钱伟长教授说："在高级学校里，应该从事全面的科学训练，应该以能掌握比较全面的科学理论，灵活地贯穿到各种技术上去为标准。在大学训练里，还有一定限度的'专'，但是这种专门性不是技术性的狭隘的'专'，而是在全面科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专'。""高等教育决不能从事'零件'式的训练。""若不从全面科学的基础上专门化，便是'零件'，并且是'死板的零件'。"[①] 他认为，大学无法满足产业部门提出的专、快、多的要求，也不应该迁就这种要求。

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先生认为，正确地制定高等教育的方针和任务，必须正确确定大学的性质和任务。"大学的任务是一方面要提高学术的理论水平；一方面要鼓励学生的创造性。大学的性质应该是全面的、向上的、创造的，大学教育不但要顾到现在，更要顾到将来。就一个大学的本质来说，学术的研究成分应当重于实用的技术成分。"这就是大学与专科不同的地方。"专科学校是解决普通实用技术问题的，而大学则是提高理论水平、鼓励创造性、解决高级理论的技术问题。"针对人们对于大学文法学院的责备，他说"文法学院的基本任务是给学生以宽厚的基础，高级的常识和分析判断的能力，而不是给以专门技能的训练，一毕业就有一定的专门用途"，因为文法训练本质上不可能达到这一要求[②]。

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高名凯教授反对把一些大学改为专门学校或通过课程调整实际改为专门学校。他说，大学的任务在于"继往开来"，传授全面知识，培养程度比较高的"通才"。"这种教育本质上就是慢性的，所谓的'百年大计'。如果毕生的学习和经验都

① 《目前工程教学的几个问题》，《文汇报》，1950年6月1日。

② 《大学有它的本职，千万不能忘却它》，《文汇报》，1950年6月6日。

不容易制造出多少的‘通才’的话，那末，一个‘准通才’之不能够在一两年的时间里制造出来就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了。所以，从原则上来说，大学校没有在短时期里培植一般专门职业人才的责任。”“我们绝不能够允许一个现代的国家没有大学。”“没有了大学的教育，这个国家就是不健全的。”[①] 把大学实际地降为专门学校，这样不但无助于急用人才的培养，而且会造成四个方面的损失：教授放弃多年研究的学术，是教授方面的损失；让一个毫无专门学校教学经验的人去教专科，必然教不好，是学生的损失；一部分大学改为专门学校，使本来就不多的大学更少，是大学教育方面的损失；普及教育包括普及高等教育，没有了大学，普及教育就没有纵的发展，也是国家的损失。

清华大学机械系刘仙洲教授赞成通才与专才并重。他说：“例如进行工业建设，我们不仅要照顾到当前的需要，更必须的是发展。如果不培养通才，只有专才，我们的学术和科学技术就不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进步。因此，培养通才是绝对必要的。”为了满足产业部门的人才需求，工学院可以实行双轨制，附设专修科，一部分中学可以改为中专或中技[②]。

樊弘先生赞成多数人的意见。他认为，不能混淆大学与专科的区别。专门学校重“术”，大学重“学”；术贵在熟，学贵在透；学是“即物而穷其理”，术是“据理以求其用”；学是发明理论，术是应用理论。“一个伟大的国家，在文化建设的工作上，必须要有不断的纯学理上的新的发明与创造，只讲术不讲学最多只能给先进科学的国家作尾巴。作尾巴还好，最坏的恐怕连尾巴都不配作。原子能已经被利用在工业上了，我们有资格作尾巴么？纵令能作尾巴了，还是尾巴不是？”在科学技术方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任务，要

① 《谈高等教育的改革问题》，《光明日报》，1950年6月6日。

② 《谈培养产业急需人才》，《光明日报》，1950年6月6日。

由大学承担[1]。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翦伯赞先生说："有些朋友担心大学会改成专科学校，或者取消学院制度，我以为是不会的。"尽管目前大学不得不在培养急用人才方面分担专科学校的部分任务，但是，"既然是大学，在原则上就必须维持大学的水准，使它名副其实，不要弄得'两不象'。所谓大学的水准，就是要给与青年以这样一种教育，或者知识，既不仅是为了现在，而且为了将来；不仅为了应用，而且为了创造"[2]。

对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领导层与教授们的理解同样有很大的差距。领导层认为，贯彻这一原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大学内部的改革，即课程设置要符合实际需要；二是体制与结构的改革，即转换高等教育模式，调整布局。教授们多从大学内部改革的角度考虑问题。从大学以培养通才为任务的观点出发，教授们反对片面理解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反对在课改中过分追求实用而忽视基础理论教育。

钱伟长教授说："所谓联系实际，不只是指的要联系目前的紧急需要，而且是要联系国家建设长期的需要。""我们现在大学要准备后备军，决不能为目前紧急的需要而乱了步伐。现在大学的学生是准备四五年后拿出来应用的，而四五年后的需要的质量决不同于现在的情形。"他预言，全世界的工业，10 年到 20 年之内，就要有一个大革命，就是把原子能运用到工业上来。"这个大革命一定要来临。新中国一定要迎接这一个工业上大革命的到来。可是，我们能够不准备吗？从现在起，在大学里就要做这样的准备。这样的人才不是三五年可以培养出来的，也不是目前迫切需要的，

① 《大学课程改革的两方面》，《光明日报》，1950 年 6 月 11 日。
② 《大学与专科的任务不同》，《文汇报》，1950 年 6 月 6 日。

但是，我们却不得不也适当的做起准备。"[①] 他还说："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问题，不等于理论与实用结合的问题，过于强调实用，会生出狭隘的实用主义或经验主义的毛病，那便是数十年来胡适提倡的杜威的实用主义。我们今天的科学学习应该问这种科学有没有唯物的基础的，或者仅是空想。"为了满足快、多、专的要求，大量举办中技、专修科、训练班是临时的办法。在高等学校里，学习应当是全面的，应当以理论学习为主。"假如有人主张以经验累积的学习来总结出科学理论，那么我们人人将重复我们祖先的努力，浪费青年精神，莫此为甚。"[②]

费孝通甚至怀疑"理论联系实际"这一命题的成立。他说："理论是反映了一定的客观存在。如果理论是科学的，理论与实际一致，是不成问题的，不然就是非科学的。现在的问题是科学的理论怎样与大众相结合的问题。旧教育的理论与实际脱节的原因，除掉学校的责任外，还有社会的原因。一种科学的理论，在学校里教学的时候，并没有理论与实际脱节的现象。"[③] 有人认为实际就是"实用"。他认为一切从实际得到的东西，都必然会是"实用"的。从短期看科学知识的实用性很不恰当。从实际里得来的理论，必然能回到实际中去，那就是实用。现在把实际看成了"出路"和狭隘的实用，是杜威实验主义的影响[④]。

上述观点落实到课改方面，就是不赞成以实用与否决定课程取舍，不赞成削弱基础课。费孝通先生说，现在的中学生基础极差。"有很多人不喜欢'通才'两字。我觉得我们实在谈不到这两个字。我们现在并不是在争'通才'与'专才'哪一种才重要，而是

① 《光明日报》，1956 年 6 月 5 日。
② 《目前工程教学的几个问题》，《文汇报》，1950 年 6 月 1 日。
③ 《光明日报》，1950 年 6 月 5 日。
④ 《对课改草案的意见》，《文汇报》，1950 年 6 月 6 日。

在要不要打好基础的问题。先有基础,包括文化水平和工具知识,好象语文、算术及一般史地知识,然后才能有所专长,最后才能有统揽全局、照顾全面的'通才'。……大学只能为通才打基础。"①高名凯教授主张,大学现有的课程,只要不是反动的、本来就不成其课程的、没有胜任教师的以外,都可以保留,"因为一切的课程只要加以新观点的洗礼都会变成新的性质,一切的课程只要不违背马列主义都是有用的,大学教育本来就不是完全制造立刻有用的人才,大学教育本来就是长久的计算,眼前没有用的将来或许竟有大用,社会是变化的,发展的,今日无用的知识明日也许就有大用。大学教育既是为明日打算,那末他的课程就不能够拿目前的用处来作取舍的标准。所以,课程的改革应当是注意课程的内容是否充实正确,不应当注意是否有眼前的用处"②。

旧中国大学的内部结构不合理、地区分布不合理的状况,久为人们所承认。1949 年 7 月,时任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委员的李达先生就提出,专科以上学校编制应予调整,把院系分别合并,改编为综合性的大学、单科大学或学院。院系归并以后,按其教学与研究内容,直接由相应的政府机关来领导,并负担教育经费,如各大学的法律系归入政法学院,由司法部领导,医科学院由卫生部领导,交通学院由交通部领导,师范、艺术等院校仍由教育部领导。各校教育行政及教育原则,校长、教员的任命,仍由教育部负责③。共产党进城之后,在高校调整方面做过一些工作,但步子不大,主要还是认为条件不成熟。

这次高教会议提出了院系调整的任务,但没有得到支持。吴晗说:"关于院系调整,校与校的调整,各方面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很

① 《对课改革案的意见》,《文汇报》,1950 年 6 月 6 日。
② 《谈高等教育的改革问题》,《光明日报》,1950 年 6 月 6 日。
③ 《李达谈高教问题》,《光明日报》,1949 年 7 月 23 日。

不一致，其中固然有很多困难，但大家都确认今天存在有不合理的现象。既然不合理，那就应该进行合理的调整。"① 但是，多数人或者反对立即进行调整，或者持非常消极的态度。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吴泽霖教授说："院系调整是改进高等教育中的一个很重大的问题，过去存在着很多不合理之处，确应加以调整，不过，教育是百年大计，需要逐步的推进。"雷海宗教授则明确反对。他说："院系调整对于一个历史较长，办理较有成绩的学校，这犹如一个国家民族一样，是具有其传统的。这个传统，不太容易打断；同时如果在不违背大的原则下，也不必一定要打断。因为建立一个新的传统，需要很长时间，是不经济的。所以，对于打断一个历史悠久而又有成绩的学校的传统，还是慎重一点的好。"②

这次高等教育会议没有取得领导层预期的成果，自然使他们非常不满甚至于愤怒。当时实际主持教育部工作的副部长、党组书记钱俊瑞在会议总结中尖锐地批评了这些"顽固不化"的教授，再次表示了领导层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教模式转换的决心。

他说，必须坚决地步骤谨慎地改革旧的高等教育。"反对进行这种改革是违反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是错误的。片面强调困难，或用种种错口，拖延不改，也是不对。"他极力强调改革过程中的政治因素。他说："教育的改造是属于思想领域内的事。旧思想和旧观点的变化和被消灭，比经济基础和其他上层建筑（如政治、法律）的改变，一般地要慢得多，它的被消灭必须经过长期的、复杂的和系统的斗争。"教育改造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过程"。这些当时很流行的言论，拿到全国高等教育会议这种场合来讲，自然地造成对在场的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压力。针对会议发生的激烈争论，钱说："不容否认，我们全体教育工作者的

---

① 《改革要逐步做去》，《文汇报》，1950年6月6日。

② 《大学课程怎样改革》，《光明日报》，1950年6月5日。

思想观点现在还是极不一致的，它们代表着各种不同的阶级阶层的不同的立场和观点。”这就把教授们的不同意见上升到了阶级的高度，从政治上否定了他们的技术性意见和建国热情。

钱俊瑞承认：“在这次会议上，讨论最久，争论最多，对今后高等教育的实际工作影响最大的问题，也就是理论与实际一致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贯穿着我们教育的方针、任务、制度、内容和方法的一条红线，是今天高等教育中最基本的问题。”他复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毛泽东关于理论与实际之关系的思想。针对教授们对狭隘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批评与警告，他指出，现时学校存在的问题不是因讲实用而忽视了理论，而是一部分理论是陈腐的，甚至是反动的，对它们不应该“敝帚自珍”，而应该彻底抛弃。

教授们认为大学就是大学，反对把大学降为专科，主张继续进行“通才”教育。钱氏狠狠地批驳了他们。他说，“大学管理论，专科管实际”是不对的。我们主张学习系统的理论，乃是希望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级建设人才，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争取“健全的和结实的专门化”。“对于我们，全面发展与专门化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高等学校，不论是综合性的大学或是专门学院，它们所培养的都应该是全面发展的为国家建设所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既非‘单纯的零件’，又非‘无所用之’的空才。我们的所谓‘全面发展的人才’，和旧教育中的‘通才’是有严格区别的。对于这种所谓‘通才’，列宁的批评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他说：‘旧的学校总说它是要培养出通晓各种知识的人，它所教授的是一般的科学。我们知道，这完全是撒谎，因为当时整个社会都是建筑和支持在把人们分成各阶级，分成剥削与被压迫者的基础之上。自然，旧时所有浸透了阶级精神的学校，只能使资产阶级底儿女获得知识。这种学校里的每一句话，都无非是根据资产阶级利益捏造出来的。在这样的学校里，工农青年所受到的与其说是教育，不如说是为迎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奴化训练。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要为资产阶级造

成适用的奴仆，既能替主人创造利润，同时又不会惊扰主人的安宁与闲逸。'"①

钱氏也表示在高等教育改革中应吸收旧教育中"一切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合理成分，呼吁建立大学与政府之间的"亲密"关系。但是，他把自己摆在与教授们对立的地位，完全从政治角度对待教育改革，并引用列宁的语录支持自己的观点，不能不引起教授们的反感。教授们是专家，他们要具体地讨论和解决教育改革涉及的实际问题，他们的意见多是具体的、实在的、技术性的。钱的总结报告则是政治性的报告。这表明，领导层与教授们之间，不仅观点不同，而且无法沟通。

周恩来总理在会议结束时发表讲话。对于理论与实践、通才与专才的关系，他的说法与钱氏的报告没有太大的区别，但他强调大学要提高理论水平，"大学和专科有差别。大学总是要学得广一点，深一点，理论更多一点"②，不能把大学降到专科的水平。他没有强调教师的思想改造，却强调了教育工作者的团结。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先生则完全附和钱氏的观点。他在闭幕词中提醒教授们注意旧教育与新教育性质的不同，"这一性质不能不体现在各级教育的方针、任务、教育内容和方法等一系列的问题上。我们对旧教育的性质和基本精神，是决然应该否定的。对旧教育的内容、制度和方法，是必须改革的。这些都应该加以肯定，不能有任何怀疑的"③。

教授们不同意钱氏的总结，认为他的报告没有反映会议的真实情况。他们作了自己的总结。费孝通教授在6月18日写了《教

① 《团结一致，为贯彻新高等教育方针，培养国家高级建设人才而奋斗》，《光明日报》，1950年12月15日。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1984年11月版，第18、19页。

③ 《光明日报》，1950年6月17日。

育者本身的教育》，谈这次会议的情况与收获。他争辩说，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对于旧的高等教育要改造的认识是一致的，“没有人觉得现在所有的高等教育不加以提高和改造是能配合得上革命形势的发展的”。会议发生的争论，属于自由讨论，追求真理，是新的学风在形成的表现，是知识分子政治上进步的表现。他显然不满于动辄把不同意见上升到阶级和政治高度的做法。他说：“每个人经验的范围是不同的，因之对于同一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看法。”知识分子没有必要担心别人把自己公开发表的批评政府提出的草案的“负责的意见”说成是“反动”，也不要怕得罪人，因为言者是无罪的。

在全国教育会议上，教授们集中批评狭隘的实用主义。钱氏的总结与马叙伦先生的闭幕词，则突出地反对理论脱离实际，对于旧的高等教育，他们实际上是全面否定的。费孝通在他的文章中继续批评片面否定旧教育的观点和狭隘的实用主义。在肯定“旧教育在本质上是反映旧社会的”之后，他说：

> 把旧教育看成完全是一堆腐烂的垃圾，那是不对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的人民富于革命性，知识分子又常是革命的先锋和革命思想的传播者。新民主主义革命先驱的五四运动就发源于高等学校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三十年来的澎湃的学生运动对高等教育不能没有影响。但是反动统治的高压和打击是严重的。旧教育中对人民有利的合理成分经过了很艰苦的斗争才保存下来了。
>
> 革命胜利了，高等教育的任务必须重新确定了。以往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为统治者服务的任务一定要改变为现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为人民服务的任务。这是方向的改变，最主要，也是最基本的。方向是扭转过来了，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过去的一笔抹煞，从头做起呢？那却又不成。社会是发展

的，没有昨天也就没有今天；没有今天也就没有明天。于是文化教育事业并不象政权一般可以一下子改过来，而是要很细致的逐步有计划的改造。文化教育是属于意识形态的范围，在革命运动中它最先反映了革命的要求，宣传了革命的思想，但是它本身的改革却是最后的殿军，政治经济有了深入的改革，这个社会事实才会推动文化的彻底改革。这是一个客观规律。但是现在知识分子的成分却以小资产阶级为主，小资产阶级有它狂热和性急的倾向。在文化教育的改革中，偏向是极有可能发生的。……

在否定旧教育的教条主义的过程中，又发生了另一种倾向，那就是借口为实际服务，而抹煞有系统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把教育工作和科学工作降低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问此时此地不问长远需要的倾向。这就成了狭隘的实用主义了。

旧教育的必须改革是应当坚决肯定的。它的教育内容的脱离实际也是不容否认的。问题是在怎样把旧教育中可以对人民有利的合理成分和实际需要结合起来，发挥它的作用；更从和实际结合中去提高理论，使我们中国的科学能自立起来，不再依赖外国。这显然是长期的工作。不向这方向前进，永远不会达到；太性急了，欲速反而则不达。

钱氏的总结给人们的印象是，教授们反对大学为国家建设培养急需的人才。费孝通声明："在争论高等教育的任务时，一般的意见是反对把大学降低为技术专修科的，但是这并不等于反对由大学来兼办专修科。这一点必须弄明确。因为当前急迫的需要而改变高等教育的任务是不好的，但是利用现在大学一部分师资和设备来协力解决当前经济建设中的困难是完全应当的。"这一段话，大有澄清事实真相的意思。

费费通重申他们在会议上提出的观点，反对以实用与否为标

准大幅度改变高校的课程。他说，教师把"以往所遗留下来的不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必须逐步地纠正过来，然后把新立场、新观点、新方法贯穿到他所教授的课程中去，这是课改的基本过程"。关于院系调整，他只承认大学中"有些学系的任务不太明确，划分不太合理"，"是不是可以立刻彻底的重新划分呢？要这样就必须有一个更合理的方案。如果没有更好的、而且一定有把握的新方案，就把旧的打乱，就会犯毛主席所指出的偏向"①。

教育界高级知识分子如此激烈地抵制高等模式转换，是受什么样的思想或心理支配呢？第一，他们强调大学与专科学校的区别，强调大学必须进行"通才"教育，表明他们坚持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一类地方所接受的欧美教育思想，也就是说，他们并不认为欧美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完全要不得。第二，他们认为，旧中国的高等教育存在脱离实际的弊端，这不是欧美教育模式和高等教育本身的罪过，而是落后的社会制度造成的。第三，消除高等教育的弊端，不需要根本改变甚至打碎现有的一切重起炉灶，而应以现有的高等教育为基础加以改进。第四，他们担心教育模式向苏式"专才"教育转换，会使大学实质上归于消灭，造成对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与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根本损害。大知识分子们似乎看不到照抄苏联已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他们仍然受到他们的留学背景和国际联系的深刻影响。他们"昧于时势，顽固不化"，许多人因为在 1957 年重申他们在 1950 年提过的这些意见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但是，他们对祖国的教育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他们在本专业领域内表现出来的、为此后几十年的实践所证实的超出领导层的历史性、世界性眼光，却不能不使后来人由衷地佩服。

我们不去评价 1950 年的这次会议对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影响。我们仍然关心这次冲突的意识形态含义。尽管这时的知识分

① 《新观察》，第 1 卷第 1 期。

子已经承认共产党政治上的伟大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然而，他们似乎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指导一切，不认为自己可以放弃在专业领域内独立思考和发言的权利，不认为有彻底否定和放弃自己的教育经验和教育思想的必要。他们自觉地或本能地认为，社会制度可以革命，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发展只能是改良与渐进，不应当因社会制度的变迁而打断它的连续性；中国的科学技术不能失去与世界的联系，不能因为眼前需要牺牲未来发展；教育的改革有政治性的因素，更多的是技术性问题，在教育的技术性改革方面他们更有发言权。我们还应注意，在这次冲突中，清华大学的教授们充当了主要的反对派，而清华正是最"美国化"的大学；有欧美留学背景的大知识分子表现出显著的集团性特点，因为他们确有与他们的教育背景、职业经验、职业特点相联系的相似的思想体系、价值标准和思维方式。

教育领导层在这次冲突中表现出了惯于从政治上看问题、惯于否定、忌讳改良的革命党的特点。他们似乎并不十分懂得社会制度可以革命，教育则不能或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革命性剧变的道理；不懂得教育的改造固然有重要的政治因素，但更多的是技术性问题，技术性问题应当尊重专家的意见。但是，他们在政治上确实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站得高。他们非常清楚，中国正在逐步建立苏联式的计划管理体制，高等教育模式的转换已成定局。同这些"浸透"了资产阶级精神的教授们就教育谈教育是谈不拢的，惟有从政治上思想上对他们痛加批判与否定，打掉他们的自信与威风，才能从根本上粉碎他们的抵抗，清除转换教育模式的障碍。批判《武训传》、批判陶行知、批判陈鹤琴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正发挥了这样的作用。

第三章　偶像的失落

昧于大势的文教界：对《武训传》和陶行知的歌颂——批判《武训传》：第二个知识分子检讨浪潮——第一个偶像的破碎：对陶行知及"生活教育"的批判——微弱的正义之声：为陶行知先生辩护的人们——党性与道德的冲突：批陶运动中的陶氏弟子们——第二个偶像的破碎：对陈鹤琴及"活教育"的批判——"洪洞县里无好人"：对教育工作者的否定与反否定——不甘寂寞的文艺界：对萧也牧作品的批判

3.1　昧于大势的文教界：对《武训传》和陶行知的歌颂

新中国成立之初，执政党的文化教育政策比较宽松。发动政治学习运动，开始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在文学艺术和教育方面迅速建立统一的意识形态的指导，使其向着适应新社会需要的方向转变，确使知识分子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但是，这个过程在总体上是宣传、学习、引导和个别批评的过程，没有发动大规模的批判与斗争。对于政治学习运动后期"思想总结"的批评，表明党不愿把延安整风的思想斗争方式运用于党外。

这种情况麻痹了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缺乏深刻了解的知识分子。他们没有认识到，这种宽松的政策仅仅是"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的体现。除了具有直接而明显的政治意义的事情以外，许

多人仍然按着过去的习惯观察问题，评说人物，发表意见。当着全国形势基本稳定，执政党把目光更多地转向意识形态的时候，它立即发现，文化教育界已经发生了不可容忍的极度的“思想混乱”。这种状况，集中地反映在对电影《武训传》和陶行知先生的颂扬上。

电影《武训传》是由孙瑜编剧并导演、由上海昆仑电影公司出品的。这部片子前后酝酿了7年时间，它的酝酿和筹拍，显然受到陶先生在抗战中期的艰难环境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下，为了激起人们的奋斗精神，拯救因经费困难而陷于绝境的育才学校，而提倡“武训精神”的启发。这部片子新中国成立前已经拍了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要不要继续拍下去，曾有过一些犹豫，在上海电影部门支持下，孙瑜完成了这部片子，并作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修改。

《武训传》公映后，得到了广泛的赞誉。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仅北京、上海、天津三地就发表赞扬武训的评论文章40多篇，作者主要为文化教育界人士。著名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董渭川先生说，他看了电影，感动得下泪，“武训这个名字，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从武训这个杰出的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许多传统的卓越精神。”[①] 他认为，在普及乡村教育和培养爱国主义精神方面，武训都是有教育意义的。陶行知的弟子、上海教育局局长戴白韬先生说，教育工作者“更应该学习武训那样赤诚的始终如一不避任何艰苦困难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去教育工农[②]。金紫光说：“武训先生的生平事迹，在解放后的新中国，应当广为宣传，因为这故事有非常伟大的教育意义。所以我很热情地把这部电影，推荐给我们新中国的劳动人民。希望大家能够从武训的经历中，学到

① 《由教育观点评〈武训传〉》，《光明日报》，1951年2月28日。

② 《看了〈武训传〉之后的意见》，《新闻日报》，1951年1月1日。

一种艰苦卓绝百折不挠的韧性战斗精神。"[1] 著名作家端木蕻良先生称赞武训是"一个充满了智慧和反抗行为的人,一个深心强记,韧性敏行的人","一个组织者和运动者"[2]。《武训画传》的编著者李士钊教授称武训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的先觉"。还有人说武训是"千古一人"的传奇式英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等。《武训传》批判运动的主将、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杨耳(许立群)在他那篇经过毛泽东修改的《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的重头文章中说,"在衷心的赞叹和景仰声中,武训被推崇得'高人云表'"[3],此言不虚。

武训的事迹,原本没有什么重要的政治意义。陶行知当年倡导"武训精神",也无非是借武训这个历史人物,激励进步教育工作者在困境中坚持奋斗。问题在于,《武训传》的拍摄者犯了一个绝大的、为执政党所不能容忍的错误:拿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失败来反衬武训办学的成功。中国共产党是依靠农民、通过以农民为主体的战争取得政权的,它与中国传统的农民起义有着血缘的联系。在执政党看来,这样的描写,不是"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4] 又是什么?而那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进步的革命的知识分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拥护者自命的人",竟然没有看出这个问题!无论那些因此而受到批判的人们觉得如何冤屈,人们有道理说:他们的政治水平的确很低。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对陶行知先生的继续推崇。陶先生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进步教育家,是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教育工作者和

---

① 《武训传》,《新民报》,1951 年 2 月 27 日。
② 《论〈武训传〉》,《北京文艺》,第 2 卷第 1 期。
③ 《光明日报》,1951 年 6 月 29 日。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 册,第 316 页。

文化工作者的一面旗帜，是教育界的“鲁迅”。他在政治上追随共产党，是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毛泽东称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1946年8月1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延安各界追悼陶先生大会上曾代表中共中央评价陶先生，说“陶行知先生的理论与教育实践……就是唤起人民自己解放自己。他把人民看做人，而不是看做奴隶与顺民。他主张人民的解放，他又相信人民的力量、人民的智慧，所以他相信人民能够解放自己。在教育事业上，他同样相信人民的力量、人民的智慧。……他主张人民自己为自己办教育，才是理想的教育。……陶先生这种教育思想，正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正是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思想”[①]。徐特立称陶先生是一个唯物主义者[②]。延安新教育学会编辑的《陶行知教育论文选集》序言，称他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思想上起了很大的革命作用”，“对中国新教育放下了一块奠基石”。各解放区都有人著书、写文章宣传陶氏的教育思想，认为陶先生不但是中国革命民主教育的开拓者、而且是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奠基者的，不乏其人。新中国成立后，人们似乎并未意识到有重新评价陶行知的必要，仍然按照这样的调子宣传和尊崇陶行知。

1949年7月30日，即陶先生逝世3周年之际，《文汇报》发表社论《纪念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赞颂这位“人民教育家的毕生事业和伟大人格”，说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实际是殖民地化的封建化的教育的否定，是为人民服务的教育的开端。这一教育路线和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新教育方针基本上有许多共同点”。“为人民服务的教育的开端”这句话，评价极端之高。著名经济学家、民盟上海主委沈志远教授撰文，不但称陶为“近代中国最伟大的一位人民教育家”，“杰出的民主战士，人民的救国领袖”，还说“作为一位

① 《悼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解放日报》，1946年8月12日。

② 《陶行知学说》，《解放日报》，1946年8月12日。

教育家，先生的理论与实践，基本上是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相一致的。从理论思想上看，首先他是一个十足的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者）的教育思想家。在先生的教育学说中，最中心最基本的思想便是为人民，与人民打成一片。他曾说：'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幸福。'这完全与为人民服务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相吻合，亦即完全与'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相吻合。先生的这种思想是很早（在留学归国后不久）就有了的"。陶氏办晓庄师范的中心原则是"亲民"与"亲物"。亲民就是接近人民，与人民为友，拜人民为师；亲物就是与实际结合，与社会结合；前者是民主主义，后者是科学思想与科学态度。沈志远先生说，陶氏把他的老师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颠倒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创导"了一次"教育思想的一大革命"。"教学做合一"的原则，"明确地表现了陶先生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思想"。"陶先生强调'做'，提倡在'劳力上劳心'的'真做'，基本上跟马列主义者强调实践的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是一致的。"[①] 在行将迈入新中国的门槛的时候，在教育界人士看来，陶行知是中国为人民的教育即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开拓者，是中国教育工作者的"伟大的导师"，他的思想即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顺理成章的是，新中国的教育要沿着陶行知开拓的道路前进。

1950 年 7 月，陶先生逝世四周年之际，上海、北京、重庆等地举行了纪念活动，《光明日报》、《文汇报》、《人民教育》等报刊继续发表文章称颂陶先生。陶氏弟子、当时在教育等部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张宗麟、方兴严、戴白韬、张劲夫等也发表文章，称颂先师。张宗麟称陶为全国教育工作者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是毛泽东给予陶先生的"无上光荣的称号"，

---

① 《追念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光明日报》，1949 年 7 月 15 日。

"万古不朽的谥封"。毛泽东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陶氏在30多年以前,即大革命以前,就提出农民教育,脱下西装赤脚下乡,与农民共同生活。新中国的工人教育是重要的,而陶氏创办的生活教育社解放前就本着陶氏的指示,在上海办了几十处工人区小和夜校。最近十多年,上海的工人教育增长了很多,领导者多是共产党员,其中很多主要工作者是受过陶先生直接或间接教育的[①]。生活教育社的负责人方兴严称"陶行知夫子是人民教育家,是民主运动的拓荒者,是人类思想的解放者,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②]。他引用陆定一在1946年的评价,强调"先生的新民主主义运动,是以教育手段来达到他的目的的。因此,先生的思想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是中国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思想,是全人类自己解放自己的教育思想。因此,先生的教育事业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事业……"[③] 方兴严当时还说过,"今后陶夫子生活教育发展的方向,是要成为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有血缘的组成部分而向前发展的,即是说要在新民主主义教育指导下,才有极其广阔的发展前途",警告他的同仁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不要"另树一帜"地求得生活教育的"发展前途"[④],但是这种声音非常微弱,完全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或者后来者用历史眼光评价陶先生,上述的评价并无不当之处。然而,这样的推崇能为执政党接受吗?陶行知既不是共产党员,更不是党的领袖,而是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杜威弟子。他读过多少马列主义的书?在根据地办过几所学校?说他是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开拓

---

① 《学习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光明日报》,1950年7月25日。
② 《配合学习文教政策学习陶夫子》,《文汇报》,1950年7月19日。
③ 《陶行知先生四周年祭》,《光明日报》,1950年7月25日。
④ 《配合学习文教政策学习陶夫子》,《文汇报》,1950年7月19日。

者、中国教育工作者的“伟大的导师”、他的思想即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欲置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于何地?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高度评价陶行知,既出于对陶氏教育思想与教育活动的进步性质的认识与肯定,更有对国统区知识分子实行统战的用意。革命胜利后,自当重新论定。可怜“思想混乱”、昧于大势的知识分子们,甚至不明白这些起码的道理,继续抱住陶行知这个偶像不放,孰料适得其反,竟使陶氏身后成为《武训传》批判运动的主要斗争对象。

3.2 批判《武训传》:第二个知识分子检讨浪潮

1951年4、5月间,《文艺报》第4卷第1期、第2期先后发表江华《建议教育界讨论〈武训传〉》、贾霁《不足为训的武训》、杨耳《试谈陶行知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邓友梅《关于武训的一些材料》,开始批评《武训传》。5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上述材料时在按语中指出,《武训传》是“歌颂清朝末年的封建统治的拥护者武训而诬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电影”。20日,《人民日报》发表主要由毛泽东写成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从中央到地方的宣传文化教育部门、大中小学校闻风而动,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就此兴起。

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批判武训和《武训传》的运动,直接原因是这部影片存在着本书已指出过的为执政党难以容忍的政治意识问题。他的目的,是要通过批判武训和在《武训传》问题上暴露出来的思想观点,向知识分子说明并使他们接受这样一个观点:中国革命的成功,中国社会的进步,决定性的因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而不是知识分子在反动统治下进行的所谓“文化教育”。这个运动也有改造知识分子的用意,并实际地发展成为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但直接目的还是推进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

也就是说，如果把它看做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它的定位在政治的层面。

人们赞颂武训，事出有因；《武训传》故事不合时宜，拍者无意。脱离了一定的历史条件，从一定的政治目的出发评判历史人物和文艺作品，就不免专断和粗暴。正如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1985年9月5日在陶行知研究会和基金会成立大会上所评价的，这个"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的批判运动，"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①]。

首先，对武训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武训是一个乞丐，因没有文化受到地主的欺压，遂发宏愿，以行乞方式，苦行终生，创办三处"义学"，收罗穷孩子读书，因而受到群众的景仰。这虽然是一件奇迹，却也是反映劳动人民的文化渴求的一件朴素的事情，大可不必上升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认识"。然而，毛泽东认为，"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②]。这就把问题提到了政治的高度。武训并没有有意识地"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也没有刻意追求"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武训聪明，但毕竟是大字不识一个的乞丐，既不懂得政治，甚至也不会讲"三纲五常"之类的大道理，他惟一的追求是让穷孩子有书念。他没有参加太平天国革命，但是，我们恐怕不能要求当时的每一个农民都

---

① 《人民日报》，1985年9月6日。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316、317页。

有觉悟、有勇气、有机会参加太平军，也不能把每一个没有参加太平军的农民都称之为不革命、反革命或改良主义者、投降主义者。用绝对的政治眼光评判一个本来非常朴素的事件和人物，就不免发生片面性的错误。

在评价武训的时候，据说使用了对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还是起阻碍作用的历史的标准。批判者说，武训教育人民去读书识字，而不是起来革命，因而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所以阻碍了社会发展，故应否定而不应歌颂。又有人说，劳动人民即使能够识字读书，还不是读封建的书，学习封建的文化？还不是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他们说："工农大众首先需要的是革命的思想和政治教育。工农的识字教育或一般文化教育必须有革命的思想和政治做内容。我们不应该因为工农需要读书识字，对于一切教育就不问其内容如何，都加以接受，尤其是不应该接受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所给的奴化教育和毒化教育。"[①] 这些观点片面之极。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民族，决不会等待马克思主义出现后才去创制文字、普及识字教育。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和老一辈革命家，年幼时如不接受"三字经"、"千字文"和四书五经等的启蒙教育，恐怕读不懂马列的书。孔子政治上主张复辟奴隶制，历代统治阶级封他为"万世师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倒退派、"反动派"，这并不妨碍共产党承认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始祖。孙中山先生在世界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中国已经有了共产党以后，仍然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奋斗，用上述"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看，也不算是革命派，他还受到国民党蒋介石的尊崇，这并不妨碍共产党尊奉孙先生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年年享受祭祀。历史唯物主义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既要看他对社会所起的作用，更要把这些人和事

① 韦悫：《对武训应有的认识》，《人民教育》，第3卷第3期，1951年7月1日出版。

放到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去理解，不能苛求于前人。否则，连识字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样简单的是非都分不清。

其次，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也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武训传》的批判者断定，《武训传》和武训精神的赞扬者不但穿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而且是进行“公开的反动宣传”。他们说“武训的改良主义——投降主义的思想，奴才根性，以及力图保存旧事物使其免于死亡的思想”“借尸还魂并不完全是迷信或神话。武训的‘事业’和‘精神’，已经因为《武训传》电影、《武训画传》、《千古奇丐》这些书籍的出现，重新向着广大人民放出无数枝毒箭。早已死去的武训，披上‘革命’‘为人民服务’的绚烂的新装，向革命的新中国来挑战了”[①]。这就把电影《武训传》和武训书籍的编著者推到了反动和反革命的地位。孙瑜在自我检讨中承认“《武训传》犯了绝大的思想上和艺术上的错误。无论编导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的实践却证明了《武训传》对观众起了模糊革命思想的反作用，是一部对于人民有害的电影”[②]。丁曼公批评他说：“作者的主观愿望不能离开他的创作的客观实践来证明，这是最起码的理论常识。”《武训传》的主题歌《武训赞》的歌词是：“大哉武训，至勇至仁。行乞兴学，苦操奇行。世风何薄，大陆日沉。谁启我愚，谁济我贫。大哉武训，至勇至仁。行乞兴学，千古一人。”丁认为在这首主题歌中，作者叹息“世风何薄，大陆日沉”，“表示了对中国人民的绝望和诅咒”[③]。经毛泽东修改的杨耳的文章《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则说：“看啊，‘世风何薄，大陆日沉！’这部影片是在一九五〇年底，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年多以后，中国人民的伟大成就已

① 杨耳：《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文汇报》，1951年6月26日、6月29日

② 《我对〈武训传〉所犯错误的初步认识》，《人民日报》，1951年5月25日。

③ 《武训的真面目》，《人民日报》，1951年5月29日。

经日益使得全世界帝国主义焦虑恐慌，日益获得全世界和平人民欢呼的时候放映的。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主题歌究竟要传达给人民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和情绪呢?!‘世风何薄’，是指的什么‘世风’，‘大陆日沉’，是指谁的大陆呢?!”① 照这样的说法，孙瑜无异于进行反动宣传的反革命。

对谈到对《武训传》和武训的片面、极端和粗暴的批判时，不应当忘记那篇《武训历史调查记》。这篇东西的炮制过程，已经清楚，恕不赘述。应当指出的是，这个由江青一手导演、由钟惦棐和袁水拍起草、经毛泽东亲笔修改的材料在新中国的史学史上开了一个先有结论、后找根据、史学为政治服务的恶劣先例。8月4日，郭沫若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读〈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无原则地吹捧这篇材料是“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的“实事求是的记载”，从政治上、人格上全面地攻击了武训。以郭沫若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修养，本不应发表这样的言论。

那些用电影、美术、文章、著作来宣传和赞扬武训的人，本来以为自己做的是一件好事，没料到会招致如此严厉的批评和暴风骤雨般的批判，无论理解与否，情愿与否，只好检讨，别无他途。当时检讨的知识分子，主要是四种人。

第一种是《武训传》的编导、主要演职人员和《武训画传》的作者。5月26日，孙瑜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约200字的检讨。他只承认客观上犯错误，不承认主观上进行反动宣传，因而又受到激烈的批评。受到袁水拍等人的激烈批评。5月31日，李士钊教授发表题为《我初步认识了崇拜与宣扬武训的错误》，表示“检讨过去在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下，我们为了进行争民主要自由的民主斗争，曾采用了‘武训’的名字作为表面上的借托”，承认“主要犯了教育上狭隘的宗派主义与狭隘的爱国思想的错误”。《人民日报》、《光明

① 《文汇报》，1951年5月26日。

日报》连续发表数文，批驳李先生的检讨。其中张再学的文章《好名词掩盖下的坏思想——评〈武训画传〉及李士钊先生的检讨》，指责李先生的检讨“没有联系到他长期有计划地宣传武训思想中的具体言论，没有接触到他在这些言论中所贯穿的思想本质”。“以好名词掩盖坏思想，以一切革命词句来装饰反动的内容，这就是《武训画传》、电影《武训传》以及当前其他的‘进步的’武训崇拜者们的苦心宣传的特色。”[①] 漫画大师华君武和著名美学理论家王朝闻先生也对李士钊痛加批判。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了武训的表演者赵丹，说他在表演艺术上有“严重的思想混乱”。赵丹作了检查。支持这部电影拍摄的上海文化部门负责人夏衍、于伶、陆万美等人也作了检查。

第二种人是新中国成立后称颂过武训或《武训传》的人。如戴白韬、端木蕻良、金紫光、李长之等人。他们尽量按照批判者的口径认识问题，却仍然受到“态度不认真”、“不深刻”、“缺乏起码的自我批评精神”等指责。戴白韬承认“歌颂武训是原则性的错误”，他犯这样的“错误”是因为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研究武训，“作了思想的懒汉”，加上小资产阶级出身，因而用片面的、孤立的、形式主义的、唯心论的观点看问题，以后要认识教育的阶级性和为政治服务的属性[②]。董渭川先生的两次检讨非常“深刻”，受到钱俊瑞的“表扬”。这位从事普及教育30年的进步教授，彻底否定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他说，自己之所以在解放后继续歌颂武训，是因为自己的全部思想本来就是建筑在改良主义之上的，并长期信奉“教育万能论”，“进步”成了阻碍自己学习的包袱。他说：“我如果没有写那篇东西（即《从教育观点评武训传》——于风政注），在批判武训的这一运动中，虽然也在无形

① 《人民日报》，1951年6月1日。

② 《歌颂武训是原则性的错误》，《文汇报》，1951年6月2日。

中挨到皮鞭，却不会感到如此火热的疼痛，更不会在下雨刮风的时候，抚摸一下这条伤痕。”[1]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位前辈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很容易“健忘”。他没有记住在“下雨刮风”时抚摸这条伤痕，因而铸就了后来被打成“右派分子”并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身亡的悲惨命运。

第三种是新中国成立前歌颂过武训的人。郭沫若先生是一位。1951 年 6 月 7 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讨》的短文，对他 1943 年在陶行知先生主持的一个纪念武训的会上“盲目地称赞”武训和为李士钊《武训画传》题词作了检讨。8 月 4 日，他在赞颂《武训历史调查记》的文章中又一次检讨了“曾经附和过”歌颂武训的错误。6 月 9 日，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在《人民日报》发表《试拿一枝尺子来量武训的为人》的文章，对他 1945 年 12 月在《大公报》上发表赞扬武训的文章表示检讨。马叙伦先生检讨说，自己过去颂扬武训的第一个原因是，“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有很容易从单纯的‘教育本位’出发，认为‘兴学’总是好的，武训‘行乞办学’尤其难得。值得加以表扬。特别是在反动政府统治之下，教育经费异常困难的时候，许多坚持教育工作岗位和关心教育事业的人，幻想着有更多的人来‘捐赀兴学’，表扬武训，正含有‘劝导’的作用在内”。第二个原因是他曾进过武训式的义塾——杭州的宗文义塾。他说：“我那时正因为没有钱念书而失学，有了这个义塾才又能够念起书来，所以一提到武训‘行乞办学’，我就联想到那个‘宗文义塾’而容易起同情之感。”这个义塾已办了一百来年，出过不少的秀才、举人、进士、翰林，还有一个探花。宗文义塾的学生只有他和杨文栋没有毕业就参加了辛亥革命。要是毕业了，一定能够在清朝取得一官半职，更

---

[1] 《错误在于我的教育观点》，《光明日报》，1951 年 6 月 27 日。

加"发达",一定是不会革命了[①]。方兴严在1934年、1942年写过两篇歌颂武训的文章。他说,他看到《人民日报》5月20日的社论后,"即想写一篇自我检讨的文字,来向人民忏悔,承认自己的错误,好改过自新"。他说当时写那两篇文章不过是"借题发挥",但又痛骂自己"白昼开着眼睛在说梦话","罪孽深重的说法,不可饶恕的错误"[②]。众所周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以陶行知先生为代表的进步教育文化工作者"歌颂"武训,是以武训为借托、为旗号,意在鼓励人们在困难中坚守进步教育的阵地,也是激发人们对反动派的韧性战斗精神。可悲的是,除李士钊先生等极个别的人以外,当年的斗士们宁愿否定自己、否定别人,却不敢说明那年代并不久远的历史真相。

第四种是文艺界的领导人。毛泽东在批评《武训传》的同时,对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认为"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质问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③] 面对如此严厉的批评,文化界领导层自然只有检讨的份儿。8月26日,对《武训传》的摄制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夏衍在《人民日报》发表《从〈武训传〉的批判检讨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他接受毛泽东的批评,承认这一事件"暴露了我们的思想工作薄弱的严重程度,暴露了我们不能坚决地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不善于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对一切不利于人民事业、有害于革命的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承认上海文艺工作者还没有能很好地掌握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武器,"在他们的认识与实践上,和工农兵群众还有着很大的距离";承认在上海文艺工作

① 《我过去表扬过"武训"的自我检讨》,《人民教育》,第3卷第3期。

② 《"借题发挥"所造成的坏影响》,《光明日报》,1951年6月6日。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317页。

中，除了《武训传》之外，还产生了许多以小资产阶级乃至资产阶级的观点立场来描写工农兵的作品，这与领导工作中的立场不明确、爱憎不分明，没有给文艺工作者以正确的思想帮助有很大关系。周扬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发表讲话时说："关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论战暴露了我们在思想工作和文艺工作上的一种严重状态，就是我们同志在新的环境下政治上思想上变得麻痹起来，开始失去一个共产党员所应有的思想上的锐敏，失去对敌对的和错误的思想的辨别与批判的能力。这种状态是和我们许多文艺工作者中间所存在的自由主义作风有关系的。"[①] 毛泽东对文艺领导工作的批评和文艺界领导人政治认识的"提高"，成为推动文艺工作中"左"的偏向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动因。

以上四类人的检讨，除了最后一类人以外，很难说这些检讨都是诚恳的、发自内心的。孙瑜、李士钊的检讨"糟得很"，这不用说。即使郭沫若、黄炎培、马叙伦这样的人，是不是一经领袖"点拨"，立时顿悟，"觉今是而昨非"，也是大可怀疑的。

批判武训和《武训传》的运动只持续了3个月，发表文章80余篇，但是涉及问题的范围和人群的范围十分广泛。整个文化界、教育界和文化教育行政机关都卷入了这场运动。平原省文教部门和东北、重庆的一些学校，由于态度消极而受到严厉批评或处理。毛泽东亲自批准拆毁纪念武训的建筑物、碑石，涂抹武训画像，更改以武训命名的学校的校名。武训的形象从此消失，武训的事迹不再被人提起。

3.3 第一个偶像的破碎：对陶行知及"生活教育"的批判

批判武训和《武训传》的运动，必然涉及陶行知，这不但因为

① 《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文艺报》，第4卷第5期。

《武训传》的出现受到过陶先生的直接影响，更因为他在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教育界带头倡导"武训精神"，三十年如一日献身于人民教育而被誉为"活武训"，是欧美留学生的杰出代表，是旧中国教育工作者的偶像。不打碎这尊偶像，就不能树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教育界的权威。同样重要的是，陶氏教育思想中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和主体人格精神，在本质上同新中国所要建立的以整体主义为特征的苏式教育相冲突。因此，在批判《武训传》运动基本结束后，批陶运动不但没有结束，反而逐渐形成了高潮。

最初批判《武训传》的时候，由于陶先生的历史地位、社会影响和毛泽东等人曾经给予他的评价，人们在是否批陶的问题上心存犹豫或略感尴尬。最早的有影响的文章——《文艺报》第 4 卷第 1 期发表的贾霁《不足为训的武训》，在涉及陶先生的时候，是为其开脱的。他说："至于说到陶行知先生为什么表扬过武训，那是因为武训处在当时的环境中，与'一无钱，二无靠山，三无学校教育'等等条件下，而能够三十年如一日地进行为谋取穷孩子识字而坚持的精神是很好的。而这，与陶行知先生当时所处的环境与条件有着极有意义的联系。那时候，国民党万恶统治下的白色恐怖的环境与条件，对于人民教育家的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是百般的破坏和阻挠；这样，提出武训精神来，有着积极的作用。陶行知先生当时是对的，他的苦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一观点受到杨耳的批评。他认为，即使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环境中，陶行知对武训的表扬也是消极的、错误的。他说："如果，我们认为在当时可以表扬'武训精神'，象贾霁同志所说，'陶行知先生当时是对的，他的苦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么，为什么鲁迅先生在同一时代却对于宣扬武训精神的'大朋友'给以无情的讽刺呢？""在某种意义上说，在人民尚被压迫的反动统治下宣扬'武训精神'，比起今天人民在取得了政权之后宣扬'武训精神'，它的为害决不可能更小些。相反，倒不如说是更大些。因为，在昨天，

在反动统治下面，宣扬‘武训精神’就会更直接地‘降低与腐蚀群众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战斗力’。那不更加是完全不应该的吗?”[①] 毛泽东赞同杨耳的观点，支持对陶行知的批判，因为5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的第一句话就提到了杨耳的这篇文章。

在领导层的引导下，大批判的矛头直指陶行知。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丁曼公的文章，称陶先生是把武训当老师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②]。6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罗慕法的文章《我不同意李士钊先生的检讨》，说陶先生宣扬“武训精神”，不论主观愿望如何，“那种精神却做了反动精神的俘虏，那种行动却做了反动统治者的义务宣传员，严格一点说，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做了反动统治者的‘帮闲”甚至‘帮凶’了”。7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范文澜先生的文章《武训是个什么人? 为什么有人歌颂武训?》，他说，歌颂武训的人中，有一类人是为“募款”办学——这一类人中，有些是教育界改良主义人士，自以为“教育”可以“救国”，在反动统治时期，募款办学，困难很多，当伸手要钱以前，不免低声下气向大腹便便者说许多好话，因此借武训“行乞”来比自己的募款，借武训“兴学”来比自己的“救国”。捧武训就是捧自己，至少是给自己解嘲打气。还有一些进步教育家，被武训为“穷孩子办义学”的把戏所迷惑，更要高捧武训用来比自己在办进步教育。这种言论，已经接近于公开的人身攻击了。

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韦嘉的文章《“以武训为借托”的是什么人?》。这篇文章在批判李士钊的检讨时说，当年陶先生和进步知识分子们的所谓“争民主”，充其量也不过是“向反动政权要民主”。“但是，世界上从来的人民民主，都是经过革命斗争，都是无数革命者的热血头颅换来的。那些改良主义者‘如火如荼的政

① 《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文艺报》，第4卷第2期。
② 《武训的真面目》，《人民日报》，1951年5月29日。

治性很强烈的斗争'，究竟能从反动统治者手里要来多少民主呢？就算是当时蒋匪给'借托'武训的人们以一些'美式民主'，这又与中国广大劳动群众何干？"这就不但否定了陶先生，而且完全抹杀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国统区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革命群众的反蒋斗争。

郭沫若在《读〈武训历史调查记〉》中说，陶先生生前"犯了很大的错误"，"有好些武训的歌颂者和崇拜者，事实上是受了陶行知表扬武训的影响而盲目附和的"。"不仅武训不足为训，就是陶行知的表扬武训也同样不足为训，我们今天是决不能'为贤者讳'了。""陶先生的错误是在不曾从本质上去看武训，不曾把武训的行为和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等革命运动联系起来看，他的表扬可以说为盲目的表扬，也可以说是受了武训和历来反动派的欺骗。"

从极端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完全脱离特定的历史环境，不讲主观动机与实际效果，来评说陶先生倡导武训精神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进而在政治上把陶先生从一个坚定的革命家贬低为不革命的改良主义者，甚至攻击和否定他的伟大人格，这是批判武训和《武训传》的自然结果。尽管批判者惧于陶先生在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中间的巨大影响，一再声称和辩白他们并不否认陶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家"，更无意贬损他的人格，而最高党报的文字传达的却正是这样的信息。

然而，陶行知是改良主义者还是革命者，这对新中国并不重要。说陶是改良主义者，充其量是使他的头上少一些神圣的光环，使引他为"导师"的那班"进步教授"们失去"炫耀"、自立以及同共产党分庭抗礼的资本。对新中国更有意义的是，陶氏被人们视为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开拓者，陶氏的教育思想因曾被共产党正式肯定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而发生着重要的影响，这对确立毛泽东的教育思想的绝对指导地位极为不利。所以，对陶行知的批判，重点必然是对其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批判。

批判陶氏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是批判《武训传》运动发起不久即已提出的问题。《人民教育》杂志成为主要的批陶阵地。1951年7月1日出版的《人民教育》，第3卷第3期发表一组文教界名人的笔谈，很多即已涉及这个问题。孙起孟在《一项建议》中说，批判《武训传》是1951年具有“头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情”，“在这一波澜壮阔的思想运动中”，“我提议大家协力来做一项工作：根据讨论《武训传》的所得，检查、研究、批判曾经和现在还在中国教育界发生一定影响的教育思想”。徐特立的文章《〈武训传〉的讨论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说，“死武训只有一个，而同情苦行的活武训是数量太大了。因此，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批评教育新武训”。张健在题为《所谓‘三无’‘四有’》的文章中提出，要“系统的研究与批评”陶氏教育思想。柳湜在《这是一个起点》中提出：“《武训传》底讨论是澄清教育思想上混乱的一个起点。”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教育理论工作存在三大缺点，一是“没有认真地宣传、阐述毛泽东同志的教育思想。……这就使得很多人不能从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中解放出来”；二是“没有认真地总结从大革命时代起到全国解放止，这二十多年中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领导下新民主主义教育，由发生到成长这一实践过程的经验，甚至没有将这一段史实，加以搜集整理，供全国教育工作者研究，以此事实，去击破教育思想中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响”；三是“对旧中国教育思想的批判，做得太少，更不用说广泛地在教育工作者中间开展了”。这些缺点，“造成了使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思想，在教育工作中有了市场，这就是今天思想上混乱的根本原因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因此，要“系统地批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各派的教育思想，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影响，以及研究与批评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等”。这就把批判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意图说得很明白了。

对陶氏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批判，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是陶氏教育思想与杜威教育学说的关系，二是陶氏教育思想的阶级

性质，三是陶氏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历史作用。在这些问题上，都存在着尖锐的不同意见。讨论表面上是自由的，实际上其基调和主调，是彻底否定陶氏的。

作为杜威的学生，陶氏的教育思想与杜威教育学说有着师承的渊源关系。杜氏的教育名言是“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陶氏把老师的理论翻了一个身，改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主张以“教学做合一”为中心原则，人称“生活教育”理论。怎样认识陶氏教育思想与杜威教育学说的关系，在批陶运动中，大致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陶氏的生活教育理论，完全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翻版。这种观点以陶氏的两位高足戴白韬、董纯才为代表。戴氏说：“陶先生的教育思想倒的确是源导于杜威的思想，基本上是杜威的思想，他提倡生活即教育，要拜儿童为师，把教师降为指导员，强调做等等，是与杜威的实用主义一脉相承的。”[①]董氏说：“陶先生所提倡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一套生活教育理论，就是他老师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在做上学’这套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花样翻新。”[②]

第二种观点认为，陶氏的生活教育理论“不是杜威学说的简单的翻版，而是杜威学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的具体运用和新的发展”；陶氏花样常变，其“中心思想——要在旧社会制度下，以调和阶级关系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是没有变的”[③]。

第三种观点断定陶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的公式，是一个“片面的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公式，这个经验主义的公式，使陶先生

① 《对陶行知教育思想认识的初步检讨》，《人民教育》，第3卷第6期。
② 《我对陶行知先生及生活教育的认识》，《人民教育》，第3卷第6期。
③ 潘开沛：《陶行知教育思想中几个问题的商榷》，《人民教育》，第4卷第2期。

不能正确地认识科学理论的重要，不能正确地认识政治、经济对于教育的决定作用和经济、政治的革命对于教育改革的决定作用"①。这第三种观点实际上是赞同前两种观点的，由于它出自权威之口，所以似有必要单独把它列出来。

陶氏的教育思想，究竟是哪个阶级的教育思想，同样是众说纷纭。钱俊瑞说它"基本上还是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直到陶先生临终时，他的教育思想还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教育思想，而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在他的教育思想和马列主义的、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之间还存在着原则的差别。""陶先生直到一生的最后期，还没有撇开乌托邦式的'新村'，而还在提倡'实施生活教育'(不是实施土地改革，推翻封建阶级的统治——钱)，以期创造'新乡村'的改良主义。"② 戴白韬认为，从陶氏"三十年来的言行看来，他的教育思想一直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③。董纯才同样认为"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则是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教育思想"④。潘开沛则认为陶氏教育思想是资产阶级的而不是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他依据陶行知先生"教育活动的经济依靠(即阶级依靠)、教育思想和他最后对民主政治的看法"，认为陶氏"三十五年来，最主要的经济依靠(阶级关系)是资本家、反动政府、国民党内的反对派"。"他的教育思想，从始到终基本上都是贯穿着杜威的学说和阶级调和以及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只是后期在阶级调和方面有所转变罢了。"因此，陶氏思想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⑤。

无论对于陶氏教育思想的阶级属性持哪一种观点，有一点是

---

① 钱俊瑞：《从讨论武训问题我们学到些什么》，《人民教育》，第3卷第5期。
② 钱俊瑞：《从讨论武训问题我们学到些什么》，《人民教育》，第3卷第5期。
③ 《对陶行知教育思想认识的初步检讨》，《人民教育》，第3卷第6期。
④ 《我对陶行知先生及生活教育的认识》，《人民教育》，第3卷第6期。
⑤ 潘开沛：《陶行知教育思想中几个问题的商榷》，《人民教育》，第4卷第2期。

共同的，这就是所有的人都一致否定陶氏思想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否定陶氏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教育即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教育的奠基者。那些过去公开宣传过这种思想的人，都作了检讨。董纯才说：

> 中国新教育的奠基石，不是别的，而是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和中国解放区人民教育的实践。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是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社会实际情况与总结中国革命教育实践而创立的教育理论。它是无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学说，是新中国教育建设的唯一正确的指南针。而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则是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教育思想，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思想，不是毛主席的教育思想[1]。

陶氏弟子张健检讨说，他过去"把代表小资产阶级的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和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实质上是真正代表着全中国人民）的毛泽东教育思想混为一谈"是"友我不分的原则错误"。"这种非科学的态度，正说明我的马列主义水平异常之低，同时，也还受着传统的师生关系的影响，没有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来正确对待我们的友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中国人民教育事业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不是陶行知先生经验主义的生活教育学说。"[2]

陶先生为建立面向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教育奋斗了30年，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起了怎样的作用，这原本是朗若白昼无须评

① 《我对陶行知先生及生活教育的认识》，《人民教育》，第3卷第6期。

② 《重新认识陶行知先生的生平和事业》，《人民教育》，第4卷第1期。

说的事情，在批陶运动中也受到了否定。按照当时人们的推理，陶氏的教育思想既然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理论，他的教育实践，无论是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救国教育、国难教育、普及教育、民众教育、职业教育等，都是花样翻新的改良主义货色；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的时期，改良主义正是反革命的帮凶或帮手。

董纯才说陶氏政治上革命，教育上不革命，并把这种不统一看做小资产阶级两重性的表现。教育部处长潘开沛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把政治和教育分离的看法是不妥当的”。陶先生自“一二·九”运动到死为止，“在抗日战争中和民主斗争中，基本上是进步的、革命的，合乎当时的历史发展要求的，我们不能将他政治上的表现和教育上的表现截然分开。但我们同时又必须明确地指出：陶行知只是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同路人，只是无产阶级的朋友，而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无论他在政治上或教育上所表现的进步与革命，都是属于自由资产阶级的”[①]。说陶氏不但政治上革命，教育思想也有进步的一面，与董纯才的观点相比，似乎对陶氏评价要高一些，但把陶氏的政治态度与教育思想都归结为“自由资产阶级”，实际是对陶氏更加全面的否定。

钱俊瑞在陶氏逝世时曾写过一篇题为《一代巨人陶行知》的文章，肯定陶氏已经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现在他公开声明收回自己的观点，改称陶氏为“革命民主派和民主教育家”，更对陶先生的教育实践提出了一个荒谬绝伦的诘难。他说：

> 人们有权利发问道：为什么陶先生不放眼看看在当时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里面，因为人民已经取得了政权，人民教育事业就那样蓬蓬勃勃地开展呢？为什么陶先生不集中力量搞革

① 潘开沛：《陶行知教育思想中几个问题的商榷》，《人民教育》，第4卷第2期。

> 命，而偏偏要化这样多的精力在国民党地区办些显然无法开展的“育才学校”之类的教育事业，甚至最后，日暮途穷，会找到武训这样一块朽木来作自己的招牌呢[①]？

按照钱氏的观点，革命的、进步的人们完全没有必要与国民党争取文化教育权，国民党统治区的一切文化教育尽可以完全交给国民党去办，企图在这些领域中拆毁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用民主的教育、进步的文化启发青年和人民的人，不是愚蠢，就是不革命了。身为全国教育行政机关的最高官员，言论如此荒谬，可见形而上学与强词夺理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还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就对陶先生的理论、实践及其历史地位做了实事求是的、因而赢得了社会各界广泛认同的评价。陶行知是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文化教育界的旗帜，是进步的欧美留学生和高级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建立，为在中国开创面向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新民主主义教育，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不顾这些基本事实，粗暴、无理地否定这样一位伟大人物和他的思想，固然打碎了知识分子的偶像，扫除了确立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地位、建立苏式教育体制的障碍，但是，它对知识分子和中国教育事业的损害、对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中的形象的损害，也是无可估量的。

3.4 微弱的正义之声：为陶行知先生辩护的人们

批判《武训传》运动是领袖发动的，批判陶行知得到了领袖的支持和默许。宣传和赞扬武训即是“反动宣传”，肯定陶氏教育思想即是反对以毛泽东教育思想为新中国教育的指导思想。问题上

① 钱俊瑞：《从讨论武训问题我们学到些什么》，《人民教育》，第3卷第5期

升到如此高度,政治压力之大,空气之紧张,可以想见。重庆育才学校校长孙铭勋是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1948年临危受命主持育才学校,因新中国成立后坚持陶氏办学思想,对批判武训和《武训传》态度消极而受到公开批判。柳湜认为,孙铭勋的思想中"明显地包括了一部分'育才'的传统,或从那传统中发展起来的",他是"当前中国教育改革中右翼的代表,代表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在争取人民教育事业的领导"①。孙铭勋被停职反省,受到残酷迫害。尽管政治压力非常之大,还是有人为陶先生辩护,用微弱的正义之声,为知识分子保存了一点体面。

最早为陶氏辩护的是李士钊教授。李先生作为《武训画传》的作者,是这次运动的主要批判对象之一。在众口一词地不讲具体的历史条件否定陶行知宣传武训精神的动机与效果的时候,李先生在他的检讨中说:

> 我回忆陶行知先生在一九四三年中国人民抗日斗争最艰苦的阶段,他为了鼓励大家坚决的在反动统治下,坚持民主教育运动的斗争,而提出"新武训运动"口号的苦心,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有积极作用的。譬如陶行知先生在重庆举办"纪念武训"的大会,形式上虽说是"纪念武训",而实质上却是一个如火如荼的政治性很强烈的斗争。

李先生认为,电影上那些虚构的不合理的故事,确是污蔑了中国的农民革命,污蔑了中国民族和中国历史,这些在陶先生生前是绝没有想到的。"我肯定凡是因为受陶先生提倡'武训精神'的熏陶而崇拜武训的人,都有其积极性,因为陶先生提倡'教育为人民'和'文化为公'。看过电影上的武训的人,一定造成他的混乱思想。

① 《略论对孙铭勋错误思想的批判》,《人民教育》,1952年2月号。

这个责任在电影，而不能归之于陶先生。”① 李先生坚持他的观点，不作进一步的检讨。这位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的老教授，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此而被迫害致死。

陶先生当年的民盟战友，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部长、民盟西南总支部主任委员的楚图南先生，为陶先生作了坚定的辩护。在说陶行知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甚嚣尘上的批判声中，楚图南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论“武训精神”的反动本质》一文，旗帜鲜明地指出：“陶行知先生一生的政治思想与教育事业是革命的，是进步的，是有着辉煌的成绩的。”他举出两件事情证明“陶行知先生的思想和行动，从本质上，从方向上或道路上都绝没有与所谓‘武训精神’有丝毫相同的地方”。一件是陶先生在民盟内部最早反对“中间路线”或“第三条路线”，坚决主张民盟跟共产党走，在民盟中起着“先知先觉者的作用，主导的作用，和进步的作用”。一件是陶先生抗战困难时期办育才学校的事情，述说了陶先生对在战乱中失去家庭的难童的极大同情。楚先生认为：

> 陶行知先生一样在困苦艰难的条件下办学校，但他的认识，他的精神，他的做法，以至于他在教材的应用和思想的领导各方面，都绝没有与“武训精神”有着任何相同的地方。就整个陶行知的政治思想、教育事业和革命生活来说，也与所谓“武训精神”是极端不同的两回事情。因为陶行知先生是革命的、进步的、立场坚定明确的。“武训精神”却是落后的、反动的、投降的。……一个进步的思想家和一个忠诚的革命工作者，最可宝贵的精神之一，乃是热爱真理，追求真理和服从真理。陶行知先生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参天的大树虽然有几片虫蛀的叶子，但仍然无碍这棵大树的枝叶婆娑，苍绿可

① 《我初步认识了崇拜与宣扬武训的错误》，《人民日报》，1951 年 5 月 31 日。

爱。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和思想是不断地发展,不断地进步的。

楚先生指出,陶氏是高级知识分子,受过资本主义教育,是杜威的信徒,但后来他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走进了人民的革命队伍。"陶行知先生是一个思想家,是一个革命家,但缺少严格的革命思想的锻炼,缺少严格的革命的组织生活的锻炼,所以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看法和想法,偶然有着不正确的认识,这是很可以理解的。""他的思想多少还有一些旧社会的残余,还不能蜕化尽净,对于特定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历史观点和阶级观点还不够明确,这是可能的,而事实也正是如此。"① 楚先生的观点是民盟人士中有代表性的观点。批判陶行知对民盟代表的高级知识分子造成了直接的伤害,因为从政治上否定陶行知,无异于否定民盟和各民主党派所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

为陶氏教育思想辩护最力的,还有张凌光先生。他在《人民教育》1952 年 1 月号发表《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文章,明确反对董纯才提出的陶先生的教育思想是杜威学说的"翻版"与"花样翻新"等观点。他说,陶先生的思想有不少地方是受杜威的影响,但是,"陶先生的阶级意识主观愿望与杜威不同,陶先生所处的中国社会背景和美国不同,因而他们的教育思想,还是不同"。陶氏事业的前半段是和杜威思想很接近的,1933 年开始有新的认识,抗战前后已有很大转变。张凌光说:

> 他把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倒转过来,并非只是翻花样,而是有他的社会背景,有他的实际意义。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学校教育,更脱离实用,更带着欺骗性、粉饰性;这不象二十世纪初期美国社会生活和教育基本上还是统一

① 《关于陶行知先生赞扬武训的看法》,《光明日报》,1951 年 7 月 15 日。

的，旧中国学校教育和社会生活虽不是没有一致的地方，但矛盾很深。学校里书本子上所教的是一套，社会上所需要的家庭里所要求的是另一套，当这二者有矛盾的时候，学生发展的方向到底服从谁呢？主要是服从社会生活的需要，社会实际生活常常比学校书本子对人更有教育的力量。所谓"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一真理，陶先生是看到了一部分。正是由于中国这样的社会存在再加上马列主义，才教育许多人走上革命的道路。陶先生的大缺点，在忽视系统的革命理论。他虽不够辩证唯物论，但他重视社会生活，重视大众生活，强调"要想受什么教育，必须过什么生活"，"要受革命教育必须过革命生活"，强调"用前进的生活引导落后的生活"，这都是进步的，这是有若干朴素唯物论。他反对死读书，提倡社会即学校，这和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读书救国论，正是针锋相对的。那时反动派总想把学生关在学校里，只是埋头读书，不要了解社会现实问题，不要过问国家大事，更不要作社会运动，这才好让他们反动派安安稳稳地统治下去。陶先生要学生从社会生活中受教育，要学生冲出学校围墙进行救国活动。例如受陶先生感召的新安旅行团，在宣传救国上，曾起过相当的作用。陶先生的理论，和当时进步学生的爱国活动有配合作用。当国家那样危难的时候，只在反动统治的学校里埋头读书，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学一套反动的思想体系，对于人民是不利的；参加救国会以后陶先生所提倡的这些办法，对于当时的国家人民有利，在当时是有进步作用。至于他忽视革命的系统理论，那是进步中的不足。他比杜威只为资本家培养雇员，那是大不相同。

张凌光从陶先生所处的与杜威不同的历史环境，正确地解释了陶氏教育思想与杜威的区别，肯定了陶氏教育思想的革命性与

进步性，是非常有力的。

张凌光和方兴严还批驳了董纯才认为陶先生“政治上革命，教育上不革命”的观点。张凌光说，陶先生是进步的小资产阶级，“到了改良主义行不通，工学团也做不了中国的救命圈，就一天天倾向革命，一天天更加接近共产党，所谓生活教育，也就一天天增加新的内容”。参加救国会后，“反对小众宰割大众的教育，认为教育是民族解放人类解放的武器，因而在教育上也有若干革命性——一个人的政治思想和他的教育思想，不可能截然分开——一方而革命一方而不革命”[①]。方兴严在《人民教育》1952年7月号发表《再认识陶行知先生教育学说并批判自己》一文中说：“陶行知先生的教育学说，即生活教育的学说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影响能够风行一时呢？有什么力量支持着他的进步呢?”就是陶先生所处的时代，即帝国主义勾结国内反动派造成大乱，有亡国危险的时代决定的，同时也由于陶先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爱国知识分子，对于国事有敏锐和正义的感觉”，因而在政治上逐步接近共产党，到了晚年，就坚决跟着共产党走，“所以他的生活教育主张随着时代而有了某些新的内容，配合着中国革命的需要，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曾发挥一定的作用”。方兴严回顾陶先生自创办晓庄师范学校以后的教育思想发展，论证了陶氏不但政治上是革命的，而且教育思想也是不断前进的、进步的。

在批陶运动中，有人以陶氏的教育经费来源为依据，论证陶氏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潘开沛等更认为陶氏从反动派那里取得津贴，实际上是反动派的帮手。方兴严痛斥了这种说法。他说：

> 有人说陶行知先生办教育能获得资产阶级的经费帮助，他办的就是资产阶级的教育。我以为这样的看法是不恰当

① 《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人民教育》，1952年1月号，第13页。

的。我和他相处最久,也曾和他商讨过这个问题。他说:"钱是社会的。我从开明的士绅和资本家手里取回了社会的钱来为社会办教育事业,我认为是可以的。但是我从他们那里取回来的钱,决不接受他们的任何条件。有条件的钱,我决不接受。"陶先生确是坚守他这一原则的。从他办的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自然学园,一直到育才学校的二十年间,都是用这个原则来接受劝募捐款的。在他学校里绝大多数是劳苦大众的子女和抗日战争中的难童。陶先生则是全心全意为这些穷孩子服务至死不变的。……陶先生也从没有对青年讲过一次赞扬资产阶级的话,反之,他是痛恶人剥削人的制度的。……这些都是事实,我只想把事实来还陶行知先生的本来面目。从这些事实,也可见他和资产阶级不同,他反对剥削,具有小资产阶级的正义感;也可见他和无产阶级不同,他没有阶级觉悟。从陶先生和共产党的关系来看,也可见他和资产阶级不同,没有任何资产阶级能象他那样紧靠共产党信任共产党。他自办晓庄师范起,就日益倚靠共产党,把他所办的教育事业交给共产党人负责①。

批判陶行知的人们认为,陶氏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张凌光却认为,陶氏的生活教育理论"有若干朴素唯物论"。陶氏弟子、曾任生活教育社负责人的刘季平在《人民教育》第4卷第1期发表《略论陶行知先生的哲学观点》,这是一篇较早的关于陶氏哲学思想的专论。他承认陶先生教育思想的基础来自杜威的实用主义,"陶行知先生的哲学观点,以至他由此而引伸出来的教育思想,都不仅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而且是反马列主义的",但是,

① 《再认识陶行知先生教育学说并批判自己》,《人民教育》,1952年7月号。

> 他接受实用主义是在美国留学的时期;开始运用实用主义是在旧民主思想占优势的时期。但他接受实用主义不是为了美国资产阶级的需要;他运用实用主义也不是为了实现美国资产阶级的卑鄙目的,而是为了实现他自己的空想的社会改良主义。这就是他和美国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最基本的区别,也是他一开始就不同于中国另一些极端反动的实用主义者的重要特点。
>
> 因为有这样一个重大特点,所以他在实用主义的具体运用中,也就与美国资产阶级处处想要束缚人民思想的反动态度不同;而是一步比一步高地想要鼓励人民的"实干精神"和"创造力"。因而在认识问题上也就不是故意单纯地强调经验主义,而是不懂得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不懂得教育上的这种经验主义的危害性。
>
> 因为有这样一个重大特点,所以他在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浪潮中,也就有了可能逐渐从政治上的改良派走向革命派,积极参加了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斗争运动。因而,他的生活教育运动也就能够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并在反对国民党教育方面暂时起了一定的作用。

这就是说,同样是哲学上的实用主义,由于中国和美国情况不同,更由于陶先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美国是起反动作用的哲学思想,陶先生把它运用于中国却起了进步的作用。这种辩护也许不是十分有力,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实属不易。

3.5 党性与道德的冲突:批陶运动中的陶氏弟子们

回顾当年对陶氏的批判,关注一下陶氏弟子们在这场运动中的表现,也许对于理解新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不无益处。今天我们很难搜集到能够全面反映当时陶氏弟子的真实思想与反应的材料。那些在大批判形势下公开发表的文章,总要经过修饰的。我们不想、也没有必要从政治品格、伦理道德的角度对陶氏弟子在这场运动中的表现作出或好或坏的断语。我们之所以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们的表现是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批判运动中的反应的一部分,从中可以窥见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的精神与人格的消解作用。

陶氏献身教育几十年,桃李满天下。他长期从事进步教育,九一八后追随共产党,同共产党建立了密切联系。他办的教育事业,如晓庄师范、育才学校等,都由共产党员主持。他的弟子中进步人士多,共产党员多,有些人进入根据地、解放区从事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担负重要领导职务,如董纯才曾担任教育部副部长,戴白韬新中国成立初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张宗麟、方兴严曾任教育部司长,还有张劲夫、刘季平、程今吾等一批有影响的人物。陶氏在培养青年、奖掖后进方面,有如鲁迅。他为中国革命、中国的教育事业乃至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陶氏弟子追随陶氏,无论时间长短,造诣深浅,总是比一般人更加熟悉陶氏的教育思想,了解他的进步教育活动和抗日反蒋的政治活动,了解陶氏的学识和人品。他们之中有人早已是共产党员,那时并不觉得自己与陶氏有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距离。他们曾追随陶氏倡导“武训精神”,也曾撰文宣传和赞颂陶氏的教育思想和革命活动。新中国成立后这批人多在教育部门工作。《光明日报》的一篇报道说:“关于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由过去‘生活教

育社'几位负责同志的自我批评开始。"[①] 这种说法并不确切。但批判《武训传》必然牵涉到陶行知,陶氏弟子必须首先表态,是没有疑问的。他们之中几乎所有有影响的人物都作了公开检讨,检讨追随陶氏颂扬武训的错误,检讨"无原则"地颂扬陶氏教育思想的错误,检查自己所受的陶氏"改良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有些人因为检讨不深刻而受到批判。他们在检讨自己的同时也都批判了自己的老师。他们的检讨和态度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大的差别。

相同之处的第一点是,他们之中几乎没有人像李士钊、楚图南先生那样,敢于顶住政治压力,理直气壮地公开为陶先生颂扬武训的做法辩护。他们的检讨文章涉及这一问题时,几乎都承认或"基本同意"杨耳文章的观点。方兴严是一个例外。他在运动发起后不久写的一篇检讨文章中说:"既然有人提到了陶先生提倡'新武训——集体武训'运动的是非功过,我是参加这运动的一员,我有义务向大家作公开的检讨。""陶先生虽然在他的晚年曾提倡过'新武训——集体武训'运动,但他的教育主张没有教人跪下去,是教人站起来,教人抵抗侵略。"方氏这段话不无感情色彩,对杨耳观点的不满跃然于纸上。然而,他还是不得不承认:"陶先生的'新武训——集体武训',使武训这一影响的扩大,给武训崇拜者和武训的拥护者的振振有词的来撒播毒素,陶先生和我的确难以辞其咎。"[②]

相同之处的第二点是,他们都异口同声地检讨了自己过去把陶氏的教育思想说成是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错误",承认陶氏的教育思想是"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而不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如董纯才检讨了他 1942 年为延安新教育学会编印的《陶行知教育论文选集》写的序言中说"陶先生的教育学说含有不

---

① 《〈人民教育〉开展批评》,1951 年 10 月 10 日。

② 《"借题发挥"所造成的坏影响》,《光明日报》,1951 年 6 月 6 日。

少的唯物主义因素,在中国教育思想上起了很大的革命作用,对中国新教育放下了一块奠基石"的错误。戴白韬检讨了他在1947年撰写的小册子《回忆陶行知先生》(出版时改为《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中称陶先生是"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创造者之一"的错误。方兴严检讨了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写作、新中国成立后修订出版的《生活教育简述》的《修订序曲》和《修订序文》中认为陶氏生活教育的理论"与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的错误。刘季平检讨了他曾经"没有能够正确地分析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并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陶行知思想与毛主席思想的根本差别"的错误。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使用"新民主主义"这个概念,是从1939年年底、1940年年初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时开始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建设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的方针,这个方针当然也适用于教育。拿这样的标准衡量,陶氏思想的新民主主义性质是没有疑问的。陶氏教育思想在前,毛泽东教育思想在后,说陶氏是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创造者之一,也是实事求是的。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曾郑重地对陶氏思想作过正式评价。在批陶运动中,无论批判者还是执政党,都只字不提。陶氏弟子们不敢在陶氏思想的性质这个根本问题上坚持他们一贯的观点,也没有表现出在执政党公开纠正自己对陶氏的"错误"评价以前保持沉默的勇气。社会环境的改变,政治与舆论的压力,党性原则的束缚,竟然使得这些在抗日反蒋斗争中英勇无畏的知识分子,不能做出普通人也会做出的反应!

尽管有以上的共同点,陶氏弟子在批陶问题上的表现还是有很大的差别。有的人一般地承认执政党对陶先生的批评,但能够为老师作力所能及的辩护,如方兴严、刘季平等人。有些人则批判先师力求"深刻",大有"划清界限"、"转变立场"甚至反戈一击的味道,如戴白韬、董纯才、张宗麟等人即是。

戴白韬在运动开始后，立即发表文章，承认“歌颂武训是原则性的错误”，表示“基本上同意杨耳同志在《陶行知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么》一文中所持的意见”。他认为陶氏政治上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教育思想也是逐步改变的，但“他受旧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影响较深，因此他的教育思想有进步的积极的一面，也有落后的和错误的一面。陶先生提出反传统反洋化教育，可惜没有正确地去分析封建教育与资本主义教育，因而对教育的阶级性和为政治经济服务的从属性的本质认识，也是模糊的，甚至还存在着若干旧教育思想的。他之错误的表扬武训，也就不是偶然的”[①]。他虽然已经否定了一年前自己颂扬陶氏的话，但还没有全部否定陶氏的教育思想。

随着批陶运动的展开和“深入”。戴先生对老师的批判大大进了一步。他在1950年年底发表的《对陶行知教育思想认识的初步检讨》，实际上对陶先生的教育思想、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作了全面否定性的评价。他说：“陶先生一开始即是以改良主义面貌出现的。”“从他三十年来的言行看，他的教育思想一直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他从办晓庄学校、山海工学团，提倡小先生，普及教育，一直到他后期，就是在这种幻想里生活。虽然，他也喊出锄头联合机器来革命（意即工农联合革命），但对他的教育思想并没有什么改变。三十年来他办教育并没有能救中国，充分说明他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幻想。陶先生生前，时而平民教育，时面办乡村教育，提倡小先生等，我把它认为是陶先生想种种办法为人民服务或者赞扬他在教育上有新创造，例如对工学团的办法加以赞扬等。其实，陶先生之好翻新花样，完全是由于他的小资产阶级的教育救国论的改良主义的幻想，灵机一动从经验里想出来的。”陶先生的世界观，“是小资产阶级的片面的、孤立的、唯心主义的世

① 《歌颂武训是原则性的错误》，《光明日报》，1951年6月2日。

界观，也就必然表现在工作上的东抓一把，西抓一把，小手小脚的，点点滴滴的，没有远大眼光和气魄”。“1936年以后，陶先生虽也承认文化是民族大众解放的斗争武器，说文化脱离了政治经济便成了不可思议……但在他的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上，这种超阶级、超政治、超经济的教育思想并没有推翻。这也正是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想的特征。”对陶氏的生活教育理论，戴先生批判说：“不论生活即教育也好，教育即生活也好，总之，生活不等于教育。如果生活等于教育，天天在校种田、扫地、烧饭，在家不一样么？那又何必到学校来呢？”他说陶先生办晓庄学校，提倡建立适合乡村实际的活教育，是杜威教育思想的翻版，等于取消学校；说陶先生晚年在《社会大学颂》中说“青天是我们的圆顶，大地是我们的地板。太阳月亮是我们的读书灯，二十八宿是我们的围墙，人民创造大社会，社会变成大课堂”。“农场、工场、会场、商场、广场、战场、娱乐场，都是我们数不尽的课堂。我们要各尽所能，各学所需，各教所知，各得其所”，“表现了他一系列的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

说陶氏是“阶级调和论者”，乌托邦理想的崇拜者，始终生活在改良主义的“幻想”中；陶氏的教育思想“超阶级、超政治、超经济”，他的教育活动是“花样翻新”，“灵机一动从经验里想出来的”，“生活教育”等于取消学校；陶氏做事小手小脚，点点滴滴，“没有远大眼光和气魄”。诸如此类的评价，对于任何一个稍许了解陶氏思想、活动、人格的人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

董纯才先生是陶氏弟子中政治上最有发展的一个。他在《我对陶行知先生及生活教育的认识》一文中，提出了陶先生在政治上革命、教育上不革命的观点，特别强调了陶氏思想与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区别，并声明陶氏的思想不能成为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指导思想。他对陶氏的批判是毫不留情的。

张宗麟的表现尤其引人注目。他在《人民教育》1952年3月号发表《对陶行知先生的认识和我的初步检讨》，反对张凌光关于

陶氏教育思想中"有若干朴素唯物论"的观点,说这个"尺度放得太宽了些"。他说:"'生活即教育'若无政治领导,那末它必定会按照着个人的出身、个人的生活、个人的爱好做去,这是教育自流,而不是能为政治服务的教育。反革命、贪污犯、土匪也都是生活中受教育的,垄断资本家自身是在生活中受教育,而且强迫被剥削者也在生活中受教育。唯物论朴素到这个地步,太近乎天真了。"社会即学校则"更容易走到取消学校教育的道路"。他说,对陶行知教育的讨论和批判,"正是给陶先生洗脸,还出一个真的陶行知来。我们应该用古人所说的'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精神来参加这个讨论"。陶氏是他30多年前的老师,而且他认为自己是陶氏的"得力助手",对陶"敬爱始终如一"。"倘若不是几次整风学习,特别是一九五○年一次整风学习,同志们严厉地提出,我的剥削阶级出身的个人主义的劣根,不是《人民教育》去年展开了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我可能还会偷偷地把生活教育的一套,送进新民主主义教育的阵营里去,也就会腐蚀我们的党,使新民主主义的教育的理论庸俗化,歪曲教育政策。若加上我对陶氏感情之深,以及我个人平素的作风,极可能会坚持错误,打击别人,一直发展到思想与行动全部蜕化,好危险呀!"① 我们已经说过,1950年7月,这位先生还撰文称颂陶氏为全国教育工作者的"伟大的导师",称颂"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是毛泽东给予陶先生的"无上光荣的称号"、"万古不朽的谥封",称颂陶氏先于毛泽东开拓了中国的工农教育事业。仅仅过了一年半的时间,他认为陶氏的教育思想已经成了腐蚀党、腐蚀革命、破坏教育事业、甚至使革命者蜕变的敌对的东西了。

在批陶运动中,陶氏弟子承担了沉重的压力。方兴严等人能在自己受到激烈批评的同时为陶氏作力所能及的辩护,实属不易。戴白韬等人的批陶言论,大多发表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发起

① 《对陶行知先生的认识和我的初步检讨》,《人民教育》,1952年3月号。

之后，也属违心之论或“一时糊涂”，因为正是戴白韬、张宗麟等人在“双百”时期比较早地提出重评陶行知，方兴严、张宗麟等因而被划为“右派分子”。我们还是要说，当年为陶氏辩护之力，莫过于李士钊、楚图南、张凌光；对陶氏打击、损害之重，莫过于若干陶氏弟子。当时，他们中一些人的言行的确有悖于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道德与气节。当然，这也折射出在前所未有、突如其来的思想批判运动面前，知识分子慌恐之极、言行失据的窘况。陶氏弟子大多属于进步知识分子，本书涉及的几位高足都是共产党员，担任重要的教育行政职务。他们的内心必不赞成对其先师作如此粗暴的批判，然而在“大是大非”面前，党性却不能不放在首位。

批陶运动，不但使陶氏长期蒙受冤屈，使教育界失去了这位鲁迅式的伟人，而且使中国失去了五四以后30年间形成的陶氏教育思想这一最可宝贵的文化遗产，割断了新中国的教育与旧中国进步教育的有机联系，也打断了中国教育与世界教育的接触，给中国的教育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冤案得到平反昭雪。然而，覆水难收。今天的中国，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就是大学生、研究生和掌管教育的官员们，还有多少人知道陶行知?!

3.6　第二个偶像的破碎：对陈鹤琴及“活教育”的批判

在旧中国的教育界，陈鹤琴先生可以说是第二个偶像。陈先生与陶行知先生有相同的教育背景：都曾在中国的教会中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接受教育，同为杜威的弟子。但回国以后，他们走的道路很不相同。陶先生一步步投身于人民革命阵营，成为进步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杰出的人民教育家。陈先生则在统治集团支持下，在中国实验杜威的教育学说。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幼儿园——南京鼓楼幼稚园，主持上海租界的“华人教育”长达11

年，抗战时期在赣南蒋经国领导的地区创办初级师范。他的“活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在全国影响极大，是为国民党统治集团所看重、受到国统区许多教育工作者崇拜的著名教育家。清理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既然批判了陶行知和他的“生活教育”，自然就没有不批判陈鹤琴和他的“活教育”的道理。

批判“活教育”理论，在批判《武训传》运动之前已经提出。1950 年 10 月，《人民教育》开始发表批判杜威的文章，这是在教育领域全面清理杜威影响的第一炮。1951 年 4 月 1 日出版的《人民教育》第 2 卷第 6 期发表张凌光《评“活教育”的基本原则》一文，从批判杜威入手批评“活教育”，但既未点陈鹤琴的名，也未全部否定“活教育”，而是说“现在‘活教育’必须从思想体系上加以根本改造，才能克服其中错误，发扬其中某些优点，然后才能对新中国有用”。陈鹤琴先生在《新儿童教育》上发表《敬请读者们对“活教育”展开批评》的文章作答。他没有对“活教育”理论作任何的检讨，只是大段引用 1948 年 4 月出版的《活教育》第 5 卷第 2 期上的言论，说明“活教育”产生的时代背景、发展过程，并解释了“活教育”的目标即“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和“爱国家、爱人类、爱真理”，等等。陈先生给人的印象是，他只想澄清人们对他的教育思想的某些误解，而不愿对他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作任何的检讨。

随着批判武训、《武训传》、陶行知运动的发展，8 月 1 日出版的《人民教育》第 3 卷第 4 期发表林英才的文章《希望倡导“活教育”的先生们进行自我批评》，这是批判陈鹤琴及其“活教育”的正式开端。林文严厉批评了陈先生的文章，认为“活教育”不过是“直接抄袭反动的美国杜威教育学说而进行改头换面”，是“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的翻版”，敦促对陈先生及其理论展开批判。9 月 1 日出版的《人民教育》第 3 卷第 5 期又发表王泰然的《“活教育”的主张能使中国旧教育变活吗？》。在这种情况下，陈先生在 10 月 1 日出版的《人民教育》第 3 卷第 6 期发表《我对“活教育”的检讨》。

陈先生说:“经过一番思想检讨之后,初步地认识到我的‘活教育’的主张,原来并不是什么进步的东西,而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教育思想。由于我没有阶级立场,不问政治,幻想用教育来救国拯民,其结果,不但国没有救成,反而为反动派服了务,为反革命统治装饰了门面,因而损害了革命的事业。”“活教育”“在人民中散播了坏影响,帮助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

陈先生回顾了他选择“教育救国”道路的过程。他说:“我生长在小资产阶级的家庭,长期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社会,看到的尽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国内军阀的混战,官僚的贪污腐化,老百姓贫穷如洗。当时我也曾为中国的这种衰亡现象悲愤,我也曾立志要想救国。记得当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反动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约的那年,我正在美国读书,那时,我非常的愤慨,为了要报仇,便每逢星期五绝食一顿以效法‘卧薪尝胆’。这种天真幼稚的做法,一直继续了半年,自然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后来,我便想中国人为什么不如外国人而受人欺侮?我以为这是因为中国人本身‘不行’;要是能把中国的‘人’教好了,使他们具有健全的身体,创造的能力,合作的态度,世界的眼光和服务的精神,那么别人也就不会来欺侮我们了。于是,我选定了教育救国的道路。”

陈先生承认自己对“人”的理解是抽象的。“活教育”的目标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貌似超政治、超阶级,实际上是有政治、有阶级。“其阶级性则属于剥削阶级,其政治则属于反动政权。”他曾错误地认为“旧社会的教育之所以没有办好,是因为旧的传统教育不行,教材不好,教科书错误很多,方法不好,教学法太死板的缘故,认为用自己的‘活教育’方法,就能培养出所谓‘人’来。这就是所谓‘活教育’的课程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和方法论‘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实际上是承袭了杜威的‘儿童本位’与‘经验论’,接受了陶行知先生‘教学做合一’的主张”。

陈先生认为自己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想的根源是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从小所受的封建家庭教育和教会学校教育、在美国接受的资本主义反动教育、杜威的实用主义与儿童本位思想的熏染和陶行知先生的影响。

《人民教育》和《人民日报》在发表陈先生的检讨的同时,发表柳湜的文章。柳湜说:"'活教育'不仅是一种理论,而且是有行动的。""我以为无论批评与自我批评都不应限于'活教育'的言论,重点应在它的实践;而且不仅限于'活教育'旗帜打出以后,或某一阶段的实践,应是包括陈鹤琴先生的整个教育活动。陈先生的教育活动有三个中心部分。一是中国首先实验杜威学说的南京幼稚院;二是上海公共租界在帝国主义直接领导下为'华人'而办的八个小学,一个女中;三是'活教育'旗帜打出以后的活动。这三部分活动是互相联系不可分离的,其教育思想集中表现在'活教育'的理论体系上。必须研究这三部分的教育实践,我们才能对'活教育'作出应有的系统批判。"① 他提出要按《武训历史调查记》的方法来做。后来,由教育部牵头,组成"活教育调查小组",写了一份《前上海租界工部局西区小学调查记》,作为批判陈先生的实证材料。陈氏的一些学生、同事,曾在陈氏主持的教育机关中工作过的教师,纷纷发表文章,揭发和批判陈氏为帝国主义、国民党办教育的"罪恶"。

新中国建立初期,从政治学习运动后期的思想总结开始,知识分子的检讨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所有人的自我批判都要"上纲上线",但又似乎有一个"默契"或"约定":只承认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承认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承认自己的思想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不承认是"资产阶级思想"。陈先生亦是如此,尽管他是中国数得着的大知识分子,他却把自己的思想定为小资

① 方直:《写在陈鹤琴先生的"初步检讨"之后》,《人民教育》,第3卷,第6期。

产阶级的“改良主义”。

然而，这时的空气已经大不相同，北京、天津已经发起高校教师的思想改造运动(可能还没有扩展到陈先生所在的南京)，对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定性立即上升为“买办资产阶级”。如洛寒在《人民教育》第4卷第2期发表的《从〈我的半生〉看陈鹤琴的教育思想》一文认为，陈氏50岁时写的这本给孩子看的书，充满了封建毒素和崇洋思想；“陈鹤琴先生的教育思想，是封建思想再加买办思想，并不是像他自己检讨的是什么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正确地说，陈鹤琴先生的教育思想是买办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同期发表的郑西鸿《“活教育”在江西》一文，以陈氏在江西办幼稚师范的情况为证，断定“活教育”标榜“民主”“自由”，实际投入法西斯统治者的怀抱，为其忠实服务；痛骂传统的形式主义教育，而千回百折之后，仍落入传统教育的窠臼；它不仅为反动统治阶级所容许，而且为法西斯头子所欢迎；麻醉和迷惑了一大批青年，使他们死心塌地跟着国民党走。曾随陈先生在工部局华人学校工作十三年半的祝荪如称陈先生为“买办资产阶级的教育家”①。人们认为，“活教育”是“中国传播杜威思想比较典型的一种理论”，“‘活教育’的思想和杜威的关系比起中国其他教育学派和个人受了杜威的影响那是有区别的”。对“活教育”的批判，“具有直接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意义”②。

新中国建立后对旧的教育思想进行清理是必要的。陈先生提倡的“活教育”和杜威的学说是一致的，因为“活教育”和杜威学说出发点相同，路子相同，方法相同，这是陈先生自己说过的。作为在中国推行杜威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在革命胜利后也许应该受到批评和清理。但是，对他的批判是颇为过火的。陈先生政治上

① 《回忆上海工部局的“华人教育”与陈鹤琴先生》，《人民教育》，第4卷第2期。

② 《〈人民教育〉开展批评运动》，《光明日报》，1951年10月10日。

不很革命，但不是反革命。抗战时期，他参加过进步的文化活动和救亡工作，40年代后期，因政治上倾向进步而两度被捕。他没有去台湾。他是职业教育家，信奉教育救国，以教育为社会服务；他的专业造诣极高，是中国儿童教育的最高权威，其教育理论与经验并非毫无可取之处，完全可以为新中国服务。对一个教育家的思想与实践，本不宜完全用政治标准来衡量。把陈先生的教育思想定性为“买办资产阶级”，把他的教育活动视做为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服务，都是片面和过分的。对陈先生的批判，不仅使这位杰出的教育家在后半生失去了正常的工作条件，也伤害了一批知识分子。

对陈鹤琴先生及“活教育”的批判，断断续续进行了几年，贯穿了批判《武训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等几个运动。我们把对陈先生的批判和对陶行知先生的批判相比较，就会发现，除了定陈先生的理论与实践为“买办资产阶级”以外，批陈的声势、“深刻”与“广泛”程度，都远逊于批陶，甚至没有特别重要的人物加入对陈氏的批判。陶氏与陈氏，一个背叛了杜威，一个始终是杜威的信徒；一个坚定地跟共产党走，自觉地置身于人民之中，几十年如一日地开拓人民教育，一个长期以“超政治”自居，在中心城市和租界搞并非平民式的教育；一个长期受到国民党的排斥与迫害，一个长期受到统治集团的礼遇与赏识。为什么革命的、进步的反而要受到更加激烈的批判呢？这是因为，陶行知因其革命与进步，他的思想很容易被认为（实际上已经被认为）是革命的思想、新民主主义的思想，甚至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相一致的思想，因而“危险性”很大，故而需要更加彻底地批判。陈鹤琴在政治上是没有影响的“死老虎”，他的教育思想之不革命也是一目了然，因此大可不必过于认真。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对那些民主革命时期进步的、革命的、跟着共产党走的知识分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那些曾经是落后的、不革命

的甚至反革命的因而在新社会比较循规蹈矩的知识分子反而比较宽容，正是贯穿着这样一种奇怪的逻辑。

3.7 “洪洞县里无好人”：对教育工作者的否定与反否定

批判《武训传》、陶行知、陈鹤琴的运动，重要目的与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民国时期的教育包括五四以后发展起来的新教育，对在旧中国从事过教育工作的所有知识分子，不加任何区别地一概否定与抹煞。这个过程，萌芽于政治学习运动，开始于批判《武训传》，在批判陶行知的运动中达到高潮，经过批判陈鹤琴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全面完成。

新中国成立之初，教育界的知识分子知道共产党要对教育进行改造，也赞成这种改造。但是，许多在旧中国从事过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平民教育、普及教育的人似乎并不认为共产党会对他们从事过的工作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1949 年 9 月，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始人黄炎培先生在谈到教育对建国的贡献时，对他在民国 6 年即创办“平民化”职业教育，没有表示任何的重新认识或自我批评，反而表示自豪。他认为职教社的目标是“一方面帮助平民解决生计问题，一方面也是国家增加生产的重要准备工作”①。政治学习运动中有人检讨到自己的教育思想和在旧中国的教育活动，但一般没有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全面否定。从 1950 年 6 月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前后高级知识分子的表现也可以看出，他们并不认为旧教育完全要不得，也没有为他们的职业历史而感到愧疚。

然而，否定整个旧教育和全部从事过旧教育的知识分子，是教育界领导层早已定下的决心。1950 年 1 月，钱俊瑞在《人民教育》创刊号发表《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一文，表达了这一决心。他说：

① 《教育对建国的贡献》，《光明日报》，1949 年 9 月 16 日。

"'我不为谁服务,我不参加政治,我为教育而教育。'这叫做自欺欺人。在旧中国,你如果不是一个自觉地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工作者如同陶行知先生那样的战士,而是一个所谓'在政治之外'、'为教育而教育'的人,那么,不管你的主观愿望怎么样,你在客观上,总不免成了反动派的工具(当然与主观实施反动教育的反动分子不同),因为你尽管说是'为教育而教育',而客观上则是驯服地执行了反动派的反动教育政策。谁人不知,这种政策是直接地反对中国人民的利益,维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的。"按照钱氏的观点,除了陶行知这样的人物以外,旧中国的教育工作者都是"反动派的工具"。

这样的观点不为人们所接受。这一期《人民教育》同时发表的东北大学教务长丁浩川教授的文章《教师怎样看待自己的工作、学生和自己》,就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他说:"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固然是'饥寒交迫的奴隶'。即使一般的知识分子,生活也完全得不到保障。一方面,中国是个文化非常落后的国家,知识分子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非常微小,同时却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失业,好象中国的知识分子又太多。在这种情形下,找职业、混饭吃对所有知识分子说来,便成为第一等的大事。……教师这种职业虽然并不'香甜'(有几个做教师的人,自己不感到有几分'寒酸味'呢),但是为了争取这一口'吃不饱,饿不死'的饭,成千上万的人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艰辛屈辱,在所谓'清高的教育界'也演出了倾轧排挤、争夺扰攘的悲剧,这怕是每一个做教师的人或做过教师的人都自己尝试过、经历过的。""教师所处的这种社会地位,一方面产生了积极的结果:使很多教师——特别是小学教师,倾向于革命,倾向于劳动人民,他们之中的很多的人在革命运动中起了重大的作用,有了很大的贡献;同时,这种社会地位也有它的消极影响——使更多教师的脖颈为饭碗累赘得抬不起头来,失掉了对新鲜事物的感觉,消磨了前进的勇气与信心。"按照丁

先生的观点，教师同样是受压迫、要革命的阶级，怎么说得上是“反动派的工具”呢？

钱俊瑞们早就想全部否定旧中国的教育和教育工作者，但在1950年毕竟还肯定教育界有陶行知代表的进步的、革命的一派。柳湜同冯友兰先生做学术与学风问题辩论的文章中也明确地肯定了这一点，说“在教育方面，我们至少不能忘记陶行知先生”，“陶先生是对中国‘传统教育’体系作了最深刻的革命的批评的人，陶先生是中国最早的人民教育家，五四以后，就决然和中国传统教育分手走了为人民的道路。他的学说，是尖锐地和传统教育相对立，不仅限于他的思想，而且是形成了一种运动的。二十余年来，他光荣的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的学说，和他个人都不是和高等教育无关系的”①。批判《武训传》运动开始后，情况就有所不同了。

1951年6月2日，《人民日报》在题为《清除武训一类的错误教育思想》的社论中说：“有人认为武训的教育思想是改良主义，是教育救国的这一类思想，这同样是不对的，它不是改良主义面是投降主义，是捧场主义，它不是教育救国，它仅是使极少数的人，眼面前的几个人识字而已。同样的要肯定乡村教育、平民教育及别的什么教育，也不是什么改良主义与教育救国这一类思想，改良主义与教育救国这一类思想还要比武训这一类教育思想，走得更远一点。”

《人民教育》第3卷第3期发表的凯旆的文章《从讨论武训思想谈到批判旧教育思想》说得更明白：“在蒋匪帮统治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革命已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所以，想在蒋匪帮统治下找出路的什么平民教育、乡村教育、职业教育等资产阶级的和地主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教育思想便成为

① 《关于“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人民教育》，第1卷第4期。

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反动思想——麻痹中国人民革命的思想，维护反动统治的思想。所以，这些改良主义的教育工作者也能在反动统治下存在，并为反动统治者所欢迎，甚至给以津贴，作为反动统治的直接助手。”“教育救国论”的改良主义思想，“在中国革命斗争激烈的时代，它却主张以教育来挽救反动统治的腐败和危机，以教育来作为改造社会的工具，以便缓和人民革命斗争”，“我们现在的教育工作者中，还有许多人是非不分，存在着许多糊涂观念，例如：‘蒋匪帮直接控制下的昨天的教育，难道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全没有一点好处么？不是替我们培养了一大批的知识分子么？’‘昨天的教育工作，今天在为人民服务，为什么还要忍心责备他们昨天是不对的呢？’这就是因为昨天的教育是培养替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压迫青年和毒害青年思想的，但结果落在革命这方面，这并不是他们的主观的愿望，而是违反了他们的主观愿望的，他们是更加仇恨在心的，我们怎么能说这是他们对我们的好处呢？”

这时的钱俊瑞又进一步提高了他的革命“彻底性”。1951 年 7 月 1 日，即在批判《武训传》的高潮中，钱氏在《人民教育》第 3 卷第 3 期发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30 周年而做的文章《学习和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文章在回顾了毛泽东关于教育、文化的言论和根据地新教育发展的历史后断言：“中外一切所谓‘教育救国论’，‘教育万能论’，社会民主党的所谓‘先培养人才，然后革命’的改良主义理论，以及在旧中国空唤什么‘普及教育’等等，都不过是‘一句废话’，说得严重一点，是它们自欺欺人的谎话，也是应该的。”他依据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的“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话推论说：“第一，我们必须革命，因为不搞革命，就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就不能有新文化教育的根据；第二，革命的理论，革命的文化教育，必须用来推动和指导革命的行动，否则它就没有任何价值；第三，劳动者和全体人民必须在革命中，在变革现实的斗争中，受到教育，得到知识。因此，离开革命的实

践，离开改造世界即变革现实的实践，而空谈教育，都不免是废话而实质上就是谎话，这难道还不明显么？”

批判《武训传》运动即将告一段落时，钱氏又发表题为《从讨论武训问题我们学到些什么》的总结性文章，集中批判改良主义的教育思想，更加彻底否定了旧中国的教育工作者。他说：“一切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教育思想的共同和基本的特点，就是所谓‘超阶级’‘超政治’的教育观，就是教育与政治分离的看法。他们认为阶级是不存在的，或者虽然存在也是不关重要的，政治则是‘肮脏’的，他们只愿意‘清高’和‘自在’地办他们的‘普及教育’、‘科学教育’、‘平民教育’、‘职业教育’、‘乡村建设’、‘民众教育’等等，并且愿意凭着这个‘教育’之‘万能’来救我们的国家。结果怎样呢？还和他们的宣言相反，一切改良派的这种‘超政治’‘超阶级’的观点和做法，在客观的社会实践上，只是为反动统治的粪堆插上了花朵，迷糊了劳动人民的认识，从而欺骗和麻醉了劳动人民，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的战斗意志，也就是这样，帮助了中外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这就是几十年来中国各种各色的改良派在‘超政治’‘超阶级’的幌子下所曾真实地实现了的政治任务和阶级任务。”[①]

钱氏把旧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国民党反动教育政策的坚决执行者”，这是反动分子，应受到人民的反对或“镇压”。第二类是“各种各样的改良派，他们提倡和推行改良主义的教育，基本上为反动统治服务”，这些人应受到“中国人民的批评”，他们应当“努力清算自己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第三类是“为着个人的生活，而为人师”，这类人是绝大多数。这些人应当改造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其他错误思想。第四类是“革命的教育工作者”，他们是“旧中国的教育工作者的真正的

① 《人民教育》，第3卷第5期。

光荣”。按照他对陶行知先生只搞教育不干革命、只看国统区的教育而不看根据地教育的责备，这第四类人显然仅限于根据地、解放区的教育工作者。根据钱氏的分类，原国统区的进步教育工作者被打入第二类，所有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过教育工作的人都是前二类，都是需要或镇压、或批评、或改造的。

批判《武训传》和旧教育思想的运动具有暴风骤雨般的气势。所有的教师，不论是否赞扬过武训、《武训传》，都被要求检讨自己的教育思想。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长期鼓吹和积极从事“普及教育”、“科学教育”、“平民教育”、“职业教育”、“乡村教育”、“民众教育”并因此而获得“进步”名声的人，自然要作更“深刻”的检讨。在这里，我们要又一次以长期从事普及教育的董渭川先生为例说明问题，因为他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前即系统检查和否定自己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并因检讨“深刻”而受到钱俊瑞“好评”的极个别的教育界著名人士。

董先生较早的教育思想检讨文章是在《人民教育》第3卷第2期发表的《我的〈旧教育批判〉》。这篇文章写于《武训传》批判运动之前(5月4日)，发表于运动发起之后(6月1日)。他的《旧教育批判》一书写于北京解放前夕，出版于上海解放之后，很快销行三版，此后停印。他承认自己的教育思想深受杜威影响，犯了狭隘经验主义的错误，而在政治认识方面，则有“更大的错误”。董先生说：

> 从来我不“为教育而教育”，这是对的。我把教育看作政治的工具，也是对的。我要求教育中国化、大众化、社会化、生活化、建设化、生产化、民主化，单就这些抽象的名词看，也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每一名词所包括的内容与要求。首先是我心目中的民主，是以英美的“政治民主”为基础，再加上苏联的“经济民主”。并且我过去在主观上所努力的教育民主，实际

上为反动统治阶级制造把文化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上的奴隶。由这一点糊涂起，其余所谓中国化、大众化等等，当然都是这棵糊涂树上生长出来的枝干。

董先生说，他对社会与教育的关系认识不清，或多或少成为一个教育万能论者，甚至误认为教育能够领导中国革命，青年学生是革命的先锋，“幻想着知识分子能够而且正在领导中国革命”。接着，他分析了他在政治上发生错误的根源：

进一步追究我为什么具有这些糊涂的政治认识。因为我一直在头脑里存在着“超阶级”的“清高”思想，这思想是军阀混战时代养成的。把教育看作“神圣的”事业，一贯地在教育岗位上硁硁自守，而不卷入政治旋涡，自己很觉得意。在五四时代就知道了一点“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等，并且承认共产主义的革命胜利迟早是要到来的，而自己却畏惧严重的实践斗争，离开革命洪流远远的，并且以“超阶级”自慰。事实上呢，既不参加人民的革命，则只有依附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努力工作也就是给反动统治阶级搽粉，甚至于不仅搽粉且作帮凶。自己也对反动统治时感不满，但是既然依附着它，就对它抱有某种幻想。希望它改良，并且帮助它改良，因此从政治的观点说，热心于美国的“新教育运动”，自以为是大刀阔斧地改革，实际是为反动统治阶级谋改良之道。

6月27日，董先生为检讨歌颂武训的错误在《光明日报》发表《错误在于我的“教育”观点》一文，把歌颂武训的错误归因于自己的教育思想。7月7日，《人民日报》转发了这篇文章。董先生说：

我抱着“超政治”、“超阶级”的幻想，给反动统治阶级办了

近乎三十年的教育，也就是依靠反动势力生活了近乎三十年。我曾致力于扫除文盲运动，在当时自以为蛮有成绩，而其成绩，除给反动统治阶级搽粉之外，更为反动统治阶级培养具备一定文化水平可供驱使、供剥削的奴隶。我只是打着“改良主义”的幌子教文盲识字读书，而从未教他们革命；假如文盲起来革命，反动统治阶级也就不允许我长期干这种工作。至于反动而不“很”，就在于我从未正面抗拒人民的革命，如此而已。

董先生的这段话得到钱俊瑞的欣赏。他在《从讨论武训问题我们学到些什么?》一文中说：“董先生的这个自我检讨，今天可以作为许多教育工作者的一面镜子。”①

7月12日，董先生又在《光明日报》发表《武训问题给我的教训》，进一步检讨歌颂武训的错误，批判自己的教育思想。他说，他之所以犯了歌颂武训这一“原则性的错误”，是因为：

我的全部思想建筑在改良主义的基础上……因为畏惧严重的实践斗争，不敢靠近革命的火焰，后来就愈走距革命愈远。大革命之后，误认为蒋介石领导革命成了功，树立起盲目的正统观念，就无保留地投降到反革命的阵营去了；青年们也就和我疏远了。及至因反动统治的贪污腐化，军阀的混战不已，而有了“又吃鱼，又嫌腥”的矛盾时，遂以为自身是“超政治”的，办的教育也是“超政治”的。因此拿定主意，只有埋头办教育，不问其他，才可以超然于一切之外，并且梦想着通过自己办的教育发生进步的作用。在教育思想上和技术上，东抄西袭，封建的、买办的，杂凑乱搞。这情形，在我办民众教育

① 《人民教育》，第3卷第5期。

的几年中，最为显著。因为肯卖力气，和武训一样地搏得了赞誉。……抗战期间，随着国民党向后方一步步逃难。由于种种事实的教训，在所讲所写的教育中，被逼着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号。……这时读的书多些了，改良的办法也多些了，于是把美国的、墨西哥的、丹麦的以至邹平的、定县的、晓庄的……整理成了一套。这些幻想，居然使我进了一个"进步的教授"。原因是，有反帝反封建作幌子，并且暴露反动教育的罪恶，有其积极的破坏作用，为进步的青年所乐闻；同时这些不革命而改良的办法也适合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的口味；至于那些特务学生呢，虽然对于我的某些话不舒服，因我根本无推翻反动统治的要求，也就没有理由反对我。但是有些进步的学生，感到我的改良办法是空中楼阁，焦急烦闷，常追问我如何实现。我老实告诉他们：听我这一套不过瘾，就去找直截痛快的路子；后来他们不耐烦再听这些，索性大踏步走开了。……由于五四运动的影响，使我一直肯定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方向是正确的，并且知其早晚必有成功之一日。然而我却不敢正视革命，靠近革命，把自己安排在"超政治"的"中间路线"之列。

钱俊瑞的《从讨论武训问题我们学到些什么?》一文，引用董先生的这段话时，删去了"反帝反封建"、"有其积极的破坏作用"、"去找直截痛快的路子"、"五四运动的影响"等一些肯定自我的话语，然后评价说："董先生的这个自我检讨是诚恳的，对己对人都是有益的。他提供了一个中国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活生生的写照，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他曾长期地背靠着反动统治阶级，歌唱出那首微弱的由杂音组成的

改良主义的挽歌。”[①]

董先生的检讨是发自内心的忏悔，一个人如果仅仅受到外部的压力，不会作出如此深刻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否定。然而，这种“深刻”的检讨，在知识分子中间并不具有代表性。

1951年8月1日出版的《人民教育》第3卷第4期刊发“对于在封建社会或在‘民国’以来军阀统治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一切‘兴学’和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应如何评价”的问答。这篇反映编辑部立场的文章表达了与钱氏和董先生不同的观点。它肯定教育是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的工具，同时又肯定“教育是保存、积累和传递了人类各时代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知识，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知识”。在国民党统治区，“整个的教育，不能不进入极端反动的时代。由于中国革命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的影响动摇了整个旧社会的基础，动摇了这基础上的一切腐朽的上层建筑，因此在思想意识上，在教育这一思想意识上，自不能不给一定的影响。在这一时期，中国教育，就出现了有被国民党直接统治的极端反动的法西斯教育，法西斯化不太厉害的教育，还有少数始终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按照过去的道路，在办他们的学校”。“至于这一时期，是否还有一种革命的教育呢？那是有的，但一般不是采取正式学校的教育形态，在极端反动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和日本占领时期，是不可能按照革命根据地一样，办成革命的学校，进行革命的教育的。”作者明确指出：

> 这一时期的所谓教育事业，所谓兴学，就看你是站在哪一方面。那些没有法西斯化，并且抵制了法西斯化，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所摧残、吞并、屈服仍然进行了一定的科学教育的学校，虽然办学的目的、理想不是最进步的，但它仍在这一时期

① 《人民教育》，第3卷第5期。

起了一定的进步的作用，有利于人民，是要和最反动的教育相区别的。

在这一时期服务于教育界的人，那更应该作具体分析。不仅在某些比较进步的学校服务的人中，有不少的革命分子、同情革命分子、进步的科学家，就是在最反动的学校，也有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忠贞的思想战士。这一时期的革命教育，除开共产党直接的宣传教育外就是寄托在这些人身上。他们在学校内偷偷地传播马列主义，宣传中国革命，介绍进步的书刊，揭穿国民党的欺骗，一直到用行动领导学生革命运动，抵抗国民党的各种反动教育措施。他们中有共产党员和爱国的民主主义者，他们中有人就为此献出了自己的性命。

还有不少一直保持政治纯洁、主张正义的人，他们虽然和革命没有什么联系，但他们在思想上是同情进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他们也没有在国民党反动派或日本的屠刀和利诱下屈服。他们在科学上保持了严肃的态度，对青年认真负责，并保存了中国教育上一部分优良传统。

在教育工作者中真正属于反动派嫡系的分子、帝国主义分子及其他反动分子那是很少数的，自然，也还有不少只是在教育界混饭吃的人，那就是所谓落后分子。

情况是如此的复杂，我们对在旧教育界服务的人怎能一概而论呢？

……既然在过去国民党统治时期服务于教育界的人，是有各式各样的，其中也有革命的，这就并不如有些人所说，只有在革命根据地工作的教育工作者，或共产党员才能真正成为人民教育家，凡没有到过革命根据地或者不是共产党员，就不能成为人民教育家。鲁迅就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到过革命根据地，但他却是人民文学运动的旗手。……

知识分子在过去为反动统治服务，那没有什么奇怪。在

> 当时,你要生活,不在反动统治下找工作,为它服务,能到何处找工作,为谁服务呢?自然,也可以革命,但不能要求每个人如此。……一般知识分子在旧社会取得的工作,如教书罢,一般只是一种脑力劳动的工作,不属于剥削、压迫人民的工作。至于教育工作者,除保有一定的知识,还有了一定的教育经验……到了今天,那还是很有用的。为什么不应该重视呢?苏联对于教育工作者的教龄是把沙皇时代的服务的年月一并算入的。

对于钱俊瑞在《从讨论武训问题我们学到些什么?》中否定旧中国的全部教育工作者的观点,也有人公开提出不同的意见。1951年11月1日出版的《人民教育》第4卷第1期发表黄铸的文章《对旧中国教育中革命力量的估计问题》,认为钱氏"低估了中国教育中'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扩大的结果'而给人一种印象,仿佛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在国民党教育机关中是很微弱的。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此时已进入批陶运动的高潮,所以黄氏的文章又声明,提高对于旧中国教育中的革命力量的估计,并不能为"曾经从事反动教育或改良主义教育的教育工作者开脱"。

对旧中国的教育事业和教育工作者如何评价,本来不应当成为问题。五四以后,一批知识分子选择了"教育救国"的道路,他们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守教育岗位。他们选择的道路与共产党不同,在政治上是短视的,但是,普及教育、科学教育、平民教育、职业教育、乡村教育、民众教育等,都是旨在普通群众中普及文化、普及现代科学知识、普及文明生活观念的有一定进步意义的教育运动。它们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同工农革命没有直接的联系,然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教育的进步,科学文化的普及,新观念、新思想(哪怕是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

的观念与思想)的传播,无一不在削弱着、瓦解着建立在愚民政策基础之上的反动统治,无一不有利于培养旧制度的掘墓人。事实也正是这样,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革命大军中的绝大部分骨干分子,不都是旧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吗?不论办教育的人的主观意志如何,在旧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之下,不但进步的教育运动必定有利于革命,即使一般的国民教育,即纯粹以普及科学文化为宗旨的教育,客观上也将有利于革命。教育把人类引向文明与进步,更是它的本质。清末留学生运动和新教育的兴起,促进了清王朝的灭亡;二三十年代中国教育的发展,同样加速了国民党的垮台,也是历史的真实。不加分析地把民国时期的所有教育运动都看做"在牛粪上插花",说所有教育工作者都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工具,这样的结论是很不客观、很不公正的,因此它自然要引起人们的反感。

《人民教育》第3卷第4期的问答对旧中国教育事业与教育工作者的评价是非常客观、全面和公正的。在否定全部的旧中国教育事业和教育工作者已是不可抗拒的潮流的情况下,《人民教育》敢于发表这样的文字,说明从旧中国过来的教育工作者不能接受对他们的历史作出的否定性评价。他们在为捍卫自己的历史的"清白"而抗争。董渭川先生的诚恳检讨则表明,随着思想认识的"逐步提高"和政治压力的加大,这种抗争终归失败或消失。事实也正是如此,在思想改造运动以后,旧中国教育工作者的历史贡献和区别对待问题,再也无人敢于提起了。

3.8 不甘寂寞的文艺界:对萧也牧作品的批判

对萧也牧作品的批判,是批判《武训传》时期文艺界的一件大事。这件事与《武训传》的批判运动并无直接联系,但是,毛泽东对文教界"思想混乱"的严厉批评,大批判运动造成的紧张和"左"的

情绪的扩散，直接地促成了对萧也牧及其作品的批判。

萧也牧不是旧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到过外国，他是在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党员作家。他受到批评的作品《我们夫妻之间》讲的是一对干部夫妻进城以后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矛盾又重归于好的故事。丈夫李克是战争年代中由城市到根据地的知识分子，妻子张同志则是进城以前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深山、大沟和沙滩的工农干部，他们的爱情和结合曾被誉为“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进城以后夫妇俩却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发生了一系列矛盾、冲突和隔膜。作者把问题归结到“我们是来改造城市的，还是让城市来改造我们?”结局也是丈夫应当继续改造思想，妻子主要是改变工作方式方法，双方互相沟通、理解和适应，解决矛盾，重归于好。萧也牧似乎察觉到了革命胜利以后城市文明与农村文明的冲突，力图用艺术形式反映现实问题。按照当时的流行观点，这部作品的大方向也是没有问题的。

然而，这部作品发表不久，批判《武训传》的运动开始了。这部作品立即受到了逐步升级的批判。第一篇批评文章是 1951 年 6 月 18 日陈涌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论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批评萧也牧进城后写的《我们夫妻之间》、《海河边上》、《关连长》等作品是“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来描写生活、表现生活”。《我们夫妻之间》夸张地描写了女主角的日常生活作风，把工人出身的革命女干部写成一个粗恶丑陋的人物。他认为这说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尽管经过了长期革命生活的锻炼，进城以后，旧的思想感情容易复发，容易受到各种外来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反映了一种危险的倾向。

十几天以后，冯雪峰以“李定中”的笔名在 6 月 25 日出版的《文艺报》第 4 卷第 5 期发表《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的批评文章，用非常激烈的语言批评了萧的作品，同时批评了陈涌文章的软弱无力。他认为《我们夫妻之间》的作者玩弄了作

为党员、革命工人干部的女主人张同志，“证明作者对于我们的人民是没有丝毫真诚的爱和热情的”。“如果照作者的这种态度来评定作者的阶级，那么，简直能够把他评为敌对的阶级了；就是说，这种态度在客观效果上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对于我们劳动人民的态度。”“假如作者萧也牧同志真的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分子，那么，他还是一个最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

7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第4卷第7期发表叶秀夫的文章《萧也牧的作品怎样违反了生活的真实》，说“萧也牧作品的致命伤就是不符合生活的真实性”，“这种对生活的违反，竟到了粗暴的地步！”《我们夫妻之间》、《海河边上》，“主要是向读者推销廉价的趣味，或者是夸大地片面地描写我们生活中所残余的消极的一面”。《我们夫妻之间》，不仅丑化了女主人公，而且错误地描写了小资产阶级与工农相结合的问题。男主人公李克是一个新到大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他一听见爵士乐就怦然心动，见了地毯、沙发等竟然立即感到“新的生活”即将开始，而他是一个入党很久、经过实际革命斗争考验的人。“难道在日常生活中的共产党员便是这样灰色的吗？”在萧也牧看来，工农必须毫无原则地向知识分子学文化；工农头脑简单，不能正确思考，所以还必须在知识分子帮助下学会掌握政策。“萧也牧所提倡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便是一种不以无产阶级科学思想为依据的，‘朴素’而省力的结合方式！”萧也牧在作品中表现的问题，是他自己的思想感情的暴露。“正像《我们夫妻之间》中的那个李克老是不能从他的小资产阶级感性知识中自拔一样，萧也牧在创作上的情况也是如此。”“为什么在《我们夫妻之间》那样的作品中，萧也牧竟然搬出那么多的低级趣味，并且以欣赏代替批判，以陶醉代替战斗了呢？很显然，在他身上，还保留着一角不小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王国，他还迷恋着一些陈旧、腐朽的东西。”

8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第4卷第8期发表该刊主编丁玲

致萧也牧的一封信《作为一种倾向来看》。她认为，萧也牧的影响越来越大，作品一个个被搬上银幕，《我们夫妻之间》得到许多专家的赞赏。她说："你的作品，已经被一部分人当着旗帜，来拥护一些东西，和反对一些东西了。他们反对什么呢？那就是去年曾经听到一阵子的，说解放区的文艺太枯燥，没有感情，没有趣味，没有技术等的呼声中所反对的那些东西。至于拥护什么呢？那就是属于你的小说中所表现的和还不能完全包括在你的这篇小说之内的，一切属于你的作品的趣味，和更多的原来留在小市民，留在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不好的趣味。这些东西，在前年文代会时曾被坚持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的口号压下去了，这两年来，他们正想复活，正在嚷叫，你的作品给了他们以空隙，他们就借了你的作品而大发议论，大做文章。因此，这就不能说这只是你个人的创作问题，而是使人在文艺界嗅出一种坏味道来，应当看成是一种文艺倾向的问题了。"她认为，《我们夫妻之间》是"穿着工农兵衣服，而实际是歪曲了嘲笑了工农兵的小说"。

萧也牧的朋友、著名作家康濯在《文艺报》第5卷第1期发表《我对萧也牧创作思想的看法》，从自己与萧的交往中说明萧的错误早就存在；萧的根本错误是脱离政治，"因而就歪曲政治，歪曲党的政策和人民的斗争生活，丑化劳动人民，错误地表扬未经改造或未完全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说："也牧同志，你的错误并不是什么复杂的问题，仍然还是九年前毛主席指出过的，你的屁股坐在小资产阶级方面，至少也是大部分坐在小资产阶级方面，你灵魂的深处，至少是灵魂深处的一角，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也许有的时候，这个'王国'因为没有群众，不得不暂时潜伏下来，而在进入城市以后，这个'王国'找到了所谓'群众'，于是大肆活跃起来了。"

各地报刊发表了大量批判萧也牧作品的文章，各级各地的文艺部门纷纷召开会议，形成了对萧也牧的围攻。如在中央文化部

电影局与中宣部文艺处召开的电影《我们夫妻之间》座谈会上，文艺界的著名人士对萧群起而攻之。严文井说："作者所选择的题材，首先就是错误的。要描写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干部结合的过程，不能通过夫妇之间日常生活的争吵和和好来表现——这样表现是把政治主题庸俗化了。"葛琴说："我看电影时简直不能忍耐，完全是在玩弄人物！"黄钢说："影片对军管会工作作了全部歪曲。"韦君宜说，影片里"党的伟大领导力量丝毫也看不出来"。赵明说"这部影片的问题很大，很恶劣，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对工农干部、对共产党的诬蔑"。柳青、瞿白音等人也严厉批判了萧也牧[①]。

在批判萧也牧的同时，电影《我们夫妻之间》的导演和演员也受到严厉的批评。批判《武训传》时一马当先的贾霁批评导演郑君里说，郑将萧的小说改编为电影，说明他与萧的文艺思想是一致、接近或共鸣的。"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文艺思想呢？那就是若隐若现地企图混淆在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中的各种各样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这些小资产阶级思想，在目前文艺创作界的现象上，表现得最严重的就是它以革命的面貌出现，想以它自己来冒充，以至于企图代替无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文艺的创作思想、创作方法上，表现得最严重的最有害的一点是：他们企图通过文艺作品，以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②] 钟惦棐批评赵丹说，他饰演武训、李克，"显然都是一种艺术劳动的浪费，对于这样一个有经验有修养的演员，我感到很可惜"[③]。

批判运动持续了4个月。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萧也牧的检讨《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原载《文艺报》第5卷第1

① 《记影片〈我们夫妻之间〉座谈会》，《文艺报》，第4卷第8期。
② 《关于电影〈我们夫妻之间〉的一个问题》，《文艺报》，第4卷第8期。
③ 《记影片〈我们夫妻之间〉座谈会》，《文艺报》，第4卷第8期。

期)。他被迫承认,他的两部作品“严重地歪曲了生活真实”,其中的干部形象和现实的生活不仅有距离、有出入,不仅是歪曲,而且是伪造,“客观上,对于革命干部是一个恶毒的讽刺”。他的中篇小说《锻炼》“既颠倒了抗日战争初期的真实的情况,一笔抹杀了群众斗争的功绩,又曲解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他说:

> 我的错误首先是立场问题;不是无产阶级的立场,而是小资产阶级立场。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弄错了,一切都错了!因而严重地歪曲了生活的真实,对待人物——劳动人民的态度是轻率的,找不出一点点真诚的感情,甚至是玩弄了人物。作品的风格是虚伪的,凡所用心写处,也正是发泄低级趣味到了顶点的地方,因而写作技巧也是拙劣的。……
>
> 我的作品里边所反映出来的:对于生活本质的歪曲,那虚伪的风格,那低级趣味,那玩弄人物的态度,以及严重的个人主义的创作动机;把创作看成是个人的事业,看成是获取个人名誉地位的敲门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惜投机取巧、粗制滥造……那种低劣的品质,无一不是我骨头缝里的东西。……
>
> 我的作品所以犯错误,归根结底一句话:是我的小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思想未得到切实改造的结果。由于我的作品所散布的毒害,是难以计数的。在我来北京后一年多时间里边,自己背上“作家”的包袱,装成教育青年的样子,晃来晃去,披着无产阶级的外衣,出卖小资产阶级的货色,而毫无自知之明,至今想来,真正地感到惭愧。
>
> 我确实已经走到错误的悬崖的最边沿,不能再走一步了。今天放在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今后创作不创作的问题了!我知道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像我那种有着极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立场、思想、感情、观点的人,如果不立刻加以切实的改造,是决不会有出路的。我必须加以切实的改造,不论路途是多

> 么遥远；也不论为了要改造自己，而所需承担的巨大的痛苦，我是有决心一切从头来过，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取得真正的无产阶级立场的。

萧也牧的检讨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不可谓不深刻，是不是发自内心呢？不是。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他公开表示对他的围攻式批判极端不满，因而在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被划为"右派分子"。

关于批判萧也牧作品的深层次原因，江冰、胡颖峰在《浪漫与凄凉的人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一书中作了很有说服力的分析。他们认为，40年代以后，在毛泽东的知识分子理论影响下，知识分子题材的文艺创作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这个模式包括两个"固定形象"或"原型"，一个是"神圣的工农者原型"，一个是"自卑的知识者原型"；工农兵的形象必须是高大的、神圣的、完美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必须是有种种缺点而"可耻可恨"、需要改造的。作品的主题和结局，必须是工农兵改造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被改造。《我们夫妻之间》之所以受到严厉批判，就是因为丈夫所代表的知识者形象和妻子所代表的工农形象与上述两个原型不合。

对萧也牧作品的批判，一方面反映了在批判《武训传》运动推动下文艺领域"左"的倾向的发展，一方面也可以看做《我们夫妻之间》中以妻子为代表的社会阶层与政治力量向丈夫代表的社会阶层的一次公开宣战。萧也牧的检讨表明，"神圣的工农者原型"已经以绝对优势压倒了"自卑的知识者原型"，这正是当时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政治与思想关系互动的一个缩影。

第四章 “洗澡”运动

运动的目的：教育改革与党的领导——运动的方式：人人“洗澡”过关——红卫兵运动的先驱：学生斗老师——真假参半的忏悔：第三个知识分子检讨浪潮——欧美派大知识分子的屈服：教育思想的检讨——反科学思想的泛滥：科学界的检讨与政治批判——文艺整风运动：文化界的否定与自我否定

4.1 运动的目的：教育改革与党的领导

1951年9月，批判《武训传》的运动刚刚结束，一场声势更大、涉及面更广、方式更激烈的政治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勃然而起。把这次运动与新中国成立后历次运动相比较，不难发现，它的理论依据、政治目标、波及范围、运动方式等各个方面，非常接近于25年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这是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后普遍经历的第一个真正“触及灵魂”、刻骨铭心的大事件。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波及范围是空前的。据统计，参加这次运动的高校教职员达91%，大学生达80%，中等学校教职员达75%，绝大多数小学教师也卷入其中。运动原定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着重弄清思想改造的目的，纠正不正确的学习态度，对立场、态度和为谁服务的问题作初步讨论；第二阶段是着重

学习文件，批判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反动思想，划清敌我界限；第三阶段是重点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批判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第四阶段是按照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需要，讨论高等教育改革问题；第五阶段是总结。1952 年 1 月，因“三反”运动骤起，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第二阶段尚未结束即按中共中央指示转入“三反”。3 月，“三反”运动进入思想建设阶段，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又按原来的部署进行。7 月、8 月以后，各地的运动陆续结束。就全国范围来说，这个运动的开始与结束，并没有统一的时间界限。

当时和现在，人们都认为马寅初先生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始作俑者。事实并非如此。马寅初先生于 1951 年 6 月 1 日就任北大校长。暑假期间，他组织北大职员进行了 40 多天的政治学习，认为颇有成效，故将政治学习运动由职员推广到教员，并于 9 月 7 日致信周总理，说北大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如汤用彤副校长等 12 位教授，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聘毛泽东等 10 人为教师。我们应当注意：第一，北大职员的暑期学习完全不具备后来思想改造运动的一般特征。马先生说，他到北大后，看到北大的学生和大部分教师的思想很有进步，但存在“自由散漫”的缺点，而自由散漫的思想根源中“最明显的是职员思想水准和主人翁的自觉性不高”，故而组织政治学习；政治学习之后，“工作效率提高不少”。这说明，北大职员政治学习的目的是克服行政人员的自由散漫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并不具备重要的政治意义。也就是说，它不以断定职员队伍中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为前提，也不以推动教育改革为目的。马先生新任校长，身为学校的最高行政首长，整顿职员队伍的作风，提高工作效率，是顺理成章的。第二，他在把政治学习运动由职员推广到教员中去的时候，仍然叫“政治学习运动”而没有称之为思想改造运动，这说明他所期望的，仍然是类似于 1949 年、1950 年间那样的学学文件，听听报告，在自觉自愿的

基础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和风细雨式的运动，完全不是后来那种人人“洗澡”过关的激烈斗争。

然而，毛泽东9月11日对马先生致周恩来的信作了赞成开展政治学习运动的批示，不但把“民间”自发的政治学习变成了“官方”行为，而且实际地改变了马先生设定的政治学习的性质。中央教育部闻风而动，随即成立“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于9月下旬发起北京20所高校3000多名教师的政治学习运动。9月29日，周恩来在京津高校教师会上作了报告。此后，“许多校长和教师开始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公开的自我批评”，一般性的政治学习转化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说：“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①] 这就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意义提到了异乎寻常的高度。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短评《认真开展高等学校教师中的思想改造运动》，并报道了京津高校教师的学习情况。各地各界的思想改造运动遂迅速兴起。中央教育部在发起这一运动时，明确地将运动的目的规定为“改造教师思想，改革高等教育”。

马先生的建议之所以受到如此的关注与重视，是因为它适应了领导层酝酿已久的发起一次大规模群众性运动以彻底改造知识分子思想、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绝对指导地位的需要。这年5月，毛泽东发动批判《武训传》的运动，并默许和支持对陶行知先生及其教育思想进行批判，表明了他对文化教育界的“思想混乱”的极度不满。但是，批判武训、《武训传》、陶行知，直接涉及的范围毕竟不大，不能根本解决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的问题。教育界的领导层既恼怒于欧美派高级知识分子在1950年6月高教会议前后抵制教育模式转换的集团性行为，又深知毛泽东对教育界思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482—483页。

想领导状况的不满，急于找到一种途径或办法，既消除毛泽东对教育工作领导不力的不满，又能排除建立苏联式教育模式的阻力。马寅初先生的建议，恰好适应了毛泽东和教育界领导层的需要。以北大和马先生在教育界的地位，由领导层实际发起和领导的运动，表面上却成为教育界自身的要求与创造，这有利于堵住知识分子之口，减少运动的阻力。这反映了毛泽东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斗争艺术。

为什么要把教师的思想改造作为改革高等教育的前提条件呢？这显然与对高校教师思想状况的判断有关。钱俊瑞在《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一文中说，新中国的高等教育要完成培养大批高级建设人才的任务，必须对大学的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进行彻底改革。"如果高等学校的教师们还是服膺着英美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还是固执着自己的个人主义、客观主义和宗派观点，而得不到确实的改造，那么一切高等教育的改革工作，诸如院系的调整、课程的改革、教学法的改进等等，都是难于进行和贯彻的，一切关于改革高等教育的决定和规章就难免不成为具文。两年来极大多数高等学校改进得如此之慢和如此之少，还不够证明这一点吗？"[①] 这样，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作，就成为改革旧教育的重要前提。

教师们中间存在着哪些"反动思想"呢？钱氏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另外还有封建思想和买办思想的残余"。他说："在我们不少的高等学校教师中还浓厚地保存着欧美反动资产阶级的思想，特别是崇拜美国资产阶级的思想。他们至今还固执地崇拜着英美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所谓'美国的生活方式'，羡慕着美国的'富裕'（他们看不见美国劳动人民的穷困），'政治上自由'（他们不愿意相信杜鲁

① 《学习》，第5卷第1期。

门正在实行剥夺人民一切正当权利的法西斯主义)和'文明'(他们向往着英美资产阶级的堕落,忽视英美广大劳动人民的陷于无文化的悲惨地位)。他们佩服英美的科学和技术到了迷信的程度,而对于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则投以不值一顾的轻视的眼光,更不消说对中国人民的创造力和发明力有什么体会和信心了。这种思想在本质上是半殖民地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买办思想,它是我们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思想,即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最危险的敌人。""我们的教师中还存在着相当浓厚的个人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思想和态度。对于这样的教师,不是崇高和伟大的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利益在吸引、支持和鼓舞着他们不断前进,而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利益和个人前途在指引和支配着他们的工作和全部生命。他们对于祖国的荣誉和人民的灾祸和幸福可以不关痛痒,对青年的前途可以漠不关心,他们所关心和往往使其苦恼的只是一己的'安富尊荣'";他们"严重地存在着理论与实际分离的教条主义"①。他提出,改造思想的学习运动的最后目的是改革高等教育,因此,学习必须联系教育改革,必须联系每个人的业务。

现在看来,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内容和目的定为"改造教师思想,改革高等教育",是教育界领导层的意思。毛泽东10月23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讲话表明,对于正在兴起的这场运动,他比钱俊瑞们要看得重得多,为这场运动确定的范围要宽得多,目标也高得多。后来的发展证实了这一点。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于1951年11月30日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的通知》。这个文件指出,"学校是培植干部和教育人民的重要机关,党和人民政府必须进行有系统的工作,以期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使全国学校都逐步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并逐步取得

① 《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学习》,第5卷第1期。

与保持其革命的纯洁性。因此,必须立即开始准备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于一年至二年内,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和高中学校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在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和专科学校以上(即大学一级)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初步思想改造工作的另一个目的是准备学校教育改革,包括学制改革、院系改革、课程改革、组织改革等等。关于这个问题,中央将另作指示)"①。必须注意,这个文件把"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视为在学校中进行组织清理的准备阶段,规定其政治目的是"使全国学校都逐步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并逐步取得与保持其革命的纯洁性"。这样,思想改造运动的目的就不仅仅是"改造教师思想,改革高等教育",而是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清理学校,建立尚未建立的执政党对教育的领导。政治的层次大大提高了。

1951年11月,高岗在东北发动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加重了他对党内腐化倾向的判断,因此在12月间发起了较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更加激烈的"三反"运动。1952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文教部门应无例外地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认为"三反"运动是最实际的思想改造,"故教育界、文艺界的思想改造学习未开始者应由'三反'开始,已开始者亦应转入'三反',在'三反'斗争中解决资产阶级思想的问题,然后再回到原定计划"②。3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这个文件认为,"资产阶级思想在极大多数学校现在仍然居于实际的支配地位,严重地阻碍教育的改革和国家建设人材的培养",高校"三反"运动的目的是"基本上消灭学校中的贪污浪费现象,克服官僚

① 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9册,第378页。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49页。

主义，揭发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从而确立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权”①。高校的运动随之又由“三反”转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阶段。5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清理“中层”的指示》，进一步规定高校运动的目标是：彻底打击学校中的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如崇美、亲美、恐美、反共、反苏、反人民的思想），划清敌我界限；暴露和批判教师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划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初步树立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肃清学校中的贪污浪费现象；具体了解高校教师的政治情况和人事情况，为学校清理“中层”和教育改革打下基础。

“三反”运动开始以后，教育部主管的《人民教育》杂志发表若干社论，认为“三反”、“五反”运动证明了“现在全国大多数高等学校，各科教学上最占势力的，还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院系领导上最占势力的，还是资产阶级的工作态度和作风。从种种事实来看，全国许多高等学校，还是由资产阶级的思想占着实际的领导地位”②。“在许多学校里，资产阶级思想在实际上还占着领导地位。资产阶级思想在高等学校里极其顽固地保持着自己的阵地，在中小学里也有广泛的影响。”“在许多学校里，还远远地没有确立并巩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③ 因此，思想改造运动的首要目的就是确立无产阶级思想在学校中的领导地位。这表明，在毛泽东的观点影响下，教育界领导层对于思想改造运动的目标定位，已把确立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放在第一位，而原来居于突出地位的教育改革已成为确立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结果和标志之一。

以上情况说明，第一，北大职员和教员的政治学习不具备知识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第117页。

② 《高等学校教师必须通过“三反”运动认真改造思想》，《人民教育》，1952年4月号。

③ 《在各级学校里为贯彻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而斗争》，《人民教育》，1952年7月号。

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基本特征，所以马寅初先生不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始作俑者；第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目的有一个不断升级的过程，即从改造教师思想、改革高等教育，到确立无产阶级思想和共产党在学校中的领导地位的过程；第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实际上是由毛泽东发动的，他的目的是彻底净化知识分子的思想，建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统天下，完全不限于教育改革；第四，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目的的不断升级，受到"三反"运动的直接影响，并以对学校政治状况、知识分子群体思想状况的严重估计为前提；第五，对学校和知识分子问题逐步加重的估计，对运动目标的不断提升，更由于"三反"、"五反"运动造成的紧张社会气氛，必然使得运动方式日趋激烈或暴烈。

4.2 运动的方式：人人"洗澡"过关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又称"洗澡"运动，这是因为它的基本方式，是要求知识分子根据其职位高低、名声大小、"错误"轻重，在规模不同的群众集会上公开地、反复地做自我检讨，接受群众批判，"洗"去身上的污垢，最后由群众决定其是否"过关"。显然，执政党在指导这个运动的时候，沿用了延安整风的经验。

运动的初期，方式还比较温和。例如学习的第一阶段，大学校长们带头进行自我思想检讨。各校选择本校突出的知名人物，进行分析。如北京大学讨论和分析了胡适的思想，燕京大学讨论和分析了司徒雷登的问题，南开大学讨论和分析了张伯苓的思想，清华大学讨论和分析了梅贻琦的思想。在对这些具体人物的讨论中，提倡教师联系自己的思想进行检讨。这时既没有提出人人过关的要求，也没有普遍开展激烈的思想与政治批判。

人人"洗澡"过关是"三反"运动兴起以后提出的要求。"三反"运动又称"打虎"运动。在假定凡是管钱管物的机关必有贪污犯、

大贪污犯("大老虎")的前提下,毛泽东严令各地、各部门层层下达"打虎"指标,限期打出"老虎",多多益善,不但使得逼、供、讯成为普遍现象,而且形成了"人人过关"的运动方式。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途转入过"打虎"运动,"打虎"运动的激烈方式也就被运用于思想改造。

1952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关于宣传文教部门应无例外地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提出了"洗澡"的要求。这个指示说,校长、教师,"一般地说,使这些人物在群众斗争中洗洗澡,受受自我批评的锻炼,拿掉架子,清醒谦虚过来,对他们自己或对今后工作都是有利的"[①]。3月1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明确规定:"对各学校中严重存在着的各种具体的特别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应该充分揭露,并予以彻底批判;每个教师必须在群众面前进行检讨,实行'洗澡'和'过关'。""教师过关一般可以用分层过关的办法,即:(一)先让大多数政治思想上没有严重问题的人很快过关;(二)再帮助一批思想作风上有较大毛病,但愿意改正错误力求进步的人过关;(三)少数政治上或思想上有严重问题的人,在群众的揭发、检举和严格的检查下,进行多次反复的检讨,然后过关;(四)直到最后每校总有极少数政治上或经济上有极严重问题的人过不了关的,对于这些人行政上可按其情节给以停职调职或撤职等各种处分。"[②] 5月2日,中共中央《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清理"中层"的指示》规定:"根据北京和上海两地的经验,在这次运动中,可以而且应该让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教师,在做了必要的自我检讨以后迅速过关;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五的教师,是要经过适当批评以后再行过关;百分之十三左右的教师,是要经过反复的批评检讨以后始予过关;只有

---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第49页。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第118页。

百分之二左右是不能过关,需要作适当处理。"①

实际运动中的"洗澡""过关"当然不像文件中说的那样轻松,那样有分寸。在普遍"洗澡"之前,党组织、学习委员会(节约检查委员会)要把教师们排排队,根据他们的问题的多少与严重程度,确定洗"大盆"、"中盆"或"小盆"。洗"大盆"即在全校大会上做检讨,洗"中盆"即在全系大会上做检讨,洗"小盆"即在小组会上做检讨。初步确定之后,要先开"控诉酝酿会",即背着要检讨的教师,在群众(教师、职工、学生)中搜集他的材料,如他如何宣扬资产阶级思想、有什么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等,然后向他本人转达,要求他写出检讨报告或发言提纲。在普遍开始检讨之前,先作启发报告或典型示范报告。在检讨大会上,个人检讨之后,群众提出批评,然后决定是否过关。问题轻、态度好的,一次通过;问题重、检讨不够深刻的,要么再三检讨,要么"澡盆""升级"。对那些有抵触情绪或"顽固不化"的人,要开展群众性的反复批斗。像清华、燕京、辅仁一类学校,由于被视为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实施文化侵略的堡垒而成为运动的重点,几乎所有教师都"下水洗澡",并受到严肃的批判。

要求教授们在大庭广众面前"洗澡"过关,无疑是粗暴和过分的斗争方式。据说清华大学教授金岳霖、潘光旦都是检讨了 12 次方被允许过关。冯友兰先生几次检讨不被接受,最后说了违心的话,始获通过。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张东荪教授是有名的"反动分子",先后在历史、哲学、国文、心理四系联合师生大会上检讨两次,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检讨一次,并受到全校师生员工大会的批判。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先生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检讨 4 小时,讲到动情处禁不住热泪纵横,仍不获通过,全校师生还运用各种宣传工具对他进行批判,要他承认自己是"美帝分子",检讨怎样忠实地执行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3 册,第 175 页。

“美帝的文化侵略政策”。著名教育家、华东师大副校长廖世承与陶行知等同为杜威弟子，1919年起从事教育工作。他在南京东大教书时兼办的附属中学，是旧中国中等教育的一面旗帜。“洗澡”时，第一次大会检讨没有过关。有人指点说：“东大附中在教育界也是一面旗帜，这面旗帜一定要扯下来。”因此，他第二次做大会检讨时，把自己教育史上最光荣的这一页说成是最丑恶的一面，发言时声泪俱下，始获通过[1]。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作家徐霞村在全校大会上检讨3小时，“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无恶不作的恶魔”，仍不能过关，在“教育辅导小组”帮助下准备了半年，检讨仍不能通过，只得向领导表示“自知不配当人民教师，愿意离开厦大另谋生活”[2]。南京师范学院教授肖丞后来说，他当时检讨15次不得过关。为了过关，给自己加上流氓、地痞、光棍、学阀的帽子不算，还要按领导的指示，骂自己的老师章太炎不学无术、封建头子。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据参加过“洗澡”运动的老教授们说，当年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洗澡”时少有不流泪乃至痛哭流涕的。

“洗澡”运动的粗暴方式，严重地伤害了高级知识分子的感情。许多人完全不能理解何以用如此方式对待他们，但惧于群众运动的压力，敢怒而不敢言。在运动过后不久，若干高级知识分子发表的某些文章认为运动由于“基层干部”的错误而发生偏差，隐约地透露出一些不满。这些并未引起执政党的注意。随后接连发生了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批判胡风和肃反运动，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加剧。在1957年的“鸣放”运动中，这种不满情绪终于汹涌而出。这些情况，将在本书第9章加以介绍。在此，我们只引史学大师陈垣先生的一段话来评价思想改造运动。他在1957年5

---

① 廖世承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光明日报》，1956年2月6日。

② 徐小玉：《女儿眼中的徐霞村》，《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4期。

月底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说："旧知识分子都有一些高傲的气质，自尊心很强，'士可杀，不可辱'，多年治学的老教授，在大庭广众中，一次次检讨，或在火力很强的群众大会上被斗争，有时人家原是热爱国家的，而指着脸骂人家是反革命，那当然会使人感到无限委屈，抑郁难平，感情的创伤一时不易弥补，这是十分可以理解的。"[①] 陈老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学术界和执政党一致敬重的忠厚长者，他对"洗澡"运动的批评，当不会夸大其辞。

"洗澡"运动虽然简单、粗暴，但并非所有知识分子都不能接受这个运动。笔者早已指出，当时处在新中国初创时期，共产党政治的成功赢得了知识分子的衷心佩服，有些人也就由此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共产党人是高尚的，自己的思想确实充满了肮脏的东西，的确需要洗一洗，因此并不过分在乎这种过激的方式。季羡林先生回忆说，他当时是系主任，必须洗"中盆"。因为没有什么民愤，没有升人"大盆"。

> 在中盆里，水也是够热的。大家发言异常热烈；有的出于真心实意，有的也不见得。我生平破天荒第一次经过这个阵势。句句话都像利箭一样，射向我的灵魂。但是，因为我仿佛变成一个基督徒，怀着满腔虔诚的"原罪"感，好象话越是激烈，我越感到舒服，我舒服得浑身流汗，仿佛洗的是土耳其蒸汽浴。大会最后让我通过以后，我感动得真流下了眼泪，感到身轻体健，资产阶级思想仿佛真被廓清。
>
> 像我这样虔诚的信徒，还有不少。但是也有想蒙混过关的。有一位洗大盆的教授，小盆、中盆，不知洗过多少遍了，群众就是不让通过，终于升至大盆。他破釜沉舟，想一举过关。

---

① 《光明日报》，1957年5月31日。

检讨得痛快淋漓，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连同自己的资产阶级父母，都被波及，他说了父母不少十分难听的话。群众大受感动。然而无巧不成书，主席瞥见他的检讨稿上用红笔写上了几个大字"哭"。每到这地步，他就嚎啕大哭。主席一宣布，群众大哗。结果如何，就不用说了[①]。

季先生这段话说到了"洗澡"运动中的两种人，即"虔诚的信徒"和"蒙混过关"的人。除此之外，还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北师大教育系邱椿教授一类公然对抗运动的人。《人民教育》1952年4月号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邱椿是解放以来进步最慢的教师和思想顽固者之一，他认为"自己的思想没有什么可以改造的，自以为二十七年以前就讲过'唯物主义与教育'了"，"自以为'懂得'马列主义，读过一些马列主义的书。不去参加天桥的控诉大会；不愿意去听周总理的报告(借口头疼)。在听大报告时，就提出'苏联的教授是怎样学习政治的'，以此来抵抗学习。开小组会时是照例保持愤懑的沉默，一言不发；偶然发言，也是提出反动问题；本来是自己的话，却说是'有人说'；譬如，当讨论到旧知识分子是为反动派服务时，他就很阴毒地说：'有人问：旧知识分子是为反动派服务，兵工厂的工人是否为反动派服务呢？'""开始是这样的对抗，逃避思想改造，后来看到非学习不可时，就采取了消极应付的态度：'叫我读文件，我就读文件；叫我听报告，我就听报告；叫我联系实际，我就联系实际；叫我找材料，我就拼命找材料来充实我的教学内容。'最近又说：'我体会到所谓群众路线，就是群众的意见都是对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说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他说，对于思想改造，只想打'六十分'。三反运动以来，'只想如何混过关去就算了'"[②]。

---

① 季羡林：《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东方》，1994年第5期。

② 秋赤：《邱椿教授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彻底改造》。

还有一种人，数量极少，人们从来不愿或不敢提到，这就是运动中自杀的人，如杨绛先生撰文回忆过的清华大学化工系主任高崇熙先生和"虞先生"之流。这些人恪守"士可杀，不可辱"的信条，把"洗澡"过关看做人格侮辱，不理解为什么自己不去外国和台湾，自愿留下来为新中国服务反而受到如此粗暴的对待。自然，在思想改造运动或"三反"运动中"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还是极个别的人，但可以肯定一点：新中国愈演愈烈的知识分子自杀现象，此时已经出现。在反右派运动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许多旧中国过来的老一辈知识分子走上了这样的道路。仅以笔者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而言，就有著名生物学家武兆发，著名教育家董渭川、朱启贤，著名作家、诗人穆木天，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石磐、马特、王真等数名教授在"反右派"和"文革"期间自杀身亡。中国历史上这种空前的、奇特的、惊人的政治与社会现象，与发源于"洗澡"运动的对待知识分子的极端粗暴的态度与方式，不无关系。

4.3 红卫兵运动的先驱：学生斗老师

"洗澡"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青年学生被动员起来，作为一种"纯洁"的革命力量参加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们的批判与斗争。这种做法，不但影响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也给教师增加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外部压力。青年学生在"洗澡"运动中的表现，很有些像25年后的"红卫兵"。

中国的青年学生，自清末民初以来，一直是社会革命的先锋。青年的身体与思想特点，使他们天然地靠近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激进的青年学生群体为共产党输送了主要的领导与组织骨干，并长期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重要方面军打击与破坏国民党的统治。他们与大多超然于政治之外或游移于国共两党之间的教师，向来有着相当的政治与心理距离。五四以后，中国在从传统社

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过程中发生的文化断裂，革命时期学生与教师群体的政治与思想差别，逐步改变着大学校园里的师生伦理观念与现实关系。学生运动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共产党和毛泽东对他们的偏爱和优礼有加，使得青年学生特别是大学生群体滋长了盲目的骄傲情绪。他们天真地认为自己的思想最纯洁，政治上最革命，而那些喝过洋墨水的教授们的思想是肮脏的，政治上是保守、落后和迂腐的。正是这样一种本于青年天性和执政党有意培养、强化而形成的心理定势，使得他们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屡屡为“左”的力量所利用，一度成为最具破坏力的社会力量。在 1949 年下半年的政治学习运动中，有些学校的学习组织采取了师生混合编组的方式，或者直接由学生会主持召开各种会议，“帮助”教师提高思想认识。但是，正如政治学习运动比较松散一样，学生“帮助”老师的方法也还没有广泛的采用。“洗澡”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执政党第一次自觉地、有组织地利用青年学生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服务。

思想改造运动发起之初，并未提倡或要求学生来帮助教师改造思想。据当时报纸报道，在学习的第一阶段，北京农业大学曾组织学生参加教师的小组会并提出意见。北师大和其他各校也有组织学生给教师提意见的，但多限于教学而未触及其他。“打虎”运动开始后，运动骤然升级。对贪污分子即所谓“老虎”，自然要发动群众包括青年学生揭发、批判，形成围攻之势，以逼迫其交代问题，现出原形。当高校运动的重点从“打虎”转回到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时候，在“打虎”运动中形成的群众斗争方式也就自然地被运用于对待教师。中共中央在 1952 年 3 月 13 日的《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强调，“在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应该深入发动群众，特别要依靠学生群众推动教师”[①]，这就非常明确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3 册，第 117 页。

地把青年学生作为推动运动发展的重要力量。

《人民教育》曾在一篇社论中论述为什么要借助学生的力量来促进教师的思想改造。社论说:“教师之间彼此很客气,许多人旧包袱很重;青年学生思想比较纯洁,解放以来,他们在政治上一般比教师进步快;而且高等学校的学生已有相当的知识水平,在正确的领导下是可以很清醒地辨别是非,因此他们能够很热诚又很有力量地帮助教师前进。教师平常错误的言论和行动,学生都是亲耳听到的或看到的,教师当着学生检讨更要拿出诚恳坦白的态度,否则学生会当面揭发。所以有的教师感到这是‘脚底下火山爆发’,使他再也不能拖延不改了。”[①] 学生斗老师,是20世纪中国人的一大发明。

让学生斗老师,首先要打破学生对老师的崇拜,这就要宣传教师思想如何丑恶,损毁教师的形象。钱俊瑞们不讲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对教育与科学事业的贡献,不讲他们的爱国精神、敬业精神,不讲他们对新中国建设的满腔热忱,而是片面地、夸大地断定教师的头脑仍然为资产阶级思想所统治,把他们描绘成新中国最落后的一群。这类文章,学生自然是要“学习”的。新闻宣传工具、学校的学习委员会,不但宣传钱俊瑞们的观点,而且引导年轻无知的学生(有的甚至是中学生)千方百计地从课堂教学、课外活动、日常生活、私人谈话等各个方面去发现教师如何灌输和宣传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如何崇拜和散布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以证实教师正在毒害青年,阻碍教育改革,是确需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不但思想落后、政治落后,道德、人格亦不高尚,其中多有利欲熏心、言行不一、鼠窃狗偷之辈。大量毁坏教师形象的不实报道充斥于报刊杂志。《文汇报》的一篇文章甚至把教师比做患了传染病的

① 《高等学校教师必须通过“三反”运动认真改造思想》,《人民教育》,1952年4月号。

乳母，用有毒的乳汁哺育孩子，不但危害了学生的身体健康，也危害了学生的心理健康。这样，学生们起来批判与斗争老师，不但是完成党交给的光荣的政治任务，而且也是维护自己的权利。通过这种抽象与具体相结合的诱导，打破学生对老师的尊敬与迷信；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灌输“斗争哲学”，批评温情主义；以“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作号召，青年学生的激烈情绪就很容易被调动起来。

我们以1952年4月19日《文汇报》发表的北方交大一名大学生写的《教师应以严肃的态度对待思想改造》的文章为例，说明在这种教育和诱导之下学生对教师的心态。这名叫余爽的学生说：“今天有些高等学校的教师，为了保持自己的‘面子’和‘尊严’，自命清高，不肯暴露自己的丑恶思想，但又‘不甘落后’，于是乎不惜努力钻研，努力向报上搜寻‘绝妙好辞’，忙于‘效颦’，煞费‘苦心’，找到‘堂而皇之’的‘漂亮’内容，固然可以‘多方引证’，觅得‘尚待商榷’的丑恶形象，也可引以为例，显得‘吾道不孤’。”在揭露了华北某大学副校长和本校物理系一名教授抗拒运动的“劣行”之后，这名学生慷慨激昂地宣布：

> 寄语教师们：铲除资产阶级思想污毒，是严肃而愉快的斗争。抽屉里是藏不住东西的，不必矫揉造作，自欺欺人，欲前又止，“顾虑”重重，也不必煞费苦心地忙于“效颦”“查档案”，因为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丑恶本质虽然仅此一个，表现在形式上却是多种多样的，不一定“无独有偶”，只有赤赤裸裸的暴露全部思想，洗个既畅快又干净的澡，无比痛快之至，这是群众最欢迎的态度，这样才真正恢复和提高“教师的尊严”。事实上，拍拍肩膀，叫上几声老弟，在商场上也许是必要的‘过门’，拿到思想改造战场上，却是不解决问题的。水是丝毫不烫，就看自己决心如何！资产阶级思想是否能很干脆暴露出

来，华北各高等学校教师中有检讨三次乃至五六次的，宁非咄咄怪事！……一切“过火论”者，大可不必故调新弹，要知“时不我待，岁不饶人”！

这篇文章对教师尽情嘲讽，极端蔑视，以革命者的口气和姿态对教师颐使气指，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字报毫无二致。青年学生的这种情绪与心态，正是领导层有意诱导和希望看到的结果。

青年学生是天真的，他们中的许多人积极参加运动，确是怀了一颗真诚的心，要帮助老师进步。他们有组织地参加教师的学习会、讨论会、控诉会，帮助教师分析和批判他们的错误。为了做到有的放矢，他们组成调查组、访问组，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搜集教师的材料，如同教师本人和教师的家人、学生、亲友谈话，查阅课堂笔记和教授们的讲稿、著作，看其中有没有资产阶级的货色；研究教授们的历史交代材料，了解他们的思想发展，等等。他们到教师家中与教师谈话，有的人竟一谈8小时！在检讨会前，他们要对教师进行“启发”，这是资产阶级思想，那是封建阶级思想……教师必须“诚恳接受”。在检讨会、控诉会上，他们经常发表激烈的言论，对教师进行指名道姓的批评。教师检讨得是否“深刻”，能不能过关，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学生们的态度。教师处于被批判、被审判、被讨伐的地位。哪位教师对检讨思想不够积极、不够“深刻”，学生的“战书”立刻纷至沓来。黑板报、宣传栏、广播站、油印小报，成了发动学生和点名批判教师的阵地。燕京大学“三反”期间出了铅印的《新燕京》小报和油印的《三反快报》，辅之以大字报、大广播，《三反快报》出了近70期，有一天就出了3期。青年学生的表现当然不尽一致。许多学生对参加运动并不积极；但偏激情绪支配和笼罩着学生群体。有的人为了表现自己“政治进步”，汇报情况夸大其辞，批判发言越激烈越好。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之中，许多青年学生对教师完全谈不到起码的尊重。揭发教师的个人隐私、

私下谈话，成为普遍的现象。有些学生指责“落后”教师“简直是顽固堡垒，干脆送到革大或去劳动改造”，“这种人也配当人民教师！怎么还让其尸位素餐，拿人民一千多斤小米呢？”“还改造他干么，解聘算了。”[①] 有的给教师提出不符合实际的意见，或进行无限上纲式的批判，教师有所辩解，学生甚至拍案大骂。杨绛先生在《控诉大会》中描述的女学生对她进行无端指责的情景，绝非虚构。

教师是如何面对这些青年学生的呢？40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从为数甚少的“洗澡”运动回忆文章中竟然不能发现任何的材料。这种情况很容易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宽以待人的美德。记晚辈、学生之过，往往被视为“失德”，这也是近年来人们对季羡林先生写的《牛棚杂忆》多有非议的原因。然而，从当时报刊发表的指导学生帮助教师改造思想的文章和有关的经验报道中可以窥见，教师们对这种做法反感之至。有的教师说：“学生管教先生，开千古未有之奇闻！”“要怎样摆布就怎样摆布好了，何必软一阵硬一阵！”“你们的办法真巧妙，操纵群众打击了我，还说帮助我！”有的说，“阎王好见，小鬼难挡”。有的甚至说：“思想搞不通，一颗子弹就通了！”[②] 有的教师本来还有“深刻”检讨思想的打算，看到青年学生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害怕“言多必失”，也就一言不发了。有的认为在这个时代里，学生当了“天下”，教师“无地自容”，充满了自卑、自贱与愤慨的情绪[③]。中国人历来讲“师道尊严”，旧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教授一级的高级知识分子更跻身于社会名流之列，今天竟要他们面对学生娃娃们的批评和指责，内心

① 张汉正：《帮助教师“洗澡”必须掌握两个主要关键》，《文汇报》，1952年5月23日。

② 张汉正：《帮助教师“洗澡”必须掌握两个主要关键》，《文汇报》，1952年5月23日。李睿卿：《帮助教师思想改造的初步经验》，《文汇报》，1952年5月6日。

③ 若微：《以诚恳虚心的态度帮助教师进行思想改造》，《文汇报》，1952年5月30日。

的受辱之感与愤怒、不满之情可想而知。然而，他们又知道此非学生之过，除了默默忍受，亦无可奈何。

4.4 真假参半的忏悔：第三个知识分子检讨浪潮

"洗澡"运动就是检讨运动，检讨自己的出身，检讨自己受的教育，检讨自己的历史，检讨自己的思想，检讨自己的生活方式乃至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通过"检讨"，洗刷污垢，"换脑筋"。"洗澡"运动中的检讨，规模之大空前绝后，因为政治学习运动和批判《武训传》时，没有规定人人要检讨；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毕竟还有一部分"左派"或"革命知识分子"不用检讨，"洗澡"运动则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人们会下写检讨，会上念检讨。在以后很长的岁月里，"检讨"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岂止知识分子！)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成为一种特殊的人生体验。"自我检讨"竟发展成为当代中国特有的一种最有实用价值的文体！

我们现在所能读到的是当时报刊上发表的数以千计的自我检讨。报刊发表这些检讨，想必有制造声势、典型示范等多重用意。这些检讨的作者，大多是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各个领域有影响的人物和高级知识分子，且以有外国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为多。这些经过作者和编辑"千锤百炼"、精心修饰的"佳作"，态度"诚恳"，检讨"全面"，对个人"丑恶"的历史与思想坦露无遗。然而，除了冯友兰、朱光潜、贺麟等极少数人能够结合学术思想进行自我批判外，绝大多数检讨文章的立意、结构、行文如出一辙，空话连篇，"帽子"成串，从思想与语言的极度贫乏中显示出检讨人的被迫与无奈。今天拜读当年那些大知识分子们的泣血之作，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那种情理皆悖的自贬自辱。

第一是对家庭的贬辱。1952年1月，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范文澜先生在该院研究人员学习会上发表讲话，敦促知识分子检讨家

庭出身的影响。他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知识分子自己出身的家庭。我们知道，能进高级学校的人，他的家庭的经济地位，一般是在小资产阶级以上，无产者家里的子弟是不可能或极少可能进高级学校的，更不用说到外国留学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出身在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资产阶级的家庭，受的是中国外国反动阶级的教育，自己的职业收入，又过着比较富裕优越的生活。这样，高级知识分子的头脑里，必然存在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思想的影响，自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一些错误思想，不管多或少，反正不会一点也没有”[①]。在这样一种理论指导之下，凡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都必须批判自己的家庭，检讨反动的或剥削阶级的家庭出身对自己的影响，有的人甚至对自己的父母颇多不敬之辞。朱光潜先生说，他的思想中伏根最深的是封建意识。他从小跟父亲读书，由于父亲管教极严，从小养成一种懦弱拘谨的性格，没有一点冒险精神，后来自私自利，妥协动摇，都与这封建的家教有关[②]。陈鹤琴先生时而说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时而说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把他的家庭出身和家庭教育视为其改良主义教育思想的两个主要根源。他特别说到他的母亲“具有浓厚的封建旧道德，无论是家庭间相处或邻居发生纠葛的时候，她总是劝告我们要忍耐，并且常常说‘吃亏就是便宜’、‘求人不如求己’”，这是他思想上失去斗争性和革命性的原因[③]。燕大教授蒋荫恩说，他从小受到父亲的“洁身自好，力图上进”，“敬上厚下，与人无侮”的人生哲学的影响，形成了严重的个人主义和向上爬的思想[④]。诸如此类的事例，不胜枚举。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

① 范文澜：《科学工作者应怎样开展“新我”对“旧我”的斗争》，《光明日报》，1952年1月6日。

② 《在最近学习中的几点检讨》，《人民日报》，1951年11月26日。

③ 《我对“活教育”的检讨》，《光明日报》，1951年10月30日。

④ 《我要彻底改造我的思想》，《人民日报》，1951年11月13日。

人是划分为阶级的，人的思想必然打上阶级的烙印。知识分子的阶级和阶级意识首先受到生他养他的家庭的影响。旧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于地主家庭，少数出身于官僚或资产阶级家庭，出身于平民或劳动人民家庭的确是凤毛麟角。这样的家庭背景固然给知识分子以轻视劳动和劳动人民等不良影响，但如上述几位先生所检讨，中国的家庭给予子女的，多是不无积极意义的传统伦理教育，它们与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政治思想、学术思想有何关系？而且，在战乱不已的旧中国，凡肯出巨资送子女进大城市读书甚至到外国留学的，大都是开明的家庭。地主、资本家剥削农民、工人固然可恨，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极重人伦道德的国度里，让学有成就的子女来辱骂自己的家庭，贬抑自己的父母，至少是有悖于伦理道德的。

第二是对本人所受教育的贬辱。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大多在幼年时期接受传统的启蒙教育，青少年时期接受新式教育，中国的新式教育，固然还有不少的封建因素和西方文化的痕迹，但肯定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封建教育，恐怕也不能称之为买办教育。许多人到欧美留学，正是欧美的那些一流学校、一流科学家把他们带到了科学的前沿，并通过他们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回了中国。即使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拿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也不是毫无进步意义。以有利于还是有碍于中国社会的进步与新式人才的培养为标准，民国时期知识分子接受的教育，特别是新式科学技术教育的性质，是不难判断的。然而，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主导的观点是"旧社会的学校都是反动阶级办的，目的在于为反动阶级服务。所以凡是受过旧社会教育特别是受过高级教育的人，他的哲学、思想、知识、技术，都不能不打上反动阶级的烙印。在有关社会

的学说上烙印打得更是十分显著”[1]。这就迫使知识分子完全否定自己所受的教育,而不能有任何的异议。凡有留学背景的人,哪怕是学习自然科学的,都必须对自己所受的“资产阶级教育”和“帝国主义教育”作出深刻的检查。

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工系主任傅鹰教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位在1957年公开主张“共产党不懂科学,不能领导科学”,却因其大胆、直率而获得毛泽东特别赦免的真正的“右派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对自己的留学经历作过彻底的无情的批判。他说:

> 我是一个多么可卑可恨的人。一九四四年底我逃出蒋匪帮的统治去美国了。离开重庆时,我想着这次脱离了黑暗,走向了“光明”。我看见当时美国也和日本作战,就拿它当作中国人民的朋友。到了米西干大学,我的老师巴特尔待我极其殷勤,我心里便非常感激。我不知道他正在用一些小恩小惠来拉拢我,来收买我的感情,好忠心为他服务。他介绍我到一个美国兄弟会中去住,我心里觉得很骄傲,认为我不是一个平凡的中国人,我不知道这正是巴特尔的深思熟虑。我帮他指导过五个研究生直到一年前我还把这件事当作一件很光荣的事。……
>
> 因为被巴特尔的小恩小惠所笼络,又因为在五年中在美国发表了十篇论文,使我在学术界向上爬了一步,因此我就对美帝国主义发生了感情,念念不忘,而很少想到它是我们的死对头。……
>
> 我的崇美思想不但使我变成了敌我不分的肉喇叭,不断地向同仁同学散布毒素,也使我在学校行政工作上犯了严重

---

[1] 范文澜:《科学工作者应怎样开展“新我”对“旧我”的斗争》,《光明日报》,1952年1月6日。

的错误。例如我崇拜美帝国主义的"天才教育"理论,使某些同学产生了自卑感,学习情绪降低……中国有一种人叫"高等华人",他们虽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骨子里却充满了欧美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对美帝国主义的感情,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要控诉美帝国主义。巴特尔利用我求名的愿望,施一些小恩小惠,使我为美帝国主义忠心耿耿地服务了五年。他不仅买了我的劳力,还买了我的感情。我不分冬夏,整天工作,废寝忘食地为他制造论文。我为美帝国主义训练了五六个高级人才,他们现在正在做危害我们祖国的事,我被祖国人民养活了几十年,不但不能捍卫祖国,反而直接间接帮助了敌人。这是巴特尔以小恩小惠将我变成了美帝国主义的奴隶的恶果①。

中国知识分子遵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道德准则,非万不得已,不愿贬损自己的导师;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可以承认种种缺点和错误,但决不承认自己不爱国。傅鹰先生如此激烈地批判他的导师,检讨自己的崇美思想,是否出于真心呢? 否。1957 年 4 月,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发言,对思想改造运动怒气冲天。他说:"我最讨厌'思想改造',改造两字,和劳动改造联在一起。有了错才要改,我自信一生无大错,爱国不下于任何党员,有什么要改?""知识分子就是爱国。……我一生的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国翻身。"② "思想改造的时候,潘光旦(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著名社会学家——于风政注)的思想检查十二次不被通过,也算得是个重点人物。为了整他的思想'暗流',最后甚至动员到他的家属,想用儿女

① 《我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人民日报》,1952 年 4 月 5 日。

② 转引自龚育之:《在漩涡的边缘》,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54 页。

之情去逼一个学者承认自己不甘心承认的错误。方法用到这一步可以说是不择手段了。前几年,大学里的萁豆相煎的局面,今天回想起来也还是让人难过。有些人是无中生有的骂自己,有些人是深文周纳的骂别人。老教授上台检查思想,稍有辩说,底下拍桌辱骂之声纷纷而来,谁受得了这样的'帮助'?许多人在一些运动中自尊心被糟蹋,精神上到现在还舒不过气来。"[①] 为什么思想不通,检讨却如此"深刻"呢?为什么一个爱国的人要把自己说成不爱国呢?这就是政治的、群众的压力。吃过美国面包的人一定崇美,崇美便是不爱国。若不按照这样的路子检讨,就别想"过关"。

第三是对个人历史的贬辱。把知识分子在旧中国所做的工作统统看做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不自"洗澡"运动始,但在"洗澡"运动中达到了极端。教师是为反动统治阶级培养忠诚、温驯的奴才,科学家用科学与技术帮助资本家剥削工人,文艺家用小说、诗歌、戏剧、电影美化旧社会,麻醉人民的斗争,而那些曾经靠近共产党的民主人士,也不过是本质上为反动统治服务的改良主义者。所有作检讨的人都按照这样的观点和腔调否定自己的过去。陈垣先生一篇《自我检讨》,震惊了大陆乃至港台知识界。这位任辅仁大学校长23年之久、在沦陷时期也没有向日本人屈服、在教育界和学术界享有崇高威望的著名教育家、史学家,不但完全否定了自己的学术建树,而且对自己的历史与人格作了全面的否定。他说:

> 我为了个人的利益,为了个人研究的便利;又因为我认不清帝国主义的本质,看不见中国人民,所以在辅仁做校长,基本上是与帝国主义站在一个立场,对校务不管,让他们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而我当时实际上是俯首贴耳,唯命是从,因此得到帝国主义者的信任,得到帝国主义的重视。我为了自己

① 叶冈:《说实话要比歌功颂德好》,《文汇报》,1957年5月19日。

好名，为了自己“清高”，为了不愿沾染当时的政治气氛，就毅然的离开政治舞台，自以为是找到一个理想的栖身之所，而实际毫没有人民立场丧失了民族气节，驯顺安适地投到帝国主义的怀抱。二十三年来，做了帝国主义者的俘虏，忠实地替帝国主义者奴役和麻醉青年，帝国主义者就通过我，稳扎稳打来在学校里做着“太上皇”。二十三年来，通过我给青年们灌输奴化教育，培养出为他们服务的人材，贻误了多少青年子弟，还自以为“超阶级”、“超政治，还自以为“清高”，其实就是做了几十年污浊、卑鄙的买办和帮凶，而不自觉。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行为，是比杀人更厉害，更毒狠的。后面操持着的人，固然是帝国主义分子，而拿着武器，在最前线冲锋陷阵的人，却是自以为“清高”的我①。

青年毛泽东最崇拜的两个人物之一，时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先生，在1952年1月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名为《读了斯大林〈十月革命底国际性质〉以后》、实为自我检讨的文章。他说：

象我自以为三十多年来专心搞“中国文字改革运动”的，对于社会发展总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撇开了政治的立场而把“革命”与“改良”孤立地用在技术上和社会运动方式计划上；经过学习，才确认自己在历年的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居然能够“和平相处”地进行文字改革运动，真是从头至尾不折不扣的“改良主义者”：明知这种“变更”中不成功的，那就是“失败主义者”；假如这种变更果然成了功，那就更是进一步的“帮凶”。特别是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任职也继续了三十

① 《光明日报》，1952年3月6日。

> 多年，在九三学社组织活动以前，可以说，完全是替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对于青年们起了很多的坏作用、恶影响，这是连"改良主义"都说不上的。

陈垣、黎锦熙先生自贬如此，何况他人！研究哲学、语言、文学和各门社会科学的学者要这样否定自己，研究自然科学和从事技术工作的人们也不例外。曾任北洋大学校长的张含英教授是旧中国最著名的黄河水利专家，1941年即主持黄河水利，是旧中国公认的有事业心和献身精神的学者。他在1952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我开始认识自己》的检讨中是怎样评价自己的历史的呢？他说："我是学习水利工程的，尤其注意了黄河的治理，很有'事业心'，想把它治好，造福人群。所以在二十几年中，'锲而不舍'地研究，不管参加这项工作，或担任别种工作，在业余的时间，总是专心致志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因之得到许多人的称赞。我现在觉得这个外衣里面还隐藏着很多不洁净的东西，因为在这一事业心里还夹杂着个人兴趣和个人荣誉(至于这一事业将有利于人民，还是有利于反动统治阶级，以前就更没有想到)。"1948年以后主持北洋大学的工作，"我虽然是善意地办学校，我虽然主观地一切为了学校，但是我所代表的是反动统治阶级，和群众利益是对立的。既然对立，虽然学校上了轨道，对同学们有益处，但也有助于反动政府的统治。……由此可见我过去没有敌我观念，更分不清敌我。这种落后的、糊涂的思想就使我很有条件做反动统治阶级的花瓶和帮凶，事实上反动统治阶级也认识了我这个花瓶和帮凶"。

旧中国最著名的工程科学家、以修建钱塘江大桥闻名于世、时任北方交大校长的茅以升先生在《我的检讨》中承认，自己过去30年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两大特性：自高自大与自私自利。他给自己扣了13顶大帽子：英雄主义、技

术观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保守主义、妥协主义、适应主义、宗派主义、雇佣观点、官僚主义、本位主义、改良主义、温情主义[1]。大概茅先生给自己扣的帽子太多，不免滑稽，“有失严肃”，态度极不“端正”，因而受到公开批判。于是，他又发表第二篇公开检讨，把自己描绘成一个三十年如一日，一心追逐个人名位，除修了一座桥梁外“几乎什么好事都未做”的“国民党反动派利用的工具”[2]。

第四是对个人思想境界的否定。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确有许多缺点和弱点，但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至少并不缺乏爱国精神、敬业精神。他们的思想境界与道德情操也许不能与出生入死推翻反动统治的共产党人相比，但仍然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重要守护者。在“洗澡”运动中，他们却用近乎粗鲁的语言，把自己描绘成思想深处最为自私自利和卑鄙无耻的一群，如茅以升先生然。自贬虽甚，却也有度。譬如他们都说自己的思想是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说是资产阶级思想，而在批判者们看来，“盖着‘小资产阶级’盖子的这个瓶子里，就十有八九装的是资产阶级的酒，而且还大半都是腐烂不堪的‘美国酒’。这也不稀奇，原来他们大半都是曾经‘爬了上去’的‘美国留学生’，这点腐烂的酒，就是他们‘远渡重洋’，‘吃尽苦中苦’，辛辛苦苦地贩回来的，所以当有人要他倒掉的时候，就紧紧地塞住了瓶口子”[3]。

“洗澡”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检讨涉及的当然不止以上几个方面。这种自贬自辱的检讨，完全打掉了知识分子的自尊和自信，彻底败坏了知识分子的大众形象，助长了鄙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社会风气。这些检讨许多是群众包括学生帮助“提高”认识的结果，所以，它又加剧着师生关系的危机。影响之恶劣、之深远，难以估

① 《光明日报》，1952 年 2 月 21 日。
② 《什么是我三十年来的主导思想》，《光明日报》，1952 年 8 月 13 日。
③ 于子：《胜利在于彻底》，《文艺报》，1952 年第 7 号。

量。

自贬自辱的自我检讨,最大的危害,还在于直接地威胁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以发明思想、发现知识为根本使命的职业集团的存在。当代中国和海外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黄平教授在《二十一世纪》1995年4月号发表的《当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非知识分子化》一文,从话语系统转换的角度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思想改造运动是新中国知识分子经历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话语转换,"其不仅表现为全国各地区的文人、学者、教师、艺人、编辑、记者的大规模投人,而且也表现为它对上述人所起的'教育'作用,知识分子在被纳人新体制下行政化了的单位的同时,通过思想改造运动也开始从意识形态上被并人一套全新的话语体系,他们不仅要清除旧的观念从而确立新的观念,而且表述新观念的方式(包括用字遣词)也都要相应地改变。从发表在全国主要报刊上的著名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来看,从内容到形式,在很大程度上都互相雷同:政策性强,词条量少,句法简单。一个简单的解释是自我批判者照抄社论文件。在这个显而易见的可能性背后,隐含着另一种可能性,即长此以往,昔日的学界泰斗文坛大师将习惯于使用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的简单语言去应付政治学习与政治运动,去被迫自我批判与批判别人,进而去进行在新体制下并适应这一体制的日常思维"。失去了独立思维的权利与能力,知识分子也就不存在了。

4.5 欧美派大知识分子的屈服:教育思想的检讨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重点是教育界,目的主要在政治,但为转换教育模式扫除障碍,也是直接目的之一。对来自欧美的教育模式、教育思想、学风、教材教法等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清理,也就成为"洗澡"运动的重要内容。

以清华、北大教授为首的有欧美留学背景的高级知识分子，在1950年6月的全国高教会议上公开抵制高等教育模式的转换，致使院系调整计划流产，这一事件对领导层的强烈刺激，显然是发动思想改造运动的重要动因。运动提出的第一个口号就是“彻底肃清欧美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残余”。这里说的“欧美资产阶级思想意识”，首先指的是欧美的教育思想，特别是培养“通才”的大学教育模式。运动中，在清华、北大和一些重点大学，曾严厉批判对院系调整、大学办学模式发表不同意见的教师，把问题上升到“反对教育改革”、“崇拜美国”、“洋奴思想”、“买办思想”的高度。

清华大学教务长周培源教授站在领导层的立场上，是这样批评那些抵制院系调整的人们的。他说，在那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教育部提出的高等学校规程中即有调整大学院系的意图，“但大部分到会的代表们，对于调整院系都抱旁观态度，不加可否。当时清华大学的教授们，也不愿意谈到自己的问题，总以为高等学校的组织规程只是应用到旁的学校，而与清华无涉”。“一年半以前，为什么一般大知识分子不能接受院系调整计划，以便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呢？理由很简单，主要的原因是思想问题，其中尤以崇美思想为主要因素。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有民族自尊心的，主观上或许决不有意识地宣传帝国主义的文化教育。但事实上，因为中国的旧知识分子直接间接地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许多大知识分子都是留洋学生，受资本主义国家教育的影响，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教育影响特别深，不自觉地以为过去学得的一套是天经地义，不愿意放弃，甚至在大学里讲书都要用英文，也不肯虚心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主张大学的学生主要是学习基本知识，实际知识等毕业后到工厂里再学，“无疑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思想的残余”。文、法、理、工、农、医、教育、财经混合的综合性大学是“自由主义的产品”。“一年半以前大部分的高级知识分子不能接受院系调整的理由，也就是希望文、法、理、工……的同事同学

在高等学校的围墙内，过着绅士般的生活，而与围墙以外的广大群众隔绝。"①

那些犯了"错误"的教授则纷纷检讨。钱伟长教授说，他在高教会议上反对院系调整，是受了长期的美国式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直认为混合大学比专科性大学"高贵"，这正是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表现，因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混合大学一般是资产阶级子弟所进的学校，是他们进入社会统治阶层的晋身之阶；专科学校一般是技术性的，是为资产阶级培养工具的。而在人民的国家，两类学校都是培养建设人才的场所。他还检讨说，当时反对院系调整还有"清华本位"的思想作怪，觉得清华培养了不少国际知名的学者和科学家，办学是有成绩的。其实，"清华大学过去的所谓光荣，只是出洋回国做教授，贩卖美帝国主义文化的买办式的光荣，是甘愿为美帝国主义传播文化侵略影响式的光荣，是甘愿为帝国主义服务、奴役中国人民思想的光荣"。清华培养的一些"英才"解放前是为帝国主义、反动派服务的。解放前清华的领导思想是为反动派服务、与人民为敌的思想。清华的崇美教育、纯技术的英才教育，不知在精神上屠杀了多少有为的青年。"这样一个可耻的反动的旧清华，早应该在思想上死亡消灭"。他还说，他一直追求清华大学办学的国际标准，强调研究，注重提高，争取把清华办成加省理工大学那样水平的学校，"这种思想是没有人民立场的，没有根据中国人的利益来考虑我们学校的发展方向"②。

北大工学院院长马大猷教授检讨了他反对办独立的工业大学，而主张办理工大学的错误。他说："在解放初期，我很不愿意听到院系调整的说法。""我在那时是不认识教育应该为人民服务的，我只是把办教育当作满足自己的兴趣、施展自己本领的事情。"后

① 《从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谈肃清崇美思想》，《光明日报》，1951 年 12 月 2 日。

② 《我跳出了帝国主义的陷阱》，《光明日报》，1952 年 4 月 20 日。

来,“我虽然由于自私原因表示赞成调整院系,但是在一九五〇年高等教育会议中提出独立的工业大学的原则时,我是第一个反对的。我自己出身于理学院,和理学院有很多联系,我就觉得理、工学院关系密切,不应分开,所以我反对工业大学而赞成理工大学。我那时说在独立的工业大学内请不到好的数学物理教员,同学们的基本训练就要受到严重损失。我并且拿一些独立工学院为例,证明我的说法。我当时想,好的数学物理教员必须有个自己的系,能培养自己的学生,他们才觉得有前途。在独立的工业大学里教的都是别人的学生,又限于浅近的基本课程,他们如何能有兴趣?一直到‘三反’运动中仔细检查自己的思想,我才发现我这种想法的错误。我这种想法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表现”。“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就是因为我们高等学校教师们的资产阶级思想在作祟,使祖国的高等教育在解放后三年还没有彻底的改革。”①这位老先生可能真的以为自己犯了莫大的错误,然而,30 年后工科大学纷纷改为理工大学并向综合性大学发展的事实证明,当年的主张不是“错误”,而是“远见”。

南开大学化工系教授丁绪淮曾撰文主张大学坚持“通才”教育。他检讨说:“我过去是赞成‘通才教育’的。解放后的最初一段时期,在讨论课程专业化的问题时,我仍旧主张在正规大学里不应该实行专才训练,应该实行通才训练,倘若有专才训练的必要,不妨在大学里附设专修科或另外设立专科学校。由于我的‘通才教育’思想在作祟,我对课程改革的精神就不重视,对课程精简就敷衍了事,有名无实,对于学时制度也就不严格地遵守。我过去何以赞成‘通才教育’而不赞成专才教育呢? 这是和我的个人主义思想分不开的,因为我从美国学来的那一套技术就是通才训练,若要专业化,我专不起来,至少也需费很多工夫才专得起来。专业化会妨

① 《拥护工学院调整方案》,《人民日报》,1952 年 4 月 20 日。

碍我个人的利益,所以我不赞成。经过这次的思想检查,我才从社会经济的本质上解决了通才训练和专才训练的问题"[①]。丁绪淮先生的检讨不免肤浅与荒唐,因为当时以费孝通为代表的欧美派大知识分子反对"专才"教育而主张"通才"教育,是出于对大学教育规律的认识,是对新中国高教模式的慎重选择,反映的是一种教育思想,决不能以"个人主义"来解释。然而,这却是当时标准的检讨模式,即一切问题除了上升到"崇美"的政治高度外,还要承认名利熏心,以证明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大知识分子们的内心之龌龊、人格之低下。

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旧中国的大学,崇尚"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这样一种"自由主义"的办学方针和学风,使大学保持相对独立的地位,轻则使大学不能很好地为现实的政治统治服务,重则使大学成为生产和传播异端思想的阵地,对现存社会制度造成严重威胁。国民党统治时期就是这样。新中国成立后,如果容忍大学保持其传统的办学思想与学风,就会成为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因此,思想改造运动中,对主要由蔡元培先生倡导的这种办学方针作了批判。北大在这场批判中带了头。

有代表性的文章要数北大法学院院长钱端升教授的《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于祖国而学习》。他说,北大的突出缺点是自由散漫,对此,"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而将他在北京大学的主要教育思想——所谓'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长期地保留在北京大学之中的老一辈的教师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则应负更大的责任。人民的思想和学术是应当自由的。但是,在蔡先生长校的时候,思想自由的具体表现是'兼容并包',更具体的表现则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占有统治的地位。在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大学中,如果有人企图以当年占着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思想来和工人阶级的

① 《检查我过去的教学态度》,《天津日报》,1952年4月7日。

思想分庭抗礼,是不是可以呢?我想是不可以的。至于'学术自由',不但一开始就和实际相脱离,以后更演变为院系各自为政,以及学术与政治对立,技术与政治对立,为学术而学术等种种严重的而且至今还没有肃清的错误思想"。"北京大学毕业的人们和在北京大学工作多年的人们容易为北京大学的光荣传统所迷惑。应当问:除了'五四'以外,北京大学的光荣传统究竟在哪里?""我们除了宣布胡适的思想为敌人的思想外,还应好好地批判蔡元培先生的思想和这思想所遗留在我们中间的影响。"他认为,解放以后,北大在前校务委员会主任汤用彤教授领导下,"长期存在着的自由散漫基本上是没有被纠正的"①。马大猷教授11月2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附和钱氏的观点。当然,也不是没有人为蔡氏辩护。如北大教授金克木先生在《政治学习必须解决实际问题》一文说:"蔡孑民校长当时的'兼容并包'之所以有进步意义,是因为他容了进步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因为他容了保皇党。"② 但是,这种观点并不占主导的地位。

崇美思想,是教育界思想改造运动批判的重点。诸如清华、燕京、协和、辅仁这样一些与美国有密切关系的学校,自然成为思想批判最激烈的地方。这些学校在长期办学中形成的某些办学风格,即所谓"清华精神"、"协和精神"、"燕京传统"等,受到严厉的批判。如清华大学数学系华罗庚教授在《我们只应当有一个传统——为人民服务的传统》一文中说:"清华一家"、"清华精神"这些口号,原本是旧社会的产物,是"帮口"中的术语。"清华精神"包括了一些买办思想,"它曾经把美国货物的推销员送到了中国社会里"。清华一贯的崇美教育使一些学生忘记了人民和祖国,甘愿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服务。"'清华精神'中颇有些不干不净的糟粕,

① 《光明日报》,1951年11月20日。

② 《文汇报》,1951年11月22日。

它缺乏斗争性，更缺乏火一般的热爱祖国的热忱。更坦白地说：'清华传统'的精神根本不是为人民服务的传统！"华先生还说，"过去的清华是为少数人服务的，而所培养的对象仅是些所谓优秀的'选民'。而反映这种思想的表现之一，就是所谓'天才教育'"。这种"天才教育"和"选民教育"又养成了清华人自高自大的心理。清华的教师是崇美的，它的研究工作完全是"半殖民地式的研究"，是"洋人头上的一朵花"，"既无根，又是旁人的装饰品"[①]。华先生人在清华，但并非清华出身，比起清华出身的人来，他对"清华精神"的批评还算是温和的。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人们不但完全否定这些学校为国内外所公认的办学成就，否定它们的办学模式、办学经验，更统统戴上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堡垒"、"买办"、"洋奴"、"卖国"等的帽子。

"为学术而学术"思想，同样是批判和检讨的重点问题。"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有学术研究不为名利所诱、不急功近利、不为世俗外物所动等多重含义。旧中国政象纷乱。在封建法西斯专制之下，知识分子因言得咎、丧命，实乃常事。为规避政治风险和纷扰，在困难的环境中有所作为，"为学术而学术"遂成为大学中的主导风气。这就是说，旧大学中"为学术而学术"的风气既是大学性质与任务使然，也有社会环境的影响。政治学习运动批判过"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批判进一步升级，并成为学术界、教育界人人检讨的重要内容。"为学术而学术"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教育阵地上的表现"；主张"为学术而学术"，就是"利用各种方式方法，对人民散布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观点，借以毒害人民和维持资产阶级的剥削地位"，因为任何一个教育工作者都是分属于不同阶级的，没有超阶级的可能。"抱有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教育工作者，最喜欢高唱'超阶级'、'超政治'、'纯科学'和'纯学

① 《文汇报》，1951 年 11 月 17 日。

术'的论调,实际上都是透顶的虚伪,或者简直是透顶的荒唐。"[①]

在这样的导向和压力之下,教授们极不情愿地、表面上又十分"深刻"地批判过去"为学术而学术"的错误。以文史考证为专业领域的周一良教授说,他在解放初的政治学习运动中学习了历史唯物论,认识到过去有些文章的观点、立场有错误,但是,讲"考据之学"的人们偶尔谈起过去的工作是否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大家异口同声地不承认,觉得我们的考据工作不作理论解释,更与政治无关,当然没有为统治阶级服务"。现在他认识到,典型的"为学术而学术"的考据工作,只是满足个人的兴趣和虚荣心,既不是当时人民大众所需要,也与轰轰烈烈的人民革命无关。在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人民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学报上发表的研究论文看得出这些情形吗?这样的研究工作不是在反动统治的粪堆上插花,不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又是什么呢?[②] 周一良教授在运动早期作的这个检讨,非常符合批判"为学术而学术"的标准套路,即始则归结为个人兴趣、个人虚荣、个人名利;继之上升为"超阶级"、"超政治",躲避现实政治斗争;最后上升到以学术散布资产阶级思想,为反动统治服务。

旧中国的大学大多照搬欧美办学模式,教师多为欧美留学生;又由于中国科学落后,竞争中的大学办学目标须力争达到所谓"国际标准",所以课程设置多仿欧美,教材多用外国原版,大学教师讲课、写讲义,常用英语和英文。这种在旧中国视为理所当然的现象,革命胜利之后显然与国家、民族的独立地位不相称。所以,李达等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即提出"撕破洋博士的伪装,改为中国语言教学";认为教材用外国原版,讲课用外语,学生花很多时间学外语,浪费了学生精力,降低了教学效率,"隔阂了业务知识,感染了

① 华岗:《清算教育工作者的资产阶级思想》,《文汇报》,1952年2月20日。

② 《我们的思想改造从哪里做起?》,《光明日报》,1951年11月23日。

资本主义的欺蒙",是殖民地思想的反映①。1950年7月,教育部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中规定:"今后各学校各系各科的教材除外国语文系科外,应逐步做到一律用本国语文。"然而,由于一部分高校教师坚持认为使用原版教材有利于学生接触国际科技前沿,也由于几十年的习惯难以一时改变,所以使用国语教材的进程十分缓慢,用英语授课的现象至少在理工科院校还大量存在,学校对学生的外语水平的要求也没有降低。

在"洗澡"运动中,激进的青年学生对这种现象发起了猛攻。有趣的是,攻击战的先锋队,不是清华、燕京、辅仁等历来完全用英语教学的学校,而是天津大学的学生。在"洗澡"运动的高潮中,天大学生致信中央教育部,激烈反对使用外文教学。《人民教育》连续发表天大学生的来信、文章和报道,认为使用外国原版教材、用外语讲课、要求学生学习外语,是崇美思想的反映,表现了对祖国语言的轻视,是殖民地化的烙印,是人民思想与人民敌人的思想的严重斗争②。非外语系科采取英文教材,利用英语教学,在为帝国主义培养买办奴才、推销商品等方面,有巨大作用,对于传授学生以系统的科学知识,则不仅没有帮助,反而为学生的学习布上了一层人为的障碍,降低了学习效果。这种情况还诱使一部分学生崇拜美国和留美教授,"这种思想发展下去和'美国的月亮圆'又有什么区别呢?"他们认为,这种现象证明"买办资产阶级思想仍然盘踞着我们学校的领导地位,教学上还是欧美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一套;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和工人阶级思想夺取领导权的问题"③。许多学生"控诉"教授们要求他们强化英文学习、阅读英文原版书对

① 《李达谈高教问题》,《光明日报》,1949年7月23日。王遵明:《工学院教授当前的三重责任》,《光明日报》,1949年10月12日。

② 杨民华、郑西鸿:《必须用本国语言进行教学》,《人民教育》,1952年2月号。

③ 《天津大学应清除买办资产阶级思想》,《人民教育》,1952年4月号。

他们的健康和思想造成的"危害"。批判之声如此激烈，情况自然迅速改观。"三反"以后，教材迅速改为中文版，再没有教师敢用英语授课，或要求学生阅读英文书籍。《人民教育》报道说，曾受到批评的天津大学电机系徐庆春教授过去不在黑板上写一个中文字。此后，他不但使用中文课本，做中文笔记，编中文讲义，而且，在黑板上不写一个英文字母。从此以后，把重视外语的学习和使用，同崇美崇洋的买办思想、殖民地思想联系在一起，中国大学生的外语水平遂一落千丈。

在反对"超阶级、超政治"的旗帜下，对所谓"单纯业务观点"的批判，打击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败坏了学生群体的风气。凡鼓励学生努力学习的教师，都被指责为用资产阶级名利观念腐蚀学生。北大数学系主任在每年的迎新会上都要说："数学是一种美好伟大的事业，数学本身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花园。""北大数学系的图书全国第一，你们将来可以用来作研究。"批判者说这是"麻醉新同学，使新同学一到数学系就被弄得昏头昏脑，整天往这个引人入胜的'花园'里钻"。动物系有一位叫张瑾的同学，听了系主任的话，专门作壁虎研究，晚上捉壁虎，白天喂壁虎、解剖壁虎。系主任鼓励她好好学学比较解剖学，将来作比较解剖学家。她还想在毕业前把本不是动物系学生必修的理论化学、电磁学、高等微积分都学完。这样一个有志向、肯钻研的好学生，竟被说成是"单纯技术观点"的俘虏，为此要进行深刻检讨[①]。重庆大学矿冶系一位教授对学生说："石油工业在中国还是萌芽时期，'专家'很少，你们赶快努力。"这就是超政治、超阶级的单纯技术观点。对"单纯业务观点"的无端指责，使得教师无所措手足。复旦大学理学院院长卢于道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把旧社会比做一个臭毛厕，说凡是从旧社会来

① 《北大部分教师的"单纯技术观点"严重地妨害了同学的健康和进步》，《光明日报》，1952年4月5日。

的人,身上都带着臭味儿。"我在学校里,每次听到人家说要提高业务,总是引起我担心,甚至于毛骨悚然,怕的是把臭味儿从教课中灌输给纯洁的青年"[①]。这位大科学家的话究竟发自内心还是对荒谬现实的讽刺,我们无从考察,但由此可见,无端批判所谓"单纯业务观点"、"单纯技术观点"这种在新中国成立初即已出现的"左"的偏向,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对后来中国的教育、科技事业造成了无可估量的危害。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对于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批判,既有合情与合理之处,又非常机械、片面和粗暴。说它合情,是革命胜利以后,在政治上获得了独立的中国人民,强烈地要求同时获得文化教育上的独立,不但教育主权要收回,大学要由中国人来办,而且教育模式、教育思想、教学方法也必须有自己的创造,不愿跟在洋人后边亦步亦趋,这其中搀杂着若干褊狭的民族情绪,但合乎中国人民的愿望,不应过分责备。说它合理,是旧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学校布局、系科与专业设置、课程、教材、教法等各个方面,都严重地脱离实际,难以完成革命胜利后为国家建设大量培养人才的任务,确需进行重大的调整与改革。它的机械与片面之处,是在激烈的革命情绪与民族情绪支配之下,过分夸大了教育的意识形态属性,完全否认教育同时又是一门科学,否认旧中国高等教育的成绩与经验,否认欧美教育确比中国先进与发达,并由否定旧教育进一步否定和批判老教师的学术研究、教学工作,则必流于片面和粗暴。

对欧美教育思想的批判,对旧大学的彻底否定,特别是无限上纲的粗暴批评和"洗澡"运动形成的强大政治压力,扫除了高等教育改革的障碍。不管大学里那些喝过洋墨水的大教授们是否真正地改变了思想,公开反对院系改革的声音是消失了。1951 年 11

① 《拥护思想改造运动》,《文汇报》,1951 年 11 月 19 日。

月，中央教育部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公布了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1952年6月至10月，京津地区、华东地区、西南地区、中南地区先后开始院系的全面调整，至1953年全部完成。中国的高等教育迅速地放弃欧美教育模式，转向了苏联式的“专才”教育。

4.6 反科学思潮的泛滥：科学界的检讨与政治批判

科学界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涉及的重要领域。旧中国留给新中国的科学事业非常落后，新中国成立初，中国科学院仅有研究人员320人，另有铁道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约100人。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是由一身而兼教学、科研二任的大学教师进行的。因此，思想改造运动中，对于科学研究工作的批判与冲击，其对象范围是包括专业科研人员和大学教师的。

为什么科研人员要改造思想呢？范文澜先生曾有所阐述。他说，中国科学院进行思想改造的目的是：“肃清科学界中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思想的影响，批评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一些错误思想，确立革命的人生观，从而使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能根据国家建设和人民的要求来进行改革”，把“思想上非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切实地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①]。这种表述说明，领导层在发动科学界的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它与教育界的区别：教育的属性毕竟具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可以作政治性的批判或提出政治性的要求；科学中的自然科学不是意识形态，没有政治含义，用政治标准去衡量、批判和要求本来不具备政治属性的事物，必然要发生偏差。

科学界思想改造的特点，首先是继续用狭隘的阶级观点评价

① 《科学工作者应怎样开展“新我”对“旧我”的斗争》，《光明日报》，1952年1月6日。

以往的科学与科学工作者,否定旧中国科学工作者的全部历史和工作。本书第二章第六节曾经指出,开国前后即有人认为科学是有阶级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帮办"。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领导层仍然坚持和放任这样的观点,并用这样的观点去批判科学工作者,似乎在工人农民掌握政权的国家建立之前,世界上根本不应该有科学、科学研究和科学工作者。

当然也有人敢于比较实事求是或者以比较缓和的口气评论科学工作者。如新中国成立后冲破美国阻挠返国的著名核物理学家、原中研院院士赵忠尧教授说:"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多年来受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喘不过气来。解放以后,虽然领受到伟大胜利的果实,都非常兴奋,愿意在祖国建设中尽最大的努力。但是因为旧习惯旧思想的障碍,又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是不无矛盾。""中国知识分子,向来不注意实际问题。一般科学工作者,也很多犯这种毛病。曾经留学欧美的人,更容易染上他们的学院式作风。一方面由于主观上的好高骛远,另一方面也因为中国学生在外国作研究,毫无主动机会,即使稍有心得,无非配合他们的需要,回来以后,自不能应用在祖国建设上。尤其因为过去的反动政府,既然不想建设,更不想靠本国的人才建设。所以中国的科学工作者,除了少数例外,大都缺乏实际经验,而只在理论上打圈子。"① 赵先生这段话既承认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确有缺点,指出了发生缺点的原因,同时申明科学工作者在旧社会是被压迫者,而不是统治阶级的帮凶或工具。当然,他也不敢为科学工作者作更多的辩护。

对所谓"资产阶级"科学的批判,是科学界思想改造运动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关于自然科学有无阶级性的问题,陷入了更严重的混乱。一方面,承认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另一方面,又将自

① 《我对于这次思想改造学习的初步体会》,《文汇报》,1952年1月5日。

然科学与技术冠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之名而加以粗暴批判的现象随处可见。譬如《人民教育》1952年7月号《在各级学校里为贯彻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而斗争》的社论说：“有些学习自然科学的人，常借口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还想完整地保存从资本主义国家学来的那一套，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新事物，则采取或明或暗的拒绝态度。要知道自然科学确是没有阶级性的，但在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的教材中，却常常搀杂着唯心主义的毒素；同时，即使在科学技术上，资产阶级的科学技术有许多地方也相当落后了。”“要剔除资产阶级科学知识中的朽草烂木。”这种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说法，实质上还是坚持自然科学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分、唯物与唯心之别。与此相联系，就必然无理地强制知识分子违心地放弃或批判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贬低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无原则地吹捧和照抄苏联。如果哪位教授敢于赞赏西方的科技，传播西方的科技信息，那就是严重的思想问题，就要受到政治性的批判。

科学界粗暴的政治批判，莫过于生物学领域内对摩尔根遗传学的否定。苏联从40年代开始在自然科学领域掀起大批判运动，批判自然科学中的所谓“资产阶级思想”。李森科一伙拉出果树学家米丘林作大旗，编造出一个所谓“无产阶级”的米丘林学说，而对“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唯心的”、“形而上学的”摩尔根遗传学说大加讨伐，甚至从“阶级斗争”的高度，对摩尔根学派的科学家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新中国建立后，科学界被强制接受“米丘林学说”，并要以此改造思想，修订教学内容和科研计划。新成立的北京农业大学的主要负责人乐天宇积极推行“米丘林学说”，批判摩尔根学说，迫使著名遗传学家李景均教授愤然出国。乐因违反知识分子政策受到批评，但强制推行“米丘林学说”的活动并未受到遏制。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对摩尔根学说的批判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1952年4月至6月，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三次

召开生物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以政治压力强迫与会科学家接受“米丘林学说”，批判摩尔根学说。同年6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为坚持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的文章，认为“米丘林生物科学是自觉而彻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生物科学的伟大成就”，“米丘林生物科学不是生物学的‘一个部门’，而是生物科学的根本变革”。摩尔根的遗传学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伪科学，必须以米丘林学说来肃清摩尔根学说对遗传学、生物学的影响，彻底改造生态学、细胞学、胚胎学、微生物学等生物科学部门。

新中国成立时，我国生物学界、遗传学界、农业科学界的主要学者都是英美留学生，有些人在摩尔根的研究室做过研究工作，他们的教学、科研都以摩尔根学说为指导，农业院校或大学生物系有关遗传学和育种学的课程也以摩尔根学说为基础。他们不相信或信服所谓“米丘林学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谁敢说“米丘林学说”不如摩尔根学说科学，那就是政治上反动。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摩尔根学派的科学家们不得不做违心的检讨，而称颂“无产阶级的、先进的、唯物的米丘林学说”。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戴松恩教授等摩尔根学派的头面人物，被迫公开发表检讨。北农大的蔡旭教授在小麦育种方面有突出贡献，李竞雄教授是我国杂交玉米的开创者。在“洗澡”运动以前和以后，他们的育种方法都是以摩尔根学说为指导的。当时，在“革命群众”与学生的“帮助”下，都不得不“深刻”检讨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表示抛弃孟德尔、摩尔根“资产阶级的那一套体系”。四川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生物科学家鲍文奎从事小麦多倍体的试验，因为实验方法与摩尔根的染色体理论有关，为研究所领导所不容，被判为“伪科学”，实验被勒令停止，实验田里的作物被拔除。对摩尔根学派的政治批判和行政压制，除了1956年“双百”时期有短暂的松动外，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使我国本来起点不低的生物科学、遗传科学研究损失了近30年的时间！

愚昧和荒谬地以所谓"阶级观点"评判自然科学,对来自西方的所谓"资产阶级科学"进行政治批判,必然形成反科学的思潮,封闭通向科学发现与科学创造的道路。清华大学有一位研究生想进行宇宙射线的研究,被认为是在教师的"反动思想影响底下狂妄地企图推翻唯物论"的典型而受到批判。今天,宇宙射线的存在已经成了常识。北师大有一位研究儿童教育的教授认为胎儿是有听觉力的。他说有一位怀孕6个月的孕妇,听音乐会时,胎儿动得非常厉害,直到走出音乐堂胎儿才安静下来,这证明胎儿确有听觉能力。这样有益的科学探索被斥责为"充满了资产阶级的鬼话","这不是在讲科学,这简直是在故弄玄虚"①。智力测验被认为是为反动统治者服务、否定劳动人民智慧的伪科学②。在形而上学猖獗的反科学气氛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唯物论被视为进行科学研究的先决条件,自然科学成了马克思主义和唯物论的简单演绎;自然科学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些创造性的科学思维,被扣上"唯心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唯物论"的帽子而遭到扼杀。

科学既无阶级标准,也无国家与民族的标准,只有国际标准。科学研究应力争达到或超过国际先进水平,科学工作者要以自己的创造性成果成为国际知名的学者,这是科学工作者应有的精神与志向。及时了解和介绍世界科技信息,实事求是地给予评价,善于向先进学习,是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前提。这些毋庸置疑的常识,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都受到粗暴的批判。主张"科学无国界"、科研要讲"国际标准"、科学工作者要立志做"国际学者"、中国的科学技术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就应在学习苏联的同时向欧美学

① 龚守静、凯旆:《资产阶级思想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具体表现》,《人民教育》,1952年5月号。

② 廖世承:《"从头做起"》,《文汇报》,1951年12月30日。

习的人,都被认为有严重的"崇美"思想而受到批判或做公开的检讨。

什么是"崇美"思想呢?我们来看钱伟长的检讨。钱先生在1952年4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我跳出了帝国主义的陷阱》一文中检讨说:浙江大学土木系有一位桥梁教授要离开浙大,他曾在美国土木工程学会会刊发表过几篇文章,被美国桥梁学会认为有重大贡献,要给他奖金,我便主张请他到清华来任教,因为美国人认为他好就一定好;我曾提出工程力学的发展应该有更强的物理学基础和算学基础,这本来不无道理,但理由却是说美国的力学发展就是这样;对于工程学报使用何种文字的问题,我主张用什么文字都行,心中是想我要追逐国际水平,所以我要用英文发表。当美国来信要论文单行本或自己的论文被美国人引用时,觉得获得了国际承认,心中很是得意。这些就是"崇美"思想的表现。钱先生说:"这表示我在长期的资产阶级教育影响下,看不到同志们用中文发表论文,是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而取得学术上的独立,而我却在科学上盲目地重视美国人的意见,强烈地表现可耻的文化买办心理。"毫无疑问,钱先生作为一名有国际声望的著名学者,绝对不会自愿做如此肤浅、可笑的所谓"检讨"。然而,在群众包括学生群众的轮番"帮助"之下,不做这样的检讨就别想过关。在"洗澡"运动中,许多教师因曾经在课堂上肯定欧美科学比较发达,说苏联比较落后,或者把论文寄到国外发表,把专著寄到国外出版,或者重视阅读国外科技期刊,而受到批判。1951年年底,钱俊瑞在"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说:有些人两个月看不到美国杂志,心中如丧考妣。作为国家教育行政机关的最高官员,竟用如此污秽不堪的语言辱骂和斥责那些关心世界科技发展的科学家,这样的言论竟堂而皇之被人引用、发表在全国性大报上,对科学工作者的精神损害可想而知!

你不是要做"国际学者"吗?什么是"国际学者"呢?"国际学

者"不是以专业造诣或创造获得国际声望的知名学者,而是国际资产阶级的走狗和洋奴。燕京大学劳动系教授赵承信在他的检讨中说:"所谓'国际学者'就是在国际资产阶级学术界里(特别是美国学术界里)出个头、露个面,这是为美英资产阶级服务的,反人民的,是世界主义的国际学者,而不是国际主义的为人民服务的学者。为着达到这个目的,就得要写资产阶级性的学术论文,跟美帝国主义学者来往,培养学生参加美英学术会。为着达到这个目的,就得要在理论上有些准备,尽量吸收美英资产阶级理论,然后在实际研究中创造自己的理论体系。"按照这样的定义,"国际学者"不是光荣的称号,倒是卑鄙无耻的标签。做"国际学者"的动力来自哪里呢?是"个人英雄主义,为名,为地位"[1]。推动学者们学有所成的个人理想、民族精神、爱国主义,都统统不见了。

你不是讲"国际标准"吗?什么是国际标准呢?国际标准就是美国标准,就是国际资产阶级的标准。旧中国的大学,由于学校的性质,最讲国际标准的是协和医学院。于是,批判"国际标准",就成为协和医学院思想改造运动的重点内容。该院院长、各科主任、知名教授的检讨,无不批判以追求与坚持"国际标准"为传统、为核心的"协和精神"。如药理科主任周金黄 1951 年 11 月 24 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彻底铲除崇拜美帝国主义的思想》的检讨中说,过去协和重视维护自己的传统"荣誉",而这种传统的重要内容就是保持"国际学术水平"的标准。"所谓国际水平,虽不完全是美国标准,但一切教学、研究、医疗,无不以资产阶级的水平为准绳。例如对研究的估价,就以这篇研究论文是否'荣幸地'在国外杂志上发表过为依据。药品品质的标准,不是按中国药典的标准,而是以英美商品为根据。"言必称欧美的先进科学技术,口口声声"国际标准"和"世界水平",被认为是"无视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是资产

① 《批判我的"国际学者"思想》,《光明日报》,1952 年 3 月 4 日。

阶级思想的表现①。清华大学在总结运动的收获之一是:“在科学研究工作中,清华大学教师们最显著的进步就是在科学上打倒了崇拜美国的所谓‘国际标准’、‘美国标准’,而代之以中国人民的标准,面向人民的研究代替了追求所谓‘国际’学术地位的研究作风。”② 如此说来,科学标准可因国家而异,中国的科学技术没有必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你想追踪科学前沿吗?这是崇洋媚外。中国人只能研究中国的问题。如果研究世界性的或中国以外的问题,就是为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服务。著名气象学家、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对“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作出过重大贡献、“文化大革命”中含冤自杀的赵九章教授在“科学无国界”思想支配下,长期瞄准“国际学术主流”,以“西风环流”为主要研究方向,而西风环流主要影响高纬度地区,而夏季及副热带高压系统的问题对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更为重要。新中国成立后,他自己仍做“西风环流”,而鼓励其他人研究后一个问题。他又想把中国气象学的力量集中起来,开展东亚大气环流的理论研究,争取几年内建立起自己的学派。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他被迫承认前者脱离中国实际,后者则是“学阀思想”。他的学生朱抱真解决了“西风环流中的垂直运动”的重大课题,他主张尽快用英文发表这一世界领先的重大成果,以便不让美国人占先,为此不急于让他参加国家气象局的工作。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赵先生被迫承认:放着本国家的问题不研究,去研究美国的“高空急流”问题,是为帝国主义服务;“自以为科学无国界,这样可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学术地位,完全是自欺欺人”③。

要做国际学者,追踪国际科学主流,使自己的科研达到国际标

① 《资产阶级思想怎样腐蚀着北京大学的同学》,《人民教育》,1952 年 5 月号。

② 王伯恭:《人民的清华大学》,《人民日报》,1952 年 9 月 29 日。

③ 《批判我的脱离实际和“科学无国界”的思想》,《光明日报》,1952 年 9 月 2 日。

准，使自己的成果得到国际上的承认，就要用外文在外国发表论文。有人批判说："我们有极少数的一些'科学家'，他们不仅是在解放以前，就是在解放以后，居然还把自己的科学论文寄到美国去。……不难想象，这该是多么可耻和可悲的一种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的思想和行径！"[①]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对科学和科学家的粗暴批判，对新中国的科学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它否定了科学的客观性和客观标准，而代之以政治的、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标准；否定了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巨大作用，取消了中国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任务；疏离了中国科学界与国际科学界的联系，使中国科学在二战后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因封闭而走向落后；沉重地打击了原本以满腔热情为赶超世界科技先进水平而奋斗的科学工作者，使他们长期陷入无比的苦闷之中。

以上所述，多限于自然科学领域。至于社会科学领域，情况就更加严重。所有从西方移植而来的新兴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以及有关的研究方法（如社会统计、社会调查、教育统计、心理测量）都被冠之以"资产阶级"的名称而被完全否定。院系调整中，砍掉了全国所有的社会学系，取消了社会学课程；取消了大部分的法学系、政治学系，并对主张从西方法学理论中吸取某些合理成分的教师进行批判。中国的社会科学从此失去了同西方学术界的联系，以至于 40 多年后的今天，社会科学还因落后于世界水平而承受着对中国社会现代化难以作出更大贡献的巨大压力。

① 纪初阳：《向米丘林学习》，《新观察》，1952 年第 7 期。

4.7 文艺整风运动:文艺界的否定与自我否定

思想改造运动的主要对象是教育界、科学界、学术界有欧美留学背景的上层知识分子,这是非常明显的。然而,它同样猛烈地冲击了文艺界。在教育界运动发起之后,从9月24日起,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党内文艺负责干部开了8次座谈会,11月23日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开展文艺整风的报告,经毛泽东批准下发。批判《武训传》的硝烟未散,一场规模更大、方式更激烈的运动再次席卷文艺界。

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决定,11月24日,全国文联召开了北京文艺界整风动员大会,胡乔木、周扬作报告,吹响了"战斗的号角"。丁玲、老舍、欧阳予倩、李伯钊、黄钢等8名文艺界人物发表讲话,拥护整风。全国文联组成以丁玲为主任的"北京文艺界学习委员会"主其事。文艺界的思想改造运动就此正式开始。次年1月,"三反"大潮涌起,文艺界转入"打虎"运动。3月以后,文艺整风再次启动。7月14日,全国文联常委会和北京文艺界学习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宣布北京文艺整风胜利结束。上海的文艺整风几乎与北京同步开始与结束。北京文艺界参加运动的总人数原定为700人左右,实际参加1228人,其中戏剧工作者414人,电影工作者361人,美术工作者151人,音乐工作者139人,文学工作者133人,舞蹈工作者30人。上海文艺界参加运动的有1300多人。文艺界的运动方式,除少了"学生斗老师"(仍然有"群众帮助")以外,同教育界、科学界几无二致。

文艺整风的目的,是乘批判《武训传》之东风,借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与"三反"运动之声势,用群众批判和自我检讨的方式,进一步净化文艺思想,树立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根据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文学艺术是"革命的螺丝钉",是党的工作的

一部分，与教育界、科学界相比，文艺界的思想应当更加纯洁、更加统一，步调更加一致，应该绝对地服从党的领导与指挥。文艺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称之为"整风"，也更加表明它是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重演或翻版。

同教育界、科技界、学术界主要打击与改造党外知识分子特别是欧美派大知识分子不同，文艺整风运动在主要批判与改造新中国成立前长期活动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同时，也不放过各地各级各文艺单位担负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包括一些从延安来的文艺工作者和领导者。运动对象的相对宽泛，除了与对文艺界有更加严格的政治要求有关以外，显然与对文艺界的整体状况的估计有关。

对文艺工作状况的估计，是运动前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干部座谈会作出的。中宣部呈交中共中央的报告认为，"文艺工作的领导，在进入城市后的主要错误是对毛主席文艺方针发生动摇，在某些方面甚至使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篡夺了领导"。它的首要表现是"迁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放弃思想斗争和思想改造工作，缺少对思想工作的严肃性"。"在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家的合作当中，表现无原则的团结，对他们的各种错误思想没有认真地加以批评，认真地提出改造思想的任务。不少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任意曲解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拒绝改造思想，拒绝以文艺为政治服务，要求文艺更多地表现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和趣味。他们认为今天文艺（例如电影）的主要群众是小市民，应多迎合小市民的趣味。他们反对以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去改造和提高小市民，而要求将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降低到小市民水平。而党的文艺干部在这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包围下，有许多人随波逐流，表现自己的立场是与他们一致的或接近的。一九五〇年上海文艺界代表大会片面地提出'更亲密的团结，更勇敢的创造'的口号，而不要求文艺工作者参加实际斗争，改造

自己，这个倾向不只是上海一地的，全国文联和中央文化部亦未向文艺工作者郑重地提出过这种任务。正因为这种政治上的取消阶级斗争的倾向，才使得许多文艺领导干部过多地并且常常是无效地忙于行政事务，而很少注意思想工作，才造成他们在工作上铺张不切实际，形式多而内容少的作风。因为这样，就降低了党对文艺作品的要求，放任了文艺作品中的错误倾向和粗制滥造现象，而没有把认真地审查电影剧本及影片，审查文艺出版物和戏剧音乐节目，当作重大的政治责任。因为这样，就产生了电影《武训传》的摄制、放映和宣传，就产生了对于《武训传》的反动宣传的丧失感觉，就产生了在毛主席指出《武训传》的反动性以后对批判《武训传》的怠工。"文艺工作者中则普遍存在着脱离政治、脱离群众和严重的自由主义风气[①]。

胡乔木在北京文艺界学习动员大会的讲话重复了上述看法。他指出，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实际上还没有解决。"一部分在一九四九年大会上举过手的作家，并没有真正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的指示的内容，他们对于文艺工作仍然抱着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见解。……而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些共产党员文艺工作者，其中甚至也包括少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表示过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针的共产党员。这些同志在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家接触以后，失去了对于他们的批判能力，而跟他们无条件地'团结'起来了。……就在这两部分人的影响下，我们两年来的文学艺术工作的进展受到了重大的限制。"因此，"目前文学艺术工作中的首要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确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和帮助广大的非工人阶级文艺工作者进行思想改造的问题"[②]。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文艺干部整风学习的报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463页。

② 《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光明日报》，1951年12月5日。

胡乔木的报告规定了文艺整风要解决的两个问题是"确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即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领导,改造"广大的非工人阶级文艺工作者";规定了两类斗争对象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和向他们投降的党员文艺工作者。

周扬此时正处于尴尬的境地。毛泽东发起批判《武训传》的运动,对文艺界的"思想混乱"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四条汉子"之一的夏衍因对《武训传》的摄制与放映负有直接责任而做了检讨,这无疑使周扬承受了极大的压力。文艺干部座谈会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领导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周扬应对存在的问题负"主要责任",周扬被迫作了"详细的自我批评"。这样一种处境,使周扬更加积极地贯彻毛泽东的意旨,激进地推动文艺整风,以纠正他所负有重大责任的"文艺脱离党的领导的状态"。他在文艺整风动员大会上说:"老解放区的经过改造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在延安经过了整风学习,就没有问题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之间总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是容易断的,而他们和工农群众之间的联系,却是常常松懈的,容易断的。至于新解放区的没有经过改造的同志,他们的思想感情实际上是根本没有改变的。他们虽然口头上也讲工农兵,心里喜欢的却依然是小资产阶级。一部分老的左翼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一个自以为'很革命'的包袱(这个包袱我也曾有过的),这就大大地妨碍了他们的进步;必须丢掉这个包袱。"[①] 周扬将思想批判的"祸水"引向"新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同时必然又是对30年代以后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文艺的清算。在15年后的"文革"狂潮中,江青等再次将斗争矛头指向所谓"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并将周扬等人打人监狱,不过是更加彻底地完成着周扬们开创的"事业"而已。

根据彻底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树立毛

---

① 《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光明日报》,1951年12月8日。

泽东文艺思想的绝对领导地位的要求，如同其他领域的思想改造一样，文艺整风运动对文艺界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成百上千的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艺术作出过贡献的作家、诗人、戏剧家、导演、演员、音乐家、画家用新中国成立后刚刚学得的政治词汇，痛斥自己只进步而"不革命"的历史，批判自己的作品，表达了拥护毛泽东文艺思想、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的决心。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和"否定过去，面向未来"的社会潮流中，发自内心的忏悔、被迫无奈的检讨汇合在一起，形成了几千年来中国文坛上不曾有过的奇异现象。

首当其冲的是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老一辈文艺工作者。中国的革命文艺只能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才能产生和发展，他们中的一些人竟然在毛泽东文艺思想产生之前就创建了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新中国建立后，要树立领袖形象，统一意识形态，有必要重新解释历史，这就必然要求否定鲁迅、郭沫若、茅盾、胡风等一类人物及其作品的阶级属性。然而，对于他们的历史性文化贡献，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已有定论，毛泽东对鲁迅、郭沫若更是推崇备至。要达到目的，就只能由这些人出面作自我否定。以郭沫若、曹禺为例。

鲁迅先生逝世之后，郭沫若俨然成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第一旗手。新中国成立初，他由作家、诗人、历史学家一变而为政务院副总理和顶级的文化官员。虽然他早在重庆时期就宣布拥护毛泽东文艺思想，新中国成立后他却也难以迅速适应新中国的文化管理方式。据楼适夷回忆，郭先生的《女神》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新版，被删去了三首小诗，其中一首是《死的诱惑》，内容是说诗人面对一把刀子、一条绳子，忍不住想走自杀的路。这首被删去的《死的诱惑》，正是他写白话诗的处女作，头生儿子一刀被砍，他是

极为心痛的。他后来曾表达过当时的心情[①]。然而，在文艺整风运动中，他却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在毛泽东旗帜下长远做一名文化尖兵》，称颂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规劝文化界同仁接受思想改造，同时明确地表达了对自我的否定。

郭沫若先生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在中国文艺工作实际中的具体的运用和发展”，到过延安或其他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有机会得到毛泽东的思想指导，“没有到过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不幸地是受着限制了，这犹如栽在墙阴里的花没有见到过太阳”。在反动区域，很难接触工农兵，对象不变，生活不变，也由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封建思想顽强地限制着作者立场的根本转换，“因而文艺的品质也就没有多少改变”。言外之意，这种条件下的文艺作品的“品质”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他说，文艺工作者应该按照毛主席的号召，把自己的阶级转换过来，“我很希望能够不断地进行改造，彻底地‘由一个阶级转换到另一个阶级’。‘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从今天做起，就再来个‘十年八年的长时间’吧。只要一息尚存，我总要不断地警惕，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改造自己，不断地改进自己的工作。我要努力争取，在毛泽东旗帜下长远做一名文化尖兵”[②]。这位在批判《武训传》时已做过一次检讨的“旗手”，虽然没有具体地批判或否定自己的某一部著作，但是，既然实际上承认了自己仍然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自己的作品并不具有无产阶级文学的性质，也就交出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帅旗。郭先生也许应当保持沉默，但他没有这么做，他也不会这么做。无产阶级文学的帅旗一倒，30年代的文人就只有检讨的份儿了。

① 楼适夷：《零零碎碎的回忆》，《文化界名人自述》，第284页。

② 《文汇报》，1952年5月24日。

曹禺先生算是旧中国最有名的进步剧作家，他的《雷雨》和《日出》是千古不朽的经典之作。这些剧作的艺术性自不待言，即以传统的政治标准而论，若将曹禺剧作置于30年代的特殊社会环境之中，结合着它们发挥过的暴露黑暗、鼓励斗争的社会作用，其进步性质应当是肯定的。然而，不幸的是，曹禺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他没有到过延安，没有参加共产党，在开始创作生涯之前，也没有首先学习与精通马克思主义，将自己改造成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因此，他的作品便难逃被批判、被否定的命运。曹禺似乎有先见之明。文艺整风运动一年以前，他已在1950年10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第3卷第1期发表文章，否定了《雷雨》和《日出》，说他在这两部剧作中表达了“模糊而大有问题的思想”，谈不到对群众能起好影响、能发挥若干进步的作用；《雷雨》有宿命论的观点，《日出》只是罗列若干旧社会的黑暗现象，而未能发掘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没有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不明了祖国的革命动力，不分析社会的阶级性质，而贸然以所谓的‘正义感’当作自己的思想的支柱，这自然是非常幼稚，非常荒谬。而一个作家的错误看法，为害之甚并不限于自己，而是会扩大蔓延到看过这个戏的数百次演出的观众。最可痛心的就在此。”

在文艺整风中，曹禺先生的认识“提高”了一步。1952年5月24日，即毛泽东的《讲话》发表10周年之际，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永远向前——一个改造中的文艺工作者的话》，强烈地表达了否定自我、否定既往的态度，承认进入新社会后内心的空虚、苦恼，表达了成为毛泽东文艺战士的向往。他说：

> 我是一个从黑暗的旧社会里走出来的文艺工作者，虽然一直向往着光明，但自己的思想意识却受了相当深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新社会到来了，我居然成为千千万万个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一员，成为毛主席文艺队伍中的一员，我是多么

感激和骄傲！然而，我多么胆怯，仿佛刚刚睁开眼的盲人，初次接触了耀目的阳光，在不可抑止的兴奋里，又不知道如何迈出第一步。……

一套套的超阶级的善恶是非的观念，若隐若现地深深扎在我以往的作品里，有的甚至还很猖狂地叫嚣起来。我好说我痛恨黑暗的旧社会，不满意人压榨人的血腥事实，也说必须推翻封建势力、官僚买办的万恶统治，可是我却是一个超阶级的人性论者。我相信在那样的阶级社会里，人性也是普遍的善良的。我从未明确地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阶级性。……

我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我缺乏新的社会现实的体验，甚至连人民大众的语言也不大熟悉。古人有一句话，“贫无立锥之地”。我今天才明白一个人在精神领域中到了“贫无立锥之地”的当口是多么痛苦。……

我明白我的精神领域里原来并不止于贫乏，那是一个好听的名词，一个旧知识分子在躲闪无路时找到的一个遮丑的遁词。实际上，在我的思想意识里，并非是如以往自命的那样进步，那样一心追求着真理和光明。我的仓库里有一大堆不见阳光的破铜烂铁，一堆发了霉味的朽木。……

一个出身于小资产阶级、没有经过彻底改造的知识分子，很难忘怀自己多年来眷恋着的人物、思想和情感，像蚂蚁绕树，转来转去，总离不开那样一块黑乌乌的地方。

文艺整风中文艺界人士的检讨，其套路与教育界、学术界中人大同小异，即先否定自己的作品，承认自己的作品没有贯彻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论，然后挖掘“思想根源”，最后涉及家庭出身。电影《三毛流浪记》的导演严恭先生的检讨比较典型。他说：“这部影

片只是点滴地暴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罪恶现象。而这是表面的、不典型的;没有从阶级斗争的本质上来揭穿官僚资产阶级如何剥削劳动人民,而劳动人民又如何起而与之斗争。很多地方只是以非无产阶级的所谓'人道'、'同情心',写流浪儿三毛的个人奋斗;以所谓'喜剧'的风格和无原则的'讽刺'手法,迎合小市民的趣味。很显然地,这是一个属于小资产阶级意识范畴的作品。"在为影片定性以后,他开始挖掘思想根源:"透过《三毛流浪记》影片,反映出我的思想意识上存在着的主要问题,是没有明确的阶级观点,有的只是小资产阶级本身的自以为革命、进步的一种幻觉、一种优越性。"他说,三毛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即是他本人个人奋斗精神的反映,这种精神来自他的家庭。他说:"我父亲是个古玩商人,我幼年失学,当过学徒、电报局的递报生和旧机关的小职员;半工半读,'刻苦自励';有着强烈的'个人奋斗'的思想。"①

在文艺整风运动中,三四十年代原国统区的进步文艺工作者,没有不作曹禺、严恭式的检讨的。翻遍他们的检讨,找不出对某一作品肯定性的文字。历史不再闪光,不再光荣,不再值得自豪,原本受到国民党政府压制、受到进步青年追捧的作品转眼间成了散发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臭气、腐蚀人的灵魂的毒药,由政治上极度信服共产党展延而来的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崇敬和彻底的自我否定,转化为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失落自我以后的极度的无所适从和惶恐不安。老舍先生在1952年5月21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毛主席给了我新的艺术生命》一文就表露了这种心态。他把毛泽东的《讲话》比做一面镜子,

> 对着毛主席给我的这面镜子,我的文艺作家的面貌是十分模糊了。以前,我自以为是十足的一个作家;此刻,除了我能掌

① 《根除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文艺报》,1952年第4号。

握文字，懂得一些文艺形式之外，我什么也没有！毛主席指示：文艺须为工农兵服务。我怎么办呢？从我开始学习文艺写作起，二十多年来，我的思想、生活、作品都始终是在小资产阶级里绕圈圈。我最远的“远见”是人民大众应当受教育，有享受文艺的能力与权利。享受什么样的文艺呢？很简单：我写，大家念。我写什么呢？随便！我写什么，大家念什么。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确是可以这样狂傲无知的。这种狂傲使我对于工农兵，恰如毛主席所说的，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我发了愁。

毛主席提出了文艺服从于政治的道理。这又使我手足无措。我在小资产阶级的圈子里既已混了很久，我的思想、生活、作品，已经都慢慢地瘫痪了。我每每觉得我可以不吸收任何新思想，还是照旧可以写东西。我的生活方式呢，似乎也恰好是一个文人所应有的，不必改变。作品呢？不管有无内容，反正写的光滑通顺，也就过得去了。这样的瘫痪已久，使我没法子不承认：文艺不但可以和政治分家，也应当分家；分了家日子好过！我以为，仗着一点小聪明和长时间的写作生活，我就可以安安稳稳地永远吃文艺饭。可是，毛主席告诉了我和类似我的人：你们错了，文艺应当为政治服务！我怎么办呢？

首先，我决定了态度：我要听毛主席的话，跟着毛主席走！听从毛主席的话是光荣的！假若我不求进步，还以老作家自居，连毛主席的话也不肯听，就是自暴自弃！我要在毛主席的指示里，找到自己的新文艺生命。

然而，对在旧中国政治压迫奇重而文艺却能奋力争得一点自由的环境中卓有建树的老一辈文艺工作者来说，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找到“新的文艺生命”谈何容易。老舍先生是最努力的一个，他的《茶馆》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他新中国成立后的成就无

法与新中国成立前相比。老一辈的作家多数挂笔不写。有的人做了散官,有的人选择了休闲与沉默。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夏衍、田汉、沈从文、艾青……这一群由五四精神孕育而成的文坛巨星,转瞬间一齐陨落。巴金老人哀叹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再也没有写过像样的作品。夏衍说"解放后我仅写过一个剧,这是我所有的创作中最糟的一个,因为我总担忧剧中的每一句台词是否与党的政策有矛盾"[1]。许多有才华的编剧、导演、演员如蔡楚生、史东山、郑君里、孙瑜、赵丹……再也没有得到发挥的机会。这是中华民族的重大文化损失。文艺整风对此负有相当的责任。

30年代的革命文艺家,大都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无畏战士。他们从来没有向什么人低过头,为什么竟在绝无生死危险的文艺整风中否定自己的一切呢?除了他们思想深处的某些矛盾以外,能够粉碎一切个人反抗行为的社会大批判是起了作用的。在群众性政治运动中滋长起来的无知和狂暴,有时是难以想像的。《人民教育》第3卷第3期在批判《武训传》的高潮中曾发表过黄庆生的文章《一篇很不好教的课文——〈背影〉》,批评初中语文第四册中朱自清的《背影》"表现小资产阶级不健康的感情",文中的"超阶级的思想感情"与三大任务(抗美援朝、土改、镇反)相矛盾,是一篇不好教的课文。有人依样画葫芦。天津《语文教学》第5期(1951年12月15日出版)发表徐砺夫的《也是一篇不好教的课文——"鸭的喜剧"》。他从鲁迅先生的这篇短文中摘引了"寂寞呀"、"北京没有春和秋"、"缅甸的夏夜"、"咻咻的叫"等语句,认定这是一篇"处处充溢着崇拜大自然的精神"的"小资产阶级的不健康的东西",指责鲁迅先生同过去的旧作家一样"用所谓'身旁琐事''炉边谈话'等小资产阶级的伤感情调腐蚀着一般青年的心灵"。如此狂妄无

① 转引自欧阳哲生:《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3期。

知的文章竟然能够发表出来,说明群众运动中形成的否定一切的“左”的力量是很大的。对鲁迅尚且如此,还有什么人、什么东西不能否定?在这样的形势之下,还有什么人敢不低头?

除了清算30年代以来进步文艺和进步文艺工作者以外,文艺整风的另一个重点就是系统地清理新中国成立后头两年文艺界发生的背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错误。1952年1月13日,《大公报》发表一篇后来为《文艺报》转载的综述性报道,题为《上海文艺界应纠正思想混乱现象》,认为“文艺界通过〈武训传〉讨论并没有真正解决思想问题”,“电影界思想混乱,错误影片层出不穷”,“戏曲改革工作中领导薄弱,没有能真正为工农兵服务”,“美术工作者缺乏政治敏感,三反运动中表现更其贫乏”,“舞蹈艺术水平未逐步提高,不及解放初期蓬勃有生气”,“错误的曲调歌词不断产生,音乐界未坚持新文艺方向”,“文学作家写不出新的作品,主要是未能深入体验生活”。相关的部门和文艺人士自然要对此作出检讨。除了这些一般性问题外,有些旧案重提。对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后上海文艺界“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讨论,周扬、丁玲、黄钢等人再次提出批评,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对抗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工农兵方向的典型反映,冼群、唐弢等发起、组织、参与讨论和领导层没有及时制止这一讨论的人都作了检讨。孙瑜就编导《武训传》的“错误”发表长篇检讨。这时,在批判《武训传》运动后期发起的对萧也牧作品的批判也达到了高潮,萧也牧本人作了检讨,电影《我们夫妻之间》的导演郑君里也被迫检讨,全盘否定自己从事进步电影事业几十年的历史,给自己戴了许多顶小资产阶级的帽子,承认自己脱离现实,脱离政治,而“又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歪曲现实,歪曲政治”。

文艺整风期间,“左”的文艺批评肆虐文坛,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新中国成立以后创作的文艺作品,如小说、诗歌、戏剧、电影、美术、音乐、舞蹈、歌曲少有不受批判、不被否定的。文艺界

人士、各文艺单位无不批判和否定本人、本单位的作品，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充满了批判文章和作者的检讨。《文艺报》和上海《文汇报》副刊作了最恶劣的表演。1951 年 10 月至 1952 年 8 月，《文艺报》点名批判的文艺作品多得惊人，有一篇文章一下子就否定了 12 个剧本！上海电影文学研究所新中国成立后编写的电影剧本被拍成电影的有十几部，除《中朝儿女》因错误严重停止放映外，其余片子也都被认为“大都有严重的错误与缺点，已放映的各片，都曾受到全国各地观众严正的批评”。《文汇报》副刊“文娱版”几乎天天有新批判、新检讨，许许多多的文艺作品被冠之以“污蔑工人阶级”、“歪曲历史”、“污蔑解放军”、“抹杀党的领导”等骇人听闻的大帽子。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不少文艺作品有严重的缺点，又因为片面强调“写政策”、“为现实政治服务”而产生了许多粗制滥造之作。但是，要说这些作品都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是思想上政治上反动的文艺，则是无中生有。

我们选择 1951 年 12 月 11 日至 13 日《文汇报》副刊连载的署名“章枚”的文章《从 759 支歌曲中看目前创作中的倾向》，来说明当时“左”的文艺批评是何等的粗暴与荒谬。这 759 支歌曲多属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群众歌曲。在批评者看来，这 759 支歌曲的歌词竟然没有一支是没有问题的。批判者说，“十万万人民一声命令，美帝立刻滚出朝鲜！”（《美帝滚出朝鲜》）反映了急躁和焦躁的情绪，是不了解战争的长期性。“战争贩子滚出去！滚出去！滚出朝鲜，滚出亚洲，滚出全世界！滚出去！”（《战争贩子滚出去》）大叫“滚出去”，“流露出对我们的最后胜利和我们尚未使用的雄厚力量认识不足，因此不够沉着”；“‘战争贩子滚出全世界’是意味着全世界帝国主义的最后崩溃，这种口号喊得还不是时候”。“把战争乌云一扫光……叫战争贩子赶快灭亡！”（《我们是和平的铁流》）表现了一种“天真的思想”，“是会削弱我们保卫世界和平的长期打算和坚韧斗争的”。“抗美援朝为自家，要想庄稼保得牢，支援前方把敌

杀"(《抗美山歌》),是"让群众停留在原来的狭隘利益的观点上"。"我有一句话讲分明,参加军校真光荣,我看你身戴大红花,我心里着急脸儿发红,明春我身体锻炼好,同你一样戴红花,同你一样做先锋,同你一道卫祖国,同你一道保和平,咱们相见在军校,同志相称真光荣"(《送我的朋友上军校》),强调了"真光荣"、"戴红花"、"做先锋"等表面的东西,"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观点"。"什么飞机大炮原子弹,纸糊的老虎,一戳就完了蛋。"(《抗美援朝对唱》)是不理解"纸老虎"这个比喻的精神实质,不"向群众揭露美帝国主义本质的弱点,帮助群众克服恐惧心理",只在"纸老虎"三个字上做文章①。"美国军队好不好?哈哈!打仗要逃跑!"(《美国有啥好》)美国"好不好","这种问法已不很妥当",要说美国军队不好是因为打仗不勇敢,那么日本和希特勒的军队不是好军队了吗?有一首摇篮曲的歌词是:"摇一摇,摇一摇,好睡觉,好宝宝,妈妈亲着你,不怕疯狗叫,好好在身边,不怕狼来咬。"(《摇一摇》)批判者说:"歌词的作者说'你不用怕,因为妈妈在你身边',那就暗示儿童说,'疯狗和狼还是可怕的,假如妈妈不在你身边,那就不得了!'这还是一种旧母亲的思想,目的是拿并无威胁的狼和狗来吓唬儿童,使儿童不得不依赖她,抬高自己在儿童心灵上的地位(所谓'依寇自重'),藉此骗取儿童对她的爱,为此不惜牺牲儿童的心理健康。"② 今天看来,这种批评滑稽之至,当年却被当做最正常不过的思维。

文艺整风期间,对于稍有独立的文艺见解,不愿附和"左"的文艺政策的人,进行了猛烈的打击。《光明日报》的《文学评论》专栏主编王淑明早在1950年10月就撰文批评过"左"的文艺批评。他认为对《红旗歌》的批评是"不公允的,过分苛刻的",作品的政治性与艺术性还不能很统一的作品,"只要不是违反人民利益与革命利

① 《文汇报》,1951年12月12日副页。

② 《文汇报》,1951年12月13日副页。

益的作品,我们都应该承认其存在的价值”。“有些批评家,往往把标准定得太严,过于僵化,不能按照具体的人与作品,有分别地来运用批评的尺度,常常疾言厉色,盛气凌人,打击得过于沉重,使作家们感到有些怕,担心创作不合标准,什么地方又来了一下沉重的捶击。”“现在有些批评家,往往把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完全看成两截。在对具体作品的批评中,不是侧重思想性,就是放弃艺术性;或者只从分析作品的艺术缺点出发,而忽视其优点。这同样都是一种偏向。”① 1951 年 7 月 28 日,他针对对《武训传》和萧也牧作品的“左”的批评,以“裘祖英”的笔名发表《论正确的批评态度》的文章,尖锐地批评了把作家当做敌人对待的偏向。他说,文艺界“不好的态度”有五种:“一是缺乏与人为善的态度”,用对待敌人的刻毒手法对待自己的同志,立场完全错了;“二是批评的态度尖酸刻薄,有些近于嘲讽”;“三是非原则性的批评”,“断章取义”,深文周纳,故意致人于罪;“四是盛气凌人,居高临下,自视为裁判者,而把作者与其作品,看成为受审与被拷问者”,以棍棒代替了政策,“一朝权在手,叫你见阎王”,“他们不是在鼓励创作,而是在做着屠夫和刽子手”;五是“不分作品中所发生的错误主要与次要,在批评上,都采取同样对待的态度”。他对批判《武训传》的某些文章、对批判萧也牧表示了不满,并特别提到要吸取 30 年代把鲁迅和茅盾当做敌人对待的教训。

在文艺整风运动中,王淑明受到“左”的文艺批评的代表人物陈企霞等人的猛烈攻击,被迫作了检讨,承认将《文学评论》“这样一个同人性质的副刊不放在《人民日报》而放在民主党派的报纸《光明日报》上”,是为了“不受审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天地辽阔,可以放任而‘自由’”,“有意避免接受党的领导”,使党干涉“亦

① 《一年来文艺批评的发展及其问题》,《文艺报》,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一周年特刊。

有所不便”，这就是“自绝于党”；承认自己有“右倾思想”，“仅看到有些作家，对于文艺批评感到不满，大叫其苦，却没有仔细考察一下，这些嗡嗡的声音，是从哪里发出的，而就毫不假思虑地对它相信和完全同情起来。事实上，这是一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或个别具有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作家，他们自身既不接近工农兵，又不愿进行思想改造，宁肯在其灵魂深处，保存着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思想王国，就是这些人慨叹于批评的‘过火’”。“这些人之所以喋喋不休，其本意就在于拒绝和不要批评，以这作为挡箭牌，企图达到保存自己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王国的目的。如果他们既要创作，又不愿放弃其原来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甚至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那我们就要毫不客气地予以严厉而深刻的批评，对于思想斗争是丝毫不能让步的。如让了步，就是对人民犯罪，放弃了文艺批评应有的重大职责。但我恰恰就是在文艺战线上对思想斗争让了步。”他说自己在署名“裘祖英”的那篇评论中说的话，“完全是无的放矢，是打击刚刚发展起来的文艺批评，是否定党对文艺批评上的领导”[①]。几年后，王淑明同萧也牧一样，被划为“右派分子”。

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创作提倡“赶任务”、“写政策”，以宣传鼓动代替文艺创作，许多人是不赞成、不积极的。1952 年 2 月 11 日，在上海《文汇报》与《新闻日报》联合举行的一次主要剧种编导座谈会，讨论如何创作和上演“三反”戏曲。云华越剧团编导韩义不赞成这种“赶任务”的做法，由此引来一场“围剿”式的批判。从 2 月 14 日至 29 日，在短短的半个月中，《文汇报》竟发表 24 篇批判文章，批评韩义反对文艺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崇高使命”，抗拒思想改造，坚持资产阶级文艺观点。其间，韩义发表“公开信”，并以

① 《从“文学评论”编辑工作中检讨我的文艺批评思想》，《人民日报》，1952 年 1 月 10 日，

48小时"赶"出上海37家越剧院即将上演的配合"五反"的六幕巨剧《千军万马》为例,认为"'粗制滥造'的'赶'是对不起人民对不起自己良心的荒谬态度"①,因此招来了更激烈的批判。在文艺整风中,韩义发表长篇检讨,被迫承认"对于'赶任务'的问题上有了很严重的错误认识","对艺术的认识是和自己的政治水平一样贫乏得可怜"②。

清理高校的文艺学教学,使之完全统一于毛泽东文艺思想之下,也是文艺整风与思想改造运动的一项内容。除了长期从事文艺理论教学的朱光潜、吴组缃等先生要在"洗澡"运动中做"深刻"检讨外,《文艺报》组织了批评高校文艺教学中的错误偏向的讨论。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美学家吕荧首当其冲。《文艺报》第5卷第2期发表山大中文系干事张祺揭露吕荧在教学中"脱离实际,脱离毛主席文艺思想的教条主义的错误"的来信。学生被学校动员起来给吕荧提意见,批评他的"教条主义"。吕荧撰文反驳,说张祺并未听过他的一次课,信中反映的情况与实际不符。《文艺报》不作调查研究,继续发表山大学生来信和外校一些教师的文章,集中批判吕荧,并在编者按中说:"有少数教师,在这一思想改造运动中表现了不正确的态度。他们还没有能够正视自己的教学中和文艺思想上的偏向;他们的教学是脱离实际和违反了毛主席的文艺方向的,同时也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这里所发表的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文艺学教授吕荧同志的来信,就表明了他在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中所采取的不正确的态度。"③ 当时担任文艺学课代表、两年后因带头批判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而一鸣惊人的"青年人"李希凡发表《对我校文艺教学问题的几点意见》一文,从小资产

① 《致文娱版编辑同志的公开信》,《文汇报》,1952年2月27日副页。

② 韩义:《批判我的名利思想》,《文汇报》,1952年7月28日。

③ 《文艺报》,1952年第2号。

阶级思想改造等 6 个方面批判吕荧先生的“错误”[①]。生性耿直、倔强的吕荧不能接受这样的“批判”，拂袖而去。同时受到批判的还有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赵景琛、重庆大学中文系教授邵祖平、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穆济波、黄季安等人。黄药眠先生也发表了检讨文章。《文艺报》的一篇综述说，这次讨论共收到全国 28 所高校教师与学生的来稿来信 300 件左右，“最显著的是大部分教师对这一问题表示冷淡。教师们的来稿只占很小的比例”[②]。一家杂志发起的运动，无论杂志的地位如何显赫，讨论的问题如何重要，只能号召人们自由参加，而不能强迫。文艺学教学讨论中这种教师消极而学生积极的现象，正是思想改造运动中教师与学生群体两种不同的心态或态度的缩影。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场政治运动之积极与消极，也应由它的客观效果来检验。文艺整风对于新中国的文学艺术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不久即由这场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周扬作了回答。周巍峙回忆说：“1952 年 7 月 15 日，周扬在全国电影制片厂厂长联系会上讲到 1951 年开始进行文艺整风的正面与负面的影响，好处是在文艺的领导机关及领导人中提高了文艺思想，明确了方向，但也引起教书的人不敢写书了，写文章的人不敢写文章了，而最大问题是一年多没有本子，电影厂的生产几乎停顿了一年，不管客观情况如何，总是一大损失。”[③] 既然文艺整风给文艺工作者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精神压力，导致了文艺创作、学术研究的极度萧

---

① 《文艺报》，1952 年第 2 号。1984 年，即 32 年后，李希凡编辑了《吕荧文艺与美学文集》，以纪念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吕荧先生，并在“编后记”中承认，吕先生“那时就已有了系统的理论体系，贯穿着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观点”，那场山大“独有”的运动，“显然也反映了十七年文艺思潮中的‘左’的倾向，或者也可以叫做‘左’的倾向的萌芽”。

② 《改进高校的文艺教学》，《文艺报》，1952 年第 8 号。

③ 《周扬与文化工作》，《中国文化报》，1998 年 5 月 8 日。

条乃至停顿,“左”的领导者当时尚且有所察觉,今天的人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肯定和歌颂这场运动呢?

第五章　短暂的喘息

文艺政策调整的信号:纪念《讲话》的两篇文章——文艺政策调整的动力:对公式化、概念化的批评——"温和"的教条主义:胡乔木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讲话——呼唤文艺繁荣:吴祖光关于改变作家生活方式的建议——思想与政策之争:第二次文代会前后冯雪峰与周扬的对立——一个不该发生的事件:《文艺报》对李準小说的批评——忍不住的抱怨:教育界对照抄苏联的不满——惶惑的科学界:陈伯达"七月讲话"和《地理学报》事件

5.1　文艺政策调整的信号:纪念《讲话》的两篇文章

1952年7月,教育界、科学界的思想改造运动和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基本结束,急风骤雨式的思想检讨与批判运动停了下来。执政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显著地进入了一个调整和相对宽松的时期。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意识形态领域的紧张气氛有所缓和,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动荡不安的知识界得到了短暂的难得的平静。

导致这次政策调整的主要因素,一是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需要人才和科学技术,因此需要争取知识分子;二是在"洗澡"运动中知识分子普遍做了"诚恳"而"深刻"的检讨,使领导层有理由相信"在思想改造运动后,绝大部分教师都已端正了立场、观点、态度,

使高等学校面貌为之一新"[①],"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已经在文艺界迅速地丧失原有的市场"[②],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已经得到初步确立。也许还有第三种因素,即领导层意识到有必要对在群众运动中滋长起来的"左"的倾向作一定限度的遏制。

文艺是当代中国政治的风向标,更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晴雨表,这一特点,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已初显端倪,在1952夏秋之际开始的知识分子政策调整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因为这次调整就是从文艺开始的。是年5月23日,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0周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5月26日,周扬发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这两篇文章,透露了即将调整文艺政策的信息。

在文艺整风高潮尚未消退之时,旗帜鲜明地提出开展"文艺工作中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是《人民日报》社论的突出特点。社论认为,文艺界的思想混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资产阶级思想对于革命文艺的侵蚀"与"文艺创作上的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倾向"。第一种倾向仍然是主要的,因为贯彻毛泽东的文艺方针,"首先要划清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界线"。在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于革命文艺的侵蚀"的同时,为什么还要反对"文艺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呢?这是因为它与第一种倾向一样,妨碍着毛泽东文艺方针的贯彻。社论指出:文艺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主要地是由于庸俗地了解了文艺的政治任务而来的。这类作品,除了搬拾来一些口号与概念之外,空无所有。它的人物是没有血肉没有性格的,它的内容是缺乏生活的。它只是把

① 曾招抡:《三年来高等教育的改进》,《光明日报》,1953年1月10日。
② 《努力发展文学艺术的创作》,《人民日报》,1953年10月8日。

肤浅的政治概念和公式化的故事粗糙地糅合在一起。它既不是现实生活的深刻的反映,因此,也就不会对群众产生真正的教育作用"。这样的作品"仿佛很强调政治,而实际上却是取消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真正功用"。"我们迫切地需要能够迅速反映现实斗争的文艺作品,但决不是概念化和公式主义的作品。""正如高尔基所说,公式主义是不可避免地局限并歪曲了活生生的、急速变化着的现实。容许这种反现实主义、同时也是反历史主义的倾向继续泛滥,就会使我们的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功用受到严重的损害。"

社论指出:"上述两种倾向的表现虽然并不相同,但是就其根源和结果来说,却是具有同样的特征。它们同样是根源于脱离群众和实际斗争,不关心人民的生活和要求,对于政治的无知以及思想的懒惰和麻木,因此它们所达到的结果都同样是对于现实的歪曲,同样是阻碍革命文艺的发展的。""真正的艺术品,必须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否认思想性,这就是说,否认革命的文艺需要有革命的政治内容,拒绝为工农兵服务;否认艺术性,这就是说否认革命的文艺需要有高度的艺术形式,拒绝深刻地研究生活、反映生活。显然地,这两种倾向都是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的。""一方面,反对文艺脱离政治的倾向——这种倾向,实际上是使文艺去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另一方面,反对以概念化、公式化来代替文艺和政治正确结合的倾向——这种倾向实际上是破坏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真正目的。这两方面,就是我们今天文艺工作中的两条战线的斗争。"社论还指出:"在批评工作中要防止简单化的、骂倒一切的粗暴现象",不要从概念出发而是要从生活出发来批评作品,同时指出"一部分领导干部""对艺术工作采取粗暴武断的态度","是一种十分恶劣的倾向"。

3天以后,《人民日报》发表周扬的文章,进一步阐述了上述的观点,不同的是,他把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提得更加突出和尖锐。周扬认为,文艺创作的数量、质量都是不够的。"文艺表现

新的事物、新的生活不够有力;反映人民生活的方面不够宽广;作品缺少应有的感动人、鼓舞人的力量。这就是说,创作上严重地存在着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我们批判了在表现群众的新的生活和新的事物上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而来的甚至从封建思想而来的各种明显的歪曲,这是完全必要的,今后还必须继续进行这种批判的工作。但是我们却容忍了一种最普遍大量存在的,似乎是'合法'的歪曲——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概念化的作品把人民生活中本来丰富的、生动活泼的、新鲜的事物描写成单调的、乏味的、千篇一律的公式;把本来是有血有肉的,有思想、有性格的,在一定环境下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人写成没有血肉的,无性格、无思想的,完全任凭作者任意摆布的,像木偶似的人物;把本来是复杂的、严重的政治斗争写成简单的儿戏。这一切难道不都是很大的歪曲吗?这样的歪曲难道是可以容许的吗?""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所以能够'合法'存在,没有受到批评,有时甚至受到鼓励,主要原因就是文艺工作者以及一些文艺工作的领导者错误地了解了文艺服从政治的正确关系和真正意义。"

联系到新中国成立前后文艺界领导层一直极力主张文艺要以"赶任务"、"写政策"的方式为现实政治服务,直接导致了文艺创作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化和粗制滥造现象的泛滥,联系到贯穿于《武训传》批判、萧也牧作品批判、文艺整风运动的不变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文艺作品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联系到以《文艺报》为主要阵地、以陈企霞等人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粗暴批评正是在"三反"和文艺整风时期达到极端的事实,鲜明地提出变一条战线上的斗争为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其中蕴涵的调整领导思想和文艺政策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无论《人民日报》社论还是周扬的文章,都没有使用"调整"的概念。我们现在说它是一次"调整",是联系到当时的具体历史背景,对这两篇文章的内容与特点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全

于周扬们有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是在对文艺政策进行有意义的调整，我们并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周扬们这时仍然认为文艺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责任在作家，与文艺工作的宏观指导无关。这就堵塞了全面检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领导工作，纠正"左"的错误的可能性，使这次文艺政策调整成为一次不自觉的、有限度的、充满了争论与冲突的因面难以彻底和持久的政治行为。

5.2 文艺政策调整的动力：对公式化、概念化的批评

这一次文艺调整的根本动力，是人民群众对于高质量的文艺作品的极度渴求和文艺创作相对落后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发生，一方面是新老作家难以很快熟悉和适应革命胜利后的新环境、新社会，但更重要、更直接的原因，则是"左"的文艺工作指导方针和教条主义粗暴批评压抑了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中央文化部电影局负责人、著名电影艺术家黄钢在 1952 年 7 月 10 日发表的文章中说，据不完全统计，自 1950 年春到 1952 年春，电影局编剧工作者创作的电影剧本与故事梗概，被否定的有 32 件之多。他认为，阻碍故事片剧本创作的首要原因是"庸俗地了解电影艺术作品的政治任务"，即要求一切艺术作品包括每一部电影作品，都能反映当时当地的每一具体政策，都能直接配合当前某一方面的实际工作[①]。仅此一例即可说明，造成文艺创作萧条的主要原因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人民群众对文学艺术落后状态的不满，对所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激烈的、无休止的批判和其间恶性发展起来的扼杀一切创作的粗暴批评在文艺工作者中间造成的沮丧与反感，使得领导层不能不对文艺政策作一定的调整。

在谈到这次文艺调整的具体推动力量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冯

---

① 《论目前电影剧本创作中的主要问题》，《文艺报》，1952 年第 13 号。

雪峰和他主编的《文艺报》。冯雪峰作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30年代左翼文艺的重要领导人、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战士，新中国成立后理当成为文艺界最高领导层的成员。然而，由于他在文艺理论和文艺工作指导思想方面长期与周扬对峙以及文艺界的宗派纷争，新中国成立后受到排斥。1952年2月，在"三反"运动的高潮中，冯雪峰接任《文艺报》主编。在批倒一切的狂热激情中，他主持的《文艺报》仍然非常之"左"。然而，这位后来被正确地批判为具有与胡风相同或相近的文艺思想、同时又有丰富的文艺工作领导经验的理论家很快发现，以周扬为代表的文艺领导中的错误已经发展到危及文学艺术生存的严重程度。他不能不出来为文艺工作者说话，不能不出来呼吁恢复"毛主席的文艺思想"，这就使他再次成为以周扬为代表的主导路线的对立面、广大文艺工作者的代言人。

冯雪峰对于以周扬为代表的文艺领导的批评，最早反映在他在《文艺报》1952年第10号(5月25日出版)发表的评丁玲《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文章中。他在这篇写于5月14日的文章中说："我们目前文学创作界依然有脱离生活和脱离群众的现象，同时也存在着反现实主义的、主要是概念化的创作路线。不少空洞说教的理论和不少简单化的批评，也在赞助和'开辟'反现实主义的、主要是概念化的创作路线。这是一条有害的、我们应该反对的创作路线。因此，把《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以及别的一些比较成功地反映了现实的作品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与路线，加以明确化，则在我们纠正目前创作与理论批评中的反现实主义的错误倾向的工作上是有作用的。"冯雪峰并没有像《人民日报》社论、周扬文章那样强调"两条战线"的斗争，而是集中抨击公式化、概念化的偏向，把它称之为"反现实主义的""创作路线"；他也没有把公式化、概念化的责任归于作家，并以继续改造他们的思想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在冯雪峰看来，"创作路线"的错误发生在领导层，是需要领导层解

决的问题。

1952年5月至年底,《文艺报》开辟了"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问题的讨论"和"对概念化、公式化倾向的批评"两个专栏,发表了一批文章,反映了文艺工作者的苦恼、希望和呼声,成为推动1953年9月第二次全国文代会进一步调整文艺政策的群众基础与舆论基础。

《文艺报》"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问题的讨论",从1952年第9号(5月10日出版)开始,到第23号结束,发表了20多篇文章。文艺整风期间,解放军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曾严厉批评部队文艺创作中流行的写"落后到转变"的公式主义,《文艺报》赞同过陈沂的观点。这件事在文艺界造成了相当的混乱,成为创造新英雄人物问题讨论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多数人认为,公式化、概念化的现象要批判,"落后到转变"也可以写;提出反对写"落后到转变"的口号,使作家不敢写人民群众中的落后现象,不敢写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使得作家左右为难,"不创造新英雄人物受批评,创造新英雄人物也受批评,到底怎么办才好呢?过去写'落后到转变'是否还是对的呢?今后写'落后到转变'是否还可以呢?"有人指出:"近来某些批评文字与读者反映,就有不允许作品中有带缺点的人物出现,常常不分析地,反现实地指责作品为'歪曲形象',发出'我们还能忍受这种歪曲吗?'的叫喊。这种现象是应当引起重视的。"南京作家蔡田以他在创作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说明,"不许写'落后到转变'的法则,给了我们在学习上写作上的困难;使我们不得不缩手缩脚,左右顾虑;使我们被限制了表现的范围,不敢多方面去接触表现题材;使我们被限制了主题的性质,不敢多方面去提出问题;使我们不能全面地去正视现实生活,而只能不全面地去观察生活,以选择题材。……这些批评家的这种理论,其影响是很严重的,已经形成了一种不良倾向"。安理认为:"一种似是而非的抹煞生活的矛盾和斗争的新的公式主义理论与胆怯的创作,正在阻碍

着我们创造真正新英雄人物的道路”。佘树声的来稿指出，在改变了写落后到转变的偏向以后，“在我们中间却产生了另一种偏向，认为写‘落后到进步的转变’和创造英雄形象是绝对对立的。在他们看来：既然要创造英雄的形象，那就必须把英雄写得十全十美，和一般的群众不能有丝毫的共同之点。使人们一见就不禁大吃一惊：‘啊！多么不可思议的英雄啊！’似乎不如此，便是降低了英雄人物的高贵品质”。“这种在文艺创作和理论上忽‘左’忽‘右’的偏向之所以发生，归根结底，是由于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①] 围绕着怎样创作英雄人物、可不可以写从落后到先进的转变的争论说明，为教条主义束缚而不得自由的文艺工作者，强烈反对规定他们必须怎样写或不能怎样写。他们渴望与呼吁创作自由。

在《人民日报》社论和周扬文章发表以后，《文艺报》似乎有意开展对于公式化、概念化的集中批评。6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第11、12号合刊发表的题为《请不要采取这样的批评态度和批评方法》的读者来信综述，对编辑部收到的文艺批评稿件中存在的“左”的偏向提出了批评。综述指出，许多批评稿只从概念出发，不管作品中描写了什么，动辄指责作品“没有写出党的领导，这是污辱了党！”动辄指责作品“歪曲英雄形象”，否定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的复杂矛盾和斗争。对一些描写从落后到进步的转变的作品，也采取了一概抹煞的态度，不问作品是否正确地反映了现实中的问题、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的发展规律，一律认为是严重的错误。这些批评稿普遍地存在着“脱离实际和狭隘地理解作品的政治内容”，从概念和原则出发乱扣帽子的错误。文艺整风结束以后，8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第16号开辟了“希望开展对概念化、公式化倾向的批评”的专栏，同时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文章的第一句

① 《文艺报》，1952年第11、12号合刊。

话就是"脱离群众、脱离生活而制造出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是目前文艺创作活动落后于政治任务的主要问题之一"。

文艺整风结束后,文艺界的空气缓和了,但是运动造成的文艺思想混乱并未解决。《人民日报》社论和周扬文章的发表,《文艺报》的活动,似乎预示着领导层可能会采取一定的行动纠正"左"的偏差。然而,对"左"的偏向的批评并没有继续下去。《文艺报》"希望开展对概念化、公式化倾向的批评"专栏,仅出一期即行消失;"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问题的讨论",也在年底戛然而止。文艺界似乎由激烈的斗争时期进入了无矛盾、无冲突、无斗争的平静状态。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一种状态呢?这就不能不研究1952年12月12日胡乔木的讲话。

5.3 "温和"的教条主义:胡乔木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讲话

胡乔木在新中国意识形态领导工作中长期居于特殊地位。他从延安时期任毛泽东秘书,是毛泽东许多文稿包括《讲话》的整理者或起草者。作为中宣部副部长,他对文艺工作是有发言权的。然而,这位至死不脱浓厚知识分子气味的"党内一枝笔",对于批判电影《武训传》曾有相当的保留。在文艺指导方面,他虽不能逸离大势,但似乎较周扬更为持重、温和。这一点已为近几年陆续发表的史料所证实。以1952年5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为标志的文艺调整,当与他的推动有关。然而,1952年12月12日他在全国文协学习会上对一批准备深入生活的作家的讲话,却成为这次调整既不彻底又充满坎坷的重要原因。

胡乔木这个讲话的核心内容,是极力张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大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斯大林1934年在苏联作协成立时提出来的创作方法,它的基本内容是要求作品要具有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这种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要和用社

会主义思想教育劳动人民、在思想上改造劳动人民相结合。胡乔木根据"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的要求，批评了文艺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他以电影《人民战士》和小说《新儿女英雄传》为例，说明类似前者那样的人物没有个性、故事发展不真实的作品和后者那样虽然艺术成功但不能在思想上给人以教育的作品，都是违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他引用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的话说明，文学艺术的任务，就是以它特有的形式担负起不同于学术讲演、政治讲演的特殊政治任务，就是把什么是正确的、革命的、前进的、高尚的，什么是守旧的、落后的、不敢向前看只向后看的东西，告诉人民，唤起人民的感情、信心和力量。他说："作品创造人物，就是为了动员人民，改造人民，教育人民应该怎样和不应该怎样。作品如果不是为着告诉人民应该怎样和不应该怎样，那末，作品为什么存在呢?"

显然，胡乔木强调的观点仍然是传统的观点，即文学艺术是党用以教育人民的工具，文学艺术的功能仅仅在于教化。但是，他同时强调文学艺术要发挥这样的作用，必须做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因而应当提升艺术性在文艺创作中的地位。这表现了一种新的思维。他说，人民群众已经对文艺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看优秀的电影、优秀的戏剧、优秀的小说。他们已经对差的作品表示了不满。作家要创作出高质量的文艺作品，应当加强政治修养，使自己达到时代先进分子的水平，同时要在艺术上作出努力。他说："要产生高度思想性、艺术性的作品，作家不仅在政治上应该有充分的学习，而且在艺术上也应该有充分的学习。我们时代的作家应该在政治上是高明的，同时在艺术上也是高明的。虽然文艺界在政治学习上丝毫没有令人满意的根据，但却经常有这种意见，批评那些在艺术上学习的人，说他们的学习态度有问题。我想这种批评是危险的，有害的。因为今天我们并没有在艺术上过分高明的危险，相反的，我们有许多作家在艺术上却表现了令人不能容

忍的低下状态。""我们没有理由反对这种对文学艺术技巧的学习。"

胡乔木的讲话语气平和,规劝多于批评,大有"循循善诱"的君子风度,完全没有新中国成立初期常见的文艺界领导人讲话中惯有的那种"火药味"。他着重批评公式化、概念化,完全不提继续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也就是说,不再强调所谓"两条战线的斗争";主张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批评忽视艺术性的倾向;不再强调"赶任务"、"写政策",要求文学艺术配合某一时期、某一项具体工作,而是从宏观社会环境和人民群众需要的角度提出文艺创作的一般任务。把胡乔木的这个讲话精神与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到文艺整风时期党的文艺工作方针相比较,指导思想上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胡乔木的讲话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这种缺点,首先是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奉为不容怀疑、不可移易的创作原则和创作方法,使它成了束缚文艺创作的教条。其次,是在回答当时文艺界争论不休的如何创造典型、如何创造英雄人物等问题时,规定了文艺创作应当写什么、应当怎样写;主张"写本质",写无缺点的"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主张写大题目、大环境、大事件,反对写"狭小环境"的"狭小斗争";要求描写大的生活画面时,必须有无缺点的共产党员出场,等等。这些清规戒律,束缚了作家的思维和手脚,也为"左"的文艺批评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胡乔木认为,文学艺术要完成教育人民的任务,必须创造典型人物。作品中的正面典型,应当反映作家的理想,成为人民学习的时代的榜样。这样的典型不能脱离现实,但又不是"现实的普通平均数",因为用现实中的普通平均数写出来的典型不能教育人民。这就需要作家用一些"夸大",这种"夸大"是作家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典型不一定限于最常见的东西,也可以是体现了社会发展规律,明天将成为普遍、大量存在的东西。"典型表现了社会发

展的本质……表现了本质就正确地写出了典型。”这种“本质论”、“理想论”证论了创造现实中尚不存在的理想化典型人物的必要性，成为后来极端发展的“高、大、全”创作模式的理论来源之一。

针对在陈沂批评写“落后到先进的转变”以后文艺界对可不可以写落后人物的转变、正面人物可不可以写缺点、能不能写冲突等问题发生的激烈争论，胡乔木明确表示支持陈沂的意见，同时系统地论述了创造完美无缺的英雄人物的观点。

胡乔木认为，在这场讨论中发生了“种种对于文艺要求的曲解”，“在许多曲解的意见中，也包含了要写英雄，要写正面人物，但同时要写有缺点、有错误的英雄的意见。同时据说还有‘写没有缺点的英雄是反现实主义’的批评，这种批评是完全错误完全不能立足的。这只是说明这种批评者自己是无理想的。他们不认为在我们的实际生活里有这种理想人物。这种理想人物，他们的生活、工作、斗争就代表了人民的利益，他们为人民的理想而奋斗，他们自己也就成为人民理想的化身。在过去的时代里提出这样的要求也许有许多困难，但在今天有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工人阶级革命运动中，产生了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党，这种政党领导革命得到胜利，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怀疑今天现实中有这种崇高的理想人物，那只是说明怀疑者自己精神上的低下状态，因此他不能看到，不能相信这种崇高的东西。他没有这种勇气和信心和这种人物生活在一起，并且把这种人物的形象写到他自己的作品里面来。因此，他们制造出这样一种理论，说任何人都是有缺点的，英雄也是有缺点的，因此在作品里的英雄也应该是有缺点的，这叫做现实主义，其实这不是现实主义，这是对现实主义的讽刺与歪曲”。

为什么英雄人物是可以没有缺点的呢？胡乔木说：“这首先是因为现实中存在这种英雄。其次是有些英雄人物他们身上有些缺点，但是因为作家要写本质，要写典型，要以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人民，所以对这些缺点应该加以忽略，如果把这些缺点，写在他要

动员人民的英雄人物身上，这就成为一种罪孽，这就成为要在人民群众面前散布一种思想矛盾，这就使群众接受一种哲学，就是世界上没有什么十全十美的东西，世界上就是这样，'天下乌鸦一般黑'，顶多只是程度不同。把这种哲学在群众中散布，这是毒害群众的思想。"有些英雄有缺点，可以在斗争中克服。作品不是写传记，要写本质的东西，因此没有必要写出这些缺点或在斗争中克服缺点的过程。作家的任务是把大量存在着的反映了本质的萌芽集中起来创造没有缺点的典型。

胡乔木从文艺要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理论出发，主张写大环境、大题目、大事件，因为写狭小环境中的狭小题目、狭小事件，"不但妨碍我们的作品表现典型人物，也妨碍它表现典型环境"，因为狭小的环境广度不够、广阔和丰富不够，不能代表时代的特征。在狭小环境中产生的狭小斗争，"妨碍我们的作品成为深刻的作品"。在这个问题上，胡乔木的思想是含混不清的，因为典型不在大小。后来发生的伍存浦对秦兆阳《农村生活散记》的错误批评，正是以胡乔木这种思想为依据。

胡乔木还强调，文艺作品写党的领导，应当有共产党员出场。"这不是说任何一首八行、十行的短诗，或者是任何一篇短篇小说里都要如此，但凡是描写巨大的生活画面，描写复杂的事件的文艺作品，如果没有共产党员而且没有各种各样的共产党员出场，那是不符合生活的事实的"，因为今天中国人民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而党的领导是通过党员和党的干部传播的。"如果能够在作品里抹煞与回避这种事实，如果作者是有意这样的话，那他对他的政治良心是不真实的，因为他否认了事实。"胡乔木说的，显然是描写新中国成立后事件的文艺作品。但是，这种写大场面必须有党的领导和党员出现的要求，后来被扩大到一切文艺作品包括以新中国成立前的社会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和一些描写小场面的文艺作品，成为一种教条化的创作模式。

胡乔木这个被冯雪峰称为"党最近对文艺工作的指示"[1] 的讲话，非常鲜明地反映了1952年秋至1954年10月的两年间党的文艺领导工作的特点，即一方面抑制在政治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左"的倾向，试图缓和文艺界的紧张气氛，期望文艺出现繁荣景象；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或认识不到有认真检讨党的文艺理论、文艺工作指导方针的必要，不愿意让"在政治学习上丝毫没有令人满意的根据"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家"享有较多的创作自由，更谈不到允许文学艺术的相对独立的发展。显露于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而在文艺整风中恶性发展的"左"的倾向，它的为文艺工作者深恶痛绝的表面行为受到明确遏制，却通过类似胡乔木的讲话这样的加工制作，获得了稳定的、表面看来不那么令人厌恶的理论形态。如果把胡乔木的这个讲话放到从新中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去观察，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5.4　呼唤文艺繁荣：吴祖光关于改变作家生活方式的建议

接踵而来的《武训传》批判运动、思想改造运动、文艺整风运动，挫伤了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文艺整风结束后，文坛逐步归于平静，但是，教条主义的束缚没有放松，在自我否定中失去了创作冲动和创作方向的作家们，惊魂未定，封笔不写，文艺界沉寂无声，文艺创作萧条冷落。"电影厂经常缺少可以拍摄的剧本，许多话剧团经常没有戏演，新的戏曲作品很少，可供演唱的新歌曲也不多，音乐会和美术展览会很少举行。创作活动的不够兴旺，不但使群众感到文化生活的饥渴，并且使不少的艺术工作者荒疏了自己的艺术业务。"[2] 政治运动没有带来文学艺术的繁荣，反而使之陷入

---

① 《克服文艺的落后现象，高度地反映伟大的现实》，《文艺报》，1953年第1号。

② 《努力发展文学艺术的创作》，《人民日报》，1953年10月8日。

了十分悲哀的境地。

领导层察觉了这种状态,并表示了关切与不安。1953年2月25日,《人民日报》引人注目地发表了夏衍、田兵、老舍、吴祖光论文艺的文章,并在"编者按"中承认,"直到目前为止,在作家们的实际创作活动和各地对文艺创作的领导上,仍然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文艺创作落后的情况仍是严重的"。田兵的文章《一个省文联在领导文艺创作上的失败教训》,批评了平原省文联的干部和工作。老舍的文章《咱们今年都要拿起笔来》,提出了大多数老作家不再动笔或动笔甚少的问题,却把原因归之于老作家兼职太多。比较有分量的是夏衍的《克服文艺创作上的落后状况》、吴祖光的《对文艺创作的一些意见》这两篇文章。

夏衍作为文艺领导层的重要成员,文章满篇"官话",毫无新意。他认为文艺创作落后的原因,是"在加强思想学习和深入生活锻炼这两个问题上,我们文艺工作者认识还是不明确,看法还是不一致的。换句话说,就是对于怎样来加强思想学习、怎样来深入生活的具体问题,似乎依然还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除去上述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很使作家们感到困惑,而实际上却是大大地阻碍了作家们用正确的创作方法来从事写作的问题。这就是直到今天为止,在文艺工作的领导方面和批评工作者之间,也还有很多人机械地理解了文艺作品的政治任务,而要求每一种文艺形式和每一个文艺作品来配合各个方面的实际工作,要求它们能够迅速地反映当时当地的每一个具体政策的问题。……指定题材,指定政策,要求作者在一定的短促时期之内写成小说、戏剧乃至电影。有些地方的文艺领导方面在一个政治运动还没有展开之前就要求作家迅速地写出反映这个运动的作品。另一些地方的文艺工作领导方面对参加'土地改革'的文艺作家提出要求,要他们把所有有关土地改革的政策都包括在作品之内。……不提倡深入生活,不反映生活的复杂、多样与矛盾,粗暴地想把概念和技术贯注到作品里

面,或者牵强地让主人公喊出几句政策口号,是决不能创作出为人民所喜爱而又能教育人民的作品的。"这就是说,夏衍把"写政策"看做妨碍文艺创作的重要原因。在这一点上,他与周扬不同。

吴祖光的文章颇有一些创造性的思想。他对新中国成立后自己的创作状况不满。他说:"从一九三七年我开始学习写作起,到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前为止,在这十二年之中,我写过九个多幕话剧,一个独幕剧,创作和改编了六个电影剧本,一个散文集。这些作品都得到了演出、拍摄和出版。""在解放以后这三年多的时间里,我几乎停止了创作,只改编并导演了一个电影片《红旗歌》,编写了一个评剧本《牛郎织女》,再写了一些短文。""在旧中国的黑暗年代,在创作生活里,我没有感到过题材的枯窘;相反,常常是在写作某一个作品时便酝酿或完成了下一个作品的主题了。""解放后,我的创作源泉好像突然堵塞了。""原因没有别的,那自然就是学习不好,政治水平、思想水平太低,目光如豆,不但看不到现实的前面,即使现实生活里的矛盾也看不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创作的可能性就太少了。""另一个原因是我的工作变了。解放后我担任了电影导演的工作。……我觉得在电影导演的任务之外进行写作是不是'走私',是不是一种无纪律的行为呢?在一九五一年我接受一个私营剧团的约请编写评剧《牛郎织女》时,我要求剧团在广告上不要登出我的名字。""解放以后,创作很少或没有创作的作家,不在少数。"

吴祖光是文艺界的"大炮",因思想敏锐、生性耿直、卓立特行而一生坎坷。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创作不多,显然有政治运动的影响和体制的束缚。他似乎想回避这些问题,然而,斯人生性如此,管不住嘴巴。他说,创作的不景气,"除去作家的主观努力不够之外,我认为批评方面也有缺点,缺少肯定和明确的意见,尤其是对于优点的肯定。我们需要批评,尤其需要鼓励。缺点应该指出,优点也应该加以肯定"。这就明显地透露出了他对创作环境的不满。

吴祖光这篇文章的创造性,是他对实行作家职业化、保障作家合法权益的建议。他认为,改变“退缩和沉闷的局面”,除了加强学习、深入生活之外,应当考虑改变作家们的“生活方式”。“作家应该以他的创作维持他的生活。创作就是作家劳动的结果,就是作家的生产成品。假如今后作家的版税、稿费、上演税都在政府的保障之下成为一种制度,这对于作家和读者观众来说就是对待劳动的重视。优秀的作家的优秀的创作必然得到群众的喜爱,必然争取到广大的读者和观众,也必然因此获得较为优厚的待遇。这是作家本分应得的,自然也就是一种最合理的最实际的鼓励。这种鼓励将促使作家增强劳动。对于不够努力的作家们,这样也不失为一种刺激。”

吴祖光对于新中国成立前作家的“生活方式”表示了明显的赞赏。他说:“解放前的一段十年以上的时期,我是以版税尤其是上演税为生活的主要收入的。解放以后我没有什么创作,但是我感觉着目前对于创作劳动的重视是显然不足的。这里举我自己的一个例子来说:我在一九四七年曾经写了一个神话剧《嫦娥奔月》。这三年以来据我所知:上海有人把它改编成连环图书,改编为沪剧上演;青岛文联把它改编为京剧上演;北京某剧团把它改了名字并改编为京剧上演;辽西省文工团木偶剧队把它作为木偶剧上演。这些改编和演出的作者都换上了别人的名字,并且改动的地方也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但是我本人是根本连通知都不曾得到的,作者理应得到的权益当然也就不必谈。”地方戏中最流行的《小女婿》,是根据李健吾先生的话剧《青春》改编的,“但是李健吾先生的名字从来没有和《小女婿》发生丝毫的联系”。他呼吁保护作家的权益,强调“文艺创作这一劳动形式应当得到它应得的重视。这可能成为改变作家生活方式的开始,也即是消除作家的‘供给制’思想的对症之药。……文艺创作必须在职业化之后才能得到更大的发展和进步,这将是促进我们人民文艺的创作高潮的推动的力量”。

吴祖光的建议，意义非同小可。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创作了无生机，除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恶化了创作环境，打击和压抑了人们的创作积极性外，制度和体制的影响不可小视。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长期实行供给制，创作有无成就及成就大小，影响他们在革命文艺队伍中的地位，但与个人的物质生活关系不大。新中国成立后，供给制推行到全国，原本靠稿费、版税、上演税等生活的新区作家也都成了国家干部，由国家包下来。这种体制，固然给作家们提供了稳定的生活条件，但是，也使得作家的劳动成果与劳动报酬失去了直接的联系，勤奋而有成就的作家得不到物质上的鼓励，消极、懒惰、不动笔的人照样生活，个人物质利益失去了对文艺创作的杠杆作用。这种体制还有一层实际上已为吴祖光指出的弊端：供给制必然把作家固定在某一具体单位，成为某一"组织"中人。组织用纪律和资源限制人们的流动，分配人们的工作，掌握人们的生活来源，把执政党的政治思想领导转化为以行政权力为后盾的强制。作家不再是自由职业者，文艺创作要遵守一定的模式，人身亦失去了流动的自由。他们无法摆脱对组织的依赖和组织的控制，离开了组织，他们的作品无处发表，生活没有来源。这样一种体制，当然不会给文艺创作带来生机。

吴祖光关于作家职业化的建议，也许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当时全国作协曾经认可过这一方向，并制定了过渡性的办法。但是，作家职业化，等于把作家推向市场，而旧中国曾经有过的文化市场已经消失。在全国实行"供给制"、吃"大锅饭"的情况下，文艺界不可能实行一套特殊的制度，因此，作家职业化这一制度性改革完全缺乏必要的条件。吴祖光坚持从制度和体制方面探讨阻碍新中国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原因，并在1957年发表了相关的爆炸性言论，因此而成为戏剧界最大的"右派分子"。

5.5 思想与政策之争:第二次文代会前后冯雪峰与周扬的对立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新中国文艺界的领导层内部、著名文艺人士之间、文艺界领导层与广大文艺工作者之间,充满了矛盾,从来没有达到过真正的统一。每当社会政治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者文艺发展出现某种危机需要进行重大调整时,这些矛盾往往会趋向激化并表面化。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前后冯雪峰和周扬的尖锐对立,就是文艺界内部矛盾的一次典型表现。他们的对立,当然不是个人意气或历史积怨的爆发,而是两种文艺指导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广大文艺工作者与领导层冲突的反映。

众所周知,冯雪峰、胡风等人与周扬、夏衍等"四条汉子"在30年代即已交恶。新中国成立后冯雪峰未能进入文艺界的领导核心,亦不愿在周扬直接领导下工作,因而没有发生过正面冲突。1952年5月以后,冯雪峰主持的《文艺报》逐渐显露出独立于文艺界领导层的思想倾向。胡乔木在全国文协学习会上发表讲话以后,冯雪峰在他起草的《文艺报》1953年第1号社论《克服文艺的落后现象,高度地反映伟大的现实》中,既表示了对胡乔木讲话的拥护,又表达了对文艺现状的更加明显的极端不满。此后,《文艺报》连续发表群众来信或文章,反映这种不满。如1953年第6号刊发的题为《作曲家和诗人应该工作起来》的群众来信说"愈来愈少听到愉快的、雄壮的和生气勃勃的歌声","今天只有民歌小调和一般化的、缺乏自己的特点的歌曲,而缺少真正的创作","没有歌唱","歌咏队快要垮台了","唱来唱去都是一个样","不喜欢新出的歌曲","晚会没有节目","许多人写的歌词,大都思想贫乏,内容枯燥,缺乏诗的意象,少有动人的语言,也谈不上歌曲所要求的形式与结构的完美与匀称、节奏与音韵的美和自然"。第10号在"读者对创作问题的意见"的标题下刊发邓友梅等20人的来信摘要。

西安《群众日报》何彬斋在信中说，文艺整风后，“产生了一种偏向，这就是有些作者为了怕在政治上犯错误，就改写政策或法令条文，因此作品中充满了政治口号”。同期发表的曾炜的《陷于停滞状态的文艺创作》说，“华南解放三年多来，不但在质量上不曾有过一篇较好的作品，就是在数量上也少得可怜”，“华南的作家们在这两三年内也没有在外地刊物上发表过什么东西”。第12号发表宋涛的文章《关于文艺创作组织领导中的一些问题》，对文艺领导的行政方式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的公式化、概念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第18号报道了湖南文艺界对公式化、概念化的批评。这些来信和文章，无疑反映了冯雪峰的思想倾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53年6月17日，冯雪峰在全国文协召开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学习座谈会上发表了1957年被当做他的典型“右派”言论之一的总结讲话，尖锐地批评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文艺领导工作，全盘否定了周扬等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原定1952年召开，由于文艺界内部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存在尖锐分歧，一直推迟到1953年9月才召开。大会的主报告原定由冯雪峰起草。冯雪峰起草的报告草稿未被接受，周扬亲自起草了新的报告。后来，冯雪峰将他起草的报告稿陆续在《文艺报》上发表。这就是今天我们在《雪峰文集》中看到的《关于创作和批评》。

冯雪峰与周扬的分歧与对立，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如何评价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工作，这是确定党的文艺指导方针要不要调整、应当进行何种程度的调整的前提。二是文艺创作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在党的领导方面，还是在作家方面。三是如何理解文学艺术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如何评价“写政策”的口号。

在第一个问题上，冯雪峰的观点是“今不如昔”。他在《文艺报》1953年第1号社论中，肯定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文艺“有一定的优秀的成绩”，但更强调文艺的落后，认为“这种落后的情况最引人

注意的表现,就是在三年多中间的文学和艺术的创作竟是非常的不多,而其中可称优秀的作品更是不多","人民已经日渐不能忍耐肤浅地、稀薄地反映我们现实的、思想性既低下而艺术性也拙劣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是不能认为已经反映了我们伟大的现实的。人民对于我们的怠惰、敷衍了事、粗制滥造,以及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等等,已经表示大大的不满"。他在 1953 年 6 月 17 日的讲话中说,这几年出版的作品有两千种以上,"举得出来的好作品很少,如果有二十种较好,也只不过是二十分之一"。"今天刊物上发表的作品,与高中、初中的作文差不了好多。"① 他在为文代会起草的工作报告稿中说,这几年的作品,"大部分水平都还很低。少数较好的作品,在水平上也还不能说已经达到能力上可能达到的高度,例如这几年发表的作品,其中可作为最高成就的,也还不及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到全国解放之间的最高成就的作品"②。周扬在第二次文代会上的报告,却用三千多字的篇幅大讲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工作的成绩。他也承认"整个来说,新的文学艺术创作还是贫弱的",但问题仅仅是"群众感觉新的文学艺术作品太少,特别是电影、戏剧作品太少",文艺作品与生活相比,"常常是显得单调而乏味"③。周扬坚持"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自然就基本肯定了党和他本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然地把阻碍文艺创作的因素作为次要的倾向来对待。冯雪峰倾向于基本否定或问题严重,自然主张对文艺政策作重大调整。

在第二个问题上,冯雪峰与周扬的观点更是截然不同。冯雪峰认为,概念化、公式化和粗暴批评的普遍存在,证明"反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或"主观主义的文艺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文艺的领

---

① 《雪峰文集》第 2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 1 月版,第 495 页。

② 《雪峰文集》第 2 卷,第 500 页。

③ 《文艺报》,1953 年第 19 号。

导工作已经背离了毛泽东文艺路线。正如本书提到过的，他在评丁玲《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文章中已经指出“文学创作界存在着反现实主义的、主要是概念化的创作路线”。在全国文协1953年6月17日的座谈会上，他不指名地批驳了周扬1952年5月26日文章中把文艺创作落后的原因归于“相当多的文艺工作者相当长时间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观点，认为“这样回答不能把问题明白化，太笼统了。为什么会脱离实际？究其责任，凭心来讲，这几年的情况作家的责任较少”。“作家的能动性，向生活的战斗性，独立的思考力，好象是被谁剥夺了的样子，不象一个灵魂工程师。”作家主观上的原因，作家自己要负责。但要追究为什么会这样？“过去即使写小资产阶级，也不会那么被动，那么可怜的状态。”文艺落后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是违反毛主席思想的主观主义思想支配了我们的创作的领导。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产生了一些好作品，领导方法比现在要好得多，主观主义思想不允许发展，好作品是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产生的。这几年毛主席的路线是被歪曲了的”①。把作家的思想改造与创作活动分割开来，片面强调思想改造；否定间接经验和研究，片面强调个人体验生活；实际剥夺作家的创作活动和创造性的自由；对作家不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实行“思想上的管制”等，都是严重的错误。“创作一定要通过个人的创造，作家思想是生活的表现，作家要发挥创造性，不允许剥夺作家创造性的自由，如果是作家自己剥夺了，也是罪过。我们要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上去。”“承认作家是灵魂工程师，就要尊重作家创作的权利和自由，我们没有实际上的形式上的管制，而是思想上的管制。”“这次文代大会我们要提出一个口号：打倒创作上的主观主义，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文代会报告草稿中，他不但再次肯定

① 《雪峰文集》第2卷，第495、496页。

“主观主义的文艺思想”“有力地存在于文艺界”[①]，而且指出这种文艺思想是文艺工作的行政方式的领导或种种变相的行政方式的领导的思想基础，又赖行政方式与种种变相的行政方式的领导推行自己的影响。这样，冯雪峰就否定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艺领导工作，主张从指导思想上对整个文艺工作进行彻底的检讨与调整。

周扬决不承认文艺领导存在严重的缺点或错误。他在第二次文代会上针锋相对地说，“我们的文学艺术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这个基本的现实主义倾向是不容忽视或抹杀的”。许多作品存在概念化、公式化的“缺陷”，不过是表现了现实主义的“薄弱”。“有些作家在进行创作时，不从生活出发，而从概念出发，这些概念大多只是从书面的政策、指示和决定中得来的，并没有通过作家个人对群众生活的亲自体验、观察和研究，从而得到深刻的感受，变成作家的真正的灵感源泉和创作基础，这些作家不是严格地按照生活本身的发展规律，而是主观地按照预先设定的公式来描写生活。”“他们没有十分深刻地全面地认识生活和理解生活，而有些作家，特别是年轻的作家，又还没有充分地掌握表现生活的创作方法和文学技巧，这就形成了产生概念化、公式化的最普遍最主要的原因。”他承认“文学艺术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倾向之所以不容易克服，还由于一种把艺术服从于政治的关系简单化、庸俗化的思想作祟”，文艺领导存在着“往往不顾文学艺术活动的规律，对在文学艺术活动的指导上表现了粗暴的态度”的缺点，“我们比较地习惯于采取简单的行政方式，而不善于运用社会方式来领导艺术创作的活动”，“对于创作的行政方式的领导方法正是无思想、无政治的领导的表现，同时也就助长了创作上概念化公式化的错误倾

① 《雪峰文集》第2卷，第498、499、508页。

向。”[①] 显然，周扬坚持认为，文艺领导基本上是正确的，不存在背离或“歪曲”毛主席文艺路线的问题；文艺创作中的缺点，主要责任在作家；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的途径，主要靠作家们的努力，根本不存在使文艺指导思想“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上去”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即要不要“写政策”的问题，冯雪峰与周扬公开对立。“写政策”是新中国成立前后领导层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重要口号。周扬口头上反对庸俗地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却始终坚定地为这个口号辩护。他在1953年3月11日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的文艺作品中一定要表现政策”。不表现政策就不能真实地反映现实，因为“政策和生活在我们的时代，在苏联，在中国应该是一个统一的东西，是一个辩证的统一”[②]。冯雪峰则把“写政策”一类口号作为主观主义文艺思想的典型表现加以抨击。他在同年6月17日的讲话中说：“在领导思想上，为政策写作，写政策，这不是马列主义的概念，而是政策的概念。”“党性是生活自然的流露，党性、政策离开了生活，是最严重的脱离实际，因此使得我们产生今天这种破产了的可怜的创作路线。”[③] 他在文代会报告草稿中进一步指出：“‘写政策’的提法所以错误，不仅在于政策不能代替生活，正如地图不能代替地球，指南针不能代替人的走路一样。而且这样的提法，结果一定会把政策从实际生活和实际斗争中脱离出来，使它成为抽象的概念。”“文艺的任务，是写生活，写斗争，写在生产和斗争中的、在实行着生活和斗争的人。”文艺同政策负有相同的政治任务，但它是“从描写生活的真实和创造典型的途径去实现这个任务”[④]。周扬在第二次文代会上反驳说：“文艺作品是应

---

① 《文艺报》，1953年第19号。

② 《在全国第一届电影剧作会议上关于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报告》，《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227、230页。

③ 《雪峰文集》第2卷，第497页。

④ 《雪峰文集》第2卷，第506、507页。

当表现党的政策的。文艺创作离开了党和国家的政策，就是离开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作家在观察和描写生活的时候，必须以党和国家的政策作为指南。他对社会生活的任何现象都必须从政策的观点加以估量。作家必须表现政策在群众生活中所产生的伟大力量。”①

冯雪峰不能接受第二次全国文代会的路线。他坚持自己的文艺工作见解。在为《文艺报》1953 年第 23 号撰写的社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文学艺术的创作任务》一文中，他强调：“文艺工作有它自己特殊的方法，有它自己的创作路线，有它自己的一个战线。这就是要作为一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那样，通过描写人民的灵魂——人民的思想、感情、品质及其一切精神上的活动的方法，来描写国家的现实生活及其在斗争中的发展。所以，文艺的方法，就是描写人的思想活动，描写人的精神品质，以塑造人的灵魂的方法。”“文艺是通过自己的战线去为政治服务的。”他的这一思想，在 1954 年 10 月毛泽东发动的批评《文艺报》和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中受到严厉批评，认为这篇社论“既没有提出文艺工作者在总路线宣传中的创作任务，也没有提出在文艺上对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任务，反而离开了这些具体的战斗任务抽象地强调文艺工作者的所谓特殊的‘方法’和‘路线’；这自然也是一种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文艺思想”②。1957 年把冯雪峰打成“右派”，这也被作为他的罪状之一。

冯雪峰和周扬的对立表明，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前后的冯雪峰，实际上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的代言人，他奋力争取的目标是打破教条主义的文艺领导，解除对于作家的束缚，争取最大限度的创作自由。历史证明了冯雪峰的正确。然而，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党领

① 《文艺报》，1953 年第 19 号。

② 《文艺报》，1955 年第 3 号。

导文艺工作存在的错误方面，是周扬乃至胡乔木等人不能接受的。面对无可否认的文艺落后状态和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代表们的严厉批评，周扬、郭沫若、茅盾等人不得不对简单、粗暴、教条主义的文艺批评提出批评。但是，他们只承认领导工作中存在若干缺点，不承认发生了根本性的错误；他们不从领导工作本身找原因，而把文艺落后的责任归之于作家，把由“左”的指导思想导致而为人们深恶痛绝的粗暴批评归之于陈企霞等几个“棍子”批评家。这就决定了这次文艺调整是被动的、有限的，它对“左”的倾向的认识、批判和纠正，不可能达到应有的深度和力度。

5.6 一个不该发生的事件：《文艺报》对李準小说的批评

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斗争和冯雪峰等人的推动下，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尽管未能深刻检讨与纠正文艺领导中日益严重的“左”的错误，但还是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积极鼓励文艺创作的指示，批评了粗暴的文艺批评和领导工作中的行政方式，使“左”的倾向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会后，粗暴批评逐步减少，作家的创作积极性有所恢复。不料，1954年年初却发生了《文艺报》对李準小说《不能走那条路》的批评，又在文艺界掀起了一阵小小的波澜。

《不能走那条路》最早发表在1953年11月20日的《河南日报》上。这篇小说企图通过一个农民购买别人土地的故事，反映当时农村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读者、中南局及河南省的文艺领导，均给予很高评价。12月20日出版的《河南文艺》和25日的《河南日报》发表作家苏金伞的评论文章《读〈不能走那条路〉》。同期《河南文艺》还发表了根据小说原作改编的曲剧。作者被邀请到当时的省会开封作了两次报告。《河南日报》和《河南文艺》开了两次作品座谈会。河南省文化局和文联把作品改编成话剧、梆子、坠子、连环挂图，大量印发，作

为宣传材料。到1954年年初,有50多个农村剧团和中小学校将作品改编成剧本上演。1954年1月,《长江文艺》转载这一作品,中南局文联负责人于黑丁发表文章给予高度评价。据说毛泽东看了这篇小说,并在《人民日报》转载这篇小说时亲自写了按语。

1954年1月30日出版的《文艺报》发表该刊理论批评组组长侯敏泽的评论《〈不能走那条路〉及其批评》。这篇评论署名"李琮",据张光年在反右派运动中揭发,是在陈企霞"指使"下写的。这篇评论首先肯定作者的创作态度认真、严肃,"对生活有比较真切的感受",对主要人物的描写比较真实、生动,作品写得很朴实,语言生动、简练,读起来感到很亲切。"特别在看多了概念化的、内容贫乏的作品的时候,这样的作品就更容易为读者所喜爱",然后指出了作品的缺点,特别表示不赞成中南和河南方面给予的高度评价。这就惹出了麻烦。

李琮的文章认为,李凖的这篇小说"也象一般初学写作者的作品一样,有一些由于作者生活经验、思想水平和艺术能力的限制而产生的缺点"。"中南和河南的文艺领导方面对《不能走那条路》的作者的帮助上,还有不实事求是的地方。"如苏金伞的文章说作品写得很深刻,很成功,"通过人物形象,通过具体斗争,通过复杂的内心斗争而解决了矛盾,使自发的资本主义思想受到批判,社会主义思想获得了胜利","它的教育意义是很大的"。李琮认为这是"一种超于作品的实际的估价"。他认为于黑丁的评价"还更其过分"。"在他的文章中,他全面地谈到了这篇作品的各个方面的成功,从作品的总的面貌以至作品主题的选择及其体现,人物形象、表现矛盾冲突以及语言等等,作者都全部给以极高的评价。""这种分析批评,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作为文艺批评看固然不够客观和不切实际,作为对于一个新作者的鼓励和帮助,也不会带来好结果。那种不是根据整个人物的塑造,根据作品反映现实的忠实、深刻的程度,而只是从人物的某几句对话中就得出这是什么主义、这

是什么品质的结论的办法；那种不问人物到底在艺术表现中是否有典型性，而只要看到‘正面’的便评定为‘典型人物’，甚至把概念化的人物也加以歌颂的办法，其实际的结果，只能是助长了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同时，对于一个初学写作者的作品，不是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从而进行鼓励和帮助，而是不适当地加以过多的歌颂，甚至把它的缺点也当做了优异的才能，这样做，实际上并不能给作者以真正的益处，而恰恰容易使作者不能很好地去认识自己的成果和努力的方向，以及他的缺点或错误"，这无异于拔苗助长。

据说李琮的评论给作者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也引起了河南与中南方面的不满。《文艺报》的"棍子"形象，使人们自然地认为《文艺报》旧病复发。《文艺报》1954 年第 7 号发表康濯的文章，对李琮的文章提出激烈的反批评。康文完全否定了李琮对作品本身缺点的指责，也否定了对苏金伞、于黑丁的评论的批评。他认为这篇小说人物的描写不存在概念化和公式化问题，更重要的是，"作品描写的是当前我国人民最关心的重大事件之一——国家总路线贯彻当中有关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主要问题，而且是及时地正确地提出了与解决了问题"，因而具有重大的政治与社会意义。"这篇小说是从生活出发的，有着相当的真实性，刻画出了相当生动的艺术形象，因而这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品。正因为如此，这个作品对人民的政治教育意义就比较大，也就必然获得它的社会效果。这样的作品是值得鼓励和赞扬的。而作者李準又是一个新人，这就更值得鼓励和赞扬。《人民日报》转载这篇小说时所加的鼓励和赞扬的按语，就严肃地说明了党对这个作品的恰当的评价。""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我们的批评必须首先考察一个作品的政治效果和社会需要，考察这个作品对于生活的真实性。因此，只要一个作品的政治教育意义较大并且反映了生活的真实，那末，即使它在艺术上还有些粗糙，我们也是应该热情地加以肯定的——这

就是我们的批评政策和态度。"李琮的文章"本身是不科学的，不实际的，没有考虑作品的实际与生活的实际，仅仅武断地从教条公式出发，因而，就不顾作品所已获得的社会效果，而不适当地贬低了作品的教育意义和艺术价值。""我们的批评应当努力发现、鼓励和培养群众中生长的年轻的作者，鼓励一切作家表现当前现实生活中最迫切的、重大的、尖锐的问题。而李琮同志的文章的整个精神，则恰恰缺乏对于年轻作者和表现当前现实斗争的作品所应有的热情的、欢迎的态度。"

康濯的批评是无法反驳的，因为他既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依据，又有《人民日报》编者按所代表的"党对这个作品的恰当的评价"的支持。从客观上来说，《不能走那条路》正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作品。无论河南、中南方面还是毛泽东、《人民日报》，看重的是不是这部作品的艺术性或李準这个新人，而是这篇作品能够发生的政治教育与宣传作用。否定这样一个作品，当然就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文艺报》作了检讨，在发表康濯文章时的"编者按"中承认："第一，康濯同志这篇文章中所提出的对于文艺作品所具有的社会的、政治的意义和效果，特别在当前有重要意义的政治性的作用，应该首先给以积极的肯定、充分的评价和及时的宣传，这是完全正确的。第二，对于正在陆续出现的新作者，尤其是在比较长期的群众的实际生活中，相当熟悉群众生活并能提出生活中的新问题的新作者，应该给以应有的热烈的欢迎和支持。这也是完全正确的。第三，与这两点相联系，批评文章不应该根据公式和教条，而应该根据生活和作品的实际，这也当然是正确的。"李琮的文章"所引起的影响是不利于我们文艺的发展的"，"这一次的事情，对于我们的工作，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康濯出面批评冯雪峰主持的《文艺报》，其间有无复杂内情，我们无从得知。可以肯定的是，冯雪峰长期与周扬交恶，特别是在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前后公开否定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领导工作，在

以周扬为核心的文艺界领导层是得不到支持的。毛泽东对李準小说已经表态,《文艺报》茫然无所知而踏了“地雷”。趁此时机,对“反对派”冯雪峰来突然的一击,亦在情理之中。笔者如此之说并非无端猜测,康濯的这篇文章已有所暴露。他特别指出,《文艺报》发表李琮的文章,同它排在一起的是巴人(王任叔)写的评《初雪》的文章。这篇文章“把《初雪》评价得完美无疵,说它‘是表现了生活的最高真实’,因而‘就是诗’,这显然是过分的不恰当的评价”。“《文艺报》编者在发表指责于黑丁的批评缺点的文章时,为什么竟看不出巴人文章也恰恰具有同样的缺点呢?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奇怪了。”康濯说“《文艺报》当然是无意地把李琮同志和巴人同志的文章偶然放在一起的”,此话大有欲盖弥彰之嫌。《初雪》作者何许人也?胡风分子路翎。康濯文章给人的暗示是:冯雪峰打击新生力量,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吹捧与胡风有密切关系的路翎,一个问题,两种态度,立场不是大有问题吗?

《文艺报》批评李準小说,冯雪峰负有责任。李準小说纵有公式化、概念化的流行病,在文艺为现实政治服务已成为铁的原则,相关创作模式已扎根于作家头脑的情况下,用在30年代相对自由的创作环境中形成的文艺理论来裁判50年代的创作实践,是行不通的。这时,“左”的倾向给文学艺术造成的损失还不够严重,人们得到的教训还不够充分,还没有产生彻底反思与向正确回归的深层要求。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很难出现符合冯雪峰标准的真正的艺术作品。在连续不断地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对于革命文艺的侵蚀”而大大挫伤了作家的创作积极性之后,再来批判具体作品中的公式化、概念化,指使作家应当这样写,或应当那样写,同样会使作家无所措手足。《文艺报》对李準小说的批评被视为一次“粗暴批评”,得不到文艺工作者的同情,原因即在于此。

5.7 忍不住的抱怨:教育界对照抄苏联的不满

1952年7月至1954年10月,领导层不但有限度地调整了文艺政策,对教育、科学、学术领域的指导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教育界的热点从思想改造运动转向院系调整与学习苏联。院系调整是在思想改造运动的高潮中,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迅速完成的,很多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并没有完全搞通,其间确有不少的主观主义错误。1952年10月起,以纪念十月革命35周年为契机,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学习苏联运动,教育界是学习苏联最为积极也最为"实在"的领域。教育部主要负责人主张,学习苏联要"一板一眼地学"、"就是要教条的学",在教育改革中照抄照搬苏联的教育模式、教学模式、教学管理模式乃至教材、教法。这在中国教育事业迅速扩张、教育教学水平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虽不无好处,但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也非常严重。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很有意见。思想改造运动后,人们也不再敢轻易发表不同意见,惟恐被上升为"崇美""反苏"而受到批判,但不满情绪仍然存在并发展着。

1953年8、9月间,在院系调整和学习苏联中发生的偏向日趋表面化的压力下,高教部接连召开了全国高等工业学校行政会议和全国综合大学会议,讨论了学习苏联过程出现的一些问题,这就给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表达情绪的机会。在这两次会议上,特别是在全国综合大学会议前后,一批担负高校领导工作的知识分子谨慎地表达了对教条主义地学习苏联的不满情绪,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教育政策的松动。

第一是要求重新确定综合大学的地位。思想改造运动中激烈批判欧美式的"通才教育",暴露出领导层轻视综合大学的倾向。在院系调整中,这种极其有害的倾向得到贯彻,具体表现就是不适

当地、过多地减少了综合性大学，把清华大学等一批办学卓有成效、享有盛誉的综合性大学改为专门的工科大学，撤销了燕京、辅仁等著名的综合性大学。“新型的综合性大学究竟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应占什么地位，起什么作用，它的方针、任务和培养目标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都不够明确具体。”[①] 综合大学的生源、师资都成了问题。在综合大学会议期间，人们对综合大学问题上的偏向提出了批评。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先生说：“过去，我们综合大学的工作做得不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我的体会，就是因为工作中的民主作风不够。在院系调整时，正如钱俊瑞秘书长所说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仓促，各校只是按命令办事，未能在教师中进行充分的商讨和说服。对于综合大学的性质、方针、任务都很不明确，以致在调整中，对于图书仪器等设备的调配，特别是对于师资的安排，不曾达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的目的。而且由于我们没有深刻了解到综合大学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组织需要高度的计划性和充分发挥集体力量，我们在这些工作上，就不曾把充分发扬民主精神，当做我们的首要任务。因而就不能很好地组织集体力量，发挥教师的积极性。”[②] 在群众意见的影响下，马叙伦检讨了领导工作上的错误。会议确定：综合性大学是国家文化和科学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各种专科性高等学校和各种研究机构的基础；综合大学的任务是培养具有更广阔的科学知识和更高深的理论水平，通晓一般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各种基本规律，能逐渐养成独立地创造性地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或教学工作的人才。这就明确了综合大学的地位与任务，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综合大学重视不够的偏向，解决了综合大学着重于理论还是着重于实用性技术的争

---

① 《加强团结，发挥潜力，稳步贯彻综合大学会议的精神》，《光明日报》，1953 年 9 月 26 日。

② 《光明日报》，1953 年 10 月 7 日。

论。

第二是明确提出了"学习苏联要结合中国实际"的要求。人们认为,院系调整以来教育工作发生的缺点,主要是教育行政领导对教育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对中国的实际和苏联的实际缺乏正确的分析、估计与比较,不恰当地以苏联的标准作为我们的标准,产生了贪多冒进,要求过高过急的偏向。四川大学副校长刘绍禹教授说:"过去一年,我们只是片面地强调学习苏联经验而忽视结合学校的实际。专业的设置,教学计划的制订与执行,教材的采用与编写,都没有结合学校的师资、设备及同学的程度等具体条件,轻率冒进,要求改革过高过急,结果去年下半年造成严重的忙乱现象。"① 南开大学教务长吴大任教授说:"教学改革的过程是学习苏联的过程,也是把苏联的先进经验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的过程,因此它同时又是创造的过程。""如果在实践中不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或结合得不好,就会只学到苏联经验的形式,没有学到它的精神实质,就会冒进,也会保守不进,过去一年,两方面现象都有的,而主要的是冒进的一面。""苏联的经验是不宜于硬搬的。"②

第三是要求端正对待"资产阶级科学文化"的态度。思想改造运动以后,这个问题成了"禁区"。人们在综合大学会议上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如武汉大学副校长韩德培教授说:"我们对过去的文化遗产,特别是资产阶级的科学文化,没有能采取正确地对待的态度。""有人认为对于资产阶级的科学文化,应该先把它完全打碎,然后才谈到吸收。这种看法,在这次会议中,是被否定了。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的科学文化,其反动的部分应该予以坚决的否定和抛弃,其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部分,应该予以严格的批判,其

① 《光明日报》,1953年10月9日。
② 《光明日报》,1953年10月8日。

正确有用的部分,就应该加以吸收。这样的态度,才是正确的态度。"[1]

第四是要求正确对待老教师。马寅初先生说:"在过去,尤其在'三反'之后,学校行政对于老教师没有照顾得很好,诚为遗憾。"[2] 韩德培教授说,新老教师团结不好的原因,是对毛主席指示的团结知识分子政策认识不够甚至认识错误,也与不能正确对待文化遗产特别是资产阶级科学文化有关。有人开始认识到思想改造运动中的偏差。如唐山铁道学院院长顾稀教授在参加全国高等工业学校行政会议后写的一篇文章中说:"有些同志由于不了解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常常急躁地叫嚷资产阶级思想的'复辟';有的职工把教师看成学校中的另一阶级,一听到要为教学服务,就有对抗情绪;有些高年级学生埋怨教师的教学改革太慢太少。""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中的偏激情绪和主观片面所引起的部分年长教师的顾虑过多,和对某些年青教师的不满情绪,以及部分年青教师的自高自满和对年长教师在教学中所起作用的轻视,也影响了教师间的团结以及师资培养和提高工作的开展。"[3] 这实际上是把新老教师的隔阂看做思想改造运动的后遗症。

在这两次高等教育会议期间以及前后,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非常微弱。经过思想改造、院系调整、学习苏联运动之后,旧中国过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已经不可能再得到像1950年6月全国高教会议那样的发言机会,也不再有那时的热情。

但是,办教育没有教师的积极性是不可想像的。1953年8、9月间的两次会议,没有达到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的目的。教育界领导层束手无策。1953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不得不发表社

---

① 《光明日报》,1953年10月8日。

② 《光明日报》,1953年10月9日。

③ 《改进领导,加强团结,稳步进行教学改革》,《人民日报》,1953年9月14日。

论，要求“进一步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社论说，实现高等学校在过渡时期的任务，“有赖于高等学校中的党组织进一步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加强新老教师的团结，对老教师采取正确的态度”。社论批评“不少高等学校的党组织和某些担负学校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没有认真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有些同志甚至违背了这一政策。这些同志在和老教师相处当中，表现了骄傲自大，盛气凌人，不去虚心地学习老教师的长处，也不主动帮助他们进步，甚至常常用粗暴的态度对待他们。也有些同志对老教师采取了无原则的迁就态度，对老教师的错误思想，没有进行必要的批评，对老教师的思想改造，没有采取真正关切的态度。这样，就使部分学校的党团员和群众的关系，新教师和老教师的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处于不正常的状态，影响了老教师的进步，妨碍了老教师积极性的发挥，给提高教学质量和培养新师资的工作以至整个高等教育事业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社论反对把是否已经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做衡量老教师的惟一标准，认为对于老教师，应该首先看他们是否“诚实工作、通晓本专业并酷爱本专业”。老教师应当接受马克思主义，但对此不能采取急躁态度，“把将来才能达到的标准当做今天的标准”。这篇社论在呼吁“宽待”知识分子的同时，坚持认为“老教师都是来自旧社会的人，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都受了欧美资产阶级教育的深重影响，以致不论在政治思想上或学术思想上，至今都还存在着许多欧美资产阶级的观点”。“推动老教师的思想改造，清除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乃是高等学校在整个过渡时期的重要任务，也是教育领域内思想斗争的主要方面，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取得胜利，才能把高等教育事业推向前进。”①

① 《加强对高等学校教师的思想改造，进一步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人民日报》，1953年12月22日。

这篇社论，典型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执政党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个悖论：既想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他们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又把他们视为"资产阶级"，坚持进行无休止的思想改造，这种似乎能够用辩证法加以圆满解释的怪异理论，正是从新中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个根本性的失误、一个走不出的怪圈。

5.8　惶惑的科学界：陈伯达"七月讲话"和《地理学报》事件

1952年7月18日，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接近尾声的时候，兼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陈伯达在该院研究人员学习会上发表了一篇讲话。这篇讲话不但宣布了科学院系统思想改造运动的基本结束，而且阐述了如何处理科学研究单位内党与非党的关系、如何认识党外科学家、如何对待科学家的研究工作等重要问题。陈伯达在科学院发表讲话这件事本身，应当视为执政党特别重视科学工作的表示。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最高领导层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科学院的特殊情况，确定了对科学人才"保护不伤"的原则[①]。与教育界、文艺界相比，科学院系统的运动，方式方法比较"温和"，一般不采取群众斗争的"过关"方式。对大多数研究员，只要求他们在副研究员以上人员参加的检讨会上作检讨，别人提出意见，本人接受批评即可。"只有十分恶劣顽强抗拒者才需反复检讨，最后在全院性研究人员代表会或大会上检讨，经低头后仍让他们做工作。"[②]尽管如此关照，让科学家们在大庭广众面前作否定自我的"检讨"，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45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在科学院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方针问题给华东局宣传部的复示》，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9册，第535页。

让青年党团员对他们进行激烈的批评,仍使他们痛苦不已。这时的中国科学院,不再是进行高深科学研究的神圣殿堂,而成了大批判的战场。

陈伯达似乎对因运动而造成的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紧张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的报告,第一个问题就是"共产党员在科学院的工作中与党外科学家的关系,新老科学家的关系"。他说,由于共产党是领导的党,共产党员在科学院能起很大的作用;作用起得好,对科学院的工作有很大好处;作用起得不好,则有很大坏处;科学院工作好不好,共产党负有很大的责任。"共产党员如何做好工作呢?是否可以滥用党的威信,妄自尊大,以党员的身份发号施令,而认为一切科学工作者,不经他同意,不通过他,就不能做事情呢?如果采取这种态度就是错误的。共产党员在科学院的基本任务,是在于谦逊地向科学家们学习,帮助科学家们做好工作","否则这个共产党员就是不称职的"。党员科学家也不要以为自己是共产党员,就可以粗暴地对待科学工作和科学家。党员和党外科学家相互间可以开展批评。尽管陈伯达警告党外科学家不要以为人民和共产党看得起自己而骄傲起来,要继续改造思想,但是他非常明确地把改善党与非党的关系的主要责任,放在党员一方。另外,还应注意,陈伯达没有强调党对科学研究的领导,而是表达了近乎于"领导就是服务"的思想。

针对运动中滋长起来的片面否定老科学家、对老科学家的政治思想水平要求过高的倾向,陈伯达说,大规模的国家建设需要发挥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的力量,"我们以后将有大批有能力的科学家涌现出来,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现在我们就必须尽量发挥现有科学家的力量,帮助他们做好工作,帮助他们扩大眼界,逐步地把他们引向共产主义思想。我们共产党员接近党外科学家的时候,需要注意到党外科学家中有许多人在科学上是有某些一定的造就的,解放后,也已在工作上开始接触国家经济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并有一定的贡献。虽然这些贡献还不算很多,但是这是一个好的开始,证明他们一旦站在人民这一方面来的时候,便能够表现出他们过去所没有表现过的能力。这些善良的肯努力工作的非党的科学家,将来是可以给国家做很多事情的。他们由于各种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过去没有机会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许多人过去是'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但这些并不能够多怪他们。我们对老科学家的看法,不能简单地以他什么时候自觉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断定他的一切的标准,重要的,是看他在所做的那一门科学工作上,是否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工作"。

思想改造运动中甚至更早以前,在理解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上普遍地发生过严重的偏差。有些领导干部、青年教师、青年学生、青年科研人员,不懂得如何做科研,不懂得科学家所从事的工作特别是基础性研究的意义,对科学家研究蝙蝠、刺猬、蚯蚓等大加嘲讽,甚至乱批乱斗。科学研究中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被庸俗化为低俗不堪的实用主义。陈伯达在讲到科学院的工作方向时,在强调科研工作要为国家建设服务,为人民的迫切需要服务,必须努力提高中国的科学水平,把我国的科学推进到世界高峰的同时,特别强调要正确理解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他明确肯定,不能依据今天是否有用来判断一项科研工作。他以数学和天文学的某些研究为例说:"有一些理论的工作今天与生产实践没有直接的联系,只有间接的联系,或者今天没有联系,可是明天会有联系。有些科学研究工作,今天还只在开始,所以不能要求它马上和生产实践及人民的生活便能够有大量的普遍的联系。事实上,许多科学研究工作,它和广大人民需要的联系总是从小量到大量的。对于这一切的科学工作,我们都应当采取尊重和积极帮助的态度。"古代史和考古学方面的问题,能够帮助人们了解历史,开阔眼界,也是必要的。"科学研究工作应该放在广阔的眼界上,不应该限于追求一些枝节的事情",但是,"有些东西初看起来很小,不被人们所

看重，但有些有思想的科学家看出研究好了这种东西有可能说明重要的问题，有可能得出重要的结果，那么，大家就不要去讥笑那些进行这种研究的科学家，不要去反对他，而应该尊重他，因为说不定他的研究结果将来会有了不起的贡献”①。

陈伯达的讲话，阐明了思想改造运动结束后最高领导层对科学和科学工作者的基本方针。它的基本精神是调整党与非党的关系、老科学家和青年科学工作者的关系；强调科研为国家建设服务，同时，允许科学家保留一定的自由空间；强调科学家的爱国精神体现于致力于国家的科技进步，号召科学家勤奋工作，努力改变我国科学落后的状况，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应当说，这个讲话的精神是积极的。

但是，陈伯达的讲话仍然有着重大的缺陷。他没有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科学工作的经验与教训，批评和纠正思想改造运动中产生的偏差；虽未强调党对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但也没有提出科学家参与领导的问题；没有对西方的科学水平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认为“英美科学家的东西可以参考”，但是，“英美科学上好的东西苏联都把它集中起来了，所以，向苏联学习是最快的、最好的”。

陈伯达的这个讲话，反映了党在 1952 年下半年到 1956 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以前科学工作的指导方针。在这样一种方针的指导下，大规模的思想批判运动停止了，但是，思想改造运动的消极后果并没有消除。“有些教师因为过去在思想改造学习中，看到资产阶级学院式的科学研究受到批判，至今提到科学研究，仍然心情不安。他们害怕自己‘辛辛苦苦’从事科学研究，结果‘落得一顿骂’，因而不愿意参加科学研究工作。”② “有许多人不敢写论

① 《在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2 年 9 月 4 日。

② 《扫除在高等学校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中的思想障碍》，《光明日报》，1955 年 3 月 7 日。

文，怕写了被人批评，'多写多错，少写少错，不写不错'。"[1] 人们的工作积极性无法调动，全国的科研工作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

思想改造运动结束后，科学界继续处于沉寂与停滞的状态，除了运动后遗症外，学术界的"政治哨兵"对知识分子的无时不在的威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政治运动培养了一批类似姚文元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拿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阶级观点"等的尺子，时刻观察"阶级斗争新动向"，专门挑剔知识分子的"毛病"，动辄把问题上升到阶级与阶级斗争的高度进行批判。1953年3月间发生的《地理学报》事件，即是一例。

《地理学报》是中国地理学会的刊物，创刊于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出版。1953年3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陈天民的文章《评严重缺乏政治思想的〈地理学报〉》，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地理学报》"就其主要的一面来说"，"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其中很多文章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都是非常错误的"。如第16卷任美锷的《四川农作物生产力的地理报》，"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形式主义的观点和抽象的方法来说明问题的"。徐近之的《国际地理大会历次概况》，"是一篇反动透顶的文章，几乎每一句话都带有毒素，每一个观点都是反动的"。发生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地理学报》"一贯忽视政治思想领导"，"它既没有刊登任何介绍有关地理学理论的科学论文，也没有对资产阶级的地理学作任何系统的批判，更没有组织各地地理学工作者进行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

面对党报的压力，5月17日，兼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的竺可桢先生和学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孙敬之发表《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答复，表示接受陈天民的批评，承认"《地理学报》的编

[1] 吴征铠：《对于综合大学中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几点意见》，《人民日报》，1954年4月27日。

辑缺乏对人民负责的态度,缺少或者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他们因袭着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编辑方法,单纯地强调来稿的'学术性',而不问稿子在政治上思想上有无错误。甚至有些人在思想上、立场上还没有很好的改造和转变,自然就不能辨别文章的错误所在和批判这种错误,更说不上有意识地介绍苏联先进的地理学理论了"。社会大转折时期的《地理学报》固然存在编辑思想落后于社会变革的问题,但陈天民式的政治批判显然是简单、粗暴、毫无道理的。统一的、具有绝对权威的意识形态形成以后,它必然经常试图超越意识形态的范围,进入自然科学领域,成为阻碍科学发展的消极力量。《地理学报》事件即有这样的性质。

科学研究的停滞,也与政治运动对科学家的"改造"有关。不可否认,连续不断的理论学习、政治运动、思想批判,扰乱了一些科学家的思维,使他们在一些最基本的科学观念上发生了混乱,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泛政治化"的迷误,阻塞了科学进步的道路。我们以南京师范学院教务长高觉敷教授1953年8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为例。

高先生是留学美国的著名心理学家。他在这篇题为《我是怎样批判资产阶级的心理学,开始学习苏联心理学的》的文章中说,他开始很难接受苏联的心理学,认为学术不应该和政治混在一起。苏联的心理学有强烈的政治性,苏共中央曾明确要求心理学加强党性,不容许心理学脱离政治,科学家要以"战斗的姿态"对传统的唯心论心理学作斗争。不同学派发挥自由思想,心理学才能进步,而苏联的心理学都归于一个形式之中,既不允许客观主义,也不允许有不同的学派存在,心理学如何发展?经过一连串的政治运动,特别是经过思想改造运动,他终于"沉痛地明白"自己一向不问政治,却以资产阶级心理学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资产阶级心理学的本质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科学的书籍里尽管没有一个地方牵连到政治,但是反动政治的毒素渗透在每一种科学理论之内,也

渗透在心理学之内";无产阶级的心理学必须建立在无产阶级哲学的基础之上。他以唯物与唯心、进步与反动为标准,批判了自己曾经崇信的完形心理学特别是勒温的形势心理学与"洞悟"理论,接受了巴甫洛夫的学说和苏联心理学。高先生把他学习苏联心理学的体会归结为过"三关",即政治关、哲学关、生理关。他说:

> 感谢党的教育使(把)我从唯心论心理学的泥坑中救出来,开始认真学习苏联心理学。我深切地体会到苏联科学不是在科学本身内所可能学得好的;必须首先通过政治活动和政治理论的学习改变立场,由资产阶级的立场转向于无产阶级的立场;其次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论和毛泽东思想,因为苏联科学是建立在辩证唯物论的基础之上的;第三就我们心理学而言,还必须钻研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①]。

历史证明,高先生原本的思想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思想,而是科学的思想。科学就是科学,科学不是政治,科学(首先是自然科学)为政治服务本来就是不能成立的。评价科学,只能用科学本身的标准,不能用政治的标准。科学的发展要求充分的自由与多样,要求有多种学派平等共存,自由争论,互相促进。通过学习与"改造",高先生把科学问题与政治问题混同起来,把科学家与"政治人"的角色混同起来,这就必然使自己的科学研究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

---

① 《我是怎样批判资产阶级的心理学,开始学习苏联心理学的》,《光明日报》,1953年8月24日。

第六章 学术思想批判

思想改造新阶段：清理学术领域的资产阶级思想——首当其冲的权威：对俞平伯和胡适的批判——无知批判有知：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的批判——知识分子的克星：激进派青年群体的崛起——运动“改造”人：吴小如先生的“觉悟”过程——“两头小、中间大”：批胡适运动中的“旧学者”——借题发挥：文艺界对“左”的倾向的批判——双重避险：斗争指向的急剧转变

6.1 思想改造新阶段：清理学术领域的资产阶级思想

1954年9月15日，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先生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了毛泽东主席的开幕词，老先生心潮澎湃，当即写下《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见闻随笔》，抒发对毛泽东的钦佩之情。他说，毛主席的开幕词，“简要得巨细不遗，精练得毫发无憾，庄严恰与伟大的题目相称。这三点犹不尽其形容的万一”，“真可悬之国门，传之后世”。毛主席“在这里发出了庄严的诺言，像泰山般的高，沧海样的深”，“真正是一首好诗”[①]，字里行间，激荡着对共产党、毛主席、新中国的热爱。俞先生绝没想到，

① 《新观察》，1954年第20期。

大会刚刚结束半个月，毛泽东便发动了批判他的《红楼梦研究》的运动，毫不留情地将他划为胡适的思想同党。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思想改造运动结束后两年间知识界的相对平静，成为又一场以高级知识分子为主要斗争对象的新的政治运动。

清除以胡适派思想为核心的旧的意识形态残余，建立马克思主义在各个学术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直接目的。1954 年 10 月，毛泽东在对《光明日报》发表的《评〈红楼梦研究〉》一文的批注中，即把俞平伯先生的观点归结为"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10 月 16 日，他在致刘少奇等 28 人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称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是"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在这封信中，他对于诸如《清宫秘史》没有受到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①]，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这说明他一直在密切关注着意识形态领域的动向，对思想文化界包括类似古典文学研究这样一些"纯学术"领域内没有发生与革命胜利相适应的根本性变化感到焦虑、不满与愤慨。对俞平伯先生的批判，是毛泽东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城堡发动的又一次攻击，《红楼梦研究》则是他选择的突破口。

如同此前此后的多次运动一样，批判《红楼梦研究》的运动，毛泽东作为最高指挥官，只是提出问题，发布攻击令，对这场运动的合理性、必要性的论证以及具体的部署、组织与实施，则由陆定一、周扬等人去完成。1954 年 10 月 27 日，陆定一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呈交了关于开展《红楼梦》研究批判的报告，提出这次"讨论"的目的，是在《红楼梦》和古典文学研究方面与资产阶级唯心论划清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4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 9 月版，第 571、574、575 页。

界限，进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作出较全面的分析和评价，以引导青年人正确地认识《红楼梦》；提出"这次讨论不应该仅停止在《红楼梦》一本书和俞平伯一个人身上，也不应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内，而应该发展到其他部门去，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彻底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①。此时运动的重点是批判《红楼梦研究》。12月1日，毛泽东找周扬谈话后，周扬向毛泽东呈交了关于批判胡适问题的组织计划的报告，将运动的重点转向以批判胡适思想为主。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宣布"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错误思想的批判已告一段落，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已经初步开始，对胡风一派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批判亦将展开"。这个文件作出了"唯物主义思想在我们的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并不是已经真正占着优势，不但党外知识分子中，而且在党内的干部中，还有许多人在实际上分不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或者自己在思想上是唯心主义者，或者在实际上被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所俘虏"② 的判断，据此把树立唯物主义思想，夺取思想战线上的胜利，作为社会主义胜利的前提条件。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更加系统地论证了思想路线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前提条件的观点和开展学术批判的道理，要求各级党委强化对运动的领导。5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宣部《关于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报告》，对这场运动作了初步的总结。

综观这次运动的起承转合，它的基本进程显示出这样一些特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588页。

② 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第459页。

点:从毛泽东的个人决策转化为党的政治行为,从对俞平伯先生《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发展为对胡适思想的全面批判,从对一个人、一本书的斗争发展到对一批人、一层人的斗争,从学术界的思想批判运动扩展到对全社会党员与群众的普遍教育。

与新中国成立后历次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相比,这次运动最显著的特点是以学术领域为主要战场,企图通过学术批判达到净化意识形态、进一步改造知识分子、教育党员和群众等多重目的。执政党认为,"在学术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是社会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理论化、系统化、集中化了的表现"[①];许多学术领域中争论的问题,反映着工人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用唯心主义世界观反对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阶级敌人抗拒改造、阻碍社会进步、阻碍科学与文化进步、阻碍建设事业发展、腐蚀劳动人民和共产党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和思想改造运动没有解决学术领域的问题,因此,需要在学术领域开展长期的对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批判,用以教育党内外知识分子和广大党员、群众。这就是执政党为什么要大规模介入并强力干预学术研究的理由。

依据执政党对这次学术批判运动的目标定位,在开展学术批判的同时,全国各大城市发动了大规模的唯物主义讲演活动。据1955年6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截至是年5月,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西安、沈阳8大城市有179000余名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听了讲演,其中北京设讲坛223个,听讲干部和知识分子达到20万人。然而,这场运动既然以学术界为主要战场,以学术领域的资产阶级唯心论为主要批判对象,它就必然主要影响学术研究和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们,即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正如1955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情况和今后工作的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6页。

报告》指出,"这次批判运动,在我国学术界直接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以往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一般没有涉及学术思想问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很少联系批判学术思想。这次却是以批判唯心主义哲学为中心,旁及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各部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术思想,这就不能不在我国学术界引起震动",但是,"这次思想批判运动对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群众的影响还不够深广"[①]。这表明,无论发动者、组织者如何为运动定性定位,它的影响必然主要局限于学术界,其实际性质必然是一次更加深刻与彻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与以前不同的是,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已经从政治的、思想的层面进入到学术的层面。通过这个运动,那些在旧社会依靠学术研究而获得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将失去最后一块避难地,知识分子不但在政治意识、政治立场上要认同现有政治制度,而且其学术思想亦必须否定既往,认同马列。所以说,这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新阶段。

6.2 首当其冲的权威:对俞平伯和胡适的批判

谈到对俞平伯先生和胡适的批判,应当首先肯定,这场运动的发起有它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胡适曾是旧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民主革命后期"变节"投蒋,成为"战犯"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哲学和社会科学各领域,胡适的思想或经胡适传播而来的思想还占着实际的统治地位。工农革命胜利之后,对胡适的思想及其影响进行清算,以建立能为新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合理性提供有力的理论论证与精神支持的意识形态,是不可或缺的工作。俞平伯先生在政治上选择了不同于胡适的进步道路,但学术思想深受胡适影响。毛泽东把批俞作为清理胡适思想的突破口,

① 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第563、564页。

并非全无道理。

然而，批判俞平伯先生与胡适的运动存在着严重的偏差。俞平伯先生拥护共产党，热爱新中国，"政治上是好人"[①]，而批判运动却把他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同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联系起来，恰恰否定了他"政治上是好人"的事实，这就不免于"粗暴"。胡适政治上是敌人，但他对中国的新学术、新文化的建立与发展确有重大贡献，因其政治反动而全盘否定他的学术文化贡献，因而失之于片面。

俞先生评价《红楼梦》的基本观点大致是：《红楼梦》是带有曹雪芹自传性质的文学作品，主要写曹雪芹自己的封建大家庭由盛到衰的过程；在文学渊源或传统性方面，《红楼梦》接受、综合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优良传统，尤其受到《西厢记》、《金瓶梅》、《水浒传》的影响；《红楼梦》的基本内容是"色"与"空"，基本风格是"怨而不怒"，作者对书中人物并无肯定与否定的确定态度；《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并不很高。他很坦白地说，他对《红楼梦》是从个人爱好出发，作"趣味的研究"。笔者对《红楼梦》以及俞先生的有关著作并无研究，以上概括可能极不准确、极不全面，但可以肯定的是：俞先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价古典文学作品；他也不是革命者，不可能着力于从古典文学作品中发掘可用以教育人民的资源。他对《红楼梦》的研究与考证，无论是科学还是谬误，完全是一种学术性、趣味性的研究，与阶级、政治、革命这些词儿毫不沾边。他研究《红楼梦》，至少在主观上完全没有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反对革命的动机。

然而，批判者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批判的着眼点不是艺术见解，而是《红楼梦研究》的政治影响，因而对俞先生的批判一

① 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300页。

开始就同政治联系起来，抓住的“要害”就是俞平伯否认《红楼梦》的现实意义。这场运动的先锋李希凡、蓝翎在他们的第一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研究〉及其他》中即已指出：曹雪芹“从自己的家庭遭遇和亲身生活经验中已预感到本阶级必然灭亡的命运。他将这种预感和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崩溃的活生生的现实，以完整的艺术形象体现在《红楼梦》中，把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内部腐朽透顶的生活真实地暴露出来，表现出它必然崩溃的原因。作者用这幅生动的典型的现实生活的图画埋葬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命运”。“俞平伯先生未能从现实生活的发展规律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离开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离开了鲜明的阶级观点，从抽象的艺术观点出发……实质上是企图减低《红楼梦》反封建的现实意义”[①]。这就是说，俞平伯先生贬低《红楼梦》的现实意义是有意识、有目的的。目的何在呢？周扬作了明确的回答，“胡适派买办资产阶级学者”是“怀着反对革命或引导人们逃避革命的政治目的的”，“俞平伯的考证和评价《红楼梦》，也是有引导读者逃避革命的政治目的的”[②]。

对俞先生的批判，开始就从政治角度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也就必然要归结为阶级斗争而不是学术问题。1954 年 10 月 23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经周扬审阅过的钟洛的文章《应当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不但肯定了李、蓝对俞平伯先生的指责，而且更明确地指出，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问题，“按其思想实质来说，是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严重斗争”。次日，《人民日报》发表李、蓝的文章《走什么样的路——再评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错误观点》，直接把问题提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他们说：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

① 《文艺报》，1954 年第 18 号。

② 周扬：《我们必须战斗》，《文艺报》，1954 年第 23、24 号合刊。

"有很多研究著作是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件时髦的外衣，骨子里仍然贩卖着旧货色，不触及作品的实际内容，割裂作品中的艺术形象，通过极隐蔽的方式，抹煞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向广大青年群众传播有毒的东西。这实质上是三十年前发生过的一次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再现。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过渡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反映。一切旧有的反动的思想观点绝不甘心退出这一阵地，而是顽强地反抗着的"。"'新红学'的实质就在于它是士大夫阶级意识和买办思想的混血儿，是反动的实验主义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具体表现。""俞平伯先生所继承了的胡适之的反动思想的流毒，在过渡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的环境里，是怎样挣扎着。我们不应该过低估计它对广大读者的危险性。"黄药眠、蔡仪、陆侃如、何其芳、王瑶等人的文章，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把学术批判政治化的偏向。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学术讨论政治化是必然的，因为运动的本来目的就是清除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批判运动遵循两条马克思主义原则：一条是"文学艺术是反映社会物质存在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在阶级社会里，它们不能不反映不同的阶级的观点和利益，为不同的阶级服务"①；一条是"文艺上的思想倾向的斗争总是反映阶级斗争的过程的"②。按照这两条原则，自然会得出《红楼梦》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思想倾向反映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斗争的结论。在那样一个革命激情尚未消退的革命年代，不可能有远离政治的"纯粹"的学术讨论与研究。

毛泽东并不赞成把俞平伯一类人作为敌人看待。他在那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指出，"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

① 何其芳：《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文汇报》，1954年11月25日。

② 周扬：《我们必须战斗》，《文艺报》，1954年第23、24号合刊。

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①]。然而，毛泽东本来就是从政治需要提出问题；批判运动，无论是思想批判、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本来的任务就是斗争，不是团结，这就使得"团结的态度"很难把握。

对俞先生的批判持续了两个月便草草收场[②]。此后不久，执政党就对运动中的偏差有所察觉。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在关于"双百方针"的报告中说，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基本上是做得对的，在分寸的掌握上也大体是对的。但缺点和错误还是有的。例如俞平伯先生，他政治上是好人，只是犯了在文艺工作中学术思想上的错误。对他在学术思想上的错误加以批判是必要的，当时确有一些批判俞先生的文章是写得好的。但是有一些文章则写得差一些，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分激烈了一些"[③]。这篇报告在修改准备发表时，袁水拍、何其芳对这一段提了意见[④]，有人主张删去，可见党内的认识并不统一。

对批判俞平伯先生这一运动的全面评价，是1986年1月由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先生在庆祝俞先生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大会上作出的。他说："俞平伯先生是一位有学术贡献的爱国者。他早年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白话新体诗最早的作者之一，也是有独特风格的散文家。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包括对小说、戏曲、诗词的研究，都有许多有价值的，为学术界所重

---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575页。

② 刘白羽在1956年年初召开的中国作协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说，1954年到1955年，全国报刊共发表批判俞先生的文章267篇。

③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300页。

④ 据黎之回忆，在讨论陆定一的报告时，何其芳激动地说：说我们做了俘虏（指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的提法——于风政注），我们没有做俘虏，也没有投降，各人有各人自己的学术观点。说俞平伯垄断古籍，我作为文学所所长，保证没有这样的事。见《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4期。

视的成果。”“早在二十年代初，俞平伯先生已开始对《红楼梦》进行研究，他在这个领域里的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对于他研究的方法和观点，其他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意见或批评本来是正常的事情。但是，1954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这种做法不符合党对文学艺术所应采取的双百方针。《红楼梦》有多大程度的传记性的成分，怎样估价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怎样对《红楼梦》作艺术评价，这些都是学术领域内的问题。这类问题只能由学术界自由讨论。我国宪法对这种自由是严格保护的。我们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按照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人民民主专政原则，党对这类属于人民民主范围内的学术问题不需要，也不应该做出任何裁决。1954年的那种做法既在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①

胡绳先生作为这个运动的重要当事人，以他发表这一评价时在学术界与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层中的地位，他的评价，具备历史学家与政治家的双重眼光，其正确性与权威性是无可置疑的。

评价1955年对胡适的批判，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因为胡适本来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复杂的人物之一。胡适早年留学美国，深受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和自由主义、世界主义、美式政治的影响，1917年回国前后，投身新文化运动，发起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他在哲学、文学、语言、历史、教育等各个领域全面传播和贯彻实用主义，做了许多开拓性、创造性的工作，对五四以后的中国思想、教育、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以说，在新中国建立以前的30年间，胡适的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最有影响的两大思潮。在政治思想与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方面，马克思主义逐渐取得优势，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① 《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纪念文集》，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12月版，第3、4页。

在文化、学术领域，则是胡适的实用主义占据统治地位，造成了一个同西方文化有着密切联系、相当不同于旧文化的新文化。同一般文化人多标榜“超阶级”、“超政治”不同，胡适长期以实用主义哲学为武器，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国革命。胡适的思想倾向与政治立场，不能不给他在十分广泛的领域所做的学术研究工作染上程度不同的政治色彩。

中国共产党对胡适的批判，可以追溯到陈独秀、李大钊那个时代。新中国成立前夕，共产党刚刚进入北平，就开始了对胡适的清算。1949 年 5 月，华北联合大学校长吴玉章和该校中共党史教员何干之在纪念五四的文章中批判了胡适。1950 年 9 月，香港《大公报》和内地各大报发表胡适之子胡思杜在“革大”的学习总结的一部分《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1951 年，在政治学习运动中，北京大学和上海各大学的一些教师开始比较系统地“控诉”和批判胡适。胡适的许多同事、学生如俞平伯、汤用彤、杨振声、周祖谟、顾颉刚以及朱光潜等人都做过检讨性的发言。在 1952 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出现了第一个批判胡适的高潮。这些批判都涉及了胡适的学术思想，但重点在政治而不在学术。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对胡适投蒋表示愤慨，但是，诚如郭沫若所说，“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当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势力。……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过他”[①]，因此，在适当时机发起一场清除胡适思想影响的运动，是必要的和必然的。

1955 年批判胡适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知名学者几乎都投入了战斗，有分量的论文达三四百篇之多，仅批判其文艺思想的文章就达 109 篇。李达、侯外庐、汪子嵩、孙

① 《光明日报》，1954 年 11 月 18 日。

思白等人着重批判了胡适的政治思想。艾思奇、胡绳、孙定国、王若水、金岳霖、任继愈等着重批判了胡适的哲学思想。何其芳、黄药眠、游国恩、王瑶、蔡仪、钟敬文等人着重批判了胡适的文学思想,范文澜、翦伯赞、蔡尚思、黎澍、白寿彝、周一良、嵇文甫等人着重批判了胡适的史学思想。许多深受胡适学术思想影响的著名学者,如冯友兰、罗尔纲、周汝昌、贺麟等人也发表文章,检讨自己,批判胡适。全国各大学、各研究机关纷纷召开批判会、座谈会、讨论会,批判胡适。

过渡时期尚存在激烈阶级斗争的特定背景、胡适本人的复杂情况、知识界对共产党的热爱和对胡适"投蒋"的愤恨等一系列因素,使得对胡适的批判充满了激愤的情绪。胡适政治上是人民的敌人,在思想文化上也被宣布为"买办资产阶级第一号的代言人"[①],说"胡适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对政治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所发表的意见,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证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统治是合理的,而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是不合理的,并且竭力提倡中国民族的自卑感和对欧美资产阶级文化的奴化态度"。"胡适一派的思想是反动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思想的一种典型的形式","是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用来麻醉和奴役中国人民的思想"[②]。从这种基本观点出发,自然要对胡适在学术领域所做的全部工作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今天看来,当年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既有合理与正确之处,片面性也不小。全盘否定胡适对于近代中国学术文化的贡献,是不妥当的。胡适崇拜美国的政治与学术,但要说他是"明目张胆的、始终如一的、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者",是"买办资产阶级的第一号代言人",恐怕与事实不完全相符。他的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相对

① 郭沫若:《三点建议》,《文艺报》,1954年第23、24号合刊。

② 胡绳:《为什么要批判胡适、俞平伯、胡风的思想?》,《学习》,1955年4月号。

立,但他提出的学术研究方法、一些重要的学术观点仍有可取之处。他是诸多新的学术领域或研究方法的开拓者。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今天仍被公认为正确。他对《红楼梦》等20多部小说所做的考证与研究工作,不但多有贡献,也很难说有什么阶级立场或政治倾向贯注其中。更重要的是,胡适的学术思想影响了不止一代人,造就了一大批一流的学者,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术文化时代。如果说在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新学术、新文化在性质上是资产阶级的,那么,较之五四以前的封建文化、封建学术,仍然是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应当肯定并批判地继承的。1955年的批判运动没有这样做。

对胡适的批判存在着片面性,并非完全是我们今天的认识,当年的中共中央文件已经有所批评。1955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报告》指出了一些问题。这个文件说,在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中,

> 许多论文在批判方法上还有许多缺点,有时个别论点还有错误。批判方法方面的缺点是:许多作者不善于从根本上抓住胡适思想的实质,不善于揭露胡适思想内部的自我矛盾混乱,不善于揭露胡适骗人的手法,常常摘引胡适的几句话就大做文章,用驳斥胡适每一句话的方法来进行战斗,甚至还不符原意地加以引申,连同胡适用来伪装自己的、本意正确的话也加以否定。有的文章论证不多,说理不够,结论武断。有的作者过多地注意胡适的家世与私德,而对胡适思想却分析不够。论点方面的错误是:有些作者在驳斥胡适的错误观点时,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如在反对胡适的改良主义时认为“革命是革命阶级实行的,改良是反革命阶级实行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代表群众的最高利益,而没有正确地说明群众的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的统一,似乎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不重视群众

的个人利益与目前利益。如有些作者在揭发胡适的思想的本质是买办思想的时候，却武断地说胡适提倡白话文，是反映了美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需要“统一的语言”的要求，反映了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矛盾；认为胡适的“所谓‘文学改良’的大旗是一面反革命的旗子”。此外，还有个别作者在写批判文章时，粗枝大叶，发生个别事实的错误，如把实用主义头子约翰·杜威和美国共和党头子托马斯·杜威弄成一个人，说约翰·杜威“竞选过美国总统”①。

人类必须为他的思想与行为错误付出代价。新中国为批判胡适运动中的片面性付出的代价就是学术研究的长期停滞。1955年的运动，打倒了胡适，也抛弃了五四以后培养起来的学风与学术研究方法，否定了五四以后30年中几乎全部的学术研究成果。新中国的学术研究几乎是在旷野上拓荒。在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学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影响下，学术研究逐步变成了“演绎”的技术。当对于资产阶级的“批判”达到真正彻底的程度的时候，中国已经不存在真正的学术和学术研究。如果把五四以后第一个30年的学术成果与第二个30年的学术成果相比较，想必会有人感到不那么坦然。

对于俞平伯和胡适的批判，在知识分子的心理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知识分子继在政治上、思想上完全否定自我之后，又在学术上进行彻底的自我批判与否定，内心更加惶恐，无所依附。郭沫若先生在1954年12月8日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说：

我感觉着我们许多上了年纪的人，脑子实在有问题。我

① 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第564页。

> 们的大脑皮质，就象一个世界旅行家的手提夹一样，全面都巴满了各个码头上的旅馆商标。这样的人，那真可以说是一塌糊涂，很少有接受新鲜事物的余地了。所以尽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有五年的历史，但总是学不到家[①]。

茅盾接着说："这段话，在郭主席，是自己谦虚的话；但在我们，却不能不说是真实的写照。"[②] 人们常说，知识分子是物质上的穷人、精神上的富人。在经过思想改造、文艺整风和1955年的学术批判运动之后，知识分子在精神上乃至学术上都已是"贫无立锥之地"了。

6.3 无知批判有知：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的批判

批判俞平伯的运动转向全面批判胡适思想，并从哲学扩展到史学、文学、语言学、教育学等各个领域，是执政党有计划的行动。为了使运动有更加具体的斗争目标，中共中央提出，要批判各个学术领域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把对胡适及其他资产阶级思想代表人物的思想的集中批判，与对旧学术工作者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一般批判适当地结合起来"[③]。按照这个指示，各个学术领域、各大学、各研究单位纷纷找出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代表人物"，作为斗争的靶子，痛加批判。先前已经开始的对于梁漱溟的批判迅速形成全国性的高潮。继续批判政治上的"落水狗"张东荪、张君劢，继续批判陶行知、陈鹤琴乃至晏阳初、黄

---

① 郭沫若：《三点建议》，《文艺报》，1954年第23、24号合刊。

② 《良好的开端》，《文艺报》，1954年第23、24号合刊。

③ 《中央宣传部关于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报告》，《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第563页。

炎培等人的教育思想。凡在旧中国有过某种影响的思潮的代表人物、学术权威，少有不被批判的。“旧学术工作者”纷纷控诉胡适的“毒害”，检讨学术思想，否定自己的研究成果，表示抛弃“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接受唯物主义。

在执政党强有力的推动下，对一人、一书的批判，迅速演变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党鼓励人们特别是青年人敢于对资产阶级的“名人”、“权威”提出挑战，而那些响应党的号召拿起“大批判”武器的青年，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理解只不过是用几句话即可概括的教条，对于何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更难有科学的界定和正确的认识。他们有的不是学术上、政治上的更高见解，而是对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思想的“阶级仇恨”，这就必然形成不辨是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局面。在大张旗鼓地讨伐“资产阶级思想”的热情激励下，政治批判的范围、对象和程度失去控制，就难免不出现荒唐可笑的事情。正是在许许多多今天看来“荒唐可笑”的事件的反复重现中，以几乎是子虚乌有的“阶级斗争”为灵魂的教条主义，建立起了至高无上的权威，扼杀了新中国科学文化发展的生机。

先来看在大批判运动中，人们是怎样把风马牛不相及的错误与责任强加于某一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俞先生虽然是最著名的“红学家”，但他在1923年出版的《红楼梦辨》，印数仅为500册，1952年改为《红楼梦研究》再版，印数不过3000册。出了文学界，世知有俞平伯者能有几人？可是，竟然有一位刘乾先生，在1955年6月27日的《光明日报》发表题为《揭露和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对中学语文教学所发生的恶劣影响》的文章，把中学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归罪于俞先生。他说，俞平伯研究《红楼梦》，最终得出了一个“甲是乙非，了无标准”的“不可知”的结论，说是“麻油韭菜，各人心里爱”；有些语文老师不接受别人的批评，认为语文教学，一人一个教法，这就是俞平伯“否认客观是非的资产

阶级观点"的表现。俞平伯研究《红楼梦》,不看作品的思想倾向和现实意义,却做琐碎的考据,"这种主观主义的牵强附会,表现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就是死钻牛角和滥用参考材料"。俞平伯对文学的欣赏,完全是个人主义的低级趣味,一些语文教师也从个人兴趣出发,对一些课文乃至鲁迅的作品乱加评论,信口雌黄,这正是俞平伯"唯心主义美学观点"的表现。荒唐透顶地寻找不同事物之间的所谓"联系",极不负责任地把那些明显错误的东西强加于被批判的人以彰其恶,把日常生活、工作中本来不具备政治内容的问题与"阶级"、"政治"联系起来,加以粗暴的指责与无理的批判,正是群众性大批判运动的一个基本特点。

再来看经过大批判洗礼的人们,是如何清理"资产阶级思想的遗毒"的。1955 年 8 月 11 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一篇署名"大麟"的题为《经济科学领域内资产阶级思想的遗毒还很深》的文章。这篇文章不过 4000 字,却点名批评了潘序伦、樊弘、罗仲言、尹文敬、金国宝等 9 位经济学学者及其著作。它把历史转折时期新经济学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某些概念模糊、借鉴旧的经济学理论时的认识偏差和一些完全正确的思想,统统归之于"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影响。例如,罗仲言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改造了旧的价值规律与分配规律;在社会主义阶段,价值规律仍然要以改造过的形式发挥作用。这种正确的观点,被指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表现。尹文敬所著的《国家财政学》介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他虽然加了批判性的意见,仍被指为"客观主义","不是分析批判而是介绍宣扬。"王文彬编著的《工业管理》介绍"泰罗制"时,提到泰罗估计当时工人的实际工作量只达到充分工作量的 1/3。大麟先生说:"这种不加分析的说法,无异于是对工人阶级进行诬蔑,对帝国主义奴才加以颂扬。"勾适生认为统计学是应用的数学,因此是自然科学;金国宝认为统计学是用数字表示社会或自然现象之动态或静态并分析其数字间关系的科学;王思立认为统计学是

研究如何搜集、分类、分析数字材料的科学。这些定义被说成是统计学领域"长期泛滥着资产阶级统计学的错误理论"的证据。著名的会计学家潘序伦先生认为，会计工作的意义，是使经济事业的利害关系人，明了企业的财务状况和业务情况，以维护自身的利益。这个不失为正确的定义，被指为"以资本保卫者自诩，未免把时代搞错了"。大麟先生说这个不对、那个错误，他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呢？一是一本书——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二是一条原则——凡是西方的、资产阶级的、旧中国有过的，都要不得。不符合这两条的，都在"资产阶级遗毒"之列。

由《红楼梦》批判引发的极度泛化的、无所不及的学术批判，影响最恶劣、至今仍令人痛心不已的，莫过于对梁思成先生的批判。

梁先生是旧中国最著名的建筑学家，对我国古建筑的研究尤为精湛，1948年曾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北平解放不久，他被指定负责首都的规划。作为学贯中西、博通古今建筑艺术的大师，50年代初，他对于首都的总体规划，在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中如何保持北京的古都风貌、如何保护文物与文物环境、如何保持建筑与环境的协调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超凡出群的远见卓识。他提出，在城市建设与城市改造中，必须极端珍视和绝对保护文物古迹，绝不能任意拆毁牌楼、古庙、城墙等古建筑。他认为北京城墙是举世无双的艺术品，主张坚决保护，反对拆毁。为了减轻内城的人口压力，有利于保护古都风貌，他力主科学规划北京城市发展，主张中央政府的行政中心区应放在外城。鉴于北京是有大量文物和古建筑的城市，梁先生非常重视新建筑与环境特别是文物环境之间的协调。1950年2月，他在《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中指出，建筑物在一个城市中是不能"独善其身"的，必须与环境配合调和。处在文物环境中的新建筑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无论它们单独本身如何壮美，必因与环境中的文物不调和而成为掺杂凌乱的局面，损害了文物建筑原有的整肃。1951年4月，

他又在《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一文中强调："我们爱护文物建筑，不仅应该爱护个别的一殿、一堂、一塔，而且必须爱护周围整体和邻近的环境。我们不能坐视，也不能忍受一座或一组壮丽的建筑物遭受到各种各式直接或间接的破坏，使它们委屈在不调和的周围里，受到不应有的宰割。"[①] 1965 年 4 月，世界建筑师大会制定《威尼斯宪章》，提出保护文物环境，这比梁先生晚了十几年。仅此一例即可说明，梁先生不愧是有远大历史眼光的杰出人物。

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包括城市建设迅速展开。在教条主义地学习苏联的狂潮中，建筑设计中出现了急功近利、粗制滥造、照抄苏联、忽视我国优秀的建筑文化遗产，使城市建设失去中国特色等严重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梁思成接过苏联人的口号，强调建筑要以民族的形式，表现社会主义的内容；强调建筑是一门艺术，强调要重视继承祖国的建筑文化遗产。他写了不少文章阐述与宣传这些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言论，当数 1954 年年初他在中国建筑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建筑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遗产的学习与运用问题》。在这个发言中，他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明的文化思想为依据，提出"在我们建筑设计中，以民族的形式，表达社会主义的内容，已成为一个必然的方向"。新中国的建筑"应该要肯定地是民族的，带有我们的民族特性，表现着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我们反对'全盘西化'的观点。我们的建筑可以吸收外国进步的技术，同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筑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但是决不能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艺术观和建设思想联合，不能同结构主义的反传统、反民族性的光秃秃的方匣子联合。……我们要在建筑中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一切成就。我们要清理我们古代建筑的

① 《新观察》，第 2 卷第 8 期。

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我们要认识我们的新建筑是从古代的旧建筑发展而来的这一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事实。我们要尊重我们自己建筑的历史，发展我们的新建筑。”他说：“我们还须认识人民的文化要求将随同这工业化之进展而高涨，而我们今天所设计建造的房屋是要存在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我们至少不应使今天的建设成为明天的包袱，我们不能向着错误的方向发展——没有计划、不顾艺术、各自为政地建造。我们要保证在作品中完成这不可分割的双重任务。”“在设计思想上，我们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在工程结构方面批判盲目崇拜欧美的思想，在艺术设计方面批判一切世界主义、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各流派的思想。我们要用对人民的关怀为准则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建筑艺术的思想来指导我们的行动。”① 在去掉由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政治运动把建筑艺术过分意识形态化的表层以后，梁先生的基本思想是：建筑是百年大计，必须讲究建筑艺术，不能粗制滥造；中国的建筑应有中国的特色，必须批判地继承民族遗产，不能照抄外国。

在梁先生看来，有民族特色的建筑艺术与民族建筑文化遗产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新中国建筑的艺术性，主要取决于对民族建筑文化遗产的批判性继承。梁先生认为，批判地继承的先决条件是学习；学习建筑遗产的第一步是研究中国建筑的规律。他说：“一个民族的建筑同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同样地有一套全民族共同沿用共同遵守的形式与规则。在语言文字方面，每个民族创造了自己民族的词汇和文法。在建筑方面，他们创造了一整套对于每一种材料、每一种构件加工和交接的方法或法式，从而产生了他们特有的建筑形式。这些各自不同的法式都是每个民族在他们的建筑实践中，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和运用而创造出来的，

① 《新建设》，1954年2月号

并且仍在不断地发展。"① 他系统地研究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基本结构、典型布局,总结了中国建筑的九个特征,将其称之为中国建筑的"文法";又将中国建筑中对于梁、柱、门、窗、瓦、檻、斗拱、隔扇、栏杆、正脊、垂脊、正吻、游廊、庭院等处理,称之为"词汇",认为建筑师学习与熟悉由这些"文法"与"词汇"所组成的"法式"或"做法",是创造中国式建筑的基本条件。为了提高人们对于祖国建筑文化遗产的认识与重视,他写了许多介绍我国古建筑的文章,这些文章既有对中国古建筑的科学分析,也充满着他推崇古代劳动人民智慧与祖国源远流长辉煌灿烂的建筑文化的深厚感情。贯穿于其中的不变的基本思想,仍然是强调建筑艺术与民族形式。他的观点,在建筑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并影响到一些重要建筑物(如北京饭店、国际饭店、西郊宾馆、新侨饭店)的设计。当时执政党确定的建筑原则是"经济,适用,在可能条件下的美观",遍地出现的是水泥、砖块结构的灰色"赫鲁晓夫式""火柴盒"。梁思成的观点,既不符合照抄苏式低劣建筑的时尚潮流,也不甚符合党的建筑方针,政治运动一来,自然在劫难逃。

1955年年初,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浪潮刚刚扩展到各个学术领域,梁思成立刻作为建筑学界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受到猛烈的批判。这年年初,建筑工程部召开的全国设计会议,批判了建筑设计中的所谓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偏向,并将建筑中出现的"过多、过好、过早"的所谓浪费现象归罪于梁思成的影响。1955年3月28日,《人民日报》刊文批评中央设计院在建筑设计中的"严重浪费现象"和《建筑学报》宣扬梁思成的建筑设计思想。5月8日,该院负责人汪季琦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公开检讨自己受梁思成的影响,违背党的建筑设计方针的错误。《文艺

① 梁思成:《建筑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遗产的学习与运用问题》,《新建设》,1954年2月号。

报》、《新建设》、《建筑学报》等纷纷发表文章，形成了批判梁思成的高潮。这些批判文章，讨论的是建筑问题，却完全没有学术的味道，纯粹是政治性的批判。

这种批判的第一个特点是夸大建筑艺术的意识形态特征，将梁先生的建筑思想加以歪曲，归结为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梁先生强调建筑的艺术性，是有感而发，并不否定建筑要经济、适用。他讲古建筑的“法式”或“文法”，也并不是要人们照抄照搬。然而，批判者断章取义，妄加罪名。有位批判者说：梁先生是按自己的逻辑，“把反映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特征的宫殿、庙宇等建筑的艺术形象，全面地肯定了下来，并企图把它规定为我们这样一个新时代的新建筑所必须遵守的格律”，只讲形式、不讲内容，“完全否定了建筑艺术的阶级性”；梁先生讲中国古建筑的“文法”，就是要“不分先进、落后、是好、是坏，‘蛮不讲理’地要求我们一律都搬到现代建筑上来”，这正是一种“毫无批判、分析、盲目复古思想的典型”；梁先生的建筑思想，“在本质上乃是一种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认识和解释建筑及建筑艺术问题的结果”；梁先生对建筑的认识犯了片面性的毛病，“最后不能不陷入到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泥潭中而不能自拔”；“梁先生对建筑艺术的内容与形式问题的理解同样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①]。梁先生所在的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位先生，不但认为梁先生的建筑思想反映了“没有发展观点的历史唯心主义”，“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党和政府的政策”，还认为“形式主义的鼓吹者和复古主义的斗士们是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在暗中毒害着人民群众”[②]。这样，建筑学家梁思成在思想上便成了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的敌

① 杨正彦：《反对建筑学中的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新建设》，1955 年 5 月号。

② 周卜颐：《必须揭发和批判建筑中的错误倾向》，《光明日报》，1955 年 4 月 25 日。

人。

这种批判的第二个特点是强词夺理，直接把梁先生的思想感情乃至阶级立场等同于反动阶级。最典型的文章莫过于顾明发表于《文艺报》1955年第21号的文章《梁思成在民族形式问题上的错误》。针对梁先生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特征”的总结、对“法式”的推崇，顾明批判说：“梁先生说这些‘特征’的时候，他心目中的标本全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宫殿、署衙、庙宇，和地主士大夫的住宅之类的东西；他是目无‘小民’的。我们都知道，这些衙署、宫殿以及它们的种种装潢，主要是统治者为了吓唬人民，用以‘重威’，这些东西搞得愈多愈大，人民就愈苦。‘殷纣王大兴土木，於都邑鹿台，为琼室玉门，其大三里，高千尺，七年而成，厚赋敛以实其中，民力以疲，民生以苦。’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在咸阳征调了七十多万徭役修筑阿房宫，所谓‘复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其高台上可坐万人，所谓‘台高出云霄’。难道梁思成想的不正是这些东西么？难道他所说的‘回廊、抱厦、厢、耳、过厅等等，围绕着一个或若干个庭院或天井建造而成的’最理想的平面布置，不正是典型的地主贵族才能享有的房子么？每个住宅要占用如许土地，而且建筑面积大而居住面积小，这会是我们今天劳动人民住的地方么？”

顾明认为，梁思成的建筑艺术思想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和创见。“只要你逛过颐和园，上过排云殿，那么你就真相大白了，那儿应有尽有。……原来梁思成所欣赏的，也就是慈禧太后当年欣赏并且强迫人民为她营造了的东西，这种思想感情的共鸣，当然绝非偶然。”“梁思成口口声声是‘对人的关怀’，但他的‘理论’和他的所作所为，都彻底地证明了他根本缺乏‘对人的关怀’，如果有，那只是对反动阶级的关怀。正因为这样，正因为他的立场是反动阶级的立场，他才把建筑艺术看成是没有阶级性的，才产生了他这一整套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复古主义的论调，才要我国现代新建的一切建筑物都纹丝不动地向古代反动阶级的宫殿、庙宇、衙署和住宅

看齐。"

陈干、高汉则说，梁先生从斯大林、毛泽东和苏联专家的著作中寻找论据，以巧妙的方法和堂皇的形式，宣传自己的观点，形成了片面强调"民族形式"的"逆风"。"他已经把'适用、经济和可能条件下的美观'的党的原则，按照他自己的意志改造成为'美观和可能条件下的适用和经济'。这是梁思成先生隐藏在写着'民族形式'和'法式'这几个大字的布幕后面的实质。"①

按照顾明的说法，梁先生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孝子贤孙，处心积虑要为早已灭亡的封建统治者服务，他的思想感情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他的阶级立场是站在反动阶级一边的。按照陈干、高汉二位的观点，梁思成是有意篡改和反对党的原则。如此说来，梁思成不但在思想上与马克思主义对立，在政治上也成了人民的敌人。

1956年2月，大病初愈的梁思成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作检讨，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承认自己20多年来写的古建筑调查报告、整理的古籍和有关中国建筑历史、都市规划、创作理论的文章和专著，其"一贯特征就是主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自己的创作理论是"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他说，自己在政治上衷心拥护共产党，但是，

> 在都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上，我却一贯地与党对抗，积极传播我的错误理论，并把它贯彻到北京市的都市规划、建筑审查和教学中去，由首都影响到全国，使得建筑界中刮起了一阵乌烟瘴气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歪风，浪费了大量工人农民以血汗积累起来的建设资金，阻碍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还毒害了数以万计的青年——新中国的建筑师队伍的后备

① 《论"法式"的本质和梁思成对"法式"的错误认识》，《新建设》，1955年12月号。

军。

> 我的思想感情中存有浓厚的封建统治阶级的“雅趣”和“思古幽情”，想把人民的首都建设成一件崭新的“古董”，想强迫广大工人农民接受这种“趣味”，让他们住在一个“保持着北京原有的‘城市风格’”的城市里。……我以为自己是正确的，党是不懂建筑的，因而脱离了党，脱离了群众，走上了错误的道路①。

梁思成先生的检讨极为诚恳，他似乎从内心里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并感谢党对他的教育与挽救，从此，他在政治上、技术上更加拥护党的领导。1957年，他曾写文章讨伐“资产阶级右派”。1959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写下了那篇名噪一时的再次检讨、忏悔并以宗教式的语言表达对党忠心不二的文章《决不虚度我的第二个青春》。然而，一位爱国家、爱民族至深至诚的知识分子，对新中国建筑事业和民族文化遗产的关怀已经融入了他的血液。在“大跃进”的狂潮中，当被他誉为“举世无双的大胆的建筑纪念物，磊拓巍峨、意味深长的艺术创造”的北京城墙被拆毁的时候，他曾失声痛哭。1969年1月，毛泽东批发报告，宣布梁思成、刘仙洲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用处不大”，“要养起来，留做反面教员”。此后不久，已失去行动能力的梁思成听说拆西直门时发现城墙里包着一个元代的小城门，还央求夫人去拍张照片给他看看。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评价新中国成立初期梁先生的建筑、规划思想，不是本书的任务，而且似乎无需再作评价，因为历史已经作出了公正的结论。北京和其他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特色已损失殆尽；昨天建成的遍布全国的“光秃秃的方匣子”式灰色建筑，已经成为今天的包袱。这

① 《人民日报》，1956年2月4日。

是蔑视科学、蔑视科学家,以政治取代科学,用政治权力干预科学应得的惩罚。对于政治家来说,科学家的理论、思想、观点和建议,合则用,不合则不用。政治家既无必要、也无资格裁判其正确与错误,更没有权力发动针对某一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人物的政治批判运动。把学术问题政治化,甚至把自然科学与技术问题政治化,以国家权力为后盾,强制知识分子接受某一种超时空的"绝对真理",并为此而肆意进行无限制的政治批判,只能扼杀思想和创造,最后是事与愿违,自食其果。

从对俞平伯、胡适以及各个领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中,我们还可以发现新中国政治化了的学术界的一个奇怪现象:哲学、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发动的每一场大大小小的政治批判运动,不但总是政治对学术与科学的批判,而且总是无知识的人对有知识的人、知识不多的人对知识较多的人、没有专业造诣的人对专业造诣很深的人的批判,同时又往往表现为青年人对中老年人、学生对先生、"土包子"对"洋包子"、甚至是工人农民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前者无往而不胜,后者无役而不败。有一个幽灵始终潜藏和徘徊于执政党的思想理论、政治传统、政治行为乃至全民族、全社会的心理之中,这个幽灵的名字就是:反科学、反知识、反思想自由与科学自由。

6.4 知识分子的克星:激进派青年群体的崛起

在1954年10月发起的学术批判运动中,最令人注目的现象,莫过于以李希凡、蓝翎为代表的一批"小人物"的登场。在这场运动中,他们成为同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的名人"作战的先锋力量。连续不断的政治批判运动,逐步造就了一个以"革命"和批判为己任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的20多年间,他们以"新生力量"自居,在意识形态领域乃至政治舞台上横冲

直撞，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左”的错误所支配与运用的一股强大的破坏力量。

新中国激进派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与新文化运动中的某些思想倾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某些特点、新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等诸多历史因素有关，更是毛泽东有意识培养的结果。

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内容是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的进攻；从其代表人物的年龄段来说，确是青年人对老年人的斗争。在陈独秀、李大钊以及其同时代人的文章中，青年与革命、革新、进步、进取、积极、朝气、活力是同义词，老年则同僵化、保守、落后、反动、倒退、没落、消极、暮气联系在一起。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先进的知识分子阶层在反封建的思想斗争中，几乎形成了一种“青年崇拜”精神。“青年崇拜”的形成，与中国社会发展转折关头的新旧思想斗争，有着内在的联系。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在其间 28 年的奋斗中，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核心革命队伍迅速壮大，党员从 50 多人发展到 300 多万，军队达到 500 万。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革命军人，大多是 20 岁上下的青年，40 岁以上的已经不多，50 岁以上的更是凤毛麟角。红军长征时，徐特立、董必武等人刚过 50 岁，已被尊称为“老”。国统区反对蒋介石政权的先锋力量，始终是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青年学生。可见，中国的革命，是青年人的革命；中国革命，是靠了青年人的流血牺牲才取得了胜利。共产党是最激进、最革命的政党，青年人的本性倾向于激烈地变革社会。这种共通使青年成为共产党最重要的群众基础、组织成分与依靠力量。对此，毛泽东有清楚的认识。在他的著作和讲演中，除了赞扬农民，就是赞扬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正是在革命过程中，崇拜青年，鄙视老年，以及其中隐含的“否定既往，迷信未来”，逐渐成为一种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认识模式，甚至成为一种

思想传统或思维定势。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但他没有正确地认识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深刻涵义，继续在各个领域推行连续不断的激烈变革，使中国共产党仍然保持着革命党的面貌。他认为，意识形态领域是受资产阶级影响最深刻、最广泛的领域，因而也是资产阶级最顽固的堡垒。在这个领域，不但老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顽强抵抗无产阶级的思想改造与思想领导，而且一些老的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免为资产阶级思想所腐蚀、所征服。要打破意识形态领域内资产阶级思想的一统天下，就要找出一种永远保持革命精神的力量，这就是青年。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青年学生被发动起来帮助教师"洗澡"过关。1954年，毛泽东把李希凡等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给予无保留的支持，对"压制"他们而对"资产阶级的名人"投降的冯雪峰给予严厉的批评。1958年，他大讲青年人如何胜过老年人。1964年，在"反修防修"的高潮中，他提出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1966年，发起"红卫兵运动"，借助青年学生的力量，摧毁了整个党的组织和除军队以外的全部国家机器。新中国建立后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和对青年人的无原则吹捧，客观上形成了使青年不断"革命化"、"激进化"的社会环境。这个历史过程表明，新中国的激进派知识分子群体，是毛泽东继承自新文化运动以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某些思想传统，为了顺畅地贯彻党的意志，保持党、国家、社会的纯洁与活力，在"左"意识形态背景与政治化的社会环境中有意培育和扶植起来的。1954年对李希凡、蓝翎的支持，是他培育和扶植这股特殊力量的重要起点。

与民主革命时期的青年相比，新中国的激进派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在否定传统、要求激烈变革社会现状方面，与他们的先人非常相似。但是，民主革命时期的青年大多比较了解西方，很多顶尖人物到过西方，是中西文化冲突中造就的一代。他们不相信、不承认

有至高无上的思想权威，不迷信任何人、任何思想、任何事物，或者说，他们要打倒、要破坏的正是代表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最高权威。他们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锻炼成长，的确是先进的革命力量。新中国的激进派青年知识分子，对西方毫无了解，历史知识、学术修养、社会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十分浅薄。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教条化，把毛泽东"圣人化"，实际上为现代迷信所俘虏、所支配。他们把复杂的社会理想化，把曲折的社会发展进程简单化，激烈地否定西方，否定传统，否定过去，否定老年人。他们没有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中的优秀成分的熏陶，缺乏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伦理道德观念，缺乏对人、人性、人格、人的权利的理解与尊重。现代迷信使他们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他们已不成其为本来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主要使命、主要工作、主要功绩，就是对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先是党外的知识分子，后来是党内的知识分子）实行无所不在的思想监督与"棍子式"的政治批判。他们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克星。

激进派知识分子对于新中国的社会政治发展与科学文化进步没有发挥任何积极的作用，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们都是坏人。除了姚文元后来成为野心家、阴谋家、迫害狂以外，一般说来，激进派青年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忠于领袖、忠于党、富有革命理想、愿为共产主义牺牲自我的青年。1954年首先向俞平伯先生发难的李希凡、蓝翎，正是这样的充满革命激情、革命责任感且不乏才华的青年。

6.5 运动"改造"人：吴小如先生的"觉悟"过程

如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后的许多政治运动，名为无产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其实是青年人对老年人的斗争、学生对先

生的斗争、无知识或知识少的人对有知识或知识多的人的斗争，贯穿于其间的，始终是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思潮。一批青年学生、教师和学术工作者，在极端政治化的环境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被改造为以阶级斗争、政治批判为己任的激进分子。俞平伯先生的弟子、著名古典文学家吴小如先生在《文艺报》1954年第21号发表的《我对于评论〈红楼梦〉问题的认识与感想》一文中，曾详细叙述了他从崇拜俞先生、为俞先生辩护，到认识俞先生的"错误"，鼓起勇气，"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对自己的老师进行批判的"觉悟"过程。这是青年知识分子如何在政治运动中被改造为"新生力量"的生动个例。

吴先生首先声明，他自看到李、蓝的第一篇文章到决定写出这篇东西，"在思想上经过了相当曲折的斗争"。他说，他很早即读过俞先生的很多作品，1945年起从俞先生受业，受俞氏影响甚深。以年龄论，自己依然是青年人。"这次讨论《红楼梦》事件的发生与展开，我深切地为我是一个青年人而感到兴奋；我觉得我是幸福的……因为党又一次明确地表示了对青年一代的大力培植。"为什么仅仅因为自己是青年人就感到"兴奋"与"幸福"？这是因为党对青年给予了特别的评价和信任，赋予了青年特别的责任与使命。在青年与老年之间，党更多地寄希望于青年，这就成为党与青年之间建立感情联系的基础。

吴先生接着说，他向来视俞先生为"红学"权威，对于俞先生关于"红学"的见解，"始终自卑地认为自己没有发言权"。所以读到李、蓝的第一篇文章，立即想到两点：

> 第一，这两位同志似乎对于《红楼梦》还没有发言权；第二，俞先生究竟是老年人了，他的思想感情以及用来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语言文字——不易为青年人所了解，他那种表达方式也不易为青年人所接受。因此，我就进一步地对李、

> 蓝两位同志的作品专挑小毛病……和熟人交谈时，便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替俞先生辩护的口吻来。但是，我无论如何没有勇气否定李、蓝两位同志的看法，而且根据我现有的微薄的理论水平，我没有理由不承认他们的立论根据是正确的，也就是说，我心目中的"权威"已经有点摇摇欲坠了。这时，我像是挨了谁一巴掌，思想斗争已经开始了。.

这是吴先生思想转变的第一阶段。吴先生的思想深处之所以起了微微的波澜，显然不是由于李、蓝的文章在学术上打破了他对业师的崇拜，而是因为他已经接受了若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李、蓝的文章恰以马克思主义立论，使他无法否定其正确。

吴先生思想转变的第二阶段，是他读了李、蓝的第二篇文章即《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栏发表的《评〈红楼梦研究〉》后发生的思想斗争。他说：

> 这篇文章尖锐地指出了俞平伯先生的不科学的治学方法，从趣味出发的治学角度，可怜无补费精神的钻牛角尖的为考据而考据，特别严重的是，他那种与胡适沆瀣一气的唯心的自然主义文学观。这使我怵目惊心，想到了"三反"时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一系列的事实。我觉得我的思想墙根被一阵无情的洪涛冲塌，同时我又感到有一股追求真理、认识真理的力量在推动着我，要我勇敢地正视客观现实，放胆地碰一碰自己思想上的疮疤。我逐渐摸清了自己所以对李、蓝同志第一篇文章专挑小毛病，并为俞先生辩护的动机。原因很简单：我的一套学术论点和治学方法是和俞先生的有着共同之处的，那篇文章打垮了俞先生的论点与方法，我的那一套也就站不住脚；要想使自己的思想站得住脚，就必须提出反抗的理由；可怜我是没有任何理由去反抗的，于是便企图用枝节的问题来冲淡、

> 混淆李、蓝两同志的论据。我之轻视他们,正是暴露了自己的弱点;我之替老师与“权威”辩护,正是替自己辩护。当然,这种辩护同时也说明了我没有站在人民的立场而是站在个人立场,只从私人感情出发。而那种从小处找岔儿以企图掩盖自己思想上的致命伤的办法,则更是非工人阶级思想的具体表现。面对李、蓝同志的第二篇文章,我把问题看得更清楚:我纵然和俞先生有感情,可是跟胡适是敌对的。我发现我和俞先生在观点、方法上的共同之点,却正是俞先生和胡适在思想上起共鸣之处。我是受党和人民培养爱护的青年人,即使我还没有树立起百分之百的工人阶级思想,也不能糊涂到跟胡适站到一边去。我否定了过去那些荒谬的想法,总算初步找到了病根。

这第二个阶段的特点,是从思想上的内外冲突,转为完全的内心自省,在肯定李、蓝的批评为正确,胡适是政治上思想上不共戴天的敌人这两个大前提之下,把俞先生与胡适相联系,终于把对待俞先生的态度作为检验自己在政治上是否与反动分子胡适划清界限、是否敢于站在人民立场上的标准。政治思想、政治倾向、政治立场与学术问题完全混淆在一起,并成为支配性的力量。

吴先生说,他在第二个阶段上的认识还不是十分透彻,“还不能认真地检查自己,更没有勇气对俞先生正面提出批评”。这种勇气,来自他的思想转变过程的第三阶段,即读了《人民日报》发表的钟洛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以后引起的“又一次思想斗争”。他说,钟洛的文章提到李、蓝的两篇文章“是三十多年来向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胡适之派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反击的第一枪,可贵的第一枪!”

> 我这才懂得,以前我在思想上的那种斗争,正是无产阶级

与资产阶级两种思想的阶级斗争。我必须设法肃清那种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学术论点与治学方法。这好象自己身上的一片烂肉,平时包扎得很严紧,一旦打开,被新鲜的风吹过,必然感到无比的刺痛。要想医好这片烂肉,必须把它剜掉切掉,才能消弭患处,不使它蔓延开来。我决心对自己的学术论点特别是治学方法尝试着做一次鉴定,更决心对俞先生的观点、方法提出批评。然而,这是有些痛苦的,特别是对影响自己为时已久的"权威"思想提出批评就更不简单。我在思想斗争过程中,曾想到若干借口。对自己,我就说,我不是专搞《红楼梦》的,我以前所写的文章也许还没有犯过太多的原则性错误。对俞先生,我就说,不要太尖锐了,应该照顾团结;要是当真尖锐地提出批评,是不是对自己以后深造有妨碍,将来怎么再去向他请教呢?可是,这些想法终于被我一个个都否定了。我从钟洛同志的文章中得到了力量。我认识到,资产阶级思想是不能和无产阶级思想和平共处的,我一定要在这场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中受到胜利的考验。

对俞先生,我想到了西哲的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我又想到了郑康成向何休学《公羊传》,结果却要"发墨守……起废疾",不惜被"同室操戈"之讥。如果畏首畏尾,那还谈什么阶级斗争!我今天是站在人民立场对我的老师说话的,广大的人民群众先就支持我。我的思想斗争愉快地结束了,社会主义思想成分在我的头脑中占了上风。

吴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叙述的思想转变过程非常完整,亦十分可信。他从崇拜"权威",笃信老师,珍视师生感情,到终于下决心向老师"宣战",其间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呢?是一步步地把问题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学术问题即是思想问题、政治问题,思想问题、政治问题即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不容含糊。当问题上升到

如此高度之后，除了“大义灭亲”之外，已经没有了其他的选择。对党的信任与培植的感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中西传统文化中鼓励人们为真理而牺牲的名言与典范、对人民利益的忠诚、对胡适一类人民敌人的仇根，都成为打破亲情、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学术领域“阶级斗争”的支持资源。当自己的思想、观念、感情与外界发生矛盾时，知识分子的思维模式，是否定自我，认同权威的政治声音，逐渐失去知识分子特有和应有的独立思考精神与能力。吴小如先生的思想转变三部曲，既是知识分子被改造过程的生动描写，也是激进派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孕育和形成过程的生动描写。

6.6　“两头小、中间大”：批胡适运动中的“旧学者”

青年人在政治运动中得到“锻炼”、“提高”，成为“革命”的知识分子，“旧学者”即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就不那么简单。除了李达、翦伯赞、黄药眠、蔡仪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以外，他们中的许多人的学术思想深受胡适影响。他们承认胡适在政治上是人民的敌人，但大多崇拜或肯定他的学术文化成就。在一场毫无思想准备的轰轰烈烈的运动中，让他们既要批判胡适思想，又要作否定性的自我批判，甚至充当大批判的靶子，思想深处的矛盾与苦恼可想而知。许多人，包括冯友兰、罗尔纲、周汝昌、贺麟、杨人楩、顾颉刚、汤用彤、金岳霖等文化名人，都写了批判与检讨合二而一的文章，或作了这样的发言，有些批判似乎很深刻，检讨似乎很诚恳，然而，这些公开发表的批判与检讨文章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他们的真实思想，实在令人怀疑。今天也极少看到人们对于当时亲身感受的回忆。我们不妨引用几则当年的材料，看看“旧学者”们在这场运动中的表现。

一则材料是 1955 年 5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报告》。这份《报告》承认“旧学者”们在

运动中普遍存在消极情绪。《报告》说：

> 这次思想斗争，大部分旧学者都参加了进来，受到了一定的教育，少数并开始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胡适思想进行了认真的批判，而且联系到自己的唯心主义思想，作了自我批评。但是，还有很多旧学者仍然带着消极、被动的情绪，他们虽然表示了态度，批评了胡适，但批评不少是浮浅枝节，轻描淡写，口气缓和，并且不愿联系自己的唯心主义思想。有的甚至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文章上表示反对唯心主义，而在谈话时表示坚持自己唯心主义的观点。还有不少则仍在一旁观望，不表示态度。许多旧学者害怕批评到自己头上，影响自己的名誉、地位、薪金，等等。一般旧学者，对这一批判运动普遍不满的有两点：一是迷惑于胡适的"历史功绩"和"学术权威"，认为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五四启蒙运动的重要人物"，认为胡适"治学是严谨的"、"值得学习"，主张"还胡适以真面目"、"去伪留真，不要一笔抹煞"，才算"公平"（对杜威也是如此，认为杜威是"美国的哲学权威，他的话几乎没人敢驳"，认为实用主义是"美国科学与工业的产物"，"就是斯大林所称赞的美国人的求实精神"，认为杜威帮助中国改革学制，功劳很大），对批评者完全否定胡适、杜威，表示不满。一是认为批评者对胡适、杜威的著作没有好好研究。"引来引去只是那几句话"，"外行看来还可以，内行看来是无的放矢"，认为批评文章的质量不高，说服不了人。但是，这些不满，一般都是背后在少数人面前表示的。个别的人，如中山大学教授容庚，则在去年十二月的讨论会上公开发言为胡适的"学术成绩"辩护，并要求中大校刊发表他的发言稿（该刊发表了他的发言稿，并发表了批评文章）。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则更恶毒地诬蔑这次批判运动，骂别人做了"共产党的应声虫"，是"一犬吠

影，百犬吠声"[1]。

另一则材料是1955年5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北大副校长、党委书记江隆基的文章《北京大学开展学术思想批判的经验》。这篇文章把知识分子在运动中的思想变化分为三个阶段。他说，从1954年10月李、蓝文章发表到12月1日文科教师座谈会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一般教师对学术思想批判的意义、目的、要求和做法都认识得不够明确。许多人误认为这是一种政治运动，因而以对待政治运动的态度来对待它。有些人担心会不会再来一次'三反'运动；有些人从人事关系出发，生怕牵涉到自己，因而在座谈会上纷纷表示自己和胡适无甚关系，说'胡适浅薄得很，我过去就瞧不起他'，'我一贯是反对胡适的'；有些人生怕学术思想批判伤害了科学研究的积极性；也还有极少数的人对学术思想批判抱反感。一部分党员、团员和进步教师也因对学术思想批判认识不足而发生左右摇摆的情绪。有些人怕进行学术思想批判会影响团结；有些人则把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批判地接受文化遗产对立起来，把培植新生力量和团结全体教师对立起来，怀疑领导方面过去是否右倾"。第二阶段，是12月1日文科教师座谈会到1955年3月2日校务委员会扩大会议。这一阶段参加斗争的人数逐渐增多，积极性逐渐提高。中科院和全国作协共同组织"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工作委员会，制定计划，定期分组开研讨会。吸收文、史、哲三系和文学研究所的教师、研究人员参加，主要是配合中科院和作协活动，被请参加讨论会和文化写作的人应付不暇，其他的人无用武之地。"老教师们觉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不够，新教师则感到业务知识不足，对资产阶级反动学说不熟悉。随着学术思想批判的深入，大家都觉得'战斗有心，武器无力'。""有些人

① 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第563页。

斤斤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在思想斗争中既怕揭发自己过去的错误，又怕暴露今天的弱点，大论文写不出，小论文又不肯写。因而在思想路线上踌躇不前，或者呐喊两声，表一表态度，就销声匿迹地退出了战场。”“看不清学术思想批判、科学研究和教学改革三者之间的联系，不把它们当做统一体，而把它们对立起来，强调‘教学任务重，工作忙，顾不上’，‘批判胡适、胡风、俞平伯和我所教的课程联系不上’，‘批判胡适和我的科学研究计划不相符合’，因而不愿参加，或者抱着所谓业务观点和应付差事的态度。”第三个阶段是校务委员会以后。江隆基特别提到，“因为学术思想批判很容易牵涉到某些教师自己的问题和暴露自己的弱点，加以解放初期有些批评（例如文艺批评和历史界的批评）曾发生过简单化和乱扣帽子的现象，因此，某些教师对学术思想的批判有很多顾虑”。

如果我们熟悉党内文件的起草、修改、呈报、批发等各个环节的特点，特别是牢记一般党内文件讲成绩时“最大最大”、讲问题时“最小最小”的套路，细细琢磨以上几则材料，可以得到许多信息。中宣部的报告说得很明白，在这场运动中，知识分子的状况是“开始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胡适思想进行了认真的批判，而且联系到自己的唯心主义思想，作了自我批评”的，是“少数”；“很多旧学者”的态度是“消极、被动”；“有的甚至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不少则仍在一旁观望，不表示态度”。“一般旧学者，对这一批判运动普遍不满”，“但是，这些不满，一般都是背后在少数人面前表示的”；公开为胡适辩护，“恶毒地诬蔑”运动的，是个别人。这种状况，用一句套话来说，就是“两头小，中间大”，而积极分子一头中，还有一些人是迫于压力，不得不说假话。江隆基的文章，以介绍“经验”为目的，不便把问题说得过于严重，却为中宣部对“旧学者”状况的总体估计提供了佐证。这样的材料，可以从当时的报章杂志上找到很多。

遗憾的是，许多年来，不少党史、国史研究者，或者是没有认真

研究这些材料，或者是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人云亦云，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正是通过批判胡适运动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事实是，对于这场以灌输马克思主义为目的的运动，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态度是消极的，在思想感情上是抵触的。确有许多知识分子或早或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绝不是这一类政治运动的功绩。

6.7 借题发挥：文艺界对"左"的倾向的批判

谈到知识分子在批判俞平伯和胡适运动中的表现，不能忘记了文艺界。文艺界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何其芳等人，积极参加了这些批判运动。然而，广大文艺工作者，特别是作家们，却利用毛泽东批评《文艺报》的时机，趁机发动了对文艺工作中"左"的倾向的猛烈攻击。他们声讨粗暴的文艺批评，反对教条主义的文艺理论，呼唤创作自由，要求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放松对于作家的束缚，使得1954年10月至12月间的文艺界呈现出与全国迥然不同的形势。

毛泽东在发动批判《红楼梦研究》运动的时候，同时向两个相互联系的方向出击：党外批判俞平伯，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党内批评《文艺报》与冯雪峰。毛泽东对《文艺报》和冯雪峰的批评，有着非常集中、非常明确的指向，这就是批评《文艺报》和冯雪峰容忍和保护资产阶级思想，以"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的态度"打击"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他在致刘少奇等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批评《文艺报》"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挡'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对资产阶级作家"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投降①。这封信当时没有发表。公开地、完整地转达毛泽东上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575页。

述观点的，是江青授意、袁水拍执笔、经毛泽东阅改并指令发表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这篇文章批评《文艺报》“对于‘权威学者’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示委曲求全，对于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摆出老爷态度”[1]。毛泽东阅改这篇文章时，在原文批评《文艺报》粗暴否定李凖的小说《不能走那一条路》的文字后面加写了“《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2] 显然，在毛泽东看来，《文艺报》的两大错误，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既然容忍和保护资产阶级思想，就必然打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也就是说，《文艺报》犯的是右的错误。毛泽东对《文艺报》的批评，丝毫没有触及文艺工作中“左”的倾向的意思。

事情的发展有些阴差阳错。文艺界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意向批判冯雪峰的右，却集中火力批判以《文艺报》为代表、以粗暴批评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文艺工作的“左”。1954 年 10 月 31 日至 12 月 8 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举行扩大的联席会议，先后开了 8 次大会（这几次会议是在北京青年剧院楼上的青年宫召开的，故称“青年宫会议”）。郑振铎、老舍、何其芳、翦伯赞、游国恩、陈企霞、钟敬文、黄药眠、丁玲、刘白羽、康濯、胡风等 30 多人先后发言。《文艺报》摘发了一些重要的发言记录，并陆续编发了一批批判《文艺报》的文章和读者来信。一时间，文艺界形成了批“左”的高潮。

文艺界知识分子批评的直接对象是《文艺报》，提出的问题多发生在《文艺报》由丁玲、陈企霞、萧殷主编时期和冯雪峰接编的初期。按照党的文艺工作理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主要通过文艺批评来实现，《文艺报》正是以进行文艺批评，“指导全国文艺思想”

① 《人民日报》，1954 年 10 月 28 日。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4 册，第 589 页。

为职责的最高刊物。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报刊上的粗暴批评泛滥成灾,而开这种"战斗性和尖锐批评"风气之先的,是《文艺报》主编之一陈企霞对王林的小说《腹地》的批评。在陈企霞等人的主持、影响下,《文艺报》乱舞"棍子",专横地批评了很多作家,否定了许多作品。对《红旗歌》的批评,对碧野的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的批评,对萧也牧作品的批评,对路翎的剧本《祖国在前进》和《洼地里的"战役"》的批评,对沙鸥的讽刺诗《驴大夫》的批评等,都十分简单、粗暴,为人们深恶痛绝。冯雪峰接手主编《文艺报》时,正值"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文艺整风运动的高潮。由于政治空气和惯性作用,更由于文艺界领导人和《文艺报》并未深刻认识过去的偏差和错误,因此,1952 年秋季特别是第二次文代会后,粗暴批评少了,但并未绝迹,1954 年年初还发生过不恰当地批评李準小说的问题。这样,群众中长期积累起来的对"左"的倾向的不满,借毛泽东批评《文艺报》之机倾泻而出。当时对《文艺报》的批评,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集中指向粗暴、专断的文艺批评。著名作家刘白羽在"青年宫会议"上愤怒地说:"人们对《文艺报》批评别人时所采取的粗暴、谩骂、盛气凌人的态度早就不可容忍了。请翻开《文艺报》看一看,这种粗暴、谩骂的句子如像:'他还是一个最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那么,简直能够把他评为敌对阶级了','不知羞耻'等真是数不胜数的。"他称《文艺报》是"'凶凶狠狠'的《文艺报》"、《文艺报》的批评是"粗暴地骂倒一切、横扫一切"。康濯说,《文艺报》用一千多字的文章批评《十月文艺丛书》。这套书共十本,一百多万字。"《文艺报》却很少说出什么道理,就给全部否定了。这种情形,有人比之为旧社会的法院的判决,我看这种比喻怕也并不算过分的。"西南地区文艺工作者王余认为:"《文艺报》的不少批评文章在态度上是粗暴、武断、谩骂、老爷式,或者是审判官式的。"李準说,《文艺报》对于青年作者,"不是具体地分析和帮助摆脱缺点,发

扬保护他们的创作热情，代替这种态度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点头认可的‘法院审判式’的批评”。作家刘大海说：“很多读者都认为《文艺报》缺乏自我批评精神，好像它永远是正确的，所以有人就把《文艺报》叫做‘一生正确’，要是周围同志中谁没有自我批评精神，别人就把他叫做《文艺报》。”[①] 许多老作家、新作家、艺人、《文艺报》读者，就是这样众口一词地、极为愤慨地斥责《文艺报》的专横批评。

第二，指出《文艺报》的粗暴批评所依据、所宣扬、所提倡的，乃是公式化、概念化和教条主义的文艺理论。康濯指出，《文艺报》除了那些粗暴批评之外，“还有些批评，不一定带有粗暴性，但是在理论上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东西”。王余认为，《文艺报》“宣传了无冲突论和公式化、概念化的错误的文艺理论”。李準认为，《文艺报》的评论，“大多是公式化和概念化的批评”，“没有做到发展创作和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方针的任务”。作家曾炜举了很多例子，说明《文艺报》宣扬的错误文艺理论和不正确的文艺批评对文艺界的影响。他说，《文艺报》宣扬的无冲突论，“使一些作家不敢大胆地揭露生活中的尖锐矛盾，就是揭露出来了，也被认为‘表现了混乱——不真实’”。“《文艺报》在批评作品中，往往单纯从主题思想出发来肯定作品，而忽略了文学的根本问题在于是否能创造出难忘的人物。”[②] 中央文学讲习所学员陈亦洁指出，《文艺报》不但宣扬过“无冲突论”，它还有一种“难道是这样的吗”的论调。批评家们为了“忠实他们的理论”，“创造了一种叫‘本质’又叫‘艺术的真实’的标准圈，用来解决一切疑难问题。……他们是把丰富多样的现实生活往他们的标准圈里面套，套上去是‘本质’，套不上去就是‘现象’，也就不是‘生活的真实’，是不准写入作品的。谁写上

① 《文艺报》，1954年第22号。

② 《文艺报》，1954年第22号。

谁就要受批评。为了不受批评，就只好按照批评家'圈'下来的'本质'写文章。这样下去，批评家的理论是丰富了，但是作品反映的现实生活却越来越贫乏，终于只剩下干枯抽象的几个空概念了。在这种公式主义的批评家的指导下，怎么会有生动活泼的好作品出现呢？——他们也容不得它们！"[①] 文艺界领导人认为公式化、概念化的责任在作家。现在，作家们不但把责任归于批评家，而且说粗暴批评不仅仅是态度问题，而是有教条主义理论做指导、做后盾的，这就触及了文艺工作中出现"左"的错误的病根。

第三，要求给予作家平等的地位和创作的自由，要求尊重作家的劳动。人们强烈不满于《文艺报》"只许自己批评人家，不许人家批评自己，甚至抗拒人们批评的权威思想"。他们提出了这样的质问："作家写坏一部作品，我们要求他检讨错误，改正错误；编辑选登一部坏的作品，我们也要求他检讨错误。那么，为什么唯独对批评家倒可以格外宽容？难道说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是只适用于作家、编辑，而偏偏不适用于批评吗？"[②] 人们虽然还没有认识到，批评家之所以有凌驾于作家之上，对作家指手画脚、评头论足、横加斥责的权力，根本原因，不是他们个人的狂妄与无知，而是根据党的文艺理论，批评家负有实现和保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的特殊责任，但作家们已经认识到，"批评这个武器若只拿在一部分人的手里，他们便会专制"[③]。过去，作家与批评家是不平等的，现在，他们要求这种平等。不少人以对秦兆阳的《农村散记》的批评为例，指出《文艺报》发表的评论文章责备秦不写大事情，专写小事情，"似乎对每篇写农村的文章都要求以一定的公式来写今天农村中复杂、尖锐的斗争，不允许作家按自己所熟悉了解的生活，按

---

① 《谈批评家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文艺报》，1954年第22号。

② 陈亦洁：《谈批评家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文艺报》，1954年第22号。

③ 老舍在"青年宫会议"上的发言，《文艺报》，1954年第22号。

自己的兴趣与风格从各种不同的侧面来反映"[①],这种理论违反了创作应力求风格和样式的多样化的原则,有碍于创作的繁荣。这些批评反映了文艺工作者对于写什么、怎么写要由他们自己决定的强烈愿望。人们还要求尊重作家的劳动与进步。部队作家段星灿以路翎为例说,路翎写过有错误倾向的小说,但是他到朝鲜前线参加斗争,写了《初雪》这样的好作品,《文艺报》却没有给他以应有的鼓励。"对于作家的劳动和进步的冷漠,不是对于某一个人的问题,实质上是对人民的文艺事业不够关心","对于作家的劳动及其成果缺乏热情,对于在劳动中产生的错误在批评时缺乏严肃和热情的态度……不能认为是符合于党的精神的"[②]。

从以上三个特点来看,文艺界人士对《文艺报》的批评,与毛泽东是南辕北辙的。他们激烈批评《文艺报》的实质,是呼吁创作自由。尽管文艺界明确肯定存在"教条主义的思想潮流",明确提出争取"最大限度的创作自由"的口号,是"双百"方针提出以后的事,但在1954年批评《文艺报》的时候,他们已经初步地表达了这样的要求,这在革命文艺史上是少有的。然而,知识分子对文艺工作中"左"的错误进行的批判只能是无果而终。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党的领导方面判定当时意识形态领域包括文艺界的主要危险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存在,党内的主要问题是向资产阶级思想投降,而不是什么"左"的倾向。这是文艺工作者对"左"的批判无果而终的决定性原因。本来,《人民日报》1952年5月23日的社论发表以后,人们已经不再把资产阶级思想作为文艺界的主要倾向。《人民日报》为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发表的社论则认为:"经过对于传播反动思想的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及紧接

① 《文艺报》,1954年第22号。

② 《文艺报》,1954年第22号。

着的文艺界和整个教育界的思想改造运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已经在文艺界迅速地丧失原有的市场。"[①] 周扬在这次大会的报告中说，对《武训传》的批判，"使工人阶级思想在文艺领域内的领导地位，获得了进一步的巩固"。茅盾在讲话中肯定，"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已经在我国的文学事业上取得了确定不移的领导地位"[②]。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和对《文艺报》的批评，彻底否定了以上估计。他认为，"《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还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一统天下。在这种情形之下，周扬们只能纷纷检讨"对资产阶级思想表示容忍和投降"的错误，根本没有可能倾听和理解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呼声，对"左"的倾向进行认真的检查和批评。

第二个原因是，文艺界领导人虽然早已承认公式化、概念化、粗暴批评的存在和它的危害，但是，他们从不认为这些问题与党指导文艺工作的理论、方针有关。文艺工作者们认为，《文艺报》的错误不是个别人的、暂时的错误，而是有普遍性的、长期的错误；这些错误与文艺领导有关。周扬却把《文艺报》的错误完全归之于《文艺报》，归于《文艺报》脱离党的领导、脱离群众，对第二次文代会的方针"采取了消极的抗拒的态度"；他的责任只是看到和察觉了《文艺报》的错误，"但没有及时地有效地纠正"[③]。他不但没有从文艺领导的全局和基本问题上反思和检查"左"的倾向的意思，同样地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批评"采取了消极的抗拒的态度"。

---

① 《努力发展文学艺术的创作》，1953年10月8日。
② 《文艺报》，1953年第19号。
③ 《文艺报》，1954年第23、24号合刊。

6.8　双重避险:斗争指向的急剧转变

1954 年 12 月 8 日,即"青年宫会议"的最后一天,周扬发表了事先经毛泽东修改过的著名讲话《我们必须战斗》,郭沫若同时发表经毛泽东修改过的讲话《思想斗争的动员》。文艺界对《文艺报》和冯雪峰的批判戛然而止,转向批判胡风。按照传统的观点,文艺界斗争指向的急剧改变,直接起因是胡风的"进攻"。这有道理,但不全面。应该说,批评《文艺报》期间文艺工作者对"左"的文艺理论、文艺政策的激烈批评,也是导致运动转向的客观原因之一,因为文艺界对"左"的倾向的批评,脱离了毛泽东规定的方向,具有十分严重的性质。

《文艺报》"以指导文艺思想为主要任务",是"文艺思想战线的司令部",在文艺工作者的眼中,它是党的化身。批评家们直接为党工作,是一批以掌握和校正文艺方向为己任的党的代言人。这样,脱离领袖确定的主题,激烈地批评《文艺报》和批评家,无异于批评党的领导。

人们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公式化、概念化和教条主义的文艺理论。人们已经认识到,粗暴批评是现象,其要害在于宣传"无冲突论"等公式化、概念化、教条主义的文艺理论。以前,文艺界的领导人总把文艺创作公式化、概念化的责任归罪于作家。如周扬说,作家"不从生活出发,而从概念出发","不是严格地按照生活本身的发展规律,面是主观地按照预先设定的公式来描写生活",是"产生公式化、概念化的最普遍最主要的原因"。现在作家们说:"公式化、概念化的主要原因在批评!"周扬说,粗暴批评之所以发生,一是批评的态度不对,二是不从实际出发,而从一些教条、公式出发。现在作家们说:"不是态度和方法不对,他们根本就在自觉地宣传和提倡错误的文艺理论!"这就实际地提出了系统清理教条主义思

想、反思党的文艺理论的要求。

人们公开要求文艺界领导对《文艺报》的错误承担责任。作家刘大海指出，"所有《文艺报》的缺点和错误，都不是仅仅属于《文艺报》的，而是和文艺界领导上的缺点分不开的"，"在《文艺报》检查工作的同时，作家协会领导上也应该向读者表示自己的态度"。刘白羽说，从《文艺报》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不能不谈到领导的责任和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文艺报》是不是尊重领导是一个问题"，"作为全国文联的机关刊物，全国文联有没有领导呢？作为研究、批评文学问题的刊物，作家协会主席团有没有领导呢？……我觉得这不是简单追究责任的问题，而是整个文艺界汲取教训，改变作风的问题"[①]。他们明明知道文联、作协领导不了《文艺报》，但除了胡风外，没人敢公开批评周扬等人。所以，批评文联、作协是假，批评周扬和党的文艺工作领导是真。

就在文艺工作者把本来对《文艺报》右的错误的批评变成对文艺工作中"左"的倾向的讨伐的时候，胡风加入了"进攻"的行列。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直接导致了运动的转向。

所谓胡风的"进攻"，主要是指他在"青年宫会议"上的两次发言。他的武器和策略是批评庸俗社会学。他的批评显得非常有力，因为他把群众对粗暴批评和公式化、概念化的一般批评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他以《文艺报》第1、2卷发表的评论文章为依据，从四个方面论证了《文艺报》犯错误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他认为，《文艺报》创刊之初即向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投降，其表现是在关于朱光潜美学思想的讨论中，向"胡适派的旗帜之一，在胡适派学阀里面是一个大台柱"的朱光潜"表示了投降，甚至对于朱光潜的挑战表示了求饶的态度"；《文艺报》很早就"对于进步的作家、对于小人物"采取了打击的态度，1950年对阿垅的批评可为例

① 《文艺报》，1954年第22号。

证;在《文艺报》的批评工作中,"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占着支配的地位","初步形成了庸俗社会学的思想战线"。庸俗社会学的基本特征,"是不从实际出发,不是凭着原则的引导去理解实际,而是用原则代替了实际,从固定的观念出发,甚至是从零乱的观念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或者政策的词句去审判作品"①。公式化、概念化、"无冲突论"、教条主义、反历史主义、仅仅从表面现象看作品的社会意义的客观主义等,都是庸俗社会学的表现形式。庸俗社会学是粗暴批评的根源。胡风认为,《文艺报》的问题,"是我们战线的失败"。他说:

> 五年来,我们文艺上的有生力量受到了很大的压制,我们的文学事业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我们的青年作者,一切有进步倾向、有革命要求、忠实地拥护革命政权的爱国的作家们,包括绝对大多数的年纪大的作家在内,都是愿意写出好的作品来,都是愿意从实际出发,一步一步向前走,一面劳动一面改造自己的。但我们的文艺战线反而消沉了。为什么?我觉得,就是这种庸俗社会学的理论和批评,以及以它为武器的一套做法从内部把文艺实践拖得不死不活,使我们感到苦恼,更使青年作者们感到苦恼的②。

胡风不但批评了《文艺报》,而且批评了《人民日报》;不但批评了冯雪峰、蔡仪、黄药眠、陈涌等人,也点名批评了周扬、袁水拍。胡风以为,《文艺报》的问题和群众对《文艺报》的强烈不满,验证了他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状况的判断,因而非常"激动"地发表了"攻击性"的言论,企图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后以周扬为代表的党

① 《文艺报》,1954年第22号。
② 《文艺报》,1954年第22号。

的文艺领导工作。

胡风的发言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不免有片面、过激之处，但是，他对“左”的错误的深刻批判，对饱受公式化、概念化、教条主义、粗暴批评之苦的青年文艺工作者是极有影响的，就连当时周扬反驳胡风的“进攻”时亦显得招架无力。毛泽东、周扬们终于认识到，在文学艺术领域，对党的领导威胁最大的，不是胡适、俞平伯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而是“隐藏”在革命文艺阵营内部，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以“青年导师”、“青年朋友”自居的胡风和他的文艺理论。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为了防止文艺界特别是文艺界的青年知识分子为胡风所“误导”，避免这两种力量合二为一，形成对党的文艺领导的根本威胁，文艺界才迅速结束了对《文艺报》的批评，立即转向对胡风的批判，使得广大文艺工作者对“左”的倾向的批判归于流产。

第七章 胡风事件

胡风:特立独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从批判到清算:批判胡风的缘起与发展——理论霸权:对胡风及其文艺思想的批判——犹大背叛:舒芜倒戈及其群体意义分析——欲加之罪:胡风集团的三批材料与按语——集体人格:声讨胡风浪潮中的文化名人——紧跟政治:声讨胡风浪潮中的诗歌创作——人人自危:肃反运动对知识群体的影响——胡风事件:知识分子群体心理的转折点

7.1 胡风:特立独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

1955年1月,经毛泽东批准,批判俞平伯的运动同时转向两个方向:全国批胡适,文艺界批胡风。极端复杂的、直到今天学者们还争论不休的历史与现实因素,使得胡风问题的性质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迅速上升为“反党反人民”,最后被定为“反革命”。革命文艺阵营内部的思想理论之争,竟然演变为大规模的政治风暴。

生活在胡风事件40年以后的我们,缺乏对胡风文艺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特定历史环境的经历、实感与体察,也许很难细致入微地读懂胡风那些用“奴隶的语言”写成的作品。然而,任何一个粗通马克思主义、尊重事实而又有历史感的学者,只

要读一读胡风在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8本评论集和他的“三十万言书”，当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胡风确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但是，他不是那种脑袋长在别人脖子上、毫无独立思考精神的、庸俗的教条主义的文艺理论家，而是注重从文艺的性质、文艺的特殊规律、文艺发展的实践要求出发，敢于和勤于独立思考、极富创造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

胡风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事业服务的方向。胡风一贯强调文学要继承与发扬“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忠实地、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反映人民的痛苦、愿望，反映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斗争。他认为“政治为现实要求底最高的综合表现，是含有真实的生活内容和广远的发展趋势的综合表现”，文学依存于政治，是“为了把文学放在生活底本质的深处和激烈的斗争里面”①。“文艺底为人民服务，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在思想内容上反映人民底痛苦，代言人民底愿望，争取人民底解放；一是直接启发人民底文化意识，满足人民底文化的需要。”② “反映人民大众底觉醒和成长的、回答人民底文化要求的、现实主义的文艺斗争”，是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相结合”③ 的。

但是，胡风不赞成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庸俗化，反对把文艺变成政治理论、政治口号的图解。他极力维护文艺的相对独立地位与作用，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特殊道路与方式。他说，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革命文艺是它的一翼，开始是先锋的一翼，后来是辅助的一翼”。“革命文艺，就是要从自己底道路上分担唤醒人、影响人、甚至改造人，把人吸引到这个大斗争里面去的意识斗争的任

① 《由现在到将来》，《胡风评论集》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版，第315页。

② 《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胡风评论集》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13页。

③ 《民族战争与我们》，《胡风评论集》中册，第156页。

务。"[1] 文艺为政治服务，主要不是服务于具体的政治任务、政治运动，而是用艺术的力量，启发人民的觉悟。党对文艺的领导，应当是"政策思想"即政治斗争的基本任务与方向的思想引导，完全不应当规定作家们写什么、怎么写。对于周扬们把作家当做教条主义驱赶下的"奴隶"，要求作家"赶任务"、"写政策"的做法，胡风深恶痛绝。

胡风坚持文艺创作的现实主义原则，坚持文艺以真实地、深刻地反映生活现实为生命。他坚持生活是艺术本源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在谈到诗歌创作时，他说："在现实生活里面，诗人底心灵有所感触，有所激发，于是发而为诗。这所感触所激发，是诗人底精神力量，以社会立场思想立场为主线的精神力量和现实生活里面的特定对象相接触而来的，根本离不开现实生活里的事象。"[2] 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就是"写真实"。"真正的艺术应该是传达历史底要求，代言人民底愿望的"，"在作品里面要对几千年的历史所造成的不民主的社会里的黑暗的人生提出痛切的批判，对于劳动人民的痛苦提出真诚的控诉，对于劳动人民底力量提出热烈的礼赞"。"怎么能够做到呢？这一方面要求艺术工作者抱着为人民服务的真诚深入到人民大众的生活里面，一方面要求艺术工作者在创作上艰苦地开拓现实主义的道路。"[3]

然而，在现实主义原则的问题上，胡风始终坚持两个受人诟病的观点，一是现实主义没有资产阶级与社会主义之分，二是文艺应暴露人民群众"精神奴役的创伤"。

胡风认为："现实主义底哲学根据是反映论，即唯物主义认识论（也是方法论）在艺术认识（也是艺术方法）上的特殊方式。犹如

① 《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评论集》下册，第341页。
② 《关于"诗的形象化"》，《胡风评论集》中册，第370页。
③ 《答艺术问题上的若干质疑》，《胡风评论集》下册，第37页。

真正反映了客观世界的才是唯物论，通过艺术特征真正反映了历史真实的才叫做现实主义。"[①] 犹如没有"各种不同的"反映论一样，也不会有"各种不同的"的现实主义。人们有时说"资产阶级现实主义"，意思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历史阶段上的某些作家所达到的现实主义限度，或者某个资产阶级作家底作品里面所包含的现实主义成分"[②]。胡风对现实主义的界定，是简洁明了而又合理的。

胡风认为，人和人民的现实人生是文艺的反映对象。受剥削和奴役的人民是"世界的脊梁"，他们"有承受劳动重负的坚强与善良"，然而，这些品质"又是以封建主义底各种各样的具体表现所造成的各式各态的安命精神为内容的"。"前一侧面产生了创造历史的解放要求，但后一侧面却又把那个要求禁锢在、麻痹在、甚至闷死在'自在的'状态里面；这个惯常是被后一侧面所包围的统一着但却对立着的内容，激荡着、纠结着、相生相克着，形成了一片浩漫的海洋。""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如果没有对于解放要求的热切的感受，固然不可能，但没有对于精神奴役的创伤的痛切的感受，也同样是不可能的；任何一面都是以另一面为基础，但在实际的过程里面，倒反而大多数是在对于精神奴役的火一样的仇恨这个要求里面开始的。"五四以后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就是以意识斗争为先锋，就是人民创造历史的要求从自在的状态进到自为的状态，"也就是从一层又一层的沉重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下面突围出来，解放出来，挣扎出来，向前发展，变成物质的力量"[③]。因此，文艺既要反映人民的优良品质和英雄主义精神，同时又要揭露人民身上

① 《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随《文艺报》1955年第1、2号合刊附发，第11页。
② 《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第12页。
③ 《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评论集》下册，第349页。

“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创伤”①。

胡风坚持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强调作家在认识生活与反映生活中的能动作用，要求作家对创作对象倾注火一样的感情。他说：“对于作家，思想立场不能停止在逻辑概念上面，非得化合为实践的生活意志不可。如果说，真理是活的现实生活内容底反映，如果说，把握真理要通过能动的主观作用，那么，只有从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开始，在文艺创造里面才有可能得到创造力底充沛和思想底坚强。”② “文艺作品是要反映一代的心理动态，创作活动是一个艰苦的精神过程；要达到这个境地，文艺家就非有不但能够发现、分析，而且还能够拥抱、保卫这一代的精神要求的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不可。就文艺家自己一方面说，只有提高这种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才能够在现实生活里面追求并发现新生的动向、积极的性格，即使他所处理的是污秽或黑暗，但通过他底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也一定能够在读者底心里诱发起走向光明的奋发。”③ 文艺要写出“人生的真实”，“须得作家有和人民痛痒相关的胸怀。主观精神，革命人道主义精神”④。这种精神发自什么呢？“由于作家底献身的意志，仁爱的胸怀，由于作家底对现实人生的真知灼见，不存一丝一毫自欺欺人的虚伪。”⑤ 这就是现实主义。胡风把创作过程中作家接触、感受、认识、理解、融合创作对象时怀抱的“爱爱仇仇”的情感态度，称之为“主观战斗精神”，把作家认识、感受、融合创作对象的过程称之为作家的“自我扩张”。由此看来，所谓“主观战斗精神”，不仅仅是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与主观精神的表现，同时也是一种思想与情感倾向，

① 《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胡风评论集》下册，第21、22页。
② 《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胡风评论集》下册，第18页。
③ 《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胡风评论集》下册，第12页。
④ 《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第24页。
⑤ 《现实主义在今天》，《胡风评论集》中册，第320页。

自然也包括阶级情感与立场。

胡风坚持文艺创作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反对从概念出发、把文艺作品变成政治概念图解的公式主义和毫无思想感情的客观主义。他说:"社会科学本身不是艺术。艺术是从生活内容提升出来的。社会科学的结论或思想只能作为作家对待生活以至把握生活的引线;到走进了创作过程的时候,思想已经成了被作家所把握的生活内容底脉管或神经。如果不经过和现实生活相融合这一过程,只是直接地从思想去制造作品,那我们要说,即令他所依据的是正确的思想结论,那作品也是虚伪的东西。"[①] "创作过程可能而且应该受合理概念底领导,限制,但虽然如此,文学却还有它自己的道路,文学底认识作用要求作家底意识在特殊的方法上最高度地进行搏斗。"[②] "作家如果真正'懂得'了理论,那他在创造过程中就会完全忘记了理论,或者说,在创造过程中,理论已经失去了作为理论的形态,它已经变成了作家底思想要求,思想愿望,他用着这要求这愿望底力量向赤裸裸的现实人生搏斗。要达到了这种境地,理论和创作实践才能够统一起来。"[③] 他对左翼文艺运动中长期存在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深恶痛绝。他说:"主观公式主义者底人物只是某一'思想'底工具,制造出'这个工具'去传达或说明他的'思想',所以他的人物是纸扎的。""客观主义者底人物好象是客观对象,但却是客观对象底浮影。"[④] "我们要求思想力与艺术力的统一。"[⑤]

胡风主张人生与艺术的统一,重视作家人生观的改造。他在谈到诗歌创作时说:"有志于做诗人者须得同时有志于做一个真正

---

① 《关于创作发展的二三感想》,《胡风评论集》中册,第296页。
② 《今天,我们的中心任务是什么?》,《胡风评论集》中册,第113页。
③ 《答艺术问题上的若干质疑》,《胡风评论集》下册,第39页。
④ 《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评论集》下册,第329页。
⑤ 《一个要点备忘录》,《胡风评论集》中册,第134页。

的人。"诗人"尽管在实生活上不免惑于利欲，但在诗里却能够写出亦真亦善的人生。但我看，即使果真如此，这也只能是片面性的真理。这样的诗人，虽然当走进创作过程的时候能够受一番洗礼，把实生活里面被压伏的或被扰乱的德性升发出来，但他们底'亦真亦善的人生'底真与善一定要受着自实生活里面来的限制，顶多也只能算作第二义的诗人"。"一个诗人在人生祭坛上所保有的弱点或污点，即使他主观上有着忠于艺术的心，但那些弱点或污点也要变形为一种力量附着在他底艺术道路上面。"因此，"真实含义上的艺术"坚决否定人生与艺术的分离，"绝对地要求和人生道路的高度一致"[①]。"第一是人生上的战士，其次才是艺术上的诗人。""无条件地为人生上的战士，才能够有条件地为艺术上的诗人。"[②]

但是，胡风坚决认为，作家的思想改造必须在创作实践中实现。他认为，作家的"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都是在现实生活里面形成，都是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映"[③]。作家"在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里面，被体现者被克服者既然是活的感性的存在，那体现者克服者的作家本人底思维活动就不能超脱感性的机能。从这里看，对于对象的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在作为主体的作家这一面同时也就是不断的自我扩张过程，不断的自我斗争过程。在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里面，对象底生命被作家底精神世界所拥入，使作家扩张了自己；但在这'拥入'的当中，作家底主观一定要主动地表现出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而对象也要主动地用它底真实性来促成、修改、甚至推翻作家底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这就引起了深刻的自我斗争"。"承认以至承受了这自我斗争，那么从人民学习的课题或思想改造的课题从作家得到的回答就不会是善

① 《关于人与诗，关于第二义的诗人》，《胡风评论集》中册，第358、359页。

② 《关于题材，关于"技巧"，关于接受遗产》，《胡风评论集》中册，第364页。

③ 《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胡风评论集》下册，第13页。

男信女式的忏悔，而是创作实践里面的一下鞭子一条血痕的斗争。一切伟大的作家们，他们所经受的热情的激荡或心灵的痛苦，并不仅仅是对于时代重压或人生烦恼的感应，同时也是他们内部的，伴着肉体的痛楚的精神扩张的过程。"[1]

作家的思想改造即是知识分子的改造，对此，胡风也有独特的观点。他给予五四以后的知识分子很高的评价。他认为，"知识分子也是人民"；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中国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是"思想主力和人民之间的桥梁，开初是唯一的桥梁，现在依然是重要的桥梁"。"就这样的具体内容看，可以说革命知识分子是人民底先进的。"[2] 反帝反封建斗争教育了知识分子，同时"拓大了也加深了知识分子革命化的社会基础，使他们更积极地接近以至深入人民底内容，汲取人民底要求流在自己底身里，奔向人民底内容所要求的那个目标。这就是知识分子所参加在内的或所独力担负的那些怒潮似的斗争底基本发动力量"。他反对把所有知识分子都看做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反驳这种观点说："断定说被这样的大斗争所主导的生活现实并不能从知识分子里面教育出革命的作家，革命的现实主主义没有一点可能争得发展甚至保持阵地，说'任何'知识分子的作家只能'实际上宣扬小资产阶级所有的一切'，这样的'文艺断种'论就不知道是替什么人帮忙，更不知道是根据一种什么古怪的'历史唯物论'了。"胡风承认知识分子存在游离性与革命性的"二重人格"，但是，他认为，"就那些和人民有着联系，争取着深入人民底内容的作家们说，他们的创作实践原就是克服着本身底二重人格，追求着和人民结合的自我改造的过程"[3]。这就是胡风关于作家只能在创作实践中才能实现思想改

---

① 《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胡风评论集》下册，第20、21页。
② 《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评论集》下册，第322页。
③ 《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评论集》下册，第323、325页。

造的观点。

胡风坚持作家应当写他所熟悉、所理解的东西，反对“题材决定论”、“题材差别论”。他说：“文艺作品底价值，它底对于现实斗争的推进效力，并不是决定于题材，而是决定于作家底战斗立场，以及从这战斗立场所生长起来的（同时也是为了达到这战斗立场的）创作方法，以及从这创作方法所获得的艺术力量。”① 他举例说，《暴风雨中的海燕》，是高尔基把俄罗斯人民的负担、痛苦、愤怒、反抗的潜在热情和追求解放的渴望变成自己的歌唱了出来。“这是政治斗争的雄壮的颂诗。但要从字面上去找‘政治事件’，那是连半个政治字母也找不出来的。”② “即使是在最停滞的生活角落和最平凡的事件里面，也能够一点一滴地开辟出不是哗众取宠而是集流成川的人民的道路。”③ 对作家，“不应出题作文，干涉他底题材选择，也不应广悬禁令，堵塞他底心灵”④。把题材区分为重要或不重要，给作家限定或指定题材，都是要害死文艺的。

综上所述，在文艺的性质、社会作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革命文艺工作的基本方向、创作原则，文艺批评的标准，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等基本点上，胡风的文艺思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但是，把胡风的文艺思想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比较一下，当会发现，二者之间的确存在某些显著的区别。

毛泽东要求文艺工作者首先要解决立场与态度问题。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和他对现实主义的解释，含有对作家的阶级立场、阶级情感和对人民大众的态度，但在多数时候、多数场合，他并不

① 《关于结算过去》，《胡风评论集》下册，第99页。

② 《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评论集》下册，第336页。

③ 《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评论集》下册，第361页。

④ 《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胡风评论集》下册，第12页。

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毛泽东强调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胡风则说文艺"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强调文艺面向工农兵。胡风认为文艺要面向最广大的人群,没有必要刻意强调以哪些人为主要读者对象。毛泽东要求"革命作家"尤其是党的作家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胡风极少提出这样的要求,他强调的重点是作家通过现实主义的创作实践可以接受和达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张文艺批评要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胡风认为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应当完全统一,没有思想性而流于客观主义的作品和没有艺术性而流于公式主义的概念化作品,都不是真正的艺术,都无法发挥它的政治作用,这两个标准不存在第一、第二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对人民、对解放区的人民,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斗争,文艺要歌颂,要更多地"写光明",要"歌颂"。胡风则强调文艺要暴露,要写人民"精神奴役的创伤"。毛泽东重视文艺的题材,强调文艺应描写工农兵,反映人民的重大斗争。胡风则认为题材并不重要。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作家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需要深入工农兵、深入实际斗争和学习马克思主义进行思想改造。胡风则认为革命知识分子是"人民底先进",作家的"二重人格"主要通过创作实践来改造。

胡风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存在上述的甚至更多的一些差别,并不能因此断定胡风是"革命文艺界内部的反对派"[①]。如果我们熟悉并充分尊重"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②],充分注意根据地和国统区进步文艺队伍的组成成分、思想状况的区别,充分注意胡风与毛泽东所处的地位、所担负的使命的区别,那么,胡风与毛泽东文艺思想之间的差异是不难理解的。

---

① 何其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文艺报》,1952年第3号。

②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3页。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革命大军的统帅。在两军生死相搏的战场上，他自然要求把党领导下、影响下的文艺工作者组织成、锻炼成一支同工农兵合一的、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绝对服从党的领导的文化军队，直接地具体地配合党领导的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制度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是穿着军装的共产主义战士。根据地的文艺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文艺。在人民已经觉醒过来、组织起来，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着斗争的时候，文艺已不再主要是黎明时节把人们从沉睡中唤醒的号角，而是催动手执武器的战士冲锋陷阵奋勇杀敌的战鼓。

胡风则不同。他生活、战斗在国统区。国统区是“灰色的战场”，进步文艺队伍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工作对象以小资产阶级群众为主（农民也是小资产阶级），进步文艺的使命以揭露社会黑暗、启发人民觉悟为主。在这样的环境下，胡风们的任务就是继承五四新文艺的战斗传统，把最广大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引导到、统一到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之下，用文艺促进国统区人民群众的觉醒与觉悟，间接地配合党领导的政治斗争，促进抗日民族战争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人民战争的胜利。不顾环境、任务和进步文艺队伍的状况，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理论和方法搬到国统区，就会将许多进步文艺工作者排斥出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统一战线，甚至将一部分人驱赶到国民党一边。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风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国统区特殊环境下的具体运用。还应当注意的是，毛泽东是政治领袖，他谈文艺，是从政治的角度谈文艺；他的文艺思想，实际上是文艺政策，本质上属于政治思想的范畴。胡风以马克思主义者和党的战士自律，但他毕竟是文艺理论家而不是政治家，他对进步文艺工作的探讨更多地是从文艺的内在规律出发。国民党的政治压迫与文化专制，迫使胡风不得不用“奴隶的语言”写作，也妨碍了他的思想表达的

明快与明确。

7.2　从批判到清算:批判胡风的缘起与发展

如同文坛上的许多是是非非一样,胡风与周扬等党的文艺领导人之间的矛盾也起源于30年代。这一矛盾随着中国革命和进步文艺迂回曲折的发展历程,时隐时现,渐趋扩大与激化。40年代以后,在以毛泽东的《讲话》统一思想的旗号下,以周扬为代表的文艺领导层几次企图清算胡风未果,终于在1955年实现了这一夙愿。清算胡风的历史过程本身即蕴涵着深刻的政治意义。

30年代初期,胡风曾担任左联书记,他的文艺思想与当时的左翼人士并无多大差别。30年代中期,鲁迅先生以及和鲁迅先生关系比较密切的胡风、冯雪峰等人,同周扬以及接近周扬的左翼文化界名人之间的隔阂与冲突,逐步显露与加剧,左翼文艺阵营的内部矛盾开始发展。这种矛盾表面上是"宗派"之争,实质上包含着如何认识与对待五四新文艺的批判现实主义原则、如何认识与对待苏联"拉普"理论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影响、如何实现共产党对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等重大问题上的深刻的思想分歧,而并非纯属因文人相轻而产生的无原则纠纷。这种"宗派"之争,像一个可怕的幽灵,时隐时现于此后几十年的中国文坛,同复杂多变的政治因素一起,影响着许多文化名人的人生沉浮、生死荣辱。在胡风事件的全过程中,他30年代追随鲁迅而同周扬一伙结下的怨仇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胡风独特的文艺思想形成于抗战时期。这个时期,他在周恩来领导下同老舍等人一起负责统一战线的文化组织"文协"的工作。他克服战时的巨大困难,坚持举办《七月》、《希望》等大型文学刊物,发现与扶植青年作者;运用文艺批评的武器,推动进步文艺的发展,在国统区进步青年中建立了广泛的影响,进一步提高了他

在国统区进步文艺界的地位。当时,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广为人知的。在1939年到1940年下半年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争论中,胡风连带地批评过党的一些重要理论家和文艺领导人,如陈伯达、艾思奇、何其芳,但那时胡风与党的关系还是正常的。胡风与党的激烈冲突发生在《讲话》传到国统区以后。

1942年6月14日,重庆《新华日报》报道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消息。1943年3月15日,该报刊登会议的正式报道与毛泽东发表讲话的消息。1944年1月1日,《新华日报》以整版篇幅摘要刊发《讲话》。4月,何其芳、刘白羽到重庆传达《讲话》。郭沫若、茅盾、夏衍等纷纷公开表示拥护《讲话》。郭沫若连续发表文章,畅谈体会,号召作家们重视与学习《讲话》。夏衍称颂《讲话》"不单是现阶段文化工作文艺工作的正确指标,而且也是有了三十年历史的新文化运动划时代的转变,与最正确的解决"。胡风却采取了与他们极为不同的态度。

据胡风回忆,他在1943年年中已经读过《讲话》。引起他特别重视的,是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的"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与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与任务的区别"。以此为根据,他不承认《讲话》对于国统区进步文艺具有如同对根据地革命文艺那样的普遍指导意义。有人提出培养工农兵作家的问题,他说:"我们在国民党统治下面的任务应该是怎样和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和反动文艺以至反动社会实际进行斗争,还不是,也不可能是培养工农兵作家。"他用"环境与任务的区别","说明了在国统区写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的困难性"[①]。他认为国统区无法解决诸如作家的思想改造与文艺的普及提高等问题。听了何其芳等人的传达报告后,胡风认为他们没有注意"环境与任务"的区别。胡风还认为,国统区进步文艺界的主要问题是教条主义,当时的思想斗争却是以

① 《胡风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309页。

教条主义反对教条主义。胡风从国统区不同的“环境与任务”出发，反对把《讲话》照搬到国统区，拒绝公开表示无条件拥护《讲话》，这就导致了他同党、党的文艺领导人、党的作家们的思想对立。

1944年年底，胡风在《希望》创刊号发表舒芜的《论主观》，引发了他同党之间的第一次公开冲突。在此，我们不必对《论主观》的得失进行具体分析，也不必深究胡风发表《论主观》的动机以及他在多大程度上赞同舒芜的观点，可以肯定的是：舒芜从哲学角度论述的“主观作用”与胡风的文艺思想确有相通之处，胡风对这篇论文如此重视，也很容易使外界把《论主观》看做胡风文艺思想的哲学表述或哲学基础。胡风对《讲话》的态度已经被认为是严重的错误，发表这篇论文无异于又一次挑战。党不能沉默。1945年1月，党的南方局的文艺领导人冯乃超召开小型谈话会，批评《论主观》。胡风不但不接受与会者的意见，反而用尖刻的语言“还了几闷棍”，使会议不欢而散。他坚持要公开讨论。周恩来亲自出面同胡风谈话，说明“理论问题只有毛主席的教导才是正确的”，“要改变对党的态度”[①]。胡风不为所动，又在《希望》第2期发表舒芜的《论中庸》。事情不了了之。

1948年，在香港的党的文艺工作者以《大众文艺丛刊》为阵地，发起对胡风文艺思想的集中批判。这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清算。当时发表的集束文章，把胡风、舒芜、路翎等“捆”在一起。邵荃麟的《论主观问题》、乔冠华的《文艺创作与主观》对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的批判最为“全面”与“有力”。这些文章不无可取之处，但它们把舒芜的哲学观点与胡风的文艺思想混淆在一起，把他们的批判建立在对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极不准确的解释之上，自然不能使胡风信服。胡风写了《论现实主义的路》，阐述和捍

① 《胡风回忆录》，第337页。

以自己的文艺思想。联系到当时郭沫若等对沈从文等人的激烈批判，香港发动的这次批判行动大有在革命胜利之际清理“门户”的味道，似乎天国的大门即将打开，而异教徒无权进入天国，更没有在庆功宴会上占据一个席位的资格。新中国成立之际的胡风，受到的正是这样的对待。

茅盾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的报告，是对胡风的第二次清算。正如本书第二章指出过的，这个报告不是顺理成章地歌颂国统区进步文艺对革命胜利的贡献并总结它的经验，而是通篇以低沉的调子检查进步文艺阵营的“错误倾向”和“错误理论”，表现出贬低以至于否定国统区进步文艺的倾向。茅盾对国统区文艺思想理论的批评，他列举的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重庆文艺界对几个作品的争论，特别是对“主观”和“生命力”理论的批判，都是针对胡风的。他说，“主观”问题是近几年文艺界“思想中积蓄酝酿着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继续下去，“不能不归结到毛泽东的文艺讲话中所提出的关于文艺上立场观点态度等问题”。尽管茅盾在“附言”中声明，这个报告系“非结论性质”，“偶有举例，仅为叙述上之方便，非欲遽加月旦”[①]，毫无疑问，这个报告是经过党的领导首肯、代表党的观点的。它在开国之际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性质作了结论，定下了进一步清算的基调。在如此重大的场合提出如此严重的指责，胡风无法申辩。他被完全排除于新中国的文艺领导工作之外。他以满腔的热情投入新的生活，歌颂毛泽东、歌颂新中国、歌颂新人物，回答对他的指责。

然而，无论胡风如何表现，他已无可挽回地从进步文艺界的著名战士变成了新中国文艺界的“脓疮”。这个“脓疮”是非剜掉不可的。1950年3月，周扬在一次大会上批评阿垅的《论倾向性》等两

---

① 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第2集，作家出版社1955年5月版，第21页。

篇文章时，说这是小资产阶级作家的“小集团”的抬头，“危害性等于社会民主党”。这是第一次公开提出胡风“小集团”问题。1951年11月开始的文艺整风，成为周扬等人发动大规模批判胡风运动的绝好时机。北京文艺整风领导机关出版的《内部通讯》发表批评路翎继续宣扬胡风文艺思想的通讯；《文艺报》分发不署名的《胡风文艺思想研究资料》，要求读者发表意见；《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讯》发表控诉胡风文艺思想对青年的“毒害”的通讯员来信。5月25日，舒芜反戈一击，在《长江日报》上发表《重新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6月8日，《人民日报》转发这篇文章，并在“编者按”中肯定存在着“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7月10日出刊的《文艺报》第13号发表两篇读者来信，要求批判胡风。根据胡乔木的指示，舒芜又写了《致路翎的公开信》，发表于9月25日出刊的《文艺报》1952年第18号。周扬等人借舒芜之口，终于将胡风由文艺思想上的异端上升为政治上的宗派。这都是发动彻底清算胡风运动的舆论准备。

这次精心安排的政治清算运动因周恩来的干预而流产。正当周扬等人计划召开大会对胡风进行公开批判的时候，周恩来指示：要对胡风进行同志式的批评，不要先存一个谁对谁错的定见，而要平心静气地好好与胡风交换意见。公开的批判会改为以中国文联、作协党组名义召开的“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开会前，周扬对胡风提出了十分苛刻的要求。从9月6日到12月16日，先后四次会议。胡风不承认自己的文艺思想存在根本错误，批判的调子也就越来越高。何其芳、林默涵、周扬把问题上升到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反对党的文艺路线的高度。翌年2月，《文艺报》发表何其芳、林默涵的批判文章，作为这几次“讨论会”的正式结果。在这两篇文章发表之前，“为了使文艺界不感到突然”，曾召开北京各文艺单位负责人会议，通报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经过情形。有参加会议者致信毛泽东，反对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引起毛泽东的关注。

何、林文章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定性，把胡风推到了与党对立的绝路之上。但是，这时思想改造运动已经结束，全国进入学习、宣传总路线的新阶段。毛泽东的兴奋点已不在意识形态领域。最高领导层显然不赞成在这个关节上发动全国性的批判运动。对胡风的批判又一次归于沉寂。

如果胡风顺应"历史潮流"，从此默不作声，或装死躺下，也许还会有一段平静的日子。然而，胡风就是胡风，他向来以鲁迅先生的信徒、五四精神的传人和斗士自居。他鄙视那种在大是大非面前随波逐流、回避斗争、圆滑虚伪、明哲保身的庸人。文艺是他的生命，原则是他的立身之本。他看到，由于革命的胜利，文艺工作中"那些公式主义、教条主义的理解更现出了一种全面旺盛的气势，解放区以前和以外的文艺实际上是完全给否定了，五四文学是小资产阶级，不采用民间形式是小资产阶级，鲁迅作品不是人民文学"，这些都成了支配性的理论观点。现实主义的原则被否定了，"五四精神和鲁迅实质是被否定了"。作家们充满了苦闷和苦恼，文学艺术出现了"一种半身不遂的状态"。"林默涵何其芳同志的批评所代表的理论实质，正是几年以来在文艺实践中起了严重的危害作用的一种力量，它危害了党对文艺的期待，它抵消了党对文艺发展所提供的巨大的政治保证。"[①] 实践似乎证明了他的文艺理论和他对文艺实践状况判断的正确。他无法保持沉默。1954年3月至7月间，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他终于冲破长期的内心矛盾，以极大的政治与理论勇气，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状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由国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习仲勋转呈中共中央。

胡风的"三十万言书"采用典型的论战手法，笔锋犀利，言辞激

① 胡风：《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状况的报告》，转引自晓风的《胡风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260、274、313页。

烈。他抓住林默涵要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首先要具有工人阶级的立场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这一不无漏洞的观点，层层深入，穷追不舍，最后把“左”的教条主义文艺理论归结为扼杀文艺生机的“五把刀子”。胡风彻底否定了《讲话》发表以来对于《讲话》的庸俗性阐释，彻底否定了新中国成立后以周扬为代表的党的文艺政策和文艺领导工作。尽管胡风大量引用革命导师的言论做根据，并把林、何的理论说成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歪曲，他对林、何以及周扬的批判却很自然地被人理解为指向毛泽东。

毛泽东没有立刻对胡风的“三十万言书”作出反应，只是将它批转中国文联主席团处理。两三个月以后，毛泽东发动对俞平伯的批判，连带批评《文艺报》和冯雪峰。胡风以为这是他的建议书起了作用，遂在“青年宫会议”上“激动”地根据“三十万言书”的观点，发表了“放肆”地攻击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文艺领导工作的言论。胡风犯了绝大的错误。这时毛泽东的注意力正集中于意识形态领域，着力于打击资产阶级唯心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权威。他批评《文艺报》和冯雪峰，是为了消除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障碍。文艺界的人们借题发挥，把斗争矛头指向教条主义，偏离了毛泽东确定的斗争大方向。毛泽东和周扬对形势发展洞若观火。在他们看来，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几次内部批判和 1953 年年初的公开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性质已广为人知；1952 年的文艺整风“改造”了原国统区文艺工作者，清除了胡风的群众基础。在这次以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为目的的运动中，胡风不自量力，自己“跳”出来，以文艺工作者的代言人自居，公开向所谓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宣战，恰好为运动提供了一个绝好的靶子。

本来无意于即刻解决胡风问题的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把斗争矛头从俞平伯转向胡风。12 月 8 日，周扬发表《我们必须战斗》的讲话，正式向这位与他对峙 20 年之久的冤家宣战。翌年 1 月 12 日，毛泽东批准部分印发“三十万言书”，作为靶子。1 月 15 日，

毛泽东对周扬与胡风谈话情况的报告作了批示，将胡风文艺思想钦定为“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1月2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宣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全国性的大批判运动立即展开，酝酿10年之久的对胡风的政治清算终于来到了！

对胡风及其文艺思想的政治清算，是迟早要来的。它是革命文艺界内部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理论和以组织化、军事化、命令化为特点的战时文艺工作领导方式借助国家权力恶性扩张和肆虐的必然结果，更是新中国建立统一的意识形态的需要。政治学习运动、批判《武训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文艺整风，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无一不是改造与重建意识形态的浩大战役的一部分。扫清“外围”之后，斗争的矛头必然要指向革命阵营内部像胡风这样有独立思想、有历史地位、有广泛群众影响的人物，因为这样一些人长期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也往往被人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思想却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故而有可能混淆人们的思想，对正统意识形态的纯洁与权威造成严重的损害。事实也是，在周扬一派的影响和左右下，毛泽东确把胡风看做惟一敢于对他的文艺理论和文艺理论权威地位提出挑战的人。由此看来，新中国成立后对胡风的清算，并不是哪一个人或哪几个人的过错，而是统一的新的意识形态建立与维护其权威的必然行为。

7.3　理论霸权：对胡风及其文艺思想的批判

对胡风的定性，初始是小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家、“革命文艺阵营内部的反对派”，继而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反党反人民的、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家，最后是隐藏在革命阵营内部的十恶不赦的反革命。从1945年重庆发动对他的第一次清算起，对胡风及其文艺思想的批判就遵循两条铁的定律：一条是，毛

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超时空的绝对真理，胡风的文艺思想纯属谬误；一条是，周扬们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绝对正确，不容怀疑。

对胡风文艺实践的评价，完全不顾历史的真实。胡风30年代投身于左翼文艺运动，勇敢地捍卫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坚持文艺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服务的方向，同反动的封建文艺、资产阶级文艺作了长期不懈的斗争。他在革命文艺阵营中的地位是在斗争中建立的。抗战时期，他同老舍等人主持"文协"，冲破国民党文化官僚潘公展等人的束缚，以文艺评论为武器，鼓励和指导国统区进步文艺工作，使党领导下的进步文艺界在统一战线的形式下坚守和扩大了国统区的阵地。他以鲁迅为榜样，以极大的热情扶植文学青年，团结、聚集和培养了一大批革命的文艺战士。40年代，胡风已被苏联文艺界誉为"中国的别林斯基"，成为中国进步文艺界少有的有世界影响的文艺理论家和评论家。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胡风没有正式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但他几十年如一日，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律，以党的战士的身份接受党的指示，从事党的工作。胡风对于中国革命文艺事业的贡献，任何一个稍有实事求是之心的人，都不会视而不见。遗憾的是，胡风的文艺活动和历史贡献，从未得到过党内人士的公正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对胡风的文艺实践作出结论的是何其芳。1949年11月，何其芳写了《〈关于现实主义〉的序》。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抗战以来国民党统治区长期地缺乏一种明确的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批评活动"。胡风属于"倾向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文学家"，在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指导下，胡风"对于他们所反对的某些进步文艺作品也不能采取一种客观的分析的态度"，把这些或者在政治性方面或者在艺术性方面存在或大或小的缺点的作品，或者叫做"主观公式主义"，或者叫做"客观主义"，"采取简单的抹杀一切的态度"。何其芳质问胡风："既然自以为一贯符合毛泽

东的文化思想文艺思想，并且是十分努力十分坚持的，这许多年来所做的文艺工作到底曾教育了多少人与工人农民相结合或教育了多少人改造了自己？到底比他们所指为'主观公式主义'或'客观主义'的作品对于革命的贡献大在哪里？到底有多少作品是真正为人民大众服务，特别是为工农大众服务的？到底做了多少普及工作或指导普及的工作？到底对于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文艺思想宣传过多少？"[①] 这不但断定胡风的文艺批评活动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而且错误地断定胡风对进步文艺的发展没有做过任何有积极意义的工作。

何其芳、林默涵在1953年年初发表的批判文章承认胡风的政治立场是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的，但却回避对他的全部实践活动作出明确的评价。林默涵说："胡风曾经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文艺活动，在政治上他是站在进步方面，对国民党反动的法西斯文化作过斗争。在这方面，胡风有他的贡献。"何其芳说："胡风同志是很早就参加革命文艺活动的文艺工作者。他一直坚持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的立场，这是首先应当肯定的。"[②] 他们都避免直接回答胡风对于左翼文艺、革命文艺、进步文艺的发展有无贡献的问题。为了否定胡风对革命文艺的贡献，何、林采取把胡风的政治立场与文艺活动分割开来的手法，全然不顾一个文学家、文艺理论家主要通过其文艺实践表明与实现其政治立场的常识。

通过否定胡风文艺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性质，进而否定胡风的革命文艺实践，虽然是党的文艺领导人、文艺理论家的明显企图，然而，1955年以前，这样的企图并未得到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正式认可，因为比较了解胡风的周恩来还不时过问文艺工作。1955年1月，毛泽东决心彻底解决胡风问题。打倒胡风的第一步就是

① 《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第2集，第23、32页。

② 《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第2集，第49、69页。

首先从政治上彻底否定胡风。是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断定,“胡风的错误的文艺思想是有他长期的历史根源的。十多年来,他一直坚持着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文艺思想,并以他的这种思想为中心形成一个小集团,顽强地同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相对抗”,“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胡风及其一派的主要斗争锋芒不是对着敌人,而是对着共产党和进步作家的”。中共中央在批示中肯定,胡风“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①]。对胡风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20年的文艺活动作出如此这般的政治宣判,实在是违背基本事实、违背良知的。然而,要彻底清算胡风的文艺思想,不在政治上打倒他是不行的。

对于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可以分为1948年至1953年、1955年1月至5月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由于政治上尚未彻底否定胡风,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定性还停留在“小资产阶级”阶段,这一时期的批判还有一些说理和讨论的味道。后一阶段,胡风在政治上既被指为党和人民的敌人,其文艺思想被明定为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更由于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表现出的“顽固”、“狂妄”、“嚣张”所引起的公愤,群众性的批判运动便普遍地表现出一种非理性的狂乱,毫无说理可言。这两个阶段的批判,有一个共同的突出特点,就是完全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超时空地对待毛泽东的《讲话》和胡风的文艺思想,把两个在极不相同的具体历史环境中产生的思想体系对立起来,从而判定胡风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敌人。

延安整风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伟大运动。不幸的是,即使共产党人也不能通过一次运动彻底地、一劳永逸地除去封建意识的残余。打破了对王明和共产国际的迷信,树立了毛泽东思想的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第29、27页。

权威，有助于中国革命，而这种权威却逐渐变成了新的迷信。对《讲话》的绝对化理解，即是一例。正如本书已经指出过的，毛泽东处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之中，面对大批从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大中城市拥入延安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他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思想上、行动上都还没有完全革命化、马克思主义化的青年人尽快整编成一支文化军队。更简明地说，就是要把他们从文艺家变成听从党的号令的、置身于工农兵群众之中的宣传家、鼓动家，这自然要求他们迅速地改变阶级立场，改造阶级感情，深入工农兵，写工农兵，写光明，自然要提出文艺为现实斗争服务以及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等的理论。《讲话》包含着一些普遍适用的文艺思想，如文艺与生活、与人民的关系等，但它毕竟是特定时代和环境的产物。其历史的局限是应当承认的。

党内对《讲话》理解最深的莫过胡乔木。他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重要参加者、《讲话》的整理者，也是胡风案件的重要当事人。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他终于有了新的认识。他在1991年、1992年的两次谈话中说："文艺座谈会讲话的背景，就是战争环境，农村环境，如果离开这样的环境看问题，把讲话绝对化，那是非历史的态度。""《讲话》主要有两个基本点：一是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二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在这两个基本点上，《讲话》的原则是不可动摇的。当然，对《讲话》也不能搞'句句是真理'、'句句照办'那一套，因为《讲话》也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也必然带有其历史局限的一面。对此，应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① 然而，从重庆时期开始，党内的态度就是"理论问题只有毛主席的教导才是正确的"。这样，《讲话》就从革命党在战争和农村环境下的文艺政策变成了超时空的绝对真理、千古不易的教条和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

对胡风文艺思想的理解，同样完全没有合乎情理地考虑到国

①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61、269页。

统区与根据地文艺工作根本不同的“环境与任务”。批判者责备在国民党专制统治下战斗的胡风为什么不用明确的语言，公开地用毛泽东的文艺理论评论作品、要求作家，为什么不要求作家学习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不要求作家深入群众斗争，去描写与歌颂工农兵，等等。他们置在“灰色的战场”上只能以“灰色的面目”、“灰色的武器”战斗的常识于不顾，仿佛不知道在法西斯军事专制下革命的理论只能用“奴隶的语言”曲曲折折地来表达；仿佛不知道国统区进步文艺工作者的多数并不是视死如归的共产党员，要求他们在国民党的枪口下面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极不现实的；仿佛不懂得国统区的人民也是人民，国统区人民争民主、反内战的斗争也是人民的斗争。

譬如，胡风 1944 年年初写了《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文章一发表，黄药眠立刻撰文，完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评判这篇文章，指责胡风不该不公开提出争言论自由、争民主。胡风在这篇文章中阐述的“主观战斗精神”，非常明显的是一种对于民族解放、人民解放事业的高昂的战斗热情，是有阶级立场、阶级感情、民族感情、政治倾向包含于其中的。1953 年，林默涵、何其芳却以这篇文章的某些话语为根据，指责胡风对于现实主义的定义如何错误，指责胡风为什么不明确地提出“阶级立场”。他们似乎全然忘记了这篇文章写在 1944 年的重庆，全然忘记了这是经集体讨论为文协理事会准备的年会论文，而“文协”的最高官员是国民党大员潘公展，这篇文章是胡风搅尽脑汁从潘公展的“审查”下“突围”出来的。林、何竟然认为在那样的环境下、那样的文章中，也可以用明确的语言提出共产党对文艺工作和文艺工作者的要求！

又譬如在因沈崇事件引发的以北平为中心的风起云涌的学潮中，胡风为北平《诗联丛刊》创刊号撰文《给为人民而歌的歌手们》，说“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

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够有诗"[1]。胡风的意图在鼓励学生诗人们积极参加和反映这一场伟大的反美反蒋的民主斗争。这段话固然符合胡风一贯的文艺思想,但此时此地这样说又有什么错误呢?何其芳却批判说,这是"直截了当地否认了革命作家必须到人民群众中间去,必须参加人民群众的斗争。尽管这里面用了一些好听的字,人民、斗争、前进、诗,说穿了就不过是这么一回事。这样的观点也是直接和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相反的",是"有意和革命文艺的新方向对抗"[2]。在何其芳看来,国统区的人民群众算不得"人民群众",共产党领导下的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第二条战线"的斗争算不得"人民群众的斗争"。这种批判,不仅荒谬,简直就是蛮横。

面对革命文艺阵营内部对他的非难与批判,胡风一直为人们不能理解或不屑于提及他所活动的特殊环境而苦恼,甚至耿耿于怀。1944年,《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受到黄药眠的批判,胡风讥讽黄说:"主帅当然不会走到前哨阵地上去,但当他安居后方,出必大旗紧随的时候,也应该知道前哨上的小卒不得不偷偷地爬过隐蔽物去黑夜摸哨的原因。"[3] 这真是一针见血的反驳。40年以后的1984年,大难不死的胡风在为他的评论集写的《后记》中再次表达了同样的感受。他说,他的评论都是"在具体的时间、地点、社会关系和人事联系中写出的。……一开始我就举例说明了国民党的压迫和摧残是怎样一种黑暗情况,但和我论争的友人们谁都不肯提到这一点"。

---

① 《胡风评论集》下册,第237页。

② 《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第2集,第77、78页。

③ 《后记》,《胡风评论集》下册,第128页。

> 友人们当做问题的，是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到解放战争进行中的十年间我的文艺实践和评论。这十年间我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生活和工作的，而友人们是把革命圣地延安和解放区的大原则拿来衡量我的实践和评论，把那些当做套子，来套我的实践和评论的。而我这一面呢？工作当然有原则作引导，包括以延安整风所提出的原则作引导，也就是以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作引导。但我的斗争只能基于现实因而针对现实，我相信的原则只能在基于现实，针对现实的实践中引导、发展和前进。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那样艰难的处境里，我面对的读者是现实生活中的读者而不是思想概念上的读者。突出了这一点，就可以取得理解这个论争的标准①。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今天看来近似荒唐的事情呢？解释只有两种：要么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现代迷信统治了人们的头脑，要么是有意排除异己，刻意树立特定人物、特定理论的绝对权威。仅此而已，别无其他。

上面所举的例子，全部引自1953年以前对胡风的批判。1955年1月对胡风的批判成为全国性的运动以后，上至名人大家，下至平民百姓，全国总动员，在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以前的4个月间，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批判文章446篇，声势之大，前所未有。在激烈的政治气氛中，人们似乎失去了理智。许多写批判文章的人显然并未读过多少胡风的文章，便按照强加于胡风的“五大罪状”，抓住“三十万言书”的只言片语妄加批判，那揪住一点、不及其余、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的批判手法，那紧赶潮流、罗织罪名、置人于死地的坚定态度，不但不顾

① 《胡风评论集》下册，第407页。

起码的历史事实，就连起码的文字道德也是不讲的。

7.4 犹大背叛：舒芜倒戈及其群体意义分析

胡风是肯定要被打倒的，但是，如果没有舒芜的背叛，他也许不会立刻陷入牢狱之灾，也许不会有2100多名知识分子受到直接牵连、92人被逮捕、78人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悲剧发生，甚至也可能不会引发随之而来的令许多文人丧胆的肃反运动。不可否认，舒芜的背叛说明他的人格存在重大缺陷，然而，把这件事情放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观察、去理解，当会发现，舒芜的行为不过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革命胜利之初社会大变革过程中极度的内心矛盾冲突中举止失措的外在表现之一。它可以成为观察与透析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政治心理的一面镜子。

舒芜的背叛有明显的轨迹可寻。它的有文字依据的公开起点是1952年5月25日在《长江日报》发表的《重新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文章的基本精神是公开表示完全拥护《讲话》，彻底否定自己的思想与历史。舒芜首先承认，《讲话》是一个“伟大文件”，“对于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革命者，每一行，每一字，都显示出无限深刻的指导意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对于严重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则是完全不可能被理解的”。在此基础上，舒芜彻底否定了自己从事进步文艺工作的历史。他的检讨中最重要的有三点。一是承认《论主观》是“谬误的文章”，自己之所以写出这样的文章，“实在是因为，当时好多年来，厌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觉得自己所要求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个性解放’，碰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论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简直被压得抬不起头来。怎么办呢？找来找去，找到一句‘主观对于客观的反作用’。这一下好了，有‘理论根据’了。于是

把这个'主观'，当做我的'个性解放'的代号，大做其文章，并且尽量摭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词术语，装饰到我的资产阶级唯心论上去"，这就承认了写作与发表《论主观》，是有意地、自觉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行为。二是对他在《论主观》中所主张的"个性解放"或"主观精神的发扬"作了解释，承认实际工作中它们无非表现为"自由散漫，对抗组织，脱离群众，自高自大，孤芳自赏，这一类恶劣的作风"。新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表现出"虚伪，浮夸，疯狂，时而剑拔弩张，时而萎靡不振，时而包办一切，时而超然物外，需要高度策略性的时候往往来一场歇斯底里的破坏，需要坚决斗争性时候偏又来一套歇斯底里的温情"，而"我们居然把它说成工人阶级的'精神状态'，还要'充分发扬它'。所以说'我们'，是因为还有几个人，曾经具有相同的思想"。三是揭露了一个"事实"："十年前，《讲话》发表的时候，国民党统治区内某些文艺工作者，认为这些原则'对是对，但也不过是马列主义的 ABC 而已'，认为这是很容易解决，也早就解决了的问题。"舒芜最后说，"回想自己十年以来，究竟为人民革命事业做了一些什么，细细一想，真是一无所有，一事无成"。"拿这个文件来衡量自己的过去，结果只有一无是处而已。"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舒芜的文章印证了这句我们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听惯了的老话。当年胡风发表《论主观》，并极力要人们重视这篇文章；在它受到猛烈批判的时候，胡风仅仅承认文章存在着"个性解放"没有与集体主义相联系这样无足轻重的缺点。现在文章作者自己承认它本来就是有意而为的反马克思主义之作，你胡风还有什么话说？在人们眼中，舒芜是"胡风派"最有理论修养的大将，对胡风的文艺理论当然领会最深，现在他承认所谓"主观战斗精神"不过是如此这般的种种令人不堪的"恶劣作风"，你胡风还有什么话说？胡风口口声声说自己的文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自己是拥护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现在舒芜揭发 10 年前这一帮人就是蔑视《讲话》的，你胡风还有什么话说？胡风坚持

说国统区的进步文艺对人民解放事业是有贡献的，现在舒芜承认自己10年来一无是处，也就是承认了何其芳在《〈关于现实主义〉的序》中对胡风的质问，你胡风还有什么话说？

舒芜文章的价值立刻被发现，并变成了打破1949年以后对胡风欲批不成、欲罢不忍的僵局的炮弹。6月8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舒芜的文章，胡乔木在他亲自写的"编者按"中说，发表舒芜的《论主观》的《希望》杂志，"是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办的。他们在文艺创作上，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而实际上否认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意义。这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现在，这些断语，已经不是信口开河、任意强加，而是自然地从舒芜文章中得到的结论。舒芜这篇文章给了胡风沉重的打击，使他陷入了极大的被动。

舒芜文章写作和发表于文艺整风的高潮阶段。他的自我否定并不显得特别突出。正如本书第四章所述，当时许多比舒芜更有地位、更有影响的大知识分子、大学问家、著名文化人的检讨，其自贬自辱的程度，远较舒芜为甚。不同的是，其他人的检讨，仅限于"自贬自辱"，而不涉及他人；空洞无物，官样文章，一般不涉及具体问题。而舒芜在自我否定的同时，却是处处旁及他人，影射胡风，批评路翎，甚至极不真实地揭露类似胡风等人蔑视《讲话》等敏感问题①。以舒芜的社会阅历和他对政治形势的判断，他应当知道，这些问题是能够在政治上置胡风和他的朋友们于死地的。我们不知道这位健在的老人事后有没有解释过写这篇文章的动机，但他

① 1952年6月13日，胡风在给路翎的信中说："厌恶马列主义云云，完全相反。他当时总是以谈论马列主义为得意的，自已也正在读一些马列主义，正在以为用马列主义认识社会的入门中，颇为沉醉的。""没有谁说过ABC的话。""ABC的话，大概是他如此想的。那时我们是研究了'讲话'，所以立志要写劳动人民的。"既然"密信"可用为定罪的铁证，为什么不能用来证实舒芜的话纯属谎言呢？

的文字告诉我们，支配他写出这篇文章的心理和动机，一半是忏悔，一半是自救。

舒芜的文章表明了他的态度。他立刻从"胡风派"的大将变成了他人手中的一柄斩杀"胡风派"的利剑。据当时在《人民日报》文艺组工作的叶遥回忆，舒芜的文章在《人民日报》转载后，"编者按"中"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的提法，引起了文艺界的特别关注。报社收到许多要求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群众来稿。胡乔木不同意选登这类来稿来信，认为水平低，缺乏说服力，建议以报社的名义约舒芜写篇比较详细的检讨批判文章。这就是舒芜发表在 1952 年 9 月 25 日《文艺报》第 18 号上的《致路翎的公开信》。在这篇万言长文中，舒芜按照此前何其芳、邵荃麟、乔冠华等人批判胡风的观点，以系统的自我检讨和对路翎"循循善诱"的口气，引用大量政治术语，对胡风作了全面的歪曲的批判。舒芜显然注意到了《人民日报》"编者按"中关于"小集团"的提法。他专门写了一节，明确承认"我们的错误思想，使我们在文艺活动上形成一个排斥一切的小集团，发展着恶劣的宗派主义"；这个"以胡风为核心"的小集团，"首先是竭力抗拒党在文艺上的具体领导"；"对于当时文艺上的进步力量""一概排斥"，"用了所谓'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两顶帽子，抹煞了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内除我们自己之外的所有较好的文艺作品"；"互相标榜，自吹自擂，到了肉麻的程度"；"对于进步文艺工作者的队伍，采取不合作的态度，避之唯恐不及"。舒芜的"供认"，自然成为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对党的文艺领导的政治宗派集团的证据。舒芜对《人民日报》"编者按"中"小集团"一词的迅速回应表明，他是在毫无原则地迎合人们对胡风的指责。如果说发表《重新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动机是忏悔与自救参半，那么，在写作《致路翎的公开信》的时候，天平的两端已经失去了平衡。

1955 年 1 月，全国性的批判胡风运动开始后，舒芜成为批判

胡风的最激进的先锋。当时的批判文章虽然大都十分激烈，但多数人一般还不把胡风说成反革命，而舒芜却是最早这么做的。他在4月13日《大公报》发表的文章《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本质》即是明证。

文章开首，舒芜即指出，“胡风所谈的并不仅仅是文学艺术的一些特殊问题，而是通过文学艺术的问题，对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从他的反动资产阶级的立场，在他的反动的主观唯心论和个人主义原则之下，提出了一整套看法和主张”。然后，他断章取义地摘取胡风的话语，通过荒谬绝伦的歪曲，诬陷胡风“根本歪曲了整个中国革命的面貌”，历来有意地反对中国革命。试举几例。

胡风在1944年年初写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谈到五四新文艺的特征时说：“当批判的现实主义在人类解放斗争里面争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文艺底战斗性就不仅仅是表现在为人民请命，而且表现在对于先进人民底觉醒的精神斗争过程的反映里面了。”[①] 即使完全不管这段话之后还有意思表达更明确的文字，胡风讲的是新文艺为人民解放斗争服务的不断发展，也是非常明白的。舒芜却批判说：“这就是说，批判的现实主义在今天的人类解放斗争里而，它所要反映的革命就是一种‘精神斗争’，而且是‘先进人民底觉醒的精神斗争’。很明显，胡风是认为，革命并不是广大人民以反动阶级反动分子为对象，而是‘先进人民底觉醒的精神’，自己以自己为对象。”

胡风在《论现实主义的路》中肯定人民具有承受劳动重负的坚强与善良的品质，同时指出这种品质是以“封建底各种各样的具体表现所造成的各式各态的安命精神为内容的”。“如果封建主义没有活在人民身上，那怎样成其为封建主义呢？用快刀切豆腐的办

① 《胡风评论集》下册，第17页。

法，以为封建主义和人民是光光净净地各在一边，那决不是咱们这个地球上的事情。"[①] 胡风说的是劳动人民的精神世界中有封建意识的影响，即"精神奴役的创伤"，它不可能用简单的方法一下子完全消除。舒芜却批判说："胡风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一九四八年，'咱们这个地球上的'中国的广大解放区里面，正在进行着如火如荼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斗争。党在领导这个斗争当中首先要向人民（主要是农民）进行教育的，就是要从政治、经济、思想（也就是精神）等各方面严格划清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界线，也就是封建主义和人民的界线；'用快刀切豆腐的办法'当然不成，但的确是要达到'封建主义和人民是光光净净地各在一边'的目的。正在那个时候，胡风却站出来这样戟指怒骂，这究竟是什么用意，难道不是很可怀疑的吗？"这就是指胡风站在地主阶级一边，反对土地改革了。

胡风谈到创作实践过程时说，作家深入生活时，应注意人民既有解放的精神要求，又有几千年精神奴役的创伤，"作家深入他们要不被这种感性存在的海洋所淹没就得有和他们底生活内容搏斗的批判的力量"，"这就是思想的武装"。胡风的意思不可谓不明确。舒芜却批判说："这是鼓动作家去向人民'搏斗'，也就是'革'人民的'命'。""胡风认为，中国人民的敌人、革命的对象不是国内外反动派，而是人民自己身上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是有着这种'创伤'的革命人民及其领导者。"

胡风在《论现实主义的路》中描述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道路时说，五四以后开始的"以反封建为基础内容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以社会意识为先锋的社会斗争"，其基本内容就是人民创造历史的解放要求从自在状态进到自为状态的历史，同时也是冲破封建意识奴役的过程。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必须以"对于精神奴役的创伤的痛切的感受"为基础。"那精神奴役的创伤，当'潜在着'的时

① 《胡风评论集》下册，第 349 页。

候，是怎样一种禁锢、玩弄、麻痹、甚至闷死千千万万的生灵的力量，当'拓展着'，特别是在进入了实践过程的成员身上拓展着的时候，会成为一种怎样的虐杀千万生灵的可怕的屠力。是不是如此，三十年以来的光辉而又痛苦的鲜血淋漓的历史道路当会站出来作证的。"① 这本来是提起人们对于封建意识的危害的注意。舒芜是怎样批判的呢？他说："这一段话，正如邵荃麟同志已经指出的，是用杀气腾腾的笔锋写下来的。很显然，这支杀气腾腾的笔锋所写下的是一段讨伐中国革命人民的'檄文'，是在宣布中国革命人民的'罪状'。这段'檄文'或'罪状'的要点有五：一、认为革命的'基本内容'，不是现实社会中活生生的人民群众——物质财富的生产者要求解放，不是社会生产力要求解放，而是一种抽象的'解放要求'在那里要求解放。十足的主观唯心论！二、认为革命运动发展的过程，不是革命阶级在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战线上向反动阶级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过程，而是人民自己身上的'解放要求'在人民自己身上'突围''挣扎''向前发展'的过程。十足的神秘主义！三、认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为革命的群众所掌握时就成为物质的力量，而是'人民底创造历史的解放要求'在人民自己身上'从一层又一层的沉重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下面突围出来，解放出来，挣扎出来，向前发展'，就一下子'变成物质的力量'。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多么坚决的拒绝！对自发性多么狂热的崇拜！四、认为'解放要求'还不是最主要的，真正主要的乃是'对于精神奴役的创伤的痛切的感受'和'火一样的仇恨'，而'解放要求'还要依靠这种自痛自恨才'成其为解放要求'。简直看不出这和天主教神父所宣传的从'忏悔罪孽'产生'解脱要求'有什么区别！五、千言万语，最后是为了宣布两条罪状：一个是，'精神奴役的创伤''禁锢、玩弄、麻痹、甚至闷死千千万万的生灵'；另一个是，'精

① 《胡风评论集》下册，第349、350页。

神奴役的创伤’‘在进入了实践过程(即革命斗争过程。——芜)的成员(即革命人民及其领导者。——芜)身上拓展着的时候’,就成为‘虐杀千万生灵的可怕的屠刀’,三十多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道路据说就在这把‘屠刀’的屠杀之下成了一条‘痛苦的鲜血淋漓的历史道路’,据说它还‘会站出来作证’,替胡风来控诉革命人民及其领导者曾经怎样地‘虐杀千万生灵’。胡风就是这样‘鲜血淋漓’地诬蔑了中国人民,诬蔑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进行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那种咬牙切齿的声音,充分表现出反动资产阶级对革命人民‘火一样的仇恨’。”

舒芜的这些话,直斥胡风为“反革命”。应当注意,这篇文章写在第一批材料发表前一个月,那时对胡风的批判,主要还限于文艺思想的范畴。

笔者不惜篇幅引用舒芜言论,并不完全是为了证明舒芜已经丧失了起码的人格与道德,同时也是为了展示一下,当年的政治批判运动是怎样肆意曲解人的言论,然后将反革命的罪名强加于他的。

此时的舒芜,忏悔的心理已经消失,那无所顾忌地、有意地歪曲胡风言论,抢在他人之前加之以“反革命”罪名的作为,说明他已经在刻意用较之其他批判者更加极端的态度和语言,显示自己反戈一击的坚决。这条不归之路的下一步,就是完全接受林默涵的建议,根据胡风给他的信,编成了《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毛泽东审阅时把“小集团”改为“反党集团”)。这一践踏传统道德出卖朋友的可耻之举,正如他在胡风冤案平反之后所说的,把“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友人,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望我的胡风”,送上了十字架。

舒芜为消灭胡风“反革命集团”立了大功。这件事情蕴涵的意义并不简单。驱使舒芜叛变的因素主要是忏悔与自救。忏悔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心态。当时,执政党有意营造

一种个人不可抗拒的社会的、政治的、舆论的环境,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引导知识分子否定既往,认同现实,特别是认同马克思主义。在这样的形势下,不少人的检讨确有无可奈何、不得已而为之的成分,但是,大多数人的忏悔是曾经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以原国统区进步文艺工作者而论,他们曾经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中开拓和发展了进步文艺事业,启发、教育千百万青年投入革命。然而,当他们看到打着腰鼓同解放大军一起进城的文工团员,看到着军装、穿草鞋、裹绑腿、怀里揣着草纸簿的解放区作家时,不少人的心头却因没有亲身投入那实实在在的流血斗争而掠过一丝淡淡的自卑和愧疚。在对革命胜利的感性观察中,他们似乎看不到自己为之做了什么。新中国成立后,对国统区进步文艺工作的贬低,对著名文艺工作者的批判,对解放区文艺的夸大性颂扬,进一步动摇了他们对于自己的实在历史的自信。从自卑、自疑发展到对自己的历史的思想与实践的全面否定,是一个可以用心理学作出圆满解释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

真诚的忏悔是向真理投降,无论这种忏悔是否陷入过误区,它决不是耻辱的事情。自救也可以理解,因为它是个体在危险与困难的环境中求生存的本能行为。然而,自救有多种方式。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的自救,多以损害他人、出卖师友为途径。从舒芜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发生过多少背弃做人处世的起码道德,以牺牲他人换取自我生存的罪恶,而这些罪恶无一例外都是在"向真理投降"的名义下进行的!对于类似的可耻行为,用天平的"一边是中共和毛公,一边是胡风,会看出谁轻谁重"、为什么"恨犹大,不恨送人上十字架的总督"之类的话为之开脱,客观上是宽恕和怂恿或自觉、或盲从地"向井口投掷石头"的罪过,对于

反思历史、反思自身，促进知识分子人格与道德的完善，又有何益[①]？

7.5　欲加之罪：胡风集团的三批材料与按语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舒芜在林默涵指导下从胡风给他的100多封信中摘录编排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史称第一批材料）。胡风问题的性质骤然升级。17日，胡风被逮捕[②]。5月24日、6月10日，发表第二批、第三批材料。这三批材料，由胡风和"胡风分子"的数千封通信中的169则片断组成。它不仅作为"反革命"的"铁证"，使胡风和一批知识分子蒙受不白之冤，而且开创了以私人通信、日记、言论等定人以罪的恶劣先例，严重地侵犯了公民权利，破坏了共和国的法制。

三批材料的编排与注释手法别具匠心，采取断章取义，移花接木，知错就错，无中生有的手法，通过加注的方式"画龙点睛"，随心所欲加人以罪。对此，若干当事人和研究者已经作了揭露。这里不妨试举几例。

1947年，胡风的朋友、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被国民党逮捕。胡风曾听说过贾认识国民党上海警察局长陈焯，便致信阿垅，让他利用国民党方面的关系去找陈焯，请陈保释贾植芳。阿垅不认识陈焯，没有去找。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营救革命同志、进步人士，本是党在白区工作中常用的方法。第三批材料摘录胡风给阿垅的信后注释："从这些信里可以看出胡风及其集团分子同国民党特务们

---

① 在批胡风、肃反、反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屡遭苦难的胡风的老朋友聂绀弩先生，就是这样为舒芜辩护的。见周健强编《聂绀弩自叙》，团结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505—507页。

② 关于胡风被捕的日期，有16日、17日、18日凌晨等几种说法，但先逮捕后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是无疑的（胡风是四川选出来的全国人大代表）。

的亲密关系。"[1] 这是望风捕影的手法。

1944年5月13日，绿原致信胡风，说"我已被调至中美合作所工作，地点在磁器口；航委会不去了"。这段历史，早在1950年绿原党籍转正的时候，组织上已经作了调查，证明他根本没去中美合作所。第三批材料的注文却说："谁能够把绿原'调至'这个特务机关去呢？特务机关能把谁'调'去'工作'呢？"[2] 这样，绿原就成了打进共产党内的特务分子。这是知错就错的手法。

1950年7月27日，年仅20岁的文学青年张中晓在给胡风的信中说："二年来，我脾气变了许多，几乎恨一切人……对这个社会秩序，我憎恨。"乍一看，此话反动之极。实际情况是，张中晓长期患有严重的肺病，当时动了手术，"周围所见的小市民的某些封建意识使得他的心理十分悲观和愤怒"。他的信的一段话解释了他为什么憎恨一切。他说："二年来，我躺在床上，家中情形也不甚好，我是用最大的力量战胜肺结核的，我想，这是我恨一切的原因。二年来，我所受的苦难比从前的一些日子多，我懂得了什么叫做贫穷！什么叫做病！什么叫做挣扎！""材料"编排者把这段关键性文字删而不取，而给人以张憎恨新中国的印象[3]。这是断章取义的手法。

1944年3月27日，胡风致信舒芜说："我后天下乡，但来月十三四又得来。这中间，得挤出一篇八股文……要做商人，只得和对手一道嫖赌，要在这圈子里站着不倒下，也就不得不奉陪一道跳加官！……既如这几年的跳加官罢，实际上应该失陪，或者简直跳它一个魔鬼之舞的，但却一直混在蛆虫里面。"第一批材料的注文说，"跳加官""指参加当时进步文艺界的活动……这里，胡风竟恶毒地

---

①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人民出版社1955年6月版，第90页。
②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第92页。
③ 晓风：《胡风的私人通信如何成了罪证》，《百年潮》，1998年第4期。

把进步文艺界的人们称为'蛆虫'"[①]。胡风的女儿晓风查阅了胡风日记,证明胡风说的"八股文"是为文协年会写的论文《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这就证明了胡风所说的"对手"和"蛆虫"是国民党的文化官僚,"跳加官"当然也不是"进步文艺界的活动"[②]。这是利用复杂的历史情况移花接木的手法。

1952年6月9日,胡风在致路翎的信中说:"斗争未有不用血可以得到的。血流得不少了,但以后就可以学得战术一些,尽量少流,宁愿在空气坏的洞中多待,'保存力量'。"这是针对当时胡风和胡风朋友们的作品一再受到批判,发表和出版十分困难的情况而说的。"材料"的注文却说:"这是一九五二年的信。这时,不但国内革命局势日益巩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局面也已确定,反革命已经失败,所以胡风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想要'学得战术一些','保存力量',以待时机。"[③] 这同样是移花接木的手法。

三批材料使用的胡风与"胡风分子"通信,多数是议论文艺与文坛问题的。胡风与周扬、何其芳、茅盾等人长期对立,新中国成立后关系更加恶化,胡风和"胡风分子"们处境艰难,因而在私人通信中必定会流露极端不满乃至愤慨的情绪。胡风为人诚实,心胸坦荡,从无防人之心;个性倔强,近于偏执;捍卫自己认定的思想与原则,大有不惜与天下人为敌的气概;文风泼辣,语言尖锐(有时近于尖刻),表达感情毫无遮拦,大有鲁迅遗风。这就为"材料"的制造者提供了绝好的条件。胡风不必说,受到牵连的"胡风分子"也都是革命的、进步的青年。他们的通信除了含有对文艺领导人、一些著名文化人士、某些中央领导人不满的言论外,也表达了对党、对新中国、对新社会的真诚热爱。"材料"的炮制者了解这些情况,

---

①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第14页。
② 晓风:《胡风的私人通信如何成了罪证》,《百年潮》,1998年第4期。
③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第63页。

但他们对正面材料弃而不取，采取如此手法编排出误导性的材料，不能不使人怀疑这是欲加之罪。"材料"的重要炮制者林默涵承认，如此处理过的私人信件，是毛泽东将胡风"小集团"定为"反革命集团"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给予胡风事件以空前的注意，为三批材料和《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写了大量的序言、按语和注文，亲自确定了胡风的反革命罪名。今天看来，即使毛泽东不十分了解文艺界的历史与现状，不十分了解胡风的思想与实践，又受到林默涵等人编排的材料的误导，他写下的那些令全国人民震惊的序言、按语和注文，也不能不说是严重的错误。

首先应当肯定的是，序言、按语和注文，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如胡风在1949年5月30日致路翎的信中说："文艺这领域，笼罩着绝大的苦闷。许多人等于带上了枷，但健康的愿望普遍存在。小媳妇一样，经常怕挨打的存在着'。"即使就信按信，这段话所指系文艺问题也非常明确。毛泽东却注释说："健康的愿望，指反革命的愿望。普遍存在，指反革命分子各处都有。当时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已解放的地方还没有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但反革命分子已感到很不自由，故说像'小媳妇一样，经常怕挨打的存在着'。"[①] 绿原本来就是党员，1950年只是按期转正，当时事实就是清楚的。毛泽东却在按语中说，绿原解放前曾经一度钻进我们的地下党组织，因潜逃失去党籍，1950年又被接受为党员[②]。这样完全不符合事实的错误，大量存在于按语和注文之中。

熟悉自胡风事件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历史的人们都会记得，按语中的不少话成为"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经常为人们背

---

①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第48、49页。

②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第103页。

诵与引用的名言。就按语的政治影响来说，至少有三点：一是对“舆论一律”的缺乏确定性的解释。毛泽东说：“胡风所谓‘舆论一律’，是指不许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意见。这是确实的。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①] 这种解释表面看来并无错误，实践却证明，由于不存在准确、明确、详尽的法律规定，所谓“反革命意见”的认定，不免有相当的随意性。二是实际地确定了反对党的领导人甚至是某一领导人，反对党的某一理论、某一政策，就等于反党，反党等于反革命，就应当受到专政镇压的政治逻辑。三是对公民通信自由的侵犯。号召与胡风有联系的人把私人通信交出来，并以私人通信作为定罪的根据，直接违反了仅仅一年前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36年后，巴金老人在为《巴金书信集》作的序中说：“私人信件可以随意公开，断章取义，任意定罪。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胡风集团’的三批材料，我学习过多次，也发过不少批判谬论，但是我至今还不明白一些文人写给朋友的信件会变为‘毒品’，流着一滴滴的血，残害人的生命。这以后谁还敢写一封信？”[②] 可见这个事件影响之深。对于后来政治运动中随意曲解人们的言论，然后强加以政治罪名的恶劣风气，三批材料和按语是负有极大责任的。

毛泽东写作序言、按语和注文的具体过程，我们知之甚少。然而，他精心写出那样尖锐、激烈、富有战斗性和感染性的文字，把胡风问题提到如此惊心动魄的高度，当然有明确的政治意图。他在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写的《序言》中说得很清楚：“我们所以重视胡风事件，就是要用这个事件向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向具有阅读能力的工作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向他们推

①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第68页。

② 《巴金书信集》，第1页。

荐这个‘材料’,借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这个‘材料’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十分引人注意。反革命分子固然注意它,革命人民尤其注意它。只要广大的革命人民从这个事件和材料学得了一些东西,激发了革命热情,提高了辨别能力,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会被我们一步步地清查出来的。"[①]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认为"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②]。毛泽东是一个政治家,他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包括对一些重要人物的处理,历来着眼于政治上的战略需要,并不顾及细节问题。把胡风问题"尖锐化",是有意所为。他的目的不是打倒一个胡风,更不是像有人所说是对张中晓称《讲话》为"图腾"的报复,而在于引起人们对于"不拿枪的敌人"的注意。

7.6 集体人格:声讨胡风浪潮中的文化名人

《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发表后,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迅速变成了对"反革命集团"的声讨。在5月中旬以后两个月的时间里,全国所有的报纸刊物完全为狂潮般的声讨文章所覆盖。社会各界的大小名人、代表人物,包括许多劳动模范、战斗英雄、少数民族代表、宗教界人士纷纷表态,声讨反革命的胡风,要求对胡风和"胡风分子"给予严惩,甚至处以"极刑"[③]。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加入了声讨的行列。幼儿园的阿姨们向孩子们讲述胡风的"罪行",代表孩子们"请求政府依照国家大法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给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70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109页。

③ 刘白羽在中国作协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说,1955年全国各报刊共发表批判和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文章2131篇,其中中国作协会员写的有544篇,发表时间多在"材料"公布之后。

以坚决无情的镇压"[①]。《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成了全国的人人必读之书，上海一地竟创下日销33万册的记录！

文化界、科学界、教育界的上层人士起了带头和推波助澜的作用。5月25日，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议，决定开除胡风的作协会籍，撤销他在文艺界的一切职务，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撤销他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请求最高法院依法惩处。在这个有700多文艺界名人参加、26人发言的大会上，惟有美学理论家吕荧教授走上台去为胡风辩护，受到全场一致斥责并被当场逮捕。6月1日至10日召开的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通过建议政府依法严惩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决议，这是科技界精英们的表态。

当年的上层知识分子，鲜有在这场声讨巨浪中保持沉默的。为了使今天的青年对当年声讨浪潮之大获得一些感性认识，冒昧地列举一些曾参与声讨运动的文化界、教育界、科学界名人的名字，也许不无意义。据笔者抄录，当时仅在《人民日报》、《文艺报》发表过声讨文章的知识界名人就有：郭沫若、茅盾、夏衍、冯雪峰、老舍、曹禺、叶圣陶、郑振铎、钱钟书、康濯、刘白羽、艾青、欧阳予倩、沙鸥、钟敬文、焦菊隐、刘绍棠、张庚、舒群、林向北、彭慧、马少波、杨朔、吴组缃、吴祖光、张天翼、田间、吴伯萧、金仲华、沈志远、冯至、丁玲、魏金枝、巴金、蔡美彪、周立波、草明、李伯钊、金近、曹靖华、罗荪、巴人、马彦祥、何家槐、柳溪、冯亦代、许广平、罗烽、白朗、王朝闻、臧克家、李季、陈学昭、楼适夷、陈白尘、胡可、陶孟和、靳以、舒新城、玛拉沁夫、方纪、以群、阮章竞、柳青、陈伯吹、吕复、刘知侠、陶纯、邓初民、王家楫、黄子卿、袁文殊、赵树理、许杰、柯仲平、李达、林汉达、廖世承、廖井丹、萧三、沙汀、马加、马哲民、赖少其、王亚南、陈垣、翦伯赞、侯外庐、尚钺、吴晗、罗常培、黎锦熙、钱

① 《广大教师学生一致声讨胡风》，《人民教育》1955年第7期。

端升、李準、峻青、孟超、赵朴初、冯乃超、李广田、宋之的、俞平伯、朱光潜、冯友兰、贺麟、许崇清、丰子恺、华君武、刘开渠、吴作人、叶浅予、古元、马思聪、瞿希贤、郑律成、梁思成、茅以升、钱伟长、赵忠尧、侯德榜、苏步青、华罗庚、卢于道、金善宝、梁希、施今墨、林巧稚、钟惠澜、梅兰芳、周信芳、蔡楚生、黄钢、于睛、于伶、于蓝、孙维世……他们仅仅是参与声讨胡风的知识分子的极小一部分，却足以代表整个知识界。

胡风事件发生的时候，社会仍处在革命改造的时期，人民群众在长期阶级斗争中形成的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尚未消退。当胡风被正式宣布为反革命，三批材料又提供了“确凿”证据的时候，人们激于革命义愤，奋起声讨胡风，是自然的事。对于胡风事件以及类似悲剧的演成，整个民族和人民是负有责任的。然而，我们没有理由过分责备普通工农群众，也不能过分责备那些对胡风的思想与历史一无所知的知识分子。对于那些熟悉胡风文艺思想及历史的文化名人们，则应另当别论。我们来看看一些文化名人是如何声讨胡风的。

郭沫若说：“像胡风这样的人，他二十年来，一贯地在革命的内部进行反革命的破坏工作，这是明知故犯、怙恶不悛的最顽恶的反革命分子。在今天对这样的反革命分子，我个人认为，应该严厉地镇压，比几年前镇压反革命的时候要更加严厉地镇压！”“好些朋友都提到，我们的警惕性太低了，的确是。以我个人来讲，认识胡风二十多年了，一直没有感觉到他是这样一种反革命的破坏分子。我们可以说，二十多年是和豺狼一道睡觉。”[①] 郭先生主张处胡风及“胡风分子”以极刑。

茅盾说：“我很早就认识胡风，在胡风刚从日本回来，混进左翼作家联盟的时候，就和他打过多次交道，可是在那时，我仅只觉得

① 《严厉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文艺报》，1955年第11号。

这个人骄傲尖刻，自命不凡，处处想称霸；而直到鲁迅先生逝世前卧病的一段时间内，冯雪峰同志把胡风在鲁迅先生那里所进行的挑拨离间的罪行告诉我的时候，我亦仅觉得这个人品质十分恶劣，为了达到个人野心，可以不顾大局，而还没有怀疑到他别有来历；到抗战后期，胡风集团明显形成，而且愈益猖獗，可是那时我也还以为这只是文艺上的小集团，是一些自命不凡，狂妄的野心家。"第三批材料证明"胡风其人自始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真走狗；胡风本人和他的集团内的骨干分子的履历，都是丑恶已极，见不得人的；胡风和他的集团分子长时期以来所进行的反党、反人民的罪恶勾当，都是狡诈，阴险而且狠毒，十足是美蒋训练出来的特务的嘴脸和手法。"①

夏衍说："二十多年以来，对于胡风及其一派人的思想言论，我们是不是一点也没有察觉到他们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在反对党的文艺方针呢？应该说，早已察觉到、认识到、而且也作了斗争的；对这一派人的行动作风，是不是一点也没有感觉到诡秘、狡诈、不正常呢？应该说，很多人是感觉到，而一直认为难以理解的；对胡风这个人的政治背景，是不是一直没有怀疑过呢？也应该说，早已怀疑过的。在抗日战争前怀疑过，在重庆时期怀疑过，去年他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发言之后，更是一直怀疑着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怀疑过，有没有斗争过，而在于我们缺乏足够的政治警惕性，没有彻底弄清楚这一派人的政治本质，所以直到最近为止，我们始终只把他们当做思想上的异己分子，而没有认识他们是巧妙地隐藏在我们队伍里的最阴险的政治上的敌人。"②

---

① 《提高警惕，挖尽一切反潜藏分子》，《文艺报》，1955 年第 11 号。

② 在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55 年 5 月 27 日。

老舍说："我认识胡风已快二十年了，应该说是老朋友了。二十年来我总以为他的毛病不过是心地偏狭，目空一切而已。看了舒芜先生发表的'胡风书札'，我才知道原来胡风并不只是心地偏狭，而是别具心肠。原来他把他的小集团以外的人，特别是共产党，都看成敌人啊！他的文章里引证了多少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的名言呀，可是他要用'铁筋皮鞭'毒打党内作家和进步作家们，杀人不见血！这是甚么心肠呢？我猜不透！我只能说，除了受过美蒋特务训练的人，谁会这么想一想呢？看了那些信札以后，我才知道胡风原来并不只是目空一切，而是要镇压革命，去做文坛的暴君！他哪里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才真是他的思想与实践的基础！我看不懂他的文章；现在，由他的信札里却看懂了他的心，一颗极端狂暴狠毒的心！怪不得他老说'自我扩张'，扩张自己好毒打别人啊！"①

丁玲说："读了十三日的《人民日报》上的舒芜所揭发的材料，胡风给他的一部分信件，我是怎样也无法继续我的日常工作了，真是令人毛骨悚然！敌人在哪里？敌人就在自己的眼面前，就在自己的队伍里，就在左右，就在身边，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二十年来，胡风始终成为我们文艺工作者中的一个不容易团结，也不容易说服的人物。""他仇恨着党，他自然要仇恨的，因为共产党、共产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反对个人野心。他恨党员作家，特别是担任负责工作的，他恨批评过他的人，恨一切进步人士，连为民主运动而牺牲在美蒋特务血手下的闻一多也不放过，因为这些人是党员、党的拥护者和追随者。""不是我们党的文艺工作者对他有什么宗派，而是胡风从骨子里恨所有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作家。谁担任负责工作了，他就骂谁，谁批评他了，他恨谁，谁有了成绩，对人民有贡献了，他看不起谁。""他同样从思想深处反对我们党的负责同志

① 《提高警惕，揭露胡风》，《人民日报》，1955年5月21日。

的。"胡风是"埋伏在我们左右的敌人"[①]。

曹禺说："我们要问，'胡风，你的主子究竟是谁？你的后台老板究竟是谁？'让我提一个线索吧。当胡风向党和党领导的文艺战线发动了猖狂进攻以后，不久就传来了台湾广播的热烈的响应，和胡风一样，甚至连胡风的词句都完全保存着，无耻地重复着胡风对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的污蔑。"胡风和胡风集团分子"必须老老实实交代出来，你们的主子究竟是谁？如果台湾之音所代表的不是你们的主子，那么，你们还得要明白交代，另外的什么反动势力是你们的主子？"[②] 读了第三批材料，"果然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走狗"[③]。

邓初民说："我虽然和胡风有朋友关系，总是格格不入，老实说，老早我就认为他是一个坏人。""老早，我就认为他是一个坏人，不过很肤浅地认为他仅仅是一个阴险、狡猾、不正派的坏人，今天从所揭露的材料看来，显然他是一个吃人肉喝人血，'拿别人养活自己'的坏人，企图'用橡皮包着钢丝'的鞭子鞭打党与人民和进步作家的坏人，拿着'剑'等待'时机'，准备割下头颅，击碎'革命'铁壁的坏人。"[④]

田间说："二十年前在上海的时候，由于自己的幼稚无知，和一条恶狼交了朋友，把他的'鼓励'当做是好意，而不知道这是别有用心。这几年来，他在几次会议上对我所下的攻击令，就可以说明。由于我没有把他的'鼓励'当成一个枷锁，永远套在身上，并且反对了他，因而引起他的愤怒。现在看来如果不是我较早地参加了党，在党的领导下工作，我就有可能被这条恶狼拉走的。""现在我必须

---

① 《敌人在哪里》，《人民日报》，1955年5月23日。
② 《胡风，你的主子是谁?》，《人民日报》，1955年5月28日。
③ 《凡是敌人最害怕的，我们就要做!》，《文艺报》，1955年第11号。
④ 《再一次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人民日报》，1955年6月11日。

说明，在胡风评论我的早期创作以前，我已经得到其他同志很多的鼓励，我已经参加了'左联'。真正引导我走上革命文学道路的，始终是我们的党，共产党。"①

艾青说："我一口气看完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心被仇恨窒息得几乎喘不过气来。"胡风集团"是一个集合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特务分子，反动军官，托洛茨基分子，革命叛徒，自首变节分子的坚决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的反革命集团；他们冒充'党员'、'革命作家'、'进步理论家'，长期埋藏在我们革命阵营内，施展各种阴谋活动，企图从我们内部来进行破坏，以待反革命统治的复辟！"②

柳青说："我以前没看完过胡风一篇文章，他的《意见书》是头一次看完了。我的感觉是看了一个糊涂蛋写的东西，怎么也不能理解。"他揭发说，解放初胡风对他"很亲热"、"真诚"的样子，无非是想拉拢他。胡风分子刘雪苇把"不正确地"捧他的《种谷记》的文章附在他那本有许多荒谬观点的《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的书后边。"我看过那篇文章，我看出那里面隐藏一个卑鄙、阴险的动机：企图拿我那本显然不成熟的习作，来抹煞另一位作家的作品。"除胡风以外，以后"也还有没到过延安或在延安时间很短的个别同志问到我和雪苇的关系，我总有股说不出口的被污辱的感觉；因为我自信我自己思想上纵有许多缺点，同他总是有区别的"③。

许广平说，胡风这个"敌人是非常狡猾的，他用'贼喊捉贼'的办法，混在我们的队伍里，说我们的言语，把我们欺骗了二十多年，鲁迅先生生前也未能识破他的阴险面目。这个反革命分子利用了当时在白色恐怖下，鲁迅先生所处的不自由环境，进行挑拨离间，

---

① 《胡风——阴谋家》，《人民日报》，1955年5月21日。

② 《坚决镇压反革命匪徒》，《文艺报》，1955年第11号。

③ 《必须刨根》，《人民日报》，1955年6月7日。

影响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妄图削弱革命的力量。可惜鲁迅先生死得太早了，没能活着看见这个反革命分子的暴露和受惩治”。“胡风和他的反革命分子，过去写了一些研究鲁迅的书，表面捧鲁迅，骨子里却在歪曲鲁迅、反对鲁迅，我因为没有学好马列主义，过去对他们的伪装分辨不出来。”①

朱光潜说：“剥去胡风的外衣来看胡风，我认为他在文艺上所站的立场和我过去所站的相差并不很远，都是从主观唯心主义那个老祖宗传下来的，所不同者我的主观唯心主义是赤裸裸的，他的主观唯心主义是有层层伪装的；我过去完全站在反动的阵营，胡风据说很早就是站在革命一边的。”②

以上12位先生，以与胡风的关系而论，大体可分为几种类型。郭沫若、茅盾、夏衍同胡风长期存在矛盾，但是，他们同为左翼文坛的重要人物，对胡风是不是历史反革命，三位先生，特别是茅盾、夏衍，应十分了解。郭、茅二位长期不认为胡风是反革命。夏衍大概和周扬一起因1934年左联成员、诗人穆木天被捕出狱后对胡风的诬陷而怀疑过胡风的政治背景，但是经过了20年的时间，不是也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而且应当从胡风20年如一日在党的领导下工作的历史中得出结论吗？怎么就在前两批材料并未提供任何直接证据的情况下随声附和说胡风是反革命呢？

老舍、丁玲、曹禺、邓初民是胡风的朋友。其中，老舍是胡风最敬重的朋友，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他们朝夕相处，一起工作。对胡风的政治历史、文艺思想、文艺活动，老舍先生一清二楚，现在，他却说胡风的主子是国民党蒋介石！邓初民长期与胡风保持私人交往，他的话更是经不起推敲。既然“老早”就认为胡风是一个“阴

① 《对待敌人不能再宽大》，《新观察》，1955年第12期。

② 《剥去胡风的伪装看他主观唯心论的真相》，《文艺报》，1955年第9、10号合刊。

险、狡猾、不正派"的坏人，为什么又能建立和长期保持"朋友关系"？在胡风朋友们的表态中，丁玲比较缓和。她把胡风的活动说成宗派活动，把宗派上升到反党，而不直接承认胡风本来就是历史反革命，"笔下留情"的痕迹非常明显。

田间、艾青、柳青属于被胡风及"胡风分子"扶植过、"吹捧"过的人。田间是最典型的人物。他是"七月诗派"的重要人物，可以说是胡风一手栽培起来的。胡风最早向读者介绍了这位"在我们来说算是'小孩子'的十七八岁的年轻人"[1]，不顾一些人的冷嘲热讽，同闻一多一起给予田间高度评价。田间去了根据地以后，胡风通过各种途径，密切关注他的创作。40年代，胡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编辑出版《七月丛刊》，为田间出版诗作两种。直到1949年，田间还在通信中称胡风为"我的民族的理论家，我的引路人"。现在，田间竟然说"由于自己的幼稚无知，和一条恶狼交了朋友"！难道世界上有如此厚爱革命青年、竭尽全力培养革命文学青年的反革命分子吗？在革命义愤、盲从心理、自保取向、政治压力的综合作用下，几乎所有曾经为胡风所介绍、所赏识、所称赞因而有可能"堕"人胡风"反革命集团"深渊的人，都在努力地表白和洗刷自己，同这个"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柳青先生的那段话，难道是言之成理的吗？至于艾青，他那曾经为胡风大加赞赏并积极推荐的诗笔，此时已转而为掷向胡风的"投枪"了。

许广平先生处在特殊的地位。她一生都在为保卫鲁迅的形象而战斗，而且新中国成立后的战斗似乎并不比新中国成立前的战斗更轻松。胡风的为人，胡风同鲁迅的关系，胡风、鲁迅同周扬等"四条汉子"的矛盾，她是清楚的。现在，为了保卫鲁迅的形象，她却不得不把胡风说成是一个大骗子。冯雪峰等30年代同鲁迅先

---

[1] 胡风：《〈中国牧歌〉序》，《田间研究专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11页。

生比较接近而同周扬们比较疏远的人，也都异口同声地这么说，并斥责胡风挑拨鲁迅同党的关系。后来冯雪峰被周扬打成右派，牵涉到鲁迅答徐懋庸的信，许先生只好又出来斥责冯雪峰(就算实际上针对周扬也罢)。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每当鲁迅先生的密友遭到清算，许先生都要如此这般地在鲁迅先生与这些“反革命分子”、“反党分子”之间划一道界限。在“左”的错误横行、文坛积怨深重的情况下，为了大局，也只能把胡风一类人说成是骗子，而鲁迅先生则是那被骗的人，这在许先生内心深处，必定也是痛苦万分的。

朱光潜先生(还有冯友兰、贺麟等人)属于民主革命时期“站错了队”的人。他撰文批判和声讨胡风，固然是为了表明政治上进步的姿态，却未免滑稽可笑。且不论学术思想的异同，他过去与胡风根本就是两个敌对阵营中的人。朱先生曾经是胡风和“胡风分子”斗争的直接对象之一。今天，在国共两党拼死搏杀关头站在反革命阵营一边的朱先生却站出来说：“你我彼此彼此，都是反革命！”笔者引用上面这篇材料，意在说明当年声讨运动之荒唐透顶，绝无贬斥朱先生的意思，因为在朱先生说来，也不过是“向真理投降”而已。

当时公开发表的一些文章、报道，隐隐透露出，“材料”发表后，仍然有人怀疑胡风是不是反革命。普通群众中尚且存在这样的情况，在知识分子特别是上层知识分子、文艺界知识分子中绝不会不存在。然而，除了吕荧以外，我们还没有听说当年有其他公开出来主持公道的著名人士。历史唯物论重视历史环境，但是，“特定历史环境”、“革命义愤”、“违心之论”、“不得已而为之”，不能成为解释当年的过错、推托一切责任的充分理由。诚实，坦白，实事求是，心口如一，视他人的生命与荣誉如同自己的生命与荣誉，是一个正直、高尚、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的起码品质。盲从本身就是严重的错误。屈服于政治压力，违心地附和将无辜的人送入地狱的罪行，是道德的堕落。为了自救而不顾事实“反戈一击”，则是不可宽恕

的罪过。这样的责备难道是过分的吗?

胡风冤案的铸成,主要由政治家负责,知识界亦难辞其咎,因为知识分子群体在应当声张正义的时候没有声张正义,应当保持沉默的时候没有保持沉默。中国知识界在胡风事件中的表现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因深受封建传统文化束缚而失去独立思考和独立行动能力的弱点,照出了几千年专制统治造成的中国知识分子屈服于政治权威、不敢坚持真理、不敢忠于事实的懦弱性格,照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因长期缺乏基本人权保障而形成的"口是心非"的"两面人"的人格。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群起批判,正是这种人格的即兴表演。

巴金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当年他也曾附和过对胡风的声讨。尽管他当时发表的几篇短文的措辞、语气都比较缓和,在那梦魇般的日子过去后,他在 1986 年 8 月写下了《怀念胡风》一文,对当年的作为作了真诚的忏悔。他说,当时报刊约他写批判文章,他是"能推就推,不能推就应付一下,反正我有一个借口,'天王圣明'"。然而,

> 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审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1]。

巴金说,他还写过一篇批评路翎的《洼地里的"战役"》的文章,当时并无伤害作者的心思。

---

[1] 《随想录》,三联书店 1987 年 9 月版,第 885、886 页。

> 可是运动一升级，我的文章也升了级。我不知道他的近况，只听说他丧失了精力与健康。关于他的不幸的遭遇，他的冤案，他的病，我怎样向后人交待？难道我们那时的文艺工作就没有失误？虽然不见有人出来承认对什么“错误应当负责”，但我向着井口投掷石块就没有自己的一份责任？历史不能让人随意编造，沉默妨碍不了真话的流传，泼到他身上的不公平的污水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是为了那些“违心之论”我绝不能宽恕自己[①]。

新中国建立后前30年的知识分子历史，是充满悲剧色彩的。前一运动的批判者，后一运动就会变为被批判者；躲过了反右派运动，却难逃“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上述12位先生中，丁玲、艾青成为右派，老舍“文革”中自沉太平湖，夏衍终遭牢狱之灾，郭沫若以公开表示自己的所有作品都应烧掉以自保，茅盾何曾有过一天的舒心！许广平先生为保卫鲁迅身心交瘁，朱光潜终不过是“牛鬼蛇神”，曹禺、田间、柳青又何能逃脱极左势力的迫害！然而，我们不禁要问：几近灭绝种群的苦难和悲剧有没有唤起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胡风平反后恢复了同除舒芜以外的几乎所有朋友们(包括那些当年批判过、声讨过他的朋友们)的友谊，而当年那些或自觉、或被迫、或真心、或违心地“向着井口投掷石块”，和政治家们一起把胡风及“胡风分子”送入牢狱的人们，能像巴金那样直面过去、虔诚忏悔的，又有几人？这不正说明中国知识分子至少在人格与道德的自我完善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吗？

---

① 《随想录》，第887页。

7.7 紧跟政治:声讨胡风浪潮中的诗歌创作

在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浪潮中,有两种类型的文艺作品出尽了风头,这就是漫画与诗歌。翻开当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新观察》等各大报刊,华君武、丁聪、方成、钟灵、沈同衡等人的作品处处可见;著名诗人沙鸥、艾青、李季、臧克家、马铁丁等则以诗歌为刀枪参加"战斗"。鉴于漫画不好作文字的描述,出版家出于印刷成本的考虑也不会赞同笔者去复制当年为世人喝彩不已的那些漫画,我们权以诗歌为例,说明当时的文艺是如何为政治服务的。

李季的诗《读了罪犯们的密信》:

读着这鲜血淋淋的罪犯们的密信,
你怎么会相信他们曾经被当作人!
仇恨使得我拿不稳手里的笔,
我一千倍、一万倍地憎恨他们!

揭开了他们的人皮的伪装,
露出了他们杀人犯的本相。
什么"作家""诗人""理论家",
原来是一群披着人皮的野狼!

他们竟是这样的阴险、卑鄙,
用"无耻"怎么能够形容他们的万分之一。
死在墨西哥的那条死狗也会自愧弗如,
他们的恶毒可真算得上"史无前例"!

罪犯们的罪行一定要彻底清算，
混进人群的野兽一定要坚决肃清。
为了社会主义，为了保卫我们的党，
必须把敌人坚决彻底地消灭干尽！[1]

袁水拍的诗《山歌三首》中的《两条舌头》：

一条舌头长，
一条舌头短。
舌头长，
骂够了人民，骂够了党；
舌头短，
结结巴巴，曲折隐晦不能说穿。

一条舌头红，
一条舌头黑。
舌头红，
“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
舌头黑，
“我用的是集束手榴弹战术。”

一条舌头毒，
一条舌头甜。
舌头毒，
“橡皮包的钢丝鞭打囚徒。”
舌头甜，

① 《文艺报》，1955年第11号。

“我追随革命二十年!”①

艾青的诗《把奸细消灭干净》:

最可怕的是戴着假面的人,
最可怕的是“阴暗的聪明”,
看他们外表也有人的模样,
但在身体里却是狗肺狼心;

什么是“革命的理论家”?
什么是“进步的诗人”?
有的来自“中美合作所”,
有的来自蒋介石的“剿共军”;

什么是他们的“真诚”?
——彻骨地仇恨中国人民;
什么是他们的“理想”?
——要把我们“一年肃清”!

这批毒蛇也真够疯狂,
居然钻进了我们的心脏;
为了破坏我们手建的天堂,
就挑拨离间,造谣中伤……

如今他们的外衣已被剥去,
妖魔鬼怪都露出了原形,

① 《新观察》,1955年第11期。

一个个躺在阳光的下面，
发黑的毒汁流淌在唇边……

这类东西不会“放下屠刀”，
也别想“在忍受中求得重生”！
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
就必须把奸细消灭干净[①]！

青年诗人邵燕祥在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浪潮中，写下了若干“战斗的诗篇”。其中，《就在这同一时间》，因其“艺术性”与“战斗性”的完美结合而得到很高的评价。

我问年轻的情人们，
你们可知道：就在这同一个时间，
你们刚寄出一封充满光明和热情的信，
相约在下一个星期天见面；
而胡风的老婆正把一批黑信，
丢进邮筒，急匆匆拐进了小胡同，
谢韬正从城外赶进城来，
跑到秘密接头的地点。

我问勘探队员，你带着新采的矿样，
从遥远的山野奔向北京，
你可知道：芦甸也挤上同一列车，
他是在领取胡风的指令。
我问工区主任，你正打开施工的图纸，

---

① 《文艺报》，1955年第12号。

看着、想着,抚摸着点点线线,
你可知道:一卷党内的文件,
已经暗地里送到了欧阳庄的手边。

我问同学们,傍晚你们走进图书馆,
在灯下摊开一天的笔记,
你们可知道:有一间密室里,
灯下是谁,在这同一个时间?
绿原,徐放,你一篇,他一篇,
替胡风偷抄党内文件;
这时在另一间密室的灯下,
正通过发展反革命组织的名单。

在同一个时间,远方的草原上,
航空磁测的飞机刚刚归来,
在炼出第一炉沸腾钢的炼钢炉旁,
大家谈笑着擦去满脸的汗;
你们可知道:胡风正在召开秘密会议,
一忽儿满脸狞笑,一忽儿暴跳如雷,
压低嗓门表扬,捶胸顿脚痛骂,
布置着:打进党,打进军队,打进文化团体和经济机关。

母亲们:你们的孩子睡得多么香甜,
别让他们作恶梦,这是你们的心愿,
这里,肥胖的小手,深深的酒窝;
那里,胡风在磨着牙齿磨着剑!
胡风得意地宣传:"时间开始了!"
但是我们并没有沉睡不醒:

“住嘴！结束了——你们的时间！”

……在我们广阔的国土上，
爱国的人民千千万万！
但是也决不只有一个胡风，一个阿垅……
也决不只有一个胡风集团。
亲爱的人们，提高警惕，
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不管他们黑皮黑心，红皮白心，阴脸阳脸，
不管他们潜逃到天边地角，
还是钻到了我们的堡垒中间①。

著名诗人沙鸥评价说：“在肃反斗争的紧张时刻，邵燕祥写了《就在这同一时间》。这首诗的主要优点是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与肃反斗争作了巧妙的、紧密的结合。这是诗人忠实于生活和在技巧上逐渐熟练的结果。诗人用从生活中得来的形象丰富了这首诗，使人不能不警惕，不能不仇恨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诗中鸣响着警钟似的声音。”②

邵燕祥并未忘记这历史上的一幕。在胡风平反昭雪十几年后的1993年，他在香港一家杂志上发表题为《何其芳的遗憾》的文字，文中说：

何其芳在《关于〈还乡杂记〉》中说过：“一个诚实的人只有用他自己的手割断他的生命，假若不放弃他的个人主义。”他说这话时是在1937年6月，他还没有投身到一个自觉的集体

① 《人民日报》，1955年6月30日。
② 《年青人火热的声音》，《文艺报》，1956年第1号。

中去。而何其芳在民族危机高涨的时分参加到党所领导的军事化的队伍以后,他曾不仅是诚实地而且是虔诚地放弃他的个人主义和他自认为或别人指称的个人主义。他会诚实地以至虔诚地捍卫他归属的集体和这个集体所宣称信奉的原则。

当我读着有关胡风案件的实录,在记忆中重现这一幕"阴暗的、污秽的、悲惨的"文字狱的时候,我又看到了何其芳的名字,何其芳的身影,并且仿佛听到了他在揭露、驳斥和控诉什么的声音。我相信他也还是虔诚地自觉作为一个集体的发言者,才有这样一往无前的理直气壮的气魄。

然而,那被宣判为反党和反革命的小集团头目的胡风,也是不满于旧日中国"阴暗的、污秽的、悲惨的"生活,并且为着人类、为着中国人民有一种合理的幸福的生活而奋斗的[①]。

何其芳在胡风事件中的作为固然是一场悲剧,青年诗人邵燕祥扮演的角色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不同的是,何其芳早逝,没有得到反思自身与历史的机会,邵燕祥有幸活到改革开放,终于大彻大悟,成为"左"的意识形态的激烈批判者。

诗歌、漫画以及其他一些灵活的文艺形式,战争年代是革命的武器,新中国成立后大量运用于政治运动,却自胡风事件始。对敌人的投枪变成了刺向自己人的匕首。胡风事件中的文艺实践证明,文艺为现实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不仅是荒唐的要求,而且最终是要取消和毁灭文艺的。

7.8 人人自危:肃反运动对知识群体的影响

胡风事件不但直接殃及两千多名真真假假的"胡风分子",而

① 《二十一世纪》,1993年2月号。

且引发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祸及许多仅有一般历史问题的人和更多的无辜群众。胡风事件发生在知识分子群体之中，知识分子集中的学校、文化、科研单位自然成为肃反的重点。肃反运动严重地混淆了敌我矛盾，采用了非法的斗争方式，损坏了党在知识分子中的威信，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遗憾的是，这个纯属无中生有、空穴来风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运动，至今没有受到应有的批判和否定。

1955年的肃反运动，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从现有材料看，在为胡风集团的第一批材料撰写按语的时候，他已经定下了发动肃反运动的决心[①]。5月12日，即第一批材料发表前一天，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肃反的方针。5月下旬，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向党内外征求了关于继续镇压反革命的意见。6月1日，他指示各地成立五人小组专门负责清查“胡风分子”。6月3日，他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稿时，加写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占百分之几，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文字，要求“各省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指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于风政注）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地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的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各种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因此，当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时，就要公开号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自我坦白”[②]。毛泽东为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三批材料写的按语和他亲笔修改的社论《必

① 发动肃反运动的另一诱因是潘汉年、杨帆事件。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谈话中说：“在胡风问题出来以后，清查反革命是必要的。”这就证实了胡风事件是1955年肃反运动的主要依据和诱因。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149、148页。

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明确地发出了开展肃反运动的号召。从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一批材料到8月底，毛泽东至少先后30次对肃反运动的文件作过批示。肃反运动的指导思想、基本政策、打击重点、打击面，运动的方法、步骤等，都是毛泽东决定的。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已经进行过大规模镇反之后，毛泽东又发动这次全国规模的群众性肃反运动，是在发生胡风事件的情况下，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出错误判断的结果。他认为胡风事件具有非常严重的性质。这个事件说明，"胡风分子已经混进我们的某些政府机关、某些军事机关、某些教育机关、某些文化出版机关和报馆以及某些经济机关，他们还混进了某些工会、青年团等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他们也混进了中国共产党，有的还担任了相当重要的职务"。"应该说，他们必然会混进来，而且已有材料证明在许多地方已经混进来了。""我们的很多人对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警惕性是不高的，许多人简直丧失了警惕性。"[①] 毛泽东明显地受到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影响。他说："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②]

胡风集团三批材料的公布，全国性的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声讨，以及有意识的宣传工作，造成了发动大规模肃反运动并产生严重"左"的错误的思想条件与舆论环境。《人民日报》接连发表关于肃反的社论。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撰文说："现在的反革命分子很多用像胡风集团这样的两面派的手法进行活动的，而愈往后，敌人就会愈隐蔽，伪装和活动的方式也会愈加巧妙。""由于我们的机关、部队、企业或团体的警惕性不高、嗅觉不灵、眼睛不亮，特别是制度不严、空隙甚多，已经有一批反革命分子以各种方式钻到我们

① 《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人民日报》，1955年6月10日。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165页。

内部来了,有的甚至窃据了我们相当重要的或机要的岗位,虽然他们为数甚少,但情况是十分严重十分危险的。"[①] 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和团中央宣传部决定,7月下旬到8月底,在全国大中城市轮回放映有关提高革命警惕性的影片,如《伟大的公民》、《斩断魔爪》、《不能忘记这件事》、《党证》、《最高的奖赏》、《锄奸记》等。《人民日报》和其他报刊不断报道各地发现和破获反革命组织、特务事件的新闻,揭露反革命分子破坏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事件,如"黑龙江破获蒋贼特务组织"、"上海破获一个长期潜伏的反革命组织"、"山西平顺县反革命分子破坏农业合作社"、"天津公安局最近破获一起美蒋特务案"、"陕西咸阳漏划地主破坏农业社"、"反革命分子在饶阳县破坏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等等。这样一种对于阶级斗争形势严重性的大肆宣传与渲染,在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了似乎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獗的紧张气氛。

尽管此时已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肃反运动仍然采取传统的群众运动方式,完全没有考虑到这样做会不会侵犯公民权利,破坏法制。在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象是后进群众、后进群众最了解敌人底细的思维模式支配下,把清查反革命建立在对所谓落后思想的批判、对"后进群众"的争取之上。中共中央要求把政治斗争与思想斗争统一起来,用开小组会的形式,发动群众,揭露反革命分子,而不能仅仅进行一般的反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批判,因为这样会使运动缺乏生气,达不到教育群众,搞出"一批反革命分子"的目的。国家机关党委在7月上旬的一份报告中说,他们采取小组形式开展斗争,有两种情况,一是有计划地对某些重点人展开思想斗争,二是"对革命阵营内部的右倾麻痹思想、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的斗争,主要是检查和批判右倾麻痹思想,然后逐步使斗争深入扩大"。中国作协7月14日在关于

① 《提高警惕,反对麻痹》,《人民日报》,1955年6月30日。

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及其暗藏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的报告中说，他们的斗争分为三个阶段。5月13日公布第一批材料后为第一阶段，主要是反复阅读两批材料，批判右倾思想。5月30日召开第一次动员大会后为第二阶段，主要是展开尖锐的揭发批判和思想交锋，对所有人员进行初步排队。6月10日公布第三批材料后召开第二次动员大会，把运动引到暴露问题的第三阶段，具体做法是："一、认真阅读'材料'，展开同各种反动的、错误的思想的斗争。二、反复动员，掌握材料，进行排队，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形成一个强大的围攻局面。三、放手发动群众，支持尖锐激烈的思想批判，结合个别谈话，促使反革命分子交代问题。四、培养积极分子，扩大战斗队伍，丰富材料，坚决查清反革命分子。"[①] 这些材料说明，肃反运动是把人民内部的思想斗争与肃清反革命的对敌斗争混淆起来的。它主张放手让群众揭发反革命，而不是按法律程序办事，这就必然要冤屈许多无辜的群众。

肃反运动中最受"关注"的，是"五百万知识分子和干部"。不但一般知识分子必须参加肃反，大学和中专的学生也必须参加坦白检举运动。毛泽东亲自规定，反革命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中的重点对象，"一般地控制在百分之五左右"[②]。在实际运动中，5%成了要达到的目标。根据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一文透露的数字，这次运动全国查出了81000名"反革命"，与被列为斗争对象的加起来约有140万人，这个数字占全国知识分子的1/4、全国机关团体学校企业脱产人员的1/5。按照当时的标准，算是没有斗错的仅占6%。江苏文联创作组2/3的成员被关进监狱。在王若望主编的上海《文艺月报》发表文章的许多业余作者变成了本单位的第一肃反对象。洛阳拖拉

---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292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472页。

机厂参加坦白检举运动的工程师和四级以上技术员共48人，重点斗争对象就有13人，超过了1/4。总政在北京莲花池办的作家学习班肃反时，“除了少数斗争骨干外，几乎大多数人都要遭受审查”①。30年代的剧作家沈君默，著名诗人李瑛、公刘，电影导演白辛等人，都曾是这个学习班的重点斗争对象。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历史、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受审查、被牵连的人也就更多。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张斧在1957年7月的一个报告中说，该校在肃反运动中，有129人被当做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追查，168人受到思想批判并审查历史，146人被审查历史与社会关系。以上三项共计443人，接近全校师生总数的10%。在这个数字中，学生极少，这样，全校教师受到斗争与审查的比例非常惊人。肃反中“畏罪自杀”现象之多，使得中共中央不得不在文件中作出处理规定。季羡林先生回忆说，揭露和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时，“附带进行了一次清查历史反革命的运动，自杀的人时有所闻。北大一位汽车司机告诉我，到了这样的时候，晚上开车，要十分警惕，怕冷不防有人从黑暗中一下子跳出来，甘愿作轮下之鬼”②。

十分恶劣的是，这次运动以普遍开展群众间的互相检举揭发为发现问题的基本方法。这种方式，是“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所使用的方法的自然延续。把胡风和“胡风分子”打成反革命，不仅以私人通信为证据，而且大量地引用私人间的日常谈话和日常工作中的言论。当时揭露贾植芳、方然、耿庸、牛汉、梅林、庄涌、杭行、张禹、朱谷怀等“胡风分子”的文章，充斥着对于“茶余酒后”私人谈话的揭露。这就自然地引导人们从同事、同志、亲友间的日常交往与谈话中发现“反革命”的蛛丝马迹。据一些老先生回忆，肃反运动中，同事、朋友乃至亲属间对于日常交往与谈话的互相揭

① 彭荆风：《忆蒋牧良先生》，《随笔》，1997年第4期。

② 季羡林：《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东方》，1994年第5期。

发，达到惊人的程度。私下的一两句“落后言论”，只要被揭发出来，就会被当做对社会不满、对党不满的证据，受到怀疑、斗争和审查。

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揭发她的大哥就是一个例子。她回忆说，新中国成立后她的思想变得十分激进。在肃反运动中，

> 学校党组织号召团员、进步青年揭发自己周围及家族中有反革命嫌疑的人和事。大哥章可当时是北京私立京华美术学院的院长。他的一个学生恰巧是我父亲的一位朋友，也是党的一个主要统战对象的儿子。这个年轻人当时也正经历着与我同样的思想演变，因而也十分激进。他找到我，要我揭发他们的院长、我的大哥章可的“反动言行”。大哥三十年代随母在欧洲生活过十年。希特勒、墨索里尼上台的前后，大哥正在德国和意大利学习油画。他那时三十岁不到，正是年少气盛之时，看到了纳粹党初起时狂热的日耳曼民族情绪，必是受了一些熏染，产生了对希特勒的一些模糊认识。我们刚到北京时……我在没有找到学校之前，闲居在家的日子里，大哥常带我去逛北京城，也和我谈到他早年在德国的所见所闻。到肃反运动，要我揭发大哥时，我认为真正革命就应“大义灭亲”，但是我并不懂得这种揭发要充分调查，要实事求是，不能凭空聊的内容就下定论。于是我把大哥平时与我谈到的对希特勒、纳粹党的那些描述都向父亲那位朋友的儿子揭发了。其结果是大哥被隔离审查了一些日子，要他交出纳粹党证。大哥当然交不出来。最后大哥被放回家，却丢了院长的职务。……从此，大哥章可将近十年在家里不同我讲话。餐桌

上只要有我在，大哥竟十年如一日一言不发，埋头吃饭[①]。

胡风事件引发的肃反运动，是凭空制造出来的、主要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产物。运动中固然也查出了极少的真正的历史反革命，但完全不是运动的主流。混淆敌我矛盾的指导思想，战争时期的群众运动方式，普遍地施行"隔离审查"，肆意刑讯逼供、抄家抄物，严重地破坏了刚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权威，侵犯了千百万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言论自由，使知识分子对于法制的热切盼望与追求归于破灭。肃反运动对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的损害，更为知识分子所痛心疾首。这场运动对于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的破坏，是前所未有的。

7.9　胡风事件：知识分子群体心理的转折点

胡风事件是一个政治事件。它是执政党在其最高领袖的个人意志支配下，将有组织的国家暴力引入意识形态领域、强加于知识分子群体的开端。因此，它又必然是一个精神事件。它不但毒化了全国人民的政治意识、政治情感，更直接的是，它猛烈地冲击乃至震撼了知识分子早已动荡不安的精神世界，损害了知识分子同共产党、同新中国、同马克思主义的联系，使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心理起了转折性的变化。

在思想领域实行强制，萌芽于延安整风时期。延安整风既是解放思想的运动，又是统一思想的运动。尽管它以批评和自我批判为武器，启发自觉革命，但无论破除旧思想，还是认同新思想，都不存在个人的自由选择。经过学习文件、自我检查、小组帮助、群

① 《我与父亲章士钊》，《梁漱溟、章士钊与毛泽东》，香港达艺出版社 1988 年 10 月版，第 51 页。

众批判等的程式，最后达到的效果，就是要人们一定要接受某种被认定为绝对正确的思想。拒绝接受“思想改造”，且不说有审干、抢救运动中存在的现实的暴力威胁，仅仅有可能被逐出革命队伍或不被信任，对于一个在国共两党对峙中坚定地倾向革命的青年来说，也意味着理想和生命的终结。所以，利用外部环境所造成的有利形势和人们内在的革命欲求，用自我检查与群众批判的方式，使人们必须接受某一思想，其中的强制因素已经隐约可见。然而，那时的强制是纯粹思想性质的强制，一般并不诉诸于直接的政治暴力，而且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中，在一个战斗的革命政党及其率领的队伍内部，思想的统一是绝对必需的，人们是理解的、接受的，因而是无可指责的。

新中国成立后，执政党借助于国家权力，把延安整风的经验与方式运用于新的意识形态的建立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情况遂逐渐发生质的变化。北平、上海等大城市解放后，用“革大”形式集训大批并无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政治学习运动后期进行“革大”式的思想总结，尽管政治学习运动的方式还算温和，“思想总结”受到批评，但在党外知识分子中以延安整风方式实行思想强制的苗头已经显露。1951 年批判《武训传》，以最高领袖直接发动知识分子从未领略过的急风暴雨式的大批判运动的方式，强制人们按照执政党更新过的理论观点与政治立场，否定武训这个历史人物，否定原国统区进步知识分子以武训为旗号所进行的争民主的斗争，否定曾经为毛泽东本人和中共中央高度评价过的陶行知先生的生平与思想，其思想强制的性质昭著于世。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由于采取人人“洗澡”过关和“学生斗老师”的群众运动方式，又由于激烈的“三反、“五反”运动的影响，给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添加了显著的暴力因素。然而，这时的暴力，还不是有组织的国家暴力，主要是执政党激发起来的、无组织的、分散的群众暴力，而所谓“群众暴力”，不过是强迫

检讨,至多是让年轻教师站着接受群众的批评,极少触及皮肉。对俞平伯先生的批判是蛮横的、粗暴的、专断的,之所以说它蛮横、粗暴、专断,是因为批判运动的发起者客观上借助国家最高权力掌握者的身份与地位说话与行动,对于学术问题采取了必须如此、不容辩解的方式。但是,国家暴力并未公开登场,俞先生虽然不得不做违心的检讨,他的人身自由、生活条件、职业并未受到影响。

到了胡风事件,思想的强制合乎逻辑地发展到了公开地、大规模地使用有组织的暴力的地步。胡风和"胡风分子"被打成"反革命"的主要依据,是他们"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这是人所共知的。且不说胡风和"胡风分子"是否真的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即使他们真的不同意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不同意党的文艺政策,仇视周扬等党的文艺工作领导人,他们毕竟并未在社会上或公众媒体上发表公开的反对言论,而仅仅在私人通信中表露一些看法和情绪,又怎么算得上是"反革命"? 所以,胡风事件的本质,是一个借助于有组织的国家暴力,建立毛泽东思想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实现所谓"舆论一律"的政治事件。至此,在思想与学术领域,在意识形态领域,大规模地使用国家暴力已成为事实。暴力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守护神。胡风事件直接牵连了两千多名知识分子,其中不乏著名文化人士。他们中的许多人被投入监狱,长期失去自由,甚至死于狱中;许多人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失去了公民的基本权利;更多的人或者失去了职业,或者受到各种处分,长期受到怀疑、歧视和压制。他们的家属受到株连。这当然是对知识分子群体空前严重的警告和威胁。

说在胡风事件中有组织地使用国家暴力,是有一定历史渊源的思想强制合乎逻辑的发展,是笔者从历史发展的一连串前后相继的环节中抽取具有质的相同性的因素得出的结论,当年的知识分子却完全想不到事情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想不到文艺思想的纷争最终会用如此激烈的方式来解决。胡风问题由"资产阶

级文艺思想"和"小集团",一变而成为"反革命",来得如此突然,不但圈子内的人感到震惊,甚至周扬本人都难以接受,对知识分子的震撼可想而知。

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参与了批判和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对于当年行为的解释,许多人说是相信共产党、毛主席,认为"毛主席说的不会错";有的人说,一边是共产党、毛主席,一边是胡风,权衡轻重,只能站在毛主席、共产党一边;更多的人承认,当时所发乃"违心之论"。很少有人说自己确信胡风是反革命。这说明,面对胡风问题的突然升级和突如其来的暴力方式,他们来不及作理性的思考,只能作出本能的反应。正是在这种本能的反应中,知识分子心理中的迷信、盲从、惶惑、焦虑、恐惧、懦弱、是非不分、屈服于权力和外加意志、从众自保等特质暴露无遗。

胡风事件对新中国知识分子群体造成了多方面的精神戕害。它损害了共产党、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在知识分子中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新中国成立前欧美派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后会不会像斯大林那样滥用暴力的隐忧,使得原先的中左派知识分子陷入了极大的疑虑和苦闷,而长期得不到解决并不断加重的疑虑和苦闷,使他们逐渐失去了政治的信心与理想的寄托。经过胡风事件与肃反运动,对于暴力的恐惧与焦虑成为知识分子群体典型的心理特征,而畏惧与焦虑必然导致人格的解体。尤为严重的是,对胡风文艺思想的粗暴批判以及知识分子对这一批判的或积极或消极的认同,损害和削弱了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同五四的精神联系,使他们在卷土重来、日趋猖獗的封建意识的笼罩下,失去了独立的意识、独立的思想、独立的品格。

胡风事件是五四以后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发生的影响现代知识分子集团精神世界的一连串重大事件中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无论是自愿的归属还是被迫的依附,知识分子集团在这个运动中的表现,说明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成为革命中造就、革命胜利后迅

速扩张的新的思想权威的奴隶,他们在五四中获得的以精神自由为核心的主体意识和独立品格正在消退。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的一部分,经过胡风事件与肃反运动,其独立精神已基本上被摧毁,再也没有恢复。这样,胡风事件也就成为新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政治心理发展的转折点。

然而,胡风事件和肃反运动,毕竟主要是思想强制与暴力强制的产物。新中国知识界的核心人物,是受过五四熏陶与欧美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传统。这个集团中的多数人,毕竟是在佩服共产党领导革命与建设的巨大功绩与怀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正确与否的内心冲突中,在政治运动造成的巨大压力下,违心地附和和默认了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与处理,极不情愿地承受了肃反运动给他们中的许多人造成的苦难。他们本质上还是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内心深处仍然保留着那个"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他们不甘愿重新堕入精神奴隶的地位。一有合适的气候与条件,他们就要洗刷在胡风事件与肃反运动中蒙受的耻辱,找回失去的精神家园。"双百"时期"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表演",正是知识分子集团急切地回归五四的表现。

第八章 早春时节

沉闷与萧条:胡风事件和肃反后的知识界——寒冬不知春:从知识分子会议到政协二次会议——惊蛰时分:作协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前后的文艺界——五月和风:"双百"方针的提出与讨论——八月突破:青岛遗传学会议及对学术界的冲击——异军突起:文艺界对教条主义的冲击——两极对峙:受到毛泽东批评的两篇文章——认识自我:知识界的自我审视与批判——乍寒乍暖:1956年知识分子的群体心态

8.1 沉闷与萧条:胡风事件和肃反后的知识界

1955年的政治风暴之剧烈,波及面之广泛,打击力之沉重,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所未有。发端于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而后转为以批胡适为核心的学术批判运动,不但触及了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而且肆意侵入自然科学技术领域,许多著名学者和科学家被当做"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受到批判。在文艺界,用暴力方式解决胡风问题以后,又发起对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甚至准备接着批判冯雪峰,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冤案。极端扩大化的、存在严重破坏法制现象的肃反运动,使知识分子失去了政治生活、学术生活、社会生活乃至家庭生活的安全保障。这些出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预料之外的政治运动,无异于告诉人们:共

产党不但不信任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而且是实实在在地把他们视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

1955年8月以后，声讨胡风的浪潮渐趋平息。始于6月的肃反运动，同年秋天度过了它最为狂暴的初期阶段。然而，知识分子群体的心态却早已进入了冬天。知识界空气空前沉闷，知识分子心情压抑，意志消沉，政治热情、工作热情受到严重挫伤。他们不理解共产党为什么要把知识分子作为主要打击对象，不理解为什么思想改造要采取如此暴烈的方式，怀疑新中国还要不要知识分子。既然学术、文学、艺术乃至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问题上的独立见解和不同意见很容易被上升到唯心论和资产阶级的高度，最终会和绝不容许讨论的政治问题挂起钩来，给个人、家庭、朋友招来灾难，那人们也就只好闭口不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了揭发私下言谈的风气，但那时大多是年幼无知的学生所为。人们在公开场合说话谨慎，私下里朋友间、同事间也还能吞吞吐吐地讨论问题。肃反以后，连这种自由也没有了。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著名数学家傅种孙先生后来回忆说，肃反以后，“最令人伤心的是老同事、老同学间几乎不敢来往，象一盘散沙，没有粘性”[①]。董渭川教授说，肃反运动中“由于当时没有能把敌我矛盾和内部矛盾两者的界限区分得很清楚，在对待某些内部矛盾上也有不同程度地采取对待敌我矛盾的方式，肃反过后，使有些人有了顾虑，愈是相熟的人，见了面，除掉谈谈天气之外，国事、校事一概‘三缄其口’，唯恐被别人抓住小辫子，说不定哪一天挨整一番”[②]。这样的一种空气与心态，自然谈不到工作的主动性。

肃反运动还损害了知识分子钻研业务的积极性。肃反后期，曾大张旗鼓地进行政治与业务关系的讨论，继续批判“单纯业务观

① 《师大教学》，第123期。

② 《师大教学》，第114期。

点”,强调“突出政治”,号召人们提高警惕,从“胡风分子”“打入”、“钻进”革命队伍一事中吸取教训。许多“只问业务、不问政治”的著名学者受到批评,被迫公开检讨。在动辄得咎、百无一是的情况下,不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停止了研究,那些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领域内有志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知识分子也因为不能理直气壮地搞业务而陷人极大的苦闷之中。大批判带来大萧条,这一条新中国成立后屡试不爽的断语,又一次得到了验证。

文艺是最脆弱的事业,文艺工作者是对“气候”最敏感的人,大批判后的大萧条也就最显著地表现在文艺上。此时,30 年代的老作家大多搁笔不写,解放区来的作家屡受批判,文艺作品不但数量少,而且题材狭窄,主题思想概念化,人物刻画公式化,作家“只能撷取生活中的一些片断现象,敷衍成一篇小说”[1]。更可悲的是,历来肆无忌惮、以“鸣鞭”为业的批评家们也陷人了同作家一样动辄得咎的境地。有的人“处处担心,唯恐‘失足’”[2],表现出“可惊的慎重”;“有些人唯恐发表一点独创性的意见……某些不负责任的流言一旦传到自己的耳中,简直紧张得好象刚刚跑过一万米”[3]。“有些批评家,在人们向他就教的时候,唯恐来不及地声称自己‘不是批评家’、‘没有意见’云云”,“失去了作为一个思想战线上的战士的积极干预生活的热情,失去了对社会、对文学事业的责任心”[4]。连《文艺报》的“战斗”特色也在消退,而这样的问题,“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后期开始萌芽,最近四个月才比较突出”[5]。这表明,到 1955 年年底,由胡风事件和肃反运动直接导致的文艺创作、文艺批评的萧条已为人们所公认。

---

① 林默涵:《两年来的短篇小说》,《文艺报》,1956 年第 4 号。
② 赵易:《“五十度的微温”》,《文艺报》,1956 年第 3 号。
③ 马铁丁:《勇敢地突破常规》,《文艺报》,1955 年第 23 号。
④ 陈骢:《“跑道”内外》,《文艺报》,1956 年第 3 号。
⑤ 曹阳的来信,《文艺报》,1955 年第 23 号。

文艺的萧条说明屡受打击的文艺工作者失去了政治热情与创作热情。对此，1955年年底夏衍在《文艺报》第24号发表的题为《打破常规，走上新路》的文章提供了佐证。在这篇文章中，夏衍承认文艺的落后已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他当然不认为文艺工作指导上有什么错误或者是政治运动对文艺有什么损害，而是继续把文艺落后的原因归于文艺工作者思想上的"毛病"。但是，他的话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当时知识分子政治上的消极。夏衍说：

> 从我个人的体会，最触目惊心的事，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工作方式等，都已经不知不觉地和一日千里地向前迈进的革命形势脱了节，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缺乏一种不能自已的、油然而生的、愿意为它献身的热情与气概。我们这一辈人，大多数是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回想一下过去，在那个时期，我们的爱憎是分明的、强烈的，对这个斗争的任何一个战线上的一胜一败、一进一退，经常是全心全意地关注的，有利于斗争的任何一件工作，都是不计成败、不计利害地愿意参加、要求参加的，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感觉是深切的，我们整个的心，是紧紧地和这个斗争联系着的。可是今天，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这一场尖锐而剧烈的阶级斗争中，对斗争的成败进退，是不是和过去同样地在全神贯注地关心着呢？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大步一大步的前进，是不是每个人都情不自禁地欢欣鼓舞呢？对阶级敌人的阻挠破坏，是不是每个人都由衷地切齿痛恨呢？应该坦率地说，我们的激情似乎已经减退了。文艺工作者相见的时候，很少认真地谈论时事了，学习时事，"搞运动"，听报告，据说已经有很多人认为是"负担"了，据说，创作就需要平静，任何外务都是对创作的干扰。这就难怪，象前几天报上发表的"全国粮棉产量创造历史上最高记录"这样的大消息，在有些"人类灵魂工程师"的

心上,也引不起兴奋和欢悦的微波了!

夏衍看到了文艺工作者政治热情消退的表面现象,却没有对其原因作深入的分析。他只是说他怀疑文艺界的人们"对祖国、对人民还有没有真挚的爱,对社会主义还有没有沸腾般的热情"。

1955年冬天,正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全面推进,"一五"计划顺利实施的时期。中国人民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行将建立和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而欢欣鼓舞。历来走在社会改革前列的知识分子阶层却如此消极与沉寂,不能不与其他社会阶层的表现形成巨大的反差。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不断发动政治运动,直接目的固然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完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以巩固新的政权与社会制度,但他的最终目的却是要用"改造"的手段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造成更发达的科学与更繁荣的文化。共产党要实现自建党以来孜孜以求的使中国现代化的目标,离不开知识分子。面对由于政治运动的频繁冲击而导致的知识分子的集团性消极反抗,除了调整政策以外,执政党别无选择。

8.2 寒冬不知春:从知识分子会议到政协二次会议

最迟在1955年10月,毛泽东开始注意到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肃反运动中发生了"左"的偏向。大概在11月底,他在一份提纲中提出开一次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会。11月23日,他召集会议研究这个会议的筹备工作,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责的十人筹备小组。12月16日,他修改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在毛泽东的指导和十人小组的组织下,中央各部门在很短的时间内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1956年1月14日至20日,知识分子会议如期召开。各方面负责人1000多人出席会议,60多人

作了大会发言。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这是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主要由胡乔木精心准备的会议核心文件。1月30日至2月7日，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召开，周恩来作了贯穿着相同精神的政治报告，使这次会议也自然地开成了一个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召开和周恩来的报告，是执政党对知识分子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标志。周恩来的报告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引人注目。第一，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①]；第二，重新确定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确认"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②]；第三，指出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其表现是"低估了知识界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巨大进步，低估了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不认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认为反正生产依靠工人，技术依靠苏联专家，因而不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认真研究和解决有关知识分子方面的问题；对于怎样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怎样进一步改造知识分子、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提高知识分子的业务能力等迫切问题，漠不关心"，"对于一部分知识分子信任和支持不够，这是我们有些同志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宗派主义的主要表现"[③]。

从一直认为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范畴，到承认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一味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到承认党内存在

---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59—160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2页。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不自此时起。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市市长彭真就说过这样的话，并在知识分子中引起过一定的反响。

③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6、170页。

着不信任、不支持即排斥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倾向，转变不可谓不大。然而，我们还是要不无遗憾地指出：知识分子会议和周恩来的报告既反映了执政党认识上的提高，也还存在着严重的缺点。

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前提是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状况作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与估计。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工作热情受到压抑，他们的积极性不能发挥，主要是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的打击。要解开他们思想上的疙瘩，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要对这些政治运动进行深刻的反思，采取切实措施消除其消极影响。知识分子会议没有这样做，反而继续肯定新中国成立后所有政治运动都是正确的。周恩来的报告仅仅承认"用粗暴的方法对待科学家和科学问题的现象，最近还有发现"，他指出党内"一部分同志对于党外知识分子的某些宗派主义情绪，更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知识分子现有力量的充分发挥"[①]，对于"宗派主义情绪"从何而来，却未作进一步的分析。陆定一在大会发言中更是不加区别地对发生在1955年的批判胡风、陈企霞、丁玲，批判胡适、杜威、梁漱溟，批判"反动的生物学家胡先骕"，批判"梁思成的复古主义形式主义"，以及肃反运动等，大唱赞歌，认为"经过斗争，文化教育和科学事业是欣欣向荣的而不是枯萎下去了，团结是增强了而不是瓦解了，新生力量是生长了而不是被压制了"，文艺界"出现了新的气象"，"从前所谓'创作枯萎'的悲观论调已经破产"[②]。这种对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知识分子政策丝毫不作反思的基本态度，使得知识分子会议和周恩来的报告除了空泛地肯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外，没有触及知识分子所苦闷、所焦虑、所痛心、所希望解决的迫切问题。

回避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回避文学艺术问题，是周恩来的报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78、161页。

② 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1册，第166页。

告的重大缺点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意识形态领域运动不断，文艺又是运动最频繁的领域，文艺工作者受的打击最重，由此造成的文艺工作的落后也最为突出。而周恩来的报告通篇谈论的是自然科学，完全回避了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也就是说，回避了最敏感、最尖锐、最棘手、最困难而又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周恩来的报告对于知识分子政治状况的估计，对于党与知识分子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的分析，使党内干部和知识分子两方面都很难把握。报告说，知识分子中，进步分子约占40%，中间分子约占40%，"缺乏政治觉悟或者在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的落后分子约占百分之十几，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约占百分之几"[①]。这一估计不但同肃反运动时期的估计并无区别，而且也否定了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在谈到党与知识分子的隔膜的时候，虽然指出了双方的原因，重点却是批评知识分子，认为"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采取了保留态度或反对态度"，列举的严重问题达9条之多。陆定一的发言更认为从政治上思想上解决问题是知识分子工作的基本经验之一，"非政治化，言不及义，不抓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就是右倾保守思想的表现"。他认为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都存在着不愿接受党的领导的倾向。他甚至点名批评了北大化学系教授傅鹰。这样的分析自然要误导党内干部，使他们觉得对知识分子继续实行以改造为主的方针是必要的；同时使知识分子感觉到，宣布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过是一句空话，执政党并未根本改变对他们的态度与政策。

周恩来的报告存在的问题，知识分子会议的大会发言反映出的不同倾向，说明党内的认识并不统一。据说毛泽东当时并未明确表示赞同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提法。

---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3页。

周恩来的报告对于知识分子政治状况的不尽客观的估计与描述，显然也有照顾到党内接受程度的因素。

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的“锻炼”，此时的知识分子似乎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判断形势并决定应该作出怎样的反应。党的宣传部门为了造成一定的声势，从 1 月 12 日(即知识分子会议开幕前一天)开始，《人民日报》陆续发表石景山钢铁厂总工程师安朝俊、北大东方语文系主任季羡林、协和医学院外科主任吴英恺、北大哲学系教授冯友兰、同济大学副教务长吴之翰、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主任张维、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中科院物理学数学化学学部常务委员葛廷燧、铁道部铁道研究所所长茅以升等著名人士的文章。各省市的党报也如法炮制。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更多的知名知识分子获得了发言的机会。他们的发言被迅速报道。这些文章和发言，反映出知识分子对于中共中央的新政策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消极的甚至是极不信任的态度。

我们以 1 月 30 日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开幕为界，将知识分子的公开反应划分为两个阶段，并作比较，当会发现两个阶段有一些共同特点，如公开表态的知识分子都没有对执政党既往的知识分子政策提出总体上的评价，也没有集中地评价或否定任何一个政治运动，甚至始终也没有完全表露胡风事件和肃反运动对他们中间许多人的伤害(对这种伤害的极度不满，在 1957 年上半年倾泻而出)。同时，我们还会发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即前一阶段知识分子的反应似乎稍微积极一些，主要表现是有人提出了一些如何认识与评价知识分子、如何改进党的知识分子工作的具体建议。后一阶段，即政协会议期间，知识分子的反应反而趋于消极，其表现是高级知识分子又一次集中地进行自我批判和检讨，绝少真诚的批评与建议。就政协会议前《人民日报》发表的若干文章而言，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内容。

第一是明确提出要正确认识与评价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状

况。季羡林先生的文章集中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他说："解放前，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这样社会里的知识分子，不管他们出身的阶级，所受的教育，以及思想意识是多么复杂，多么不同，因为或多或少都受过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气，所以一般都非常爱国。他们希望自己的祖国能强起来，自己也可以扬一下眉，吐一下气。中国的旧知识分子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迎接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尽管当时对解放的意义还不能说是有全面的深刻的了解，但是他们却感觉到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因而很兴奋。我现在还能清晰地回忆起来，在人民解放军进北京的那一天，许多教授冒着大风到大街上去欢迎，表现出高度的热情。但是这只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接受新事物，特别是像这样天翻地覆的伟大的变革，对一个旧知识分子来说，是并不简单的。""多数的旧知识分子都是爱国的，他们渴望自己的国家强盛起来。这种希望在过去一直没能实现。然而今天，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我觉得这一点是中国旧知识分子自觉自愿地进行自我改造的一个起点和基础。""就我直接见闻所及，我周围的人基本上都能勤勤恳恳地工作，想努力完成党和人民交给他们的任务。他们现在对党有无限的信任，无限的敬仰。谁也愿意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加上一把力，不愿意成为懒汉，坐享其成。"知识分子"今天在政治觉悟方面的进步速度是很高的，是空前的"。"今天我们如果要对知识分子给以评价的话，上面这些情况不应该放过。然而，我觉得，一部分同志，特别是年轻的同志，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是不够正确的。他们没有从过去的基础和将来的发展看问题。他们也许是因为太年轻，不知道解放前知识分子的情况，就对他们提出一些不实事求是的期望和要求。对知识分子的进步来说，这是没有好处的。"①

① 《我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些看法》，《人民日报》，1956年1月13日。

茅以升、冯友兰先生的观点与季先生相同。茅先生说："我是个年老的知识分子，我时常和同辈的知识分子在一起，了解到他们的一些情况。他们都毫无例外地信任党，拥护党。他们天天学习，都在逐步地提高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年老的知识分子都在进步，都想成为劳动知识分子，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贡献出一切力量。"[①] 冯友兰先生则明确告诫执政党，对党在知识分子中的领导力量和广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热情拥护这种情况不可估计过低，他坚定地表示："我敢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以接受党的领导为莫大的光荣。"[②]

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前提是客观地估计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状况。把以季、茅、冯三位先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自我评价与执政党的观点两相比较，不难发现差距之大。认定知识界的中间分子占 40%，落后分子占百分之十几，反革命分子占百分之几；认定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甚至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间敌我不分，留恋资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反对苏联，诋毁马克思主义，不愿接受党的领导等，未免与事实相去甚远，难以得到知识分子的认同。

第二是有分寸地、含蓄地指出了政治运动对于业务工作的消极影响。吴之翰说，1952 年的思想改造运动，"由于领导运动的个别干部对于思想的发展规律认识不够，未能多采取以理服人的方式而流于生硬粗暴，使少数知识分子产生了一些消极情绪，造成一定的损失"[③]。吴英恺说："有些专家在思想上有顾虑，对新疗法新手术不敢开展，怕出问题。还有不少人怕被人戴上'单纯技术观点'或是'脱离政治'的帽子，因而不愿强调技术发展的重要。这些

---

① 《我们年老科学家的愿望》，《人民日报》，1956 年 1 月 22 日。

② 《发挥知识分子的潜在力》，《人民日报》，1956 年 1 月 15 日。

③ 《要团结得更好一些》，《人民日报》，1956 年 1 月 16 日。

情况，确实使高级技术人员在发挥技术领导作用、提高医疗教学和研究工作上遇到很大的困难。每当检查学术进度和工作水平的时候，大家就难免感到沉重。有些人参加国际科学会议的时候，感到我国的政治地位是空前地提高了，但是科学水平跟这种地位并不相称，这对于新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来说，是一个异常尖锐的刺激。"①

第三是指出党与非党教师的团结合作存在问题。茅以升认为，党与非党人士之间有"尊而不亲"的现象。吴之翰认为，教学单位内部党与非党人士之间存在着隔阂。"一方面是有些党员对于群众的进步一面重视不够，往往强调他们的缺点，不能虚心倾听他们的意见，耐心地予以帮助，形成了相互间的隔阂。另一方面也是对于群众的进步估计不足，不敢放手进行批评，流于迁就"，这就影响了党与非党教师的团结。在系一级，"有些党员干部对教学工作一知半解，或者强不知以为知，处理问题不同系主任磋商，贸然决定。结果事后纠正，不仅事倍功半，而且酿成各方面的意见。也有些党员干部对于教学情况不了解，也不学习，反而自以为胸有成竹，遇到同系主任的看法不一致的时候，不能很好地商讨，产生了隔阂"。个别党员干部"以势在必行的态度，向系主任提出意见；而当系主任布置任务的时候，则又以简单语调加以否定，缺乏相互研讨的精神"。"党员教师的意见尚未取得教研组主任的一致，就去执行。或者在教研组会议上不够注意态度，引起年长教师的反感。"② 陈垣先生提出"党内外的高级知识分子必须彼此主动地密切合作。要在实际工作、学术思想、科学研究上建立起真诚的感情上的联系，逐渐成为知心朋友"。"两方面都应当增加主动性，以改

① 《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些体会》，《人民日报》，1956年1月14日。

② 《要团结得更好一些》，《人民日报》，1956年1月16日。

变以往的情况，做到更紧密的团结。"[1] 这些言论说明，主要由于频繁的政治运动造成的高校中党与非党关系的紧张，已经引起了普遍的重视。

第四是提出了一些检讨业务工作指导思想、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和物质待遇的建议。茅以升认为，应当反思学习苏联发生的教条主义偏向。他说，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由于脱离实际，生搬硬套的形式主义作风，在学习苏联的名义下，反而造成了对国家人民的损失。有时候对苏联专家反映情况不全面，但却把苏联专家由此得出的结论当做金科玉律，这也是很有害的"[2]。老工程师们过去崇拜英美技术，学苏联后，所有英美书籍束之高阁。不适当的保密制度，束缚和妨碍了科技交流，需要加以检讨和改进。当时，说这些话是需要勇气的。

冯友兰先生提出了加强科研与教育发展的规划等 5 条建议，并特别提出了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他说："现在的大学教授的生活比解放以前是好多了。但是如果他没有过去的储蓄或者是稿费的贴补而家里人又多一点，生活还是很紧的。有些人还要做些家庭琐事，这当然占去了他的精力和时间。很多的人没有余钱买书。但是大多数的教师都喜欢买书。自己的书可以随时看，也可以在上面随意批点。买书是读书人的一种快乐。可是现在有很多的教师不能有这种快乐。""能买书的人，也有他们的问题，就是买来放在什么地方？十几平方公尺或几十个平方公尺的地方，除了人住之外再找书'住'的地方，就困难了。有些书装在箱子里。用的时候，明知道自已有，可是还得跑图书馆。"他反对教师的最高工资比

---

① 《我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意见》，《人民日报》，1956 年 1 月 20 日。

② 《我们年老科学家的愿望》，《人民日报》，1956 年 1 月 22 日。

学校主要负责人低三级的制度[①]。

政协会议期间，知识分子对于执政党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反应之消极令人惊异。政协的多数成员是知识分子。他们在会前已经知晓中共中央知识分子会议的精神，周恩来所作的政治报告的主题之一也是知识分子问题。然而，就会议期间公开报道的著名知识分子的大会发言来看，除了李四光、顾颉刚、曾招抡等少数人外，几乎没有人像会前季、冯、茅等诸先生那样比较坦诚地为知识分子辩护并对执政党提出带有批评意味的实质性建议，而是纷纷表态感谢执政党对知识分子的信任、支持和关心，纷纷进行运动式的自我批判与自我检讨——梁漱溟检讨，沈从文检讨，梁思成检讨，廖世承检讨，唐钺检讨，侯德榜检讨——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特别是对"妄自尊大"的毛病的批判，在这次会议上达到了一个高潮。知识分子"从旧社会带来的""自我"，甚至被宣布为"社会主义道德的最大敌人之一"[②]。

知识分子并不缺乏对外界事物的感受力与理解力。他们对中共中央知识分子会议的消极反应，说明这个会议本身的确存在严重缺点，它对既往错误政策的坚持，对知识分子政治思想状况的错误估计，使人们难以相信执政党调整政策的诚意和决心。胡风事件和肃反运动造成的创伤还在流血，因言获罪还仅仅是几个月以前的事情，知识分子的心态不仅仅是余悸尚存，简直就是还在冬

---

① 《发挥知识分子的潜在力》，《人民日报》，1956年1月15日。冯先生对于新中国成立前后大学教授生活待遇的比较，显然有自相矛盾之处。与1936年相比，1956年，教授的起点工资与技工的起点工资之比从28.6:1下降为6.8:1，最高工资之比从47.6:1下降为9.7:1。其时，全国高校有教授、副教授约7500人，教授最高工资为253元，以实际购买力估算，大约相当于抗战前工资的16.8%。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为253元，中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顾颉刚为218元，文学所研究员俞平伯、北大教授王力和季羡林均为184元。

② 李四光的发言，《光明日报》，1956年2月5日。

天。有的研究者把知识分子会议比喻为一声"春雷"。那些在冰屋子里冷得手脚几乎就要冻掉的人,会因为窗外传来一阵人声的喧哗就会相信是什么"春雷"吗?

8.3 惊蛰时分:作协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前后的文艺界

尽管党内存在分歧,执政党放宽知识分子政策的决心却是坚定的。中央的知识分子会议结束后,各地纷纷召开本地的知识分子会议,制定知识分子工作纲要,连后来以发表"知识分子三天不打就翘尾巴"的"名言"而著称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也不甘落后。全国大小报刊上的大批判文章迅速绝迹,代之而起的是对知识分子重要作用的宣传、对著名知识分子近况的报道。从3月开始,全国刮起了一阵竞相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旋风。用多快的速度、发展多少高级知识分子入党,似乎成了紧跟中央的一个标志,有些地方党委甚至为此而打破了正常的入党程序。从把知识分子统统说成资产阶级分子,到突击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执政党在用实际行动向知识界证实调整政策的决心。执政党对知识分子如此厚爱,优礼有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所未有。然而,在迅速趋于宽松与温和的气氛下,知识界的心态仍然没有发生同步的变化。这种状况,文艺界尤为突出。

文艺界受胡风事件打击最重。胡风事件不仅从政治上毁灭了一批有才华的作家,更由于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形而上学批判,使文艺理论、文艺思想、文艺工作指导方针中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恶性发展,达到了极端猖獗的地步。作家被当做什么也不懂的小学生甚至白痴,到哪儿去,看什么,怎么看,想什么,怎么想,写什么,怎么写,都要由几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和文化官员详加规定与教诲;写出的作品,当然也要交由他们或一批审判官式的批评家来裁判。文学艺术失去了它的本质所要求的比其他任

何领域都更加需要的宽松与自由。诚如胡风所说，文艺已经枯萎甚至被“闷死”了。1955年年底，执政党开始关注知识分子问题，但文艺领域没有进入领导人的视野。1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而就在前一天，中共中央还批发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到1956年年初，仍然在批判丁玲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一本书主义”。

然而，此时的中国，正处在社会制度发生翻天覆地变革的时期。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无论其文艺思想存在怎样的差别，毕竟都受到过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滋养与影响。在他们看来，文艺的生命、文艺工作者的职责，就是成为时代的先声、号角与鼓手。作家的使命感、责任感，驱使他们时时寻找有利的条件与时机，冲破思想与政治的樊篱，而成就文学艺术的事业。他们没有直接沐浴知识分子会议的阳光，却敏锐地察觉到了文艺转机的希望，并抓住时机，开始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最早的表现之一，便是1956年1月21日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小说组围绕三部苏联作品特别是尼古拉耶娃的中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开展的讨论。

《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描写了一批响应党的号召从城市来到农村的青年人，为发展农业生产而进行的思想斗争。它在官僚主义与新生力量的尖锐矛盾冲突中塑造了娜斯嘉这样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朝气蓬勃的人物，歌颂了青年人敢于同旧的落后思想斗争的勇气和精神。这部小说反映在苏联兴起不久的以“干预生活”为中心的反“无冲突论”、写普通人、“非英雄化”、“写战壕里的真实”等的文艺思想，在深受“无冲突论”、写“理想”的英雄人物、写本质等公式、概念、教条束缚之苦的中国文艺界引起共鸣，是必然的。

马烽、康濯、郭小川、刘白羽等人在发言中一致承认中国的文

学创作存在着回避斗争、不敢干预现实生活、不能真实地描写生活的缺点。这篇小说当时被团中央推荐为青年必读书。有些青年学生读后提了批评性的意见。马烽说,这些意见"实际上要求凡是正面人物,都不应该有丝毫的'缺点',一言一动都应当合乎'组织原则',不管你是老几,也不管你所处的具体环境,必须这么办",或者是要求文艺作品介绍工作方式。青年学生对文学作品产生这样的不正确的要求与看法,原因很多,"我们的一些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以及一些教条主义的批评,也给了他们一些不良的影响,甚至是很大的影响"。马烽还指出,尼古拉耶娃的作品是通过尖锐的思想斗争刻画人物的,我们的作品多是通过与自然灾害的斗争表现英雄人物的,"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取巧的办法,是一条绕开生活中尖锐矛盾的狭窄小路"。有的作品接触了新与旧的社会矛盾,但多半限于很小的范围,如家庭,批评干部至多写到区一级,批评到县一级的几乎没有,最多的是村干部。他认为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除了作家方面的原因外,就是有些人"怕捅漏子,怕受批评,不敢大胆地去正视这些矛盾,或者是不知道怎样处理才好,于是只好绕开走"①。

康濯认为,与尼古拉耶娃的小说相比,"我们创作中存在的严重的问题之一,正是粉饰生活和回避斗争。这种情形甚至在优秀的作品中也在所难免"。"我们的作品还不能及时地热情蓬勃地提出当前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不能尖锐地接触到人民生活的脉搏,因而不能同生活发生更紧密的和火热的联系;另一方面,有些同生活紧紧相连的、充满热情的作品,如像过去一些朝鲜通讯等,却又有人吹毛求疵,说是粗糙或艺术性不高——从创作和批评两方面来说,这都是一种危险的现象,是我们有些作品不能在群众中发生影

① 《不能绕开矛盾走小路》,《文艺报》,1956年第3号。

响，和作家受到群众责备的一个重要原因。”[1]

郭小川说：“把矛盾和冲突解决得太轻易，或回避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这在我们的文学现象中，也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在作品中揭露矛盾和冲突，必须是通过人的性格的冲突，必须按照文学艺术的特殊的方法去表现，否则，矛盾冲突尽管揭示出来了，却不是文学艺术。”[2] 刘白羽承认，我们的文学作品的突出问题是，“没有真实地、按照历史的发展来写我们的现实生活”[3]。

参加这次讨论的，多是“领导作家”。他们所指出的文艺创作回避矛盾冲突、不敢“写真实”的问题，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然而，在为了反驳胡风对新中国文艺事业的“诬蔑”而大谈文学艺术如何繁荣兴旺余音犹在的时候，承认这样一种事实，也需要一定的勇气。我们还应注意，刘白羽等人仍把问题的责任归于作家，而马烽、康濯却已经对于造成这种状态的客观因素表示了不满。因此，这次讨论应当看做1956年逐步发展起来的对于文艺领域的教条主义的声讨与批判的重要起点。但是，由于文艺界的大气候并未发生变化，这次讨论对此后不久召开的作协理事会第二次会议没有发生影响。

2月4日，作协创作委员会诗歌组也开会讨论创作问题。这次会议讨论的深度不及小说组。多数人发言批评艾青，说他新中国成立后创作不足，质量下降，原因是“政治热情不够，生活还不够深入”、“不够振作，思想感情不够健康”等，这表明诗歌界的思维还在“矛头向内”的轨道上运行。比较有价值的是力扬的观点。他说：“展开正确的批评，是发展诗歌创作的必要条件。”“我们对现代的以及‘五四’以后的一些新诗的流派和重要的诗人，都还没有作

① 《不能粉饰生活，回避斗争》，《文艺报》，1956年第3号。
② 《通过人的性格揭示矛盾》，《文艺报》，1956年第3号。
③ 《在斗争中表现英雄性格》，《文艺报》，1956年第3号。

出全面的评价。如对戴望舒的估价，就不够全面。我认为'现代派'除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一面以外，它们在艺术上对现代诗歌创作的发展仍是有贡献的。我们应该把'五四'以来的诗歌全面研究一下，找出它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流。"[①] 这表明，诗歌界开始出现反对完全以政治标准评价作品的思想斗争。这些都是解放思想的萌芽。

国家政治经济建设的迅猛推进，执政党知识分子政策的趋于宽松，文艺工作者、社会各方面包括党的领导人对文艺现状的不满，对文艺领导层形成巨大的压力。周扬等人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据当时中宣部的工作人员黎之回忆，有一次谈及创作中有种种条条框框的清规戒律时，周扬说：不要搞的真像胡风所说的像中世纪一样[②]。为了推动文艺创作，1956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6 日，召开了中国作协理事会扩大的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距上次会议已经整整过了两年半。

作协理事会第二次会议盛况空前。200 多名理事、代表出席，周扬、茅盾、康濯、刘白羽、老舍、陈荒煤等作报告，巴金等 34 人作大会发言，唐弢等作了书面发言。毛泽东率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康生等接见、照相，刘少奇专门约见周扬、刘白羽谈文艺[③]，周恩来出席晚会并和作家谈话，陈毅到会作指示，这在作协理事会的活动史上都是空前的，足见最高领导层对文艺的重视。《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消息，并迅速发表了会议报告和大部分会议发言。《文艺报》发表了所有的报告和发言。然而，由于对文艺的落后状

---

① 《文艺报》，1956 年第 3 号。

② 黎之：《回忆与思考》，《新文学史料》，1994 年第 4 期。

③ 刘少奇说：现在对文艺批评太多了，特别是口头批评和品头评足太多了。这一点应引起注意。他对政治上干涉过多、粗暴，提出了批评，说"以后遇到这种干涉的时候，没有正式文件，就可以当做个别人的意见，可以不听"。周扬、刘白羽很兴奋，回来后向代表们作了传达。见黎之《回忆与思考》，《新文学史料》，1994 年第 4 期。

况估计严重不足，更没有找出文艺落后的真正原因，这次在极为有利的形势下召开的盛况空前、声势浩大的会议，却毫无新的内容与重要意义可言。

周扬的报告是这次会议的核心文件。这个题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的报告，甚至不愿意坦白地承认文学艺术严重落后于生活的现实，反而极力宣扬文学艺术经过“思想战线上的一系列的斗争，特别是批判和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所取得的成绩，反复强调文艺创作已经出现了“新气象”，“正在走向旺盛与繁荣”。“文艺创作不但没有像胡风所诬蔑的那样，‘萎缩’、‘枯死’下去，而是相反，它们正在茁壮地成长。”“‘萎缩’、‘枯死’的只是一切反动的文艺而已。”[①] 他用 1/4 的篇幅回顾了 1954 年以后的“思想斗争”特别是同胡风集团的斗争，得出了“革命文学史就是一部和各种反动的‘理论’和‘派别’作斗争的历史”的荒谬结论。周扬批评了公式主义和自然主义，认为这是妨碍文艺创作的主要障碍，然而，他把公式化、概念化、自然主义等的一切问题的责任，照旧归之于作家，没有从领导的角度作一句自我批评。在 1953 年的第二次文代会上，面对作家们的不满，他还有勇气承认对文艺的行政干预是妨害创作的原因之一，在“打败”胡风的“进攻”之后，周扬们连这一点自我批评的勇气都丧失了。

出席作协理事会的当然是中国文艺界的上层知识分子。他们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令人失望。除了唐弢在书面发言（发表于 1956 年 3 月 31 日《人民日报》）中尖锐地提出“同庸俗社会学倾向作斗争”，即同文艺批评与文艺理论中机械地、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作斗争，另有罗荪对文

---

① 《文艺报》，1956 年第 5、6 号合刊。刘白羽关于文学创作的报告、陈荒煤关于电影剧本创作的报告、康濯关于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创作的报告，都坦率地承认创作严重落后于现实，但这些报告并非会议的核心文件。

艺批评状况表示不满外，几乎所有的报告与发言都随声附和周扬的报告，丝毫不敢触及文艺理论、文艺思想、文艺领导中存在的问题。这并不能过多地责怪他们。胡风事件刚刚过去，肃反运动尚未结束，周扬还在声讨胡风、批判丁玲；人们大讲繁荣文艺，对妨害文艺繁荣的真正原因却讳莫如深，文坛空气的紧张依然如故。领导层没有作出任何准备进行真诚的自我反省并放松对作家的思想监控的表示。这样，被棍子打怕了的作家们也就不可能在公开场合发表"僭越"的言论。

然而，作协理事会上的"一面倒"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现象掩盖下的是领导层与文艺工作者的无声对峙。这种局面，只能靠引人其中一方难以抗拒的外力来打破。这种外力很快为文艺工作者找到了，它就是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文艺界走向"解冻"过程中出现的新理论。

众所周知，30年代以后，中国的无产阶级文艺始终为来自苏联的文艺理论所支配。苏联的理论，不论是斯大林的理论、"拉普"的理论、日丹诺夫的理论，还是其他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的理论，都被中国革命文艺界不加区别地当做了"圣经"。苏共以行政力量对文艺的每一强力干预，苏联文艺思想的任何重要变化，都会在中国引起相同方向的反应。斯大林逝世后的第二年，西蒙诺夫在全苏作协大会上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公开提出异议，得到广泛响应。1955年下半年，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第18期发表题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的专论，再次对斯大林时期的文艺思想提出挑战。虽然此时的苏联正在滑向"修正主义"，但中国人尚未察觉，视苏联的一切为神圣的思维习惯还没有改变。因此，当1956年2月间《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的译文在《人民日报》、《文艺报》发表后，文艺界便"拉大旗作虎皮"，向僵顽不化的教条主义发动了试探性的进攻。

这篇"专论"抨击的对象是马林可夫在苏共十九大政治报告中

对典型问题下的定义:“典型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中的表现的基本范围。典型问题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专论”批评马林可夫的定义是“烦琐哲学的、错误的观点”,是“冒充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它强调艺术认识与反映现实有其特殊的形式与规律,认为把典型问题仅仅规定为一定社会力量、一定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的体现,就会脱离艺术创作的生动实践,忽视艺术认识与反映世界的特点,导致公式化;典型不能等同于党性,典型不能完全归结于政治,否则就会使人们以反历史的态度对待文学艺术;不能不顾艺术家创作的时代和条件以及他的世界观的性质,企图从任何一个典型中找到党性立场的表现,因为“党性是以世界观的自觉的明确的阶级性为前提,这远非一切艺术家所固有”;不能把艺术典型化的某些方法如夸张神圣化、绝对化,无条件地要求有意识地夸张现实生活中的正面现象,并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体现社会的本质,否则就会抹杀真实的现实。“专论”号召文艺工作者“根绝美学中的烦琐哲学和教条主义”,“打开广阔的天地从各方面来研究典型问题和其他重要的美学问题”,“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来揭穿内容贫乏的教条和公式”①。

我们不清楚是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批准发表这篇“专论”。这篇文章简直就像为中国文艺界而写,它的主要观点乃至一些语言,竟同胡风如出一辙。从新中国成立初开始,中国文艺界领导层不但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神圣化,而且公然提倡“本质论”、“无冲突论”,强调歌颂中的夸张,强调写“理想化”的英雄人物,绝对化地强调作家的世界观与文艺作品的政治性、阶级性。这正是“专论”所明确反对的,也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所深恶痛绝的。所以,作协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后,作协创作委员会理论批评组即对“专论”和典型问题展开讨论。这次讨论以及其间的争论

① 《文艺报》,1956年第3号。

与交锋，成为“双百”方针公开提出之前文艺界批判教条主义、解放思想的先声。

《文艺报》第8、9、10号先后发表的张光年、林默涵、钟惦棐、黄药眠、陈涌、巴人、王愚、李幼苏的发言记录或文章，表面上一致赞同“专论”的观点，认为我国文艺创作中存在着“专论”所批评的问题，但细细看来，他们的观点、强调的重点和态度，差距甚大。赞同“专论”的观点并对我国文艺创作的现实持激烈批评态度的，以张光年、陈涌为代表；貌似全面，实则对“专论”有相当保留的，以林默涵为代表。

张光年集中抨击了“本质论”。他首先肯定，我国文艺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的错误并不是直接受到“专论”批评的错误理论影响以后才产生的，“在我们的文艺界，流行着一些大同小异的更加简单化的公式。问题是，‘专论’批评的典型问题的错误公式，使我们文学艺术中的公式化、庸俗化现象找到了理论上的根据”；文艺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以“本质论”为核心的庸俗化的文艺批评造成的。他说，艺术要反映生活本质，但要用完全不同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即典型化的方法去反映；仅仅把典型规定为与一定社会力量、一定社会现象的本质相一致，就会放弃典型的个性化的要求，鼓励千篇一律的描写，从而使文艺作品变成公式、规律、工作过程、工作经验的图解和政治论文；而庸俗社会学的批评又会简单地抓住社会本质的教条，把社会科学的公式硬套在文学评论上。他警告说：“理论家不管有怎样高的天才，怎样高的理论水平，如果不是时时注意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在下科学定义的时候，如果不充分估计到丰富的生活实际，文学艺术创作的生动实际，而单凭逻辑推理来解决问题，那是很容易发生错误的。”①

① 《艺术典型与社会本质》，《文艺报》，1956年第8号。

陈涌的批评更加尖锐。他集中地批判了庸俗社会学。他说，我们的理论批评工作中存在着庸俗社会学的倾向，庸俗社会学并不比唯心论好一些；“庸俗社会学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否认文学艺术的特殊的性质和任务，否认文学艺术有它自己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殊的规律，而用一般社会学的公式生吞活剥地代替对于文艺的具体生动的实践的研究”，因为它表现得很革命，仿佛从马克思主义原理中来，很能迷惑人。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忽视对文艺特殊性与特征的研究，不但没有专著，甚至连比较有价值的论文都没有。他以武汉大学教授、文艺理论家程千帆先生的一篇学习《实践论》的体会文章为靶子，认为在文艺创作问题上照套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三阶段论”，正是典型的庸俗社会学的公式。这个公式实际上要求作家、艺术家在成为作家、艺术家之前先成为科学家，在形象思维之前先进行逻辑思维，只有在逻辑思维中达到的，才能在形象思维中达到，完全违背了艺术创作的规律。“按照这个公式进行创作，便只能产生没有艺术生命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陈涌指出，文学艺术作品不是工作报告、理论著作，不能要求每一作品都能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抒情诗、风景画、静物画便是这样。“现在我们便有些人在一切作品面前日夜都打着灯笼去找寻主要的矛盾斗争，已经到了可笑的地步。”陈涌明确反对“千篇一律”地要求文艺为具体的工作服务。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主要表现在为国家的根本政策服务，不能像要求一般的宣传教育一样要求文学艺术。文艺的特殊作用是“在人们的精神上发生深远、持久的影响的美感教育的作用”，这正是它的特性[①]。很显然，几乎同胡风一样，陈涌把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创作落后的根源归因于“庸俗社会学”，并公开批评了周扬等人一直宣传和坚持而为胡风、冯雪峰等人坚决反对的“赶任务”、“写政策”。在批判胡

① 《关于文学艺术特征的一些问题》，《文艺报》，1956年第9号。

风余音在耳、文艺界领导人根本不承认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这样的言论大有石破天惊的效力。

此时的林默涵，显然处在备受批评与攻击的被动地位。敢批胡风、批丁玲甚至也敢批判冯雪峰的林默涵，对于苏联的一篇并非大人物写的文章，却没有公开反驳的勇气。他不敢说“专论”的观点不对，也不敢明确否定中国文艺创作中存在着“专论”所批评的问题，但又不甘心承认人们的批评，只好玩弄文字游戏。“专论”的重点是反对把典型仅仅归结为一种社会力量或社会现象的本质。林默涵却反复强调：“典型是不是要反映一定社会力量或社会现象的本质呢？‘专论’并没有否定这一点。‘专论’认为把典型理解为仅仅是和一定的社会力量的本质相一致，这种说法是片面的。”“‘专论’不是说典型不是社会力量的本质的表现，不是推翻这种说法，而是指出了这种说法的片面性。”徐迟先生曾提出过去对典型创造的要求过高、编辑部要作家带着意图下去找材料不妥等意见，受到林默涵的批驳。他说：“应该责备有些批评家和文艺领导者粗暴地要求作家按照某种条文去写作。但更主要的还在于作者自己，作者应该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应该敢于按照生活的真实来修改自己的思想、意图，来拒绝别人的无理要求。这是作者的权利。我们往往还缺少这种勇气。”[①] 他在说这种冠冕堂皇的话的时候，全然没有想一想自己主持下的文联有没有为作家提供起码的创作自由甚至人身自由的保障。

无论如何，文艺工作中存在的庸俗社会学的错误已是千夫所指，林默涵不能不后退一步。他承认，“典型不能和党性等同起来，过去我们在这一点上是糊涂的，看了‘专论’，比较清楚些了”。“关于典型和党性的关系问题不明确，使得一些理论批评文章中（特别是批判胡风期间的某些文章）产生了简单化的倾向。”“在批判胡风

① 《关于典型问题的初步理解》，《文艺报》，1956年第8号。

的运动开始时，是准备同时批判文艺思想上的机械论、庸俗社会学的倾向的。但因为我们的力量不够，又恐怕在读者中间引起混乱，才决定把后一工作推迟一步。""应该说，在最初批判胡风的时候，还不是把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关系简单化的。我们指出了在旧现实主义作家中，世界观和创作方法可以存在矛盾，同时也指出了世界观的消极的一面对创作会发生消极的影响。后来发展下去，似乎就认为古典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全没有矛盾了。"[①] 他本人就是"最初"批判胡风的人，"后来发展下去"的方向，即是由他和周扬、何其芳等人决定、引导的。现在他却说他最初的批判没有错，"后来发展"如何，似乎与己无关。林默涵仍然极力强调作家非有工人阶级党性不可，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必须有和新的现实、和先进事物相吻合的世界观，实际上仍在顽强坚持他在批判胡风时提出的"作家首先要具有工人阶级的立场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的完全违反作家成长规律、脱离实际的荒谬理论。

鉴于"专论"的基本观点与胡风思想相同或相近，政治上极为敏感的林默涵不得不几次提到胡风，意在掩盖和割断"专论"与胡风思想之间的联系，这反映出他的内心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担心和恐惧。对于这种担心和恐惧，黄药眠先生表达得更加明确。他赞同彻底批判庸俗社会学，又担心胡风思想"借尸还魂"。他说："在这次讨论会上，有人认为学习'专论'要防止胡风反动思想复辟。有人认为没有这种可能，不必害怕。我看还是可能的。作为胡风的文学理论的基础的阶级还存在着，所以胡风的论调也就有可能借尸还魂。"[②]

作协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后，文艺界的空气逐步趋于活跃，但是，像典型问题的讨论这样直言不讳地批判文艺理论中的错误，并

---

① 《关于典型问题的初步理解》，《文艺报》，1956 年第 8 号。

② 《对典型问题的一些感想》，《文艺报》，1956 年第 8 号。

不多见。它表明文艺工作者正在从胡风事件和肃反运动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同时也表明，反对教条主义与维护“左”的错误的两条阵线，或者说1956年年底、1957年年初公开亮出旗帜的左右两种势力的对峙，在这场讨论中已初露端倪。

8.4 五月和风:“双百”方针的提出与讨论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震动了全世界。毛泽东迅速作出反应。为了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他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就意识形态领域来说，毛泽东的讲话虽然没有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运动作任何的反思，但还是提出了若干新的观点，如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提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对苏联的经验，也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照抄照搬；自然科学“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技术“大部分先要照办”；对外国资产阶级的腐朽制度和思想作风要抵制和批判，“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①]。这些话今天看来极为普通，当时却并不简单。

据说在政治局讨论毛泽东的讲话时，陆定一作过长篇发言，讲科学、文艺问题。毛泽东不断插话，对苏联这方面的一些简单做法提出批评。4月28日，毛泽东在作政治局会议总结时正式提出了“双百”方针。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5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101、103页。

月2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重申"双百"方针。他说:"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5月26日,陆定一应郭沫若之邀,在怀仁堂向2000多名科学文艺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6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过修改的陆定一报告稿。从此,"双百"方针成为全国知识界关注和讨论的中心问题。

现代国家应当尊崇民主与法治,以宪法为国家生活的最高权威。科学和文学艺术正常发展的条件,要靠宪法和法律来保障。由此看来,我们过去对"双百"方针的评价是过高的,因为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①],均属一般民主国家的公民应当享有的言论自由。对这些公民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明确规定,它的涵义应当比毛泽东、陆定一的解释更广泛。"双百"方针的提出,不过是在用革命时代的政治运动方式强求思想、学术、言论、出版等的绝对一律因而严重损害了科学文化艺术发展后不得不作出的政策调整。它是执政党还没有树立自觉的法制意识、政策还高于法律的例证。何况"双百"方针本身也是有严重缺陷的。

但是,把"双百"方针放到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的积极意义却毋庸置疑。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运动一直以"资产阶级思想"为批判对象,而对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并无确切的定义。执政党力图将思想、言论、学术、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统统纳入马克思主义轨道,影响所及,自然科学都有了阶级性,在铁路设计中采用最新的美国信号技

① 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300页。

术也会被扣上政治帽子①。俞平伯、胡风更是因言获罪。不但知识分子所期望于新中国的、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没有兑现，就连旧中国的学者们已经享有的科学研究的自由也受到侵犯。现在执政党虽然仍把政治问题列为不可讨论的禁区，但已明确表示科学与文艺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唯心主义也可以自由发表，提倡自由讨论，不再搞政治批判，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然而，此时的知识分子，经过政治运动的打击，已成惊弓之鸟。他们欢迎"双百"方针，但对这个方针能否真正实行，绝大多数人是半信半疑，顾虑重重，瞻前顾后，踌躇不前。为了消除知识界的顾虑，把"双百"搞起来，在执政党的有意引导和民主党派的积极推动下，1956年6、7月间，以北京为中心，开展了关于"双百"方针的讨论。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文学艺术、教育、学术刊物、图书出版等领域的部分知识分子参加了讨论。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曾组织600多名科学家开展讨论，高教部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也把讨论"双百"方针作为重要内容。民盟、民革、九三学社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各大学和科研单位，也都召开过许多座谈会。讨论和争论集中在"双百"方针的内涵与实行条件等几个问题上。

第一个问题是，实行"百家争鸣"要不要有所限制。倾向性的意见、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不要有任何的限制。6月19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发言提出，"百家争鸣"要"鸣得好，争得好"。7月1日，他又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演奏出雄壮的交响乐》的文章，认为"百家争鸣"譬如是一个交响乐队，"万种乐器齐奏或叠奏，但总要按照着一定的乐谱"。"鸣得更多一些，更快一些，更好一些，但也要更省一些。""我们不是光'争鸣'，而是要'争鸣'得好，鸣得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如果一阵乱叫或乱打响器，别人便只

① 朱汝昌：《从我所遇到的一次论争来谈"自由讨论"问题》，《光明日报》，1956年6月10日。

好蒙着耳朵，或者甚至请你出乐厅。"他的观点引起普遍的反对。

《新闻日报》总编辑刘思慕先生说："争要争得好，鸣要鸣得好，这种提法使人意识为'争得不好的不能争，鸣得不好的就不能鸣'。交响乐队的譬喻也不恰当，交响乐队百乐齐鸣，听起来是和谐的。学术上的争鸣有相反的意见，调子不一定和谐。郭院长的意见，有消极限制的一面，我是不敢苟同的。"中南财经学院院长马哲民教授说："我很反对郭沫若院长的说法。他认为'百家争鸣'不要乱鸣。事实上'百家争鸣'开始的时候，不可能没有一些乱的。""现在最要紧的问题，是如何创造条件，保证大家'鸣'，不能提出任何限制。"沈志远先生反对把"百家争鸣"拆开来作咬文嚼字的讨论，反对"事先定一个框子"。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教授说："对所有限制性的意见，我是一概反对。我们要充分信任争鸣之士，不要有任何限制。"①

历史学家宋云彬教授说："我不同意在号召'百家争鸣'的同时定出过多的清规戒律来。"什么"要争得好、鸣得好"啦，"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啦等，全是废话，"要求大家'争得好，鸣得好'，'好'的标准究竟是怎么样的呢？争得不好、鸣得不好又怎么办呢？我的意见，凡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都可以承认它是一家之言，让它有宣传和辩论之自由。'持之有故'就是理论有根据（至少能够自成一套）；'言之成理'就是说话要有条理合乎逻辑（至少能够自圆其说）。当然，所谓有根据，它的根据不一定是唯物主义的，可能是唯心主义的。那也不要紧，我们可以展开辩论，展开斗争。展开辩论也不一定要得出结论（能够得出结论自然更好）"②。

---

① 《光明日报》，1956年7月9日。

② 《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对"百家争鸣"的一点体会》，《人民日报》，1956年7月14日。

罗隆基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的发言曾把"百家争鸣"比作管弦乐队,同样遭到人们的反对。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费孝通教授说:"百家争鸣不可能是同一个调子,目前要争鸣,就一定有杂音,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的言论,都可以鸣。"沈志远说:"自由争论决不能是一个调子,争鸣时有辩论,有分歧,调子是杂乱的,经过一段较长久的时间之后,才能求得真理。""百家争鸣永远不能达到如交响乐那样的和谐的地步,因为社会永远是存在着矛盾的,争鸣到一定程度,大家的意见在某些问题上比较接近了,原来的矛盾(意见的分歧)解决了,但又会有新的矛盾、新的争论出现。"著名记者范朴斋说:"在指挥旗下演奏交响乐的比喻,意思等于是说,要在有安排之下来个百家争鸣,这种说法会阻碍百家的争鸣。"① 在知识界,这种主张"百家争鸣"不加任何限制的意见,逐步成为主流。

第二个问题是,"百家争鸣"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争鸣要不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标准或条件"②。对此,一开始就存在严重的分歧。讨论初期,多数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都主张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6月11日到13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600多名哲学和社会科学家讨论"双百"方针,首先提出的问题就是学术研究、学术争鸣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范文澜认为,马克思主义理应成为"百家争鸣"的指导思想,因为马克思主义"不能作为一家之言对待"。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主张,"'百家争鸣'首先要肯定马克思主义是衡量百家之说的共同标准,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就不可以谈"③。王亚南、朱光潜以及清华大学张光斗教授等持同样的观点。朱光

---

① 《光明日报》,1956年7月9日。

② 底之:《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讨论》,《光明日报》,1956年8月14日。

③ 《光明日报》,1956年7月10日。

潜先生的论述比较系统。他在7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百家争鸣，定于一是》的文章中说：

> 定于一是，这是百家争鸣的最终目的。怎样争鸣，才可以走最迅速又最稳健的道路达到这个目的呢？这是目前我们所要郑重考虑的问题。党在我们大力向科学进军的时候提出了"百家争鸣"的方针，为的是要纠正过去一些主观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偏差，建立学术自由争论的健康风气，使科学可以蓬勃发展起来。这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光明大道，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运用。有些人看到要破除"清规戒律"，不免误认为这是放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尺度，甚至于私自庆幸，以为这符合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不适用于文艺和自然科学的看法。这些人仿佛以为我们过去犯了一些主观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偏差，原因就在于要到处推行马克思主义。其实主观教条主义恰恰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过去固然不免有人有时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假冒反马克思主义的勾当，但是这宗罪过决不能记在马克思主义的账上。

开始讨论"双百"方针时，就有人反对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报道说，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的讨论中，"有的科学家认为争鸣不一定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应该自由发表各家的学说"。随着讨论的深入，这种声音逐步高涨，并成为多数人的意见。7月，北京、天津、沈阳、重庆等地的知识界，"有不少人认为，提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对争鸣的限制"。天津大学副校长、物理学家张国藩主张，"争鸣应以人民利益和客观真理为准绳，具体地说就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维护宪法"。"如果提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准绳就会使人感到限制。"新从瑞典回国的中科院副研究员郭可信说，新归国的留学生未学过马克

思列宁主义，如果提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他们就不敢"鸣"了①。7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秀德明的来稿《该不该划圈子》，认为如果只允许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鸣"，学术思想上的研究讨论，还是不会自由展开的。"学术思想上的争论，可以是在马克思主义原则下的对某些问题的不同认识的争论，也可以是和马克思主义针锋相对的争论。在我们的社会里，这两种类型的争论都应该容许其存在。有唯心主义的不对，才显示出唯物主义的正确。"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略论"百家争鸣"》，明确表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国家活动和文化科学的指导思想，这是已经确定的。但是，在学术问题上，在科学研究中，如果有人不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或达到了和马克思主义不一致的结论，他仍然可以有权发表自己的见解。因此，是不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或评判是非的标准，那也要看各人自愿。"这篇评论员文章的发表，标志着"百家争鸣"可以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张，在知识界占了主导地位，并且得到了党的认可。

第三个问题是，唯心主义是否有自由争鸣的权利。这个问题，陆定一的报告说得很清楚："在人民内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鉴于从严厉批判唯心主义到让唯心主义自由发表的弯子转得太大，还是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初期有人不赞成让唯心主义自由争鸣，理由是："百家争鸣"是为了探求真理，唯心主义本来就是谬误，为什么给它自由发表的权利？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批判知识分子中间的唯心主义，让唯心主义自由发表，思想改造成果会不会毁于一旦？这个问题的认识虽然很快得到表面的统一，但允许唯心主义自由发表的目的却不同。有的认为只有让唯心主义发表出来，才便于批判它，使它真正归于消灭。有的认为，唯心主义在老专家中间是客观的存在，既然存在，

① 《光明日报》，1956年7月22日。

就应该让它发表出来,“如果学术研究上没有唯心主义发言和讨论的地盘,并不能就说没有唯心主义了。可以打一个譬喻,虽然是阴天,并不是没有太阳”。也有一些比较深刻的观点。如蔡仪提出,学术问题本身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自以为是唯物主义者的人,他的学术研究,可能有些地方是唯心主义的。许多东西,在某些场合下,一时很难断定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在文艺理论上,这样的现象很普遍。只有通过自由讨论,才能分得清。他还说,即使唯心论也不是简单的学说,并非没有一点可取的地方,不能简单地否定一切。康德在认识论的提法上就是有贡献的,虽然他的基本论点是错误的。朱光潜的美学论点是错误的,但他对文学的想像问题却有很深刻的分析,对文艺的特征,也把握住了一些东西①。在唯心主义也有发表自由的思想支持下,教学内容向苏联“一边倒”的大学文科教学迅速趋向活跃。1956年下半年,北大带头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罗素哲学”,由中国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兼北大教授金岳霖先生主讲。1957年上半年开设“黑格尔哲学”,由贺麟教授主讲。该校经济系、法律系也积极准备开设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课程。

第四个问题是,高校教学能否实行“百家争鸣”。“双百”方针提出后,立刻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九三学社、民盟由于与文科系统关系密切,积极推动这一讨论。民主党派的机关报《光明日报》成为主要的争论园地。持反对态度的人认为: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地方,学生是在教师指导下学习科学知识,把还没有定论的东西介绍给学生,会使学生无所适从;教学大纲是国家规范教学的指导性文件,应按大纲进行教学,教师个人的意见和见解,不应当在课堂上讲。有的认为高年级教学可以“争鸣”,低年级不可以;专业课教学可以“争鸣”,基础课不可以。东北地质学院院长俞德渊、东北工学

① 《光明日报》,1956年6月14日。

院院长靳树梁、四川大学校长彭迪先、西南农学院副院长何文俊等不赞成把“百家争鸣”搬进课堂。广西师范学院院长梁唐晋先生在1956年8月17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专文，阐述了不能在课堂教学中实行“百家争鸣”的理由。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不少，但像梁先生这样写了文章系统地论证自己观点的不多。

经过几个月的讨论，大学教学可以实行“百家争鸣”，成为绝大多数人的意见。在教学中实行“百家争鸣”的含义，是课堂教学除了讲授教材内容外，还可以介绍与教材不同的学术观点；除了讲定论外，还可以讲尚在研究和讨论中的问题；除了讲权威人士的观点、教研室的观点外，教师可以讲自己的学术见解，通过不同学术观点与研究信息的交流，启发学生独立地研究、思考与判断。赞成这样做的理由，主要是认为在教学中实行“百家争鸣”，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对这个问题论述最深刻、至今尚有重要意义的言论，当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朱启贤教授在1956年11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对教学中也要百家争鸣的主张不必怀疑》一文。

朱先生认为，反对在教学中实行“百家争鸣”的人没有考虑这样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学报上、论坛上出现了百家争鸣，学生不可能不读到、不听到，他们自然会向教师提出自己的看法，教师与其被动地、零碎地、分散地处理，不如在教学中主动地、有计划、有步骤处理。第二个因素是，“课堂上如果不讲不同的意见，只讲某某‘权威’自以为是的一家之言，其结果必然是闭塞青年一代的思路，不能培养青年一代的独立思维的能力，使学生成为背诵教条的奴隶”。第三个因素是，“在教学目标上应该培养青年一代的独立思考能力，如果没有不同的意见，又如何能有深入的思考？如果不让学生有独立思考的机会，不引导他们作独立思考的实际活动，又如何能获得独立思考的能力？”教师在课堂上像留声机一样背教条，学生记笔记，把教材以外的一切学问一概抹杀，又如何培

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朱先生认为,反对在教学中实行"百家争鸣"的人,"也许不仅不承认高等学校应当培养学生具有独立思考、辨别是非的能力,一定也不会承认青年人的独立思考、辨别是非的能力,是能够通过科学教养、特别是通过科学方法和逻辑的教养而培养起来的。他们也许不仅不知道现在许多青年人之所以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是由于过去几年中某些教条主义教学的自然结果,也不知道教条主义教学是绝对要不得的,因为它不可能完成国家办教育培养人才的任务,它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学理论根本不相容的。他们也许忘记了'真理有客观标准'、'真理愈磨愈明'的道理。在教学上越是出现不同意见的公开争论,青年人的头脑就越清楚,从而领导他们进行深人的研究就越容易"。朱先生还从大学的教学内容、人的发展等两个方面,有力地论证了高等学校教学中有条件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而且"高等学校的性质决定非贯彻它不可"的道理。

第五个问题是,实行"百家争鸣"的外部条件。人们提出来的问题很多,主要集中在对随意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的粗暴批评、崇拜权威的思想、学习苏联中的教条主义、出版不自由、领导无度量等问题上。各方面的知识分子都对压制学术自由的风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张光斗教授说:"以往在技术科学方面,不是'百家争鸣',而是根本没有'鸣'过。"傅鹰教授说,共产党和政府过去倡导学术自由,但情况并不好,因为有些人随便给人扣帽子,如果谁对李森科的学说提出不同意见,就会被戴上"你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你这是唯心主义"的帽子,这种态度,和共产党的政策相违背[1]。有些人"往往把学术问题的争辩认为是简单的是非问题,甚至把学术上的思想认识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不但不支持讨

① 《光明日报》,1956年5月28日。

论，反而妄加指摘或者给别人扣帽子。个别担任行政职务的人，甚至滥用行政命令来解决学术问题，粗暴地加以干涉。还有一些人，受资产阶级的权威思想的影响，习惯于使所有的意见定于一律"[1]。因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能不能贯彻，在相当的程度上要看文艺和学术的领导人有没有大的度量"[2]。许多人指出，由于粗暴批评，在学术研究中形成了一种人云亦云、吞吞吐吐、附和权威、心口不一的风气，"不愿意表达针锋相对的意见，没有'争鸣'的风气，只是习惯于说同一种话，把心里的一套看法按捺下去"[3]，于是教条主义便滋长起来，不少人在教学、研究中只读、只说马恩列斯和中国革命领袖、苏联专家以及中国权威学者们说过的话。刊物、出版社、图书馆，本来是传播和保留各家的"鸣"声的。"但是，几年来，文化界不知怎么一来，有了那么一条清规戒律，有人一被批评(有时这批评还不一定对，甚至根本错误)，刊物就不愿再发被批评者的稿子，出版社就不愿再出他的著作，书店也不愿再卖他的书了。有的图书馆则干脆抽去登记卡片，列入禁书。结果呢？被批评者沉默不语了，别人也再不提不理他了，一切都似乎盖棺论定。读者想再看被批评的著作，只能自恨无缘。""如果这风气继续存在下去，'百家争鸣'的前途是略可想见的，也许一开始是百家一轰而起，还没有等到'争鸣'，就会先被这种清规戒律打得剩下九十九家、八十八家、七十七家……最后只剩下一家独唱。"[4]所以，"'百家'在现代怎样'鸣'法，很显然，是出版"[5]。

---

① 《民主党派有责任为"百家争鸣"创造条件》，《光明日报》，1956年5月28日。

② 李长路：《宰相肚皮》，《人民日报》，1956年7月2日。据当时《人民日报》文艺部负责人袁鹰回忆，这篇杂文是经过胡乔木亲自修改的。见《我所知道的胡乔木》，第198页。

③ 《光明日报》，1956年6月14日。

④ 何弃：《"争鸣"和著作》，《人民日报》，1956年6月17日。

⑤ 黎锦熙：《实现百家争鸣的具体措施》，《人民日报》，1956年7月5日。

讨论“双百”方针的时期，正是苏共二十大影响到社会主义各国包括中国的时候。执政党继续放宽知识分子政策，听任不同意见发表，气氛相当自由。但是，令人瞩目的是，对“双百”方针的讨论，知识界比较热心，党的干部很少发表意见；党外知识分子意见比较尖锐，党内知识分子说话非常谨慎；在“热心”的知识界，积极参与讨论的是少数，多数人还是作“壁上观”。这说明多数人或者是仍不相信执政党改变政策的诚意，或者是余悸尚存，不敢轻易开口。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长之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有些人对“双百”疑神疑鬼，担心“说唯心论也有宣传自由，是不是一个策略，让唯心论者自由宣传一下，好‘整’他们？”[1]

阻碍人们积极参与讨论的根本问题之一，是“双百”并不包括政治范畴的问题。执政党的基本立场是把学术与政治分开，学术问题可以自由讨论，言外之意，政治问题不可以自由讨论。但是，连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问题都经常被说成是“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崇洋媚外”、“崇美反苏”，学术与政治怎么可能分得清楚呢？“双百”方针本身的这个根本缺陷，有人看到了。费孝通先生在一次发言中说，很多人不怕学术批评，怕得是“有些人强拉硬牵，引申到政治问题上去，这就麻烦了，尤其是社会科学，争到终了，不可能不涉及政治。目前有些人写历史文章，越远古越有人写，越近代越没有人写，原因就在此”[2]。在民主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很长的时期内，政治问题是不允许普通公民自由讨论的，即使专门从事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也罢。把政治问题划为“禁区”，是“双百”方针得不到贯彻的根本原因。“双百”之所以昙花一现，中途夭折，就是知识分子“侵入”这一禁区而“踏雷”的结果。

---

① 《欣闻百家争鸣》，《人民日报》，1956年7月5日。

② 《光明日报》，1956年7月9日。

8.5 八月突破:青岛遗传学会议及对学术界的冲击

1956年8月10日至25日,谈家祯、戴松恩、祖德明等130多位[①] 生物学家聚集青岛,召开了一次被时人称为"富有历史意义的学术集会"[②]。这次会议,不但是我国生物学界米丘林学派和孟德尔、摩尔根学派在学术讨论上的首次接触,也是自然科学界"百家争鸣"的开端。它有力地推动知识界从对"双百"方针本身的讨论,迅速地进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各个领域的实质性"百家争鸣",因而成为"双百"方针贯彻过程中一个有路标意义的突破。

正如本书第四章所述,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盲从苏联,执政党在科学领导中犯有严重的乱贴"阶级"标签的错误,特别是在生物学领域强制推行李森科制造的所谓米丘林学说,打击摩尔根学派,造成了严重的后果。1955年,苏联许多著名科学家联名上书要求罢免李森科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1956年4月,李森科被迫辞职,苏联科学院为被迫害致死的摩尔根学派著名学者瓦维洛夫平反昭雪。这一消息在我国科学家界引起极大震动。执政党及时地作出了反应。陆定一在"双百"报告中说:"在某一种医学学说上,生物学或其他自然科学的学说上,贴上什么'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之类的阶级标签,例如说什么'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的学说是社会主义的'、'米丘林的学说是社会主义的'、'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是资本主义的'之类,就是错误的。我们切勿相信。"[③]

---

① 会议开幕当天编发的新华社报道说,参加者有40多位科学家。

② 李有明:《遗传学会议后记》,《光明日报》,1956年9月13日。

③ 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313页。

深受政治压制之苦的生物学界，立刻发出恢复摩尔根学派合法地位的呼声。7月12日，北农大教授、学部委员娄成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对生物学课程中把核物质（特别是染色体）作为"禁忌"避而不谈，和在讲遗传性的物质基础的时候，把一些染色体中科学界公认的现象，如减数分裂和世代交替的关系，都抛开不提，以致有人一听到研究染色体就要发生莫名其妙的警惕的现象，提出了批评[①]。7月19日，《光明日报》发表北农大吴仲贤教授访问记，对否定摩尔根学说的错误，提出了进一步的批评。吴教授说，说摩尔根学说是"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反动的"学说的人都不是学遗传学的。他们或者是对这门学问不了解，或者是乱扣帽子，这样，当然也就谈不到科学的态度。摩尔根学说是一门国际科学，把它看成资本主义是不对的，应当正式列入教学计划。正是在苏联影响和国内科学界的促进下，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同中科院、高教部等商定，召开了这次遗传学会议。

这次会议开得相当热烈。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在会议开始时讲话，宣布全部摘掉过去强加给摩尔根学派的一切政治帽子。大会按照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的争论焦点，分为"遗传物质基础、遗传与环境"、"遗传与个性发育"、"遗传与系统发育"、"遗传学的研究与教学"等四个议题进行讨论，先后召开了14次座谈会，共有56人发言。因反对李森科学派而长期受到围攻、批判并因此而未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原中研院院士胡先骕先生发言达8次之多[②]。这是新中国的摩尔根学派科学家第一次与李森科的米丘林学派平起平坐，自由发表学术见解。会后，摩尔根学派的科

① 《教学改革中的百家争鸣》。

② 叶笃庄：《我国遗传学发展中坚持"双百"方针的艰难历程》，《炎黄春秋》1997年第8期。关于胡先骕先生1955年未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原因，另一种说法是因为"在政治上他同国民党的关系较多"，主张"政治不能干预学术"，等等。见《炎黄春秋》1999年第6期《中宣部科学处与中国科学院》一文。

学家享有同李森科学派同样的教学、研究、出版权利。自然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完全不讲科学态度地向苏联“一边倒”的局面终于被打破[①]。

青岛遗传学会议在自然科学最敏感的领域迈出了实际开展“百家争鸣”的第一步，极大地鼓舞了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法学、经济地理学、音乐、民族学、哲学、编译工作、学术期刊编辑工作等各个领域的“百家争鸣”也逐步开展起来。

法学是政治性、实践性最强的社会科学学科之一。1952 年，国家进行司法改革，时值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高潮，对资产阶级法学理论的简单否定、照抄苏联法学的教条主义，成为法学研究与教学中的突出问题。1956 年 8 月底，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召开贯彻“双百”方针座谈会，推动了法学领域的“争鸣”。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吴德峰教授指出，几年来法学领域缺乏自由讨论的风气，对不同意见的争论存在顾虑，大家写文章十分谨慎，司法改革后更加拘谨，对一些重要理论和认识问题未作深入的具体的分析研究，旧法观点批判后新法观点并没有系统地建立起来，因此对于分歧的问题，大家都不敢发表意见，“都怕受到公式化的批评”，“这种情况只会造成学术上的沉闷空气，只会助长学术武断和八股滥调的滋长”[②]。钱端升教授认为，法学界乱扣帽子的劲头还很大，有些青年同志常常抓住经典著作上的一两句话，就给人扣上“资产阶级的、封建残余的观点”等的大帽子。法学的阶级性、政策性特别强烈，它最容易引起扣帽子，展开争鸣，必须冲破这个障碍。北京政法学院国家法教研室主任严景耀教授说，许多教师的讲稿，离开经

① 1957 年下半年，形势再次发生逆转。从反右派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摩尔根学派科学家继续处于被否定、被批判的地位。在摩尔根学派的基因学说造就了生物工程、生命科学时代的今天，对科学领导工作的经验教训，似乎还有进一步反思的必要。

② 《光明日报》，1956 年 9 月 1 日。

典著作的话，自己再不敢说什么。对资产阶级的法学理论，除了骂它反动、虚伪以外，很少说出什么道理。北京政法学院副教务长雷洁琼教授、北京司法局副局长楼彦邦教授认为，法学界有割断历史的问题，老一辈法学工作者不受重视的问题很突出。北京政法学院教务长刘昂等人对照抄经典著作，照抄苏联教材，不敢独立思考，忽视中国实际与革命法制的历史经验的风气，提出了批评。1956年，法学界的争鸣并不深人，例如尚未提出如何对待资产阶级法学理论等这样一些基本问题，但是，由于学科的特殊性质，能达到这个程度，已属不易。

经济地理学是经济学领域受“左”的思潮干扰比较严重的研究领域。新中国成立后，不但经济地理学的一些基础理论被批判为“环境决定论”，连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也成了问题。有的人主张以研究生产关系为对象。有的认为既研究生产关系，也研究生产力。这就把经济地理学混同于政治经济学。1956年8月20日至25日，中国地理学会举行第二次学术报告会，对经济地理学的对象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学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地理教研室主任孙敬之教授提出，生产关系不是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他驳斥了主张经济地理学既研究生产力也研究生产关系的观点。武汉大学教授邓启东、南开大学教授鲍觉民、中山大学教授杨克毅等人支持孙敬之的观点。北大助教杨吾扬说，把生产关系包括在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之内，则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学都可以取消，这是庸俗的社会经济学的公式[①]。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是一门学科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经济地理学研究对象的拨乱反正，无疑于挽救了这门学科。

音乐界在7、8月间发生了一次有意义的争鸣。在音乐周筹备期间，陈沂发表文章说，“目前，在我们有些音乐、舞蹈创作中，存在

① 《光明日报》，1956年9月1日。

着一种不好的现象,这就是中西混杂、不中不西、看不出民族特色"[①]。音乐批评家李凌撰文反驳说,"不中不西"正是创作民族音乐形式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情况。音乐周期间召开的中国音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又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对待民族音乐遗产,如何吸收世界音乐文化中的优秀成果。阻碍新中国音乐发展的主要问题,一部分人认为是崇拜西洋音乐的教条主义,一部分认为是对待民族音乐遗产的保守主义。音协副主席、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特别强调文化交流对民族音乐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民间音乐是惟一宝贵的源泉,但学习西洋音乐数百年来在理论与技术上的成就,对于发展和创造我们自己新的民族音乐文化将起决定性的作用。西方的管弦乐属于世界,不是哪一个民族的。西方的大交响乐、大歌剧是进步的。音乐家要兼通中西。学习西方音乐文化不是要消灭本民族的风格。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副所长杨荫浏、古琴家阜古等反对贺绿汀的观点。8月24日,毛泽东同中国音协负责人谈话,阐述了他对音乐以及中西文化关系的意见。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应当中国化的经验直接引出西方音乐也应该中国化的结论,强调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保守主义;音乐"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②]。凡是好的都要学,不应该有中西之分。这次讨论确定了继承民族音乐文化遗产与学习西洋音乐先进理论与技术相结合的正确方向。

编译工作是问题非常突出的一个部门。有人统计,中国科学院5年中翻译出版的外国科学著作108种,只有5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著作。各专门学会出版的《译报》、《科学文摘》几乎成了"苏联译报"。《物理译报》、《生物学译报》、《植物病理学译报》创

---

① 《音乐舞蹈的民族形式》,《人民日报》,1956年7月14日。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182页。

刊后共发表文章398篇，仅有两篇文章译自德国的科学刊物，其余全部译自苏联刊物。《微生物学译报》还规定，译载除苏联以外的其他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论文，不但要有"批判能力"，译了还得"过关"。这是给自然科学乱贴阶级"标签"、毫无道理地实行科学技术"一边倒"的结果。知识界对此一直持反对态度。1956年年初，即有人提出要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是非，积极介绍与吸取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青岛遗传学会议期间，有人发表文章，公开提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术译著也要译载，没有必要对每篇外国科学论文都要进行所谓的"批判"；要检查编译工作中的清规戒律，分清学术与政治的区别、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论文的区别①。9月5日，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召开会议，批评了编译出版工作中存在的错误，提出要反对绝对正确、绝对错误的极端思想，使编译工作充分反映中国和世界各国科学研究成果以及学术争论；在选题标准上，不应以权威为标准，应以科学价值为标准；不同思想体系的著作，只要有价值，也可以翻译出版。有人提出，对世界著名科学家的重要著作，即使不对，亦不应妄加删节。有人提出审稿制度不可取消，但审稿是为了衡量学术水平和甄别是否达到了"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出版标准，并不是排斥与拒绝学术上的不同见解，更不是以政治标准决定是否"放行"。编译出版工作的讨论虽多集中于自然科学方面，但对于推动出版的相对自由，无疑是一大进步。

期刊工作这时受到了各方面的特别重视。期刊是知识分子发表研究与创作成果的园地，是他们表达意见的喉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运动中，特别是《文艺报》事件发生后，不断增加的清规戒律扼杀了刊物的生机。知识界对刊物不满，编辑们充满了苦恼与委屈。在讨论"双百"方针时，黎锦熙先生等发表的意见，实际上

① 骆瑛：《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术论著也应译载》，《光明日报》，1956年8月14日。

已把学术成果的自由发表作为实行“百家争鸣”的先决条件。有人提出，报刊“可以为各种学派各种不同的学术意见提供充分的争鸣的阵地”[①]。7月2日至5日，全国31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负责人在北京举行座谈会。与会人员认为，学术刊物是学术活动的主要园地，要使“百家”能够“争鸣”起来，首先要在学术刊物上有充分的学术讨论自由。他们纷纷批评过去几年间学术刊物限制批评、简单粗暴、乱扣帽子、崇拜权威、不尊重作者、滥发教条主义文章的不良风气，认为应当“划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线，在学术论争中不允许任何批评者给被批评者乱扣政治帽子”；学术刊物可以发表唯心主义的文章；应鼓励学术工作者撰写阐述国家政策的文章和对执行政策中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的文章[②]。

1956年下半年，哲学界对于真理的阶级性、真理的标准、社会科学的阶级性等问题的讨论，史学界对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进一步讨论，民族学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提出，生物学界关于麻雀是不是害鸟的争论，中国自然科学史讨论会关于中国数学史和天文学史方面的争论，语法座谈会关于语法的讨论，考古工作会议对于进一步开展考古工作的讨论，教育界关于重评陶行知问题的提出，都是有意义、有影响的争鸣。1956年，全国性重要学术会议召开了50多次，学术论文和学术报告逾2000篇，创新中国成立后最高水平。这些情况不但显示了“双百”方针的巨大作用，也表明了在政治与社会环境不断趋向宽松的情况下，知识界正在恢复受到过重创的自信心，向着思想的全面解放前进。

---

① 张微波：《百家争鸣与报刊编辑工作》，《光明日报》，1956年6月13日。

② 《光明日报》，1956年7月9日。

8.6　异军突起:文艺界对教条主义的冲击

由于职业的关系,文艺工作者对社会环境的感受最为敏感。知识界受到打击,这个群体会首先陷入沉闷与消极;环境趋于宽松,他们又最先觉醒,成为为新思想、新事物、新生活鸣炮的先锋。"双百"方针提出后,他们再次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在1956年上半年通过对《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和典型问题的讨论初步启动思想解放行程的基础上,从1956年下半年起,他们从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文艺理论等三个层面,对教条主义发起了猛烈的冲击,从而使文艺界成为"双百"时期解放思想的先锋。

率先在文艺创作实践中冲破教条主义束缚的,是青年作家刘宾雁和王蒙。他们是文艺界较早接受并实践来自苏联"解冻"期"干预生活"文艺理论的少数人。1956年4月,刘宾雁在《人民文学》发表特写《在桥梁工地上》。这部作品没有按照当时文艺创作的套路"写本质"、写光明、写进步、写先进人物,而是刻画了一个在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停顿不前的个人主义和保守主义者的形象,在先进与落后的斗争中尖锐地揭露了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矛盾。这篇离经叛道的作品发表后,立刻引起强烈反响。《人民文学》在"编者按"说:"我们期待这样尖锐提出问题的、批评性和讽刺性的特写已经很久了,希望从这篇《在桥梁工地上》发表以后,能够更多地出现这样的作品。"《文艺报》等刊物发表系列评论文章,对作品"干预生活"的勇气以及思想和艺术水平给予高度评价。接着,《人民文学》6月号又发表刘宾雁的短篇小说《本报内部消息》,这部作品贯穿着和《在桥梁工地上》同样的精神。

在文坛掀起轩然大波的,是《人民文学》9月号发表的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是一部更加大胆、更加尖锐地"干预生活"的作品。它以北京市的一个区委组织部为舞台,以

一个新到组织部工作的青年人的经历、心态与性格发展为线索，揭露了党的机关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这部作品写的故事发生在首都，发生在党的机关，发生在老干部中间；作品中的人物，无论是区委书记、副书记，还是组织部的部长、副部长，都完全不是以往文艺作品中那种"高大全"式的正面人物。中国作协、各地作协、各文艺期刊纷纷召开讨论会，讨论这部作品。"在某些机关和学校里，人们在饭桌上、寝室里，都纷纷交换着各种不同的意见。"[1] 许多人认为这是一部少见的好作品，作者勇敢地触及现实矛盾，生动地揭露官僚主义，"整篇作品中洋溢着不可抑止的激情，作者掩饰不住自己对新生活的热爱，对旧社会残余的憎恨。已经看惯了许许多多概念化作品的读者，读了这篇充满了生活和感情的作品，不能不使我们有一种清新的感觉，好像它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新的天地。这天地里虽没有仙花异草，百鸟齐歌，但有峻急的溪流，峥峥的岩石，引人深思，促人猛醒"[2]。也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一篇不健康的、歪曲现实的坏作品。作品把区委书记写得"很灰色"，把区委副书记、组织部长写成了"冬烘学究式"的空谈人物，把组织部副部长、一位老干部写得"庸俗无能，不伦不类"，毫无原则性。作品中出场的 24 个人物中只有两个"正面人物"，把党委机关特别是"党中央所在地——北京市的区委组织部"、把老党员老干部写得如此之糟，是对"党委机关、党的领导干部的一种嘲笑、讽刺与歪曲"[3]。对这部作品的争论持续了几个月。1957 年年初，毛泽东亲自出面肯定这部作品，并批评了修改这部作品的《人民文学》编辑，争论才基本上有了定论（当然，这只是一时的"定论"，王蒙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时候，它又成为罪证之一）。《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创作

① 《文艺学习》，1956 年第 12 号。

② 林颖：《生命的激流在奔腾》，《文艺学习》，1956 年第 12 期。

③ 增辉：《一篇严重歪曲现实的小说》，《文艺学习》，1956 年第 12 号。

与争论，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后束缚文艺创作的教条主义清规戒律开始被冲破。这场讨论既显示了文艺界反对教条主义的力量，也显示了社会各界包括文艺界内部维护和附和教条主义的强大力量，从而潜伏着使形势发生逆转的危机。

在文艺批评领域，反对教条主义的力量对长期肆虐于文坛的“棍子式”文艺批评发动了全面进攻。新中国成立后，以保卫党的文艺理论与文艺方针、清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影响为使命的陈企霞一类批评家，“顶着堂而皇之的名义，把本来无罪或罪不至死的作品判成死刑，务求把被批评者一棍子打死”①。他们与作家之间的积怨既深且重，达到了使人们无以释解、不能原谅的地步。“双百”方针提出后，人们在各种各样的讨论会、座谈会上，在各地各种文学或非文学刊物上，纷纷表达了对以庸俗社会学为武器的教条主义粗暴批评的厌恶与愤怒，并把文学艺术的严重落后、新老作家的消极与苦闷主要地归因于教条主义的粗暴批评和“刀斧手式”的批评家。萧也牧等人发表文章，诉说对他们的不公正对待。粗暴批评陷入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境地。

对“左”的文艺批评的声讨，比较重要的文章当数侯金镜在《文艺报》1956年第18号发表的《试谈〈腹地〉的主要缺点以及企霞对它的批评》。侯金镜指出：“现代文学批评、研究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在过去几年中成为有很大影响、发生了很大危害性的一种思想潮流。”“这一教条主义的倾向曾经有多种表现形态，其中之一，就是向简单化、庸俗化的极端上去发展，和武断、粗暴的批评方法相融合，形成一种专横的批评风气，在文坛上高视阔步，四处冲击。”教条主义批评的武器是“五光十色”的，“忽而片面地强调批评的政治标准，用政治教条去斥责某些作品，忽而片面地强调批评的艺术标准，又用艺术教条去封闭某些作品了；一个时期在某些批评

① 华夫：《也谈粗暴》，《文艺报》，1956年第16号。

里宣扬无冲突论，可是为时不久忽然又翻过身来反对无冲突论"。它的批评方法同样也是"五光十色"的，"有的咬文嚼字，寻章摘句，用一种新评点派的方法去割裂作品；有的是根据几句想当然的政治条文，用按语式的方法去评断作品；有的文章干脆就抛开对作品的分析，直截了当地对作者的立场宣布可怕的判决"。陈企霞对王林的小说《腹地》的批评，就是这种教条主义的、武断粗暴批评的典型。陈企霞的文章发表于1950年《文艺报》第3卷第3、4期，被认为是开"战斗性与尖锐批评"风气之先的评论。这种风气在全国泛滥成灾，"就不能不在读者中间散播了简单化、庸俗化地理解文艺作品的空气，降低了读者对文学艺术作品的鉴赏力，麻痹了他们的美的感受机能，以至影响一部分作家在生活面前无所措手足，当写作的时候，一想到这些批评就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被挤到公式化、概念化的羊肠小道上去；同时，也就不能不危害了批评家和作家之间的正常关系"。侯金镜的文章显示了意欲彻底清算教条主义文艺批评的决心与气魄。

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文艺批评中的庸俗社会学、粗暴、武断与专横，皆源自于教条主义的文艺理论。教条主义文艺理论则来自对于毛泽东《讲话》的偏狭理解和对苏联文艺理论的照抄照搬。对此，文艺界人士并非没有认识。但是，1956年上半年，几乎没有人敢于触及这个要害。人们对胡风事件记忆犹新，深恐一步不慎，重蹈胡风的覆辙。陆定一关于"双百"的报告，却在无意中开启了这个禁区。他说："为工农兵服务"，就是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一切劳动人民服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但不是惟一的创作方法，作家有选择创作方法的自由；文艺题材应当非常广泛，不应当有任何的限制。"禁区"一经开放，就不能阻止人们进入。

7、8月间，全国各文艺单位在"双百"方针的讨论中，开始广泛触及文艺理论、文艺方针中的教条主义。在中国作协召开的一系

列会议上，冯雪峰等人都发表了意见。他们认为，近几年大部分文艺作品题材范围狭窄、单调，创作风格不够多样化；文艺评论缺少自由讨论的风气。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过去对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以及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理解存在着教条主义和片面性，以致使文艺创作的发展受到了限制"①。简单化的粗暴批评和领导的不适当干预，也对文艺发展不利。"对某些问题，如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是必须加以干预的，但在艺术创造和学术探讨上，应该提倡独立思考，鼓励不同学派、不同风格的发展。"老作家张恨水说，文艺作品的题材范围应该是无限宽广的，即可以歌颂新社会，也可以批判旧社会，这样才可以让作家各尽所长，写自己熟悉的东西。中国作协武汉分会一些作家提出，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理解的片面性和简单化，是产生公式化、概念化的重要根源。它主要表现在"忽视文学的特殊功能，机械地强调文艺为中心任务服务"。"由于片面地简单地理解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作品写社会重大题材，写工农兵生活，片面要求作品的主人公只能是先进的工人或农民，只能写他们的先进事迹，把他们的生活仅仅限制在劳动和生产活动的狭窄范围，排斥其他的题材，甚至是工人农民劳动生产以外生活方面的题材。同时也片面简单地要求作品的政治教育意义，而忽视文学反映生活的丰富复杂的内容。常常会出现这样情况，那就是把所谓工人阶级思想感情的圈子划的很小，而把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圈子划的很大。"②

这一时期对教条主义文艺理论、文艺方针的批评是广泛的，但存在明显的缺点：批评的范围没有超出陆定一"双百"方针报告所涉及的范围，批评的力度也没有超出茅盾在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

---

① 《文艺报》，1956 年第 14 号。

② 《长江文艺》，1956 年 9 月号。

的发言和《文艺报》第10号关于"双百"方针的社论。这表明文艺界知识分子说话仍十分谨慎。8、9月间,情况出现重大变化,对教条主义的零碎批判开始向系统的突破过渡。其重要标志是两篇论文的发表,一篇是秦兆阳以"何直"的笔名在《人民文学》9月号发表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篇是周勃在《长江文艺》12月号发表的《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这两篇文章对占统治地位的文艺理论的核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提出了公开的质疑。

秦兆阳认为,文学艺术的严重落后,文学创作上普遍的公式主义倾向,与"文艺思想上带有普遍性的教条主义倾向有关系";文艺思想上普遍性的教条主义,又起因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的不科学、由这一不科学的定义所产生的庸俗思想和中国特有的另外一些性质相同的庸俗思想。这些因素编织了"千万条教条主义的绳子",严重地束缚着文学事业的发展。

本书第五章第三节曾经说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是1934年斯大林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这个定义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在斯大林逝世后召开的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西蒙诺夫公开提出异议。他说:这个定义中"同时……"这句话,可能被理解为一种附带条件,好像艺术描写的真实性与历史性可以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教育人民的任务相结合,也能够不结合;换句话说,并不是任何文学描写的真实性与历史具体性都能够为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这个目的服务。对这个定义的任意理解,使得一些作家和批评家"借口现实要从发展的趋向来表现,力图'改善'现实"。

秦兆阳表示完全同意西蒙诺夫的观点。他说,如果认为艺术

描写的真实性与历史具体性里没有"社会主义精神",因而不能起教育人民的作用,而必须另外去"结合",那么,"社会主义精神""一定是不存在于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之中,而只是作家脑子里的一种抽象的概念式的东西,是必须硬加到作品里去的某种抽象的观念。这就无异于说,客观真实并不是绝对地值得尊重,更重要的是作家脑子里某种固定的抽象的'社会主义精神'和愿望,必要时必须让血肉生动的客观真实去服从这种抽象的固定的主观上的东西;那结果,就很可能使得文学作品脱离客观真实,甚至成为某种政治概念的传声筒"。这种"社会主义精神"既是作家主观上的一种观念,必定是其世界观的一部分,作家的世界观对创作实践的影响绝不可能存在于"艺术描写的真实性之外","这种作用是有机地表现在艺术的真实性里面,是无须乎在艺术描写的真实性之外再加进去或'结合'进一些什么东西去的"。这个定义的不科学性还在于,从未有人能对它作出"最确切最完善"的解释。秦兆阳进一步指出,"所谓旧现实主义,也并非绝对地只是批判的现实主义","想从现实主义文学的内容特点上将新旧两个时代的文学划分出一条绝对的不同的界线来,是有困难的"。他的结论是:"如果从时代的不同,从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运动对于人类生活的巨大影响,从现实主义文学已经发展到了对于客观现实的空前自觉的阶段,以及由此而来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某些必然的发展,我们也许可以称当前的现实主义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他反对用"几句简单的词语"对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作出"硬性的规定和说明"。

在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提出质疑后,秦兆阳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中国文坛特有的教条主义。他认为中国文学事业中的教条主义,是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不科学产生的庸俗思想与中国另外一些性质相同的庸俗思想"相结合、相助长"的产物。中国的这些庸俗思想,"就是对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庸

俗化的理解和解释，而且主要表现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理解上"。

秦兆阳肯定文艺应当为政治服务，但是不赞成要求所有作家和文学形式都为当前的每一个政治任务服务。他说：

> 首先，必须考虑到，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和为人民服务应该是一个长远性的总的要求，那就不能眼光短浅地只顾眼前的政治宣传的任务，只满足于一些在当时能够起一定宣传作用的作品。其次，必须考虑到如何充分发挥文学艺术的特点，不要简单地把文学艺术当做某种概念的传声筒，而应该考虑到它首先必须是艺术的、真实的，然后它才是文学艺术，才能更好地起到文学这一武器的作用；即或是一篇杂文，一段鼓书，一篇特写，也不要忘记了它的文艺性。此外，还必须要考虑到各种文学形式的性能，必须考虑到各个作家本身的条件，不应该对每一个作家和每一种文学形式作同样的要求，必须要尽可能发挥——而不是妨害各个作家的创造性，必须少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对文学创作进行干涉……

在谈到文艺批评的标准时，秦兆阳认为，说"政治标准第一"，是因为自古以来就没有无倾向性的文学，人民需要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文学，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配合每一个临时性的政治任务是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标准；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艺术标准并不重要。"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必须统一。怎样统一呢？不是要求艺术消失于一般性的、抽象的政治概念之中，也不是要求政治与艺术生硬地简单化地'结合'，更不是只要艺术而不要政治，而要求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这种统一开始于对于生活真实的认识和把握中，以及艺术的真实性的创造中，也就是开始于作家对于现实生活的政治热情、敏感性、自觉性、创造性、战斗性

之中。"而且"政治标准第一"也并不是说作品中的任何成功与错误,作者思想上的倾向,都应该从政治上找原因。"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代替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如果违背或缩小了艺术只有真实地反映现实才能影响现实的大前提,忽视或违背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特征,忽视了作家本身的情况,单纯从主观愿望与政治概念出发,简单地想用艺术去图解政治,那结果只会产生虚伪的概念化的东西。"长期这样片面地机械地强调文学艺术配合任务,其结果必然是:即或在某种程度上为当时具体的政治服务了,即或用政策或工作方法等等去为人民多少起了一点宣传作用,却没有产生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这就使得文学艺术没有能够更深刻、更广泛、更长远地去对人民的精神品质起影响作用,并且使得人民在生活里不能得到更加满足的艺术享受。"秦兆阳在列举了许多具体的混乱思想和荒谬说法后指出,教条主义几乎在每个人身上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文艺领域不停地"刮风",大家忙于看风行事,有些人则按照流行样式制造各种吓人的帽子。创作上的教条主义与批评上的教条主义,创作上的一般化和批评上的一般化又成了双生的姐妹,共同扼杀着作家的创造性。要繁荣创作,作家就要"从千万条教条主义的绳子"下解放出来。

我们可以把秦兆阳的观点归纳为: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是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的自然结果,反过来说,具有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的文学作品,一定会发挥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作用;新旧现实主义具有相同的本质,不能作截然的划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难以成立,可以用"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的概念来取代;对新的现实主义概念不必加以明确定义,否则可能束缚人们的思想;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完全统一,不能分立;必须尊重文艺的特点与规律,不能要求文艺为具体的政治任务服务。对照一下胡乔木1952年12月在全国文协的讲话、胡风的文艺思想、阿垅依据胡风思想提出的"艺术即

政治"的观点，以及胡风、冯雪峰等人一直坚决反对"写政策"、"赶任务"的立场，就可以知道，秦兆阳在"离经叛道"的道路上走得有多远！

周勃的基本观点与秦兆阳相同。他认为文艺理论中种种错误的来源，"在于对现实主义——这个为世世代代的艺术家们以自己的独创的成果和经验所丰富所发展的创作客观法则——缺乏科学的、恰切的、精确的阐释，是在于教条主义的理解和错误的引申前辈伟大作家的指示，是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的反映论代替了对于现实主义这一艺术法则的全部分析"。他赞同秦兆阳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的质疑，认为"由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乃是一种艺术创作丰富的经验积累的结晶，因而无论发展到怎样的高度，它的创作条件有什么变化，但从艺术创作方法本身来说，是不应该有什么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前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在创作方法上，是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区别的"。因此，没有必要摈弃过去的足以概括现实主义创作特殊规律的原则而去制定另外的一些什么原则。

应当特别注意一点：这一时期，大家都在批判教条主义，但都认为教条主义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歪曲。秦、周则否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本身，而否定了它，无异于抽掉了党的文艺理论的基石。后来秦、周被打成"右派分子"，也算是"名副其实"。

秦、周的文章发表后，张光年曾撰文反驳，但他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作的辩护，实在是软弱无力的[①]，而且几乎没有得到什么人的响应。在中共八大突出地提出反对主观主义的任务后，文艺界和其他知识界对教条主义的批评逐渐成为强有力的潮流，即使不少人觉得秦、周的观点过于偏激，也不会出来反驳他们而为教条主义助力。

---

①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着、发展着》，《文艺报》，1956年第23号。

1956年下半年文艺界批判教条主义的力量之大，甚至动摇了周扬的信念，并对党的文艺领导工作发生了实际的影响。据说周扬看过秦兆阳文章的初稿，表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是可以讨论的"。11月5日，他在中国文联主席团会议上提出：作协的章程上，是否还要规定"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准则，是可以考虑的"[①]。11月21日到12月1日，中国作协召开了有全国64家文学期刊代表出席的编辑工作会议。会议提出，文学刊物要"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不同观点的文章，敢于发表不同风格、不同题材、不同形式的作品，并且特别提出，尖锐地批评生活中的缺点的文章和作品，只要不是恶意的诽谤，就应该发表"。文学期刊作为"机关刊物"性质与地位，已经成了对贯彻"双百"方针的一种束缚。会议决定从1957年1月起，所有文学刊物一律取消这个"头衔"，刊物之间取消那种不成文的指导或领导关系，"大家平等"。有人提出，刊物应该能够团结一批作家在自己的周围，以在艺术见解、欣赏趣味上大体一致的一批作家作为比较固定的中心，来支持刊物，影响刊物，团结更多的青年作者和读者，以便形成刊物自己的风格和特色[②]。周扬出席这次会议并讲了话。取消机关刊物，创办同人刊物，本是胡风的主张，如今周扬甚至不得不转而赞成这样的主张，足见文艺界领导层的惶惑与被动。

8.7　两极对峙：受到毛泽东批评的两篇文章

如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样，教条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内有着长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思想基础，早已成为难以根本动摇的传统。"双百"方针提出后，党的多数领导干部、理论工作者、文艺工

---

① 《光明日报》，1956年11月6日。

② 《文艺报》，1956年第23号。

作者持保留态度，知识界也有许多人难以迅速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随着批判教条主义的矛头越来越集中于某些根本的、核心的理论问题与指导思想问题，并迅速进入对实际工作中的错误的反思与清理，知识界出现了否定新中国成立后党对意识形态某些领域的领导及成绩的趋势。在根本性的威胁面前，党内对抗“双百”方针的教条主义力量开始聚集与行动起来。这就逐步形成了解放思想过程中的“左”右两极。1956年年底，两极对峙的局面基本形成并公开亮相，其标志就是引起毛泽东、执政党、文艺界乃至整个知识界广泛关注的两篇文章的发表：一篇是《文艺报》评论部主任钟惦棐以《文艺报》评论员的身份在《文艺报》1956年第23期发表的《电影的锣鼓》，一篇是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陈其通和该部干部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在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联名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

《电影的锣鼓》是对《文汇报》开展的“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的讨论的评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7年，全国仅拍摄电影155部，大约等于新中国成立前产量较多的一年的产量；公式化、概念化的片子占的比重不小，不受群众欢迎。电影导演、电影编剧、电影演员普遍感到苦恼和不满。1956年上半年，浙江苏昆剧团改编演出的昆剧《十五贯》引起轰动。下半年，戏剧界讨论《琵琶行》、《如兄如弟》，文学界讨论《在桥梁工地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音乐界讨论民族形式问题，美术界讨论漫画与国画问题，都非常热烈，而问题突出的电影界，反而比较沉寂。其中的原因当然不难理解。11月，在全国和文艺界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已经形成似乎不可逆转的形势的推动下，电影界终于行动起来，以《文汇报》为阵地，开展了“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的讨论。许多著名的电影导演、电影演员、电影编剧和一些发行人、观众积极发表意见。这场讨论持续了三四个月的时间，仅1956年11月、12月，就发表讨论文章40多篇。这场讨论，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第一个问题是电影艺术的指导思想。绝大多数人认为，电影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严重存在。许多影片不受欢迎，“原因之一就是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存在着机械的理解”。写工农兵、以工农兵为主角是应该的、必要的，但是，由于公式化、概念化和数不尽的清规戒律的束缚，许多影片缺少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物形象，这一部影片和那一部影片故事情节差不多，人物的思想感情几乎是一样的。“有一个时期，除工农兵以外，把其他阶级的人写成主角，是被否定的。他们以为这样就算是‘工农兵影片’”，“结果是题材狭窄，内容单调，有些写工农兵的电影，在工农兵观众中也不受欢迎”[①]。有人认为，问题还在于文学艺术的一个基本原则被忽视，即文艺作品中的思想性决不能是外加的，也不是事先安排好了的，只能通过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故事与人物自然地来表现与表达。著名电影编剧陈鲤庭指出，国产片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和我们近年来对于影片的片面的过分急躁的政治要求不无关系，例如用故事来图解政策，将阶级分析机械地搬用到人物典型的创作工作上，以及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某些偏执的解释。不待说，这些都可能促使故事影片走上公式概念和题材狭窄的道路”[②]。

第二个问题是怎样认识与接受五四以来中国优秀电影的传统。孙瑜认为，国产电影是有优良的、进步的艺术传统的。“它在思想性上代表了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在艺术性上符合了人民对情感上和审美观念上的起码愿望，广大的观众曾经张开着双臂热烈地欢迎它。电影上映时候万人空巷、家传户颂；电影歌曲是人手一篇，此唱彼和。”国产影片出现质量不高、千篇一律的严重情况，“没有很好地接受‘五四’以来进步电影的艺术传统是一个重要

① 《电影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文汇报》，1956年12月24日。

② 《导演应该是影片生产的中心环节》，《文汇报》，1956年11月23日。

的原因"[1]。他还认为，导演在创作中的中心地位、艺术处理的自主与自由、尊重与接近观众，就是国产电影的重要历史经验。剧作家汪巩说，解放前的进步电影与新中国人民电影的建立与发展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解放后割断了这种联系，把过去的进步电影都说成是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服务的，许多知名导演与演员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把过去说得一钱不值，几乎全盘否定，这是非常片面的。著名导演石挥说，中国影片从《孤儿救母记》开始，有许多成功的影片和成功的演员，"可是解放后就是没有人谈到过一个字"[2]。不重视中国电影的过去，也就不重视旧中国过来的演员，人才不能尽其力，电影的落后也就是自然的结果。也有人激烈地反对孙瑜和石挥代表的这种意见。

第三个问题是电影生产的体制。人们普遍认为，电影事业的领导管得过严，集中过多。这种以集中与计划为特征的行政中心体制，表现在创作上，是形成了上级命令、下级服从的不符合艺术创作特点的情况。写什么，怎样写，干预太多。作者写出的剧本，"似乎人人有权修改，个个显出优越"，经大家大改特改的剧本，成了"四大皆空"之作。这种踊跃改稿的风气既成，作家们就没法不束手束脚。一来二去，连懂得些电影剧本技巧的作家也不愿拿笔了。"连老导演们也默默不言，一旁待立。可是，他们不熟习四大皆空的剧本。偶一为之，也必然失败。"[3] 电影的生产组合是"强迫结婚"，在摄制集体内部，上下左右层层包围着导演，干涉他的分镜头、选演员，甚至用多数举手表决的方法决定具体的艺术处理。这种以行政为中心的领导体制与领导方法，违反了电影生产的规律。

---

① 《尊重电影的艺术传统》，《文汇报》，1956 年 11 月 29 日。

② 《重视中国电影的传统》，《文汇报》，1956 年 12 月 3 日。

③ 老舍：《救救电影》，《文汇报》，1956 年 12 月 1 日。

《电影的锣鼓》写于12月间,当时的形势几乎是“一面倒”,即着重揭露电影生产中的问题,很少讲成绩与经验。这篇文章不但肯定了人们提出的全部批评性意见,并且提出了若干独立的观点,对电影工作的指导思想、领导方式、管理体制提出了更加尖锐的批评。钟惦棐认为,电影的生命在于与观众的联系,上座率可以作为检验电影与观众的联系的标准;国产片观众如此之少,暴露了两个问题:“一、电影是一百个愿意为工农兵服务,而观众却很少,这被服务的‘工农兵’对象,岂不成了抽象?二、电影为‘工农兵’服务,是否就意味着在题材的比重上尽量地描写工农兵,甚至所谓‘工农兵电影’?”他说:“绝不可以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和影片的观众对立起来;绝不可以把影片的社会价值、艺术价值和影片的票房价值对立起来;绝不可以把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理解为‘工农兵电影’。”“工农兵电影”无论怎样解释,以其实践效果检验,确有明显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性质。他对电影工作的行政领导方式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认为电影因其特殊性质,尤其不适合于采用过分集中的管理体制;艺术创作必须保证有最大限度的自由,电影生产的管理体制不能妨碍和限制这种自由,因此“导演中心制”是应当肯定和采纳的。有人认为孙瑜要重视电影传统的观点是主张“倒退”。钟惦棐以“朱煮竹”的笔名发表了《为了前进》的文章,明确表示:“我国的电影这几年来在对于电影的基本法则基本特征这样的问题上,明显表示出它是‘前进’得过远了。”“‘倒退’一下也好,退到电影创作正常的轨道上来;退到广大观众不仅要求教育,也要求娱乐,要求美的欣赏或享受。”“‘倒退’也是为了前进。”[①]

今天看来,电影问题的讨论并没有达到完全解放思想的程度。人们说话仍有诸多禁忌,例如甚至没有人提及对电影《武训传》、《我们夫妻之间》、《关连长》以及其他许多电影的粗暴批评。对

① 《文汇报》,1957年1月4日。

1952年文艺整风的不满，也只不过是字里行间略有流露。然而，一下子发表几十篇文章，集中批评电影工作的缺点，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未有。像孙瑜这样一些历次政治运动中始终处于检讨者和被批判者地位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旧电影工作者，这时似乎忘记了他们曾经做过的无数次检讨，对党的电影工作方针、电影工作领导方法、领导体制，不仅仅是"说三道四"，简直是"鸣鼓而攻之"，确实令人难以接受。这时，全国文艺界都在批判教条主义，秦兆阳、周勃的文章把矛头直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本身，暴露性的文学作品接连出现并引起轰动。教条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统治都产生了全面崩溃的危险。正是在这种形势下，1957年1月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经夏衍等人事先看过的陈其通等人的文章。

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只有两千多字，提出了三个观点。一是"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有些人认为描写工农兵的题材太狭窄，企图用"题材广泛论"代替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既然不是惟一的，也就不必坚持，甚至认为它未必正确。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和对它的教条主义解释造成了公式化、概念化，因此企图取消"社会主义"，只提"现实主义"或"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我们认为这种怀疑论和取消论是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产物。"在"双百"方针下，可以允许不同的艺术思想和创作方法存在，"但作为一个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坚持和宣传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因为它不一定对一切人都是正确的，而对我们却是唯一正确的。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下，不是放弃它，而是要坚持它，不是对某些怀疑论者、取消论者默不作声，甚至随声附和，而是应该高举起自己鲜明的旗帜，压住阵脚进行斗争"。二是过去的一年中，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斗争有

“界线不清”的地方。“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再有人提倡了，大量的家务事、儿女情、惊险故事等，代替了描写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惊天动地的解放斗争、令人尊敬和效法的英雄人物的足以教育人民和鼓舞人心的小说、戏剧、诗歌，因此，使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里光彩黯淡了。”三是“百花齐放”以后，“有许多人只热衷于翻老箱底，热衷于走捷径去改编旧的”。“百花齐放”“应该以提倡新花为主，并放新花为主”。陈其通等人声明，这三点意见是他们“回忆1956年的一些感想”。其实，它不仅仅是“感想”，也不仅仅是对“双百”方针和1956年文艺界的形势表示怀疑、忧虑和反感，更是号召“党的文艺工作者”起来保卫传统的文艺理论、文艺方针的“战斗檄文”。

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引起了空前强烈的反应。一方面，知识界的许多人认为它代表了怀疑和反对“双百”方针的教条主义力量，纷纷予以抨击；另一方面，怀疑和反对“双百”方针的人从中受到鼓舞，开始同“双百”提出后逐步壮大起来的反教条主义力量进行斗争。许多省市的报刊转载此文，并加了肯定性的按语。辽宁等地的党委文教部甚至召开座谈会，表示对陈其通等人观点的拥护，并检讨1956年文艺工作中的问题。教条主义的力量聚集与动员起来，形成大举反攻之势。至此，文艺工作乃至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左”右两极的对峙局面，已经形成并公开化。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文艺界形势的发展。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发表的当天，他指示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将此文印发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即将在1957年1月中旬召开的省市党委书记会议与会人员[①]。在这次省市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说：陈其通等四同志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294页。

对文艺工作的意见不好，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我们的意见是只有反革命的花不让它放，要用革命的面貌放，就得让它放。也许这四位同志是好心，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但意见是不对的。在2月27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在又一次批评陈其通等人的同时，谈到了《电影的锣鼓》，说中宣部有个钟惦棐，写了篇《电影的锣鼓》，说今不如昔，代表了右的思潮。

8.8 认识自我：知识界的自我审视与批判

贯彻"双百"方针，解放思想，繁荣科学、学术与文化，既要有宽松的环境，更要有主体的自觉。对此，1956年的知识界表现出了一定的认识。知识分子会议后，多数知识分子态度消极，"双百"方针提出后，多数人仍然疑虑重重，沉默不语，这使那些解放思想的先进分子焦急万分。为改变知识界的精神状态，动员大家积极参加"争鸣"，不少人发表文章与言论，尖锐地批评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些不良风气。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不断进行自我批判，但那是对旧社会过来的"旧我"之批判。这一次，批判的对象不是"旧我"，而是经过若干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政治运动改造后形成的"新我"。这表明，一部分人已经看到了知识分子群体发生的精神变异，试图引起知识界的警觉，阻止或改变这种可怕的趋势。

受到激烈批评的第一种风气是谨小慎微、人云亦云、不敢发表个人见解的风气。在6月份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出席会议的学者们一致认为，"这几年学术研究中有一种要不得的风气，这种风气，就是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人云亦云，不敢发表个人的意见"。钱杏邨说："这几年来，做学术研究工作的人，常常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在没有拿笔以前，还有些新鲜的意见，到了动笔的时候，这里一道绳子，那里一道绳子，被清规戒律束缚住了。……我们形成了一种风气，不愿意表达

针锋相对的意见,没有‘争鸣’的风气,只是习惯于说同一种话,把心里的一套看法按捺下去。”[①] 费孝通、翁独健在民族问题座谈会上说:“研究民族问题,有‘胆子小’、‘追求真理的精神差’的现象。有的研究者顾虑太多,怕把自己的见解拿出来。首先是怕犯错误,一听见批评,认为除了伤害自己的面子,此外是‘一无好处’。也因此,拿出来的东西,必定是人家说过的才说,人家写过的才写。”[②] 这种精神影响到刊物,就是编辑部“往往顾虑重重,缩手缩脚,前怕狼,后怕虎,既没有旗帜鲜明地提倡什么,又不敢旗帜鲜明地反对什么。这种畏畏缩缩的庸俗的作风,使得报刊上出现了一些灰色的东西,人云亦云,不痛不痒,把报刊弄得没有生气”[③]。

第二种风气是引经据典,不进行独立思考的风气。路思在《文艺报》第10号发表的短文中说:“有些人不论是写文章或是说话,对引经据典十分感兴趣。在他们的文章言谈里,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别林斯基、杜波罗留波夫直到苏联现代的批评家留里可夫,无不加以引用,差不多每说一句话都要找个根据,真是‘处处安寨,步步为营’,这样的文章或言谈读起来,听起来,真如铜墙铁壁一般,扎实得很,稳当得很。这些人嗜好引证到了这样的程度,明明是一句很普通的话,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也觉得由别人来说比自己来说要好些。他们引证的范围也在不断地扩大,起初还只不过喜欢引证一些经典名言,后来就不管是什么人说过的一句什么话,只要是‘合用’的,都抓过来加以引用。……对他们来说,能够在某一部著作中找到一句恰恰可以引用的话,甚至比他们自己说出这句话来更要使他们觉得舒服哩!”[④] 邹丰在《还是自己说

① 《光明日报》,1956年6月14日。

② 《光明日报》,1956年6月19日。

③ 安旗:《不能没有自由讨论》,《文艺报》,1956年第10号。

④ 路思:《谈引经据典》,《文艺报》,1956年第10号。

说吧!》的短文中说,某大学的学生送给文学课教师一首打油诗:“正如高尔基这样说/又如鲁迅那样说/再如别林斯基所说/整本讲义说来说去尽是别人说/就是没见老师自己说。”邹丰评论说:“说来说去尽是别人说”,在高校里普遍存在着。“在某些文学课程的讲义里,很少看到,或者是根本看不到老师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有的只是过多的、不恰当的烦琐哲学的‘引证’”。在某些讲义中,“整段整节的从很多前辈的著作中摘录下来,教师自己只加几个‘因为’、‘所以’、‘但是’、‘然而’之类的连接词把它们连贯起来”①。冯雪峰也批评了这种风气,说“大家总是拼命地追求着某一种‘定论’,在文章中引上几句马克思说列宁说,而没有自己的语言。有的不是从外国的学术研究文章中去吸取精华,而是把它们生吞活剥,当作‘经典’”②。

第三种风气是看“权威”、等“定论”的风气。有人指出,“我们一向的习惯是:看权威,看‘气候’,看大多数,看北京”③。遇到可能发生争论的问题,权威没有说过的不敢说,大多数人的意见没有摸准不表态,领导没有“定论”、特别是北京没有消息不敢动。杜佳在《习惯和不习惯》的短文中说:“有些人对于一个文艺上学术性问题的探讨,或者对于一个文艺作品的艺术评价的争论,也仿佛总想等到有关的权威人士做出总结、下了定论之后,这才敢于安心来据以发挥,或者乐于安心地来全部接受。要不,就会象习惯于拄着拐杖走路的人找不见了拐杖一样,觉得没有把握,惶惶无主,无所适从了。”“譬如,关于李煜这位落难皇帝的词有无人民性的问题的争辩,据说有人在参加讨论之前,就总想从什么地方探听到一种权威的定论,否则就不能放心;或者想从进行讨论的刊物编辑部的按语

① 《长江文艺》,1956年8月号。
② 《光明日报》,1956年6月14日。
③ [illegible]:《不能没有自由讨论》,《文艺报》,1956年第10号。

中,象猜谜似的猜出到底有什么暗示——否定呢还是肯定呢?——再决定自己朝哪一方面来立论。"如果有不同意见而无定论,"有的人就会觉得不知如何是好,'思想混乱'了"[①]。杜黎均在《"争"和"等"》的短文中说,一切奴隶的主人都不喜欢"争",争可能惹祸,因此人们遇事是三缄其口。这种可悲的人生哲学带进了新社会。"不少干部和青年同志常常对'争'不感兴趣。是真的没有任何意见吗?其实不然。在走廊里,在饭后茶余的时候,你可以听到颇为精彩而尖锐的对话。但在会议上,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你就很难发现'争'的痕迹了。"不"争"的原因之一是"等"。"为了怕'争'出来犯错误,也只好'等'了。于是就等定论、等权威人士发言、等领导同志总结、等中央报刊表示态度……既然要'等',所以在会上发言和发表文章时不得不'留半句'、'让三分'了。结果是'语言无味,象个瘪三'。""崇拜权威,崇拜个人,不进行独立思考,或者不相信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够获得真理,于是就不'争'而'等'。"[②]

第四种风气是公开场合一种意见、私下里一种意见,口头一种意见、文字又是另外一种意见的"两面人"作风。刘寿在《"私下的"和"公开的"》的短文中说:"一些'关心'文艺创作的人们,'私下里'闲谈到某个作家或某部作品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颇为独到而且尖锐的意见。这些意见也并非偶尔即兴之作;一些发人深省的警句,闪烁着闲谈者们沉思的光彩。这时,人们不禁会这样想:这些意见——不论它们是否全都正确,要能让被批评者、读者听见,引起大家注意,而且能开展讨论,该多么有益啊!然而,到了'正式的'场合,譬如到了关于某部作品的座谈会上,那些独到而且尖锐的意见(这里指的是谈缺点的意见)却都销声匿迹了。精辟的警

① 《文艺报》,1956年第10号。

② 《文艺学习》,1956年第7期。

句，一变而为吞吞吐吐、含糊不清的猫儿经。只有最虚心、细心而且耐心的人，才能透过一连串'也许'、'或者'、'大概'、'不完全是'……的重围，体会到一星半点批评者的真意。当然，这比到时候婉言推说'没有意见'，还算是略好一些的了。"另一种情况是，"有些文艺创作上的问题，在所谓'内部的'讨论会上进行讨论的时候，不同的见解，可能引起热烈的争辩。双方（甚至几方）都各自旗帜鲜明，相持不下，有时还会争得脸红脖子粗。……然而，当问题需要'公开地'提出来讨论的时候，情况就变了"。某刊物在一次座谈会后，约请三位代表不同意见的同志写三篇文章准备公开发表，写出来后出乎编辑的意料，三篇文章的面目竟是如此相同，讨论会上那雄辩的有着独立思考的见解，都被磨得棱角全无，四平八稳，甚至模棱两可，更多的是一些十分正确同时也众所周知的原则，人们看不出他们究竟存在着什么分歧。刘寿感叹说："'负责'！'慎重'！多少惯于屈从清规戒律，不敢坚持自己见解的人假汝之名以行！"①

第五种风气是不讲原则、看风使舵的庸俗风气。秦牧认为，知识界的好些人继承了旧社会的庸俗风气和处世经验，"用唯唯诺诺、眼开眼闭、看风使舵、笼络敷衍这一套花样来打发日子"，"整天打着哈哈，尽量对任何人客气，对旁人的错误和缺点决不干涉"。"在某一场合里面，人数多的一面说什么，我也就跟着站到那一面去，人多势众，随声附和；如果错了就跟大伙儿一起错误，并没有什么特别惹人注目之处，就象三国演义里面的左慈变成羊隐身到羊群里面去，教人没法找寻一样。"② 江军说，有一班赶浪头的人，"今天说的话可以打昨天说的话的嘴巴，甚至后一分钟说的话可以

① 《文艺报》，1956 年第 10 号。

② 《闭上一只眼睛的猫头鹰》，《长江文艺》，1956 年 11 月号。

否定前一分钟说的话，而他仍然是永远正确的”[1]。丁子在《领导者的苦闷》一文中指出，有一些人，“一个作品出来后，他们就伸长耳朵打听领导同志有什么表示。如果领导同志说‘好’，他们就跟着赞不绝口；如果说‘不好’，就立即口诛笔伐。假如领导上没有明确表示意见，那他们也就含糊其词，不敢明白表白态度……四平八稳，头头是道，话未开口，先留后路……最不好的，是有些人很容易翻云覆雨，变化多端，而变化也以领导上一言为准”。他举例说：“《翠岗红旗》出来后，有人大骂为小资产阶级情调，可是当某些领导同志说好时，舆论忽然为之一变，对作者也另眼相看了。《智取华山》开始时有些领导人说不好，这个文艺机构中就出现了不屑一评的气氛，有些人一口气说出来十多条缺点，但后来领导上和观众都肯定这部作品时，于是连续开会，研究它的优点成绩，先前骂它的人这时竟又发现了它十多条优点。《葡萄熟了的时候》在发表之初，到处一片赞美之声，但后来因为有领导同志指出它的缺点，于是开会三天，紧锣密鼓，定要作者找出错误思想根源。”[2] 宋谋易写了一篇题为《风标的悲哀》的寓言，讽刺那些风派人物。文中说：

> 风标傲慢地站在花园管理人的房顶上，非常灵活地转动着它那轻巧的头。他最注意园中那几株大柳树的垂地的长枝了。柳条向东方飘动了，他赶忙指着西方；柳条向西方飘动了，他赶忙指着东方。这是他积累了很久的经验了，据他那不常用来思考的脑子的回忆，好象从没出过差错。于是他的眼睛越来只注意那几株高柳，完全按照柳条的摇摆来支使他自己的头颅了。风标，从此养成了习惯。没有风的时候他就呆

① 《论“赶浪头”》，《文艺报》，1956年第18号。

② 《文艺报》，1956年第18号。

着不动，一起了风，他就赶紧抬起头来看柳枝[①]。

非常明显，上述种种风气的本质完全相同，这就是：相当一些人失去了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捍卫真理的勇气和表里如一的品格。在一个充满了革命气象和革命激情的年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世界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消极的变异，呈现出如此令人泄气的状态呢？人们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当时的环境所允许的探讨。

"刀斧手式"、"审判官式"的粗暴批评，被公认为是影响知识界精神状态的最重要的原因。秦兆阳说，文艺批评中有一种"尖锐之风"，"开口必给人以'个人主义'，动笔必给人以'小资产阶级'，所谓拿谩骂代替说理，拿扣帽子当做斗争，拿作政治鉴定代替与人为善的批评"。他说："试翻开历年来的报章杂志看一看吧。从最初那两年的文艺批评看起，那些文章不是几乎篇篇都有'小资产阶级卑劣的感情'，'有意歪曲工人的形象'一类吓人的词句吗？甚至'小资产阶级'呀，'卑劣'呀，'诬蔑'呀，还觉不够'尖锐'（他们总是嫌批评得不够尖锐），还必须加以'最坏的小资产阶级'之类才甘心。""问题还不仅仅在于'尖锐'，问题还在于'风'，在于一阵一阵的风，在于随风而起，捕风捉影，看风使舵，望风生畏……""当别人在反对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时候，许多闻风而起的人就比无产阶级还要革命，甚至只因为你的作品里多少写了一点爱情，也会有若干顶帽子飞向你的头上。""当别人在提倡写新人物新气象时，许多闻风而起的人就都成了新人的典型。于是，你写了落后人物就是'污蔑劳动人民'呀，'难道生活是这样吗'呀，'歪曲党的形象'呀……""当别人在反对'无冲突论'的时候，许多闻风而起的人就颇象是'唯冲突论'者了。于是，'简直是无冲突论的典型'呀，是'粉饰生活'呀，'冲突还不够尖锐'呀……""其他如'公式化概念

① 《长江文艺》，1956年8月号。

化'呀,'庸俗社会学'呀……莫不是道理未讲三句,帽子来一大堆。""真可以说是气候季季不同,帽子常常更换。于是,就出现了许多看风色写作的作家,和望风生畏而不敢写作的作家;批评即非完全是各人自己的语言,作品也就趋向于雷同的面孔。"[1]

毫无原则、随心所欲、蛮不讲理的批评,造成了人们的惶悚恐惧,无所适从。江有生以漫画创作为例说,漫画家把美国垄断资本家画成正在锻造"冷战"武器的铁匠,有人就说:"你这算什么呢?资本家还劳动吗?你把阶级敌人比作铁匠,你这不是污蔑劳动人民,污辱工人阶级吗?"漫画家画"白宫医生"在给蒋介石治病,又有人说:"把反动人物比作医生是污辱了人道主义、治病救人的医务工作者……"把美国好战分子画成保姆,把西德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画成小孩,又被说成是污辱了人类的花朵、天真的儿童。画资本主义国家在"军备运动场"上竞赛,被叫做污辱了运动员,讽刺了"三好"中的"身体好"。画杜勒斯顶着氢弹表演,被叫做污辱了杂技艺术工作者,而最近中国人民杂技团在国外得到了好评。"行行有禁忌,事事得罪人,现在是什么也不好画了,漫画家迫得无路可走……"[2] 作曲家王云阶在谈到自己的苦恼时说:

> 写群众歌曲吧,这是目前最合乎工农兵要求的。我写了影片《六号门》的插曲《搬运工人之路》。影片还没有公映之前,就有同志说:"你听聂耳的《码头工人歌》多好啊!"这种规格一来,使我觉得在没有很熟悉工人生活之前,还是先写点别的为妙。那么,写独唱曲吧,但又怕说是为独唱家卖弄技俏,因而写得平平稳稳,淡而无味。难怪一位歌唱家在表演了我的《戴上一朵大红花》之后告诉我:她过去很喜欢唱我写的歌,

---

[1] 《尖锐之风》,《文艺学习》,1956 年第 8 期。
[2] 《行行有禁忌,事事得罪人》,《文艺报》,1956 年第 15 号。

> 但是这首歌却使她失望。写合唱曲吧，为了怕说喜欢搞复杂形式，又怕冲淡了曲调的民族风格，在和声的处理上既胆小，还去夹上一段独唱。我写影片《青春的园地》中的插曲《为了花香果又甜》时，为了表现青春活力而采用了一点复杂的手法，又有人认为超出了群众的水平。写交响曲吧，更怕说是追求大气派，所以在写《第一交响乐》的过程中，常常想“等着挨批评吧”[①]。

更严重的是，这种粗暴批评不但成为文艺界、知识界的风气，也蔓延到整个社会，影响到普通群众，形成了极不利于科学文化自由发展的社会环境。作家的一个作品受到批评，“那作家就成了众矢之的，除了检讨之外，连辩解也是无可辩解的”。他们就要“遭受上上下下的各种冷遇，一种有形无形的‘社会压力’，将逼使你不改行至少也得‘隐姓埋名’”[②]。用不着谁下命令，出版社就不再和你订出版合同，书店停止你的作品的销售，图书馆会把你的著作从书架上撤下，语文教师可以自动抽掉课本中你的文章。如果哪一位作家受到批评，或读者认为作家的作品有什么问题，有人甚至会写信到编辑部，“勒令”某某艺术家、作家公开检讨。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中，被批评的作家就抬不起头来，“从此不再在人多的场合露面了；从此不再写东西了，即使偷偷的写，也不敢用原来常见的署名发表了；大路上遇见熟人，宁可多绕一个弯子，避免见面”。“影响所及，不仅是犯错误的人，无法再在工作中继续改正自己的错误，面且使尚未犯错误、谁也不敢写包票不犯错误的任何人带来一种消极的因素：处处谨小慎微，走老路，按陈规，免得出了什么差错，有一天无情的棒子落在自己的头上。独立的思考，独立的意

① 《随想曲》，《人民日报》，1956年8月9日。

② 白榕：《一种不容忽视的工作》，《人民文学》，1956年10月号。

见，遭受窒息，使有燎原希望的许多星星之火，遇到不良的气候，燃烧不起来。"[1] 萧也牧说，几年前他受到批评后，几本集子绝版，图书馆停借，书店停止销售，文艺界不再请他参加任何活动，出门办事不敢用"萧也牧"的名字，不但他自己"做人都很困难"，甚至他的一些青年读者也受到牵连。在这样的风气之下，还谈得上什么自由创作、自由讨论呢？

文艺界如此，科学界、学术界也好不到哪里去。大学教授们讲课只能讲苏联先进，不能讲美英科学发达，否则就是崇洋媚外。无知批评有知，更是普遍的现象。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陈义研究蚯蚓20年，对蚯蚓的种类、地域分布、生态做过深入的研究，写过十五六篇论文。新中国成立后，有些教师和学生公开嘲笑他，说他"研究蚯蚓是从个人兴趣出发，与国家经济建设毫无相干，徒然浪费人民财产"。有的人质问他"论文为什么要用英文发表？"有的人嘲笑他的研究脱离实际，钻牛角尖，"做了十几年研究，一事无成"。这些毫无科学常识的意见竟然为学校领导人所接受。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陈教授受到集中批判。他的研究在华东高校被传为笑柄。直到1955年下半年，上海文教部门一位负责同志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还把他作为脱离实际的例子来批判[2]。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问题就更加严重。

有人注意到了造成知识分子精神状态不够正常的社会政治因素。北京大学教授、著名政治学家赵宝煦先生认为，大事小事、事事处处追求统一而反对多样的思维逻辑，是影响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重要原因。他说："过分追求统一，强求一致的思想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学校中为了要培养合乎'统一规格'的学生，于是把学生生活中一切细节，都做出统一规定。……在大学中讲课，

① 樵渔：《向前看》，《文艺学习》，1956年第8期。

② 《光明日报》，1956年10月17日。

要按照统一的教学大纲，其神圣尊严不亚于宪法。但大纲究竟只能把大的问题统一起来，于是教统一课的教员，就有了统一讲稿……结果总不免于大家上台背诵同样的文章，论证层次一样，举例子也一样。教员用不着独立思考，也不需要有独立见解。这样教出的学生自然就不需要独立思考了，因为他们若能把同样的笔记背熟，岂不是就最好地满足了统一规格的要求了么？”“统一行动，是一种风气，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也如是，要谈什么，大家都谈什么。例如要鼓励人穿花衣服，于是打开报纸杂志，就看到文字漫画，众口一声，都针对干部服开刀。后来忽然有一篇文章说宣传过火了，接着大家就立即噤声，再也看不到一篇提倡穿花衣服的文字或漫画了。”“我们偏爱统一，不喜欢多样，这种现象还很不容易扭转。因为从字面上看，‘统一’一词似乎与无产阶级的组织性纪律性有联系，而你若反对统一，要求多样，岂不就是赞成小资产阶级的无组织无纪律了么？至于争论，就更要不得了，有些人一看到这两个字就总得联想到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狗打架。‘在我们人民内部也可以有争论吗？’这还了得！”①

30年代的著名作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施蛰存先生认为，知识分子中的这些现象与不适当地打击他们的自尊心有关。他说，知识分子中间最普遍的毛病是自高自大，而“自高自大大多是自尊心的恶化发展”。“这是一种不自觉的发展，所以应该采取极自然的教育方法，以消弭于无形。如果采取打击他的自尊心的方法，我以为是毫无好处的。它反而只会促成这自尊心的狂妄发展，以非常突出的自高自大态度来敌对思想改造。或者另外也有一些人，当他的自尊心完全被打垮之后，态度大变，非但丝毫不再自高自大，简直自卑自小到极度，变成一个唯唯诺诺的人，对一切都欣然同意，对一切都恭维一阵。这一种人的思想状况，分析起来，还可

① 《多样与统一》，《文艺报》，1956年第15号。

以分成两个类型：一个是真的完全失却了自信心，心灵整个麻痹了，只求适应他的生活环境，以取得生存；另一个是把他的自高自大转为向内发展，表现做一个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者。"① 施先生这是曲折地、含蓄地批评了执政党，认为执政党对待知识分子的错误方式，是导致知识分子精神变异的原因之一，这无疑是符合事实的比较深刻的观点。

1956 年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审视与自我批判，零碎而又肤浅。它多以杂文形式出现，多是对表面现象和直接原因的描述，像赵宝煦、施蛰存先生这样的比较深刻的分析极少。意识形态各领域普遍存在的教条主义粗暴批评，固然是造成许多人不敢说话、不敢说真话的主要的直接原因，但不是根本的原因。根本原因是执政党在错误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意识形态工作方针指导下发动的一连串以知识分子为斗争对象的政治运动的打击，以及由此必然造成的"犬儒主义"风气。"双百"方针的适用范围，此时仅仅局限于科学文学艺术学术范围，政治问题不允许触及和讨论，人们也就没有勇气、没有可能触及知识分子的精神与性格何以发生扭曲的真正原因。这样，知识界的自我审视与自我批判也就不可能达到深刻的程度。

8.9　乍寒乍暖：1956 年知识分子的群体心态

不少老一辈知识分子回忆说，1956 年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们心情最舒畅的一年。此话不假。1949 年 2 月初，解放大军开进北平。二三月间，各大学即开始组织教师们学习政治。从那时起，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从旧社会的名流、上层沦为新社会的三等公民，成为"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经历了他们在迎接解放

---

① 《夏原和知识分子》，《文汇报》，1956 年 11 月 23 日。

军进北京时绝未料到的一个接一个的"触及灵魂"甚至皮肉的政治运动。无论他们对思想改造的认识如何深刻，那心中的酸甜苦辣是很难用言语来表达的。相比之下，他们在1956年的处境确实是非常不同了。

如果说1956年是新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春天，那么，这个春天的气候是由多种国际国内因素的组合造成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是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发生的变化。以批判和纠正斯大林所犯错误为主题的苏共二十大的主要文件、苏共中央6月全会通过的《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在中国报刊上发表，苏联文艺界的新思潮、新理论、新作品被迅速地介绍到中国，一方面打破了人们对于苏联、苏联党、斯大林的迷信，有助于解放思想，另一方面，仍然严重存在的迷信苏联的心理却又强化着苏联的新思潮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和苏联新的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影响。在国内，受到政治运动连续打击的知识分子以群体的消极表达他们的反抗，迫使执政党不得不检讨和调整自己的知识分子政策。同时，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国际环境的有利变化，使得执政党有更强的自信心，以更加宽容和开放的态度，对待长期被视为资产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由章伯钧、罗隆基、费孝通等人领导的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在执政党的授意和默许下，积极进行知识分子问题的调查研究，反映知识分子的状况与呼声。这些因素，都促进了知识分子所处的大环境的改善。

在上述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1956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外部环境逐步向好转：年初的知识分子会议和政协会议虽然还在讲继续改造知识分子，但主题和重点已经转到重视和信任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上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特别是高校和科研单位，空前关注知识分子问题，努力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解决他们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积极落实"六分之五"的工作时

间，并以大量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表示对知识分子的政治信任。“双百”方针提出后，“思想改造”几乎不再被人提起。对于许多人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双百”指导思想等“出格”的观点，执政党也没有正面提出批评，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宽容姿态。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等提出了批判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任务，努力推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科学文化教育和知识分子工作中的偏差与错误开始受到批评。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摆脱了被教育、被改造的令人沮丧的地位，取得了与工人、农民平等的社会地位。知识分子与他们的批判者、改造者、领导者、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环境在变化，气温在上升，知识分子的心态自然也要发生相应的积极变化。本章各节已大体勾画了1956年知识分子心态变化的历程：知识分子会议后，知识界反应消极，不大相信执政党的政策调整；“双百”方针提出后，一部分人思想趋于活跃，开始发表意见，知识分子的教学、科研、创作积极性开始启动；随着批判教条主义的声势的高涨，解放思想的知识分子日益增多，出现了一批敢于对传统理论和“左”的错误提出挑战的勇敢分子。但是，由于执政党内的思想并不统一，教条主义的势力顽强存在，多数党政干部对新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双百”方针态度消极，知识分子受到的打击太深太重，自信心、自尊心受到重创，对执政党的政治信任、感情联系遭到严重损害，不少人怀疑执政党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诚意和决心，怀疑新的政策能否持久，这就使得知识分子群体的心态在总体转暖的过程中显得极不稳定。

我们还是用权威的历史资料来再现当年的知识分子心态。这样的资料，首先要数费孝通先生那篇人人皆知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篇文章，写于1957年2月中旬，发表于3月24日《人民

日报》。作者曾郑重声明，它“指的原是过去半年的天气”[1]，即1956年下半年的情况。这篇文章是费先生从1956年下半年起到各地作了半年之久的知识分子调查后写成的。费先生本人即是最有代表性的高级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有着广泛的私人联系。他又是一个最讲实事求是、敢于直言、不愿说假话的人。在反右派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被指为费先生典型的“右派”言论之一，他做过检讨。但是，在这篇文章发表时，是得到了一致肯定的，认为它真实地反映了高级知识分子的心情。《新观察》1957年第10期发表的记者述评《蓓蕾满园乍开时》评论说：费先生的文章“坦露出老一辈知识分子们的心情”，“费孝通先生的感受，是有一定的代表意义的。因为，‘早春’确实说明了知识分子当时的心情”。到了80年代，费孝通先生还引用周恩来当年的评价，认为这篇文章是写到了“知识分子的心灵深处”的[2]。因此，说明1956年下半年的知识分子心态，这是一篇最权威的材料。在这篇文章中，费先生说：

> 去年1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象惊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象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逼近一看，问题还是不少的。当然，问题总是有的。但当前的问题毕竟和过去的不同了。
>
> 前年年底，我曾到南京、苏州、杭州走过一趟。一路上也

[1] 《“早春”前后》，《光明日报》，1957年5月31日。

[2] 《知识分子和智力资源调查自述》，《费孝通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399页。

会到不少老朋友。在他们的谈吐之间，令人感觉到有一种寂寞之感：当一个人碰到一桩心爱的事而自己却又觉得没有份的时候，心里油然而生的那种无可奈何的意味。这些老知识分子当他们搞清楚了社会主义是什么的时候，他们是倾心向往的。但是未免发觉得迟了一步，似乎前进的队伍里已没有他们的地位，心上怎能不浮起了墙外行人的"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感叹。

去年下半年，我一直在西南一带东跑西走，在朋友中听到的这种感叹是不多了。周总理的报告对于那些心怀寂寞的朋友们所起的鼓舞作用是难于言喻的，甚至有人用了"再度解放"来形容自己的心情。知识分子在新社会的地位是肯定了，心跟着落了窠，安了。心安了，眼睛会向前看，要看出自己的前途，因此，对自己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有的敢于申请入党了，有的私下计议，有余钱要买些大部头书，搞点基本建设。这种长期打算的念头正反映那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的转变。不说别人，连我自己都把二十四史搬上了书架，最近还买了一部《资治通鉴》。

费孝通认为，知识分子"对百家争鸣是热心的；心里热，嘴却还是很紧，最好是别人争，自己听。要自己出头，那还得瞧瞧，等等再说，不为天下先。依我所接触到的范围来说，不肯敞开暴露思想的人还是占多数。这一年来，情况是有些好转，在一定场合之下，有些人是肯吐露些知心话了，但还是相当腼腆的"。"他们对百家争鸣还是顾虑重重，不敢鸣，不敢争；至于和实际政治关系比较密切的问题上，大多更是守口如瓶，有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神气。""对世界的和国家的大事不很关心可能是当前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的一般情况。"

> 究竟顾虑些什么呢？对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明白的人当然还有，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这种人不能说太多。比较更多些的是怕出丑。不说话，抱了书本上堂念，肚子里到底有多少货，别人莫测高深。抛头露面，那就会显原形。说穿了这里还有个“面子”问题。面子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我记得有一次座谈会上有一位朋友说得很生动。他说，我不是怕挨批评，我们以前还不是大家有被批评的，学术论战还是搞过，现在可挨不得，因为一有人说自己有了唯心主义，明天上课学生的脸色就不同，自己脚也软了。面子是很现实的东西。带上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就会被打入冷宫，一直会影响到“物质基础”，因为这是“德”，评薪评级，进修出国，甚至谈恋爱，找爱人都会受到影响。这个风气现在是正在转变中，但是积重难返，牵涉的面广，也不是一下子就转得过来的。“明哲保身”“不吃眼前亏”的思想还没有全消的知识分子，想到了不鸣也无妨，鸣了说不定会自讨麻烦，结果是何必开口。

对于知识分子时下的心态，费先生的概括是：“‘草色遥看近却无’——这原是早春天气应有的风光。”

关于费先生的文章，我们可以提出三个问题。第一，费先生说，他写的是过去半年即1956年下半年的情况，那么，1956年上半年的情况又是如何呢？费先生的文章发表后有人挑剌说：“如果最近半年还是早春天气，前几年是什么天气呢？这不是明明暗射思想改造是冬天么？”费先生后来写了《“早春”前后》，说明这篇文章写作和发表的经过，对人们的责问却避而不答。他只是说：“我认为在1956年的下半年，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是显著上升的。”①

① 《光明日报》，1957年5月31日。

言外之意，上半年虽有1月“惊蛰”、4月“和风”，知识分子的心态有所转暖，但并没有发生显著的积极变化。变化发生在下半年。

第二，费先生的文章所描述的情况，是多大范围内（一是人群的范围，二是问题的范围）的真实。费先生说，就他接触到的范围来说，“不肯敞开暴露思想的人还是占多数”。这就是说，他概括的情况是高级知识分子阶层的整体情况或基本情况。就问题的范围来说，费先生在《“早春”前后》中说，当时有两个“盖子”：“百家争鸣”揭开了一个盖子，这个盖子一揭开，知识分子从事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冒起来了”；还有一个盖子要靠“互相监督”来揭，这个盖子若揭开，“开出来的是知识分子对政治的积极性，他们会改变过去对国家大事不大关心的消极情绪”。现在第一个盖子揭得还不够，第二个盖子还没有揭。这就表明，费先生所说的1956年下半年知识分子的情况，限于科学研究的“百家争鸣”方面，不包括政治问题与国家大事。也就是说，在1956年，即使思想开始解放的一小部分知识分子，也还不敢触及政治问题。

第三，知识分子对“百家争鸣”顾虑重重的原因是什么。费先生没有把主要原因归于知识分子。他认为主要问题在“天气”，不在“花木”。他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中说：“具体领导知识分子工作的人对于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不是都搞通了呢？也不全是通的。有些是一上来就有的担心。‘中央定的方针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这里具体情况还没有条件。’接着有些人想把这个方针圈个范围：先圈在学术里，再圈在教学之外，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出乱子了。等到鸣了起来，闻到一些唯心主义的气味，就有人打起警钟：‘唯心主义泛滥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又冒头了’。大有好不容易把妖魔镇住了，这石碣一揭开，又会冲出来，捣乱人间的样子。对这方针抗拒的人固然不算多，但是对这方针不太热心，等着瞧瞧再说的人似乎并不少。”这里指出了党内教条主义势力是阻碍知识分子思想解放的现实因素，但对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状态何以如此

消极的历史原因，费先生未置一辞，《“早春”前后》亦避而不谈。由此可见，即使像费先生这样的“顶尖”知识分子、思想解放的先锋，到了1957年年初，也还是心有余悸，不敢畅言，何况1956年的普通知识分子！

费先生的两篇文章，验证了本章各节所述1956年知识分子心态变化的历程与特点：在国际国内诸多有利因素的影响下，知识分子的心态逐步转暖，比较明显的变化发生在下半年；但是，知识分子在总体上并没有摆脱沉闷与沉重的精神状态，思想比较解放、开始参与“鸣放”的只是少数人，多数人没有动；自然科学界知识分子的心态变化好于社会科学界，文艺工作者的心态变化比较领先。1956年的知识分子，外部环境是“乍寒乍暖”，内心世界是“心有余悸，顾虑重重”。

作为一个整体，1956年的知识分子还是比较消极的。然而，这未尝不可以看做他们经过一连串政治运动的打击特别是经过胡风事件和肃反运动的震撼以后，吸取教训、慎重自持、以求自保自存的时期。“双百”之声高扬入天，多数人不为所动，也许恰恰表现了对执政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乃至某些更加深刻的问题的独立思考与清醒认识。即使那些勇敢分子，也是只谈文学艺术，不谈政治、国事。然而，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同执政党的关系虽然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主要由于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巨大成绩，却仍然保持着对共产党、对毛泽东的政治认同与信任。转过年来，在气候与环境由春入夏的时候，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终于为执政党的“诚意”所感动，在投身“鸣放”、成就了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同时，走上了群体毁灭的道路。

第九章　群体的毁灭

由春到夏:走向全面解放思想的道路——话语之一:调整执政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话语之二:打破教条主义与发展科学教育——话语之三:打破教条主义与繁荣文学艺术——话语之四: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与法治——话语之五:社会主义的制度、体制与改革——反右运动:"旧知识分子"群体的毁灭

9.1　由春到夏:走向全面解放思想的道路

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目的是繁荣中国的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其真诚用意无可怀疑。至少在1956年,他并无"引蛇出洞"的用心。在他看来,"百花齐放",自然会有毒草出现;若有,锄掉就是了,不需要大惊小怪。但是,1957年年初他对《电影的锣鼓》、陈其通等人文章这两株"毒草"的批评,却引起了不利于"双百"方针的效果。

毛泽东对这两篇文章的批评,是各打四十大板,本意是既反"左"又反右。但是,钟惦棐的文章反映了大多数文艺工作者的观点,毛泽东说它是"今不如昔",代表右的思潮,无疑是对思想刚刚有所松动的知识分子的警告。他对陈其通等人的批评,却是仅仅认为他们主张只放香花、不放毒草的意见不好,肯定他们"忠心耿

耿,为党为国","是好心"。这种"左"比右好的观点,实际上成了对教条主义者和党内怀疑、反对"双百"方针的人的鼓励。

事实确也如此。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发表以后,甚至在毛泽东多次提出批评以后,许多人仍然发表言论,呼应陈其通等人的观点。陈沂、陈荒煤、袁文殊等人纷纷发表文章,对《电影的锣鼓》和《文汇报》关于国产片问题的讨论中提出的批评意见发动全面反攻。同时,文艺界一些人对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非难,广东对周钢鸣作品的批判,四川对流沙河作品的围剿等,使得"一股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寒流'弥漫了全国各地"①。特别是1957年1月中旬四川发生的对于最早出现的同人刊物《星星》诗刊发表的流沙河的《吻》与《草木篇》的围剿,在知识界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这次有《四川日报》、《成都日报》、《草地》、《红岩》等报刊积极参与的批判运动中,棍子满天飞,帽子十分吓人。《草木篇》充其量是掺杂着某些不健康思想情绪的作品,有人却说它是"向人民发出一纸挑战书",这组诗里反映着一套完整的反动思想,作者流沙河和共产党有杀父之仇,想"变天",因为说梅花爱冬天的白雪,就是作者盼望反革命复辟的象征,等等。这时的知识分子,多是"惊弓之鸟"。他们对环境与"气候"的变化极为敏感。"早春"时节来了"倒春寒"。对"百家争鸣"只是整人策略的担心和认为共产党又要"收"的看法,在知识界又占了上风,许多人又不说话了。

毛泽东对于造成一个毫无拘束的百家争鸣的局面的决心并未改变。一方面,他恪守着"双百"方针的初衷: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以繁荣社会主义的科学与文化。另一方面,《电影的锣鼓》这一类对党的领导工作的尖锐批评,《草木篇》这一类作品的出现,确又使他感到吃惊。他把这些都看做资产阶级的进攻和知识分子还没有得到根本改造的证据,逐步形成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引蛇

① 秋耘:《刺在哪里?》,《文艺学习》,1957年第6期。

出洞"的策略。为了同时达到这两个目的，他做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

1957年1月中旬，毛泽东在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讲话，系统地阐述了"双百"方针的意义，批评了陈其通等人的文章。2月17日，他约见周扬、林默涵和作协其他负责人，重申"双百"方针，公开支持正在受到批评的王蒙。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在全面阐述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学说的基础上，反复强调文学艺术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治生活中要坚持各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批评了各种阻碍"双百"方针贯彻实行的思想和做法，批评多数高级干部不赞成"双百"方针，鼓励党内外知识分子大胆讲话，勇于批评。3月1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结束语，继续强调"放"的方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推动了各个政治系统和知识分子的动员。3月5日，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开幕，406名代表发言，知识分子问题和"百家争鸣"成为委员们议论的中心话题，特别是罗隆基的《加强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团结》的发言，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3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与会者有800多人，破天荒地邀请160多名党外高级知识分子参加会议。3月9日，毛泽东与出席会议的部分党外人士座谈，正式提出整风。3月12日，他在会上发表讲话，主题仍然是"放"。在毛泽东的引导下，出席会议的党外高级知识分子对陈其通等人提出了一致的批评。3月16日以后，毛泽东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巡视，沿途发表讲话，抨击党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宣传整风和通过贯彻"双百"方针动员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必要性。3月下旬至4月上旬，民主党派各自召开全国性会议，讨论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地方组织亦纷纷召开相同主题的会议。

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各个政治系统的一系列全国性、地区性会议,闻风而动、铺天盖地地对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和"鸣""放"的舆论宣传,显著地改变了主要由于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和对《草木篇》的围攻所造成的知识界的紧张气氛。毛泽东的讲话,使一些知识分子觉得心里有了"底":共产党的政策是"放"不是"收"。许多著名知识分子发表文章或谈话,赞颂毛泽东的讲话。有人说:毛主席的讲话,"象春天的太阳发出的温暖,使停滞的冰河解了冻"①。曾参与中国共产党创建工作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申府先生说,1956 年 7、8、9 三个月,报纸上、座谈会上真是热闹极了,"但是不久天寒了,夏季的热闹也沉寂了"。现在毛主席一讲话,"天又暖了,气又清了"②。进入 4 月以后,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为毛泽东所说服,开始相信执政党鼓励"放"的诚意。"放"的内容,亦开始由 1956 年的科学、文学、艺术、教育扩展到一些比较敏感的政治问题。

然而,即使在这个时候,多数知识分子也还没有完全相信毛泽东的承诺。许多人盯住《人民日报》,从字里行间揣摸党的政策是"放"还是"收"。4 月 21 日、22 日,《人民日报》在关于天津教授们座谈"百家争鸣"的报道中,在南开大学教授雷海宗的发言摘要前面加"按"后面加"注",表示不能同意他关于马克思主义仍然停留在 1895 年的观点,竟被不少人看做"收"的信号。有人特别注意党员、党的干部、党内知识分子的反应,发现绝大多数党内知识分子始终"守口如瓶,沉默不语",多数干部对"百家争鸣"态度消极,认为这是一个不祥之兆。知识分子中间仍然普遍存在着主要在肃反运动中形成的"四怕":怕"钓鱼"、怕汇报、怕检讨、怕讲话。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比较热闹,边远省份、中小城市、偏僻地区,却是"差

① 《蓓蕾满园乍开时》,《新观察》,1957 年第 10 期。

② 《发扬五四的精神:"放"》,《光明日报》,1957 年 4 月 27 日。

笛悠然伴杨柳,春风不渡玉门关"。"双百"的春风只刮"大屋顶",即大学、大机关、大科研单位。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发表后,得到多数知识分子的认同,认为时下还是"早春天气","知识分子是春寒的心情"[①]。翦伯赞教授在4月20日发表的文章中说,"现在还看不到万紫千红、鸟语花香的美景,能够看到的只是花的蓓蕾,能够听到的只是鸣的前奏",令人有早春之感。主要是放得不够。有些部门、地方的领导"直到现在不敢大放,甚至不敢小放、小小放"。知识分子的态度却是"大放则大鸣,小放则小鸣,不放则不鸣"。因此,知识分子现在还处在"摸底的阶段","他们还在揣测,这是真放还是假放。如果是真放,放多少,放了以后还收不收,放是手段还是目的,是为了繁荣文化学术还是为挖思想、整人,以及哪些问题能争鸣,哪些问题不能争鸣,等等"[②]。4月下旬,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王造时先生甚至提出,要消除知识分子参加争鸣的顾虑,"中央负责同志可以考虑再发表一个比较具体的声明:保证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外,一切思想问题概不在追究之列"[③];"中央负责机关应该宣布,学术著作不应该作为犯罪的证据,这样可以解除某些人认为'百家争鸣'是放长线钓大鱼的错觉"[④]。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潘世兹先生在5月5日的一次座谈会上说,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大家都很兴奋,"不过还有这样的疑虑:今天我把什么话都讲出来,过一个时期,一年或许两年,我讲过的话是不是要算账?不光我一个人有这种想法,我所接触的一部分人也有这种想法。有的朋友谈起整风,不知道我们是否要弄在里头?还有人怀疑现在整风是整党内,过一个时期,是否要轮到我们?"[⑤] 这说明,

① 《知识分子闻"放"之初》,《光明日报》,1957年4月9日。

② 《为什么会有"早春"之感》,《人民日报》。

③ 《光明日报》,1957年5月1日。

④ 《文汇报》,1957年4月28日。

⑤ 《光明日报》,1957年5月10日。

即使在毛泽东反复表态、发动以后,多数知识分子仍然顾虑重重,不敢参加争鸣,惟恐落入"陷阱"。这种状况,即使在"大鸣大放"的高潮中也没有根本的改变。

5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使形势又一次发生重大变化。这个文件公开承认"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①,要通过整风解决这些问题。这就在知识分子中造成了执政党准备诚恳接受批评的印象,同时又把当时主要对于科学文化教育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的批评引导到重点批评执政党的工作上来,即把"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地扩大到政治生活领域,揭开了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第二个"盖子"。对于素有政治参与传统和对现实政治多有不满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不可抗拒的诱惑。

然而,就在号召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同时,"引蛇出洞"的策略也逐步形成。5月4日,毛泽东亲自起草党内指示,在要求各地"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② 的同时,明确表达了在批评中"暴露"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的用心。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指示报刊"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15日,毛泽东写下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党的组织立刻成为实施"引蛇出洞"策略的工具。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部门的中共党委及宣传部、文教部、统战部,纷纷召开座谈会,遍邀知名知识分子参加。科技文教单位的基层党组织也照此办理。各级党的领导人亲自出马,极力鼓动党外人

---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22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56页。

士"大鸣大放",对党的批评"越尖锐越好"。报章杂志原文照发那些最"毒"的"毒草"。善良厚道、对执政党虽有意见却忠心不二的知识分子们,虽然始终对执政党鼓动"鸣放"的诚意心存怀疑,却决然想不到执政党郑重其事发起的"鸣放"运动会包藏着如此险恶的动机。许多人终于经不起空前"宽松"的环境的引诱和党的一再动员,说了一些心里话,对执政党提出了一些尖锐的批评。6 月 8 日,毛泽东一声令下,"反攻"开始,凡曾开口说话的知识分子立时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少有漏网之鱼。

开始于 5 月初的"鸣放"运动持续了不到 40 天。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鸣放"的重点,是政治问题,而不再是纯粹的科学文化艺术教育问题;积极参与"鸣放"的人,仍然是知识分子的少数,但范围明显扩大。从思想发展进程来看,这个阶段仍然是开始于 1956 年 5 月的因贯彻"双百"方针而启动的知识分子思想解放进程的一部分。这个思想解放过程的全部,乃至不同阶段的转换,其动力都不是来自知识分子的自觉,而是出自执政党基于复杂目的有意而为的推动、促进、引导或诱导。也就是说,1957 年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在执政党和知识分子两方面都不是自觉的产物,而是由于非常特殊的政治与社会因素组合所促成的客观结果。

但是,不论 1957 年的知识分子们对于"鸣放"怀有何种程度的疑惧与保留,也不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着又一次五四式的启蒙工作,他们还是成就了一桩伟大的思想解放事业。在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管理体制的束缚下,在教条主义窒息了人们的思想与社会生机的情况下,一批富于独立思考精神的知识分子,以对国家和民族高度负责的精神,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了诚恳的批评,对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处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如何吸取苏联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厉行改革等一系列关系到社会主义命运与前途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许

多创造性的建议，显示了由五四精神培养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崇高精神境界与思想水平，也显示了知识分子的无可替代的独立价值。如果说新中国建立后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集团在政治上有过群体性的独立精神的表现的话，那就是在“鸣放”时期。

9.2　话语之一：调整执政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

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1957年“鸣放”的中心话题。毫不夸大地说，从中央到地方各系统各部门召开的座谈会，全国基层单位的“鸣放”，报章杂志发表的文章，凡知识分子的言论，十之八九离不开这个话题。人们围绕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的现状、突出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如何恢复与重建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的讨论，涉及范围之广泛，批评之尖锐，分析之深刻，为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所未有。这种情况，充分反映了当时党同知识分子关系的紧张状态以及知识分子强烈要求党改变政策的迫切愿望。

党与知识分子关系的状况到底是怎样的呢？知识分子方面一致的看法是：他们之间有一道“深沟高墙”。突出表现是：党的组织和党员不信任、不尊重、不理解党外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和日常工作中歧视、排斥和打击党外知识分子；因不受信任、不被尊重、不被理解、在运动中屡受打击的知识分子，对党组织、党团员充满了怨气。他们不敢对党员和干部说真话，不敢提意见，惟恐哪一天被人打了“小报告”挨整，待人处世，如同“小媳妇”一般谨小慎微，甚至不得不“六亲不认”，连老朋友间的人情往来、谈天说地，也成了忌讳，内心极度痛苦。在教育科研单位，并不内行的党员干部以党的代表、领导者、改造者自居，盛气凌人，随意发号施令，一副严肃的“政治面孔”，使人敬而远之；党外人士有职无权，成了“摆设”；重视党员，轻视群众，重视青年人，打击老年人，重视学生，轻视教师，

重视苏联专家,轻视本国专家;评级、评薪、晋职、提拔、待遇,过分照顾党员;选拔留学生,政治标准决定一切;党员教师资历低、学问少,但不屑于向老教授学习;人事部门权力很大,引起人们反感,等等。这些问题普遍存在,而且愈演愈烈。

知识分子对党的不满达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可以从傅种孙先生的《中共失策之一》一文中窥见一斑。傅先生认为,错误地对待知识分子,是中共建国后最大的失策之一。他说:

> 中共所标榜的知识分子政策与知识分子所感受的几乎完全相反。知识分子的心情可能中共不很了解。自从解放以来,知识分子每见中共一设施,无不额手称庆。就大体来说,知识分子是爱护中共的。中共的最终目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大多数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所谓大同世界并无二致,所以知识分子衷心趋附共产党不是偶然的。然而共产党是怎样对待知识分子的呢?在乡间,中共提倡斗争,斗争的目标是地主、富农。在城市中共提倡斗争,斗争的目标是买办、资本家。在高等学校,中共提倡斗争的目标是谁呢?自然不是工友,不是学生,不是年轻的教师、助教。所以每一个政治运动起来,虽然这运动名目不叫斗争,不管它叫学习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肃反也好,每一运动起来,知识分子就心惊胆跳。对于统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遭白眼、挨耳光,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想不起来有哪一个兴朝盛世是这样糟蹋知识分子的。我也不晓得这些知识分子究竟造了什么孽而致遭这么大的祸殃。……中共可以检查一下,这几年来四海之内有哪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不寒心?我不相信知识分子对中共离心离德而中共能够达到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的。……现在的知识分子与中共既无冤又无仇为什么不可能利用?知识分子愿为中共效劳,因为为中共效劳也就是为祖国效劳,为人民效劳。你有

远大计划，现有人懂行，愿效劳，何苦不用？自然中共会说，我现在是用了，没有一个知识分子失业呀！但打着用，骂着用，叫知识分子成天用眼泪洗脸，这是何苦来？难道这是一种政策吗？把这般知识分子打服了、骂服了，就容易驾驭了吗？这是不了解知识分子。其实解放后的知识分子对于共产党不打不骂也是佩服的，一打骂倒是怀疑了。再这样打骂下去，仇恨就会结深，后果不堪设想[①]。

傅种孙先生是著名的数学家、民主人士，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这篇文章中的怨气之大，实在令人惊讶。这种情绪，并不是只存在于个别人或少数人之中，应当说有一定的代表性。回想新中国建立之初，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和共产党员是何等的钦佩！时隔8年，情况竟然发生了如此惊人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人们异口同声地归因于思想改造等政治运动。

复旦大学教授张孟闻先生在1957年4月26日《文汇报》发表的《我看党群关系》一文，系统地叙述了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遭到破坏的过程。他说，党与非党没有打成一片，自然是党与非党两方面的问题，但是“掌握实权的党员同志所负的责任更多更大”。“科学界，尤其是教育界，解放后的大事是院系调整。调整以前，先有三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这两个运动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改造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但也由于主持运动的个别党员掌握政策有偏，甚至工作作风十分粗暴，特别是以‘改造思想者’自居，高高在上地来改造别人，面自己的思想、作风，以至业务与哲学的修养都未必足以服人。这就招来了一些不必要的矛盾。于是党群之间起始有了隔阂。”在院系调整中，主持人认识不明，主观行事，“乱点鸳鸯谱”，惹出不少意见。在随后的教学改革中，教条主义地学习苏联，

① 《师大教学》，第151期。

"如果有人要求结合中国实际，就随便扣上反抗领导、反抗政府以及各种各式的大小不同帽子；据理力争，就被认为死硬派、顽固派，说这些人并非'硬骨头'，而且现在也不需要硬骨头，在大会上当众指斥，年轻人跟着起哄，把老年教授撕扯得体无完肤，好象要做到这样地步才是前进有为。即使党和政府已经号召向科学进军，老少团结，尊师重道了，也还是有人鼓动青年，向'老师'进军，大肆攻击，群起围剿，务使闭口无言，'明哲保身'，安安静静做听话的'好人'而后快"。他说：

> 这等的偏差，即使在学术上的争论也形成了一股歪风。一窝风向东，一窝风向西。别人的科学性预见，被说成是"落后"；而主持者错了，要变了，却用"辩证法"来掩护，认为是条件变了所以必须跟着改变；往日既无偏差，今日更无错误，甚至以不能避免错误自解。……凡是主持大计的党员们，倘使以不能避免错误来作辩护，而在事后既不检讨，又不认错。甚至在肃反运动中个别的偏差，也由集体负责，个人脱然无累，干净利落，一无责任。偶然有人批评他个人的错误，竟以"朕即国家"的态度，认为这就是批评党，反抗领导，反对政府，把个人和党与政府整个联成一气，等同起来，形式逻辑地演绎成别人的无妄之灾。这连形式逻辑的周延问题也没有搞清楚，怎么能教人心头服帖，又怎么能使党外群众和他水乳交融得起来呢？而不幸这等情形并非太个别地存在。……
>
> 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深受了数千年来的封建遗毒影响，"明哲保身"，大家都学了金人，三缄其口；尤其在几次运动中对敢于直言者的"围剿"，不能不谈"虎"(所谓思想老虎)色变，观望"行情"，"识相"为佳，至少可以不吃眼前亏。所以拆散理工，既无异言；而在拟订科学规划时，大多数只讲厚生利用之道，轻重工业、国防民用色色俱全，独独漏去了基础理论科学的研

究规划不提。要不是中共中央特地提出第57项来，竟可以对此基本大事默默无言。“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倘使要诧异于当代中国的科学家，竟无白(布)鲁诺、哥白尼、盖得(加利)略，科学工作者将何以自解？但是在偏风横吹，“围剿”威胁之下，甚至难免被剿成“落后”以至“反动”，我们想想蝼蚁犹且偷生，“何以人而不如动物乎？”①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许杰先生从党与非党人士的互动中解释了“深沟高墙”的形成。他说：

大部分旧知识分子和党员的接触，都在解放以后，而党却以某一机关学校的领导者的身份出现的时候。这个时候，两方地位悬殊，一方面是领导者，一方面是被领导者，一方面觉得我们革命革成功了，给你们包下来，才给你们饭吃的，一方面觉得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自己的觉悟不高，也不完全懂得党的政策，多少还有些距离。从这以后，接连搞上许多运动，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和肃反运动。在党员方面，为了要贯彻党的政策，怕犯错误，希望在运动中立功，在政策的执行上，可能还有宁“左”毋右的思想，这就容易形成不够和谐的地方了。自然，在这些运动当中，虽说不是每个都被斗到，但是交代历史，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却是任何人都落了水、洗过澡的。这里且不说年青的党团员的汇报，将无作有，以小为大，造成党群之间的距离，就说普遍地交代了历史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这一事实，也就引起了知识分子的更大的自卑，觉得你们是当权者，我的辫子已经抓在你的手里，连头也

① 《文汇报》，1957年4月26日。

有些不自觉的抬不起来，还谈什么主人翁态度呢[①]？

浙江大学教授董太和、梁允奇说："在高教部门的多数知识分子，都是有抱负的文化与科学工作者，有事业感和责任感，莫不希望解放后在中共领导下有一个美好的研究园地而有所作为。可惜，此一美好理想如同将尽的烛火一样每况愈下，由批判单纯技术观点而三反，而思想改造，而院系调整，而教学改革，而一系列的社会运动，最后到肃反，在这一切又一切的改造批判运动中，知识分子莫不为主要的对象。一声'大胆怀疑'，其株连之广，不下东林学案。思想改造连得三代祖宗都得拉出来大大批判一番，否则不得过门。当然千万顶大帽子更是美不胜戴了！弄得大家皇皇若丧家之犬。所谓社会主义建设愈胜利，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的理论，使得有些朋友大吃苦头。""一切改造运动我们是双手拥护，但对以往的方式方法收是不敢领教，结果是口服心不服，以致鸿沟愈来愈阔。至于昨天方才入党入团的十七八岁的青年人，今日便以改造者领导者自居来整老年人的掌故，更是美不胜收。提起打虎队，至今犹令人谈虎色变，因虎威依旧存在。在如此这般之后，难怪尊师重道，敬业乐群，早已与老年人久违了！"[②]

人们普遍认为，思想改造运动和肃反运动对他们伤害最大，其中又以肃反为甚。在这次运动中，许多单位的党组织完全没有法制和人权观念，不做调查研究，偏听偏信，望风捕影，宁"左"勿右，错整了许多喜欢发表意见的好人或仅有一般历史问题的人，在党与非党之间种下了很深的过结。北师大政教专业王真教授说："高级知识分子社会关系复杂，对他们的历史进行评价不是易事，这样肃反时就产生这种现象：不应说深的说深了，不应怀疑的怀疑了

---

① 《墙是怎样形成的》，《文汇报》，1957 年 5 月 9 日。

② 《我们看思想改造与高等教育工作》，《文汇报》，1957 年 5 月 20 日。

可避免的偏差没有避免。"[1] 许杰先生说:"在从前的时候,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党的政策是对的,但具体的党员,在政策的执行上,不能没有偏差的,所以对党员个人的意见,批评了党员个人,也不等于批评党、反对党,但到了肃反学习以后,就连对党员个人的意见,也就不敢提了。可不是吗?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就用攻击党员的手段来对抗党、打击党的威信的,你如果仍旧如此,这还能行吗?到了这个时候,有一些党员,也就真正把自己当做党的化身,觉得自己就是党,就是党的代表,因而使人更不敢去碰他了。""党与非党之间如果真有什么高墙,那么,这座高墙就是这样筑成的。"[2]

为什么会发生历次政治运动都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斗争对象,日常工作中又普遍存在着歧视、排斥、打击知识分子的现象呢?人们认为,深层次的原因是执政党对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的特点和思想状况缺乏实事求是的了解,看不到或不承认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是爱国的,是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是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对他们的阶级属性作了错误的判定,因而缺乏对他们的政治信任。

黄药眠先生认为,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是不正确的,总把知识分子当成异己分子。他说"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阶层而不是一个阶级","中国的知识分子更特别,虽然绝大多数受资产阶级教育,但因为它受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压迫也想工业化"。他们具有爱国主义的思想,所以他们在民主革命阶段就是革命的力量。在社会主义阶段,他们"已经或可能在党的领导下,故属社会主义的力量"。知识分子有落后的一面,但他们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也在发展、进步。"不应一开口就是知识分子是小资产阶级","不要

① 《师大教学》,第115期。

② 《墙是怎样形成的》,《文汇报》,1957年5月9日。

死记住列宁的个别词句，如念经一样，一提到知识分子就有'对抗情绪'，就是小资产阶级，总是把知识分子当成异己分子。党过去没有考虑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也没有从每个知识分子本身的思想发展去看问题，首先，看政治上的态度如何，这是造成'墙''沟'的原因"①。由于政治上不信任知识分子，所以，"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在实践中就变成了"利用、限制、改造"(黄药眠、冯亦代语)；不是团结，而是"打击"，不是改造，而是"取消"②。

傅种孙先生认为，给知识分子戴上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帽子是绝大的错误。他说："地主之所以为地主，资本家之所以为资本家，必然是有剥削行为的，有罪过。我们能够说一个知识分子必然有罪吗？我们来看看中共是怎样对待知识分子的。所有的报章杂志上所写的，报告会、讨论会上所说的，只要一提到知识分子，必然戴上帽子'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很少单独提知识分子而不戴帽子的。这很显然，如果光提知识分子而不戴帽子，就不好骂了。可是听的人作何感想呢？他会不会想我不是旧知识分子而是新知识分子，我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红色知识分子呢？我想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自封。因此，每个知识分子听人谈到知识分子(总有小帽子——旧的，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时，总不免有些害臊、害怕。"③"在知识分子上面必须要加上'旧'字或者是'资产阶级'，叫旧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何尝不是从旧社会来的，农民何尝不是从旧社会来的？为什么偏偏给知识分子加上个'旧'字？这又何苦？你把人家当雇佣，当奴

① 《师大教学》，第156期。

② 余肇池等：《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体会》，《争鸣》，1957年12月号。

③ 《师大教学》，第151期。

隶,甚至当敌人看,这怎能使人家有主人翁的态度?"①

傅鹰教授说,8年前他在美国看到解放军炮击英国紫石英号的大新闻,这一炮出了中国人的百年怨气。"我以前对共产党知道不多,解放军的大炮使我相信了新的政府是勇敢的、革命的,于是我这个受过辱的中国人就回来了。"回来以后的事情就有点不顺心了。"思想改造的时候,最使老知识分子伤心的是连这点爱国之念也有点不信任了。以前在国外读了几年书,在旧中国教了几年书,一下子忽然都成了于国不利的事情,弄得读书教书也要查一查它的立场。在运动中,说我不知马克思主义,当然心服;说我不爱国,怎么能使人甘心?这些年,人有一个最不愉快的感受,好象爱国也慢慢变成了部分人的事情,连这件事情也把党外的知识分子见外了。其实,党员爱国,我也爱国。"在知识分子中间,"谁领导谁,早已不是一个问题"。党内有些人对知识分子总是不放心,"我们感到总有一根无形的绳子拴上了鼻子牵着走,这种感觉是极不舒服的。其实说来也非常简单,我们这班搞科学的人不过有一点小小的心愿:有一个实验室,多教几年学生而已。这个心愿过去对,现在对,将来也还是对的,有什么不可以放心的呢?""解放军的大炮可以把我们远居国外的科学家轰回国内,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推他们走到科学的峰巅?""前几年,1949年这一条政治分界线把思想也一划为二,以前读过的书做过的事都就变成了障碍知识分子长进的'包袱',一概扫地出门。好象不如此便不能脱胎换骨。根据这样一种'逻辑'办事,这几年因人废言因言废事的事情就发生了许多。比如化学家高崇熙先生的遭遇,就是很值得惋惜的。论高先生的人品,化学界是没有人赞成的;论他的学问,大家都佩服。三反运动时,高先生受不住折磨死掉了,他一死,我国的无机化学便失掉了识途老马。现在我们在定科学规划的时候,便深感这一

① 《师大教学》,第124期。

门学科带路无人。"[1]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周熙良说，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即百分之九十九点几都是跟着共产党走的；这些人，和那些在解放前夕逃往国外的少数知识分子有个基本的不同：他们容许还不满意目前的国内情况，但是今天便是请他们出国，他们也不肯出国。不但如此，那些逃往国外的少数知识分子这几年也陆陆续续地回来了，将来还会有更多的回来，为什么会如此呢？一个原因：我们都是黄皮肤，而黄皮肤过去是被帝国主义国家轻视的。稍为回忆一下过去中国的社会背景，这一点是很容易了解的"。"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许许多多都是跟共产党休戚相关的。而有些党员还不认识到这一点，只和少数的干部推心置腹，认为只有这些人是跟党一条心，没有看到跟共产党一条心的人数量要多得多。"而且中国知识分子热爱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对共产党建设祖国的伟大计划没有不坚决拥护的[2]。

北京政法学院副教务长雷洁琼教授说，有些党员领导同志把旧知识分子当做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把老教师们放到一个"孤岛"上。"我不否认我们有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但是，这并不等于就是地主和资产阶级。"[3] 该校教授于振鹏说，该校的党员教务长刘昂说，他到政法学院来，就像到了"白区"一样，把政法学院比作"白区"，"使许多老教授非常痛心"。

清华大学艾维超教授说："党对知识分子猜疑过分了，对学习的积极性降低了，专业思想也减弱了，有专业思想不一定是一件坏事，过去把它当成单纯技术观点，加以批判，因此有些科学家几年

① 叶冈：《说实话要比歌功颂德好》，《文汇报》，1957年5月19日。
② 《拆墙》，《文汇报》，1957年5月14日。
③ 《光明日报》，1957年6月7日。

来也没有成就。有些人爱国思想也被打倒了,吃过美国面包的不一定有崇美思想,回来的都是有民族气节的,但是回来以后不敢和外国朋友通信。""这几年在知识分子中间是非标准是没有的,哪些是好,哪些是坏,党应当重新估价。"[①]

许多老一代知识分子指出,有些党员对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表现和传统缺乏了解。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旧中国拒绝与统治者合作,在腐败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中保持着可贵的清高,这是应当肯定的。北师大教育系教授欧阳湘说,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我国知识分子有着优良的传统,"在华北沦陷时期,很多知识分子忍饥挨饿度过年关,不为日本侵略者的威逼、利诱所动,主要是因为他们读过这些线装书,具有传统的士君子气节"。对此,党组织没有充分的认识[②]。吴奔星先生说,有些党员"只是片面地看到知识分子从旧社会来,只是片面地看到坏的一面,很少调查研究,不了解某些知识分子在旧社会的斗争历史。据我所知,有些知识分子曾经参加过大革命,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参加过民主运动,曾经挨过国民党特务的棍棒与驱逐,曾经写过不少进步的诗文……但是这一切很少引起少数党的领导干部的重视"[③]。董太和、梁允奇教授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传统的特点,就是辨是非,识大体。解放前后,他们已经接受了马列主义,把它作为改造自己的准则,并因而拥护党发动的各项改革运动。"遗憾的是,有些人对知识分子只看到出身和社会关系缺点的一面,而没有认识到这个传统特点,面把知识分子看做三千食客,甚至视为危险人物,以致错用了种种粗暴手段来改造知识分子。"[④]

---

① 《文汇报》,1957年5月15日。
② 《师大教学》,第122期。
③ 《协调党群关系的几点意见》,《光明日报》,1957年5月21日。
④ 《我们看思想改造与高等教育工作》,《文汇报》,1957年5月20日。

在“鸣放”中，相当多的人提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质与自尊心，认为不理解中国知识分子在其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特殊气质，不注意保护知识分子的自尊心，也是导致错误地对待知识分子的原因之一。这个问题，罗隆基提出得早，影响也大。他在3月份的全国政协会议上阐述了“从中国士大夫阶层中生长起来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性”，提醒执政党注意吸取封建社会对待这类“自高自大的‘士’”的“领导艺术”[①]。后来，很多人引用和发挥了他的观点。

著名记者范朴斋先生在他那篇后来备受批判的《会外之音》的通讯中说：“中国的知识分子由于受了中国传统的熏染，大都有相同的气质。他们除了学术修养之外，最重人品，自尊心很强，直与他们的生命相联系。”他们讲究立身做人之道，既是“择善固执”，也能“克己复理”；只可说服，不可压服。然而，建国后党内同志对知识分子的这一特性没有很深的了解，往往把他们看做落后分子，“对他们的过去，否定得太多，这也是‘劣根性’，那也是‘劣根性’，一无是处。比如有人说‘富贵不淫……’，总算不错吧，偏有人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硬骨头，算不得什么。’又如有人说：旧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这本是引用毛主席的话，但有人偏要追说：‘问题是在爱什么样的国。’这样分析也不错，但对知识分子的爱国，也必定转个弯给他一点否定，好象不如此就不足以显示自己进步，这对知识分子来说，是最伤感情了。……他们不敢分辩，说道理也说不通，只好忍守。许多人由此逐渐产生了消极情绪，这也错那也错，感到人格丧失，见人低头，还有什么生活意趣呢？那些做知识分子工作的党员同志以势凌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质缺乏认识。他们把每一个人都看做毫无渣滓透明彻底的‘政治人’，把一个复杂细致的工作简单化了！”[②]

① 《加强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团结》，《人民日报》，1957年3月23日。

② 《光明日报》，1957年6月5日。

北师大教育系康绍言教授说，有人一提知识分子的“面子”，“就认为是资产阶级面子，资产阶级面子是讲排场，摆阔气，知识分子的面子则是‘羞耻之心’。一个人没有了羞耻之心是很可怕的”[①]。吴祖光认为，不能否定知识分子的“清高”，“清高是难得的品质”，“一个知识分子不可能没有孤高梗直的个性”[②]。马哲民先生认为，经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知识分子觉得“他们做人的起码的自尊心都被毁灭了。应该懂得，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自尊心，是和他们的血肉以至生命关联着的，毁灭了他们的自尊心，是他们再伤心不过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无怪乎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生存意义都发生了怀疑”[③]。傅种孙先生说：“就知识分子来说，养着他而不听从他的意见，这是所谓‘豕交兽畜’的待遇，是知识分子所不甘心受的。知识分子的气节是从古以来所鼓励的。共产党在历次运动中声色俱厉地说‘要把知识分子的臭架子打掉’，对士气毫不顾惜，我认为这是很大的隐忧，无形的损失。”[④]

执政党为什么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发生这样一些严重的错误呢？当时已经有人敏锐地认识到，这应部分地归因于共产党没有自觉地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还在用阶级斗争的方式认识和处理问题。著名记者黄裳在一篇题为《解冻》的新闻综述中说：

> 由于在过去阶级斗争的环境里，有些人习惯于对敌斗争的方式，有些人还没有学会辨别人民内部是非的能力，在批评的时候用各种帽子扣住对方；在辨别事物时用简单化的方法

① 《师大教学》，第124期。
② 《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文艺报》，1957年第19号。
③ 《光明日报》，1957年5月8日。
④ 《中共失策之一》，《师大教学》，第151期。

> 进行批判。这样，象牛顿这样的科学家，就因捉住一个"上帝"字眼爽快地被宣判为"唯心主义"；一项反动帽子，就压垮了一位教授毕生研究的成果；一封读者来信就使新华书店拒绝发售一本厚厚的科学著作；一位老教授被比他儿子还小的年青人们用牛头不对马嘴的方式"批判"得涕泪纵横。提了意见，不经考虑就被没有论证的演绎法一步步从反领导、反党，推论到反革命……特别是这种简单化的方法更笼罩了宗派主义的色彩时，就更容易伤害知识分子脆弱的感情[①]。

陶孟和先生认为，党员在阶级斗争环境中养成的"仇恨心"，是错误地对待知识分子的重要原因。他在6月8日科学院党组召集的座谈会上说："党与非党，党员过去生活是艰苦的。同时当时是阶级斗争，具有仇恨心，在革命时期是必要的。阶级斗争的革命仇恨心，用来进行建设最为坏事，和团结正相反，是破坏。阶级斗争是仇恨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批评过苏联，说这种国家(德、意)就是靠着'恨'发展的。没有恨就完了。而我们到今天是否有些党员思想上还是以'恨'为主。认为这些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恨就不会信任，你不信任我，我也就不信任你了。化恨为爱，至少化恨为友，好不好呢？在革命时期恨是必要的，但现在应不应该把人划分为党员、积极分子、地主阶级等，应不应该划分阶级来归队？应按人来看，只要不是反革命，可否把阶级仇恨加一个限制。葛佩奇只要没有反革命行动，可否让他说话。"[②]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景汉说："有些党员同志对待党外人士或高级知识分子时，先对他们来一个假定，至少假定他们是不可靠或者可能是不可靠的，然后以对待贼的心理来处处提防。但是，这种提防不能不让

① 《文汇报》，1957年4月21日。

② 《请看陶孟和说了些什么话?》，《光明日报》，1957年7月23日。

对方感觉到，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求对方还对你真诚，可能吗？可以想象得到，当他们的人格受到损伤时，他还能容易发挥出什么积极性呢？”[①] 同时，党的地位变化以后，一部分党员居功骄傲，滋长了优越感和特权思想，严重地脱离群众，党没有及时地察觉和解决这些问题，也是造成党与非党隔阂的原因。“右派分子”把执政党的许多缺点错误归因于没有自觉地实行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从革命时期向建设时期转变的观点，是很有见地的。

高级知识分子对执政党的意见，表面上是一种个人和集团情绪的宣泄，从深层次来说是对于国家建设前景的担忧，因为他们中的骨干分子都曾在西方发达国家受过教育，深知国家富强的基础是工业、科学与教育。共产党打天下靠农民，建设国家必须靠知识分子。而新中国成立后的知识分子政策却反其道而行之，这使知识分子既伤心又焦急。陶孟和先生说：共产党当政，需要一大批能干的人，国民党时期的人才也可以用，关键是要信任他们，否则他们就没有主人翁的思想与态度。新中国成立后对高级知识分子否定过去的一切，割断历史，把过去一班人弄掉了，接班人问题又没有解决。“高等院校不讲课的有 4000 人，院系调整时废除课目的一些人被毁了。资产阶级政治学、法律学、社会学废除了，为什么不可以教？这些人都有几十年的经验，完全都放弃了。我有些过火的说：这是知识分子的浩劫。”如果说大学 4 年算一代的话，“我们国家知识分子特别是科学家，缺少了 5 代。当中空了一大段。新的一代有无希望？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是不大”。“如果象现在这样下去，科学不能发展。不要说十二年赶上世界水平，即使二十四年也成问题。……过去我最热心争取在美国的中国人回国来，现在信心不大，一年来回来有多少呢？”[②] 他认为，高级知识分子

① 《从“山穷水尽”到“柳暗花明”》，《人民日报》，1957 年 5 月 16 日。

② 《请看陶孟和说了些什么话？》，《光明日报》，1957 年 7 月 23 日。

接班人断了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必然受到阻碍。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武兆发[①] 说："解放后，许多老教授都在泥洼里洗过澡，动员青年们斗老教师，直到现在青年们不尊重老教师，这在很大程度上要领导机关负责。过去的这些做法大大地损伤了中国旧知识分子的元气。八年来，年老多病的人，没有发挥作用，就死去了，活着的旧知识分子，很多人是积极性不高。教育部应该明确，依靠谁来办教育，是依靠中国的知识分子呢，还是永远依靠外国专家？我看还是应该依靠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中国的许多专家都是科班出身，我们是了解中国的，也看到过外国的，我们有力量能办好我们的事业，但是有一句话，就是必须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②]

陶孟和、武兆发们的意见没有错。新中国建立之时，我国的总体科学水平很低，却有一批世界一流的科学家。执政党对他们的水平与作用估计严重不足。一方面抬高和依赖苏联专家，一方面贬低本国高级知识分子，不但没有"替中国教授留体面"，"没有替

---

① 著名生物学家，一级教授，20 年代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武先生在 1952 年的"打虎"运动中即是重点对象，曾有自杀的举动。反右派运动开始后，武先生作为北师大最早揪出来的"右派分子"之一受到猛烈批判，屡屡检查不能过关。有人以"论理社"的名义写了一篇题为《关于"三反"中武兆发"抹脖子"的真相》的文章，以轻松、戏謔的口气说：他作为一个"在解剖上技术不坏的专家"，"三反"中被"隔离审查"的时候竟然用小刀子割不断自己的颈静脉，而后不得不"疯了似的"夺门而出，这恰似我国民间流传的一个人"想"跳河便大嚷"我要跳河"的笑话。他被找回来后又用毛巾勒脖子。毛巾能勒死人吗？武兆发并不想死，只不过是做给别人看看，想"更能迷惑一些人而已"。这篇文章在师大校报《师大教学》上发表几天以后，武先生即自杀身亡。8 月 1 日，师大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声讨顽抗到底的自绝于人民的右派分子武兆发大会"，陈垣先生、著名文字学家陆宗达教授、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教授、生物系汪堃仁教授、学生会主席何培修、工会代表朱黄芗等人发言，说武是"祖国的叛徒"、"卖国贼"、"民族败类"、"唯利是图的商人"、"投机的博士"、"闻名的惯盗"、"科学教育界的大骗子"、"伪科学家"、"人类的渣滓"，甚至用不堪形诸于文字的污秽语言来污辱这位死去的科学家。

② 《光明日报》，1957 年 5 月 31 日。

国家留体面"[1],更从根本上损害了中国的科学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对此感到不平与忧虑是有道理的。新中国科学的发展不是靠了苏联专家,而是靠了西方培养出来的中国科学家。正如本书第一章指出过的,从新中国建立到80年代,欧美留学生始终是我国科学界的核心和领导力量。我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同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王淦昌、王大珩、赵九章、赵忠尧、邓稼先、竺可桢、李四光、侯德榜、童弟周、戴芳澜、华罗庚、茅以升等一连串光辉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是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使中国失去了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使绝大多数人没有得到正常发挥的条件,中国科学技术的面貌将会有极大的不同。

在"鸣放"运动中,知识分子对执政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批评是激烈的、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他们的观点是: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至少实际执行的政策是错误的,错误是主流而不是枝节,是长期的、全局性的错误而不是某一阶段、某一方面、某一单位的错误;不应该给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戴上"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这样做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必要;党应根本地反思和改变知识分子政策,其前提和基础是建立对于知识分子的政治信任,切实尊重知识分子,平等对待知识分子,使他们同工人农民一样成为国家的主人。

毫无疑问,人们对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提出的批评和建议,尽管不免有偏激之处,但态度是善意的、建议性的。他们希望执政党能够对他们的政治思想状况有客观的评价,能够重视他们在建设新中国的事业中的作用,能够为他们创造心情舒畅地发挥作用的条件与环境。然而,这一切都被看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抗思想改造的表现。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说过去的知识分子是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

---

① 傅种孙:《中共失策之一》,《师大教学》,第151期。

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小生产这五张"皮"上,"就是吃五张皮的饭"。"现在这五张皮还有没有?'皮之不存'了。"1958年,他干脆把知识分子同民族资产阶级一起列为中国尚存的两个剥削阶级之一。对知识分子的歧视、打击和迫害更加变本加厉,错误的理论和政策竟然又持续了20年。

9.3 话语之二:打破教条主义与发展科学教育

在"鸣放"运动中,知识分子抨击的重点,一个是政治运动,一个是教条主义。如果说对于政治运动及其负面影响的评价还有不同意见的话,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和声讨却是异口同声的,大有同仇敌忾的气势。人们强烈要求把思想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根本上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苏联经验的态度、对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遗产的态度、对西方科学教育文化的态度,以平和、开放、宽容、虚心、建设的态度对待一切,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为繁荣新中国的科学教育文化服务。

许多人指出,教条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也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种系统的、自觉的错误,是一种难以抗拒的社会潮流与风气。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集中表现,它把马克思主义与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分割开来,"把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简单化为一些理论框框,用绝对主义的精神来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秩序'。不同的意见出现怎么办呢?——用理论框框去套,尺寸不对,立刻就会气势凌人地飞出反马克思主义的大帽子,希望一举压服下去"①。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甚至经典著作中的只言片语教条化,用一把自认为绝对正确、绝对科学、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尺子衡量旧有的一切,以极端虚无主义的态度和满天飞的唯心

① 《整风——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文汇报》,1957年5月15日。

主义帽子，完全否定新中国建立以前的一切文化遗产、学术成果和教育事业，否定西方国家的一切科学文化，特别是全部的人文社会科学。它长期笼罩和牢固地控制着意识形态，已成为新中国科学文化教育发展的最大障碍。

教条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可怕的社会势力，能够横扫一切、“无往而不胜”，是借了官僚主义和自认为“唯有共产党人革命，其他人都不革命或反革命”为特点的政治宗派主义情绪的声威，因而浩浩荡荡，大有罩盖一切之势。它以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借着党、党的原则、无产阶级思想的名义，自奉为权威，好像马克思主义“尽在于此，别无分出”。教条主义主要发生和表现在党的领导和党的干部身上，但久而久之，也传染了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群众，形成了一种“左”比右好的社会风气。在这种社会风气影响下，“独立思考的见解容易受到歧视和打击；社会上有一种鼓励教条主义的势力，因为即使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人们会说至少他的‘动机是好的’，至少是‘立场稳’，‘斗争性强’，至少是‘好干部’”[①]。这就形成了鼓励和放纵教条主义扩张与横行的社会温床。

人们认为，教条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危害最为深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陈友松教授说：过去几年，教条主义者习惯于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术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惯于骂街或断章取义地引用经典著作来代替独立思考，曾经使不少科学部门无法生存，不少学有专长的人被迫改行，不务正业。“批判了”三个字，好比“推出午门斩首”一样，一切都完了[②]。陶孟和先生指出，不但思想改造等政治运动伤害了一批人，院系调整、教学改革也伤害了一批人，“特别是社会科学等于连根都拔掉了”；“文教政策没有照顾

---

① 张盛裕：《揭开矛盾，扫除障碍》，《文艺报》，1957年第9号。

② 《教育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文汇报》，1957年4月30日。

接受过去遗产，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特别是社会科学更惨”[①]。在院系调整中，社会学、政治学、行政学、遗传学、人类学、比较研究等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科学而被排除于大学的系科设置之外，师资被遣散，科研被中止。教育学、经济学等学科中的许多分支学科或研究方法，由于源自西方而被否定。洪文达教授曾指出，教条主义之所以对社会科学危害最大，是因为“社会科学是阶级斗争的科学，与政治利害当然是密切相关的，因而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权威论调也就最能吓唬人，危害性也就最大。它既然压抑了理论研究的热情，又歪曲了理论研究的方法，结果是斫伤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生机。这种影响表现在教学上，就是根据现成结论和权威意见，照本宣科，否则就容易被认为‘丧失原则性’，或者‘破坏科学体系’。在科学研究上呢？就是离开了从实际出发进行矛盾分析的方法，而是对某些现成理论进行反复咀嚼，津津有味，写成文章也只是在理论上兜圈子，在解释方法上进行比赛。可能每段文字都有来历，而独独缺少自己的意见。当然这种理论教学和研究的道路是比较容易走的，既可少费脑筋，又可免犯错误。只要是经常注意，如有什么新的权威性的、结论性的意见出现，就赶快补充进去，这就算‘不脱离实际’了”[②]。

更加可怕的是，教条主义不但破坏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改变着人们的精神状态，扼杀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追求真理的精神。在教条主义横行的情况下，知识分子起初可能感到有点苦闷，有点别扭，但久而久之，也就逐渐习惯了，甚至也有意无意地对别人抡起教条主义的棍子，就像有人所说，“这真是在教条主义的俘虏和熏陶之下，久而不闻其臭了”。钟惦棐在一篇没有发表的文章《论电影指导思想中的几个问题》中指出，电影事业之所以

① 《请看陶孟和说了些什么话?》，《光明日报》，1957年7月23日。

② 《整风——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文汇报》，1957年5月15日。

繁荣不起来，根本上是思想问题，“所谓思想问题，即在制片工作上过多地拘泥于‘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这一套。因之在平常的工作中，不敢越雷池一步，缺乏创造性，深怕想出的主意成了资本主义的”①。北大教授周辅成先生说：“旧知识分子很害怕自己的学术上的错误被人误认为是政治上的错误，象处理胡风分子一样地来处理。所以长期在学术上不想钻研。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比如对于唯心主义的人物就不敢研究，如对王阳明，虽然明知人家对他的批评是不公正的，可是不敢为他说一句话，深怕说了会被人扣上帽子。觉得还是宁‘左’勿右好。这样做学问当然就不能深入，不敢有创见了。”② 一个是凡事要问姓“社”姓“资”，一个是宁“左”勿右，一旦从领导层的指导思想转化为大众的心理定势，什么思想的自由、科学的创造、文学艺术的繁荣、学术的发展，就都谈不到了。

根据对教条主义的特征与危害的认识，人们呼吁，要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尤其要确立马克思主义是发展中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实践的理论等基本观念，注重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现代科学的进步积极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谈家祯教授在青岛遗传学会议上就提出过科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必须充分考虑到现代科学的新成果。他说：“今天还有些人，死啃马克思列宁主义几本经典著作，认为内中一字一句不能更动，不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问本身也在发展中。……例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讲到生命是蛋白质体存在的形式，这主要是从十九世纪下叶的科学水平得出而且带有预见性的启发；但是科学发展到今天，愈来愈多的事实说明生命体的更重要物质还不是蛋白质体而是去氧核糖核酸。如果我们死守

① 转引自于更生：《钟惦棐的真面目》，《新观察》，1957年第17期。

② 《我们要什么样的学风》，《人民日报》，1956年5月16日。

住恩格斯当年讲的话，这不仅会妨碍科学使它停滞不前，而且会象毛主席所指出，我们是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宗教来看待。”[①]

人们还认识到，民主革命胜利、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作为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有一个适合形势需要的发展。有人提出，“过去的马克思主义是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应该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马克思主义”，表述不尽科学，但提出理论应当根据形势与任务的变化而变化的可贵的理性思维。对这个问题，徐懋庸先生在一篇题为《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未刊稿（反右运动中成为徐先生的“罪证”之一）中说得更加明白。他说：

> 近40年来，和近10年来，特别是最近一年来，人类历史，经历了许多次急剧的巨大的转变，而且正在迎接着新的转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都面临着包罗万象而充满矛盾的实践任务。这种形势与任务，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它能创造性地、正确有效地解决新问题。正因为这样，这个理论正在重新受审查。各式各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根据前一时期的实践经验，检验这个理论的已有的全部内容直到它的基本原理，都企图在这个理论宝库中添进新的东西，同时修改它的那些已经不合时宜的东西[②]。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没有穷尽真理，而是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路，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思

① 《我对遗传学中进行百家争鸣的看法》，《文汇报》，1957年4月11日。

② 转引自张光年：《文艺界右派是怎样反对教条主义的》，《文艺报》，1957年第37号。

想，也是毛泽东反复申明过的思想，不是什么新的观点。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教条主义风行、实际上不允许人们对经典著作提出任何异议的情况下，明确提出审查、检验、修改、补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需要极大的政治与理论勇气。联想到20年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同样的问题以及它所发生的巨大而深远的政治历史影响，对1957年徐懋庸等人的思想无论怎样估计也是不会过高的。

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往往被当做“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成了一根扼杀新思想、新观点，维护教条主义统治的棍子。一些知识分子看到了这个危险。周辅成先生指出，在百家争鸣过程中，既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修正主义，但在目前情况下，不能把二者并列，必须重点反对教条主义。他说：

> 目前的具体情况是：教条主义是我们的主要病根，我们可以担心或警惕修正主义的发生，但是目前教条主义阻碍了学术的进步，这却是已然存在的显然事实，恐怕谁也不会否认。在这情况下，当有人一反对教条主义，我们立刻便警告“勿犯修正主义”，这等于对反教条主义的人，在他未说话前便先恐骇他一吓。结果，会弄得反教条主义的人，不敢彻底反下去。特别是修正主义，大家对它并没有确定的、共通的了解，有些理论，也许是他认为对，我认为不对，在这情形下，我们便很容易地说他是修正主义。如果竟有这样事实发生，那么，这就不是警告他人犯修正主义，而实是警告他人不能反对我的意见[①]。

北大哲学系贺麟教授亦曾撰文论述为什么要集中力量反对教

① 《三点意见》，《人民日报》，1957年4月23日。

条主义而不是修正主义。他认为,在学术界,"左"的教条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两个倾向,教条主义更危险。他明确表示不承认教条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内在联系或具有统一性,教条主义者把思想缠在一条绳子上,它难免不反对新事物,看起来很"左",仍然是可以很保守、很右倾的,因此,"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即可以消灭右倾机会主义"。"把教条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平列起来或对立起来作为反对的两个不同路线,不惟没有分别开主从和轻重缓急,而且事实上会放松甚至掩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主要障碍物——教条主义。"①

知识分子关心的是科学文化教育与学术。他们呼吁打破教条主义,呼吁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目的,首先是为繁荣新中国的科学文化教育扫清障碍。为此,他们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具体建议。比较集中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正确对待西方的科学文化与学术,把批判地继承人类一切文化遗产作为建立新的社会科学乃至社会道德规范的基础。

人们普遍认为,新中国的科学落后,最突出的是社会科学的落后。雷海宗教授认为,1895年以后,即恩格斯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实际上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列宁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仅限于革命的问题上。"从了解整理几千年来人类历史经验,建立新的社会科学来说,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②,因为人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解决了一切问题,社会科学不用再发展了。雷海宗教授尖锐地指出:

> 我们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太薄弱,太贫乏,所有的东西几乎都须从头做起,不是短时间所能奏功。在人类历

① 《必须集中反对教条主义》,《人民日报》,1957年4月24日。

② 《天津的教授们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人民日报》,1957年4月22日。

史上，成为科学的社会科学是到资本主义时代才出现的，我们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我们新社会所需要的社会科学。资本主义的这些东西不能拿来就用，但是又不能不用，因为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可用的东西。……最近六十年来，世界的社会科学仍在不断地有新的发展，不断地增加新的材料，对旧材料不断地有新的认识和新的解释。但这些，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界来说，是等于不存在的，我们今天仍然满足于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马克思或恩格斯在当时的认识条件和资料条件下对问题所说的个别的语句。……我们似乎不愿意想，马克思若在，他今日对于欧洲过去的历史，在今天的条件下，究竟会如何看法。我们是如此地不去思考，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界也是如此地不去思考！无产阶级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当以全部人类文化精华的继承者自豪，但我们不肯继承这一份按理属于我们的遗产，反倒把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学者去利用，而他们时常去滥用。但当他们去滥用时，我们也束手无策，也指不出他们的错误，因为我们不掌握材料[①]。

新中国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之所以不能发展，要害问题是对旧的社会科学采取了全面否定的态度。因此，"发展社会科学还得先解决这个对旧的社会科学的态度问题"，"这是发展社会科学的第一步即起码的一步"[②]。民盟"科学规划"临时工作组提出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中说：

要发展社会科学。首先要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

---

① 《雷海宗先生来信》，《人民日报》，1957年4月28日。

② 《关于科学体制问题》，《争鸣》，1957年5月号。

有人认为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社会科学可言。因为那些过去被称为“社会科学”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科学要从头创造,没有可继承的。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只有批判,谈不到接受。对旧社会科学不是改造,而是取消。因此,解放以来,过去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科学的人,在情绪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某些学科解放后竟被废除,或不成为独立科学。过去研究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学的人很多转业了。过去许多课程因为苏联没有就被取消了。有些课程比如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情况、政治制度、国际关系、国际法等本来都是政治学系的主要课程,但至今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些做法我们认为是不妥当的。对待旧社会科学应当是改造而不是取消。因此应当恢复的应即采取适当步骤予以恢复,应当重视的就应重视起来①。

费孝通先生进一步解释说:

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是有错误、有缺点的,因为它受到阶级性的限制和歪曲,但是资产阶级要用它来解决它社会里的问题,虽则它不能解决这种社会里的基本矛盾,但也不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在它所能解决的问题的范围来说,它所掌握的也不可能全部是虚假的,都是些和客观事物不相符合的错觉。如果它也反映一部分事实,这一部分的知识还是应当有用的。不但如此,资产阶级社会里的阶级斗争是一直存在的,而且是复杂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是不是只代表统治者的一方面而完全没有代表反统治者的一方面呢?我想不可能是如此的,那么我们凭什么全部否定资产阶级社会里的社会科学

① 《光明日报》,1957年6月9日。

呢？有什么根据可以说没有任何遗产可以继承呢？[①]

用马克思主义一统意识形态，就是要“一边倒”，但是，“一边倒”不应当等于完全否定另一面。许杰先生强调：“在学术研究上，我们固然不能没有‘一边倒’的——我们要倒向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边，要倒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普遍真理这一边，这是毫无问题的。但是，我们对问题的提法，如果只是这样，就会割断了无产阶级文化发展的历史传统，就会否定一切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优良的、值得我们吸收和丰富我们自己的学术成果这一面，那也是非常错误的。”他主张在实行“一边倒”中的“两点论”[②]。南开大学教授王赣愚先生指出“我们要把世界文化看做一个整体，应该把我们的知识领域大大地扩大”，“对于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研究，从继承性的观点来看，继承它们的有用的一面”，“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思想的书也很多，一概否定也是不对的”，“只批评不介绍也是不对的”[③]。既然旧的社会科学是可以批判地接受的，那么，旧中国过来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也是可以继续发挥作用的。

除了社会科学的建立与发展要继承人类文化遗产包括吸收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有益成分外，人们还提出，建立新社会的新文化新道德，还应当正确对待祖国的文化历史传统。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刘世楷先生郑重建议执政党重视民族气节与社会道德的培养问题。他说：

民族气节的培养，与尊重本国固有的文化有关。解放后，

① 《关于科学体制问题》，《争鸣》，1957年5月号。
② 《倒向真理》，《学术月刊》，1957年第2期。
③ 《天津的教授们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人民日报》，1957年5月22日。

因为反对封建势力的偏差，几乎把旧有的一切都否定了。凡是写文章、做检讨、作报告、编戏曲……差不多有一定的公式，即是尽量丑化旧社会以形容新社会的美好。青年孩子们由电影小说上所看到的英雄故事，是外国的比本国的多，而本国的故事又是现代的比古代的多。这样只看本国旧日的坏处，不提过去的好处，由旧社会产生的文化自然要被忽视的。这样的人与有文化的民族接触，会发生自卑感的，对于民族气节的培养是无有好处的。

共产党抗日成功，在于能够领导很多具有民族气节的广大人民去进行斗争，而不是专靠少数的共产党员。今后去世界大同之日还远，党应该重视民族气节的培养，对于抗日有功的人，无论存亡，无论党派，都应明令表扬。每逢抗日战争的各种纪念日，应当有庄严的纪念仪式。对于古代的忠烈信义的故事，应当重新估价，适当地编入一般人民读物及戏曲之内[1]。

第二，要求重视社会科学，恢复社会学、政治学等被取消的学科，加强法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建设，并调整相关的政策。

最早提出要恢复的，是社会学。社会学是一门具有突出实用价值的社会科学。旧中国的社会学已有相当的基础，有了诸如陶孟和、陈达、费孝通、吴景超、严景耀、李景汉、潘光旦、吴文藻、林耀华等一批著名学者，其中陶孟和、陈达曾人选为原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许多社会问题没有专人调查研究，另一方面，各大学的社会学在院系调整中被全部取消，社会学学者被迫转业。大概由于这几方面的缘故，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引起了知识界的特别关注。

① 《师大教学》，第116期。

吴景超先生是提出恢复社会学的始作俑者。1957年1月,他在《新建设》杂志1月号发表题为《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的短文,从苏联、东欧国家的学者参加国际社会学会议谈起,非常谨慎地提出"中国的社会学往何处去"的问题。他说,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基本是错误的。但是,"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在我国的哲学系中,还有设立一门社会学课程的必要",旧社会学的人口理论及统计、社会调查、婚姻家庭妇女儿童等问题,社会病态学中的犯罪学部分,都可以并入其他学院有关各系之内。这一呼吁首先得到陈达等人的响应。陈达开始同一些学者研究人口问题,并在北京市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提出设立社会调查研究机构的议案。2月20日,费孝通先生借题发挥,在《文汇报》发表《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一文。他同样谨慎地不对过去取消大学社会学系的对与错作出直接评价,而从社会生活现实要求的角度提出重新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必要性。他说,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包括新的生产关系、政治关系,一些大的问题有人研究,但有些人与人的关系没有人研究,如恋爱问题、婚姻问题、夫妇问题、儿童问题、养老问题、人口问题,等等。"这类问题,是会跟着社会发展不断出现的,并不会太平无事的。对于这些问题用科学方法来调查研究比闭了眼睛说没有问题对我们有利。"应当有一批人专门来做这些工作,可以搞出一套学问来。不必计较这门学问叫什么,第一步称作"社会调查"也可以。他表示可以保举以前在大学教社会学和学社会学的人来搞社会调查工作,因为这些人原来学会的那些访问、观察、记录、统计、分析等技术还是有用的。他建议科学院成立社会学研究所。费先生的这篇文章得到许多人的响应,后来被认为"不仅是右派分子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纲领性的文件,而且还是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的理论

基础"[①]；是一种"重大的政治阴谋"，因为费孝通公然"要求党和政府改变对待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态度"，"这一方面充分表现了他们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极端诬蔑，另一方面，也充分表现了他们对工人阶级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极端仇视与无知"[②]。费孝通先生因为发表这篇文章，在3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重申上述观点，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中"吹捧"中国社会学的两位大师——陈达、李景汉，而被公认为主张恢复社会学的带头人。

随着争鸣的展开，知识界呼吁恢复社会学研究和社会学系的声音日益高涨。北京社会学学者先后三次召开会议，讨论恢复与开展社会学研究的有关问题。其中，《新建设》编辑部4月10日召开的座谈会，邀请陈达、费孝通、吴景超、李景汉等20多位社会学家参加，内容涉及社会学的地位、研究对象和内容、现阶段社会学的任务、怎样开展社会学研究以及培养新生力量等问题。王庆成先生在《新建设》4月号发表文章，建议在综合性大学的哲学系设立社会学专业，或单独设立社会学系。4月16日，《文汇报》发表陈达教授访问记。陈先生认为，"目前社会生活中各方面的种种问题，没有人来系统地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这样，在学术领域中就形成了空白，并为国家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损失"。院系调整时取消社会学系，他就坚决反对，因为社会学理论纵有许多错误，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加以改造，决不等于一无可取。"中国过去搞社会学的人一向注重实施调查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和成套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经验。由于社会学系被取消，过去一批搞社会学的人多数改行干别的工作"，"这实在是对国家人才的一种

① 孙定国：《必须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学》，《新建设》，1957年9月号。

② 邓初民：《从阶级观点剖析右派分子企图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政治阴谋》，《新建设》，1957年11月号。

浪费"。他极力主张从速在科学院成立社会问题调查研究所，在综合大学或财经学院恢复社会学系。在各方面的积极推动下，4 月下旬，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终于决定成立社会学工作委员会，由陈达、费孝通、雷洁琼、吴景超、吴文藻、李景汉、胡庆钧、袁方等 8 人负责筹备，以陈达为召集人。5 月初，上海的社会学学者召开座谈会，呼应北京方面的行动，并在 5 月 29 日成立了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筹委会领导下的社会学工作组，由应成一、言心哲、刘咸为召集人。

恢复社会学的呼声之所以能够形成很大的声势，并取得实际的进展，与一批社会学家同时所做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密切有关。他们首先从人口问题的研究方面突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长期战乱的结束，人民生活趋于安定和改善，人口迅猛增加成为不少人忧虑的突出社会问题。吴景超在 2 月 21 日的《文汇报》发表《展开人口问题的研究》，在《新建设》3 月号发表《中国人口问题新论》。3 月 30 日，《文汇报》召开人口问题座谈会，4 月 8 日发表座谈会记录。4 月 27 日，《文汇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开展我国人口问题的讨论》，同时发表《马寅初谈人口问题》和上海财大教授叶元龙关于《论最适当的人口数目》的文章。马先生认为：人口问题使人民的生活改善受到很大的限制，现在这个问题很严重了；我国人口不仅有量的问题，而且有质的问题；不能再这样无计划生育下去，要推迟结婚年龄、避孕，这还不够，还要用行政手段控制生育；现在是有计划经济，同时也应该计划生育；生两个孩子有奖，生 3 个孩子征税，生 4 个孩子征重税，征来的税款用做计划生育奖金；我国总的情况是劳力多，资金少；马尔萨斯关于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的观点没有错，但粮食也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的，我国粮食生产增加得快，可是不能长期如此，因为耕地有限。这些观点和主张，充满独立见解，使人耳目一新。《新建设》4 月号发表董杰的《建立无产阶级人口学》、费孝通的《人口问题研究些什么?》，5 月号发表陈

达的《节育、晚婚与新中国的人口问题》。5月3日、4日,《文汇报》发表上海文史馆馆员陈长衡先生的《谈谈过渡时期的中国人口问题》的文章。这些研究文章大量使用了调查、实证、统计、分析等社会学的方法,使人们更加看到了恢复与发展社会学的重要意义,有力地推动了恢复与重建社会学的进程。

从恢复社会学的热烈讨论中,可以非常明确地看出,费孝通等一批新中国成立前长期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之所以积极呼吁恢复与重建社会学,既不是为个人的事业与前途着想,更非如后来的批判者所说的,是为了用资产阶级社会学取代马克思主义,并通过涵盖政治、经济、社会等一切领域的"大社会学"研究来干预和取代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一批曾在欧美受过系统社会学训练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看到,新中国建立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旧有的许多社会问题没有解决,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执政党集中精力于社会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造,无暇顾及这些社会问题;教条主义与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又阻碍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而对于诸如人口、家庭、婚姻、养老抚幼、城乡人民生活方式与生活状况、社会犯罪等一类社会问题,如果不调查、不研究、不解决,就会影响社会的健康发展。他们热爱新中国,愿意以自己的学识与经验为新中国服务。他们呼吁恢复社会学,不过是为争得更好地为祖国服务的条件。说他们有什么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野心和其中包含着什么政治阴谋,真是荒谬绝伦。

政治学也是当时提出要恢复与重建的学科之一。同社会学系一样,大学中的政治学或政治学专业也是在院系调整中取消的。费孝通在《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中同时提出了政治学包括行政学、管理学的恢复问题。他说:"我最近调查了一些党和非党的共事合作关系,我意识到这里有一门很复杂的学问,那就是怎样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人民内部的政治关系。这问题可以包括更多

的内容，好象人民代表大会制的运用、民主党派的互相监督等，有关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都是人类的新问题，是在阶级消灭后人和人政治关系的问题。把这些关系作为客观存在的事物来研究它的变化和运动的规律，不是一门新的学问吗？如果要挂个牌子，我想也可以说是政治学。”“我这两年来又调查过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其中有一方面是属于知识分子思想的变化，那是新的政治关系在人们思想上的反映和变化，如果专门加以研究，总结一些经验出来，我想又是政治学中的一个极有意义的部分。另一方面，我又看到人才的使用和安排，人事的管理等问题。这些问题现在是处理得不免太简单化了些，而且的确出了一些问题的。其实，这又是一门学问，我想就是行政学或管理学。”

恢复政治学的主张，同样得到各方响应。5 月 8 日，在民盟上海市委召开的有 30 多位政治学、法学专家参加的座谈会上，大部分人同意立即恢复政治学。恢复的理由是：政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作为政治问题来说，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也存在问题；恢复政治学也是培养政治人才——决策和行政人才的需要；在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需要知己知彼，需要知道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现在就有很多人不知道。国家设有政法学院，但课程不是以法代政，就是有法无政。因此，大学应恢复政治学系。在此前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召开的座谈会上，有人提出政治学系应开五大类课程，如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党政治、行政，行政学课程应列为重点；不但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可以借鉴，封建主义的东西也可以批判地学习，譬如“治事之官多则治，治官之官多则乱”之类。也有少数人持反对意见，认为政治学课程都包括在其他系、院内了，政治学毕业生没有什么出路，政治学系没有恢复的必要。大概由于政治学（包括行政学、管理学）的恢复与重建较之社会学更为复杂，所以有关的讨论远没有社会学那样热烈，也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法律学也是备受关注的一个重点学科，但情况与社会学、政治学有所不同。新中国建立后，执政党在推行司法改革的同时，对于大学的法学系科给予了特别的关注。院系调整中，撤销了北大、南大等一些综合性大学中有几十年历史的法学院或法律学系，组建了几所新的政法学院，所以法学这个学科还是存在的。但是，由于把法律和法学的阶级性绝对化，全盘否定旧的法律科学，认为在旧中国从事法学教学与研究的人员难以改造为我所用，在对法学院系进行调整的同时，一方面安排绝大多数旧中国过来的法学教育工作者转业，一方面照搬照抄苏联的法学理论，使得教条主义横行，造成了法学工作者的极大苦闷。1954 年，有几所综合性大学恢复了法律系，仍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法学的某些学科，如国际法、国际私法、比较法学的研究完全停顿，人才到了"绝种"的地步。在贯彻"双百"方针的过程中，人们提出重视法学和法学研究队伍的建设，也是自然的。

法学问题的提出，始于法和法学的阶级性与继承性问题的讨论，其开端是 1957 年 1 月 12 日《光明日报·政法》双周刊发表的文章。在这之后，北京、上海等地的法学界掀起了讨论的热潮。2、3 月间，上海法学会召开了两次学术讨论会。3 月到 5 月，中国法律学会组织了 3 次大会讨论和 3 次分组讨论。法学家和一些实际法律工作者围绕着"社会主义类型的法与剥削者类型的法之间有无继承性"、"法的阶级性与继承性的相互关系"、"在继承性问题上法与其他文化遗产的区别"、"继承什么"、"怎样继承"、"法的继承性问题的实践意义"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场讨论和以后的"鸣放"中，旧中国最著名的法家学、复旦大学法律系杨兆龙教授以其渊博超群的学识、独立精辟的见解、直言不讳的品格，成为法学界"资产阶级右派"的头面人物。我们就以杨先生 3 月 14 日在上海法学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和他在《华东政法学报》1957 年第 3 期发表的《法律的阶级性和继承性》一文为依据，说明当时

法学界提出了哪些重要的新思想、新观点，并由此提出全面改革和改进法学研究与教学的要求。

杨兆龙教授强调的重点是法学的继承性，这显然是针对法学领域以阶级性否定一切的教条主义倾向的。他的基本观点是：(1)法律受经济基础最终决定，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政治文化等因素对法律的作用也很大，譬如印度和西藏的法律就受到宗教的显著影响。(2)法律规范按其性质，可分为主导性规范与辅助性规范。主导性规范往往只能用于某一个特定的阶级社会，辅助性规范却可以用于不同性质的阶级社会。(3)法律中有许多规范的阶级性不表现在规范本身，而表现在谁运用它们或用它们来对付谁。(4)法律的阶级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单一的，但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由于国家政权掌握在几个不同的阶级手中，这几个阶级的力量对比可能不相上下或有重大区别，就可能出现有代表几个阶级性的法律规范。(5)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劳动人民的反抗力量不断增强，资产阶级不得不对人民作出一些让步，因此出现了一些比较有利于进步人民的法律，这些法律是可以直接反映进步人民的利益与要求的。在这些法律中，被统治阶级意志表现的程度无疑地要比统治阶级意志表现的程度强得多。这些法律仍然是资产阶级法律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反映着被统治阶级的阶级性。(6)资产阶级法律中有许多规范可以为社会主义国家吸收和继承来为新社会服务。他的结论是："法律的继承和任何法律体系的形成发展以及任何阶级统治的成功，有着永远不可分割的联系。"[①]

杨先生的观点，今天已成为法律系学生的常识，当时却是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惊人言论。在"争鸣"中，沈宗灵先生连续发表文章，批判杨先生的观点，认为杨先生"不仅在理论上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法律阶级性的根本原理，而且在实践上必然会

① 《法律的阶级性和继承性》，《华东政法学报》，1957年第3期。

动摇了工人阶级在推翻旧政权的同时，要摧毁全部旧法制的任务。假使说，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律中有许多是没有阶级性的或其中有些实际上已表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性，那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摧毁全部旧法制的原理，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废除全部国民党法律的历史任务岂非值得怀疑了吗？"[①] 由此可见，在人们已经习惯于以马克思主义的条条评判一切，而不再对客观事物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考察的情况下，提出任何一点新思想、新观点是多么不易！几十年来，中国的社会科学之所以举步维艰，以政治与行政权力为后盾的教条主义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在理论上承认法学和法律的继承性，在实践领域自然要引出两个结论：一是重视介绍和研究西方国家的法学和法律，在法学研究、法学教学乃至立法、司法实践中重视借鉴国内外旧法中可以借鉴与继承的成分；二是要重视和积极使用旧中国过来的法学法律工作者。这两个方面的要求，在"鸣放"运动中成为法学界的强烈呼声。

在"鸣放"期间，法学界关注的焦点，完全进入实践领域。人们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执政党忽视法律科学，是严重的失误；对原有法学院系的轻率调整，损害了法律学科的建设；抛弃旧法人员，反映了只信任党内人士而不信任党外人士的宗派主义。呼吁重视法律学，呼吁重视发挥旧法人员的积极性，成为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法学工作者比较集中的地方的一致呼声。兰州大学副教授吴文翰在中国法学会召开的座谈会上说，前几年，老一辈法学家被看做"六法"余孽，一棒子打死了，他们抬不起头来，被安排搞资料、图书还是好的，有的干临时工、教课外课，或者隐没在别的地方，要招魂；新的年轻的一代被教条主义迷住了，也要招魂[②]。在民盟南京

① 《什么是法律的阶级性》，《光明日报》，1957年2月12日。

② 《光明日报》，1957年5月29日。

市召开的座谈会上，人们对院系调整时撤销南京大学法学院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江苏省司法厅厅长、前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高一涵先生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切科学的指导思想，但不能代替社会学、法律学。""是否说搞旧法的就不能搞新法?""北京有些司法工作的领导同志也是学的旧法，难道南京有旧法观的人是不能改造的吗?"前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南京工学院图书馆工作人员祝修爵认为，院系调整中对法学院的处理是极端粗暴的，"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但也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忽视法学研究是不对的"[①]。在上海法学会的座谈会上，人们一致认为，解放后法律科学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复旦大学教授孙晓楼说："谈到法学，一般人都不大看得起，连自己的子女也不愿意学法学。……自然科学研究所有几十个，法律科学研究所迄今没有建立。全国只有两种法学刊物。书坊里买不到我国学者写的法律著作。过去几年法学界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杨兆龙教授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肯定是指导原则。但有人一提到法律科学，仿佛钥匙只在他一个人手里。同时由于强调政治，否定法律的专门性和科学性，以及保密的范围非常大，都妨碍了法律科学的研究。"[②] 杨先生认为，法学界的基本矛盾，是党与非党的矛盾。他说，法律界存在种种问题的原因是：强调法律的政治性而忽视了它的专门性和科学性；将党外"旧法出身"的人士的觉悟估计得过低；不信任党外的法学人才，不敢放手使用他们。"法律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它的政治性。但这不过是问题的一面。法律还有它丰富的独特内容和技术，须加以系统的研究；关于法律的全面正确知识乃是一种专门的学问，不是任何人都懂得的。重视法律的政治性并不等于可以忽略法律的专门性和科学性。……过去那种宁可信任不懂或

---

①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9日。

② 《光明日报》，1957年5月11日。

不大懂法学的少数干部，而不敢放手使用专门研究法学的党外人士的看法是很成问题的。"①

第三，呼吁纠正教育领域学习苏联中的教条主义，正确对待中国的教育遗产和西方的教育科学，以发展新中国的教育学与教育事业。

教育界最不满的是学习苏联中的教条主义。陈友松教授指出："教条主义有新有旧，新教条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庸俗化。在教育工作中它就表现在硬搬硬套苏联教育学，不问中国的实际。"② "解放几年来，在教育界所以引起这么多的问题，根本问题就是跟着苏联走了弯路。"③ 人们激烈地抨击院系调整与教学改革中发生的苏联大学没有的专业中国不能有、苏联大学没有的课中国大学不能上，照搬苏联从小学到大学的一整套教学内容、教学制度、教学组织、教材教法，并且以行政手段压制反对意见的偏向。教育部、高教部成为众矢之的。人们认为，教育主管部门"只信教条，不信教师，达到惊人程度"④，造成了中国教育科学的严重落后，大学毕业生水平低于新中国成立以前，损失之大，使人痛心。

教条主义地学习苏联，必然要否定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科学，否定我国传统的和旧中国的教育文化遗产。人们认为，这是错误的。曹孚先生在《新建设》1957 年 7 月号发表的《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新旧教育中有着相当多的共同因素，相当大的继承关系，其理由是：教育不仅是一种上层建筑，而且是一种永恒范畴"，"在教育学中，新旧之间的继承关系的分量要比其他

① 《法律界的党与非党之间》，《文汇报》，1957 年 5 月 8 日。

② 《教育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文汇报》，1957 年 4 月 30 日。

③ 《从教育学理论来看学制》，《争鸣》，1957 年 6 月号。

④ 《文汇报》，1957 年 5 月 20 日。

社会科学为多，其范围比较它们广"。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教育思想有很多可以吸取的东西。即使资本主义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它的教育发展水平并不低，其教育教学方法仍然有不少值得学习的东西。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并不与他的政治思想"正面有关"，对杜威的教育理论不应当绝对地否定，杜威的教育思想中也有积极的东西。华东师大校长孟宪承说，对资本主义国家教育理论和经验中有关知识、技能、方法等方面的内容，需要细致地加以检验，吸收它有用的部分来丰富我们的教育科学，改进我们的教育工作。"教育统计也是教育研究的方法之一。统计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的应用范围是很广的，在美国的教育研究中，有各种各样的调查统计，如关于学生健康的统计、知识水平的统计等，智力的统计只是运用的一个方面而已。教育统计与遗传学并不是必然联系的东西。统计本身只是一种方法，并没有什么思想性。只要我们运用得好，它是可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事实上现在我们的许多机关、团体也都在使用统计，不过使用得比较粗疏罢了。"华东师大教育系副教授赵福麟说，我们必须加强西方教育史的研究，尤其是对西方古典教育家如夸美纽斯、卢梭、斐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的研究。他们的教育遗产，是教育科学理论的重要构成部分。近几年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做得太少，对于赫尔巴特、杜威等的批判，存在片面性[①]。朱启贤、陈友松等许多杜氏弟子或有欧美留学背景的教育家都明确提出重评杜威，由此入手端正对于西方教育理论的认识与态度。

心理学的建设被提到突出的地位。人们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巴甫洛夫"表示了不满。南京师范学院副院长高觉敷教授认为，应当鼓励心理学的研究；心理学的教学，不必局限于苏联心理学教科书的框子。他说："我们在解放初期把心理学的历史连续性割断

① 《为繁荣教育科学创造条件》，《人民教育》，1957年7月号。

了。"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心理学工作者已经介绍了欧美各种派系的心理学，进行过一些研究工作，出版过几种专门刊物，"那时的中国心理学正反映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没有自己的独立的理论体系。因此，解放以后，心理学是最受误会的一门科学，心理学家只好从头学起，否定了已往的一切"。"有些学校的共产党干部以为心理学就是唯心论，最好消极。"院系调整后，一些大学的心理系被取消，心理学人才的培养受到极大的削弱。"第一，怕犯错误，怕批评，怕被扣帽子；第二，对科学研究的艰巨性体会不够，下结论过早，胸襟不很开展。在解放初期，我们都把自己的思想局限于捷普洛夫心理学，不敢越雷池一步。后来听了北师大心理学专家的课堂讲授或读了他的讲义，我们又倾向于全盘接受，好象专家的体系是不可动摇的心理学体系似的。""历史是连续的，割断历史是不对的。我们还应该向资产阶级心理学学习，研究资产阶级心理学错误的原因，而予以分析批判，这样才可使我们获得'免疫性'，不至于重复别人的错误。"[①] 华东师大教育系主任张耀翔教授说："苏联在许多方面有其卓越成就，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向苏联学习，这是肯定不移的。但这并不等于说苏联的一切科学都达到了世界最高峰，我时常这样想，心理学或者正是他们薄弱的一环。""学习一国的心理学而排斥其余各国的心理学是不明智的。巴甫洛夫老早就教导我们：'科学是没有国界的。'把心理学分为唯心的和唯物的有道理，把它分为资产阶级的和非资产阶级的就很难讲得通，资产阶级很可能利用心理学的成果，为他们的阶级利益服务，但这不足为心理学之病。""在心理学里也有一棍子打死人的事，心理测验是早已被打死的一门学科。其实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还是值得学习的。它可用在教育成绩检查方面，也可用在心理疾病诊断等方面。""无论新旧社会，都不免有人要得精神病，则变态

① 《是心理学鸣放的时候了》，《文汇报》，1957年5月27日。

心理学和心理卫生学就不能忽视。苏联心理学家大力在那里学习并介绍欧美心理学，参加他们的心理学会议，我们为什么不学习苏联老大哥这种治学的精神呢?"①

如何对待中国的教育遗产，也成为非常受人关注的问题之一。华东师大教育系教授欧元怀说："解放以来，我们把过去五六十年从资本主义国家学来的教育理论和措施，一概推翻了。即连同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亦随批判《武训传》而同归于尽。老解放区本来也有一套独创的教育经验，但迄今未见有系统的总结。在这种青黄不接的情况下，似乎我们自己的老一套，都是动辄得咎，一无是处的。这里就产生了严重的副作用——自卑感。所以今日我们首先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要鼓起勇气，建立更大的自信心。对中外古今的教育理论和方法，要明辨是非，舍粗取精，去伪存真，而不应该否定一切。"赵福麟副教授指出："教育科学的研究工作，如同别的科学研究工作一样，它只有站在前人所积累的知识的基础上，才能前进。这几年来，我们对教育的旧经验太不重视了。姑且不论几千年来我们教育的古老传统，单从1902年实施新教育算起，已经半个世纪了。在这半个世纪中，有不少失败的经验，同时也有不少成功的经验，我们没有理由全盘否定它，舍弃它。"华东师大教育系副主任张文郁教授说："中国教育学的方法论，基础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也要吸取苏维埃教育学的成就。但是，中国各个时期的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遗产，不应当完全抛弃，而应当批判地继承。在教育学中不仅能够引用夸美纽斯、马卡连柯等人的材料，而且也有孔仲尼、陶行知等人的材料。"该校教育系教授常道直说：任何一门科学的研究可以从三方面进行，即理论基础、历史知识、实际应用。"解放后，好象有意地把现代中国教育史给割断了，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过去的学校行政和教学经验

---

① 《为繁荣教育科学创造条件》，《人民教育》，1957年7月号。

是有可取的地方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已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和提高，而把这一部分遗产抛弃呢？"①

正确对待世界的教育理论与教育经验，正确对待中国的教育遗产，自然要重评陶行知。这个问题早在 1956 年下半年已经提出。10 月 16 日的《文汇报》发表陈友松先生的文章《陶行知先生的教育遗产是新中国教育的源泉之一》。他说："'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是中国人民和人民教师的骄傲，是创造性地独立思考教育问题的典范。他创造了一套富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的革命的教育思想。""解放后，我们在讲授教育学时，由于学习苏联有些教条主义，尤其是未能批判地吸收中国教育的历史遗产，从而对陶先生的思想几乎没有提及一字。""我们对陶先生的这种态度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和缺陷。""陶先生的教育实践——他的各种行为不仅表现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因素，而且还表现了许多共产主义教育的因素。"他同意 40 年代徐特立关于陶行知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和革命家的观点，同意戴白韬关于"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是毛泽东同志和陶氏共同创造起来的"的观点。12 月 1 日出版的《争鸣》第 2 期发表李士钊先生的来信，对于过去 5 年中对陶先生的批评存在着"不公正不深入和人云亦云的情况，然而却还没有一个人能够畅所欲言地提出自己的不同主张"表示不满；建议筹印陶行知全集，编写完整的陶氏传记。这种动向，反映了教育界对于批判和否定陶行知的不满。

1957 年上半年，重评陶行知的问题为更多的人所关注。1957 年 1 月 2 日出版的北京师范大学校报《师大教学》第 101 期报道，教育系副主任陈友松教授主持召开有方兴严、戴白韬、陶行知先生的儿子陶宏和北京教育行政学院的同志参加的会议，讨论该系教授毛礼瑞的论文《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几个问题》。在这次会议上，

① 《为繁荣教育科学创造条件》，《人民教育》，1957 年 7 月号。

"大家一致认为继承和发扬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中积极的和合理的因素是极其重要的"。戴白韬认为,研究陶先生的教育思想,首先应该了解陶先生所处的环境是什么样子,国内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到底是什么样子,才能客观地分析陶先生的教育思想;"陶先生政治思想是进步的,但教育思想仍然没有摆脱改良主义的色彩,并认为这种现象是不难理解的"。朱启贤教授不赞同戴白韬的看法。他认为教育是为政治服务的,政治思想既然是进步的,教育思想无疑是进步的;陶先生是"人民民主主义革命教育家"。大家认为,重评陶行知,非常重要的是区分陶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与杜威的"生活教育"理论,对陶先生的教育遗产应当充分肯定。2月7日的《文汇报》报道了这次讨论会的情况,同时发表东北师大梁忠义教授的文章《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根本区别》,肯定陶氏教育思想"不仅符合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要求,而且还具有共产主义教育思想的因素";他的教育思想的基本思想与主导精神与杜威是相对立的,"与新民主主义教育不仅是不相排斥,而且相反,是相接近的"。

"鸣放"时期,为陶行知先生打抱不平的有影响的言论,要数邓初民在6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6月2日的《人民日报》简要地报道了他的发言,引起了一定的反响。随后,他又在《人民教育》7月号发表题为《我们必须对陶行知先生给以重新评价》的专文,对批判《武训传》中否定陶行知表示了愤慨。他说:"当中国文教界群起批判电影《武训传》以后(电影《武训传》是应该批判的),接着又有人批判了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从此人们就好象渐渐地把陶行知先生遗忘了。我每每想起这件事,就使我的心中好象展开了一场战斗,使我整夜无法入睡。""陶先生所领导的生活教育社,所主办的育才学校、社会大学,以民主同盟重庆支部主任委员的资格发行的'民主星期刊',无一不竭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没有一件事、一个时候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照说，过去文教界批评电影《武训传》，应该是与陶行知先生也在一个时期推崇过武训，不能相提并论的。陶先生那时搬出武训，只是在武训行乞办学这一点上，与他也等于行乞募捐办教育上相同的。特别是由于他所处的环境，他所办教育要培养的下一代，其旨趣与武训根本不相同。因而受到反动统治阶级的摧残压迫，于是想到把武训搬出来作他的掩护，这种苦心，他是曾经对我讲过的。”“批判杜威的生活教育，也不应该与陶先生的生活教育相提并论。”“陶先生的生活教育的特点，首先是生活的，依次下来，就是：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有历史联系的。可见在那一个时候，他就以被压迫的人民大众的权利的保护者自任了。”他的教育理论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这完全是由于那时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的局限性所致，其责任不应该由陶先生来负”。“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容或还有许多值得商量的地方，但在那时已经达到中国教育史上的顶峰。”

同期《人民教育》发表张宗麟的文章《关于陶行知先生》。文章开首便说：“‘人民教育’要发表纪念陶行知逝世十一周年的纪念文字，我认为这是整理中国近代教育家思想的开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这是毛主席在陶行知逝世时的悼词。”“陶行知不是美国杜威在中国的翻版。”“杜威的一生完全为帝国主义服务，是美国华尔街的御用学者之一。陶行知恰恰相反，他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勇士，一生为求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而奋斗，几次遭到通缉，几次流亡，终于受法西斯反动派的迫害，猝然死去。能够说，这样的陶行知是美国杜威在中国的翻版吗？不能这样评论前人！其次，杜威是主张‘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陶行知是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这两种主张的含义完全不同。有人把它等同起来，不但犯了逻辑上的错误，而且不了解‘翻这个筋斗’的本义。至于‘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理论是否合理，可以进一步商讨，那是另一个问题。但绝不可以把它和‘教育即生活，学校即

社会'画个等号。所以无论从陶行知行动上和教育理论上来检查，都不应该说'陶行知是美国杜威在中国的翻版'。""陶行知不是武训，这二人不能相提并论。""陶行知确实提倡过武训行乞兴学，但应该查清楚：他在怎样时代、什么条件下提倡行乞兴学，他所兴的学（例如重庆育才学校）内容如何，是为谁服务的，他教青年和孩子走向何处，他的工作对当时的革命运动是有利，还是有害……倘若只看到陶行知曾经提倡武训行乞兴学，就把他和武训画一个等号，那是极幼稚的极粗暴的棍子。这一棍子不但打灭不了陶行知的功绩，也必然会引起很多人的不平。"本书第三章曾经指出，在当年批判陶行知的高潮中，张氏对其恩师的态度从原来的"歌颂"急剧地转变为最激烈的批判。5年后，他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并因此而被打成"右派分子"。是鹿是马，竟然决定于政治气候的四季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的悲哀，由此可见一斑。

9.4 话语之三：打破教条主义与繁荣文学艺术

"双百"方针提出后很长一个时期，文艺界扮演着解放思想的先锋的角色。1957年2、3月以后，知识各界的争鸣逐步高涨，争鸣的重点很快从学术问题进入政治领域，文艺界的动向不再显得那么突出。但是，文艺界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批判之尖锐，仍然是其他领域少见的。

1957年年初，毛泽东批评《电影的锣鼓》，说钟惦棐主张"今不如昔"，是"右"的代表。到了4、5月间，"今不如昔"却成了许多人公开的观点。陈白尘先生在4月29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召开的座谈会上说："解放八年来，话剧运动成绩不大。""八年来话剧事业有发展：剧团多了，队伍大了，剧作者也有大量的增加。近半年来演出也活跃得多。但不管剧作、演出、批评、出版……各方面，进步不大，劲头不大。解放后有几部经常上演的剧本？不多！每个剧作

家写了几部作品？不多！吴祖光同志刚才说他抗战八年写了十个剧本，郭老在1942年以后三年中就写了六个剧本。今天的剧作家的创作劲头哪里去了？话剧演员很多，但八年来在舞台上发出光辉的新'明星'并不多！新导演很多，但能以其独特的风格在舞台上放出异彩的也不多！而且有许多过去光彩射人、曾经为观众念念不忘的导演、演员们，又都从舞台上隐去。"[1]电影界的反应更大。电影演员沙那说："我很想画一幅漫画，大意是：打日本鬼子的时候，我们顶着日本鬼子炸弹演戏；国民党统治的时候，国民党士兵、特务用手枪威吓我们，我们还是演；但到今天，革命胜利了，我们反而没有戏演了。"[2]

河南作家苏金伞说："过去对于曾在国民党地区生活过的老作家，尤其是非党作家，是采取不够尊重甚至于是排斥的态度。对于在解放区受过锻炼、受过教育或在解放区生长起来的作家，则另眼看待，作品有优先发表权，著作有优先出版权；对这些作家的作品，有时给以不甚恰当的推崇，使这些作家以政治上的优越性成为文学方面的先进人物。而对于老作家——尤其非党老作家，则认为他们历史上有问题，政治上不进步，对新的人民生活不理解，因此也就写不出好作品来。即使写出作品来，也冷冷淡淡，或者让其自生自灭，或者加以打击。"解放区来的作家和党团员，"更多的同志有着比较狭隘的宗派主义情绪"。"为什么会产生宗派主义情绪呢？无非以为自己立场最坚定，政治最可靠，思想最进步，观点最正确，是马列主义的守卫者。"[3]

贵州的老作家蹇先艾说："作协有些领导同志的思想里长期存在着宗派主义的排他性，因此'广泛地团结作家'这个工作显然就

① 《话剧运动要求领导》，《戏剧报》，1957年第10期。

② 《长影的第一个声音》，《文艺报》，1957年第11号。

③ 《肃清文学上的宗派主义》，《文艺报》，1957年第12号。

大大地受到了阻碍。"陈梦家在这次作协党组座谈会上说自己像文物一样被作协挖出来,大家听了觉得好笑,蹇先艾说他却"感到有点沉痛","直到今天,没有'出土'的老作家还不是少数"。"还有很大一部分老作家压根儿没有动笔或者写得太少了","有的作家被宗派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一笔就抹杀了",如徐志摩。他为沈从文打抱不平,说"有一位解放前写过十几本小说而且大家都公认为有一定成就的小说家,解放后他的作品全部都被否定了,他只好转业去搞文物工作"。"过去某些宗派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那种割断历史、排斥老作家、完全否定了别人若干年的劳动成果的行为,是应该反对的。"① 汪曾祺先生也为沈从文打抱不平,说解放后以作家的政治身份来估价作品,对沈从文就是如此,使得一批老作家不能发挥作用。

作家吕剑在中国作协党组召开的座谈会上说:《人民文学》"不信任国统区的非党作家,把范围局限得非常之小,只有解放区少数几个作家才有可能发表作品"。"许多党员作家,他们对茅盾、郭老都瞧不起,认为这些人只能谈谈技巧。这两位作家都未受到重视,可以设想其他作家的精神状态。"②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的开拓者钟敬文先生批评作协领导对党内同志有说有笑,对党外作家"敬而远之",认为"党员作家和非党员作家虽然在一个同业团体里,实际上中间的'楚河汉界'是非常分明的"。人们怀念民主革命时期党内外作家平等团结亲密无间的岁月③。

教条主义仍然是文艺界声讨的主要对象之一。姚雪垠指出:"教条主义不仅在领导同志、编辑和批评家身上相当严重,在读者

① 《多关心"作家老百姓"的疾苦》,《文艺报》,1957 年第 12 号。
② 《文艺报》,1957 年第 11 号。
③ 《为了完成高贵的共同事业》,《文艺报》,1957 年第 11 号。

身上也相当严重。它曾经好象是一种时代空气，或者象流行性感冒，散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环境中。在这样的环境中，作家也不能不沾染着或多或少的教条主义。……他们常常一面带着教条主义创作，一面同教条主义斗争。""一部分领导、编辑、批评家和读者群众按照几个简单的教条对作品进行衡量、挑剔和指责，形成一种很大的压力。"教条主义"其所以为祸甚烈，是由于教条主义总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扮演着马克思主义文学保卫者的姿态。而且它上有领导，下有群众，形成了一种社会力量。今天教条主义的阵地虽然被冲垮了，但如果不警惕，不但旧教条主义可以卷土重来，而且随时都可以产生新的教条主义。所以我认为同教条主义斗争是长期的，不能看做是一阵风"[①]。人们批评了 1952 年文艺整风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认为建国后党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存在着严重的错误，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以《文艺报》为代表的粗暴批评，"实际上是文艺界领导思想的体现"[②]。

"鸣放"时期，人们对文艺领域教条主义的批评，公开指向了其代表人物周扬，甚至对《讲话》的权威阐释乃至《讲话》本身提出了质疑，这是其他领域绝无仅有的。

延安时期以来，周扬是党的文艺工作的主要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工作中发生的一切缺点错误，都与周扬的僵死的教条主义文艺思想和简单、粗暴并带有浓重宗派主义色彩的领导有关。"双百"时期，人们批评教条主义，尚未指名道姓。进入"鸣放"阶段后，周扬成为公开的批评对象。《文艺报》1957 年第 8、9 号发表蔡田的题为《现实主义，还是公式主义？》的长篇论文，系统地批判了流行的"左"的文艺理论。他认为，建国后同错误倾向的斗争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而是以教条主义为武器的；教条主义"摆出

---

① 《打开窗户说亮话》，《文艺报》，1957 年第 7 号。

② 《文艺报》，1957 年第 11 号。

一贯正确的权威的架子,以及具有某些行政权力,所以它长时期都不受阻碍,一帆风顺地发展"。他集中地批评了"理想人物论"和"无冲突论"。这篇论文点名批评陈荒煤,兼及陈沂、张立云、鲁勒等人,实际上直接针对周扬。

接着,《文艺报》第10号又发表唐挚的《烦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与周扬同志商榷几个关于创造英雄人物的论点》,认为蔡田的文章和在这同时发表的于晴的文章没有进一步分析"为什么这样的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为什么这样的理论曾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指导的思想?"唐挚说:"回答上面的问题,也并不需要绕许多弯子,简单的说,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理论不仅仅是作为个别理论家的个别观点而存在着、传播着,而且是曾经作为一种正确的理论被肯定在我们的文件中,以供大家学习的。因此,这个影响就特别深刻、特别严重。"他举出周扬在第二次文代会上的报告为例,集中地批判了周扬在这个报告中提出的"要写英雄,就得写一个完美无疵的英雄,一个'理想人物'"的理论。

6月7日的《文汇报》发表杜黎均的文章《关于周扬同志文艺理论中的几个问题》,认为周扬文艺理论中"某些部分是教条主义的",最突出的是他关于创造英雄人物的理论;周扬对于落后人物被改造是不是英雄人物成长的典型过程、可不可以写英雄人物的缺点等,都规定了许多的框子;周扬对自然主义的批评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当时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倾向。

这样,尽管自1956年下半年以后周扬本人也发表了不少的"右派言论",人们还是毫不犹豫地把他置于文艺界教条主义总代表的反派地位。批评周扬,等于批评了胡乔木,因为正如本书第五章所述,写理想人物的思想得到过胡乔木的肯定与支持,这是文艺界人所共知的。

为什么教条主义如此猖獗、盛行不衰?人们追根溯源,不能不

把眼光投向文艺工作的最高经典——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多数人把教条主义的根源归之于对《讲话》的曲解或简单化的理解。

王蒙指出："文艺本身就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意识形态，任何伟大的理论，多半只能使'方向'取得一致，而不可能精确地概括文艺问题的各个方面，用逻辑思维来解释形象思维，是难以做到面面圆满的。""有一些不肯下工夫学习文艺的人，他们有的甚至宣称自己不懂艺术也不想懂艺术，却想靠背诵《讲话》的片言只语和一般的政治分析能力插手领导文艺，该让这些好心的、靠教条主义吃饭的人歇歇了。"[①]《文汇报》在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中指出："这几年来，不管是在新英雄人物的创造问题上，还是在题材问题上、文学艺术的样式问题上……都是受到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的，而这些教条主义又是和曲解毛主席《讲话》的论点分不开的。"因此，"必须彻底解除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彻底批判教条主义对毛主席《讲话》的种种曲解"[②]。

徐懋庸以对于"人性"的理解为例，说明曲解《讲话》的危害。他说，《讲话》中"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的话，"十五年来，却被许多人利用来根本否认人类有共同的人性，其结果，连阶级性也被曲解了"。"根本否认人性存在的阶级性论，在理论上，是歪曲的，它解释不了社会生活中许多实际问题。例如，倘若没有某些共同人性的基础，中国资产阶级为什么竟可以改造为社会主义者；特别解释不了李后主的词何以为什么能感动人民之类的文艺问题。至于在实践上，那些不承认人性而自以为无产阶级性极强的人们，则不过使自己的行为变成矫情，并且不能懂得别人的心

① 《伟大的起点》，《文汇报》，1957年5月22日。

② 《反对曲解毛主席对文艺问题的讲话》，1957年6月3日。

理;而在创作上,也只会使得作品中的人物显得不合情理。”[1]

上述言论尚未触及《讲话》本身。姚雪垠的观点进了一步。他说:

>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其中基本道理,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参加斗争,进行自我改造,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等,在今天仍然是我们的指导原则。但历史条件在不断变化,许多真理也在跟着发展,今天除提到为工农兵服务外,也提到为知识分子服务,这就是发展。今天提出文艺的“百花齐放”,也是发展。必须从发展看问题,把指导原则看成是活的,才不犯教条主义[2]。

姚雪垠强调《讲话》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表达了不承认《讲话》是超时空的、标志着文艺理论之终结的绝对真理的意思,但正面触及这个问题的,却是被周扬斥之为“不知天高地厚”的年仅21岁的青年作家刘绍棠。在《讲话》发表15周年之际,这位青年人自称以“‘初生牛犊式’的勇气”,在《文艺学习》第5期发表题为《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的文章,自称是“胆大妄为”地对《讲话》本身提出了挑战。

刘绍棠的基本观点是:《讲话》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指导当时文艺运动的策略性理论;一个是指导长远文学艺术事业的纲领性理论”。他说,《讲话》产生的历史情况是:抗日战争正处在最艰苦的年月,国民党对日动摇,对人民采取高压政策,而“文艺工作者存在着脱离群众和创作脱离政治的现象”。为了使掌握着文

① 《过了时的纪念》,《文汇报》,1957年6月7日。

② 《要广开言路》,《文艺报》,1957年第8号。

学艺术武器的作家和艺术家发挥战斗的作用，“必须对作家艺术家们进行思想改造，要他们深入工农兵，深入实际斗争，要他们及时写出直接为抗日战争服务的作品，哪怕这些作品只是一块砖瓦，一块石头，只要它能打击敌人就可以。因此，当时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就必然表现在为政策条文服务上”。文艺作品大多要根据一定的宣传意图来写，并且以普及为主，《兄妹开荒》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作。作家们写这种作品，理论家推动作家去写这种作品，文艺领导督促作家去写这种作品，都是必要的。这些作品反映的生活有一定的时间性，创作过程匆忙而短促，所以艺术性一般很差，思想性也有很大局限，因而生命力不强，但是它对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尽管没有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产生，但是在文学史上，它应该占有光辉的篇章；而且毫不夸大地说，这些众多的无名作品和无名作家，集体组成了史无前例的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

刘绍棠指出，解放后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欣赏艺术的机会多起来了，欣赏能力提高了，根据政策条文创作的作品，缺乏高度的艺术魅力，已经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生活环境的安定，使得作家有充分的时间对作品进行孕育、构思和细致的艺术加工。“再沿用过去的领导方式和理论思想督促和指导作家的创作，势必只能起到‘促退’而不是‘促进’的作用了。”历史条件的变化要求调整战争年代的文艺工作领导方式和文艺理论。然而，这种调整却没有发生。刘绍棠说：

> 不能不承认，全国解放以后，我们的理论指导思想是守旧的，而且与之同时又深深地接受了外来的教条主义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妨碍和束缚了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于是，这就发生了读者、观众与被阅读、被欣赏的作品之间的矛盾（也可以说是人民与作家之间的矛盾），创作与理论指导思想的矛盾（也可以说是作家与理论批评家和文艺领导工作者之

间的矛盾)。……

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就在于教条主义者机械地、守旧地、片面地、夸大地执行和阐发了毛主席指导当时的文艺运动的策略性理论。但是应该公平地说,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起过积极作用的,然而在这今天,它已经是有害无益的了。

刘绍棠把战争时期形成的文学艺术为政策条文即为具体的政治任务服务的传统思想视为文艺理论、文艺工作指导思想中妨碍新文艺发展的最大障碍。他认为:"要求文学艺术作品非常及时地为政策方针服务,其实是违反唯物论的基本原则的。""为了某些迫切需要的任务,根据政策方针去创作,也是应该的;并且也可能由于生活积蓄的丰富和艺术技巧的高超,写出优秀作品。但是,这并不符合艺术创造的正常规律的。因之,也就不能据此去要求文学艺术服从和服务于某一方针政策;否则,就仍然会陷入公式化概念化的泥坑中去。"什么是指导文学艺术创作的正确原则呢? 刘绍棠说:

文艺为政治服务,并不是表现在机械地为某一政策或某一方针的服务上,也并不是表现在根据宪法、党章和法律条文的创作上;它主要是表现在作品的阶级性、对人民的鼓舞作用以及对人民道德品质的美育作用上,也就是说,表现在人类共产主义灵魂工程的建设作用上。

从上述观点出发,刘绍棠对文学创作和文艺领导工作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如在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上,应转而以提高为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要坚持,但"今天的为工农兵服务,实际上也就是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服务";作家应该努力描

写工农群众的题材，但必须出于作家的自愿；工农兵题材，内容并不限于劳动、生产、战斗，陈其通等人所鄙视的"家务事，儿女情"也包括在内；题材有主从之分，但作品的价值并不决定于题材和主题的重大与否，而决定于作品通过艺术形象所表现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感染力；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不能倒置，但思想性必须通过艺术形象去完成，"在今天，最尖锐最突出的问题，是要求作家们，努力探索和追求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亦即是艺术性、艺术感染力和艺术魅力，因为这正是人民文学艺术事业内部矛盾反映在当前作品本身的焦点"；深入生活和改造思想要坚持，但思想改造只能说服不能压服，深入生活的方式应因人而异，并以作家的作品来检验其效果。

刘绍棠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他在把《讲话》分为两个组成部分的时候，声明"我们不可能断章摘句地在全书中找出这两个部分"，他所指的是"整个理论中所含有的这两种意义"。他的文章没有引用《讲话》的一句话。然而，这种"两分法"却从根本上动摇了《讲话》不容置疑的绝对真理地位。贯穿于《讲话》的核心思想是文艺为现实政治服务；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人把它具体化为为政策服务，形象的说法就是"写政策"、"赶任务"，这并未偏离《讲话》的基本精神。刘绍棠强调历史条件决定一切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表现了从发展的角度动摇《讲话》的绝对地位的企图；认为"写政策"、为"迫切需要的任务"写作不符合文学艺术的规律的观点，则是对《讲话》之核心思想的直接的否定。他使用至今仍在流行的"辩证法"惯用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诡辩手法，否定了《讲话》的一系列比较具体的原则或定律，其意图也非常明显。在反右运动中，周扬、茅盾、郭沫若等人据此批判刘绍棠，说他"不知天高地厚"、"无知得很"、"狂妄得很"，公开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或许并没有怎么"冤枉"他。

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宣布，党

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作家写什么,怎样写,只能由作家自己决定,不要横加干涉。又过了十几年,1991 年年末、1992 年年初,胡乔木终于承认《讲话》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特别是战争环境中的产物,说“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问题,《讲话》有它的局限性”,“文学服从于政治这种话是不通的。古往今来的文学都服从于政治,哪有这回事?”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已经成为新时期文学艺术事业的指导方针,胡乔木晚年的睿智也受到广泛的赞扬。然而,现在又有多少人知道或者愿意公开承认 1957 年有一个叫刘绍棠的青年人曾经明确地提出过这样的思想并为此付出了 20 年的青春呢?

“鸣放”时期,文艺界人士出语之惊人,无过于刘绍棠。但是,作为一个 21 岁的青年,他不属于作为本书主要研究对象的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群体。从刘绍棠的年龄、思想倾向和表现来说,他属于以大学生为主体的青年“右派分子”群体。这个群体以北京大学的谭天荣、中国人民大学的林希翎为代表。这个群体的特点是以青年人特有的敢于怀疑一切、探索一切的勇气和坦诚,不但全面地涉及了老一辈知识分子提出的问题,更从理论、思想、文化、制度、社会风气、国民性格等更加广阔、更加深刻的层次上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不符合社会主义理想的弊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明确承认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铁托“普拉”讲话(在这个讲话中,铁托认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与制度有关)对自己的影响,有些人撰写了长篇论文阐发一些非常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这是绝大多数老一辈知识分子没有做、不敢做或做不到的。同旧中国过来的老一辈知识分子相比,他们关注的问题针对现实但又不局限于现实,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重新界定社会主义的概念方面,在探讨如何改革与完善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建立真正的民主与法制、切实

保障公民的自由、平等和人权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上，他们的思维方向与主要观点与70年代末发生的思想解放运动有着更加直接的联系，因此他们同样不愧为五四的传人、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但是，由于青年人嫉恶如仇、理想主义和易于陷入片面性的特点，这个群体中有些人的言论相当偏激。鉴于本书所确定的研究对象的限制和这个问题的特殊性，恕不多加论述。

9.5　话语之四：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与法治

扩大民主，加强法制，保障公民的思想与言论自由，是"鸣放"时期知识分子的中心话语之一。在新中国成立50多年的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像1957年那样公开地、强烈地大声呼唤民主与法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加强民主与法制，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被置于空前重要的地位。这种指导思想上的进步，主要源自于执政党对20年"左"的错误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痛苦反思，而非缘于知识分子的推动。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民主法制建设的基本思想、基本思路乃至许多具体措施，1957年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已有全面的论述和建议。

新中国建立之初，知识分子对政治民主期望甚高，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自戊戌维新以后，民主历来是知识分子集团追求的基本政治目标。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正是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中，同共产党走到一起来的。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现实，却与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以欧美留学生为主体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理想相去甚远。他们看到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存在着种种不民主的现象，在日常工作和政治运动中亲身感受到因民主遭到破坏而发生的种种不快，察觉到国家政治生活业已出现向高度集权方向发展的趋势，党和国家政治机体中的封建因子正在恢复与加强，因而不能不利用整风的机会，大声疾呼。在他们看

来,民主是新中国、新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没有人长篇大论地论证民主的必要和重要,而是集中地抨击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中的种种不民主的弊端,敦促执政党加以改革。

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一切权力集中于党的系统,是建立民主政治的严重障碍,对此,1957年的知识分子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许多人认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已经到了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程度。在国家政治系统中,从中央到地方,党委凌驾于人大、政府之上,直接向政府发号施令,或者越过政府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这样一种执政方式,被党、党的干部、党员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全国人大成为听听报告后“举手通过”的机关,对于国家重要问题,难以发挥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选举流于形式。许多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甚至不能按期召开。政府机关中党组决定一切,党外人士有职无权。基层单位的领导工作,同样为党的组织和党员所包办。尤其是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大学里,校一级是党委包办行政,系一级是党员秘书“专政”,教研室、教研组同样是党员决定一切,老教授受到排斥。选拔助教、留学生过分强调政治条件,评薪评衔党员受到照顾。外行办教育,导致院系调整、学习苏联、教学改革等工作中出现失误。有些党员主观武断,专横跋扈,惯于用阶级斗争的眼光和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中很使一些人吃了苦头。这些并非虚构和夸大的现象,不免使人产生新中国成立后是“党天下”的看法[①]。没有人反对或动摇共产党的领导,但确实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认为,共产党必须改变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方式。否则,不但全中国人民百年追求的民主

---

① “党天下”这个词是《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在1957年6月1日的发言中提出的,它不过是对于由党的系统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形象说法。储安平的发言用了“老和尚”、“小和尚”这样的刺激性字眼,但他指出的党同国家、同群众、同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的建议,并无恶意,且极有见地。

理想无以实现，共产党亦必然会由于垄断权力而脱离人民，走上蜕化变质的道路。他们强烈要求从思想上、制度上解决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以有利于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

为什么会普遍出现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呢？多数人强调党员和党的干部在革命成功后滋长的功臣思想。有的人认为是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实行向执政党的自觉转变，仍然沿用战争年代的领导方式和方法。有的人认为这是共产党地位变了的缘故。有的人则认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与错误的理论指导思想有关。

有人提出，革命胜利以前争民主、胜利以后怕民主，是导致新中国成立后执政党和执政党的干部对民主建设不甚热心、不甚重视的重要心理原因。徐懋庸在《不要怕民主》一文中说："现在的比较高级的干部，都是吃过国民党的不民主的苦头，肯为争取民主而奋斗多年的；他们也深知国民党的压制民主的'工作方法'之复杂。现在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时代了，而有的高级干部，却嫌'群众民主太多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也许，因为他现在已经是'干部'，从'群众'身份中解放出来了；也许，他过去的争民主，仅仅是为了他自己，并非为了群众——但我不敢武断。""为什么怕民主呢？有的自以为是为党为国，怕民主多起来，社会主义就会动摇；他看得党、国的基础薄弱得很。也有的，却只是为了自己，怕民主多起来，自己的什么架子摆不稳了；他暗中对于自己的基础，倒是有点自知之

明。"[1] 徐先生指出的"怕民主"的问题，当然是革命党人由于地位变化而引起的微妙的政治心理变化，有这种心理的决不止是"有的高级干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全党性的问题。朱启贤先生指出，苏共二十大以前，党内有些同志不敢谈民主，一谈就说是资产阶级的，"他们不知道还有无产阶级民主。党为民主奋斗了几十年，掌握了政权反而不敢谈民主！他们不知道资产阶级不好，不在于民主，而在于民主是假的"[2]。因为理论上片面否定资产阶级民主而不敢讲民主，也是民主建设不够的重要原因。

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来源于苏联，它是斯大林的国家学说即关于党、苏维埃、群众团体之关系的政治理论的物质体现。有人认为，要扩大民主，就要纠正斯大林理论上的错误。民盟中央候补委员陈新桂先生在 1957 年 6 月 10 日的民盟中央小组会上对此作了深刻的发言。他说，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有 40 年的历史，它的正确性应当肯定，它也有缺点和阴暗的一面。《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也提到无产阶级专政还有很多困难、很多弱点。"共产党的执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同一语。共产党在执行国家领导和政治统治的时候，依靠党员作核心，而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是杠杆、传导带。这样一种方式就值得研究。"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体制中，"党首先信任党员，党员信任团员和积极分子，这样，如果没有

---

① 《人民日报》，1957 年 4 月 20 日。新中国成立后执政党在民主问题上的变化，1951 年 3 月刘少奇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提供了绝好的例证。他在这个讲话中说，社会主义的民主比旧民主主义的议会制要民主"一万倍"。"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这一口号，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时候是有进步意义的，"如果拿到今天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底下要求立即实行，对于中国人民目前的实际情况则是还不完全适合的，因而也是不能完全采用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农民太多，多数人民还不识字，缺乏选举经验，对选举的关心和积极性也还不够充分，立即采取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所注重的"形式主义的办法"，"在实际上并不能使这样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具有更多的代表人民的性质"。

② 《师大教学》，第 117 期。

宗派主义以及由此滋长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是难以想象的，这不是‘党天下’，是难以想象的”。他认为，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用来联系群众的杠杆和传导带，实际上是工具，完全是被动的，不可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要改进无产阶级专政的弱点和阴暗面，必须使党进行领导时所应用的环节，发挥主观能动性。真正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就不再是传送带。“归根结底，就是扩大民主的问题。”①

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知识分子关注和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这是因为，民主党派的成员多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自然也就把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实际地位与作用作为衡量政治民主化的一把尺子。开国之初，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结构中处于突出的地位。中央政府 6 名副主席中的 3 位，56 名政府委员中的 27 位，4 名政务院副总理中的 2 位，15 名政务委员中的 9 位，政务院 34 名部、会、院、署、行正职中的 14 位，是党外民主人士。各地方、各系统、各基层单位的民主人士都很有政治地位。1954 年 9 月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后，开国时任中央政府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的民主人士的“椅子”统统挪到了人大，政府系统的最高层为清一色的共产党人，担任部长一级的党外人士也大为减少。政协因失去临时最高权力机关的性质而成为没有实际政治权力的纯粹的统战组织。从中央到地方，民主党派的地位与作用显著下降。1955 年的肃反运动涉及了不少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的党员。在基层，一些共产党员傲视党外人士。张奚若先生说，有的党员认为“天下是咱家打下来的”，于是老子天下第一，以革命功

① 《光明日报》，1957 年 6 月 11 日。陈新桂先生分析的对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并无主张根本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意思。某些党史、国史著作至今仍将陈先生的发言引为典型的右派言论，实在与事实相去甚远。

臣自居。他们对党外人士有一种看法：现在革命成功了，给你一碗饭吃，算是很不错了；不仅给你饭吃，而且还给你官做，已经很客气了。这只不过是为了政治团结，何况你并不高明，这一点你知道，我也知道。这样，他就产生了权威思想，采取了自古以来的当权者的做法："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①] 这样，基层的民主生活也就严重不足。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民主党派强烈希望执政党采取措施，真正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发挥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与科学文化教育领域中的积极作用。

与对民主的关注相比，1957 年的知识分子对法治的呼声似乎更高一些，也更加集中，这显然起因于他们新中国成立后的境遇与感受。自批判《武训传》开始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思想改造运动和肃反运动，确实存在着侵犯言论自由、思想自由、通信自由和人身权利的严重偏差，招致许多知识分子的不满与愤慨。他们把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首先归之于没有法治，强烈希望执政党重视法治，用法律的力量保障民主，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这其中当然也蕴涵着他们希望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的社会理想。

对于法治、民主、人权之间的关系，以及建立真正的法治的必要性，1957 年的知识分子认识非常明确。王造时先生指出，"要讲民主就要讲法治"，民主是近代社会发展的趋势。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统治向来重人治而轻法治，现在人们的思想上和生活习惯上还存在着不少的人治主义的封建残余。人民崇拜包公就是崇拜人治。人治必然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今天有英明的党和领袖，但要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更要建立法制"。"解放以来，各项事业成绩很大，需要以法律条文加以巩固，用上层建筑保障这些基础。"[②] 他还认为，美国的民主是虚伪的，但法治是认真的，美国

① 《文汇报》，1957 年 5 月 14 日。

② 《光明日报》，1957 年 5 月 11 日、6 月 17 日。

的法治精神我们可以吸取。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陈体强说，要保障民主，就一定要遵守法制；既需要有法可据，也需要充分尊重法律[①]。类似的意见非常之多，但对民主、法治问题论述最为全面和精当的，还是杨兆龙先生。他说：

> 社会主义的建设并不是单纯的物质建设。它除包含合乎无产阶级要求的物质建设外，还包含各种为保证或推动这种物质建设的正确发展，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调整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关系以及建立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所必要的非物质建设。这些非物质建设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的法治（有人用“法制”这一名称，与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学者的一般说法不符合，故不采用）和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构成部分，同时也是它的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它的内容。无产阶级的专政，虽然对于阶级敌人不必讲民主，但在人民内部却必须实现真正的民主；至于法治，那就是对于阶级敌人，也是不应该有例外的。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这种有机联系及统一乃是社会主义国家法律和政治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
>
> 在实践中，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和发扬，在许多场合，是非靠法律不可的。它要靠法律的制定，将民主的原则变为具有强制性的行为规范，它要靠法律的执行，将法律中所包含的民主原则贯彻到实践中去。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法治的这一面往往显得更重要。因此有些人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性。这种提法曾经引起一种错觉，以为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多谈法治，少谈民主，甚至可以只谈法治，不谈民主。实

① 《光明日报》，1957年6月10日。

际上这种看法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依照我们上面所说过的，强调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性也必然意味着相应地承认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性；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法治[1]。

人们认为，新中国的法制本来就极不完备，在政治运动中又遭受破坏，情况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许多人以肃反中大量发生的没有证据即批判人、斗争人，不经法定机关批准就随便逮捕人，随便以"监护"、"管制"、"隔离审查"等名义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甚至致人以非正常死亡等现象为例，说明破坏法制、侵犯人权的问题已经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了相当的不安和对党与政府的怀疑。颁布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而对宪法的破坏却最为严重，也最使人不安。著名老报人顾执中先生在社会主义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说：

宪法所规定的条文，有些是有名无实，有些被破坏而没有受到制止。例如宪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实际许多现象却不是这样。第八十九条规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经法院或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而肃反时的行动证明这一条文全被破坏了。第八十七条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事实都没有得到保证。……很少有人执行宪法中所规定的统战政策和民主集中制。大家都把宪法当做一张纸，通过后也就算了。想当年，在讨论宪法草案的时候，大家都愿为保护宪法而斗争，现在从刘委员长到一般公民谁也不提保护宪法了。这样下去，把宪法当成了手纸，乱关人、乱

① 《我国重要法典何以迟迟还不颁布？——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立法问题》，《新闻日报》，1957年5月9日。

捕人、拆信等，都可以为所欲为，将来何堪设想[①]?!

任何一个亲身经历过肃反运动而活到今天的人都会承认，顾执中先生和许多知识分子诉说的肃反运动中破坏法制、侵犯人权的现象，绝非无中生有、蓄意夸张。然而，无论是人民群众分散的意见，还是"资产阶级右派"们的"疯狂进攻"，都没有引起执政党的重视，以致事情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中"无法无天"的地步。当年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宪法的刘少奇，不但无力庇护亿万公民不受迫害，甚至连他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自己也落得一个未经任何法定程序即失去人身自由，死于异地他乡而不为家人所知的悲惨结局。这样的结局，不但1957年的"刘委员长"想不到，即使发出"将来何堪设想"警告的顾执中先生又何敢设想[②]!

为什么法治的重要性得不到认同？为什么宪法和法律得不到尊重和遵守？为什么会持续地、普遍地发生随意破坏法制的现象？人们认为，这与执政党的思想观念有关。刚刚从战争年代过来的革命党，由于历史的习惯传统而重政策轻法律，是妨碍法制建设的主要原因。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教员谢怀式认为，开国以来法律之所以不完备，关键在于思想观念有问题，党内流行着一种以政策代法律的观点，认为有了政策就不需要法律。后来有了宪法，就满足于宪法，用宪法代替一切。有的人以为我们的法律不完备是理所当然的事，没有害处；没有民法、刑法也不足为奇[③]。吴文翰副教

① 《光明日报》，1957年6月9日。

② 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20年，许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已经忘记或在努力忘记那场浩劫。1998年纪念刘少奇诞辰100周年前后，许多人撰文称颂刘少奇的历史功绩，却没有人系统地分析一下新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何以如此，值得深思。

③ 《人民日报》，1957年6月5日。

授认为，有一些领导干部对法律持虚无主义的观点，认为以党代政是当然的，党的命令高于法令，党员个人的言语即是“金科玉律”①。

顺理成章的是，要建设法治国家，要加快和完善法制建设，首先需要执政党思想观念上的根本转变，明确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重视以法治国的必要性。南大前法律系主任赵之远教授说，应当明确，“政法是一个工具，如果不把政法工作搞起来，矛盾就不可能解决。尤其是法律方面，法律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经济服务；法律要明辨是非，解决曲折，有重要的作用。……要法治，就要使大家懂得法；可是现在法治不完备，法学总则、分则都没有公布，判决案件没有标准。……没有法律就没有法治。我们是六亿人口的大国，有许多法院和审判员，但他们不懂得法律如何执行任务”②。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先生说：“必须把一切工作中的法制、规程建立起来。没有法制、规程，光靠什么‘精神掌握’‘个人诚恳’来做工作，都是不可靠的。”“共产党搞法制规章，我们愿摇旗呐喊。”③

以法治国，不但不要以政策治国，也不要以运动治国。鉴于政治运动不断，造成社会的持续动荡和法制的破坏，人们强烈呼吁执政党改变靠政治运动推动社会改革和各方面建设的领导方式，转而以法制、制度实行领导。北师大物理系刘世楷教授指出：

> 运动是救急的手段，不是常法。比如医师动手术开刀，腐肉割掉了，好肉也难免不受伤流血。所以，痛不到一定程度，是不宜轻易动手术的。解放以后几次的运动，如思想改造运

---

① 《人民日报》，1957年5月29日。
②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9日。
③ 《文汇报》，1957年5月14日。

动和肃反运动，把真正的反动分子肃掉了许多，可是好人也有被斗错了的，甚至有冤枉至于死的，我们不能不替那些好人叫屈！又如反细菌战的运动，把全国绝大部分的卫生清洁工作搞到举世惊叹的良好程度，可是一年半年以后，各处又呈现出不清洁的现象了。又如在反贪污反官僚作风的运动以后，近一二年来在报纸上公布的贪污腐化案件并不太少，这许多事情真象一阵风，风头一过就完了。……人民的内部矛盾应当由法律解决，用不着取运动方式的办法①。

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力先生明确反对以运动方式推进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他说："我个人认为，今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不能再作为一种运动来搞。1952 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固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起了不少的副作用。在某些学校里曾经用相当粗暴的方式来对待高级知识分子。当时作为一种运动来搞，与其说是为了改造思想，不如说是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今后没有必要沿袭这种办法。"要在不长的时间内赶上或接近世界科学先进水平，就不能不让大家过一种宁静的生活。诸葛亮说过'非宁静无以致远'。在今天说来，'宁静'就是在高等学校里少搞一些运动。"②

除了政治运动以外，大学和科研机关里面还经常开展其他的一些非政治性的运动。高级知识分子也普遍不赞成这种工作与领导方式。清华大学的反映尤为强烈。该校副教授李欧说，用搞青年运动的方式来搞学校教育，已经成了清华的习惯势力和治校办学的特点，这个特点有三多三少：搞运动多，细致工作少；任务贯彻多，商量少；关心青年多，关心中年以上的人少。学校的运动，总是

① 《师大教学》，第 116 期。

② 《漫谈高等学校里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57 年 6 月 7 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就把经常工作冲乱了。该校电机系教授章名涛先生说："学校学术空气不够，这与党的领导作风有关，过去党习惯于搞运动的作风，习惯于用这一套方法，现在值得考虑。"[①]北师大中文系钟敬文教授认为，党和政府采取搞运动的做法给文教事业带来很大危害。无论创作也好，批评也好，教育的进程也好，都需要长期的深入细致的研究，一阵风主义，非反掉不可[②]。华南工学院副院长罗雄才教授反对用运动方式办高等教育。他说："过去几年无论搞什么都采用运动的方式，而且直到今天，运动之风仍然未减，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大家长期处于动荡不安之中，总没有时间让你静静地坐下来做做学问，考虑考虑问题。……解放快八年了，可是这种动荡不安的局面仍然存在，不知要到哪年哪月才能终止。""去年才说过，以后不搞运动了，但是现在又卷起了风浪。"[③]从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高级知识分子反对搞运动，不仅有建设法治国家的政治要求，而且也反映出希望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以便集中精力专心从事科学教育文化建设的迫切愿望。

如何加强法制建设呢？人们认为，关键是两条，一条是加快立法进程，一条是执政党带头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

法治的前提是有法可依，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第一步。新中国的立法进程极为缓慢，新中国成立 8 年了，仍然没有颁布刑法典、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和民事诉讼法典。有些重要法规的起草工作早在做，但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无法则公民行为无以规范，司法工作无所凭依，相同案件判决不同，量刑幅度畸轻畸重，错判误判在所难免。特别是没有系统的具体法律的保障，宪

① 《人民日报》，1957 年 5 月 15 日。
② 《周扬说批评越尖锐越好》、《文汇报》，1957 年 5 月 26 日。
③ 《光明日报》，1957 年 6 月 1 日。

法无法落到实处。刘世楷教授认为，"只有宪法，并无实施宪法的各种法律，实际上等于无法"。"现在国基巩固，不同于建国之初，应当赶快把保障人民权利、赏罚善恶行为、监察工作人员的法律规章明白规定，颁布实行。""建国快十年了，不特刑法民法还未制定，连都市适用的违警律都付阙如，闹到首都市上出手打人的人，究竟该受如何处罚还无定论，这是太不对的。"杨兆龙教授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法制的特点之一，就是大部分规范必须取成文法的形式，这就使得立法非常重要。现实情况是立法的努力严重落后于社会实际的发展，特别是"平常与人民的基本权利的保障及一般社会关系的调整最有密切关系的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等至今还没有颁布"，"我国法律制度的建设，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变成了最薄弱的"，这样，"无论在刑事或民事方面都难免使坏人感到无所顾忌，好人感到缺乏保障，常常引起不必要的矛盾"，"我们过去只偏重于制定有关于政权机关的组织及一般职权的法规和某些行政法规，而没有及时地兼顾到上述这些法律，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他批评了导致立法工作缓慢的 10 种原因，如认为解放区的一套可以搬用，不必急于立法；中国情况特殊，必须创造经验以为立法根据；认为主张立法或及早系统立法是旧法观点；懂政策，有干部，无法亦可；立法要等社会定型，以求一劳永逸；害怕立法会限制政府手脚；满足于现有立法水平；认为中国缺乏法学家；认为既已拖了几年，不妨再拖几年；等等。杨兆龙教授特别指出，"政府机关那种无明确性的法律限制的办事的'灵活性'有时颇足以破坏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治"。"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对付什么人（那怕是反革命分子）都必须'依法办事'，给坏人以应得的制裁，给好人以应有的保护。""某些重要法律迟出来一天，在六亿人口的中国会使多少人遭受到多么大的

损害。"①

执政党和执政党的党员必须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不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这也是人们一致的观点与要求。民革中央常委谭惕吾说，宪法是党制定的，党制定政策，应当在宪法范围之内。可是有些事情没有遵照宪法办事。她举例说，宪法规定个人生活资料受法律保护，住宅属于生活资料的范围，但由党内制定的上海房改办法却把住宅纳入房改范围，说起来是个人自愿，实际并不如此。宪法是大家包括共产党在内举手通过的，皇皇宪法为什么不遵守呢？解放前不遵守宪法是为了推翻反动政权。共产党今天希望国家长治久安，领导国家，对国家的法律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党的政策不应当同法律冲突；若有，就应当纠正。党应该把政策提到人民代表大会制成法律，再由国家管理机关根据法律制成各种法令，大家都根据法律法令办事，不应该在法律、法令之外发什么内部指示。内部指示代替法律、法令是不可以的②。刘世楷教授说："党员应该守法负责，作为人民的好榜样。"党员犯了法就"检讨"了事的办法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按近几年的习惯说法，'检讨'是一种对于犯了法而有过失的人的处罚。而检讨的方式，大概都是写一个文件（或当众宣读），把过失的原因分析出来，指明这是旧社会封建思想的遗毒，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在作祟，等等。究竟过失的严重程度到了某个下限，才适用检讨，并无明白的规定。如果这个下限由犯罪人的领导人员灵活掌握，那就很难公平了。……我敢断说，人民希望党员和非党员都负责守法，不希望任何人做了坏事只是负责检讨完

① 《我国重要法典何以迟迟还不颁布？——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立法问题》，《新闻日报》，1957年5月9日。

② 《光明日报》，1957年6月6日。《人民日报》、《文汇报》的报道略有出入。

事。"[1]

知识分子不但重视民主、法治,同普通群众相比,他们更重视言论与思想自由,因为他们知道,思想与言论的自由与知识分子共生共存,失去了思想自由与表达思想的言论自由,也就没有了知识分子的存在。知识分子之所以热烈地欢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因为他们把"双百"视为允许有充分的言论自由的象征。陈望道先生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原是党繁荣文艺、振兴科学的方针,因为方针提出的初期多注意于排除放和鸣的障碍,排除清规戒律,逐渐演进,现在已经成为言论自由的同义语。"[2] 沈志远先生在1957年3月12日《争鸣》杂志召开的座谈会上谈到对"放"的理解,其间表达了与陈望道先生同样的见解。他认为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的基本精神就是一个"放"字,"那就是大胆放手和全面开放"。他说:

> 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的矛盾既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时时刻刻在逼迫着我们去应付,去解决,那就应该大胆放手去揭露这些矛盾,而不应该掩盖或回避矛盾,放手去扩大人民的民主生活,放手让不同学派、不同思想、不同意见公开争论。全面开放,就向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开放,向"牛鬼蛇神"开放,向所谓闲花野草开放,向帝国主义的新闻报导开放,向社会内部的阴暗面开放。不但要宣扬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美的一面,宣扬它的优越性,同时也要暴露它的丑的一面。过去,我们的新闻报导上,我们出版的书籍上,往往乐于宣传好的一面,而羞于或怯于公开坏的、不光彩的一面,现在党的宣传方针是要全面开放,要大胆放手让客观存在着的一切形形色色

---

① 《师大教学》,第116期。

② 《略谈文化科学和党群关系》,《文汇报》,1957年5月14日。

的美的、丑的、善的、恶的、好的、坏的、光明的、阴暗的、新的、旧的、进步的、落后的……中间的矛盾都尽量揭露出来,以便大家来正视这些矛盾,进行分析、研究,通过争论,来明辨是非,解决矛盾,从而使人们学会选择。

……"百家争鸣"的主要精神,我以为就是要让社会上客观存在着的矛盾,自由地、如实地、毫无拘束地反映到我们的思想、意识、言论上来,在报纸上、杂志上、著作上、讲台上、舞台和银幕上表现出来。

当然,"放手"和"开放"并不等于提倡开放唯心主义,并不等于提倡唯心主义;开放"牛鬼蛇神"并不等于提倡迷信;开放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学说,并不等于提倡这些思想、观点、学说;开放丑的、恶的,并不等于提倡丑恶。开放的意义,一方面是为了让人民的思想意识受到磨炼,让他们的感觉器官、思维器官能经常接触到广阔、复杂的外界现实,不是象过去那样地让他们长期禁闭在温室花房里,经不起风霜,见不到世面,而要让他们有机会接受各种变化多端的气候的侵袭。有了这种经常的磨炼,人民的思想意识,才会有很强的抵抗力,也就是有正确和敏锐的识别力。开放的另一重大意义就是"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运用。……只有通过百家争鸣(而不是一家独鸣,不是自说自话),让各种不同的观点和理论自由地鸣起来,真正的科学真理才会从实际斗争的考验中获得阐明而被人们所掌握。但这并不是如有些同志所说,"百家争鸣"的目的是让别人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暴露出来,以便我们痛加驳斥,从而壮大马列主义。这种把"百家争鸣"的方针解释成"诱敌深入,包围聚歼"的策略是不很恰当的。因为这样的解释会给人以印象,仿佛马列

主义是一种狡猾的东西，一种不光荣的“权术”①。

保障言论自由，就要以宪法为准绳，言论只要不违反宪法，就可以发表；就要把反动言论与反动行动加以区别，不以言论治罪，不应当有“文字狱”。张申府先生说：“我们的争鸣，一定要根据宪法；根据宪法，我们一定也就可以争鸣，而且可以获得争鸣的机会与条件；再则，不论什么放言高论，只要根据宪法，只要不违背宪法，便也都没有什么不可以。”② 王力先生说：“我甚至怀疑1955年的肃反运动连反动言论都‘肃’在一起是不是妥当。两种不同性质的事情同时去做，容易做出偏差来。如果反革命行为和反动思想应该区别开来的话，把反动言论‘肃’在一起就是把敌我对抗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混为一谈了。在今天的‘鸣’‘放’过程中，反动言论比1955年更多了，将来要不要再‘肃’一次呢？我看是不必要的。”③ 王造时等人坚持同样的观点。“反动言论”该不该治罪，至今仍然是不许公开讨论的问题，历史似乎早已作出了回答。

在“鸣放”运动中，胡风的问题被提了出来。有人公开提出：胡风不是反革命，胡风一案纯属冤案，应予彻底平反。沈阳师范学院宣传部部长张百生等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课题》一文中明确提出：

胡风及“胡风集团”是反革命分子吗？根据前些时候公诸于世的材料看来，说他们是反革命分子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从胡风给党中央写的“万言书”中，丝毫看不出有反革命的味道。他只是就意识形态范围内的文学艺术问题提出了不同的

① 《如何开展学术界的“百家争鸣”问题》，《争鸣》，1957年4月号。

② 《发扬五四的精神：“放”》，《光明日报》，1957年4月27日。

③ 《漫谈高等学校里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57年6月7日。

看法和建议罢了，他的某些看法和建议今天看来还是正确的。对林默涵、何其芳同志的教条主义的批评，这是公民的起码权利，是百花中的一朵，是百家中的一派。至于人民日报揭发的材料和人民日报的按语，表面看来无疑是反革命，其实有些是历史问题，有些是在言论不自由的情况下对教条主义者发出的暗语，怎么能说是反党反人民而兴师问罪、大加围剿、拿入囚牢呢？"偶语者弃市"的做法，仁人志士谁还敢开口！这样只能阻塞言路，助长"三大主义"，葬送革命①。

言论自由要借助一定的物质形式来实现，这就本质地要求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如同言论自由一样，出版自由本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但在1957年以前，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却已被界定为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东西。尽管如此，"鸣放"时期的知识分子还是公开地以宪法为依据，以呼吁调整出版工作指导思想、改革出版管理体制的形式，曲折地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新中国成立初期，报纸是主要的出版物，是新闻的主要传播形式，因而受到格外的关注。人们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报纸只讲思想性、教育性，不讲知识性、趣味性，千篇一律，百家一面，只有旧闻，没有新闻，报社的编辑、记者没有自主权，非常不满，认为这些问题的产生都与如何认识报纸的性质与作用有关。因此，围绕着报纸的党性和群众性、真实性，趣味性与思想性等问题，展开了争论。比较激烈的意见，是批评执政党没有考虑到社会环境的根本变化，继续坚持报纸是党的"宣传工具"的指导原则，因而造成了一系列的偏差。

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教授认为，新闻事业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由于人们对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需要

---

① 《沈阳日报》，1957年6月10日。

产生的，所以不能说报纸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报纸可以为政治服务，但不是政治本身。一切政党的报纸都具有两重性，首先是商品性，其次才是宣传工具。如果读者不愿意花五分钱买一张报纸，就不能实现"工具性"。因此报纸要为读者服务，要有趣味性。他说："党委很容易忽视报纸的特点，或者仍然习惯于抗战时期和阶级斗争时期的做法，对新形势下报纸应起的作用认识不足。报社如按着党委的旧习惯去办报，便会造成报纸脱离群众。党委不仅是对报社要放手，而且要积极领导报社，使党报办成为群众所喜爱的报纸。"[①] 现在有些党委把报纸看做下达自己的命令和意见的工具，忘记了报纸还是人民获得知识和消息的东西。"报纸是为了叫人看的，如果人家觉得没意思，没兴趣，看不进去，那还有什么阶级性呢？"[②]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员莫如俭的观点与王中相同。他认为，报纸一方面应有政治性、思想性，一方面还应有商品性、舒服性。他说，报纸的性质和作用至今没有解决。党委认为报纸是代表党和政府的，所以讲党性，过分强调报纸是教科书，总是自上而下地服从命令。列宁说过"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鼓动者，而且还是集体的组织者"，那是在 1901 年说的，当时阶级斗争很尖锐，那样说是对的。现在再机械地这样执行，就压制了大家的积极性[③]。

除了报纸的性质与作用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以外，更多的人要求报纸要有新闻，要有趣味性、可读性，应当发挥记者的作用。上海文化出版社第一编辑室副主任许君远说："趣味性越强，越能引人入胜；报纸越能大量争取读者，越能发挥指导性的作用。"趣味

① 《上海新闻界的争鸣》，《新闻与出版》，1957 年第 17 号。
② 《人民日报》，1957 年 5 月 17 日。
③ 《人民日报》，1957 年 5 月 17 日。

性与指导性并无矛盾。"解放后报纸只顾说教,忽视趣味,而趣味正是中国报纸的一种优良传统。"[①]《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黎群说,现在的报纸实际上担任了布告牌、留声机、翻版书的角色[②]。民国时期的老报人张友鸾说,报纸要做读者的良友,不要做板起面孔正襟危坐的严师。"资产阶级的新闻学,说报纸应该有益和有趣,我觉得这话还是对的。""今天大大小小的报纸,所有社论,好象都是'社训',只许读者接受、服从,不许读者吭气。我认为这种态度是值得考虑的。"报纸本来就叫"新闻纸","新闻在报纸上应该占有头等地位"[③]。顾执中认为新闻有阶级性,新闻编排没有阶级性。"资产阶级的报纸为什么能够办得生动活泼,社会主义的报纸却做不到呢?"他主张记者要抢消息,"抢消息绝对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张恨水先生说,新闻要快、要新。现在许多新闻开头是"几个月来",这是历史,不是新闻[④]。《新观察》记者黄沙对工作一阵风、记者"顺风跑"、只能根据领导的意图和看法去采访写稿、报喜不报忧等现象提出了批评[⑤]。

除了要求报纸内容的相对开放和自由外,还有人提出了办报自由、报刊不能由党垄断的要求。顾执中在批评中宣部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时说,过去许多与美蒋并无关系的新闻记者,解放后被踢出了新闻界,非党报纸得不到照顾,新闻学校要由党来办,过去私立的新闻学校都停办了,被国民党封闭的通讯社没有让其恢复。他建议:重要的会议应有民主党派参加;新华社应成为塔斯社、路透社那样的国际性新闻通讯社,国内报道可以由人民团体办

---

① 《报纸应当这样办下去吗?》,《文汇报》,1957年5月21日。

②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

③ 《是蜜蜂,不是苍蝇》,《光明日报》,1957年5月28日。

④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

⑤ 《记者是干吗的?》,《新观察》,1957年第11期。

的通讯社担负,与新华社分工合作①。王中认为"新闻事业是以搜集、发布新闻而谋生的事业",因此应允许私人办报。许君远、《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等都赞成同人办报。这实质上都是在争取"新闻自由"。

在书刊出版问题上,不少文艺界人士(如黄药眠等)主张允许办同人刊物,学术界有人主张应允许办同人杂志。实际上,"双百"时期,各地确也办起了几家这样的杂志,如《星星》诗刊、《收获》杂志、《争鸣》月刊、《学术月刊》等。人们认为,同人刊物,可以"让大家比较自由的发言"②。文艺家"自愿结合起来办杂志,和用行政方式办杂志比较起来有很多优越之处。行政是官办的,没有独特的见解和艺术倾向,作者与编辑部是脱节的。同人杂志有自己的主张和艺术倾向。要用杂志形成流派"③。杂志"是学术上进行辩论与'争鸣'的最理想的园地,而同人杂志就格外适合于学术上的自由论辩。道理何在呢?在于同人杂志是一群学术工作者自己办理的民间刊物,它不代表任何方面。发表在这样杂志上的文章,既不代表编辑人的意见,也不受任何的约束,真正的文责自负。换句话说,只要它有独创的见解,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可以发表。而且可以把各种不同见解的文章同时发表,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论辩"④。主张办同人刊物、同人杂志的人,后来大都被划为"右派分子",但是这种主张当时确有影响,如前所述,甚至周扬也赞同过这样的意见。刊物是出版物。办同人刊物与出版自由是同一语。

如何使中国的出版活起来,更好地服务于科学文化的传播与进步?有人主张重要的问题是改革从苏联搬来的出版管理体制,

---

① 《光明日报》,1957年6月3日。

② 黄药眠:《解除文艺批评的百般顾虑》,《文艺报》,1957年第9号。

③ 《文艺报》,1957年第27号。

④ 《学术月刊》,1957年第6期。

核心是打破国营出版社的垄断，引入竞争机制。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曾彦修说，学习苏联中的教条主义错误，吃亏最大的是新闻与教育，出版更严重。“对书的管理，不抓大的，只抓小的”，“专门去控制那些小地方，结果是层层控制，妨碍发展科学，妨碍自由思想。”① 解放后，把中国过去出版工作的经验都抛弃了，搞过生活书店的老同志把老传统包括邹韬奋的好办法都忘记了。“基本上停止了学术著作，而让苏联的小册子泛滥于市场。”他主张：“体制问题不能老限制在现有一套，可以办同人出版社。”“不能因为纸张不够把几十个学报停刊，甚至可以少印马列主义。一些专门性刊物内容是不太丰富，但不应随便砍掉。把出版局砍掉中国不会亡，把这些学报砍掉，中国没有科学，却要亡的。”他不赞成出版社集中管理，主张“有关的出版社各自找自己的‘后台老板’，交各学会、学术机关团体领导”②。通俗出版社副总编辑蓝钰主张：“把国营出版社彻底整顿，同时开放自由市场。”他认为现在“‘统得太死，统而不通’。国营出版社，一切只有‘国家的’。在私营改造时，‘统’是必要的。现在社会上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除掉国营而外，谁也不能搞出版社，如果不开个口子，矛盾始终解决不了，还要发生一些问题，不如让搞一些私营出版社”。“开放同人出版社”，这样，社与社之间竞争，有些在竞争中垮台，也不要紧③。萧乾、胡明、刘宾雁等都认为垄断是妨碍出版事业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新民晚报》总编辑赵超构、巴金等人都主张，出版社不妨多办几家，让它们展开竞争，唱唱对台戏。赵先生主张，出版社可以去掉“人民”二字，办不好就让它关门④。

---

① 文化部出版局：《讨论出版工作参考资料》，1957 年 7 月 8 日。
② 文化部出版局：《讨论出版工作参考资料》，1957 年 7 月 8 日。
③ 文化部出版局：《讨论出版工作参考资料》，1957 年 7 月 8 日。
④ 《文汇报》，1957 年 5 月 3 日。

9.6　话语之五：社会主义的制度、体制与改革

1957年的党内整风，重点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相当多的知识界人士和民主人士认为，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产生，民主、法制、人权的破坏，经济建设与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中的曲折，都与制度与体制中存在的弊端有关；应当通过全面的调整与改革，去除这些弊端。他们对于政治制度的完善、经济体制与科学文化教育管理体制的调整等，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许多看法、观点、思路、建议与20年后执政党的理论与政策基本吻合，充分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智慧。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用制度保证民主化，对此，人们的认识非常明确。例如南京的金鸣盛先生指出："解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总的目标就是要从制度上来扩大人民的民主生活，防止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滋生。""例如学校、机关和企业中，党的领导和行政领导之间的界限问题，民主党派在机关、学校和企业中的作用问题，党员和民主人士合作共事上的填平鸿沟与拆除隔墙问题等，这些问题主要都应该从制度上来求得根本解决。"①1957年的知识分子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政治体制"刻意地加以区分，以杜绝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嫌疑。他们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前提下，涉及的基本上属于政治体制范围内的问题。主要问题是两个：一个是国家政治体制的调整与完善，主要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消除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一个是基层的党政关系，主要是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的领导体制。

实现和保障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法地位，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

① 《光明日报》，1957年5月21日。

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完善国家政治制度的首要问题。这其中的关键是按照宪法的框架确定和解决执政党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些基本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执政党必须尊重人大的崇高地位,不得凌驾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上;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法、党规不得大于宪法,党的政策不能代替宪法与法律,也不能与宪法和法律相冲突;党应该转变直接命令政府的领导方式,转而通过人大实现对政府的领导,即党的政策或建议应通过人大制成法律法令,再由政府转变为行政法规或行政指令,以行政力量保证实施;党不能越过人大和政府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政府由人民代表大会监督,还要制定制度来监督执政党。党与人大、党与宪法法律、党与政府的关系,实质上是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这个问题不解决,人民代表大会就只能是党的附属品,而不能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机关,民主也就是空话。1957年的知识分子不但清醒地认识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而且强烈要求根据上述这样一些基本原则,切实解决党同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其他设置之间的关系。

人们还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能落实,除了党同人大的关系没有解决外,也与人大组织上的缺点有关。人们提出了不少加强人大建设的具体建议,如实行人大代表与政协代表专职化,即人大代表不兼任政协委员,政协委员亦不兼任人大代表;实行人大代表职业化;省市一级的人大设立常务委员会,全国和地方的人大常委会下设若干工作组,吸收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经常参加各项政策及一切问题的讨论,工作组成员不以代表为限,可以着重吸收民主党派人士;执政党应选派一批有知识、有能力、有威望的干部到全国和地方人大常委会工作;改进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制度,人大常委会应对国家的方针政策进行经常的讨论并作出决定;人大开会,各部应该有常务部长出席代表各部说明政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必须按期召开,逾期不开即为违法,应予追究;人民代表的

选举应当真正体现人民的意志，可以实行差额选举或竞选。谭惕吾建议：充实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机构，发挥它的作用，共产党员到这个权力机关中来监督政府，掌握政策；把党内的各部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各种委员会[①]；人大内部可以设党组，吸收非党人士参加工作。她还建议，司法、律师、检察不但要分开，而且不能隶属于同一个党委领导，以便发挥"杠杆作用"。她认为这也是完善国家制度的重要问题。

今天看来，1957年人们提出的落实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原则与具体建议，并无多少不妥之处。改革开放以后，上述基本原则至少在理论上已经为执政党所接受，许多具体建议则被付诸实行。按照上述原则和建议建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结果，必然是使人大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而执政党的政治活动必然转变为以人大为轴心来开展。尽管章伯钧声明"这不是资本主义议会政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也因为缺乏多党竞争等典型特征而不成其为西方式的议会政治，但是，就要求执政党围绕人大开展政治活动来说，其中确实又有"议会政治"的影子。当然，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基本精神并无不合之处。

调整和完善国家政治制度的第二个问题是消除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保持政府系统的完整与独立，加强人民政府的权威。许多人指出，在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系统中，实际上存在着党与政府两个权力系统，党的组织的权力高于政府的权力。在实际政治运作中，上级和同级党的组织可以直接向政府下命令，下级党组织甚至有否定上级政府的政令的；政府的党组和党员向同级和

---

① 这个时期，中共中央仿照苏共中央的办法，在党内设立了同国务院各部对口的一些工作部，如重工业部、轻工业部等，负责领导相应产业部门中党的工作、政治工作和干部工作。谭惕吾说的"党内的各部"，指的即是这些部，而不是党的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等。

上级党的组织负责，而不向行政系统的领导负责；党对政府工作的指示下达到政府中的党员或党组，党外人士读不到党内文件，无法工作。这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体制削弱了人民政府的权威，造成了许多矛盾，必须调整与改革。谭惕吾说，党领导国家，大家承认，但用什么方式领导值得研究。现在政府有一套机构，党内又有一套机构，如政府有工业部，党也有工业部，许多工作指示都是从党内发下去，这是“双轨制度”。原说党是抓思想和政策的，实际上已超越了这个范围，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政府部门却没有权。不但党外人士无权，就是不参加党的工作的党员，也同样有职无权。例如，乡人民委员会形同虚设，一切都听支部书记的；县人民委员会也是这样，县委代替了一切。党的领导站在政府机构之外或者站在政府机构之上。这样怎么能不产生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呢？党中央和国务院要联合发指示，因为党不下命令，行政的命令就行不通。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为什么不利用现有的国家机构，而要在政府以外发号施令来削弱政府的作用[①]？人们提出了许多解决党政关系的具体建议，如明确规定政府机关中党组与行政领导的职权；机关工作应由法定实行集体领导的行政机构作决定，等等。

调整和完善国家政治制度的第三个问题是继续发挥政协和民主党派的作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后政协失去了临时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政治地位下降，新的职能定位也不很清楚，引起一部分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的不满。1956 年下半年民主党派讨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时，这种不满已有所表现。不少人批评共产党对政协重视不够，把政协看成是养活和安顿一部分人的机关；政协缺乏经常性工作，开会时轰轰烈烈，闭会后冷冷清清；除了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外，缺乏开展工作的积极性；有些共产党员

① 《光明日报》，1957 年 6 月 6 日。

在和民主人士协商问题时，对他们尊重不够，缺乏民主作风。有人提出，政协对国家事务起监督作用这一点，应该在政协章程中明文规定。有人提出，在实行互相监督的时候，不应该害怕互相监督会变成"分庭抗礼"[①]。进入1957年，人们继续探讨在新条件下政协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有人建议干脆取消政协，加强人大，但多数人认为政协是一个以党派关系为重的民主机关，有利于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不应当取消。有人建议使政协取得法定地位，让它成为人大之外的第二个民主机关。它不同于苏联的民族院，代表党派、团体，也代表华侨和少数民族，但以党派关系为重点。这实际上是第二院[②]。章伯钧提出"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其本意也是要提高政协的地位[③]。

政协是民主党派活动的主要舞台。强化政协的作用，就是要保持或提高民主党派的政治地位，这是十分明显的。这就需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民主党派的性质。民主党派的高级知识分子实际上也公开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希望不要再把他们看做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不要过分地强调他们的任务是组织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要解决民主党的组织发展问题以便使他们后继有人。黄药眠先生认为，知识分子"现在已经成为劳动者了，所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事实上就是政治民主化；在政治民主化时候，而

---

① 《人民日报》，1956年7月14日。

② 《光明日报》，1957年5月21日。

③ 《人民日报》，1957年5月22日。据吴晗先生在1957年7月初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揭发，章伯钧曾在农工民主党的一次内部谈话中说："我带头，主张中国搞两院制，把政协变成参议院，把人大变成众议院，政协有监督权和不同意权（否决权），人大有选举权和立法权。"近些年来，并未有人对这一"揭发"的可靠性提出怀疑。

有人要把民盟的首要任务放在自我改造,这样长期共存就要落空"[①]。章伯钧、罗隆基曾提议民盟成立政策研究委员会,以便在国家大政方针制定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认为民主党派对国家的方针政策,不但要参加"演出",更要参加"编导",不但要参加"施工",还要参加"设计"。罗隆基提出,要使民主党派有独立、平等、自由的条件[②],有些规章制度就要变一变,让民主党派参加更多的会议,看到更多的文件;重大政策的决定,在共产党内进行讨论的同时,应该让民主党派参加讨论,并由有关方面事先提供情况和资料。他认为这不是个人有职有权的问题,而是使民主党派有名有实、使政治协商名副其实的问题[③]。马哲民、叶笃义等人建议,民盟、民进、农工、九三学社,都是联系各方面知识分子的党派,工作对象交叉,发生"争人"现象,不如统统解散,重新组织一个知识分子的政党[④]。

基层的党政关系或领导体制,讨论最热烈的莫过于大学的党委制问题。中共八大以前,学校的党委负责制并没有明文规定,起初是校务委员会领导,学习苏联后实行一长制,但实际上早已自然地形成了党委负责制。由于连续的政治运动损害了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党派进大学担任领导工作的许多干部并不懂得高等教育,不懂得大学与一般行政机关的区别,对于依靠什么人办教育的问题缺乏正确认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外人士有职无权、教授对

---

① 余肇池等:《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体会》,《争鸣》1957年12月号。

② 充分尊重民主党派在宪法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法律平等的地位,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1956年6月的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的。1958年11月29日,周恩来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重申民主党派在宪法范围内有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性,但加了"六条政治标准以内"的限制,并且不再提法律上的平等地位。

③ 《文汇报》,1957年5月11日。

④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

学校大政方针没有发言权等问题非常严重，学校中党派活动太多，关系复杂，占用了教师们的许多时间。对这些问题，不少高级知识分子都很有看法。在解放思想的宽松气氛中，人们自然对于改变高校领导制度的问题，表示出特别的关心和兴趣。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时，首先提出了改变学校党委制的意见[①]。5月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座谈会，专门讨论清华大学中的党派关系与领导体制。5月10日，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高校领导体制。以后各民主党派都在各高校召开了许多这样的会议。民盟专门成立了由黄药眠先生任召集人的“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工作组。是取消还是保留“党委制”，一时间成为全国各大学最热烈的话题。

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意见大体有三。一是继续坚持党委负责制，但党政要明确分工，同时扩大校务委员会的职权，发挥教授的

---

① 据《民盟中央工作简报》第15期记载：毛泽东当时说：“我建议，首先撤销学校的党委制，不要由共产党包办。请邓小平约集民盟、九三学社等方面的负责人谈谈如何治校的问题。”反右运动开始后，说章伯钧的这个传达歪曲了毛泽东的讲话。民盟“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工作组参加人员之一的陶大镛先生1957年6月20日在民盟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上揭发章伯钧时说，他后来找来了一份毛泽东讲话的“最可靠的原始记录”，上面的记载是：毛主席说，“党章有一条规定，工厂、农村、部队、学校要实行党委制，现在看来，学校党委制恐怕不合适，要改一下。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或教授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有什么办法和意见，都到那里去讲，人家赞成的就做，不赞成的就不做。这个问题，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等开会座谈，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当时，陶先生正因为根据民盟指示积极组织关于高校党委制的讨论而受到激烈的批判，所以他在检讨中说这一段话与章伯钧的传达相去甚远，并用“偷天换日”、“何等丑恶的歪曲”、“何等卑鄙的伪造”、“何等阴毒的手法”等语言批判章伯钧。其实，这两份记录在关键点上完全一致，并无矛盾。因此，撤销党委制，实行教授治校或民主办校的主张，实出于毛泽东。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因发表“教授治校”或“民主办校”的言论而被打成“右派分子”，这一事件对知识分子的心理影响、对党的政治形象的损害，实不下于“引蛇出洞”的策略。

作用，党委要有民主作风；同时改变校内党的领导体制，只在校一级坚持党委制，系、所、教研室一级不实行党的支部领导或清一色的党员领导，更不实行党员秘书“专政”。第二种意见是实行“教授治校”，即由全校的教授、副教授组成教授会，教授会推选评议会，由评议会决定学校的重大问题，使教授会成为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第三种意见是“民主办校”。至于“民主办校”的组织形式，有人提出以校务委员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校长为执行人；校务委员会以教授为主，党委和民主党派负责人经过选举进人校务委员会发挥作用。有人主张建立两个平行系统：行政会议处理行政工作，学术委员会处理教学和科研工作，总的用意仍然是教授有权决定科学与科研工作。有人说“这是罗蒙诺索夫时代的民主传统”[①]。这三种意见实质上是两种，因为所谓“民主办校”也就是教授治校、内行当家。也有相当多的人不赞成改变党委制，如马寅初、陶孟和、楼彦邦等一些北大、清华出身的著名教授，以其亲身体会，明确反对实行“教授治校”或“民主办校”。但是，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民主办校”的主张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赞同。民盟中央“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工作组综合各方面意见起草的《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就是一个反映。

应当注意的是，主张“教授治校”或“民主办校”并不等于反对党的领导。相反，许多人在提出和论证这些建议的同时，强调党仍然要发挥领导作用，不过领导方式、方法、作风需要改变。农工党江苏筹委会主任邓昊明先生说：“党的领导最主要的首先是体现在路线上，其次是体现在方针政策上。一定要在一个高等院校放上一个党员校院长，才意味着体现党的领导，不一定对头。”[②] 朱启贤先生后来被批判为反对党的领导的头面人物之一，然而，他在极

① 毛礼瑞语，《师大教学》，第120期。

② 《光明日报》，1957年5月21日。

力主张“民主办校”的同时，仍然肯定“党是总领导，领导方针政策思想”①。清华大学教授、民盟中央常委叶笃义先生被认为是公开主张共产党退出学校的“右派分子”之一。1957年5月8日的《光明日报》在关于前一天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清华大学党派关系座谈会的报道中说：

> 叶笃义在会上谈了两点意见……他认为在学校中，不需要有党派的组织活动。他十分赞成改变高等学校的党委负责制。他说，过去党委会管得太多，如果说党与非党之间有一堵墙，墙的来源，主观上有些关系未处好是一个原因，但是不是因为有了党的组织，无形中就形成了一堵墙呢？他认为一个人多一种关系，多一种身份，就多一个矛盾，如校长就是校长，教授就是教授，两人之间的关系就简单些，如加上一种党派关系，关系就复杂些了。我们如果不以党派成员身份出现，关系就简单些，矛盾就少了。叶笃义的这一意见，是包括主张共产党员在学校中也不以党员身份进行活动。他说，党派要常开会，起码对六分之五的时间的保证就有影响。问题是在高等学校中搞这些组织，是起了推动教学的作用呢？还是抵消了教学的作用？七八年来，民主党派组织生活都过得不好，这一问题长期不得解决。除了主观原因之外，客观上，每半个月或一个月开个会过组织生活，对知识分子有无必要？他对于民主党派学共产党的组织生活那一套，是不是正确的方向，表示怀疑。他对于民盟组织在大学中的活动，究竟对学校有帮助呢，还是添了麻烦，也表示怀疑。

叶先生是不是反对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呢？他在6月8日

① 《师大教学》，第115期。

《光明日报》发表的谈话中说：

> 我在清华大学讲的话引起了误会。……我讲的不是各党派退出学校，以后不再发展了，而是怀疑到党和民主党派在学校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也就是党如何进行领导的问题。……党的领导应该起舵手的作用，主要是进行方针政策的领导，确定方针政策，交其他单位执行就行了。如要学校培养符合规格的人才，党和民主党派谁去执行都可以。因此，党领导国家，在中央主要把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搞好，在省、市主要把省、市代表大会和省、市人民委员会搞好。在机关和学校，党派不要成立组织，但可以发展党员。现在大家提出要拆墙填沟。由于学校多一层关系，多增加一层矛盾，如果学校无党派关系，只有教师之间的关系，关系简单些，矛盾也就少了。

叶先生的意见，在今天看来，也显得过分简单，甚至有些难圆其说。但是，他并无反对党的领导之意，是肯定的。党如何领导国家以至高等学校，是强调方针政策领导还是同时加之以严密的组织领导，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党内也没有取得统一的认识。1980年年初，邓小平重提学校中实现党的领导的组织形式问题。80年代中期，一部分高校试行校长负责制，党委只起政治思想上的监督保证作用，近几年又回复到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说明，高校是否实行党委制，与是否承认与坚持党的领导，并无直接的联系。

科学工作体制是科研单位知识分子讨论的热点之一。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性质不同的方面，一个是从全国科研力量在科研单位、高等学校、产业部门之间的配置、划分、组织、协调问题，一个是党能不能领导科学、如何领导科学。前一个问题讨论得多，争论激烈；后一个问题涉及得相对较少，却有更直接的政治意义。

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是远在“鸣放”甚至“双百”方针提出以前就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至少与思想改造运动以后科学与学术问题上发生的“左”的偏差有关。科研单位并未实行党委制。人们不满意的主要是党和党的组织对具体的科学、学术问题的行政干预。所以，在1957年上半年，比较集中的呼声是希望党对自然科学实行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不要具体干预；科研机关应由专家领导，不应由行政干部领导。如学部委员、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黄鸣龙，生理生化研究所研究员邹承鲁等极力主张科学院不能“以长为尊”，要以研究员为主体，由真正的科学家治院。中国药学会理事长薛愚教授说：党是能够领导科学的，但党能够领导科学不等于党员都能够领导科学。党外的科学家学好了马克思主义，做好了科学工作，也应理解为党领导好了科学。过去干预多了，效果是不好的[①]。化工冶金研究所研究员杨纪珂、冶金学家叶渚沛主张，科学机构中要实行“无为而治”，“党只要给科学家定出一条总路线，文章和细节尽可以让科学家自己去写”[②]。武兆发教授认为，“党领导自然科学，应当体现在政策和支持方面，而不是在科学的具体问题上。……自然科学理论领域中的具体问题，那应当让科学家自己从实验室去得出结论，党不要去干预他们。科学上的是非，他们是能够判断的。……为什么不可以放心让科学家去决定一些研究方面的问题，不论他是属于何种学派，采取的是什么样的研究途径”[③]。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邢其毅认为，应该把制定科学发展的大政方针和对科学工作的实际领导分别对待。根据经济建设的需要，确定科学发展方向，只能由党和国家来做，而科学研究的具体范围和方法途径，要由科学技术人员去做。不

① 叶冈：《党与自然科学》，《文汇报》，1957年5月12日。

② 叶冈：《科学、政治、自由》，《文汇报》，1957年6月4日。

③ 叶冈：《党与自然科学》，《文汇报》，1957年5月12日。

管执行具体任务的人是不是党员，他只要遵照既定的方针，在党的领导下工作，根本不存在党能不能领导科学的问题[1]。

上述国家体制与党对高校、科研单位的领导等，都属于政治体制的范畴。这些是1957年上半年特别是“鸣放”时期知识分子关注的热点。在这同时，还有少数知识分子从更宏观的角度审视除政治体制以外的国家建设各领域的管理体制问题，对后人同样很有启发意义。

应当首先提到的是沈志远先生。他当时多次发表谈话，指出党和政府管得太多太死，权力过分集中，是窒息社会生机，扼杀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使党和政府产生官僚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属于制度性质的重大原因”。他在1957年5月16日的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说：

> 我常想请画家画一张漫画，是画一个满头大汗、寸步难行的人，这个人的两手提着大皮箱，两腋下夹着笨重的行李包，头上顶着一个装满了东西的筐子，牙齿咬住了一个大公事包，腰上又缠了一串串的零星杂物，背上还要背上一个大铺盖卷，甚至连下巴底下都夹满了七零八碎的东西。试问这样一个人还能行动自如主动办事吗？显然是很困难的。社会主义是需要计划管理的，但过多的计划管理，就会损害自由，妨碍积极因素的发挥。社会主义是要求集中化的，但过多过死过紧的集中，就会损害灵活主动，同样会妨碍群众积极性的发挥。而今天我们各部门的管理制度恰恰不足以鼓励群众的积极性，在某种程度上倒反而把可能调动的积极因素变为消极因素了。由于管得过多过死，一切都要国营，一切都要管起来，包下来，把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都管光了，包完了，于是出现了

① 《划清范围，加强领导》，《人民日报》，1957年4月25日。

一系列反常的现象：好些演员长期没有戏演了，好些教员整年没有书教了，好些名医常年不看病了，好些著作无处出版，只好藏之名山了，好些学术工作者无法从事研究工作了。在我们这个文化落后、知识分子异常缺乏的国家而出现这样一些现象，这岂不是糟得很吗[①]？

沈先生举例说，教育界一方面感到高级知识分子缺乏，一方面经常有大批教员不开课，有些人则用非所学，人才的闲置与浪费非常严重，原因就是"包得太多，管得太死"。他主张逐步取消"包下来"的制度，开放人才"自由市场"，使之成为国家统一调配制度的补充。文化界矛盾最为突出的剧团，应当"用自力更生、按劳取酬的办法去自由经营"。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问题，"也与过分集中有关"，"没有力量管而硬要管，造成只此一家，一家独鸣"的局面。出版界的问题在于"一家独鸣"的专业化出版制度，这是一种垄断，"垄断、独鸣就是排斥矛盾、掩盖矛盾、取消竞赛、保护懒汉、奖励不上进、阻碍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它会使思想僵化、企业衙门化、出版事业的生命枯萎下去。……所以今后出版事业应当向社会开放，允许志同道合的人开办象同人出版社、同人杂志社、书刊出版发行合作社之类的机构，政府只要掌握一些大的方针政策措施，负起督促检查之责，其他事情还是少管为好，何况你事实上要管也管不了那么多呢"。医务界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他认为，在管理制度方面，需要党解决的迫切问题是"如何正确地使计划管理与自由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这些观点表明，沈志远先生实际上提出了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苏联式管理体制进行全面改革的思想。

张奚若先生对过分集中的体制与潜伏于其中的思想倾向也提

① 《解放日报》，1957年5月17日。

出了严厉批评。他在5月15日下午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批评党内有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未来的错误倾向。他说,好大喜功有两方面,其中一方面是"组织之大,就是庞大"。"很多人把庞大叫做伟大。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等于集体主义,集体主义等于集中,集中等于大,大等于不要小的。由于有这个基本思想,所以工商业组织要大,文化艺术组织要大,生活娱乐组织形式也要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本来这些工商业和社会组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但现在这个办法不管人民的实际需要,好象人民为他们服务。"[①] 张奚若先生对"大"的批评,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应视为对高度集中的社会管理体制的总体性批评。

在经济体制方面,比较有创见的观点是北京大学经济系陈振汉教授的分析。他说:"虽不能说社会主义制度滋长官僚主义,但总觉得它是与官僚主义有密切关系。""我们日常经济中的官僚主义简直触目皆是。原因有下述几个:1. 动力问题:资本主义下有追求利润的动机,我们只靠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觉悟。2. 规模问题:重叠复杂,环节多。3. 我们的企业都处于垄断地位。4. 客观规律不容易认识,从而经济运动成为没有把握的试试看。资本主义下,试试看,有好处。无数小的偏差的抵消作用。我们试试看,就会造成全国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严重的,到极端就是匈牙利情形。"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里有竞争,可以使无数小的偏差得到平衡,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价格市场作生产和分配的自然调节依据",因此经济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可能比资本主义更严重[②]。反右派运动中,抓住陈先生的第一句话大加批判。其实,这时人们所说

---

①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6日。

② 杨培新:《批判陈振汉污蔑社会主义"与官僚主义有密切联系"的谬论》,《新建设》,1957年11月号。

的“制度”,大多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体制”。陈先生这里说的“社会主义制度”,明显地指的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应当说,他对于我国经济体制的弊端是有比较深刻的认识的。

改革高度集中的文艺领导体制,则是文艺工作者特别是作家们的强烈呼声。人们对过分集中的电影管理体制、戏剧管理体制、文化管理体制,对于创作的行政领导方式,对于作协的“衙门化”等,提出了广泛的批评,要求恢复左联时期的传统,加强政治与思想领导,放松行政控制,给文艺工作者以自由和自主权。在这一方面的呼声中,最为激烈也最为深刻的,是吴祖光先生对于“组织制度”的批评。

吴祖光说:“解放以后的新社会产生了新的生活习惯,这种新的生活习惯形成了新的制度,我感到这种制度可以叫做组织制度。……组织,在革命的事业中发挥了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巨大的力量……但是就文学艺术的角度看来,我以为组织力量的空前庞大使个人力量相对地减小了。”“身为革命干部,或是‘干部’以外的任何工作者都以依靠组织为荣。事实上很久以来也几乎没有一个文艺工作者是没有组织的,谁也不敢做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人。‘组织照顾’也的确达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做一个国家干部,即使是看一场电影,也有组织万分体贴地代为买票。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我们只要事事‘依靠组织’,便有了不虞匮乏之自由,成为不劳而食的人。”过去文艺工作者不劳动就不能生活下去,“为了生活”的动机也能把作家的创作力大大调动起来。“我们今天的生活制度由于组织一切包干的结果,竟使不劳而食成为合理合法的事情,因为恰巧有许多辛勤劳动出来的作品反而受到了无情棍棒乱敲乱打,于是索性不写不做反而落得平安无事。”组织力量空前庞大的另一个表现是“人人皆知、人人不敢反对”的“服从组织分配”,但“万能的组织分配的结果,却是什么样颠倒因果、乱点鸳鸯的事情都做得出来”。组织即是领导,领导既是政治领导、思想领

导,亦是行政领导、艺术领导。行政领导不但成为万能,而且权限无限扩展,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接踵而来。组织是有等级的。文艺若区分为等级的,中央、北京以外永远出不了好作品,文艺界却恰恰形成了这样的风气①。

吴祖光对于"组织制度"的批评,从文艺工作的角度立言,其思想实质却与沈志远反对党和政府管得过多过死过紧、反对一切都包下来的观点完全相通,因而对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有着同样的意义。

9.7 反右运动:"旧知识分子"群体的毁灭

开始于1957年6月8日的反右派运动,是针对知识分子的空前暴烈的政治运动。《人民日报》一篇《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打懵了昨天还在热烈响应执政党号召"大鸣大放"的教授和学生。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一个郑重的执政党,一个受到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领袖,怎么会用"引蛇出洞"这样不讲政治信用的手法陷善良、诚实的知识分子于"不义"! 然而,这却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检讨、认罪以获得"人民"的宽恕,是"右派分子"的惟一出路。所有的知识分子,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转瞬间全都成了"变脸"绝技的传人。7月初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变成了一次批判大会。郭沫若、李达、吴晗等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纷纷上台作激烈的批判发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头面人物纷纷检讨。章伯钧的检讨是《向人民低头认罪》,罗隆基的检讨是《我的初步交代》,费孝通的检讨是《向人民伏罪》,储安平的检讨是《向人民投降》,黄药眠的检讨是《我的检讨》,潘大逵的检讨是《我承认错误》,马哲民的检讨是《我要重新做人》,叶笃义的检讨是《揭露罗隆

① 《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戏剧报》,1957年第11期。

基的本来面貌，并检讨我自己的错误》，谭惕吾的检讨是《我为什么犯了严重的错误》，宋云彬的检讨是《我辜负了人民给我的信任和荣誉》……全国人大会议如此，地方人大会议如此，民主党派的会议也如此。全国所有的报刊杂志立时成为检讨与声讨文章的海洋。所有的高等学校、科研单位、文艺团体、文化教育机关等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又一次成为大批判的战场。大会上，小会上，“右派分子”们为自保自救而互相揭发，不顾起码的信义、友谊、道德与体面。青年学生再一次成为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主力军。党的组织按照“指标”划定哪些人是戴帽的“极右分子”，哪些人是“控制使用”的“中右分子”，哪些人要给予纪律处分。为了完成划“右派”的指标，“右派分子”的标准定到了荒唐的程度[①]。阶级斗争的紧张气氛弥漫全国。“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追随他们的青年学生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和1958年的反右派补课运动，总共划了多少“右派分子”，至今没有确切的数字。我们只知道，到1980年为止，全国共有552877名“右派分子”得到改正，这个数字几乎占当时全国有大学文化水平的人的1/4！知识界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界和文艺界的精英分子几乎被一网打尽。“右派分子”中的许多人被开除公职，下放农村，流放边疆，劳改劳教；许多人在批判、流放、劳改、劳教中悲惨地死去；家庭、亲友受到牵连，祸及千万无辜之人。即使那些受到“关照”留在本单位接受“改造”的人，也成为“黑五类”之一，失去了正常生活和从事专业工作的条件。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集团，几乎全军覆没。

1957年的知识分子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这支队伍中的

---

① 我的一位小学老师，当时还是不满20岁的中师学生，仅仅因为说了一句“小麦1毛钱一斤，饼干4毛钱一斤，这不是工人剥削农民？”就被划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我们这些无知的学生的斗争。

多数人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他们中的核心人物大都在西方受过教育，其世界观与共产党人确有差距，但是，他们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华民族，渴望对国家和民族有所贡献，这是无可否认的。他们批评执政党的缺点错误，是响应党的号召，出于帮助党整风的至诚愿望。有些人的言辞尖锐、尖刻甚至“过激”，多出于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中发生的偏差的刺激，其本意也决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反右派运动是对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群体的致命打击。这只是问题的一面。从另一面来看，从“双百”到“鸣放”，知识分子却也成就了一场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基本内容、在精神上与五四相通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场夭折了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知识分子们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对如何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有民主、有法治、有自由、有平等、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领域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型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创造性的思考和探索，使自己当之无愧地成为 20 年后终于在中国大地上掀起的改革开放事业的思想先驱。这个集团的覆亡，结束了一个政治时代与文化时代；它在覆亡前的最后一搏，却留下了新时代的预言，播下了新时代的种子。因此，它的毁灭是光荣而又有几分悲壮的。

知识分子集团的存在，主要是精神意义上的存在，它是要通过具有鲜明个性特征和独特价值的精神活动与表现这种精神活动之内容的公开言论来实现的。反右派运动以后，无论是“右派分子”，还是揭发、批判、声讨“右派分子”的“左”派人士，都毫无例外地陷入了完全的、长期的沉默[①]。沉默是一种无奈、一种抗议，也是一

---

① 1962 年 4 月 9 日，毛泽东在第十八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右派猖狂进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办呀？但是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徐铸成先生说：“从那次‘阳谋’后，知识分子从此闭口不言，真是万马齐喑了……”见《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 1998 年 4 月版，第 416 页。

种生存方式。但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沉默如果不能成为发言前的思考,则是死亡与不存在的同一语。历史没有再给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群体以集团性发言和复活的机会。“文化大革命”的又一次摧残,岁月的无情,铸就了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待到春回大地之时,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如未谢世,亦垂垂老矣!那些有幸熬到“改正”的人们,能够保持思想之树常青的,又有几人?有些人在历经磨难与“改造”以后,“大彻大悟”,不但失去了可贵的“书生意气”,甚至变成了宁“左”勿右的人。有些人重新受到推崇,但推崇的多是他们1949年以前的历史;有些人重新站到了重要的学术或学术领导岗位,却难再有新的建树。胡风熬到了平反,并坚守着他的信念;冯友兰回归自我,晚节善终;费孝通迎来了“第二个春天”,他的社会学研究大放光彩……然而,这些老一辈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已经不再成其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他们在知识界文化界的地位迅速地为青年一代所取代。

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集团的毁灭,是一个社会精英集团的悲剧,更是一个民族的悲剧。反右派运动后,中国进入了长达20年的文化“荒漠化”时期。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在社会后果方面,造成了我国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与经济建设的长期落后;在政治影响方面,造成了知识分子同执政党之间日益扩大的裂痕,成为改革开放时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产生与泛滥的重要历史根据。历史的逻辑毫不留情。凡对这场历史悲剧的铸成负有责任的社会力量,无论是民族、国家、党派、群体甚至个人,都已经或还将继续付出代价。

第十章 历史的思考

从忏悔到沉默:知识分子群体毁灭的轨迹——思想改造:非知识分子化的知识分子政策——革命中国:一个不适合"旧知识分子"生存的社会环境——自我审视:知识分子群体毁灭的主观原因——回归五四: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灵魂与生命

10.1 从忏悔到沉默:知识分子群体毁灭的轨迹

1949年至1957年间知识分子集团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清楚地反映出这些政治运动对他们的政治思想、政治情感、学术思想、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群体文化、群体道德、群体精神、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各个方面逐步强化的影响。这些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改造",构成了这个群体一步步走向毁灭的链条。在对这个链条的各个环节作过考察与描述之后,我们来作一个简要的回顾与总结。

中国的近代知识分子,是一个在五四精神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和现代意识的进步群体。解放战争后期,以欧美留学生为主体、以自由主义为主要价值取向的中上层知识分子之所以投向共产党,决定性的因素是爱国精神。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对共产党知之不多,甚至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一无所知。但是,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开创了建设现代化强

国的光明前景，也就赢得了他们的拥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的迅速变化，共产党治理国家的能力与政绩，共产党干部的廉洁作风，使知识分子更加钦佩与信任共产党，并进而相信马克思主义科学与正确，一部分先进分子产生了了解、学习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要求。但是，在革命胜利之初的思想与社会震荡中，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无法对本集团的性质与历史作出客观的全面的自我评价。一部分人认为自己长期置身于革命之外、对新中国的建立毫无贡献而产生了愧疚感、原罪感。这种在执政党有意识引导下产生的不断扩展着的自我意识，成为知识分子群体否定自我、接受改造的思想与心理基础。

1949年至1950年间的政治学习运动，既是知识分子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政策、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开端，也是这个社会群体进行初步的历史总结与政治思想清理的起点。这一时期，知识分子检讨的问题集中在政治的层面。许多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右派知识分子通过这个运动，开始从理论的高度认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检查和否定了自己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历史。政治学习运动的思想总结阶段发生过"左"的偏差，但是，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在政治思想上融入新社会的过程，基本上是一个自觉和自愿的过程。通过亲身参加土地改革运动，知识分子增进了对中国农村的了解，促进了思想感情的变化，对共产党、新社会和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又前进了一步。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认同共产党，有些人并认识到学术思想要改造，但多数人并没有完全做好放弃原有的学术思想、教育思想、文艺思想以及其他专业思想的精神准备。朱光潜同蔡仪、黄药眠的争论，上海文艺界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讨论，阿垅对于"艺术即政治"的观点的阐述与坚持，有欧美留学背景的高级知识分子对转换高等教育模式的抵制，表明知识分子集团仍然在政治以外的专业领域本能地或习惯地保持着独立

的意识。

批判《武训传》的运动，是用政治批判方式促使知识分子进一步认同现实政治的努力。在这个使文化教育界的知识分子第一次受到巨大震撼的批判运动中，知识分子接收到的信息是：对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的解释必须严格遵循执政党的理论与口径。运动方式的粗暴，使知识分子感受到了新体制为建立大一统意识形态而有意营造的政治与社会压力。对陶行知、陈鹤琴及其教育思想与实践的批判，否定了旧中国的一切教育思想、教育事业和教育工作者，摧毁了知识分子的职业自豪感和自信心。这是从心理上对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的一次致命打击。这一时期，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检讨和忏悔是真诚的。但是，由于难以抗拒的政治与社会压力，知识分子的自我检讨开始出现言不由衷的现象。李士钊、楚图南、方兴严等人为陶行知先生所作的辩护，一些教育工作者反对全盘否定旧中国的教育思想、教育事业和教育工作者的言论，表明知识分子集团仍在努力捍卫本集团的历史与形象，仍未丧失独立思考与发表独立见解的勇气。

思想改造运动把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从政治的层面推进到思想的层面。群众批判、"洗澡"过关的运动方式，使知识分子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更多的知识分子开始诚恳地、全面地检讨自己的思想，表示抛弃"旧我"，接受马克思主义。但是，这场运动不但更加彻底地否定了旧中国的一切进步的文学、艺术、教育、科学事业，严重地损毁了知识分子的公众形象，伤害了知识分子的自尊心，也损害了知识分子对执政党的感情，面导致了反科学、反知识、反知识分子的社会思潮的泛滥，破坏了知识分子正常工作和发展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的社会环境。经过这场运动，知识分子群体失去了一切历史的和现实的"资本"，沦为一无所有的"精神贫民"；因为受到群众暴力的威胁，一部分人产生了"犬儒主义"的倾向。违心之论成为知识分子检讨过关中的普遍现象，真诚的忏悔开始向着毫无

实事求是之心的自贬自辱式的“认罪”演变。此后，对院系调整、学习苏联、文艺批评中发生的教条主义偏差，没有人敢于公开提出异议；在“自然科学有阶级性”观点的影响下，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的科学研究工作陷入了政治的迷雾，这说明，借助群众暴力推行的思想专制开始扼杀知识分子群体独立思考的精神与勇气。

对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思想的批判，是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从思想层面进入学术层面的重大步骤。在这场运动中，许多学术带头人被当做“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受到批判，五四以后30年间发展起来的新学术遭到形而上学的全盘否定，确立了用一种思想、一种理论指导与衡量一切学术研究的学术——政治规范。确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在运动中增进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学术研究；也确有少数著名学者抛弃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学术体系、学术成就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大部分“旧学者”在运动中的态度是消极的。学术领域的这种重大变故，既有力地推进了新的意识形态的建立、扩张与巩固，也使得新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逐步变成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乃至革命导师的只言片语的阐释与演绎，使得学术研究和学术工作者失去了独立的任务、地位与价值。

清算胡风及其文艺思想，有着与清算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相同的政治含义与目的，即摧毁民主革命时期进步知识分子的偶像，树立毛泽东和毛泽东的思想的绝对权威，其中贯穿着方式单一，手段粗暴。罗织罪名，把胡风打成“反革命集团”，则是对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与自由言论的强力压制。胡风事件引发的肃反运动，大量地把学术上的不同见解、工作中的不同意见乃至日常生活中的言谈当做反革命言论对待，混淆了两类矛盾，破坏了法制，打击了更多的知识分子。胡风事件和肃反运动，是使用有组织的国家暴力解决意识形态领域中问题，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与实践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了统治地位的标志。它一方面对于知识分子群

体的精神造成了严重损害,另一方面,又因其过分暴烈而引发和强化了知识分子中间对于思想改造的反感与抵触情绪。运动过后,知识分子对于政治活动、社会活动、专业研究、人际交往的态度极为消极。这种群体性的消极反抗,使得文学艺术更加萧条冷落,科学与教育受到严重影响。

1956年年初,执政党开始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双百"方针的提出,1957年年初毛泽东鼓励"百家争鸣"的一系列讲话,减轻和消除了部分知识分子说话的顾虑。在日趋宽松的国内外环境中,知识分子群体逐步恢复了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问题的活力。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6月初,知识界对新中国成立后肆虐于意识形态领域、阻碍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教条主义发起了猛烈攻击,并在"大鸣大放"阶段对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偏差和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各领域发生的缺点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系统地提出了改革与健全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管理体制、教育体制,根本调整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要求。执政党不能接受这一现实,使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对待知识分子。反右派运动不但把50多万知识精英排除于正常的社会生活之外,更由于大规模使用暴力和政治信义的丧失,使整个知识界从此陷入长期的沉默。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群体终于在长期的沉默和岁月的流失中归于毁灭。

新中国成立初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运动,都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斗争对象,以推进知识分子的全面改造并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绝对领导地位为目的。这些运动的特点,一个是内容与要求逐步推进:从政治层面(政治学习运动、批判《武训传》运动)进入思想层面(思想改造运动),再进入学术层面(批判《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思想的运动),在这些努力失败后重新返回到政治层面(反右派运动);一个是暴力强制成分的逐步加大:从完全自愿(如政治学习运动),到掺杂思想强制(如批判《武训传》运动),再到借助群众暴力

(思想改造运动),最后到完全凭借有组织的国家暴力(如胡风事件、肃反运动和反右派运动)。对旧中国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形而上学的否定,使知识分子失去了自豪、自信与自立的"资本";把文化教育学术研究变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阐释之学、宣传手段的企图,则否定了知识分子的独立职能与价值。这就从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取消了知识分子群体存在的客观基础。

在这样的政治与思想斗争旋涡中,知识分子内心的矛盾冲突日益加剧。一方面,新社会确实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政治清明的社会,共产党确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知识分子不会反对这样的社会,不能同创建和领导这个社会的政治力量对立,因而长期保持着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忠诚;另一方面,他们又难以认同执政党的科学文化教育工作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革命胜利之初曾经真诚地认为自己的思想确实需要改造,但一个接一个的日趋激烈的思想改造运动,却激起了他们的反感和反抗。然而,"反感"被当做"资产阶级思想"的顽强表现,"反抗"则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招来残酷的斗争与打击。知识分子既然认可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同时又无力反抗以暴力为后盾的强制性的思想改造,惟一的选择就是放弃自我,消极地承受以消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目的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后果。

10.2 思想改造:非知识分子化的知识分子政策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间,执政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团结、教育、改造",核心是改造。如果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应当承认,即使从全局来说"左"的错误尚处在萌芽时期的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项政策也不是成功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1949年至1957年间,我国的社会改造、经济建设、对外斗争取得

了巨大的成就，而科学发展却受到严重干扰，整体水平没有提高；文学艺术长期萧条，其繁荣程度与创作水平远不及三四十年代的进步文艺和根据地的革命文艺；教育事业有量的扩张，没有质的提高；除"双百"方针提出后的一个短时期外，知识界长期处于政治运动造成的动荡之中，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造性没有得到发挥。意识形态领域的这种状况，与那个伟大的时代极不相称。反右派运动后毛泽东的多次讲话，实际上已经承认了知识分子改造政策的失败。导致如此结局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政策本来就是难以成立的。

对知识分子实行思想改造的前提，是把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定性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因而才产生了对他们进行"改造"的必要性。这种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定，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发生，同马克思、列宁理论的某些缺陷有关，也同中国共产党没有注意旧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影响、没有自觉实行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等多种因素有关。

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革命理论。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包括其他社会关系），目的不但是要从"经济的事实"中发现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而且是为了找到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理想社会的革命力量。通过严密的理论分析，马克思认定工人阶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者，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被剥削阶级，是旧社会的埋葬者与新社会的建设者，这些基本结论是正确的。但是，马克思的理论存在重大缺陷。

(1)这个革命理论既然以实现一定的社会伦理目标为己任，也就不可能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充分注意和详细考察科学技术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从自然经济进入商品经济，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正是决定性的因素。不能充分注意科学技术的作用，也就必然要忽视知识分子在物质生产乃至社会发展过程中日益突出的作用。

(2)在依靠改进技术增加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情况下,科学技术和科学技术人员已经成为发展生产、增加利润的最主要的生产要素;资本家剥削的对象,已经主要不是生产工人,而是科学技术工作者,因为正是科学技术和科学技术人员在不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的前提下,为资本家提供了更多的利润。但是,马克思在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没有对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作出客观的评价。

(3)马克思承认技术人员参与剩余价值生产过程,受到资本家的剥削,但是,他从生产组织的角度观察问题,认为技术人员一般处于管理者的地位,也就是处于同工人对立的地位,是为资本家服务的,这就否定了技术人员的"知识工人"的性质与地位,为后人把知识分子置于依附资产阶级而同"体力工人"相对立的地位,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

(4)由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限制,马克思把管理看做资本的职能,没有充分评价管理在大工业生产中的独立作用,因此也就必然导致对于从事管理工作和管理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为管理和管理科学提供必需的智力与科学文化支援的知识分子的作用。

列宁的理论,是一种更加具有实践性品格的革命理论。俄国资本主义生产的低下、科学技术的落后、知识阶层赖以生长并为之服务的封建经济与贵族政治,使列宁更不可能对科学技术与知识分子的进步作用作出科学评价。俄国没有强大的工业经济与工人阶级,特殊的国际环境与国内矛盾又造成了革命的形势,大批并未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小知识分子拥人党的队伍。为了从思想上组织上整合党的队伍,列宁对知识分子的"劣根性"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他认为,知识分子是"浸透了资产阶级精神"的,即是说,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精神上属于资产阶级的一群。革命胜利后,列宁极端重视文化教育与科学技术的作用,但是,他的主张是"利用"资产阶级的"旧专家",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红色专家"。斯大林

的思想与列宁如出一辙。可以说,把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明确地界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马克思的理论缺陷为之提供了可能,而明确作出这一判断的是列宁。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一个非常笼统、非常含糊的概念,它既可理解为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也可以理解为知识分子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无论哪种理解,都很难成立。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一部分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与技术工作,一部分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文学艺术活动。前一部分人直接或间接参与物质生产过程,他们的报酬是脑力劳动所得,完全不存在对他人的剥削;如果说他们以自己的才智为资产阶级服务,这种服务和工人以自己的劳动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并无区别。后一部分人中,除了极少数为实现、论证、宣传、巩固、改善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的人们以外,多数人的工作也不具备直接的或完全的阶级与政治意义。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知识阶层,只有一小部分人是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完全依附于资产阶级的。说知识分子是剩余价值的瓜分者因而应视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显然不符合事实,因为从事科学技术工作和生产管理工作的知识分子本身即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不加区别地说知识分子客观上为资产阶级服务因而应认定为"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我们也许可以用思想改造运动中北师大教育系邱椿教授的那句话加以驳斥:"说知识分子是为反动统治服务的,国民党兵工厂的工人又是为谁服务的?"说知识分子在精神即思想意识方面接近资产阶级因而应视为"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那么,马克思、恩格斯早已说过,在任何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都是那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工人、农民也不能免受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影响。考虑到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高等教育日趋普及,工人阶级知识化的进程迅猛推进,以体力劳动参与物质生产的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迅速消失,那么,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统统划归资产阶级的范畴,其荒

谬绝伦更加显而易见。可以说，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的近代知识分子同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差别。这是一个活动于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与社会管理各领域的松散的社会集团。它的内部构成千差万别，就其主体而言，应当视为一个以脑力劳动获取报酬的劳动阶层。

中国共产党对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作用的认识，既受到马克思的理论缺陷的影响，更受到列宁、斯大林理论与政策的影响，也与没有始终如一地重视旧中国的特殊社会环境以及新中国成立这一历史事件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有关。旧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华民族长期受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经常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生长起来的近代知识分子，在整体上是一个爱国的、进步的社会集团。他们中的核心分子在西方接受教育，但他们的思想意识、政治倾向与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不同。在历次社会政治运动中，革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始终是先知先觉者与实际运动的领导者、组织者。正如胡风所说，五四以后的知识分子，不仅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且革命的知识分子还是"人民底先进"。在 1927 年以后的 20 年间，知识界的中上层大多游离于国共两党之外，许多人主张建立英美式的政治加苏联式的经济。他们的政治倾向固然与共产党不同，但他们不赞同或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仍不失其为进步。解放战争中后期，在决定中华民族命运前途的最后时刻，知识分子集团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对新社会的拥护、对共产党的敬佩与爱戴、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他们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调整思想，努力服务于新中国的建设，在新旧社会交替的时候表现出了与十月革命时期的俄国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态度。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曾经注意到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新中国成立后他却没有肯定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与思想进步。他在 1957 年 4 月 10 日的一次谈话中说，现在

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那方面。无产阶级给他们钱，让他教书、办报，做文艺工作，这是赎买他们，要他们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不过，对资本家可以公开这么说，对知识分子不能公开这么说。他明确地把知识分子看做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一部分，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看做类似于对资本家实行的赎买政策，希望通过“赎买”达到消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集团的政治目的。即使按照“皮”“毛”理论，这也是解释不通的。

对知识分子实行思想改造的政策之所以错误，还因为它是战争年代政治思维和政策原则的延续，是一项过时的、应当修改或抛弃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内长期存在着轻视和排斥知识分子的传统。大革命失败后对知识分子的仇恨，推行党内干部工人化时对知识分子干部的排斥，苏区肃反运动中对知识分子的打击，是人所共知的。抗战初期，错误的知识分子政策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但理论与思想深处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并未受到触动。延安整风时期，形成了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方针。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中，对已经或即将在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队伍中担负领导责任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以实现革命队伍的高度整合，是必要的。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党的主要任务不再是革命而是建设；革命需要最大限度的集中，建设则需要发挥各个方面的主动性与创造性，需要思想的自由和组织形式的宽松。科学文化教育不再是革命的工具，面是相对独立的建设领域。知识分子也不再是革命队伍中次于工农的成分，而是越来越重要的建设力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知识分子群体无论存在怎样的缺点，他们所做的工作都是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因此，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应当是对他们继续进行“思想改造”，而是为他们创造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即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因不能很快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确需“改造”，也应当是一个在实践中自我调整的过程。忽

视因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必然带来的任务、政策的变化，在继续认定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一部分的前提下，以政治运动的形式，借助于思想乃至暴力的强制，无休止地对知识分子实行"思想改造"，这就不是把知识分子当做建设力量，而是当做了革命的对象。这种政策取向，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要求背道而驰。

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实质上是使知识分子非知识分子化的政策，亦即"知识分子工农化"。认定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自然也就认定知识分子的政治觉悟、思想水平、道德境界都远不及工农群众，因此必须到农村中去，到工厂中去，在阶级斗争实践中转变阶级立场与思想感情，把知识分子全面地"提高"到工农的水平。民主革命时期认识如此，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没有改变，而且对知识分子的贬抑不断升级。从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知识分子最无知识，中国革命是农民的军队打败了知识分子的军队，到"文化大革命"中大办"五七干校"，让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都贯穿着要求"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倾向。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目标始终存在着尖锐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从不否认知识分子是革命与建设的重要资源，亟思加以利用；另一方面，又把知识分子视为社会变革的障碍、复辟资本主义的精神力量，企图借助于政治运动，摧毁他们的独立精神，不但要改变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且要他们"洗心革面"，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一切具体的和抽象的方面完全消融于工农群众。所以说，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客观上不能不是消灭知识分子的政策。这不是推论，而是毛泽东本人反复申明过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执政党已经公开放弃了这项政策。然而，有些人直到今天还在肯定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政策为正确，岂非咄咄怪事！

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之所以发生长期的错误，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原因。轻视、排斥、打击知识分子，是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的消极传统之一。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无论在国际范围内还是在一国范围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起者、组织者、领导者都是知识分子，而人们却从来不肯承认这一基本事实。中国共产党亦是如此。从社会理想来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都受到过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这在毛泽东设想的以人民公社为基本单位的社会模式中曾经有过明白无误的表示。而无论西方的还是中国的乌托邦，那里面都没有知识分子的独立地位。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又受到过民粹主义的影响，而且始终没有彻底清除这种影响。民粹主义憎恨现代工业文明，憎恶人性堕落的城市，向往人间净土的农村，也就必然无视在近现代工业社会中迅速壮大、地位与作用日益突出的知识分子。按照斯大林的理论，共产党因掌握马克思主义而通晓社会发展规律，因此，决不需要知识分子的智力帮助，尤其不需要西方式的知识分子的所谓理性批判。同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对知识分子"俳优以蓄之"的消极成分和苏联式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管理体制，都绝不允许知识分子独立存在。知识分子要么从政治上、思想上、精神上绝对依附于统治集团，要么接受被消灭的命运。中国共产党既不能摆脱传统政治文化的束缚，又照搬了苏联模式，也就必然要实行这样的知识分子政策。

说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是错误的、不能成立的政策，并不是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毫无正确的成分，更不是要从根本上全盘否定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至少在民主革命时期，特别是延安时期，对知识分子实行思想改造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成功的。夺取革命的胜利需要一支思想、行动高度统一的大军，而当时的知识分子(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的知识分子)由于家庭出身、所受教育等因素的影响，需要根本地调整阶级立场、思想感情、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才能真正融入革命的队伍，成为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中的先进分子。毛泽东本人在不同时期都曾高度评价和

肯定过知识分子的作用，但是没有成为现实政策的主要基础。执政党未能根据革命胜利后根本变化了的情况，及时调整自己的知识分子政策，特别是及时调整改造知识分子的方式与方法，这就酿成了实践中越来越严重的偏差和错误。1956 年年初的知识分子会议曾表现出实行新政策的明确意向。从新中国建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执政党最高领导层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与政策主张远不是统一的。费孝通先生在 1984 年写的《知识分子和智力资源调查自述》一文中说：“在中国社会主义时期，这个阶层（知识分子）应放在什么地位？对其作用如何评价？这些问题很早就提出来过，也有过一些结论，可是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回想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发展时期，国家建设急需知识分子的协力合作，而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如何使用知识分子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般是爱国的，过去受到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压迫，新中国成立后就存在着为人民服务的积极性，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就应该放手使用。另一种看法，认为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阶级烙印深，在头脑里充满着封建、资产阶级的思想，必须和民族资产阶级一样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前一种看法，直到 70 年代后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占上风，在过去近 30 年里，后一种看法越来越压倒一切，十年动乱，达到了高峰。”[①] 费孝通先生对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概括，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是同本书通过具体的历史分析得出的结论一致的。

10.3 革命中国：一个不适合“旧知识分子”生存的社会环境

执政党改造知识分子的错误方式和方法，是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集团在新中国建立后不久即归于毁灭的直接原因，但是，

① 《费孝通选集》，第 397 页。

革命胜利后对社会进行革命性改造而形成的新的社会环境与社会风气，也促成了“旧知识分子”群体的灭亡。

《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的政权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新中国是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国家，知识分子不能在政治与社会地位上与工人、农民平等，而被视为资产阶级的附庸。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完成后，毛泽东突然宣布放弃新民主主义理论，立刻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这就意味着要通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立即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顺理成章的是，作为资产阶级附庸的知识分子，也必须通过“思想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这就是说，新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结构，执政党推进社会变革的战略规划，从根本上决定了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群体必然被消灭的命运。

知识分子集团的独立存在，需要有独立而稳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做保障，以自由流动的社会人事体制为条件。也就是说，只有当人们自由发表意见而不顾虑这样做会损害自己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时，才能有知识分子的独立存在。旧中国是一个私有制的社会，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于地主、资本家与官僚家庭，不少人有属于自己的一份产业，经济困难时能够得到家庭的资助；人事可以不受限制地流动，“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合则留，不合则去”。在反动统治之下，革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经常感受到暴力的威胁，许多人为了保住一份在战乱与萧条环境中不易得来的一份工作而小心翼翼，但来自家庭的经济支持与自由流动的人事制度，的确支持着相当一部分中上层知识分子直言的勇气。新中国就不同了。土地改革和三大改造完成后，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完全断绝了与家庭的经济联系，他们和他们的家庭的生活完全靠本人的已经大大降低了的薪俸来维持。“包下来”的政策固然解除了知识分子失业的隐忧，然而，全国整齐划一、联成一气的户籍制度、人事制

度、档案制度和学术、教育、文化、科研单位的机关化、行政化管理，织就了一张无边无际的组织之网，全社会的每一人、每一物，都成为亿万网结之一。在这张网上，每个人的身份、地位、作用是固定的，他同相邻网结的关系是固定的。他无法从网上脱落，也不能从网上脱落，因为网不但是自由的限制，而且是生存的依靠，脱落即是死亡。在这样的体制中，知识分子完全失去了流动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大到国家政治，小到具体工作，他们发表的意见若超出了"组织"所能容忍的限度，轻则影响晋职晋级，重则失去工作岗位，使个人和家庭立即陷入饿饭的窘境。国家既然完全控制着知识分子的基本生存条件，他们也就不能不俯首听命。何况组织化的生活本身，就是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巨大力量。

知识分子的独立存在，还需要有一定的社会政治条件，特别是对于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法律保障，因为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的知识分子，总是要通过公开发表的具有知识分子特点的言论来显示其存在的。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思想自由，也就没有知识分子的存在。《共同纲领》和宪法历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但一直缺少具体而明确的法律解释与法律保障，几十年来，没有人反对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但是，领导层又一直坚持"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分开"，言外之意是，学术问题可以自由讨论，政治问题则不允许自由讨论。然而，知识分子作为公民，享有过问政治问题的权利，许多学术问题又如何能与政治问题截然分开？法制保障的缺少，政治与学术关系的混乱，为一些人随意把知识分子的一些独立意见上纲上线，用"右派分子"之类的帽子把敢于直言的人打入"另册"提供了条件。1949 年至 1957 年，新中国诞生不久，一方面是人们还习惯于用阶级斗争的眼光和手段认识与处理问题，一方面法制又极不完善，这样的社会政治条件，自然不利于知识分子的生存。

知识分子群体的独立存在，需要全社会对知识分子价值的认

可与尊重。1949 年至 1957 年的中国，不存在这样的条件。经过以铲除剥削制度为基本内容的社会改造与大规模的政治宣传，工农群众在认同新的政治制度的同时，也认同了执政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在他们看来，中国革命的成功主要是农民的贡献，知识分子不过是“摘桃派”；知识分子内心肮脏，只有进行脱胎换骨式的彻底改造，才能为新中国、为人民所用。划分阶级成分的时候，知识分子的阶级出身要按照其家庭成分来确定，这就把大部分知识分子同剥削阶级联系在一起。人民群众对地主、资本家的憎恶，自然有一部分转移为对依靠家庭剥削收人的支持而获得知识分子地位的地主、资本家子弟们的憎恶。因工农革命胜利和抗美援朝运动等得到强化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某些方面发展为仇外排外情绪，这种情绪表现为对西方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有外国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的否定。这一时期的工农群众乃至执政党的党员、干部，严重地缺乏对知识分子群体价值的正确的、稳定的认识。像思想改造运动那样的从政治、思想、道德、人格等方面全方位地贬低和侮辱知识分子的行为，被认为是正常的、革命的行为；只有按照工农群众纯洁而高贵、知识分子肮脏而卑鄙的固定模式撰写的文艺作品，才被认为是真正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社会风气是鄙视知识分子，而不是尊重知识分子。革命阶级对反革命阶级、不革命阶级的清算，被压迫民族对压迫民族的清算，旧社会没有条件受教育的人对有条件受教育的人的不满，执政党的自觉引导和劳动群众自发的否定既往的一切的偏激情绪，造成了极不利于知识分子生存的社会风气。在这样的环境中，知识分子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却得不到任何的社会同情，孤立无援，遂成为被社会唾弃的群体。

从更深的层次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轻视、歧视、打击知识分子的政治与社会风气，同民族的某些传统文化心理不无关系。封建社会的士子们，以读书做官、进入统治集团为惟一出路，他们是

与劳动人民对立的一群，实在不配得到劳动群众的尊重。中国的老百姓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格言，不惜倾家荡产也要让子女受教育，好像非常尊重读书人，但是，他们尊崇的不是书生的知识，而是书生与权力、财富的联系。“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盅粟”，就是这种动机的生动描述。学而优则仕，世人景仰、羡慕；学而不得仕，就会被看做孔乙己式的人物。“十年寒窗苦，一举成名天下闻”的故事固然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永久题材，“书呆气”、“落第秀才”、“落魄书生”、“穷酸文人”、“书生气”、“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手无缚鸡之力”、“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等贬词谑语同样也是民间文学和口头话语中刻画知识分子形象的典型语言。新中国成立后，这种传统心理几乎没有任何的改变。在工农群众心目中，知识分子就是把麦苗当成韭菜的那种人；许多党员、干部，长期以“大老粗”为荣，“知识分子”成了一顶受人嘲笑的帽子。另外，在我们的民族心理中，还有着墨家“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的传统，这种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可贵观念，与马克思理论中推崇体力劳动阶级而轻视以脑力方式参与物质生产的知识分子的缺陷相结合，逐步演变为对劳动方式的片面理解，即认为体力劳动是劳动，脑力劳动不是劳动；物质生产是劳动，精神生产不是劳动；体力劳动者是劳动者，脑力劳动者不是劳动者。再进一步的推论，就变成了知识分子是“寄生阶级”①，按照“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当在消灭之列。经过多年的“教育”和“改造”，许多知识分子也接受了这样的逻辑，渐渐形成了在工农群众面前自惭形秽、无法摆脱的“原罪感”和自卑情结。深深潜藏于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工农群众中的这种鄙视知识分子的心理，既是导致执政党知识分子政策错误的社会基础，又是形成贬抑知识分子的社会风气

① 邵翰齐：《中国知识分子向何处去》，《文汇报》，1949年6月21日。

的温床。这种民族文化心理使得执政党只要发动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就能立即得到全社会的响应，掀起足以淹没知识分子的滔天巨浪。

知识分子的群体精神，如同其他一切社会共同体一样，是在同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和反复冲突中形成的。社会共同体对于社会环境的关系，一般是被动的，因为无论个体还是群体，都无力选择社会环境而只能适应社会环境。当社会环境特别是社会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社会共同体的本能反应是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新的环境。旧中国的知识分子主要基于爱国情感而接受共产党、新社会，但精神结构与工农群众、共产党人相去甚远。在社会制度与话语规范双重转换的情况下，在以暴力为后盾的政治运动的反复冲击下，知识分子群体的内心矛盾冲突日趋加剧，迷惑、彷徨、自责、屈辱、愤懑、自卑、恐惧、悲观、绝望、畏罪、自我保护等消极心理的交替反复，逐步改变了知识分子特有的心理结构，使他们的独立精神丧失殆尽。

10.4 自我审视：知识分子群体毁灭的主观原因

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集团之所以难逃毁灭的命运，主要是执政党的政策错误与社会环境变化所致，不可以套用外因与内因关系的原理加以解释。但是，这一重大历史曲折的铸成，确与这个集团自身的某些特点和弱点有关。

首先，知识分子集团的群体精神、价值观念与新体制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旧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精神与价值观念的形成，受到诸多性质不同的外部因素的影响。最重要的三种因素是：在中国和西方接受的新教育；五四运动（更准确地说是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与熏陶；在清末、袁世凯、国民党统治时期受到的政治、思想与社会压迫。直接在西方接受的教育不用说，即使由西方传入中国

的新教育,包括中国人自办的新教育和外国教会办的新教育,也不能不程度不同地包含同封建主义尖锐对立的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西方文化的价值观。以科学与民主为大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彻底反封建的思想运动,它反对的是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提倡的是来自西方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西方式新教育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使崇尚民主反对专制,崇尚科学反对迷信,崇尚自由反对压迫,崇尚法治反对人治,崇尚独立思考反对奴隶盲从,成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集团的主导精神与核心价值观念;反动统治阶级的专制压迫,则从反面强化了知识分子集团对西方化的政治与文化价值的追求。所以,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受到西方文化强烈影响的群体。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期相比,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由于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落后的经济与社会基础的作用和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武装斗争中形成的军事传统,中国在移植苏联的社会模式时更加发展了它的制度精神、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中的封建因素。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实行高度集权的体制中,需要的不是民主,而是“集中”;不是自由,而是“纪律”;不是科学,而是教条;不是敢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而是惟命是从的“知识奴隶”。知识分子群体坚持与表现独立的精神与价值追求,要受到社会的反对、暴力的打击;放弃独立的精神与价值追求,则是放弃自己的独立存在。两种情况,一种结局,都是群体的毁灭。

其次,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集团的主体脱离物质生产过程,使它难以得到劳动群众的尊重。在经济落后、人民贫穷的社会里,知识分子只有直接参与具体的物质生产过程,并以自己的知识带来社会财富的显著增加时,才能得到广大劳动群众的真正尊重和珍爱。脱离物质生产过程的知识分子,对于工农群众来说,只能是寄生的、靠他们养活的一群。在现代社会里,科学技术人员应当是知识

分子集团的主体。可惜的是，近代中国的特殊条件决定的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造的迫切任务，把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吸引到了政治、思想、文化、教育、军事领域，只有极小的一部分人从事科学技术工作。长期的战乱与政治的腐败又使中国的工业始终得不到稳定发展的条件，因此，连这极小的一部分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也得不到正常发挥的条件，更不用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扩大自己的队伍了。旧中国的知识界，读书做官的风气仍然存在，科学技术职业得不到重视。新中国成立时，全国高等院校的工科学生数量微不足道；全国的农业科技人员只有数百人，从事工业技术工作的不过数万人。也就是说，90%以上的知识分子游离于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以外。这样一个的确要靠工农群众来养活的知识分子集团，怎么能够获得工农群众的尊重？在它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时候，又怎能期望从工农群众那里获得同情和支持？

再次，知识分子集团的群体精神中有封建士大夫阶层的意识遗留，这种消极因素也促成了群体的毁灭。孔子变官学为私学以后，中国逐步出现了知识分子群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形成了许多优良的群体道德品质。但是，"学而优则仕"的功利追求使这个群体自产生之日起就有致命的缺陷。读书既然以人仕为惟一目的，也就要努力认同统治集团的价值观，以致在政治上、精神上依附于统治阶级，始终不能成为独立的群体。当自己的思想与统治集团发生冲突时，知识分子的本能反应是通过所谓内省的功夫否定自我，认同对方。五四新文化运动强烈地冲击了这种传统的奴隶意识，但不可能完全改变历经两千年历史积淀而形成的这种心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接受新教育的同时仍然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其独立精神扎根未深，极易摇动。在国共两党对峙时期，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能以"名士"的身份，或者游离于斗争之外，对两党评头论足，或者企图成为第三种势力，一展其政治抱

负。到了革命成功、大一统局面形成、新的统治集团要求知识分子恢复其传统地位之时，知识分子群体传统的依附心理立刻发生作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有些人的检讨否定自己的所学、所思、所做简直如弃敝履。这种现象可以看做是向真理投降的举动，也可以看做传统的依附心理发生作用的证据。

最后，由于传统心理的作用与屈从于外部压力，知识分子个体与群体的独立人格也就不能不彻底地消解。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说过："知识分子不属于任何特定的经济集团，他们所以构成一个独立的阶层，是由于他们恪守知识和思想的信念，以极强的自觉意识承担着社会发展的责任，肩负着人类的道义。"①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最杰出的代表鲁迅先生阐发过同样的思想。知识分子作为思想者，其人格与精神必须是独立的、自由的，这种独立精神应当通过言论与行动来表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知识分子并非没有捍卫过自己的独立与自由，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在强力面前出于自保自存的求生欲望，表现了明显的软弱，一步步失去了自我。1949 年至 1957 年间，知识分子做得最多的事是忏悔。著名美学大师、北京大学教授宗白华先生说过："独立思考的人们能够通过忏悔而觉悟，净化灵魂。本来是好事。只有人类能够做到，禽兽做不到。但是，所谓'忏悔'，不能一概而论。有诚心诚意的自由觉醒的真忏悔；有各种压力下的虚假的忏悔；有精神奴役下的愚民的忏悔。第一种是真忏悔，第二种是假忏悔，第三种是愚忏悔。历次整人的政治运动中，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人人过关的思想汇报、有口无心的检查材料，往往是假忏悔。而在所谓文艺整风、组织生活、大跃进、反右倾的'交心'中，则

① 转引自余杰：《王府花园中的郭沫若》，《反思郭沫若》，作家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版，第 283 页。

有些是愚忏悔。"[①]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自我检讨为主要形式的知识分子忏悔,就其主流而言,正是从真忏悔变为愚忏悔,再由愚忏悔变为假忏悔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放弃了自己的尊严与人格,同时也就出让了生存的权利,沦为他人精神的奴隶和权力的附庸。不能低估当时知识分子生存的艰难,也不能要求他们都像陈寅恪先生那样公开坚守"学术自由"与"精神自由",因为中国没有几个人有他那样的"资本",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在人格消解、自我丧失这一历史现象背后,潜藏着知识分子群体心理结构上的重大缺陷。

10.5 回归五四: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方向与使命

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集团的毁灭,首先是精神意义上的毁灭。中国的近代知识分子集团,从精神生命上说,是五四的产物。发源于五四的一股最先进或最激进的思想与政治力量,以最激烈的方式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却在新中国成立后 30 年间的"继续革命"中,一步步走向了与五四的对立。在对所谓"资产阶级思想"的长期批判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残余乘机卷土重来,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面复辟。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集团的毁灭,不过是一个时期内政治与社会运行逐步背弃五四的表现与结果之一。五四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思想起点,也是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母亲,她赋予中国知识分子新的精神生命和历史使命。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毁灭,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在新旧社会交替的革命变革时期,在外部压力与内心冲突中,失去了五四赋予的独立精神。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要重建自己的队伍,使自己成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先锋与骨干,首先要做的,就是寻回五四精神,保持

① 陈明远:《湖畔散步谈郭沫若》,《黄河》,1998 年第 5 期。

五四精神。

五四要求知识分子的，是精神、伦理、道德的解放与独立。五四的先驱们指出，中国政治与社会现代化的前提是国民性的彻底改造，“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觉悟”[①]，这个任务要由知识分子来完成。因此，知识分子必须首先从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完成自身的重铸，从而获得“为人民师”的先决条件。知识分子的重铸，是精神的彻底改造，核心是摈弃“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的“三纲”之说，摈弃“一切操行，悉非义由己起”、“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树立“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而脱离他人附属品之地位[②]，确立主体意识，保持精神与思想的完全独立。为此，就要打破一切迷信，不迷信传统，不迷信权威，不迷信任何思想与学说，因为世界上“本来没有推及万世而皆准的真理”[③]。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毁灭，就是因为他们在经过短暂的本能抵抗之后，最终还是失去了主体意识，失去了精神与道德的独立。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是在改革开放导致传统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结构日趋瓦解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但决不可以说我们天生就获得了精神与道德的独立，因为以己属人的奴隶道德并不必然地与线装书联系在一起，它渗透在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的每一个毛孔之中；它不一定完全表现于对传统的膜拜、对政治强权与思想专制的屈从，同样也表现为全球化过程中民族意识、民族文化的迷失。

五四的旗帜是科学与民主，这既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认定的强国之路，也是五四赋予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中国的繁荣富强，在于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推进物质生产的进步，但它需要现代化的

---

①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新青年》，1卷6号。

②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新青年》，1卷5号。

③ 陈独秀：《学说与装饰品》，《新青年》，8卷2号。

政治与社会结构和开放性的思想文化条件做保障。在过去的80年中,前60年没有获得这样的条件,近20年情况有了极大的改变,但也还没有完全获得这样的条件。科学与民主,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前提。倡导科学、尊重科学,就是要打破一切迷信、一切教条,以完全自由和开放的心态思考大至国家政治小至个人生活领域的一切问题。民主就是要打倒一切领域、一切形式的专制,用完善的政治与社会制度实现人民的宪法地位,保障公民的权利。历史证明,在有2000多年封建传统的中国,科学的观念、民主的制度,不是靠一次或几次革命就能建立起来的,它更是一个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改造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的漫长过程。知识分子不但要参与民主政治的论证、设计与施工,更要承担起改造民族政治文化心理的重任。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必须继承陈独秀、鲁迅等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衣钵,对民族的"劣根性",对现实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封建残余,进行持之以恒的批判,必须成为新思想的发明者和传播者、社会良心的承载者、社会公正与正义的代言者、社会弊端的批判者、新文化的建设者、新道德的鼓吹者,借助理性的批判,促使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社会能够向着给绝大多数人带来幸福和利益的理想状态前进。长远说来,实现科学与民主两大任务,知识分子也许承担着比政治家更重要、更稳定的责任。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要建立深厚而坚实的社会基础,必须自觉地调整群体的内部结构。如前所述,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集团的主体脱离具体的物质生产过程,是导致群体毁灭的重要内部原因。当代知识分子应从中吸取教训。中国仍然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发展经济、摆脱贫困仍然是最迫切的任务。知识分子只有在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上显示自己的独特价值,才能赢得全社会的尊重。不可否认的是,现在有一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鄙薄科学技术工作的心理,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天地君亲师"是并列的,只有"为帝

王师"或"为人民师"者，才称得上是知识分子，从事自然科学技术的人算不得知识分子。这种传统心理必须改变。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知识界必须把大部分最优秀的力量投入科学技术与经济领域。"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同样是五四精神的分支。它们在新中国成立后曾长期受到激烈批判。在现代化建设时期，知识界应高高举起这两面旗帜。

从旧中国过来的、以欧美留学生为核心的知识分子，也许是生不逢时的一代。他们在旧中国受到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进入新中国又受到高度集权的社会体制的束缚。这个群体的毁灭，不是他们自己的责任，而应归咎于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当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绝不能忘记，他们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社会群体之一；中国现代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基础，是他们奠定的；中国现代科学文化教育各个领域的大师，存在于这个群体之中；他们中的许多人的科学水平、文化修养、学术建树、社会贡献，令人仍难以望其项背；他们那种超越和压倒一切的火一般的爱国情感、不计个人名利得失而献身于事业的执著，更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楷模。在这个群体中，那些早年接受马克思主义而走上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固然是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即使那些在思想上政治上曾陷入过困惑甚至犯过错误的人，也不过是在前进路上经历过一些曲折，仍不失为五四的传人。当代知识分子要重建与五四的精神联系，是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许多东西的。

新中国已经走过了五十年的历程。经过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国知识分子都在思想上获得了巨大的进步。邓小平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已经成为执政党的重要指导思想，"科教兴国"已经成为党和政府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知识分子越来越得到全社会的信任和尊重。社会环境的根本改变，为中

国知识分子发挥聪明才智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中国知识分子应当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局面,发奋工作,自强不息,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